重返巴格达

唐师曾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钻进了金字塔

唐师曾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从战场归来

I Survived The Gulf War

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
——俾斯麦

唐师曾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我钻进了金字塔

我从战场归来

重返巴格达


迎接战争和迎接
太阳一样。
——麦克阿瑟
我钻进了金字塔
I Got Into The Pyramids
唐师曾 著
Xinhua News Agency
新华社中东总分社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钻进了金字塔

唐师曾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钻进了金字塔 /唐师曾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54-6899-4

I．①我…

II．①唐…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5082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　曦　罗小洁

装帧设计：谷　宇

媒体运营：张　坚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　　版：

長江出版傳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　　话：027-87679310

传　　真：027-87679300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　　编：430070
发　　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58678881
传　　真：010-58677346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　　编：100028
印　　刷：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0千字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献给母校北京大学

她教我懂得民主，科学，自由，容忍

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目录

CONTENTS

再版前言　战场归来二十年　唐师曾

序　唐老鸭，高手也　张中行

自序　法老的符咒　唐师曾

我见到了卡扎菲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

我钻进了金字塔

哭泣的骆驼

从囚犯到总统

在天安门城楼挥过手的人

我的外国记者朋友

流入梦中的苏伊士

铸剑为犁的拉宾

梦系魂牵阿拉曼

四进巴格达

埃及地震亲历记

我看到了神光

我的耶路撒冷

我爱我妻

“长城-金字塔”在召唤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跋　用生命写成的书　任幼强

返回总目录

再版前言
战场归来二十年

唐师曾

老鸭《战地三部曲》都是老书，其中最老一本已诞生20年，先后被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四次再版。尽管时过境迁，但因独家、客观、亲临一线而不可替代。

老鸭这辈子做对两件事：上对一所大学；选对一个职业。亦做错两件事：误入一个组织；错结一次婚。或许人生本来就没有对错，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老鸭在新华社有两大发明：（1）闪击，将古德里安的“闪击战”应用于突发事件，在孕育期潜入，在爆发时采访；（2）语像，利用“语言＋图像”跨界叙述，产生热核武器的聚变效果，突破传统单一表达的局限。

老鸭以往的两位责编都是比我大十来岁的北大中文系学姐，退休前给老鸭极高的文学滋养。此次再版，责编陈曦是比老鸭小二十多岁的机械系小妹，高中四中、本科清华，人生的基础是靠“高中＋本科”浇筑的。

我就是从“高中＋本科”开始崇拜卡帕的，亦步亦趋一直走到现在，capa@sohu.com已经坚持了十多年。我为海南出版社《卡帕传》

写序，为中国摄影出版社《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前沿50年》《〈生活〉画报和〈生活〉摄影师》……等书写序。意大利使馆让我代表中国参加“中意战地记者论坛”，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命我为《戈雅，所有战争的新闻记者》写前言。日本共同社河野把价值连城的“Leica III”送给我这个“中国卡帕”（河野语），它是卡帕在越南踩地雷时最后一刹手中的“名器”，通过旁轴取景器偷窥枪口，感到毫无遮挡的恐惧时按下快门。

家族和北大的综合教育，使我养成独特的写作习惯：亲临现场、自然定位、社会延展、独立思考、文学描述，五个维度缺一不可。作为新闻记者，我只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基本加工，简单处理后，以新闻的特点、速度即刻传播。不计时间成本地对某个问题深入研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上星期，我和北大中文系学长河野彻在东京久别重逢，彼此庆幸都还活着。1990年我们相识于战火下的巴格达，当时我们初出茅庐、满腔热血、无所畏惧，为一张独家照片可以出生入死。现在，河野是共同社国际局次长，老鸭因“再生障碍性贫血”“海湾战争综合征”原地踏步20多年。运气更差的是在巴格达结识的巴萨姆·库巴，他2004年6月殁于汽车炸弹，时任伊拉克副外长。库巴出任驻华大使6年期间，每到周末都和我去密云水库游泳，还为我的《重返巴格达》写序。

改革开放之初，受传统等多重桎梏，中国新闻采集方式严重落后，妄加评论者多，亲临一线者少，复制转帖，“愚乐”大众，误导政府。1991年1月15日海湾战争爆发之际，时任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处长的陈佐夫告诉老鸭，某中南海会议上，新华社社长穆青拍案而起，“巴格达没中国人了，只有一个新华社的唐老鸭！”

12亿中国人中，我是被选中进入巴格达拍摄海湾战争的唯一者，年轻气盛，血性方刚。凭与生俱来的新闻本能追逐“异动”，用镜头捕捉画面，以文字交代因果，国际视野、职业素养，合成有生命的新

闻“语像”。新华社副总编王文卿看了我的传真说：唐老鸭写的干草都带着露珠。

以科学的眼光，用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这是我的书20年后仍能以不错的印数和版税再版的基础。

唐师曾　于什刹海

2013年10月31日

序
唐老鸭，高手也

张中行

近年来我感到日暮途穷，生活成为大部分时间面对稿纸，目光很少射到一尺以外，以致连唐老鸭（学校注册和身份证之名为唐师曾）这样一位性格奇、造诣高、成就大的人也毫无所知。后来有了所知，是他找上门来。大致是去年夏天，他来个电话，说姓唐，新华社记者，想来采访我，向海外发一篇介绍。我说我没什么成就，往远地吹嘘更不合适，还是以不如此为是。他不退让，并拿出新武器，说他也出身于北京大学（1983年国际政治系毕业），采访向海外发是他每月一次的任务。听到同出一门，我只好退让，说欢迎来谈谈。不久他来了，门开处，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最上部是长而秃的头，使我吃了一惊。坐谈了一会儿，拍照了一会儿，我的印象由惊奇变为亲近，觉得他为人憨厚，对一切事都特别认真，简直近于痴。告辞前留下一张名片，因为我眼既昏花又缺少注意力，只觉得上面还有个似曾相识的漫画，究竟表何意，未想就放过去了。

很巧，之后不久就见到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的高莉芙女士，闲谈触及采访的事，她说那就是新华社有大名的摄影记者唐老鸭，人很有意思，新闻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如梦初醒，找出他的名片看看，原来上面的漫画就是与米老鼠齐名的唐老鸭，只是胸前多个相机。原来的印象未变，却加点新的，是立身处世还不少风趣。又是不

久之后吧，他来送照片和已刊于报刊的照片兼文，还带来他1994年出版的一本《我从战场上归来》。这本书是写他在海湾战争中的采访情况的，其时我正忙，只看了其中的几十幅照片，书就被更想看的友人拿走了。“还书一痴”，到我想看的时候，只好向老鸭呼叫。很快又送来一本，我看了。有什么感受呢？除了对于书，比看小说更加感到新奇以外，主要是对于作者，原来的憨厚或痴不变，要加上许多新东西。占首位的是胆量稀有，海湾战争，现代化武器的烟云之下，出生入死，他走了五国，看来总是乐呵呵的。其次是事业心强，为抢几个镜头，真是连命也不要了。其三是还多有机智，异国有异俗，而且是战时，困难甚至危险多到数不清，靠他能够随机应变，都化险为夷。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愧为北京大学出身，而且学国际政治的，域外许多国、史、地、统治阶层、人民生活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化为文字就能内容丰富而确凿可信。他是摄影记者，摄得之影也就多值得欣赏，如这本记海湾战争的，有个“‘爱国者’弹道导弹轨迹”之影，又有个“生离死别的以军恋人”热吻时之影。我见到，就真想揪住老鸭问问：“这都是万钧一发之际的难于瞥见之景，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又登门，送来一部书稿，总有十几万字吧，仍是记国外采访情况的，所以取名为《我钻进了金字塔》。他说书已在印，希望我看完写几句，为同学助助威。能写不能写再说，总可以先睹为快了。于是翻开看。正文18个题目，可见写法要化零为整，想法大概是，不说则已，说就说个痛快。果然是折子戏变为整本戏，看也就可以看个痛快。正赶上我将外出，未能篇篇俱到，只是看了几篇特别感兴趣的。语云，尝鼎一脔，所以也就可以说说新的一些心得。已经写过的优点不重复，说这未问世的一本里使我看时兴奋、看后念念不忘的，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几乎没有想到，对于异域的各方面，他竟有如此丰富的知识。以《铸剑为犁的拉宾》一篇为例，写拉宾的经历和突出的成就，可谓面面俱到，巨细不遗，简直使我有个感觉：根据这一篇，可以为拉宾写个简要的年谱。其中写往乌干达救人

质一事尤其使我感兴趣。这个看似神话的举动我在某期刊上见过，说得比较概括，到老鸭的笔下，一切都化为具体，连谁指挥，如何化装，用什么枪打都说到了。这样写，就使纪实具有了戏剧的效果，所以干脆就走入剧场，不能不高喊一声“好”！二是还善于剪裁，能取重舍轻，常常不乏画龙点睛之笔。仍以写拉宾的一篇为例。拉宾是政界大人物，所行或所记应该都是会场上或战场上的大事，可是这位老鸭也述说了与丽哈恋爱拖延的事，不穿防弹背心以致被刺身死的事。这看似闲笔，却既可寓褒贬又可增情趣，取得开卷如“漫游奇境记”的效果。三是更想不到，他不是学文的，却常常显示有雕龙的巧技。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诌文，开头难，结尾更难。我看了这本书稿的第一篇，讲见卡扎菲的，就很欣赏那段结尾，照抄如下：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唯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我来了，我看见了”，等于用画笔画出他的性格。后面还有“残阳如血”，是掺杂一些轻微的惆怅吗？难说，此之谓余韵不尽。能如此，高手也，应该赞扬。如何措辞呢？想借用胡博士在红楼里常说的一句话，“北大不愧为大”，能够养育唐老鸭这样既能拿相机又能拿笔的人。

張中行

1998年4月1日

于元大都北郊

自序
法老的符咒

唐师曾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病房里坐井观天闲肌难耐。医生让我静养，可每到子夜，所有电台都说完晚安之后，我还在双目圆睁怒视天花板。我一直拥有大牲口般的健康，低地高原、严寒酷暑、战场疫区，可谓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可现在从外到里都令人忧虑。首先我的右腿受伤后未及时就治，至今周长已比左腿细了两寸。以后发现，心肺肝胆都与常人不同。当301医院建议我摘去萎缩的胆囊时我大叫不可，人可以无心不可以无胆。X光、B超，“肝胆相照”之后我肝火上升，见谁都有气，把身边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一遍。此时我的白血球仅为2600，不足常人的一半。

一个月内我撅着屁股在北京医院、301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连续做了3次骨穿一次活检之后，显示的特征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合演的《血疑》中的“不治之症”。医生怀疑我受过核辐射污染。我不断变换卧姿，幻想有林妹妹跳出来让我敲骨吸髓。可面对我这个四处生事的大白胖子，所有人都摇头说不大可能，我自己更深信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1990年在海拔6860米的布堪达阪峰下，西宁高原生物所的医生为我验血时，说全队68人中，只有我的血足以与出生在沱沱河的藏人恰加媲美。

那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半年的野外生活，我认识了《民族画报》记者凌风。在高原寒风掀动的帐篷内，他每天不辍地给3岁多的儿子写信。听他讲，他的儿子叫凌晨。从此每当高原旭日金黄的暖光照进帐篷，我都想起这个名字温暖可爱的孩子。于是我第三者插足，给他们父子的信画插图。吉普车追藏野驴，爬冰塔林，还有千奇百怪的高原生活。我羡慕他和他的儿子。

光阴荏苒，到1994年我从中东回国时小凌晨已8岁。现在是轮到他为我写的文章画插图。除天赋之外，小凌晨更多的是善良。每次得知我受伤、生病、失恋或诸多不如意时，他都会伤心得大哭，并旗帜鲜明地向一切伤害我的人、物开战。去年我一人驾车环绕美国，他特地从五台山请来护身符让我带在身上，保我平安而归。郭沫若《棠棣之花》里有句台词："有了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儿女；有了好的儿女，才有好的国家。"凌晨的母亲是恢复高考头一年考进北大中文系的，据说当年同班的凌风慧眼识珠，以"不成功便成仁"自沉未名湖相要挟，才把我这位善良的师姐弄到手。

母校百年华诞，CCTV两套人马找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动员我再次露脸为母校效力。《世界博览》主编任幼强也动员我把这几年的辛苦整理一番，献给我们的母校。为母校祝寿，儿子自然尽力。

可惜我百病缠身，拖着输液瓶在纸上乱画，连派克45型钢笔的钢杆都被我捏断过两根……心灰意懒有如诺曼底之战后受伤住院的隆美尔。其实还有几篇如《家在开罗》《贝鲁特绿线》《长长的尼罗河》《戈兰高地》《该不该修阿斯旺水坝》等正在炮制之中。时至今日，离北大百年华诞"五四"大典仅剩一个月，而我病体孱弱，显然无力完成学长们布下的作业。

取名为《我钻进了金字塔》很合我现在的处境。外人以为我事业如日中天，正勇攀金字塔顶，其实我肉身已处于地层深处。更深夜静扪心自问，大概是当年在开罗年轻气盛，乱闯金字塔，惹恼了当地头

号大法老，祭起法老符咒，压得我从此永无出头之日。特长荒废，鸡飞狗走，事事不顺。进而侵浸身体，以致今天愚人节还趴在手术台上，再一次骨穿取活体。一阵毫无警告的剧痛之后，麻药麻痹了整个后腰，大脑却清晰如刚擦过的玻璃。回首往事，或许海湾战争期间在伊拉克的半年中，我的确被辐射过……

唐师曾

1998年4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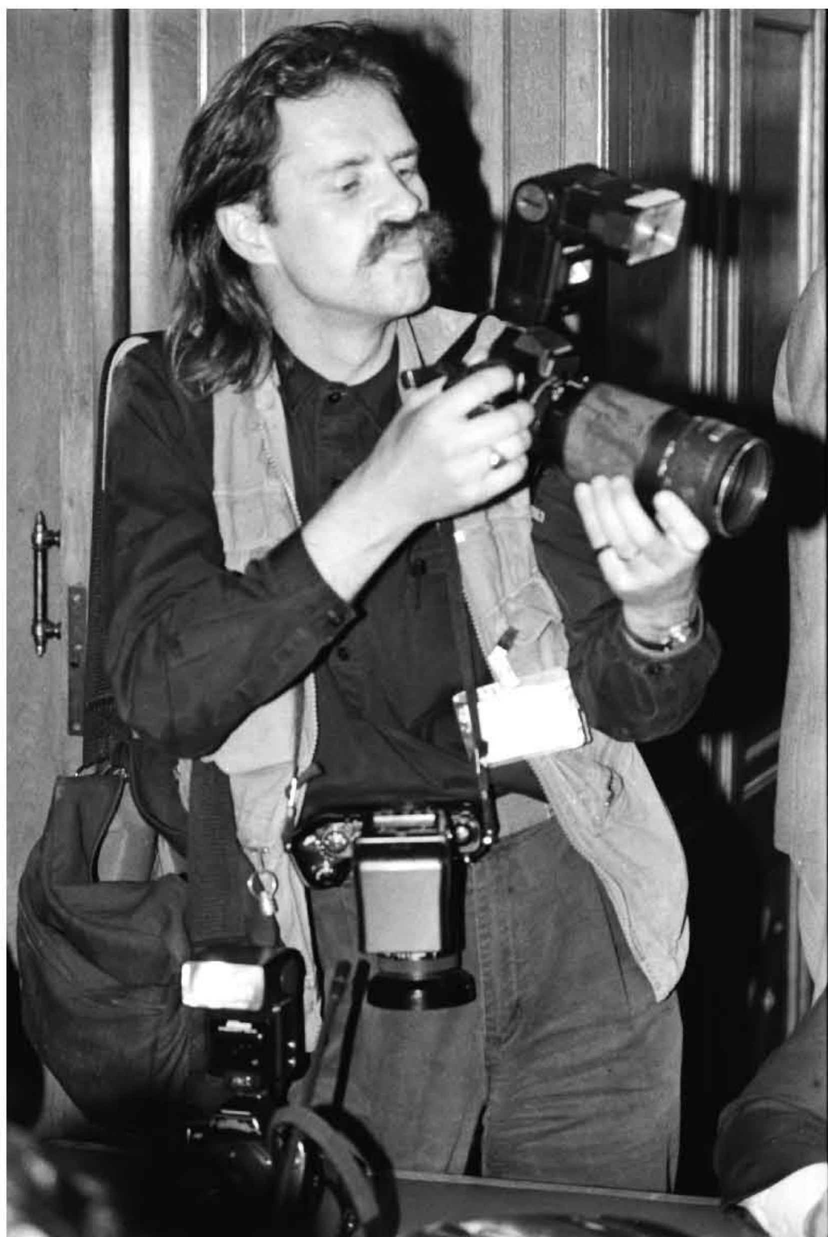
于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穿之后

我见到了卡扎菲

新华社记者独得签证

我真不愿将好朋友“断腿巴利”扔在开罗，自己去闯利比亚，这与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信条不符。利比亚驻开罗使馆几次警告我离美帝远点儿，我上司也严令我不要再惹是生非。当我怀揣利比亚入境签证，与分社英文记者润哥爬上开往利比亚的长途汽车时，我还在为没能帮“断腿巴利”弄到利比亚签证而自责。

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以色列绕道塞浦路斯、埃及、约旦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交给我一封信，还关照道：“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烽火连天的巴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美国摄影家、因拍摄艾滋病而成为世界新闻摄影大赛金牌得主的阿龙·瑞宁格寄来的，他对我“刚在纽约出版了熊猫画册就半途而废地参加海湾战争”大为不满。阿龙在信中列数战争的几大罪恶，劝我离战争越远越好。知道我为人固执，他还连篇累牍地举了一大堆例子，其中就有他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被打断了一条腿。阿龙力诫我要珍惜小命，最好还是回秦岭去寻找大熊猫，或是重返可可西里探险队继续我的世界屋脊探险，可就是别碰该死的战争。最后，他托我有机会路过开罗时，千万别忘去看一眼“可怜的断腿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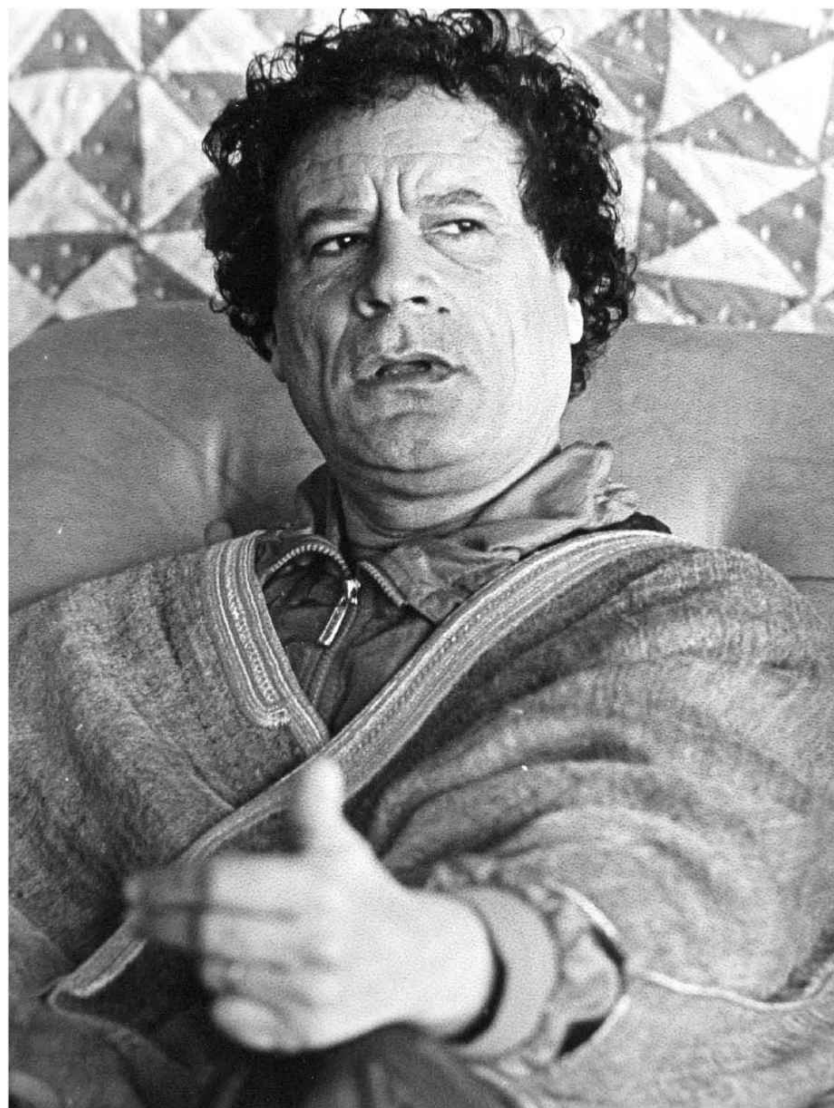
断腿巴利

可足足拖到1992年4月8日，在开罗采访阿盟外长紧急会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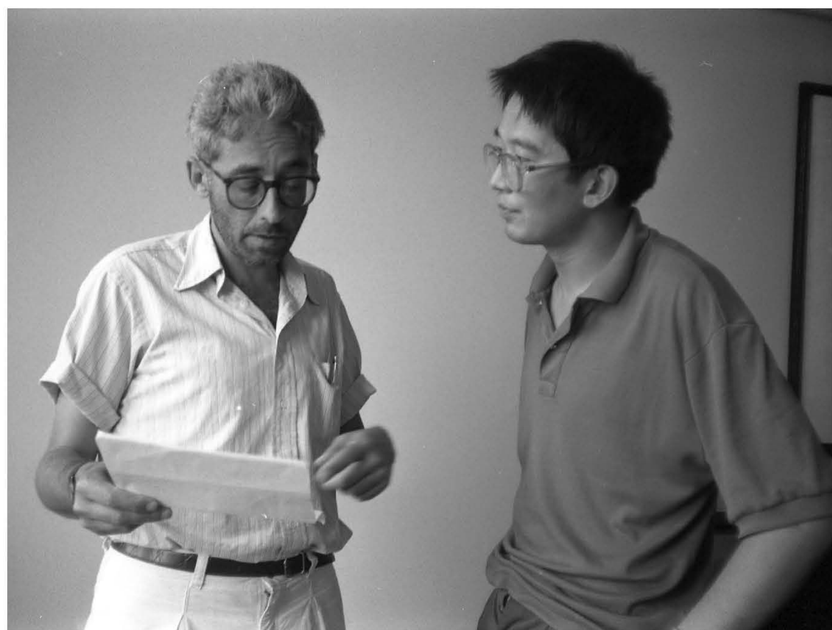
才碰上胸口别着Time徽章、头戴牛仔帽、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过去说：“打扰了，我猜你就是断腿巴利，我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起眼睛用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神态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色的。”我正惊讶他怎么会中文，他竟像我为我的北大自豪一样，炫耀道：“我在哈佛学过中文。”

年石油收入上百亿美元的利比亚处于阿拉伯世界核心位置，国土面积辽阔，比三个法国还大。可由于人口不到400万，政治上无法与东邻埃及相比。卡扎菲上台后主张阿拉伯团结统一，为此他先与萨达特的埃及联合，接着同叙利亚、苏丹联合，可都告失败。此后他转向马格里布非洲，先后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签订条约，可实际上仍是一纸空文。由此卡扎菲对联合阿拉伯国家感到失望，把伊斯兰前途放到黑非洲的萨赫勒国家身上，企图建立乍得、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的联合合众国。

怨恨西方霸权国家的同时，卡扎菲更对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分裂十分恼火，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觉得自己有理由对利比亚表示不满。1984年、1986年里根两次派空军袭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殃及许多平民，但世界上站出来为卡扎菲说句公道话的国家不多。现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借口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坠毁的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是利比亚特务做了手脚，命令卡扎菲交出涉嫌的有关人员，卡扎菲置之不理。联合国安理会为此通过了748号决议案，由于卡扎菲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联合国从1992年4月15日起对利比亚实行空中封锁。连利比亚的邻国突尼斯、埃及也准备加入对卡扎菲的制裁，这令自视为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卡扎菲大惑不解，万分沮丧。根据这位大漠英雄的一贯表现，我坚信他一定会不失时机地宣示立场，他不仅拥有无可抑制的表现欲望，而且具有这方面的天赋。



卡扎菲



1988年，瑞宁格应杨绍明之邀在北京主持“国际新闻摄影周”，我给他当翻译。

随着4月15日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日的迫近，各国记者纷纷跃跃欲试，伺机进入利比亚，可利比亚却迟迟不肯给外国记者入境签证，引得各国记者成群结队地围着利比亚驻开罗使馆打转，还彼此猜忌着，生怕对手抢了先。断腿巴利拖着那条在贝鲁特被打断的右腿，开着“79”式美军吉普，一日三次地往利比亚使馆跑。由于空中封锁，民航中断，即使有签证，也很难穿越几千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到达利比亚。为此，断腿巴利正组织一支吉普车队，准备结伙远征。由于有阿龙·瑞宁格的推荐，我开着我的“三菱山猫”加入了巴利一伙。巴利用力拍着我的三菱，大喊：“瞧！鸭子有辆好车，这车可得过“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第一名。我们要一直开到的黎波里！”

可直到4月12日中午，利比亚驻开罗使馆却只给新华社一家发了签证，馋得几十名老外大眼瞪小眼。断腿巴利可怜巴巴地挤在人群

里，竭力装出一副潇洒样，可话到嘴边却带了哭腔："鸭子，一个人当心点！"

穿越撒哈拉的两天两夜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令我和英文记者润哥吃尽苦头。由于没有航班，我们不得不从陆路辗转到边界，再假道托布鲁克、班加西，紧贴着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一直向西。分社社长断然拒绝了我驾车穿越撒哈拉的计划，因为同行的润哥不谙驾驶，我一人在沙漠中连续开车缺乏安全保障。

嗅着沙漠的气息，我仿佛又回到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正伙同巴格达使馆的弟兄们驱车横穿伊拉克沙漠。可眼前是几十人挤在臭烘烘的公共汽车里，既无昔日轰炸的刺激，也没有自己开吉普随心所欲的浪漫，一想到要熬过48小时才能到目的地，我恨不得一口气憋死。我这人嗜吉普车如命，当年我在驾校学的是吉普，秦岭林海追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中往返巴格达-安曼的还是吉普。我喜欢开吉普探寻无人涉足的小径，体会妙不可言的冒险乐趣，在干涸的河道的浮沙上露宿，让滚烫的流沙埋过赤裸的躯体，洗去长途驾驶的疲惫，只有令人窒息的喀新风（沙漠热风）才能使我体会母亲怀抱的温馨。

出亚历山大西行113公里，即著名的阿拉曼战役旧址。50年前的这个季节，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隆美尔从利比亚向东直线推进2000公里，进逼苏伊士运河，与英军大战于阿拉曼。我们的大巴士正沿着当年隆美尔且战且退的海岸公路行进，路两侧成群的无名战士墓沉重肃穆，令我从枪口的冷钢得出无限遐想，冥冥寒夜中隐约听到隆美尔北非军团的熄灯号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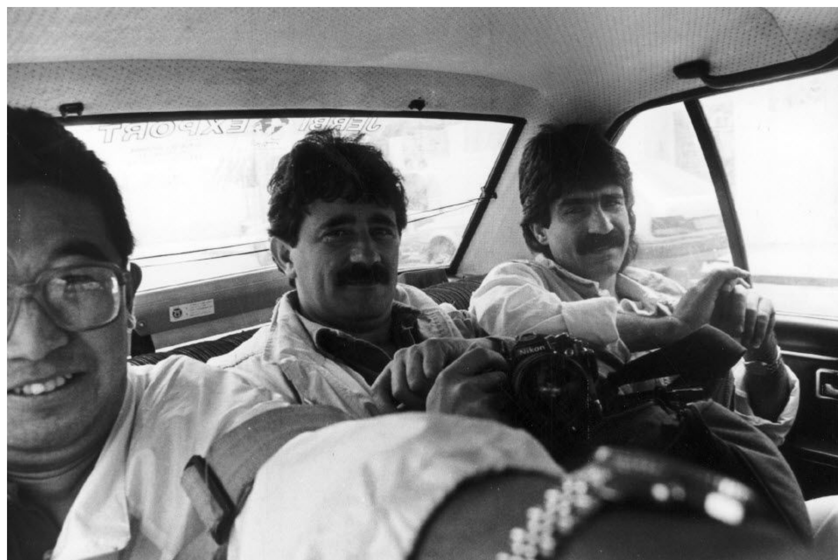
终于熬到彤云散尽、旭日东升，大巴士在蛇腹形铁丝网间穿行，不知不觉正通过边境。留下润哥"看堆"，我一人肩扛手提相机、放大

机、传真机去报关，看到两位长官无休止地下国际象棋，我忍不住建议中校用皇后去吃对方的马，由此引发一场鱼死网破的厮杀，了却残局。

进入利比亚境内，并未遇到海关、边防站之类的任何阻拦，因为利比亚民众国把所有阿拉伯国家视为自己兄弟，故无国界。沿海滨公路西行，碧波万顷、彩霞满天，连绵不断的橄榄林、金黄的草场、白顶的农舍、蜿蜒其间的水渠和一望无际的紫花地丁，宛若列宾油画中的俄罗斯。唯有每逢路口，高高竖立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画像才提醒你眼前就是利比亚。路旁的路标和交通标牌已被白油漆涂抹得看不出所以然，据说是防备以色列特种部队和美国入侵。中午，我和润哥钻进撒哈拉沙漠边缘一家无名小店，徒手吃了只比野麻雀大不了多少的阿拉伯烤鸡，连吃两大盘盐水煮蚕豆，总算填满了肚子。

下午2点半，大巴士缓缓驶入班加西，乘客奉命在一处遍布垃圾的广场下车。我和润哥以及另外5位要去的黎波里的乘客被集中起来，一位穿皮夹克的大汉收走了我们的护照和车钱，答应为我们7人安排一辆小车继续走完剩下的1100公里路程。可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蹲在大垃圾堆旁望着往来车辆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

终于盼来一个长着一双烂桃般火眼、穿着件脏得无法辨认本色的长袍的胖子他自称是内务部管查验签证的。胖子端起我们的护照瞪着火眼琢磨良久，又紧贴到我们脸前，逐一辨认我们的的面孔，逼视得我跟着他一起迎风流泪。



我和为西方媒体工作的阿拉伯记者在利比亚。

我们被塞进一辆丰田工具车，原说只坐7个人，可此时竟塞进来17个。我那条因受伤萎缩了的右腿不得不蜷到粗壮的左腿下寻求保护，膝上摞着传真机和装了尼康F-3及6个镜头的器材包，由此开始了下一段1000多公里的旅程。

夜幕降临沙漠，汽车又莫名其妙地没油了，沿途所有加油站全关了门，以纪念美国轰炸利比亚6周年。1986年4月15日，美国空袭阿齐齐亚兵营，致使包括卡扎菲养女在内的41名利比亚人丧生。从此，每年4月15日，利比亚全国海陆空交通、通讯全部关闭以示悼念。

虽然刚晚上9点，可撒哈拉大沙漠的夜风已如利刃刺骨。我只穿了条单裤和一件红背心，白天挺风光，可此时真羡慕阿拉伯兄弟的长袍和裹在身上的羊毛毯。与另外16名乘客同车共济，我绞尽脑汁变换着大腿小腿的位置，调整坐姿，将身体倚靠到别人身上，以争取尽量大一点的生存空间，从腥膻汗臭的毛毯上分享一丝一毫的温暖。润哥耐不住性子，持护照找到加油站，声称自己是卡扎菲上校的客人，可

人家连眼皮都没抬："那让卡扎菲接你好了！"

终于熬到午夜12点，几百辆车蜂拥着挤进恢复营业的加油站，碰撞怒骂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车上由于有17条好汉，抢油泵的、堵别人车的、大打出手的、叫骂助威的各显其能，自然抢在最前面加满了油，得意洋洋地上了路。

经过打架、发动机漏油之类的天灾人祸，车停停走走，到4月15日下午2点，我们经过45小时的长途远征终于驶进的黎波里，我和润哥满脸泥垢，眼窝发青，两腿发软，钻出汽车几乎跌倒。

我拍制裁下的利比亚

早就听说利比亚是个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但想不到比我在海湾战争中经历的伊拉克更甚。我的一位朋友曾因身背相机在的黎波里街头徜徉而被勒令交出胶卷，理由是"尽管你现在没拍，可谁知道你刚才拍了什么"。为了防备美国、以色列入侵，的黎波里街头所有的交通路牌全涂上了白漆，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在安理会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抵达的黎波里，深感乌云压城的气氛。

清晨，我与润哥还有从突尼斯赶来的阿文记者小拱驱车赶赴的黎波里机场，采访空中封锁头一天的反应。为避免引起保安人员注意，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尼康F-3紧贴到肚皮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暗中偷拍了张机场外景。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候机厅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显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亚航空公司飞往罗马、开罗、苏伊士的航班全被拦截。到问询处打听能否乘飞机回开罗，回答是："要么坐船到马耳他转飞机，要么开车到突尼斯吉尔巴岛换船。"我发现一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呆坐在候机厅一角，便凑上前去搭讪，称赞孩子长得美。博得好感后，我端起装24毫米广角的尼康F-3连拍了两张。可还没等相机马达啸音散去，一只熊掌般的大手就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

小门，我只看到润哥和小拱两张扭曲的白脸一闪便消失在门口。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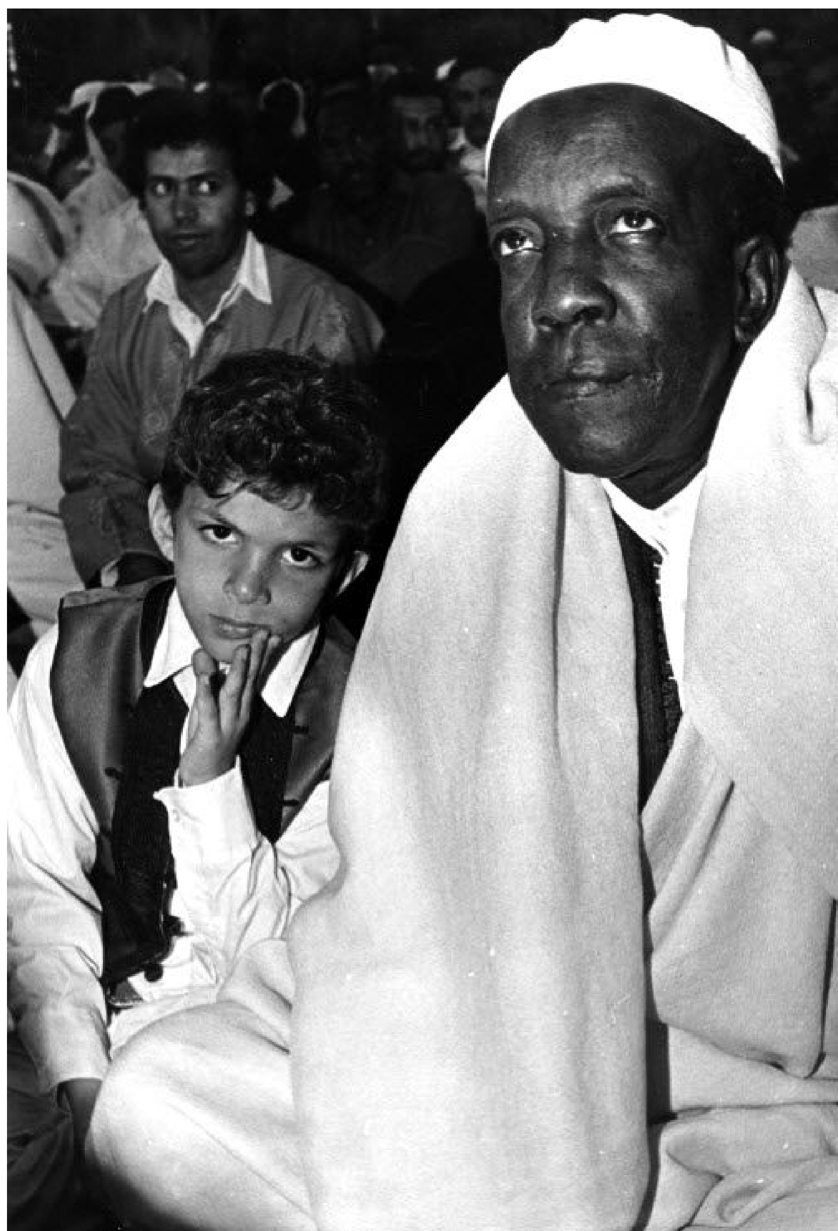
返回我居住的中国大使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我耳边炸响：“永远别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拍到、为什么没拍好。我只问你要新华社传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记者小拱说利比亚新闻部要求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楼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废钢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头看时，断钢筋刺穿彪马运动鞋帮，直抵右脚腕，血流如注。我从摄影包上扯下一段胶布，先缠脚后缠鞋，单腿蹦着上了车，小拱问扎得怎么样，我硬挺着说没事。

急急忙忙赶到海门饭店，可什么人也没有。大堂里路透社小个子摄影记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发上，我问他是否拍了什么好照片，他说拍个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说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他说我可以无偿使用他设在海门饭店1345房间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摄机场、海港和使馆区，可答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朝我撇嘴、耸肩、瞪眼：“咱们干什么来了？”当他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驶至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

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抻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他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主麻日”祈祷，谴责联合国对利比亚的空中封锁。



1992年4月19日，自联合国748决议生效以来，由于空中封锁，利比亚与外界交通不得不依赖陆路。在利比亚的150万埃及劳工开始部分撤离。照片中这十几位埃及人正搭乘“皮卡”自的黎波里东下近3000公里返回开罗，途中需经过班加西、托布鲁克、马特鲁、亚历山大等城市，沿地中海南岸穿过撒哈拉沙漠边缘，日夜兼程50多个小时。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3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内瑞拉使馆院内，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立即将我们的大奔驰围在核心，吓得我赶忙把相机夹在膝盖底下。10天前，当安理会通过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时，委内瑞拉碰巧是本届安理会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亚人，他们一把火烧了委内瑞拉使馆。

离开委内瑞拉使馆，眼前是雄伟的老王宫，我忍不住对准老王宫拍了一张，相机还没放下来，斜刺里冲出一辆奔驰280，一下子把我们的车别到路边，车里跳出两个穿军便装的大汉直扑过来。我挺紧张，准备随时交出相机，可王小立让我别动。只见他隔着车窗朝外面打手势，急得那两个军人犹如鱼缸外面的猫，围着我们连连打转，直到记下汽车的牌号，才说了声“OK”，放我们走。

到孟加拉使馆送完文件，我们打算去买些点心，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死哪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要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专机在等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经一打方向盘跃上了去往机场的公路。我将信将疑地问：“卡扎菲上校会见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斩钉截铁：“大使还能涮你！”大奔驰闪烁着双蹦灯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门的啸音如同F-14战斗机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轰鸣。我说：“哥们儿，我身上的胶卷全是5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冲进静悄悄的机场大门，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守候在贵宾室门口的几位利比亚官员正向我们招手："是中国使馆的吗？"我来不及回答，抱着摄影包紧跟着他们冲进贵宾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鸭子可来了，我总不能老扣着专机不让飞呀！"一架苏制安-24马达轰鸣着停在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这就是卡扎菲的座机。我们六人依次登上专机，想不到飞机上已有两位姑娘，一位金发碧眼，一位卷发黑皮肤。

坐在我对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发，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块铜钱大的刀疤，她身着紫色连衣裙，脚蹬坡跟黑皮鞋，不论问什么，只是报之以训练有素的友好笑颜。我让小拱用阿文问她能否拍照，她说"听真主的"，小拱解释说这等于婉言拒绝，并让我把相机装回包里，堆在行李上，因为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紧张"。我几次试探着将手伸向相机，但可恨的润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让我别因小失大。

我转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肤姑娘。从我的位置侧角度看过去，是一张标准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准，卷而奇长的睫毛，灰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弄不清有多少层眼皮，皓齿如编贝，白天鹅般长脖子上挂着条精细的项链。一身褪色的蓝月（Blue Moon）牌牛仔装，纤细的小手轻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发四处飘洒，几乎打到我脸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称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生，对农业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追根寻源问我中国三北防护林的长度、宽度，是复合林还是单一树种，是针叶还是阔叶，是灌木还是乔木……可望着她那紧绷绷、满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么也不信她是个女学生。我用右肘捣了一下润哥，"我敢打赌，她准是个女保镖。"说得他将信将疑。

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国借口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案轰炸利比亚、可事后调查此事与利比亚无关时，佳米拉拍案而起，"41个利比亚人白死了，美国凭什么？"话题又扯回农业："我们渴望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国蔬菜在这儿长得特别好。"我问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国学农业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国把我的同学全赶回来了，英国

也不会给签证，说我们全是恐怖分子！”我们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留学？”佳米拉两手一拍，“空中封锁，我去不了呀！”我打开笔记本，打算记下这段有趣的对话，可利比亚礼宾官示意我收起纸笔。

下午1点25分，我们的总统专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班加西机场。3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现在的机场静悄悄，唯有我们的小飞机蜻蜓般地滑跑。机场尽头树丛中，恍惚可见涂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苏-22雄赳赳地仰望长空。我们的总统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三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6人分乘三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疾驶。

我们被送进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级饭店住下，大堂内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达”彩卷。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浴室自来水龙头，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衣服痛快地洗了个澡。在此之前，我的头发被的黎波里的咸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犹如舔老咸菜一般。可是没等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禁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入，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

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M步枪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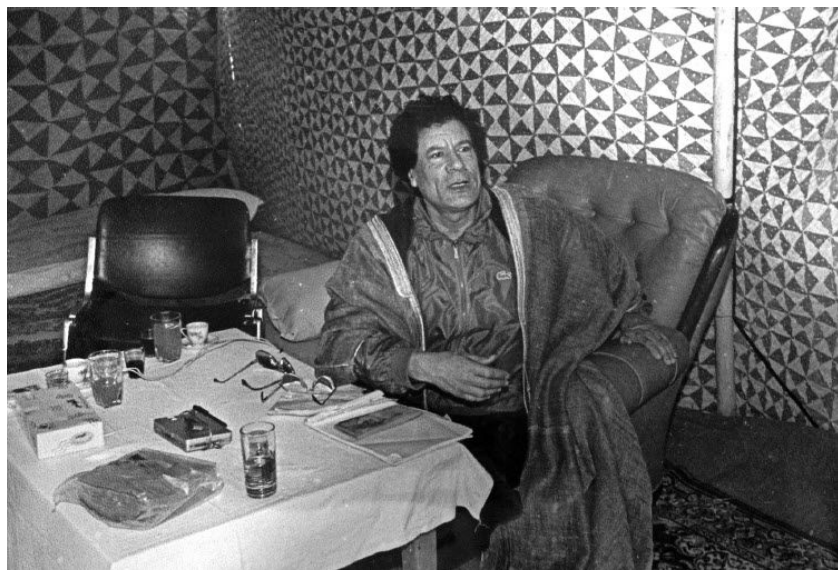
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他每天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蹚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

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并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人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

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1992年4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因洛克比空难案通过748号决议并制裁利比亚已达一周，卡扎菲神态自若在撒哈拉沙漠深处某秘密基地，接受我的独家采访。进入时我看到大门口用阿文写着“十月六日农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2米长、1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5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左面两米远处有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一位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彪形大汉，蹬伞兵靴，穿皮夹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

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他见我只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哪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5张”。

我哆哆嗦嗦地拍完这5张，倒退着退出大帐篷，蹲坐在地毯边缘，贪婪地注视着大帐内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至于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这种情况我只在1988年1月采访阿兰·德龙时遇到过，可阿兰·德龙霸道做作肤浅，带着一种演员特有的夸张的豪气。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阔视却带有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气息。像恺撒大帝迷信红色一样，卡扎菲上校穿着一件大红的鳄鱼牌（LACOSTE）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简朴的金边。伴随着缓慢的手势，上校时而英语、时而阿拉伯语侃侃而谈。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贵儒雅、逻辑性强，能熟练运用阿文、英文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政治家，由于民族和地理特点，带着迷人的传奇色彩。凝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侍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

不知不觉已过了45分钟，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终蹲坐在帐篷边缘、怀抱相机如痴如醉和他一样穿大红上衣的我。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并用英语说：“If you want you can take any pictures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随意拍。）我像一束紧绷的弹簧一跃而起，其感觉类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访结束，我走上前用英语问卡扎菲上校能否与他合影，他宽宏

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让我紧靠在他左边，我的右手与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我就势掏出笔记本请上校为我签名，上校从桌上摸起一支大红“斑马”（ZEBRA）签字笔，挥洒出一片红色的阿文：“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的女兵。



在阿拉伯国家中，利比亚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是妇女们向往的地方。这里看不到头裹纱巾的妇女，只有手持AK-47步枪、训练有素的战士。



卡扎菲的高炮女兵。

他用左手将签名递给我，右手拍着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可以卖100万。"言罢又哈哈大笑，我亦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卡扎菲上校将我们送出帐篷，中午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黑皮肤少女正和其他5位同样的黑皮肤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见我们走出来，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抢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张影。放眼四望，我在寻找另一位同机而来的金发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无所有。就在我们钻进大奔驰离去之际，我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夕阳里，满头金发随着撒哈拉的狂风上下飞舞，还是那身褪色的牛仔套装，只是上衣脱去，露出柳腰间银光闪烁的手枪来。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万个不愿意地将相机塞回包里。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唯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中国倒霉蛋

1992年6月22日，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重要新闻机构同时播发了一条足以断送我前程的电讯：“新华社记者唐师曾驾吉普车自西奈非法闯入加沙地带，以色列南方军区追捕数小时后将其拘押。”以色列电台的新闻广播使我臭名远扬，继而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讹传——《以色列消息报》《约旦时报》《埃及华夫脱报》……远东的港澳报刊也一哄而起，可抓住一个敢在加沙折腾的中国倒霉蛋了，就连中国大陆的某大报也卷了进去。眨眼间，我成了驾MIG-25飞往函馆的别连科，或是从天降落在红场的鲁斯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的新闻同行绘声绘色描绘我在以军枪口下的种种狼狈之时，我却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的哈美利兹大道为沙米尔拍照。当这张新华社特拉维夫传真照片被《大公报》采用时，《星岛日报》还在做“大陆记者非法入境，以色列军队穷追数小时”的文章。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那天在我吉普车顶上盘旋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带着“陶”式反坦克导弹，而迎面挡住我去路的那辆M-113装甲车上的7.62毫米机枪瞄着我的脑壳。

难熬的边境仲夏夜

我本应早些时候由开罗动身前往大选在即的以色列，可种种繁文缛节直耗到6月21日中午才开亮最后一盏绿灯。当我驾车渡过苏伊士

运河，横穿整个西奈半岛驶抵埃以边境时，已是晚上9点。埃及边防军不许我靠近，命令我折回55公里以外的阿里什去住旅馆。可我一想到孤身摸黑横穿沙漠，总有点不寒而栗。多亏一位名叫埃尔桑的埃军准尉，破例让我将车停在哨所的灯影里，我感激涕零地掏出红茶、香烟、清凉油分给弟兄们，说尽我会的所有表示感谢的阿文单词后才钻进吉普车后座的睡袋里。

我开的是辆1991年款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广东人称之为“沙漠王”。线型排列6缸4500毫升“3F”汽油发动机和沙漠色的防热漆，是专门为海湾产油国设计的，其公路水平速度可达180公里／小时，负重爬30度陡坡，超奔驰260如探囊取物，更不用说沙漠越野了，我曾让它的前轮爬到胡夫金字塔的基座上。从红海到地中海，我驾着这位“无言的战友”跑遍整个埃及，我管它叫“长腿沙漠跳鼠”。我说过我嗜吉普如命，驾校学的是吉普，追大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中往返安曼-巴格达的还是吉普。我喜欢开吉普一人远行，任意在沙漠上驰骋，寻找汉尼拔、巴顿、隆美尔、巴列夫们鏖兵的遗迹，缩在吉普车里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风卷来上万只伊蚊，吹着“军号”向我轮番进攻，害得我将清凉油通体涂遍，权当驱蚊剂。刚刚入梦，又被值勤的埃及哨兵弄醒，让我分享滚烫的煮红茶，从此再也没睡踏实。接连不断的噩梦、驱赶不走的蚊群的尖啸犹如当年的“飞毛腿”警报一般彻夜不停。

在边境熬过一个难眠的仲夏夜，已是22日凌晨，离以色列大选还有24小时，可我还未踏上以色列国土。和埃及边防军挤在一起啃阿拉伯大饼，远眺沙漠旭日冉冉升起，景致虽好可味同嚼蜡，心急如焚。

单枪匹马穿过加沙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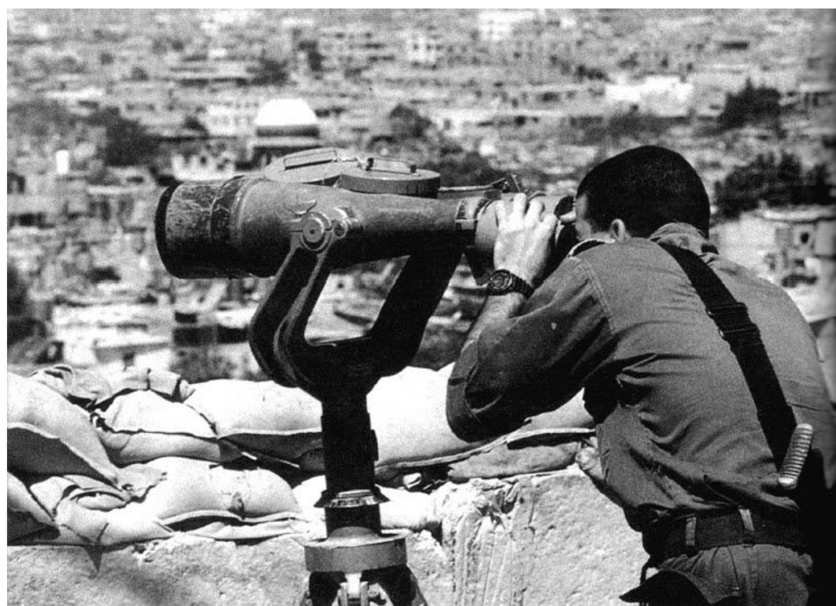
在埃尔桑准尉帮助下，我好歹办完了离境手续。埃方收走了我的

所有物品的证明文件，包括汽车、相机、放大设备、传真机过关证明、吉普车行车执照及汽车号牌，只将护照还给了我。我大惑不解地追问没有行车执照和号牌的汽车能否上路时，一位便装男子朝以色列方向一指：“那个操蛋国家（Fucked Country）会给你安个新的。”

我开着这辆没有牌照的大吉普咆哮着冲出埃及，就像当年乔治·巴顿强渡莱茵河。现在唯一能证明汽车身份的是前风挡上手提相机狂奔的卡通人唐老鸭和我手书的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 News Photo（新华新闻摄影）。

穿过100米长的全封闭地带，眼前是高悬蓝白大卫星旗的以色列边境。蛇腹铁丝网后面蹲坐着头顶钢盔、戴墨镜、穿防弹背心、裸着大毛胳膊、平端M-16步枪的以军。我摇下车窗，右手戳向太阳穴，来了个联合国军式的敬礼，摘下墨镜，用海湾战争中学来的两句半希伯来语大喊：“沙巴沙龙（安息日好）！哪条路通耶路撒冷？”一位小个子士兵倒背起M-16，朝我回了个巴顿式的军礼，咧开大嘴：“照直走，日本人！”边喊边跑到用角铁焊成的拒马旁，移开挡在路中央的横杆。

在我前面是辆MFO（多国部队观察员）的大号雪佛兰，还有一辆UNTSO（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大吉普。在中东，军车在值勤或集体调动中，不论昼夜都是开亮大灯的，美军、伊军、以军……全是如此。这两辆军车分别属于挂玫瑰红旗的多国部队和挂蓝色联合国旗的联合国军，尽管风马牛不相及，但同样亮着大灯，我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伴随汽车收录机中瓦格纳辉煌的旋律，我的沙漠鼠以120公里的时速狂奔着。沙漠太阳升起来，我放下遮阳板，戴好波拉墨镜，可映在引擎盖上的另一个太阳照样刺得我双目微合。踌躇之际，雪佛兰和大吉普一左一右拐下公路绝尘而去，公路上只留下我单人独车疾驰突进。



加沙制高点的以色列兵在监视巴勒斯坦人。

继续前行，道路更差，以军哨卡却渐多，往来全是包了铁丝防护网的军车。途经一片橘林，劈头盖脑飞来一阵石雨，紧接着砰然一声巨响，一块比拳头还大的水泥块正命中我的前风挡上端。显然，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错把我当以军了。在以色列，汽车牌照共有五种：7位数黄牌为正宗以色列人；6位数黄牌为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人；白牌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蓝牌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绿牌为巴勒斯坦人的出租。而我驾的车没有任何牌照。我加大油门选择东北方向最宽的道路落荒而逃，根据闪击战理论（Blitzkrieg），速度可以改变一切劣势。我慌不择路，直到落满尘垢、死气沉沉的“欢迎来加沙”横幅从头顶上一掠而过，我方意识到我已单枪匹马穿过了加沙城。

看一眼手腕上的指北针和右座上的公路图，阿什克隆已经不远，离特拉维夫不足200公里。就在我暗自得意之际，一辆兰德罗孚警车将我别出公路，一辆M-113装甲车威风凛凛地横在我面前。



加沙的以色列士兵将一名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按倒在地。

“飞人使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我就这样被押进了加沙检查站与阿什克隆之间的一家警察局，我的大吉普像外星飞碟一样被看管起来。一位长得颇像林肯的警察中校收走了我的护照："你有权保持沉默……"就像警匪片中的纽约警察。

显然，警方对我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破"世界第一陆军"防线、纵深以色列几十公里大惑不解。尽管我的护照和以色列签证合法齐备，可就是连人带车奇迹般地越过了边防和海关。

"你不是第一次开车出国旅行吧？环球旅行家？"警官掂着我厚厚的护照讥讽道。"那是。"我堆起一脸的灿烂，"不过，那是从巴格达开到安曼。您知道，约旦和伊拉克就像亲兄弟，何况天上还有多国部队的轰炸机，战争状态。我还从开罗到过的黎波里，那是做卡扎菲上校的客人，而利比亚与埃及间根本不设边界。贵国虽说来过，可乘的是特拉维夫私人运动飞机，海湾战争使贵国的所有航班全停了。在希尔顿顶层我拍到了'爱国者'迎击'飞毛腿'，还在拉马特甘炸飞的民居前撞上了阿里尔·沙龙……""难怪有这么大胆子。"警官撇嘴揶揄道。我借机献媚："是以色列造就勇敢的人。"一句话逗乐了警察中校。

警官继续翻着我的新华社记者证问："你在哪儿学的车？""北京警察学院。""那咱们还成同行了，难怪追了你半天。"他指着记者证扉页上与我并肩合影的苏大爷（苏仲祥，原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问："他是你师傅？""哪儿敢呀！他是北京市公安局长。"中校端详了一阵，喃喃自语："像个好警察，怎么，他管区人口是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半？"

我将警官的笔录看了两遍，确信没有对我不利之处后才在右下角签了名。警官将笔录夹入卷宗："对不起，国防军的先生们已经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我想你得跟他们走。"我知道事已至此，只有听天由命。不过我有权用电话通知一下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警官阻止我说："不必了，你已经上了电台，全以色列都知道'飞人使南方军区跳了起来'。"可我仍坚持给耶路撒冷首席记者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

的坐标。



在以色列，热恋中的情人也手不离枪。

在不按规矩打牌的地方得学会自我保护

出警察局，两辆包着防护网的国防军吉普车紧逼着我的大吉普，整整两车头顶包了迷彩布的盂型钢盔、身穿“凯福拉”防弹背心的国防军，虎视眈眈地坐在车上。一位坐在驾驶座上的少尉朝我一挥手，“Flying man，follow me！”（飞人，跟着我！）

两车国防军一前一后押着我沿加沙公路驶向西南。看着右侧的沙漠上空太阳由白变红，我几次轻踏油门企图超过前面慢吞吞的军用吉普，可都被摆动着加里尔步枪的国防军逼了回来，黑洞洞的枪口晃得我胆战心惊。驶入一个小村，国防军做出密集编队的手势，看着他们脚蹬车帮，向四面八方端起一支支加里尔步枪，吉普车成了向四周奓刺的大刺猬，显然将通过一段由巴解控制的地段。果然，石块从天而降，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又高高弹起，以军开始还击，跳跃的弹壳

落在我大吉普的引擎盖上。急转弯时，前面军车尾部丈把高突突乱颤的鞭状天线竟横抽到我的前风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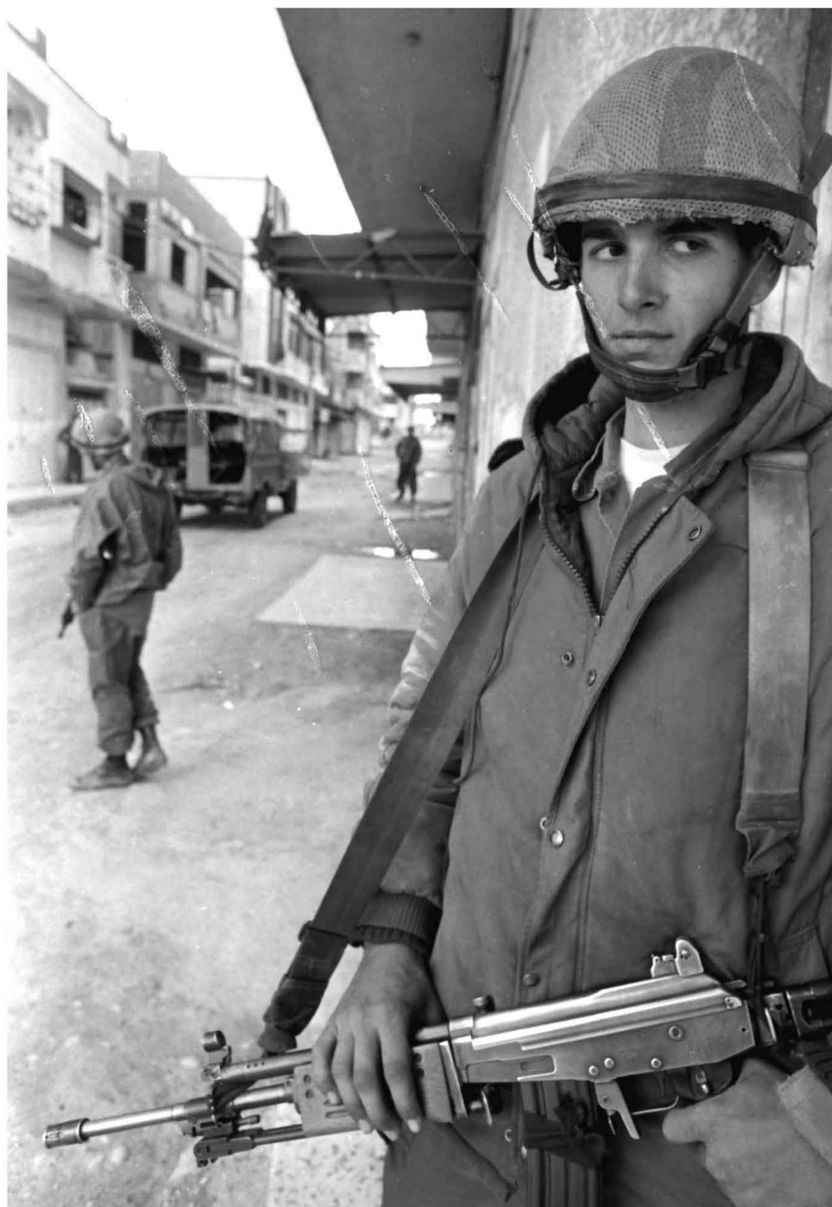
以色列军方电台Radio Army女记者采访我。她不把我当“非法入境者”，而是“从天而降的英雄”，满怀崇拜地称我为“Flying Man”。

我被带进一个四周筑有沙墙的阵地中，只能看到瞭望塔上操纵比利时Mag机枪的两个哨兵和懒洋洋下垂的大卫星旗。我被命令将所有物品搬到沙地上，由一帮我认为是军警宪特外加“摩萨德”的人员仔细检查。我真羡慕他们有如此的耐心，连我车内的装饰板都拆下来，推敲夹层里是否藏了武器，我器材箱中的几瓶显影液被怀疑是“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一种著名的汽油燃烧瓶）。

一位戴眼镜者发现我的两台尼康F-3相机备忘插上分别是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后格外警惕。我坦然地解释说：“我是个在动荡地区拍新闻照片谋生的人，也是个很守法的人。不过，在那些不按规矩打牌的地方得学会自我保护。在北非，没有哪个恐怖分子敢绑架卡扎菲上校的朋友；在加沙地带，有一张与阿拉法特的合影，至少可

以不挨石头。”

显然，国防军已经相信我是个货真价实的摄影记者，而造成我“非法入境”的主要原因是边境上的哨兵。尽管我是个无辜受害的可怜虫，可国防军仍坚持要把我押回边境，重新演练一番过关程序。“因为这对你我双方都至关重要，以色列国防军决不允许任何人突破自己的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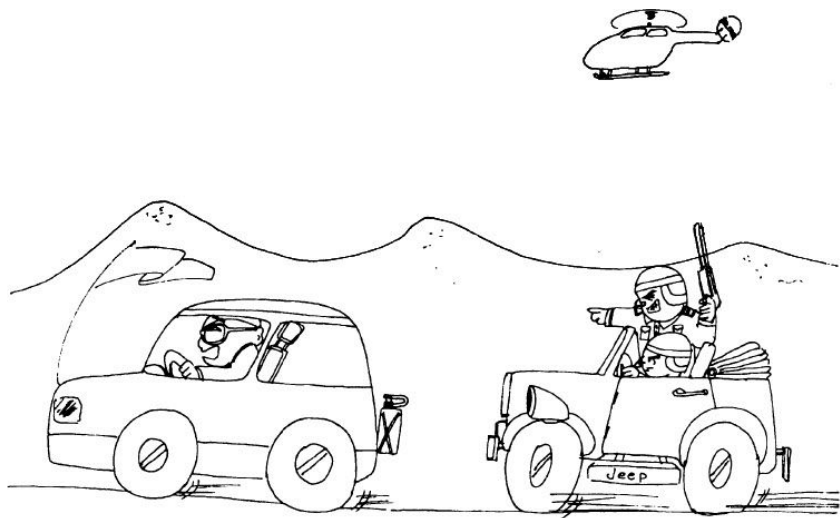


手持加里尔步枪的以军在加沙巡逻。

欢迎采访以色列大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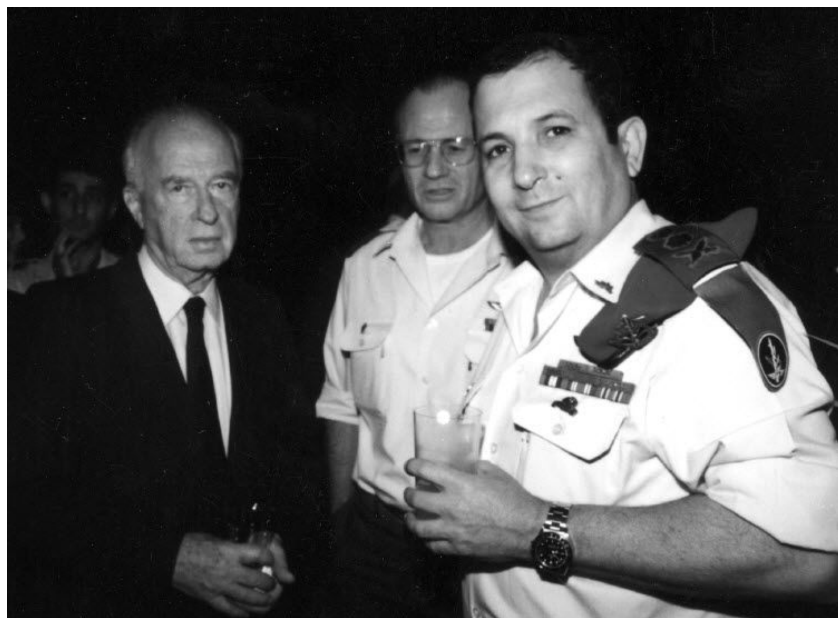
我至今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意外事故，因为当我被以色列国防军押回埃以边境时，埃及仍拒绝将我的各种过关文件移交以色列。埃以双方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埃方坚持最多只能提供各种证明的复印件，而以色列则非要原件不可。

我和我的大吉普被搁在边界上，一名端M-21的狙击手远远地喝令我待在车上别动。我深知这种加瞄准具、因越战而闻名的步枪的威力，其7.62毫米的铅弹随时可以把我轰在界碑上。我乖乖地坐在驾驶座上，一张生就的硬嘴还兀自不服："战俘还享受日内瓦公约，可我现在像是在奥斯维辛。"我正全神贯注地与狙击手用手比画，一位戴"边境联络"臂章的军官从天而降出现在我车前："国防军中校摩西·达扬为您服务。"他见我惊讶地闭起一只右眼看着他，便儒雅地露出一口白牙："的确，我与那位独眼伟人同名同姓。我想通知您，尽管埃及仍拒绝移交原件，可我们欢迎您来以色列采访大选。"一位便衣青年变戏法般地锯了两块三合板，用圆珠笔在上面写了"14614"，找了段铁丝拴在我大吉普的保险杠上。此时，由耶路撒冷赶来营救我的新华社驻以色列记者李红旗，已站在海关的另一端向我招手。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路透社6月23日特拉维夫电："以色列军方今天纠正了中国记者自埃及边境闯入加沙地带的说法。军方在一项声明中称，中国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并未如早些时候报道的闯入以色列境内，他只是未受到哨兵的常规检查而已。国防军发现哨兵的错误后，四处搜寻师曾先生，将其带回拉法边境站接受例行检查后已准许其入境。早些时候军方曾声称已将师曾先生驱逐出境。"以上这条电讯被6月24日的《以色列消息报》《约旦时报》同时采用。



拉宾对巴拉克赞赏有加，一度声称："这么优秀的青年如果不能担任公职，就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觉得这话对我也适用。

在特拉维夫一个宴会上，我被引荐给以色列总参谋长、陆军上将巴拉克。这位娃娃脸、有35年军龄的巴拉克将军是以色列特种兵之父，被称为"小拿破仑"，是以色列历史上被授勋章最多的军人。巴拉

克幼年在东欧因纳粹屠杀失去双亲，移民以色列后投身军旅，偷袭、救人质、反劫机屡战奇功。1973年他还亲自头戴女性假发、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率一支突击队袭击了阿拉法特驻黎巴嫩总部。1995年拉宾被刺后，巴拉克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长。1997年5月出任以色列工党领袖。对全世界“恐怖分子”来说，他是唯一的克星。如不出意外，我断言他肯定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

当我的好友、记者李红旗把我推上前，告诉上将这就是那个惹过阿齐兹、搂过卡扎菲、开车闯过国防军阵地的小伙子时，这位以军的最高长官哈哈大笑：“我喜欢！我喜欢！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

1991年1月7日，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阿拉法特是举世唯一公开表示站在巴格达一方的政治家。当时，我才突然发现面前这位叱咤风云的中东名人身高竟然只有一米六，这与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课堂上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在此后的3年里，我作为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先后几十次为阿拉法特拍照，由近在咫尺到勾肩搭背，得意地看着美联社、路透社的摄影记者们朝阿拉法特大喊："看这儿！阿拉法特！"

没有国土的元首

阿拉法特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土的国家元首，1929年出生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他的名字阿拉法特，就来源自耶路撒冷老城附近的一座山峰，原意为"神与吉祥"。我曾先后四次爬到该山山顶，体会耶路撒冷的神圣。

早年，阿拉法特之父由于从事反对英国殖民者和犹太人统治的活动远走开罗，从此阿拉法特一家不得不四处漂泊。阿拉法特四岁丧母，童年的诸多不幸养成他固执、坚韧的性格，崇尚武力。由于与生俱来的领导天赋，自少年时代起，阿拉法特就成为巴勒斯坦儿童的领袖人物。



1993年1月17日，自1992年12月17日被以色列驱逐至南黎巴嫩高山上的416名巴勒斯坦人已在严寒中苦熬了一个月。此君在雪山下伐树作柴，冀以取暖。



1993年2月26日，在南黎巴嫩高山暂居营地，被驱逐的巴勒斯坦

人风餐露宿，盼望国际支援。

从埃及开罗大学工程系毕业后，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开设了自己的建筑承包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他拥有了七辆汽车和一座别墅。优越的物质生活无法使阿拉法特成为池中之物，他梦系魂牵的是故乡耶路撒冷那座与他同名的小山。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1958年，年仅29岁的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秘密建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法塔赫”。7年后，他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开始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革命由此爆发。

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由于“法塔赫”坚持以各种手段反抗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统治，阿拉法特被视为头号恐怖分子，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爆发后，为配合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的正面作战，阿拉法特化名“阿布·奥马尔”，秘密潜回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领导地下抵抗运动。

阿拉法特的身高在人高马大的阿拉伯世界显得有些矮小。这位四处漂泊的政治家一年四季总穿一身墨绿色的军便装，上衣扎在军裤中，腰悬左轮手枪，系军用武装带。阿拉法特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对于十几年来签署的每一份文件记忆犹新。两年前，在开罗外交部与埃及外长穆萨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阿拉法特不假思索地向我背诵十多年前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内容原文。在与阿拉法特的交往中，我觉得他是个感情外露又好激动的老头，干厚的大嘴唇微微凸起，持久地微笑着。在中东各国的国家元首中，阿拉法特是最乐于与摄影记者合作的一位，每次公开露面都有一大帮摄影师乱哄哄地摆布他，“看这边！阿拉法特！”“再握一次手！阿拉法特！”而阿拉法特总是宽厚地满足大家的要求，皱起大鼻子，半眯起眼睛，咧开厚嘴唇憨笑，使得整个面孔随之缩短。当他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暴行时，立即双睛凸起，脸部鼓得像一只充足气的皮球，伴随着怒吼，右手食指在空中乱舞。

阿拉法特总是头缠黑白方格或红白方格阿拉伯头巾，左耳露出，脖子上紧围着另一条同样图形的头巾，塞在军便装衣领里。阿拉法特的头巾围法与北非撒哈拉人、苏丹努比亚人、也门人、贝都因人及海湾各国的围法都不同。在非统国家首脑会议上，我与列席会议的阿拉法特再度相遇，这天他围的是条黑白相间的方格头巾。当我问起他与众不同的围法时，他严肃地解释："这是我的风格，阿拉法特风格。"据说这种只露左耳的围法使头巾呈不规则的巴勒斯坦地图形状："白格代表城区居民，红格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黑格代表农民。"尽管阿拉法特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土的国家元首，而代表其国土的围巾却日夜顶在他的头上，这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这边！阿拉法特！"

恐怖之鼻

当一些国家将阿拉法特称为恐怖活动的鼻祖时，经验丰富的阿拉法特却得意地为自己嗅觉灵敏的大鼻子得意。年轻时的阿拉法特的确用尽各种暴力手段打击以色列，因而以色列总理贝京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PLO）称为“暗杀辛迪加”。以色列的另一位总理沙米尔干脆称阿拉法特为“心怀无穷仇恨的人，正在完成阿道夫·希特勒的未竟事业”。

不久前，一名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时代》周刊上承认至少有四次他完全有把握将阿拉法特置于死地，可出于各种原因，全让阿拉法特躲了过去。作为巴解主席的阿拉法特，几十年来一直是“摩萨德”刺杀的头号目标，可谓险象环生，阿拉法特总是凭借超人的第六感官，从敌人和内奸的枪弹毒药旁滑了过去，化险为夷。这还不算阿拉伯国家间同室操戈的兄弟内讧。

1969年初，一名被以色列“摩萨德”买通的巴勒斯坦人潜至阿拉法特身边，在阿拉法特的坐车上偷装了窃听器和微型脉冲雷达发射器，企图以此为以色列战斗轰炸机指引目标。可阿拉法特凭直觉及时发现了这个装置，使该阴谋破产。半年以后，在约旦“法赫德”游击队营地，阿拉法特指着办公室内一个写着“阿拉法特兄弟亲收”的邮包大喊：“这是一枚炸弹，我闻到了火药味儿！”就在卫兵奉命将包裹移出营地时，包裹炸得粉碎。

1971年，阿拉法特的坐车在叙以边境附近的巴勒斯坦营地遭伏击，司机中弹身亡，可阿拉法特却安然无恙。1973年，一架载有100多名乘客的利比亚客机被以色列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原定搭乘此架飞机的阿拉法特因临时变更了飞行计划而幸免于难。

1982年，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亲自率大军入侵黎巴嫩，把设有巴解总部的贝鲁特西区团团围住，将阿拉法特、阿布·吉哈德、阿布·马赞等人困在其中，轰炸两个半月，但阿拉法特再次逃脱，巴解总部从此迁往突尼斯。

1992年底，我奉命前往南黎巴嫩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5名巴勒斯坦难民时，曾拜谒贝鲁特西区巴解总部旧址，对阿拉法特在炮火轰击下安然无恙大惑不解。

巴解总部迁往突尼斯后，以色列仍未放弃从肉体上消灭阿拉法特的企图。1985年10月1日，经过周密计划的以色列空军长驱2400公里，突然袭击位于突尼斯城南郊的巴解总部，一举将巴解总部夷为平地，伤亡数十人。可阿拉法特当天因迟到15分钟而再次逢凶化吉。



约旦的阿拉伯人游行，要求把耶路撒冷归还给阿拉伯人。

自1982年以色列奇袭贝鲁特，阿拉法特便经常以车为家，他的十几辆不同牌号的防弹车日夜待命，随时准备行踪不定的阿拉法特突然行动。以色列情报部一再扬言，一旦活捉阿拉法特，就用直升机把他吊到约旦河两岸向巴勒斯坦人示众。为防止万一，阿拉法特与警卫约定，一旦有被生擒的危险，警卫即可开枪将他打死。

1993年12月初，我与新华社开罗分社首席记者刘顺驱车到埃及-以色列边境小城塔巴采访巴以和谈。在塔巴希尔顿饭店7层楼口，竟与阿拉法特的大保镖相遇，我和刘顺当时都以为阿拉法特秘密飞抵塔巴。大保镖将各国记者挡在楼下，只友好地将刘顺和我放进套房，独家采访了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席代表沙斯。原来，阿拉法特并未到此，他只是本能地预见到危险，故将自己的大保镖借给沙斯担任贴身警卫，以保障巴以和谈安全举行。



贝鲁特是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战场，孕育了全世界最能“忽悠”的战地记者。当地民居的墙壁上遍布弹洞。

1993年9月13日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签署以后，阿拉法特一跃成为各国情报机关关注的头号人物。现在，由于中东和谈的大量活动

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埃及举行，巴解、“摩萨德”、中央情报局和埃及内政部正竭尽全力保护谈判成员的安全，阿拉法特名列重点保护对象的榜首。

乘飞机最多的国家元首

阿拉法特素有开快车的嗜好，1969年1月他开车从安曼往巴格达看望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那天天降大雨，途中由于车速太快竟将警卫车远远抛在后面。阿拉法特至此还不满足，继续加速，乃至在超车时撞进一辆载重车的集装箱里，坐车车顶撕裂。20分钟后，赶上来的警卫才救出全身是血的阿拉法特，令人惊奇的是他仅仅手骨骨折。

阿拉法特更多的时光是在飞机上度过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土，阿拉法特不得不频繁地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成为举世公认的坐飞机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国家元首。阿拉法特曾对驻开罗的外国记者说：“飞机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坟墓。”

1992年4月7日晚，我正和一帮外国记者聚在利比亚驻开罗使馆门口催问签证，突然听到阿拉法特的飞机在利比亚上空骤然消失的消息。各国记者说法不一，纷纷赶回办公室发稿。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上校已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寻找阿拉法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命令埃及空军配合利比亚行动。美国卫星、法国驻乍得的军队也都卷入寻找阿拉法特的行动之中。原来，阿拉法特于4月7日结束对苏丹的访问，乘一架有阿尔及利亚民航标记的“安-26”飞往利比亚萨拉地区，视察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可刚进入利比亚上空，就遇到一场50年未见的特大沙暴，使阿拉法特的专机与地面无线电联络中断。

阿拉法特失踪的消息举世震惊，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祈祷真主，正在秘密和谈的中东各方更为不安，担心巴以和谈夭折。

经过一天多的搜寻，美国侦察卫星最先发现了严重毁损的飞机。

利比亚空军也在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确定了阿拉法特专机坠落的位置，但因沙漠风暴继续肆虐，机上人员仍生死不明。

阿拉法特从不事先向外界透露他动身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路线。他一向声称：“谁也不知道今晚我在哪里睡觉。我坐进汽车后才告诉司机去哪里，飞机驾驶员也只有在飞机升空后才被告知降落地点。”一夜之间，原本行踪不定的阿拉法特在撒哈拉沙漠罕见的风暴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拉法特飞抵利比亚萨拉地区上空时正值沙漠风暴以160公里的时速呼啸而至，他命令机组马上在附近的库夫拉军用机场紧急迫降，可在飞沙走石的情况下，空中能见度不足30米。机长穆罕默德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地面利比亚军方，请求地面协助，但强大的沙暴使无线电通讯蓦然中断，从此飞机杳无音信。

阿拉法特的专机被沙暴吹离库夫拉空军基地，燃料消耗殆尽、摇摇欲坠。经请示阿拉法特后，机长毅然决定不放起落架，用机腹在荒野上做软着陆。

阿拉法特的战友马上在飞机尾部搭起一个简易掩体，用衣服、枕头等缓冲物堆在阿拉法特周围。飞机迫降时机头扎进沙堆，机身断成三截，机首部分3名机组成员无人生还，5名随员重伤，可阿拉法特仅头部受轻伤还最先爬出飞机残骸，指挥抢救重伤员。之后，点燃火把，命令伤员将尿撒到瓶子中，以备缺水时用。阿拉法特再次从死神黑翼下滑过。

先有国　后成家

阿拉法特被西方报刊描绘成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生性羞怯、不擅与女人沟通，几次求婚遭拒绝后一蹶不振，还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

直到1991年秋，62岁的阿拉法特突然与年方28岁的苏哈·塔维尔小姐秘密结婚，举世皆惊。其实，阿拉法特在私生活上并非一个超人："我是一个凡人，我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我将面临长期斗争，要求任何一位妇女与我共患难都是不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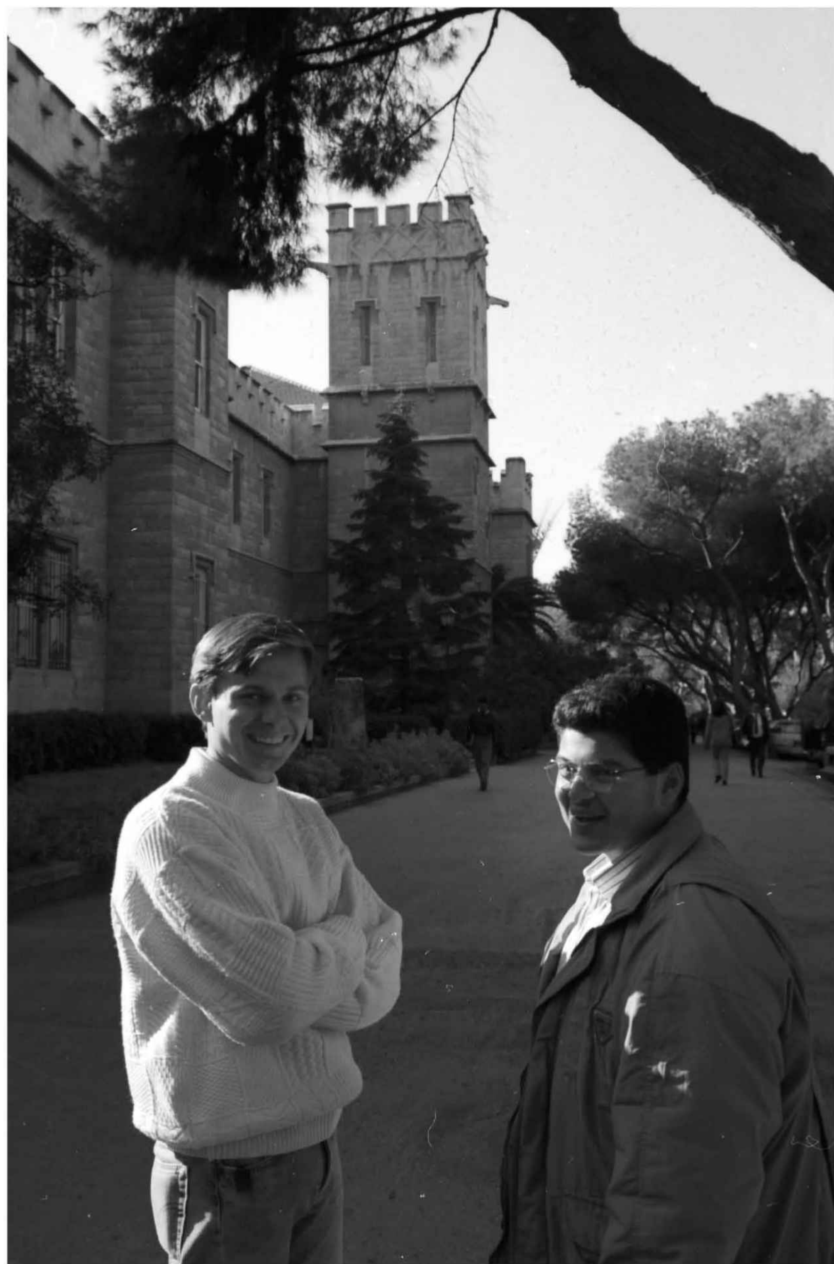
苏哈小姐与阿拉法特都是耶路撒冷人，苏哈比阿拉法特年轻34岁。苏哈5岁时，阿拉法特已是当地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了。苏哈说："难以置信的是我5岁时听说过的那人，最终成了我丈夫。"



贝鲁特美国大学女生宿舍。该大学与开罗美国大学齐名，是中东教学条件最好、奖学金最高的高等学府，也是移民美国的捷径。中东政要多为行伍出身，而他们的女人很多毕业于这两所大学。



由于战争，贝鲁特通货膨胀严重，用美元兑换本地货币得拿塑料袋装。



因恐怖活动频发，美国关闭驻黎巴嫩使馆，将贝鲁特美国大学托管给当地人，开两天关两天。

苏哈1964年6月17日出生于耶路撒冷布尔吉苏坦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富有的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记者，创建了巴勒斯坦通讯社。苏哈毕业于法国苏尔本大学，曾在法国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和语言、文明史博士学位。1984年，芳龄20的苏哈陪母亲前往约旦拜会阿拉法特，从此相识。此后，苏哈辞去巴黎的工作，担任阿拉法特私人通讯员、秘书和经济顾问。1988年，阿拉法特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他本人当选为总统。大功告成、年老思家的阿拉法特恰在此时开始考虑与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苏哈小姐结合，并终成眷属。

嫁给阿拉法特的苏哈不得不放弃许多自由，随时面对死亡，过着聚少离多动荡不安的生活。丈夫的姓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她当然为这个姓氏骄傲，但同时也是沉重的负担，未经安全人员许可，不得外出行动。阿拉法特太太既不能与新婚丈夫形影不离、共享蜜月的甜美，更无法尽主妇义务，为丈夫做一顿家常便饭。阿拉法特通常每天连续工作十几小时，而且浪迹天涯、萍踪不定，只有凌晨才能同太太单独待一会儿。新婚妻子苏哈抱怨“我总是担心他的安全，但他却什么都不怕”。阿拉法特则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想逃也逃不掉”。

年逾花甲、胡须花白的阿拉法特是位很温存的丈夫，对娇妻体贴入微，每次出访归来都不忘给太太带回纪念礼物。偶有闲暇，阿拉法特喜欢待在房中欣赏古典音乐，最喜欢《茶花女》和莫扎特的作品。擅长演讲的阿拉法特有时会声情并茂地给太太朗诵名著，整段整段地背诵戴高乐讲演中的名句：“法国虽然输掉一场战斗，但没有输掉战争。”

阿拉法特生活俭朴，不嗜烟酒，喜欢喝加蜂蜜的红茶。他还特别喜欢孩子，常说：“孩子是我们的生命，孩子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我们的政治。”

阿拉法特与苏哈的结合，使他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心愿成为可

能，可他们绝对想不到1995年夏天，苏哈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婴后，她所住的医院就出现了恐怖炸弹，她眼看着嘴里含着橡皮奶头的小东西被裹在防弹背心里让保镖带走。阿拉法特夫妇给新生的小女儿取名萨赫，意为“希望”，希望她“生活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那里能和以色列儿童一起安全地玩耍”。



在巴以协定签字之日，巴勒斯坦国旗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升起，下面窗口中是两个以色列士兵。



贝鲁特——战地记者的天堂，老百姓的地狱。

1993年12月12日，按规定以色列应从加沙、杰里科撤军的前

夕，我在埃及开罗总统府最后一次为阿拉法特拍照。由于直至撤军前夜，与以色列总理拉宾长达一整天的艰难会谈毫无进展，满面花白胡须的阿拉法特一脸倦容。我只记得他用阿语含混地宣布：“撤军将无限期推迟，再见！”透过取景器，65岁的阿拉法特更显苍老，但仍然昂首挺胸地消失在总统府门口。

7天后，我飞回北京，写完这段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的故事。此时，我缩在寒冷的北京蜗居之中，遥祝阿拉法特早日拥有统一完整的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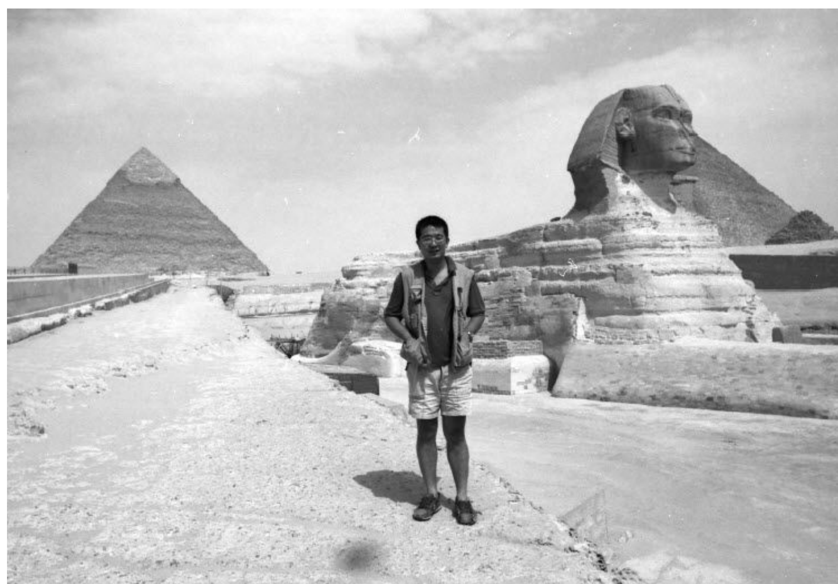
我钻进了金字塔

世界七大奇迹非倒即毁，唯一货真价实、称得上5000年历史的，只有埃及的金字塔。几千年的严寒酷暑、沙暴地震……无奈它半分。金字塔启迪来此游览的希罗多德创建历史学，诱使拜谒它的毕达哥拉斯钻研数学，引得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它面前静坐呆立、冥思苦想……西方关于金字塔的专著汗牛充栋，不下数百种，可至今金字塔仍是横亘古今的一个谜。我们对金字塔的了解大多是种种猜测。

1990年12月至1993年12月，我充任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有长达两年多时间常驻开罗。从我居住的摩汉迪森小区，即可看到若隐若现的金字塔尖顶。其间，我把我的前任使用的奔驰轿车换成大吉普作为自己的坐骑，开进大沙漠，直到将前轮开到金字塔的基座上。

埃及共有96座金字塔

从残存的遗迹看，古埃及的法老（Pharaoh，即国王，原意为住在巨大房子中的人）至少建造了96座金字塔，其中位于吉萨省的小金塔是1993年1月13日最新发现的。当时，我和途经开罗的新华社贝鲁特分社记者邵杰有幸采访了发掘现场，成为世上为数不多亲临这一秘密遗址的人。



我和吉萨金字塔以及斯芬克斯像。

在已发现的96座金字塔中，经严格科学鉴定的有48座，共分为阶梯、角锥、弯弓、石棺四种建筑形式。其中阶梯式金字塔9座，角锥式金字塔37座，弯弓式金字塔和石棺式金字塔各1座。

阶梯式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字塔，由古埃及第三王朝开国君主左塞尔（King Djoser）建于公元前2780年，它位于距开罗南20公里的古城孟菲斯附近的萨卡拉。这种最古老的阶梯状金字塔的外表附有一层平整的抹面材料。可惜4800年的风雨侵蚀已经使它们完全剥落，化作尘土。据说其阶梯状建筑的原意可能是为已故的统治者修的升天国的阶梯。这里现为每年一届的“北非法老汽车拉力赛”首段终点。1992年10月，我和安曼分社记者王波参赛，我的大吉普汇集到现代化的钢铁洪流中，咆哮着掠过这座巍然屹立的人类最古老的建筑物。望着阶梯式金字塔下荡起的征尘，发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感慨。

现各仅存一座的弯弓式金字塔和石棺式金字塔由于位于军事禁区

内，严禁参观。我驾大吉普数度在沙漠上做大迂回，试图绕过岗哨进入其中，但都归于失败，乃至遗恨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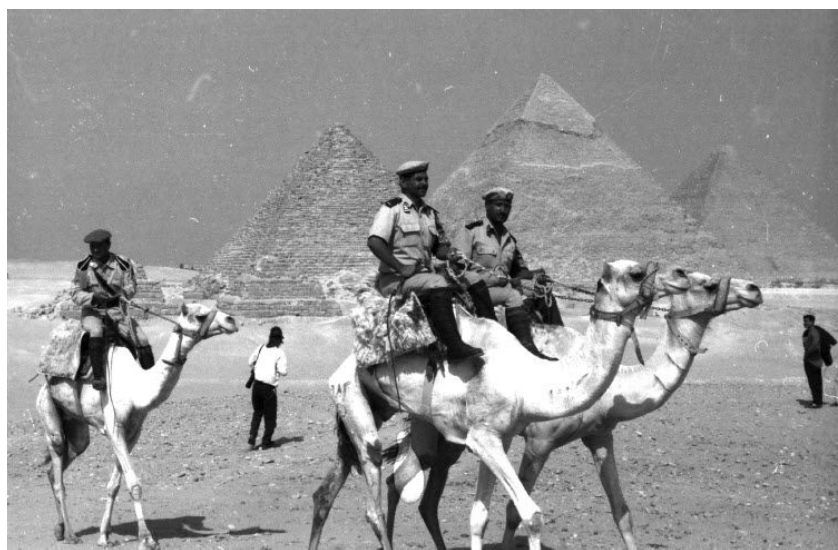


1993年3月19日，美国新上任的国务卿Warren Christopher将参观金字塔、斯芬克斯像作为其“中东六国之行”的第一站。

在四种形式的金字塔中，最负盛名的是角锥式金字塔，就是我们经常在书刊上看到的那个著名形象。据说这种金字塔来源于大沙漠中自然形成的沙丘形状，古埃及人受大自然的启示后建造出这种金字塔。由于角锥式金字塔科学、坚固，所以流传极广，苏丹国王雅纳赫利和古罗马皇帝也仿照埃及角锥金字塔，建造自己的金字塔。在法国的卢浮宫，建筑大师贝聿铭建起一座玻璃钢的金字塔形建筑物。至今，西文中的“金字塔”与数学中的“角锥”、文学中的“宝塔诗”还是同一个词——Pyramid。

吉萨高地金字塔群揽胜

人们通常所称的金字塔是指坐落在开罗西南吉萨省吉萨高地的金字塔群，这里共有大小金字塔十余座，几乎全都是角锥式金字塔，其中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就有九座。我的吉普车低压胎的花纹遍及金字塔群的沙漠小径。胡夫金字塔（Khufu）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有146.5米高，古希腊人称之为“齐奥普斯”（Cheops）。与它相邻的是胡夫的儿子哈弗瑞（Khafre）的金字塔，古希腊人叫它“齐普芬”（Chephren）。1993年春，恐怖分子为打击埃及旅游业，在该金字塔内引爆了一颗炸弹。当时，我和《时代》周刊摄影记者“断腿巴利”冒着浓烟钻进塔内抢拍受伤者。尽管遭此厄运，哈弗瑞金字塔仍是当今世界上保留得最完整的金字塔。从哈弗瑞金字塔再向西南，是胡夫的孙子门卡拉（Menkaura）的金字塔。胡夫祖孙三代大小各异的三个金字塔构成了吉萨金字塔群的核心。



为防止发生恐怖活动，开罗警方加强警力保卫金字塔旅游区。

由胡夫祖孙金字塔向西南方沙漠纵深，有另外三座小巧的金字塔，据考古学家考证是王后金字塔。这里断壁残垣，一派破败景象。

在胡夫金字塔东南沙漠中，有一组比王后金字塔还小的塔，是古埃及人祭祀用的，可惜已经残破不堪，几乎无游人光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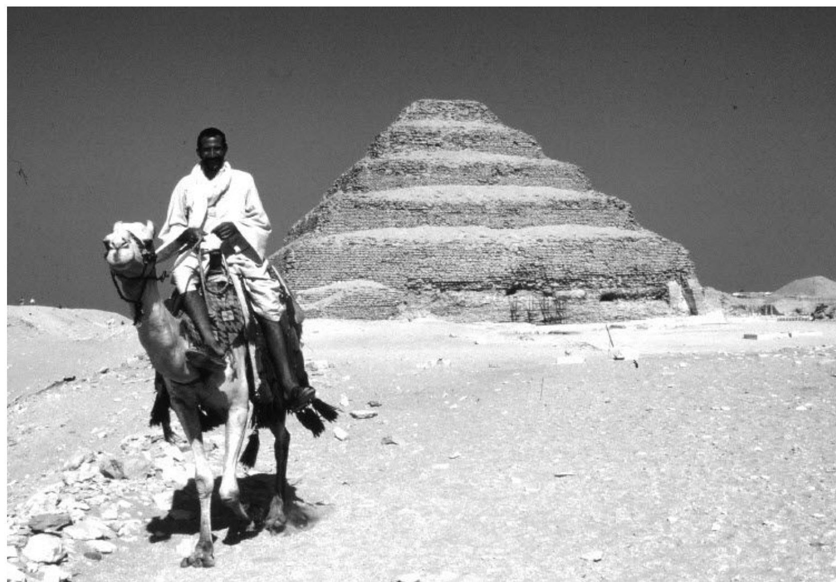
1993年1月13日，埃及考古文物局局长宣布，在吉萨地区又发现一个金字塔：“这是世界考古学的最重大发现，使金字塔的数目增至96个。”我四处寻找角度试图表现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可惜这座小金字塔仅剩边长23米的石基和塔顶的一块尖顶巨石。据推测，这座小金字塔仅高13米，是众多祭祀用金字塔中的一座。

1991年底，在吉萨区发掘的160个古墓全部为阶梯式、弯弓式、石棺式和角锥式，刚好与金字塔的建筑形式相仿。墓中的象形文字显示墓中的死者曾在金字塔工地劳动过，墓石的质地也与金字塔的石料相同。埃及国家科研中心对墓中39具骨骼进行了研究，怀疑是当年修建金字塔的劳工墓地。

1987年，考古学家在吉萨金字塔区发现一处古港，表明远古时代这里曾有一条运河直通尼罗河。科学家认为，该古港很可能为当年修建金字塔运送过石料。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当年占领西奈时掳走的文物，经后代整理又归还回来。



萨卡拉金字塔。

在金字塔群东南，是30米高、55米长的狮身人面像，古希腊人将其命名为斯芬克斯。它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由于5000年的风沙侵蚀，两只前爪已经破损，其面部亦已斑驳不堪，相传为拿破仑的炮兵轰击所致。但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炮轰狮身人面像的并非拿破仑，而是生活在公元9世纪的苏菲（伊斯兰泛神论神秘主义者），这位名叫塞缪达哈（Saem-el-Dahr）的苏菲要以此向民众证明狮身人面像仅是一尊石兽而已。

钻入胡夫金字塔内

众多金字塔中最不可思议的是胡夫金字塔，它始建于公元前2690年。这座金字塔完全用取自当地的岩石，打磨成230万块堆积而成，

每块巨石重约2.5吨，石块与石块之间没有任何黏合材料。这座巨型四棱锥体的每条底边长230.42米，塔高146.5米，侧面与地表夹角为5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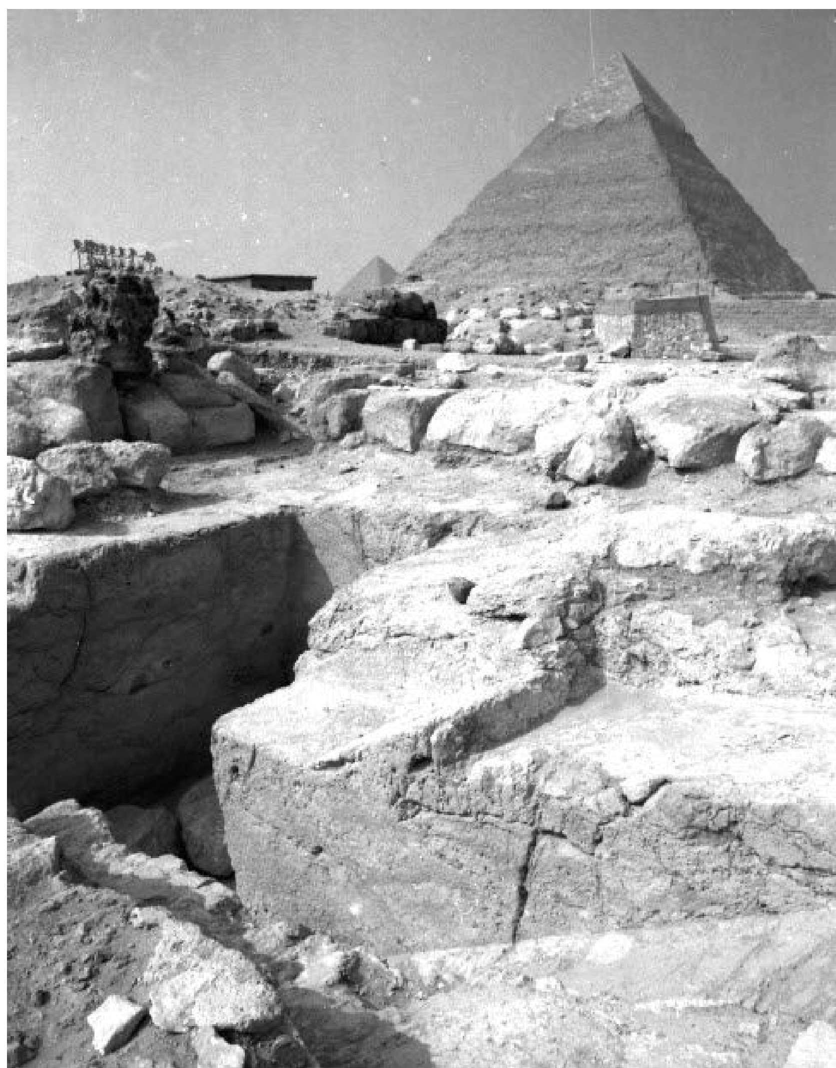
尽管胡夫金字塔的原始入口于1881年就被考古学家霍华德·维斯（Howard Vyse）打开，可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989年夏，才首次对公众开放，门票每张20埃镑（合60元人民币），记者免票。

从主入口钻入胡夫金字塔，沙漠的酷热和城市的嘈杂被头顶上的巨石滤得一干二净，油然而生的是恍惚的隔世感。前行约十余米，墓道一分为二，其一陡然而下，由于过于狭窄，我不得不屈膝蹲坐，贴地而行。下行约有100米，进入一石室，约30平方米，空无一物，靠近东隅的地面，有一巨大的石坑。在石坑里，我才能伸展一下躯体，可此处空气极稀薄，且夹杂着陈腐的恶臭，使人联想到阿鼻地狱。这里处于胡夫金字塔正下方地层深处，原准备做墓穴，但尚未竣工就被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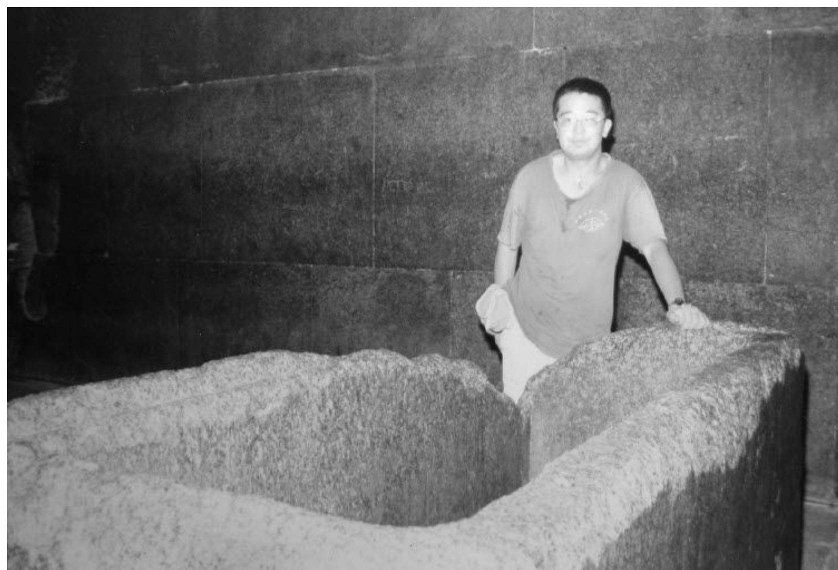
胡夫金字塔内的另一条墓道从主入口一直向里，这条墓道甚为宽敞，宽约2米，高7～8米，长60余米。墓道呈陡然上升状，直抵金字塔的核心，通向“第二墓穴”。在接近墓道尽头时，有一条转为水平的捷径，极为低矮，高不足1米。我再次膝行向前，犹如从蛮夷之地来拜见中国皇帝。爬了约十几米，才钻过狭窄入口，进入用红色阿斯旺花岗岩修筑的国王墓穴之中。

显然，这里是胡夫金字塔腹内的核心部位，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向我袭来，好像来自整座大金字塔的压力直抵头顶巨石，随时要把我碾成齑粉。这里仿佛是宇宙时间的核心，我可以听到左手腕潜水表的秒针急速沉重的跳动，似乎经受不住这里的巨大压力，从1、2、3、4……直到60，于是一切齿轮戛然而止，这是又一分钟被从无穷的时间上切下，同时标志着新的一分钟的开始。西方人总是说：“人最怕时间，时间最怕金字塔。”而我此时正蜷缩在胡夫大金字塔的腹内，

呼吸着5000年前的空气，周围的一切都是阴晦沉重的，空气中仿佛充满了各种悬浮物，用手就可以触摸得到，因为这里已经5000年没见过太阳光。



第96座金字塔挖掘现场。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我离开中东后的“继任”王岩，他在人大上学时就跟我实习，开车也是跟我学的。印度教、锡克教、穆斯林……都有赤脚表示对神敬意的传统。我脱掉红色“高卢鸡”，赤脚爬入胡夫金字塔内的石棺，让王岩给我拍照。轮到他时，他“嫌里面脏”，直接迈腿跨了进去。14年后，事业平步青云、贵为“胡锦涛摄影师”的他，一次拍摄中从12米高的升降车顶坠落，头触钢车帮，当即不幸，没有任何痛苦。

在这里，我首次体会到什么是可以听到的寂静，什么是可以看到的黑暗。据说所有到过胡夫金字塔墓穴的人都没有善终，法老的咒语、陈腐的空气、5000年因没有阳光而滋生的奇怪病菌……使所有打扰过胡夫法老墓穴的人暴亡。受我胆大妄为影响，至少有两位新华社同事被牵连罹难。

我蜷缩在墓穴里，刚才连滚带爬大汗淋漓，粘在后背上的衬衣往阴冷潮湿的石壁上一靠，寒冷彻骨。我怀着对冥冥之中所有神灵的敬畏，打量四周的一切。这是座东西走向的长方形墓室，约有30平方米，高5～6米。四壁是坚硬光滑的花岗岩，用手一摸有潮湿黏滑的奇

异感觉，犹如刚钓上来的鱼。紧靠西墙有一口巨大的石棺，已被人敲掉一个缺口。此外，四壁空空。据说没人见过胡夫的木乃伊。

是什么原因使胡夫把墓穴从金字塔下的地层深处转移到金字塔内？唯一可信的解释是宗教信仰的变化。在旧王朝，所有法老都把自己的墓穴建在地下，而胡夫第一个将自己原在地下的墓穴迁移至地平线以上。当时，胡夫金字塔被称为“Akhef-Khufu”，意思是“地平线胡夫”。按当时的说法，法老是天神霍鲁斯（Horus，古埃及神，形状为鹰，现印在埃及国旗国徽上），死后将升天变成“瑞”（Re，古埃及太阳神）。显然，胡夫将自己的墓穴转到地平线之上是使自己具有太阳神“瑞”的特征，表明自己已从黑暗的大地挣脱，而与太阳神越来越近。

金字塔之谜

“民以食为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历史是饥民求食的历史，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为埃及人提供了肥沃的良田。当史前人每天24小时为温饱奔波时，古埃及人已有相当的空闲去制造食品之外的其他东西，去思考衣、食、住之后的各种问题，从天空的星斗到河水的定期涨落。

古埃及人看到生活的艰难，便把幸福寄托在灵魂上。他们认为天神乌悉利斯将根据每个人在人间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而肉体仅是灵魂在人世的“住宅”，没有“住宅”的灵魂，不能进入乌悉利斯国，所以古埃及人千方百计保护尸体的完整。他们把死者的尸体涂满香油、浸泡在防腐液中，再敷以松香。而松香在波斯语中叫作“木米伊”，所以敷过松香的尸体便称为“木乃伊”。木乃伊被缠以数十米的特制细麻布，再装入特制棺椁之中。

最初的棺椁在平地掘墓而葬，但沙漠上的猛兽和比猛兽更凶残的盗墓贼经常破坏墓地。为防止亵渎死者尸体、影响灵魂升天，古埃及

人开始在坟墓上覆盖巨石，修筑石丘。这类石丘逐年增高，因为富有者总是以此炫耀自己的财富，石垒的坟丘成了权势和财富的象征。而胡夫法老的石丘造得有146.5米高，即我们今天看到的胡夫大金字塔，比意大利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大3倍，比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高54米。

1992年10月，一场里氏6.7级的大地震袭击埃及，开罗中心一幢14层的钢筋水泥巨厦被夷为平地，我的右腿亦在事故中负伤。可已有5000年历史的金字塔却结实得让我嫉妒，尽管我开着大吉普在金字塔群连转3圈，可就是找不出丝毫因地震造成的损伤来。

尽管我已罗列了一大堆冗言赘述，倾向同意金字塔是人类的作品、是法老的陵墓，可胡夫的木乃伊又在哪里？一些国际研究机构坚持认为胡夫的真正殡宫还未找到。为此，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法尔兹教授用宇宙射线对大金字塔进行穿透试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们也在金字塔内用电磁波探射，但都一无所获。有人推测，金字塔的功能不仅仅是墓穴，有可能在统治者健在时还起礼仪作用。当初，在每座大金字塔未完工前，都要建一座小型宫殿，统治者在位33周年及此后每隔3年都要在这里庆祝法老生辰。法老在庆典中向近臣证明，自己是一名贤君、勇敢的战士和生殖力超凡的男人。

至于金字塔的作用，至今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有人认为金字塔是经纬仪。由于每年尼罗河水泛滥，淹没地界，因此把金字塔作为经纬仪，可以从任意角度把土地三等分。有人认为金字塔是天文台，古埃及祭司和占星家利用它观察星辰运行，把金字塔当作一个巨大石晷，确定每年的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误差不超过一天。胡夫大金字塔位于世界各大洲中心，其底面正方形的对角线向北延长，正好是尼罗河三角洲的两个腰，延长底面正方形中央纵平分线，就是地球子午线。因此，还有人认为金字塔是外星人或神怪的杰作，因为5000年前，人户稀微，科技落后，人类无法完成如此工程。

有的研究者认为金字塔的石块蕴藏着一套相互联系的数字、尺寸、重量、角度、温度、方位、几何题和宇宙信息密码。还有人把金字塔说成是太阳观象台，因为古埃及人对太阳十分崇拜，帝王谷、王后谷四处留有太阳的痕迹。而阿布森贝神庙运用多种科学知识建筑了太阳神光的通道。更有人认为金字塔对生物和矿物有特殊的物理作用，有人甚至以此赚钱。加利福尼亚有位商人做了许多小金字塔，说能聚集能量。在他制造的金字塔模型里，牧草幼苗长得快，狗改为素食。牙科医生若将72个小金字塔挂在手术椅上，可让病人减轻病痛。罗马尼亚有人用金字塔形装置杀菌净水，有人发现爱哭闹的儿童在金字塔形建筑中会安静下来，金字塔形建筑还能使病人安稳入睡、减少妇女经期出血、保持脑力劳动者头脑清醒、提高性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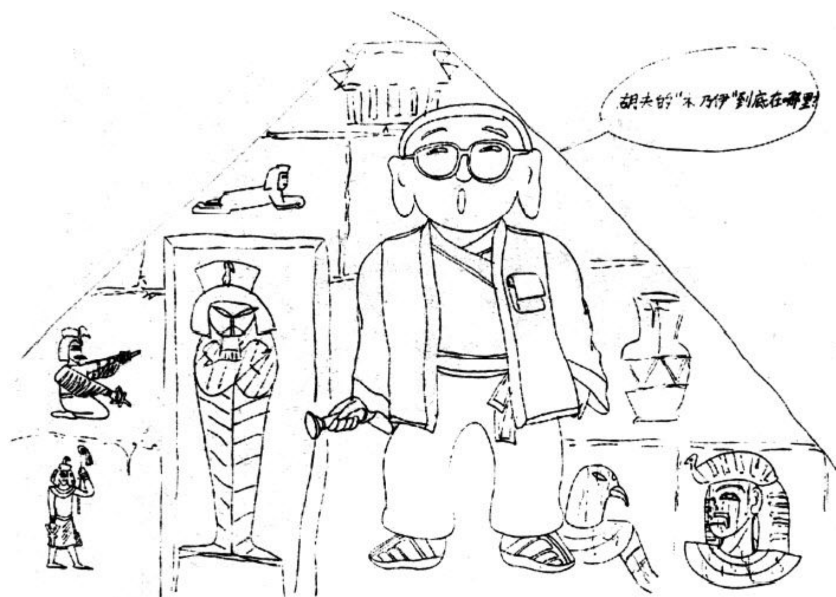


埃及国土面积的96%是沙漠，4%的宜居地带集中在尼罗河两岸和三角洲。图为尼罗河三角洲农民。

当年，考古学家打开齐奥普斯金字塔内的法老棺椁时，只发现一尊石像，没有找到木乃伊。除帝王谷的图坦卡芒墓穴找到英年早逝的

图坦卡芒木乃伊外，埃及考古史上没有哪具木乃伊是从金字塔里找到的。也有人把金字塔称为奴隶社会奴隶的杰作，但在金字塔附近发掘出的工匠村落证明，参与金字塔施工的几十名工匠食宿条件优越，显然是雇佣劳动者而非奴隶。当年，喜欢攀登金字塔的权贵可以由三个阿拉伯人驮着登上大金字塔塔顶，喝随从端上来的土耳其咖啡。据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是先登金字塔，然后登上沙皇王位的。

我将吉普车开出尼罗河谷，爬到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沙顶上。回首东望，我驾驶的吉普车仿佛已爬到胡夫金字塔的最高一层，团团晨雾随着尼罗河谷的腥风扑面而来，带来昨夜的寒意。滚滚浮沙在车轮下滑动，流向远方玩具似的城市。越过金字塔的尖顶，蚂蚁般的人群匆忙地爬来爬去，全神贯注于各自眼前的利益。在一堆乱石那边，有一大片烟囱、房屋、花园、医院、学校、汽车、铁路等人类的补缀物。振翅飞过的岩鸽给金字塔蒙上一层轻柔的前景，将都市的嘈杂净化在沙漠之中。此时，我对我们的家园又有了新的认识。



哭泣的骆驼

听说我要去埃及，布鲁克斯摄影学院教授保罗把秃头摇得像“萨姆”导弹，“恐怖分子早已把开罗变成最大的停尸房，莫非你也想变木乃伊进金字塔？不过，埃及的骆驼市场倒颇值得一看，那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骆驼市。”

在我抵达开罗的当天，就赶上高速公路塞车，听前面的人讲，有一只骆驼跑上了立交桥，一中队警察正在围捕这个交通肇事犯。

驾吉普车在开罗的大街小巷转悠，骆驼的身姿四处可见，犹如置身于处处是牛群的印度德里或加尔各答一样。但令人悲伤的是，这里的骆驼决非像印度牛那样被视为圣物，而是正义无反顾走向汤锅的冤魂怨鬼。

世界上最大的骆驼市

出新华社中东分社驾吉普车只需10分钟，就是茵芭芭（Imbaba）骆驼市，它坐落在尼罗河三角洲与撒哈拉沙漠之间的一块沙地上，占地约为100费丹（634华亩）。茵芭芭区是大开罗省穷人的聚居区，没有给排水设施，恶臭冲天，苍蝇像浓雾一样遮天蔽日，而骆驼市正处在该区的中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居民经常在这一带从事反政府活动，引得搜捕恐怖分子的警察时常光顾这里。



80多年前，沙特阿拉伯商人阿伯丁找到埃及人阿卜杜勒·卡西姆，求他代购一批苏丹骆驼。半年后，卡西姆亲自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骆驼队徒步从苏丹走到埃及，并于1914年在开罗城西茵芭芭区的铜铁市建立了最初的骆驼市场，专门代理骆驼的长途贩运业务。从此，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形形色色的商人由四面八方奔到这里，茵芭芭成了骆驼贸易的转运中心，闻名中东，享誉世界。骆驼队如滚滚洪流从遥远的苏

丹穿越大沙漠涌至这里，再源源不断地流向埃及全国、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乃至整个海湾地区。

今天的茵芭芭骆驼市由14个骆驼经纪人把持着，他们操纵着整个市场所有苏丹商人与埃及商人之间的骆驼交易。每个骆驼经纪人的地盘包括一间9平方米的简陋小屋和一块上百平方米的空地。小屋是经纪人与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地方，而空地则暂为待售骆驼的栖身之处。每个交易所前都聚集着一大群俯首帖耳即将出卖给农民或汤锅老板的非洲骆驼。

在骆驼市的一角，成堆的骆驼贩子、各种小工和屠夫在棕榈树干和椰枣叶搭成的茅棚下席地而坐，从容地享用阿拉伯风味的午餐，大吃之后，便大睡、喝土耳其咖啡或抽大烟（Sheesha，一种阿拉伯大烟枪）。埃及商人、掮客在骆驼市场内为埃及人提供的住处过夜，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苏丹的骆驼商人则住到骆驼市附近的旅馆里。

骆驼市入口处，苏丹裁缝正用雪白的埃及长绒棉布为远道而来的骆驼商人量体裁衣，缝制苏丹风格的阿拉伯长袍。经过几十天艰苦的沙漠长途跋涉，骆驼商人与赶骆驼的牧人的衣服早已又脏又破，而且惯走沙漠的阿拉伯人从不携带换洗衣服。因此，在骆驼市，卖掉骆驼的商人们将肮脏不堪的旧衣服剥去，在此缝制一身新装体面地返回苏丹。此外，他们还用卖骆驼的收入从开罗带回一些时髦的衣物，送给妻子儿女。

每逢星期一，骆驼市似乎被注入一种新的活力。这天，来自埃及各地的屠夫们都聚到这里寻找称心如意的锅中肉。各省来的骆驼肉零售商各有所好，开罗人偏爱瘦肉型的小骆驼。而沙奇省人则倾心一两岁多脂肪的小肥骆驼，因为这种小骆驼肉类似羊肉，因而奸商可以鱼目混珠卖到羊肉的价钱。卡罗卑亚人喜欢老而肥的骆驼，而孟努菲人却偏爱老而瘦的骆驼。

据从事骆驼生意的人讲，每年都有上百万只骆驼越过边界从苏丹进入埃及，仅埃及每年就消费骆驼50万只。骆驼市上70%的骆驼进了屠夫的汤锅，其余的30%被农民买走当作畜力使用。在上埃及（埃及南部尼罗河上游），骆驼是收割甘蔗时的主要劳力；下埃及（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人则用骆驼在狭窄的乡间小路运输小麦、大麦和水稻。在埃及田野里，农民以各种奇特的搭配方式用牲口耕地。有人用一匹马或一头驴配上一头骆驼，或用一头公牛配上一头骆驼，或单独使用一头骆驼。他们从不同时使用两头骆驼的理由是防止它们打起来。想不到骆驼这种吃苦耐劳、温顺听话的动物竟喜欢窝里斗。巴顿将军当年看罢尼罗河三角洲的骆驼耕地后在日记中写道："同骆驼拴在一起的那些牲畜，不论是哪一种都令人厌恶不已，觉得它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大人物"都有自然率真的一面，我把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打扮成贝都因贩骆驼的。同样被我如此折腾过的，还有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等。

茵芭芭骆驼市的骆驼经纪人艾哈迈德说，每峰骆驼根据年龄体重不同可卖500埃镑到1500埃镑（当时1埃镑约为0.33美元），个大的索马里骆驼可以卖到3000埃镑、剔出300公斤净肉。而他则从每只骆驼身上抽40埃镑（13美元）的好处，艾哈迈德每天开着他的奔驰轿车准时来此上班。

骆驼市已成为埃及旅游业的一大景观，从1990年至1993年底，骆驼市的门票已从0.5埃镑翻了两三番，但记者可以免票。

沙漠之舟

骆驼生长在中东地区的大沙漠中，阿拉伯人称之为“沙漠之舟”。3000年前，骆驼是西南亚唯一的运输工具，由于它可以长时间不饮不食、负重远行的特性而扩展到整个非洲。非洲独峰驼的负重量与今天的轻型卡车载重量相差无几，可它在苛刻气候条件下持续33天不饮不食、越野行走的能力足以使任何车辆黯然失色。

每年从苏丹越过边界进入埃及的上百万只骆驼中，绝大多数是纯种苏丹骆驼。苏丹驼的体形尽管不如索马里驼大，但奔跑速度却很快。埃及著名骆驼商人艾哈迈德·埃尔桑将苏丹驼分为白沙瑞、凯纳尼、伊扎比和萨哈利四个品种。

白沙瑞和凯纳尼由于擅长奔跑而被贩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充任比赛用驼。一只合格的赛驼的体重必须严格控制在120公斤到150公斤之间，年龄为5岁。典型的白沙瑞赛驼的面部和后背各有两个红点，它奔跑的时速可高达100公里。



非洲独峰驼极瘦，但却能够长时间不饮不食，负重远行。



骆驼吃苦耐劳、对人忠诚，悲伤时会流下眼泪，甚至痛哭失声。

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往往委托埃及骆驼商人

代养骆驼，在白沙瑞还是幼崽时，就用棕绳拴住它稚嫩的脖子开始训练。在海湾产油国一场赛驼豪赌中，一只白沙瑞可以一下赢得数百万美元。

在金字塔等旅游区为游客充当脚力、任人骑乘合影的骆驼也是白沙瑞。因为这个品种的骆驼除具有极高的奔跑速度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一只驯化的白沙瑞绝对忠于主人，会前膝跪倒让游人爬到它的背上，还会遵从主人命令或走或停。闻名世界的美国骆驼牌香烟包装盒上的形象就是白沙瑞。

中东著名的“哈嘎纳”（Hagana）特种部队利用白沙瑞骆驼追捕偷越国境者和沙漠贩毒集团。“哈嘎纳”特种部队骑兵的白沙瑞骆驼不仅会遵循口令慢跑、疾驰、突然急停，还会躲避敌人的射击。

一只骆驼平时每天要吃掉几十公斤的苜蓿、干草、谷物，饮5大桶水。骆驼像其他家畜一样喜欢任人梳弄。茵芭芭骆驼市以剪驼毛为生的哈桑抚摩着一只刚剪过毛的雄骆驼说：“骆驼与人一样需要理发，理过发的骆驼会感到浑身清爽，精神振奋，因而速度、能力和胃口都大为增加。”骆驼毛可以长到6厘米长，每隔3个月就得剪一次。哈桑认为剪骆驼毛是一门艺术，他剪一只骆驼能挣10埃镑。他说，尽管骆驼市每天过往成千上万只骆驼，可只有4个剪驼毛的工人，最好的剪毛季节是斋月结束后到宰牲节前的一段日子。

骆驼的忍耐力、承受力和持久力都是一流的，但是，一旦超过了它的承受限度，温顺的骆驼也会一下变成最残忍的野兽。骆驼商人埃尔桑亲眼看见一个牧人痛打一只离群的骆驼，终于把这只骆驼打得勃然大怒，它用巨颌咬住牧人的腰部在空中狂舞，再将其摔落在地，牧人当即死去。

骆驼还会记仇。有一只被主人暴打的骆驼一直伺机报复，入夜，它找到主人通常睡觉的地方发起袭击，对其又踢又咬，碰巧主人外出

未归，当它发现所攻击的对象仅仅是主人的一块毛毯时，气破五脏而倒毙。

骆驼通常是最忠实的，中东地区的许多王族都将骆驼编入禁卫部队，例如沙特、巴林、约旦等国。我在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上校的大帐篷里也碰到骆驼，据说卡扎菲每天都要喝骆驼奶，他还把骆驼带到南斯拉夫不结盟首脑会议上。

骆驼能在人群中识别出自己的主人，主人死后，它会找到主人的墓地，跪在墓穴前悲伤而死。骆驼的眼泪也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当骆驼发现自己因病老而无法跪下前腿时会痛哭失声，因为这标志着它的死期将近。

骆驼有自己的繁衍方式，每年7月至9月是骆驼的发情季节。雄驼之间撕咬打斗，只有最强壮的雄驼才能幸存，而老弱病残者只能在争斗中死去。最后获胜的雄驼将占有驼群中的全部雌驼，至少要与50只雌驼交配。它们像所有的奇蹄类、偶蹄类动物一样，以残酷原始的方法保证自己的种群不退化，繁殖出胜过父母的子孙。这一生命的孕育过程是在遥远广袤的苏丹草原上完成的。年复一年，就在苏丹草原新出生的幼驼刚在炎热烈日下享受母爱、嬉戏学步时，它们的父辈却正跋涉在奔向茵芭芭骆驼市的沙漠上。



出征前，给骆驼灌足水，此后一个月都将不饮不食。

四十天之路

“达博·阿拉巴因”（Darb　E1-Arbyeen）意为“四十天之路”这是一条由古代阿拉伯商人开辟的洪荒古道。“四十天之路”南起苏丹境内的达佛尔，穿过数千里的沙漠直通上埃及的达鲁（Daru），驼队单程行走需40天。骆驼是世界上唯一能横穿热带沙漠和大戈壁的动物，也是当地阿拉伯人赖以代步的工具，至今没有任何运载工具可以取代骆驼在沙漠中的地位。

远古时代，驼队将黑非洲的象牙、毛皮销往埃及，再买回衣服、埃及长绒棉布和其他日用品。本世纪以来，单纯的骆驼贩运繁荣起来。来自黑非洲不同品系的骆驼被商人集中起来，踏上这条有去无回的“四十天之路”。过去，“四十天之路”沿途有许多骆驼集散地，但时至今日许多都已凋敝。

赛义德率领着一支由2000只骆驼组成的驼队在晨曦中向埃及挺进。赛义德说，所有驼队的骆驼都在1000只以上，通常由七八名牧人和一名商人照看。驼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牧人头儿”，他熟悉沙漠中的每条小路和牧场，入夜，他可以凭借星光辨别方向。驼队备有轻型武器自卫，随时准备应付劫匪的袭击和野兽困扰。无论是沙漠风暴还是任何天灾人祸，驼队都会凭借自身力量竭尽全力紧紧聚拢在一起。我驾着吉普车与驼队缓辔而行，深感茫茫大漠中自然的伟大、人的坚强。

驼队进入埃及境内后在边境小镇达鲁做首次休整，同时办理入境手续、经过海关和动物检疫等事项，为此每只骆驼需付220埃镑（74美元）的过关杂费。

此时，埃及商人开始加入到驼队之中，协助驼队继续北上，穿过东部沙漠和西部沙漠直到阿斯旺。我曾和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驱车在这一带采访，不幸汽车右后轮胎爆炸，汽车撞入沙丘中。据帮助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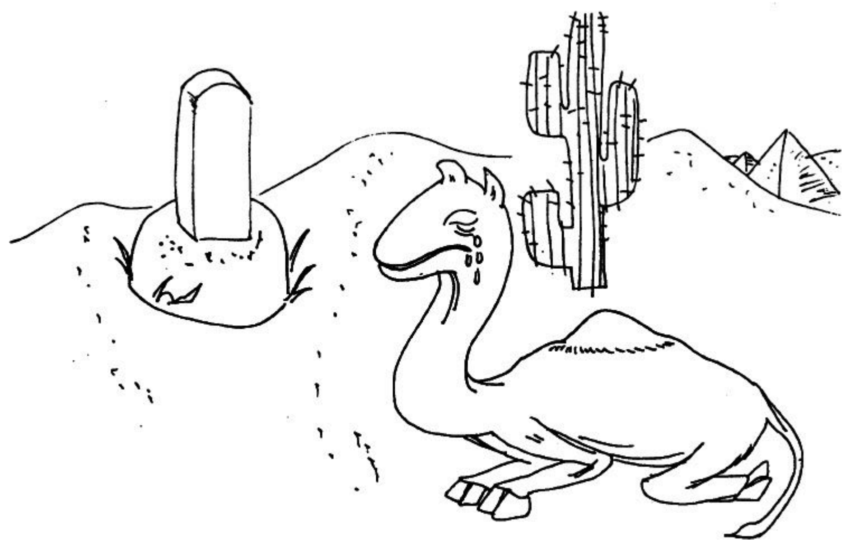
过路驼队讲，在这段800公里长的沙漠路上，没有一滴水。

对长途跋涉的驼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水。阿拉伯人总是将水灌进用山羊皮缝制的巨型储水袋中，这样即使在炎炎烈日下也可以保持水的清凉。

冬季，驼队往往在清晨6点上路，到中午，赶驼人才停下来吃一盘盐水煮蚕豆，接着继续赶路，直到晚上9点才在沙漠上露宿。夏季，为避开毒辣的沙漠烈日，驼队一般在午夜出发，直到次日上午才停下休息。据说就连圣者摩西也不敢在夏日正午穿越沙漠。夜晚，牧人头儿凭借星光辨别方向，率领驼队在茫茫长夜中疾行。

尽管骆驼可以连续33天不食不饮，但酷暑、沙漠风暴、暴雨、疾病、肉食动物的攻击和出乎预料的种种艰辛会使许多骆驼在漫漫路途中丧生。骆驼商人赛义德承认："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杀死驼队中疲惫不堪的病驼、弱驼。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高唱《古兰经》彼此激励着走下去。"

沿"四十天之路"走向死亡的不仅仅是滚滚驼群，还有已存在了80多年的开罗茵芭芭骆驼市。由于堵塞交通、污染城市等原因，埃及政府已下令将古老的骆驼市迁往50公里以外的巴尔卡什村。对人们来说，80年的茵芭芭骆驼市已成历史。



从囚犯到总统

当今在任的国家元首中，从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获得如此广泛的最高荣誉，这位空前的伟人就是南非总统纳尔逊·罗利哈拉哈拉·曼德拉。迄今为止，他已是罗马、佛罗伦萨、阿伯丁、格拉斯哥等上百个城市的荣誉市民；当选为苏格兰、利兹、伦敦等数不清的大学联合会主席；大不列颠全国海员工会及无数个工会的荣誉会员；获得包括中国北京大学在内的英、法、美、德、古巴、津巴布韦等数十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学衔。世界各大洲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公园、广场……德国还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他是印度尼赫鲁奖、奥地利布鲁诺·克赖斯基人权奖、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解放奖、苏联列宁国际和平奖、圭亚那最高荣誉奖、西班牙人权协会奖、德国不来梅团结奖、东德国际友谊之星奖、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古巴普拉·希龙奖、英联邦第三世界奖、美国肯尼迪人权奖乃至诺贝尔和平奖等众多大奖的拥有者。1963年他被判终生监禁走进监狱时，还是个健壮的男子；1990年走出监狱时已是71岁的古稀老人。斗志和毅力使他在有生之年看到理想实现，成为南非有史以来第一位自由民选的黑人总统。1993年11月，我终于有幸见到了这位伟人。

他本应成为大酋长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在南非特兰斯凯省乌姆塔塔一个滕布族酋长家里。他的曾祖父是当地著名的黑人部落首领，父亲是操科萨语的滕布人部落酋长，据说有皇族血统，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乌姆塔塔乡间，曼德拉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黄昏，曼德拉同村里

的孩子围在篝火旁，听白发苍苍的部落长者讲述美丽浪漫的黑人历史，黑人英雄丁干、本巴塔、欣查等抗击外族的故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曼德拉在回忆童年时写道：“我对政治的兴趣是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述历史时产生的。我曾暗暗发誓，在生活给我的快乐中，将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将为我的人民获得自由而做出贡献。”

少年时代的曼德拉被母亲送到当地一所白人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聪敏好学的曼德拉发现教科书中的非洲历史与黑人部落口头流传的历史大相径庭。放学后，曼德拉像其他黑人孩子一样帮助父母放羊、种地，黑人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给曼德拉很大教育。

从教会学校毕业后，曼德拉进入唯一一所肯招收黑人学生的黑尔堡大学攻读文科，由于父亲去世，滕布族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了他的监护人。黑尔堡大学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曼德拉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大学三年级时，曼德拉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他的监护人达林戴波大酋长强令他接受校方条件重返学校，可曼德拉断然拒绝。大酋长又提出让曼德拉娶妻成家，回乡继承酋长职位，处理部落政务，曼德拉再次拒绝，并宣布放弃自己的酋长继承权，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工业城市，沉浸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气氛之中，曼德拉先在一家金矿当警卫，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拳击手。在这里，曼德拉结识了“非国大”领导人西苏鲁和奥利弗·坦博，随之加入“非国大”。

“民族之矛”总司令

“非国大”成立于1912年，全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唯一跨种族的政党。它在团结各部族联合维护非洲人利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始终不肯越过“温和、合法”的界限。曼德拉加入“非国大”后，一面函授修完文学、法学课

程，一面与西苏鲁、坦博合作，于1944年在“非国大”内建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任全国书记和全国主席。在青年联盟推动下，“非国大”于1949年通过反对白人统治、争取民族自决的政治纲领，决定以群众运动反对白人种族统治。

1952年，针对南非国民党上台后颁布的“集团住区法”“人口登记法”，曼德拉组织了全国性的“蔑视运动”，这是南非历史上首次有组织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运动，曼德拉任运动总指挥。曼德拉的指挥才能令非洲政治家们敬畏，同时吓坏了南非政府。成群结队的有组织的有色人罢工罢市，强行进入仅供白人使用的商店、邮局、车站、住宅区等公共场所。这场运动持续了4个月，蔓延到全国，给白人政府以沉重打击。南非当局下禁令不许曼德拉参加政治活动，可他因指挥“蔑视运动”有功而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

在此后的几年里，曼德拉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坚持用合法手段反对南非政府，总结积累斗争经验。

“蔑视运动”使“非国大”威望猛增，成员从7000人发展到10万人。针对这一情况，曼德拉制定了以其名字第一个字母命名的“M计划”，着手在基层建立严密的街道小组，再逐级组成城镇领导机构，接受“非国大”中央执委会领导，使“非国大”组织日趋严密。

1960年3月21日，警察开枪镇压沙佩维尔反对通行证法的示威群众，打死69人，伤180多人。继而宣布紧急状态法，取缔“非国大”。由于事先已有“M计划”，非国大及时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曼德拉开始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亲自担任总司令。他隐蔽在一个白人朋友家中钻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军事理论，选择了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破坏战略”。

1961年12月16日，为纪念祖鲁人抗击布尔人入侵的“丁干日”，曼德拉的“民族之矛”在德班、伊丽莎白港和约翰内斯堡同时行动，袭

击政府机构和变电站，公开进行游击战。

为获得国际支持，曼德拉多次秘密访问英国，还会见了尼雷尔、布尔吉巴、本·贝拉、海尔·塞拉西等非洲国家领导人，并在安哥拉接受军训，成为令南非当局坐立不安的“黑色的烦恼”。1962年8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扮成司机的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秘密被捕。同天，世界正瞩目于好莱坞艳星玛丽莲·梦露的玉殒。

1962年10月，被捕的曼德拉在法庭辩护时，喊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种族隔离制度是不道德、不公正、不能容忍的。我们的良心激励我们抗议它、反对它、努力改变它。”虽然他从此身陷囹圄长达27年，但他一直在监狱里以精神领导着南非黑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斗争。

“无期徒刑再加5年”的铁面人

他的监狱身份卡简单明了：“纳尔逊·曼德拉。466-64号，破坏罪，1962年11月7日起无期徒刑再加5年。”

在好望角外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与世隔绝的罗本岛监狱里囚禁着这位当代“铁面人”。身材魁梧的曼德拉的单人牢房仅有4平方米，没有床也没有桌椅，只有一席草垫和两条毯子。直到1973年曼德拉生病后，狱方才发给他一张床，但没有床单和枕头，一日三餐吃的是玉米粥和杂粮。每天早7点到下午4点，曼德拉与其他囚犯一起挖土修路、开采石灰岩，从事奴役性劳动，四周是鞭打、凌辱和警犬，风雨无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体质日益虚弱，体重下降了50磅。南非当局企图以长期囚禁和苦役消磨曼德拉的意志。

曼德拉每天3点半就起床，先锻炼身体2个小时，继而开始学习。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其他囚犯，促成改善政治犯待遇。他通过函授在狱中修完伦敦大学法律专业课程，又开始学习经济和商业专业课程。

曼德拉通过博览群书了解外部世界，积蓄力量。为能看懂官方的南非荷兰文报纸，曼德拉开始自学南非荷兰文。由于曼德拉广泛接触囚犯，讲述人生哲理，传播反种族主义思想，囚禁曼德拉的罗本岛监狱成了“曼德拉大学”。

曼德拉在狱中坚持不懈地斗争，争取到听广播、读报、洗热水澡等多项权利。南非当局担心这会影响其他囚犯，秘密将他转移到开普敦波勒斯摩尔中央监狱。在这里，曼德拉拒绝以流放和放弃武装斗争为条件的释放出狱，“在他们给我们以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之前，不得不继续武装斗争。”他严正指出：“自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在监狱中，我对白人的仇恨减少了，但对制度的仇恨却增加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几十年后曼德拉恢复自由之后，决不向仇敌或曾经折磨他的人报复，极富宽容雅量和道德勇气。

1985年1月，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前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首席顾问达什获准访问这位已经与世隔绝了23年的伟人。达什写道：“他身材修长，仪表堂堂，看上去不像66岁。自制合体的咔叽衣裤，没穿囚服。平静、自信、具有威严的举止绝不像一个游击队员或激进理论家，而像一位国家元首。”

此时曼德拉的处境进一步改善。凌晨3点，曼德拉开始做操、举重、俯卧撑、跳绳和长跑，然后淋浴、浏览报刊、听新闻广播。早饭后看电视节目《早安，南非》，继而是处理来往信件。共有十几名士兵看守着曼德拉，其中三名几乎与他寸步不离。

辛酸的夫妻

曼德拉结过两次婚，早已离婚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这位妻子现在与曼德拉唯一的儿子在老家特兰斯凯开杂货店度日，女儿梅基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第二位妻子就是著名的温妮，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泽妮嫁给了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

的第58个儿子，小女儿津妮成了作家，现在美国。

早在1956年，还在念中学的22岁的温妮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曼德拉，当即被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律师所吸引。当接到曼德拉请她去吃午饭的邀请时，竟激动得“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曼德拉经常请温妮吃麻辣的印度饭，拉她到体育馆去看他如何锻炼得大汗淋漓，由此拉开奇特的爱情序幕。

1958年6月，正受“叛国罪”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可保释候审只有4天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一半，曼德拉就赶回法庭受审。由于曼德拉的政治活动被判非法，从此新娘温妮只有待午夜窗户上神圣的叩打声出现，才能与新郎柔情一番。

一天，温妮为家里那辆因老掉牙而趴窝的破车发愁，当天就来了个穿蓝工装、戴宽边帽的修理工。修理工命令温妮上车，直开进一家汽车修理厂，温妮这时才认出这个化装成修理工的大个子竟是曼德拉。曼德拉帮温妮卖掉破车又买了辆新车，才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公共汽车站里。

1962年曼德拉被判入狱时，温妮刚怀上小女儿津妮。温妮总是每月千里迢迢赶赴罗本岛，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按指定的路线乘船渡海，只为能隔着装了厚玻璃的铁窗看一眼憔悴的丈夫。

狱中的曼德拉每天都抚摩身边的温妮照片，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婚姻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互相爱恋，而且在于相互间的永恒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摧不垮的，即使在危险关头也始终如一……我真想在你身边，把你抱在膝上……”

直到22年后，南非当局才允许曼德拉夫妇直接接触，“这22年中我们甚至没碰过彼此的手”。当这对夫妻拥抱在一起时，连狱警也表示剥夺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男人拥抱妻子和孩子的权利22年之久是可恶之极的。

获释出狱　劳燕分飞

1990年2月11日16时15分，南非开普敦维克托·沃斯特监狱大门打开，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在警车和直升机护送下走出牢门。年已71岁的曼德拉须发斑白，与夫人温妮手拉手向群众挥手致意。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记者会集于此，报道曼德拉出狱。据南非报纸称，第一张曼德拉出狱的照片当即以数百万美元的高价被美国人买走。

曼德拉两位妻子养育的一子三女已经长大成人并为他生了12个孙子孙女，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清晨，温妮为她年迈的丈夫挑选合适的衬衫和领带，摆好不含胆固醇的早餐，盯着他服完药，敦促他到院子里会见客人。温妮结婚31年后才首次经历这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她表示："我对这种状况很不习惯。"比她大18岁的曼德拉"甚至不能洗涮一下他喝水的杯子，在监狱里人们从不让他做这类事"。

温妮嫁给曼德拉时还是个年仅22岁的幼稚的女学生。在婚后的31年里，她独自一人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并坚持探视狱中的曼德拉。南非政府不断地对她拘留、监禁、流放，温妮住在无水无电漏雨的草棚中，吃未熟的米粥、带泥的萝卜，孑然一身面壁而坐。久而久之，她产生了被遗弃的感觉，养成了酗酒的毛病。一次，她在屋内换衣服，一名警察闯进屋来，暴怒的温妮一跃而起扑将上去，将警察打翻在地，几乎扭断了警察的脖子。

温妮把自己当作曼德拉的替身、"非国大"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时而表现出独断专行的作风，令"非国大"领导人十分不满。9年的流放生活使她养成好斗的习惯，这与曼德拉"不反对白人，只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温和政策格格不入。温妮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是一个以街头流浪者为主体的冲锋队，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温妮本人经常威胁当地少年加入她的组织，否则就将他们干掉。

1988年12月，温妮手下的人干掉了与她政见不和的斯通比，司

法当局在调查臭名昭著的“斯通比案”中发现温妮本人也卷入了这场丑闻。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温妮有牵连。这使曼德拉十分尴尬，愤然命令温妮立即解散“曼德拉俱乐部”，可温妮置若罔闻。

曼德拉考虑到多年的独居生活和南非政府的持续迫害给温妮生理心理造成的创伤，企图以宽容抚慰温妮，让她担任“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长。可温妮我行我素，酗酒闹事，公然与一个29岁的情人同行同止。曼德拉在忍无可忍之后，断然撤销了温妮的部长职务，并与其分居。他对报界宣布：“鉴于我们的分歧，最好的抉择是分居。但我对她的爱决不减弱，我希望诸位理解我正在受的痛苦。”

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

在南非，家喻户晓的曼德拉是最受欢迎的黑人领袖，他的声望犹如他受囚禁的岁月一样令人肃然。索韦托“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对公众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把南非各个组织的黑人团结起来，这个人只能是纳尔逊·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曼德拉是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政府必须把他作为黑人领袖对待。”

出狱的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威望取代年老多病的坦博，负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他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与开明的德克勒克政府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并赢得南非最大部落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的合作。曼德拉成了名副其实的南非2600万黑人的领袖，其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主张得到其他种族的理解和支持。

1993年夏，曼德拉列席在开罗举行的非统国家首脑会议，一时成为大会的核心人物。当身着黑色西装、雪白衬衫，系花格领带的曼德拉气宇轩昂地缓缓走入会场时，尽管他走路时大腿略显不适，但腰板挺直，形象特别高大。当时，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迎这位领导人。这是南非代表首次被非统组织接受的象征。当时，

我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有幸一睹他的风采。曼德拉是非洲贵族与英国贵族风格的混合物，教会教育使他言谈像个英国绅士，衣着风格也是英国式的。祖上的皇族血统使人觉得他举止自尊自信甚至傲慢。曼德拉身高约在一米八以上，头发花白，步态和缓潇洒，怎么看也不像75岁的古稀老人。尽管当时他参加竞选总统尚无结果，可其优雅的绅士风度、敏锐的思维、略带伦敦口音的英语表达，使他的政治魅力超过了在场的任何一位国家元首而成为众多记者捕捉的目标。



1993年1月，在埃及采访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告诉我："无论对谁怀有多大的敬意，都不要把他写成天使。"

一位中年女秘书始终不离他的左右，礼貌但坚定不移地把围拢上来的各国记者控制在一定距离之外，以免这帮全身披挂、鲁莽好动的家伙碰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曼德拉优雅地坐到代表席上，只有极少数入"Pool"（Pool：池子。按国际通行惯例，在重大采访中，因记者太多而实行的特殊采访

权制度。一般由主管当局和记者协商推举国际著名新闻单位或资深记者享有特殊采访权，代表全体记者采访，所得采访素材全体记者共享。获得特殊采访权的记者称Pool）的摄影记者获准进入会场，我亦有幸混迹其中，紧跟在曼德拉四周。我右侧的WTN（Worldwide Television News）记者法鲁克一上来就朝曼德拉大喊："您想您能当选南非总统吗？"直震得我右耳暂时失聪。

也许因为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的黄面孔记者，曼德拉对我这张以众多白脸为背景的黄脸格外客气，频频朝汗出如浆的我点头微笑。

"Pool"采访结束，趁与曼德拉合影留念之机，我破坏摄影记者不得提问的惯例，向这位为自由而身陷囹圄27年之久的斗士表示敬意。我低声告诉曼德拉，我是中国记者，正在写一篇有关他传奇的小文。这位目光炯炯的慈祥长者和善地望着我，"无论我们对谁怀有多大的敬意，都不要把他写成天使。因为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

在天安门城楼挥过手的人

非洲国家首位驻华大使

3年前的一个月夜，在开罗“尼罗河希尔顿”露天酒吧，“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一杯啤酒下肚，满腹惆怅，正面对一江秋水发呆。一位鹤发童颜的古稀老人手托威士忌悄然坐在我旁边，双目如电，望着月夜下滚滚北去的尼罗河水炯炯放光，大有“独钓寒江雪”的气势。浪迹天涯的我不禁为之动容，视线越过酒杯，痴迷地端详起这张阡陌纵横的脸。老者有所觉察，谦和慈祥地转向我，扬扬酒杯，“日本人？”“索哈菲西尼（中国记者）。”我亦扬扬手中空杯用阿语作答。不料这一句竟引出老者滔滔不绝的故事。

老者自称是哈桑·拉吉卜博士，当过兵、打过仗，还当过外交官，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朋友。怕我不信，字正腔圆地用中文说了句“你好”。他这一说，立即使我恍然大悟：面前这位长者就是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首位驻华大使、法老村长、纸莎草大王拉吉卜。在埃及，几乎无人不知这位老者的鼎鼎大名。

1919年，拉吉卜出生在埃及北部地中海滨亚历山大一户百年望族之家。青年时代就读于开罗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留学法国进修地铁专业。回国后任埃及电车公司工程师，参加了亚历山大、开罗等地的城市交通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吉卜投笔从戎，在阿拉曼战役期间任盟军联络官，战功卓著，成为美82空降师荣誉军官，后被调往埃及驻美国使馆任三军武官。由于拉吉卜积极参加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团”革命，1952年7月23日，纳赛尔推翻法鲁克王朝后，

拉吉卜晋升为少将，出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军工生产。1956年起，拉吉卜先后出任埃及驻中国、南斯拉夫、意大利大使，以及埃及旅游部顾问，1968年辞官赋闲。至于他荣任首位驻中国大使的缘由，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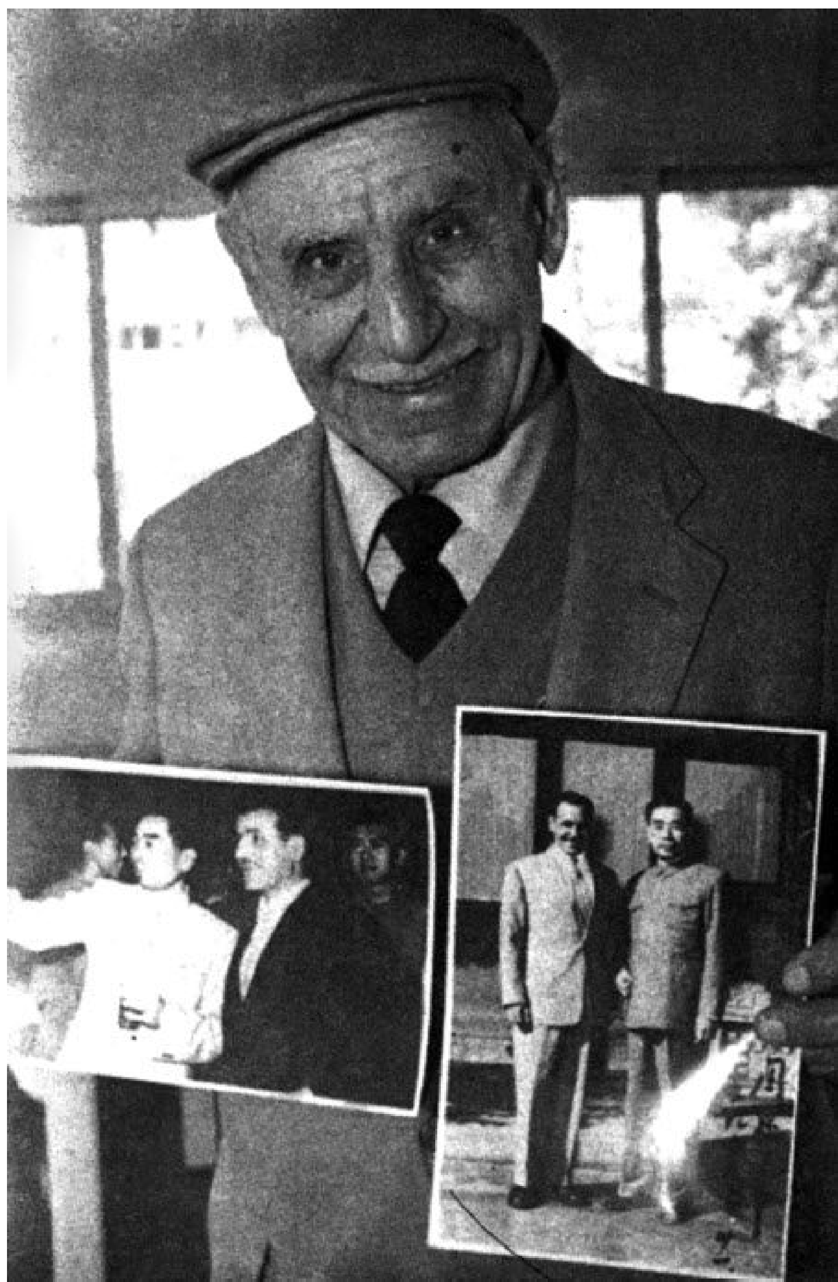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埃及总统纳赛尔认识了周恩来。会上，纳赛尔告诉周，他准备收回苏伊士运河，可英国首相艾登以武力威胁，阻止埃及将运河收归国有。当时中埃两国尚未建交，但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埃及运河国有化，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将以医疗给养、武器弹药支援埃及。万隆会议后，纳赛尔遴选拉吉卜为首任驻华大使，因为他不仅懂外交，当过驻美武官，而且是主管军工生产的国防部次长，有利于从中国争取军事援助。1956年5月30日，中埃建交，陆军少将拉吉卜作为首位阿拉伯国家和首位非洲国家驻新中国大使走马上任。

同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色列旋即武装干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当即拨款2000万瑞士法郎给埃及，同时50万中国人在天安门集会，声援埃及。拉吉卜称他家里至今保存着一张当年他站在天安门城楼朝50万声援者挥手的照片，可惜年代久远，已记不起站在他身旁的中国领导人的姓名。说到此，老人拉住我的手："现在就去帮我辨认一下照片上的人都是谁！"话音未落，性急的老拉吉卜一跃而起，拉着我的胳膊直奔停车场。

周恩来的老朋友

老拉吉卜家住尼罗河路78号大楼，他孤身一人拥有两个单元，妻子仙逝多年，儿子已移居美国。老拉吉卜的客厅简直是一座中国博物馆，从茶几、佛龛到桌椅、茶具，皆为从中国运来的瓷器、雕器、漆器制品。正北墙挂有一幅8尺长的工笔牡丹，画纸已变黄，可画面依旧栩栩如生。老头儿得意地用中文说："我爱人画的。"并说他夫人在

中国上过工笔重彩的国画科班。这儿的每件中国货都颇具来历，其中佛龛和一只用整块红木雕成的茶几是周恩来送给他的礼物。墙壁上至少悬挂着三张他在不同场合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其中还有毛、周的亲笔签名。



首任埃及驻中国大使拉吉卜博士手捧有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合影，缅怀中国总理周恩来。

一杯土耳其咖啡落肚，老拉吉卜的故事又侃侃而来。40多年前的一天，周恩来到刚开设的埃及驻中国大使馆做客，发现阿拉伯人喜欢吃的煮蚕豆与中国蚕豆味道大为不同，不仅个儿大，而且不涩。周恩来当即向拉吉卜要了一小袋未煮的生豆带回家去。不久，中国开始试种阿拉伯蚕豆，首先满足驻京阿拉伯人的食用，继而在中国大地普及了这种蚕豆品种。

1958年的一天，拉吉卜途经北京西直门，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拆城墙砖盖工厂，他当即找到周恩来提意见，说城墙像金字塔一样是宝贵的文化财富，现在中国很闭塞，将来开放了，城墙能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周恩来听取了他的意见，打电话下令保护城墙。说到此处，老头儿得意地仰面大笑。

说着，老拉吉卜翻出一张发黄的中国报纸，上面印有当年他肩挑扁担在十三陵水库工地的照片。老头儿自称作为尼罗河的子孙，饱受水患之害，最懂得兴修水利的重要，因而当年亲自率领埃及使馆全体人员和48名在京的阿拉伯留学生奔赴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此后，各友好国家驻华使馆纷纷效仿他的行动，周恩来称赞说：“哈桑·拉吉卜在外交史上发动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

老头儿又翻开一本美国《幸福》杂志，指着一位坐在孩子群中的中年男人得意非凡：“这是我毕生最得意的作品——我唯一的孩子，他是亚特兰大最有名的儿科医生。本来我可以把他塑造得比现在还好。”原来，当年周恩来听说拉吉卜只有一个孩子，正在大学念书，便建议他把孩子接到中国学中医，可当时拉吉卜不信中医。说到此，老头儿追悔莫及：“假如我儿子学了针灸，那他现在一定是美国医生中的首富。”

穿过有微型车床、钻床、墙上挂着数百把不同型号的钳子和扳手的车间，来到老头儿的卧室。这里挂着那张拉吉卜当年和中国领导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向50万中国青年招手的照片。我凑上前去，钻研

良久，可只认出其中一人是郭沫若，至于其他人则一无所知，这令老头儿大失所望。



老拉吉卜家的墙上挂着数百把不同型号的钳子和扳手。

在此后的两年里，我把我认识的所有来开罗访问的中国大人物都带到老拉吉卜的那张照片前辨认一番，可都没能使他满意。包括《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无法认全那张照片上的几十个人物。

纸莎草纸的发掘者

漫步埃及街头，从希尔顿酒店到汗·哈利利市场，不论街头巷尾，还是商店地摊，四处可见一种称之为“帕毕鲁斯”的“纸莎草画”。这是将古埃及神话画在古老的纸莎草上的精致工艺品，而老拉吉卜正是这一专利的持有人。

30年前，拉吉卜大使参观天津造纸厂，中国蔡伦的造纸术对他震

动极大，他当即暗下决心，要让失传千年的古埃及纸莎草纸再现于世。

拉吉卜卸任回国后，潜心研究古埃及造纸术。可古埃及造纸术由于由法老控制，十分秘密，在文字历史高度发达的埃及，史书对此竟无丝毫记录，早在1000多年前业已失传，连供造纸的纸莎草亦在埃及绝迹。为发掘埃及古纸，拉吉卜溯尼罗河而上，经过数年寻找，终于在苏丹南部找到了纸莎草。

纸莎草（Papyrus），阿文称“伯尔地”，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浅水沼泽之中。根部为鱼鳞状嫩叶，茎光滑无叶呈三棱形，顶端为辐射状细长针叶。古埃及人用其盖房、造船、织席、编筐，《圣经》中的摩西（《古兰经》中称为穆萨）就是坐在纸莎草筐里逃生的。据说当时埃及法老横施暴政，民不聊生，神谕法老权杖将落入由他抚养大的希伯来男孩之手。法老惊恐万分，下令杀死所有希伯来男婴。摩西父母均为希伯来人，他出生后不久即被父母放入纸莎草筐中，抛入尼罗河，后被法老之女捞起，抚育成人。摩西长大后逃出埃及，完成摩西十诫，成了希伯来人的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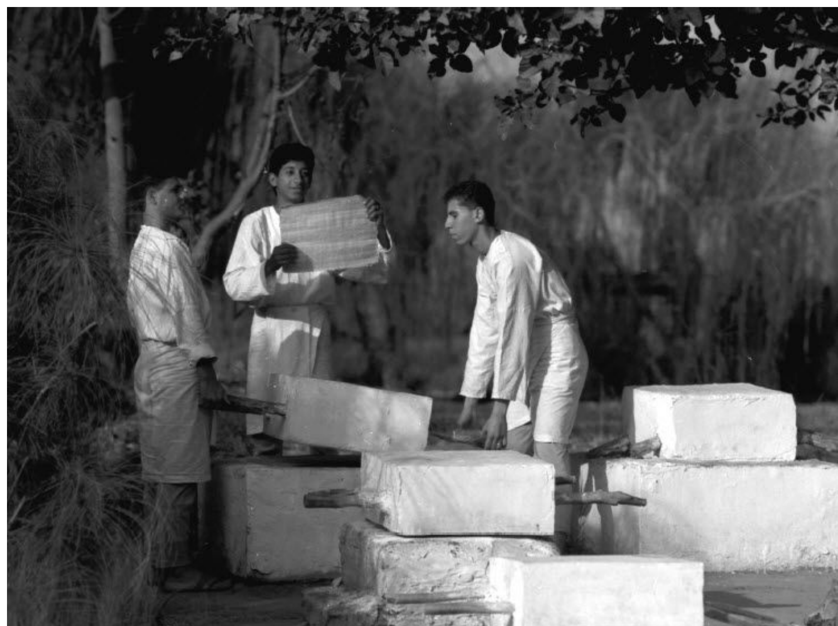
拉吉卜将千辛万苦在苏丹找到的纸莎草移植回埃及，精心培育，使绝迹千年的古草在开罗南部尼罗河雅各布岛迅速繁殖。



埃及街头卖饼的人。阿拉伯人以烘焙食品为主，与我们的蒸煮食品不同。



开罗传统食物。



制造纸莎草纸这门古老工艺，被拉吉卜带到现代世界。

仔细研究古代埃及纸之后，拉吉卜终于揭开纸莎草纸的制造秘密。他先将纸莎草剥去表皮，将其茎削成薄片，浸泡水中；再把充分吸水的薄片纵横排列经纬交织，覆以巨石挤压干燥，由此仿制出古代的草纸。拉吉卜的发现立即取得专利，法国为此授予他“纸莎草学博士”学位。

当年拉吉卜耗尽前半生积蓄创建的纸莎草研究所，今天已发展成拥有研究室、制作车间、绘画室、展厅、销售门市的综合产业实体。他生产的纸莎草纸可以保存千年以上，一扫普通纸易黄易脆的缺点，其产品行销世界各地。

法老村的主人

老拉吉卜是个从不满足的老头，就在他将雅各布岛种满纸莎草的

时候，一个更庞大的旅游村计划也在同步进行。

拉吉卜先在环岛的杂草水道中建起12座神像，依次为霍鲁斯神、太阳神、尼罗河神、农神、力量之神……每尊神像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神话故事。拉吉卜又在这座15万平方米的小岛上种上5000棵树，修建了古埃及时期的庭院、神庙、鸽子窝、牛棚。雇了300多名男女老少，身着古埃及粗布服装，充当“村民”，使用黄牛木犁、古网草船，刀耕火种，从法老到祭司、牛郎、羊倌、渔夫、农民、闲汉，七长八短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拉吉卜将他种草的荒岛命名为“法老村”，引得各国游客蜂拥而至，挤上小船，跟着手持麦克风的导游，围着小岛大眼瞪小眼地观看古老的耕种、收割、汲水、捕鱼、酿酒、纺织、造纸、建屋等活动……仿佛回到了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



法老村门前。

去年，老拉吉卜又在岛上复制了帝王谷的图坦卡芒墓，使这座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而严禁参观的古墓重现于世，从专家学者的著作、电影、电视中得以再生。

老拉吉卜已经83岁，孤身一人往返于纸莎草研究所、法老村和尼罗河畔的家。他毕生还有最后一个野心，就是用纸莎草纸代替现代纸。现代造纸业以木材为原料，每年都有大片森林被伐，而社会的发展使纸张总是供不应求。拉吉卜认为，以多年生草本植物纸莎草为造纸原料，年年收割、年年生长，既保护了森林，又降低了成本。据研究，每费丹（6.3华亩）沼泽地上的纸莎草可以制造16吨纸，埃及政府已将阿斯旺高坝湖沿岸的两万费丹土地辟为纸莎草生产基地。

拉吉卜目前正与日本投资商合作，共同开发纸莎草科研项目，用现代技术改进纸莎草纸制造工艺，研制高质量的现代纸。

1992年春，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访问埃及，我开着大吉普带他参观，钻遍开罗的大街小巷。临了，张百发恋恋不舍地离开法老岛，“全埃及还就这个小岛有点意思，你说咱们怎么就不能也造一个呢？”

我的外国记者朋友

莽汉纳伯特

在开罗市泽马利克区一幢别墅的阳台上，一条壮汉正逐一向参加酒会的来宾打听最新出品的镇静剂，因为现有的所有安眠药对他都已不起作用。他懒洋洋地变换着姿势，努力保持上身水平以使一只以他的驼背为沙发的黑猫睡得舒服些。他一面大口啜饮不加冰的黑牌威士忌，一面不停地埋怨时运不济，混到如今这步田地，回忆当年玩命的光辉岁月。这位蓬头垢面的老兄就是大名鼎鼎的纳伯特·席勒，美联社驻开罗摄影记者，一条胆大包天的莽汉。在大多数人眼里，此君在许多场合的古怪举止只有在娱乐宫拐角的哈哈镜中才能看到。

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前夕，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拉宾在开罗紧急会谈，上百名记者会聚开罗总统府。十几位资深记者身佩胸卡，自报姓名，获准鱼贯进入总统府。所有人都诚惶诚恐，唯有纳伯特·席勒一脸猥亵地自称是《花花公子》摄影师，一下子惹恼了不苟言笑的总统卫队。幸亏美联社牌子大，一位新闻官员又认识纳伯特的老脸，才把众目睽睽下出尽洋相的纳伯特从轻发落。

埃及内政部长被刺，安全人员拳脚相加驱赶摄影记者，一拳正打在纳伯特的小腹上，这厮当即大吼一声，放开美式门户，直打得那个警察望风而逃。以上这两场闹剧都是我亲眼目睹。

谈起辉煌的往事，纳伯特总是陶醉在两伊战争的硝烟里。当时他受雇于法新社，把自己绑在直升机的滑橇上，航拍波斯湾的海战和油

井大火。这类冒险他可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刻不停地干了整整一年半。当他结束这份工作、返回老家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时，就像远征伊比利亚后凯旋的拿破仑。家乡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闯进他本来就奇热无比的小屋，又打亮两盏钨灯，直烤得他面对摄像机双手乱舞，“我是自始至终待在直升机滑橇上而唯一活下来的人。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战争中的人全他妈疯了！”

纳伯特在开罗已经住了12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聪明远大于他的鲁莽，至今鼓舞他振作起来的唯一动力还是他早年看过的一本书，该书的作者威尔福雷德是位勇猛异常的英国水手，本世纪初便横扫了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伊拉克沼泽等人迹罕至的各种禁地，并将自己亲历的奇闻逸事著书出版。

纳伯特啜了一口威士忌，“我现在还在读威尔福雷德关于埃塞俄比亚的一本书，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内燃机的发明大大损害了世界原本完好的面目。我本应生活在威尔福雷德时代，真正的探险不依赖任何机器，人只有强迫自己把他的能力用到极限才叫探险。”

埃及是纳伯特人生探险的第一站，他在这里的感悟远比在中东、非洲其他洪荒之地十多年劫掠式探险的全部所得还要有价值得多。

1978年的欧洲是纳伯特人生的跳板，当时他与另外两名大学生邂逅于雅典，计划暑假周游欧洲。纳伯特主张去土耳其，可他的两位朋友却心血来潮要绕道开罗。

“就是当初死活要来开罗的那两个家伙，在开罗待了3天便悄然而去，而我则坚持下来，我一直向南走到卢克索。在那里，我一人冥思苦想了6个星期，最后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生活在这里。”

纳伯特埃及之旅恰逢吉米·卡特总统促成埃以和谈的万象更新之时，当时埃及到处充满了生气。即使这一和平浪潮刮过之后，其余波还久久不散。无论在街头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每个人都想参与中东和

平进程，每个人都要你明确表明你的观点。纳伯特正是为此才重返埃及的。

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继续学完3年课程后，纳伯特感到重返埃及的时候到了。当时他面临三种职业选择：旅行摄影师、自由作家和国际救援志愿人员。纳伯特的背景显然无法与牛津、剑桥的毕业生相匹敌。在谋生的道路上他不得不改变轨迹，当了一名苏丹难民救援人员，只有这样才能靠近他所热爱的埃及。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获得一份拍摄尼罗河幻灯片的工作，纳伯特花了一年多时间，沿尼罗河漫游了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想不到这一经历竟然成为他投身职业摄影生涯的转折点。



在机场执行任务，“大人物”久等不来。纳伯特（左）闲极无聊和别人玩起了“打手板”，没留神把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打飞了，发动全体摄影记者帮他找。现场光线极暗，大家蹲下去满地摸索无果。一自作聪明者说：“用闪光灯！”结果所有人的眼睛都被闪花了。

“尽管当年我拍的那些幻灯片不怎么样，可我却喜欢它们。”望着

满地的尼康、哈萨相机，纳伯特脸上露出怀旧的忧伤，“当时我只有最简单的照相器材，可那批幻灯片凝结的汗水比以后历次工作的辛劳都多。”

“新闻是很讲结构的。你必须把照相机取景器内填满各种有用的信息符号，这样才能精确地告诉读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我始终追求旅行摄影，我可能早就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了。我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展示或改变自己的风格，当然，我已建立起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能重来一遍，我会以全新的透视处理照片，处理人生，起码不会混到今天这一步。”言罢，他将面前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纳伯特·席勒十几年来拍摄的照片经美联社转发后，刊登在数不清的报刊上，上千万的读者坐在自家的安乐椅上，看着约旦、伊朗、巴勒斯坦的政治示威，埃塞俄比亚的起义，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西撒哈拉内战和海湾战争……

纳伯特根本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安稳生活。1992年以来，他管辖的中东、非洲地区，一直风平浪静，“这简直是浪费人生，我看只有南斯拉夫的战火和索马里内战还有点刺激”。在令他兴奋不已的机会到来之前，纳伯特只好无可奈何地帮太太抱刚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尽管他在酩酊大醉后四处夸耀开罗是生孩子的宝地，他将守着娇妻幼女安享天年，可现任美联社文字记者的纳伯特夫人心里明白：要么把老公送上战场玩命，要么任他在家里酗酒发疯。

断腿巴利

断腿巴利在贝鲁特弄断他那条他自诩为比玛丽莲·梦露的玉腿更直、更长、更性感的右腿已经将近10年，那时他比现在要精神得多。当年，数不清的黎巴嫩姑娘缠着这个十足的北欧海盗船长型的小伙子。据称他的祖辈来自挪威，他的姓“伊文森”是挪威贵族才敢用的大

姓。断腿巴利讲过一个他祖上的故事，据说当年他爷爷的爷爷是一帮北欧海盗的头子。一天爷爷的爷爷又洗劫了一个小岛，照例扯开嗓子大吼："我抢劫！我强奸！我……"话音未落，一个房门应声而开，走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妪，口称"谢谢"，一下扑到爷爷的爷爷面前。日后，这老妪成了巴利的爷爷的奶奶。尽管巴利持有美国护照，但他总是认真地强调："我真是挪威人，不是美国人。"

10年前，欢蹦乱跳的巴利是贝鲁特战火中最活跃的突发事件摄影记者，哪里出了乱子哪里准有他。也许是因为他太欢实了，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裤裆下爆炸"，多亏上帝有眼，仅炸坏了他的右腿。



《时代》周刊记者"断腿巴利"（前排左一）与美联社的纳伯特（前排左二）。

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在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特拉维夫绕道尼科西亚、开罗、安曼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塞给我一封信，还神秘地挤了挤眼睛："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炮火连天的巴

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我的老朋友、世界新闻摄影大赛金牌得主阿龙·瑞宁格写来的。他在信中列数战争罪恶，劝我还是离战争越远越好，并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玩刀者，必死于刀下。"知道我为人固执，阿龙特别提到他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险些丢了性命。

在阿盟外长紧急会议上，我第一次碰到头戴迷彩牛仔帽、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上前去："打扰了，我猜您就是断腿巴利，我是新华社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眼用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从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的。"看到我惊讶，他炫耀道："我在哈佛学过中文。"从此，我和断腿巴利成了哥们儿。

随着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迫近，中东地区的各国记者跃跃欲试，纷纷伺机进入利比亚。巴利拖着瘸腿、开着"79"式美军吉普一日三次地往利比亚使馆跑，准备凑齐一伙胆大妄为者结伴远征，穿越撒哈拉沙漠直取利比亚。就这样，我被断腿巴利引荐给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鸭子有辆三菱山猫，我们要一直开到的黎波里。"，尽管这次行动最终夭折，但从此我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了。

在开罗，诸如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等消息往往得等到西方传媒播发后，新华社中东分社才抄收转发，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字记者几乎从不到场。作为摄影记者，若想采访到正在发生的新闻，只有依靠外国记者朋友提供信息，而巴利和纳伯特的消息正是全开罗所有记者中最灵的。他们都娶了当地女人，BP机、大哥大不离身。从住宅到办公室，为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新闻线索的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他们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社会，疯狂地吸吮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每当有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之类的重要新闻，我的"酒肉朋友"纳伯特和巴利都会主动打电话通知我："鸭子，开上你的车！"因为在中东所有新闻机构中，新华社的汽车是首屈一指的。在开罗，拥有奔驰轿车的

新闻记者只有中国人，这一点令外国同行们大为羡慕。





几条大汉挤在我的吉普车中，享受着空调冷气，往返几百公里热带沙漠。沿途轰轰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话争奇斗艳，各种语言的脏话不绝于耳，我车中的白菜馅包子也被当作三明治，用军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两次轰炸巴格达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围但求无过的作风阻碍我与这帮抓“老鼠”的“大公猫”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闻的良机。

巴利现在娶了一名正在开罗美国大学念书的埃及女人做太太。开罗美国大学是与贝鲁特美国大学齐名的美式贵族学校，穆巴拉克夫人

苏珊等名媛皆毕业于此。巴利那位温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罗河心泽马利克岛上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安下心来过日子。可巴利积习难改，仍背着沉重的摄影包为《时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14层大厦中与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当时他正弯着那条完好的左腿往一块断裂的水泥预制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后面用力抱着他那条残腿往上举。

巴利喜欢穿黑帆布工装裤、黑色“阿迪达斯”运动鞋，背黑色“多姆克”摄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裤腿，眉飞色舞地给簇拥着他的崇拜者们讲贝鲁特那颗炮弹如何命中他的裤裆，险些废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终只断了右腿。急救手术时他又如何镇定自若，矜持幽默，令医院中的女护士泪水潸然。《时代》周刊至今坚持每年让巴利回一次美国，对他那条断腿进行理疗，可每次理疗之后，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别喜欢中国的“双喜”香烟，我总把使馆的朋友送我的香烟转送给他抽。按他的理解“双喜”（Double Happinese）有同性恋的暗示，像中国的京剧，吓得我赶紧表白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绝无此雅兴。巴利说他曾抽过一种“长征”（Long March）牌的中国烟，味道之妙至今难忘。每逢人多的时候，巴利总是炫耀他的两句半中文：“我说北京话不说广东话，我吃广东菜不吃北京菜。”车轱辘话连念十几遍，声音越念越大。最后，得意地歪头环顾一周后宣称：“我和鸭子在一起总说中文。”其实，巴利能讲的中文满打满算也就两句半。

闲暇时，巴利常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美军吉普沿尼罗河兜风，两听啤酒落肚，遥望无穷远的泪眼便没了焦点。

患难与共的河野

当我从海湾战场归来，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否还完好无损，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编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摄影记者，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北大时的校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留学北大进修中文，毕业后任共同社驻京记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过，1990年亚运会期间他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在巴格达再度相会。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的巴格达，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让你对付不了。为博得好感，我将摄影背心前胸和后背都缝上五星红旗，并用阿语、英语大书“人民中国”。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看着他艳羡的眼神，我许诺，如果打完仗彼此都还活着，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样的红旗，激动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难与共。”此后，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我拍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做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边境采访。知道我囊中羞涩又自尊心极强，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车，快去买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左）和摄影师大河源利男。



河野的同事、共同社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帮我用美联社底片传真机传输德奎利亚尔的稿件。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踪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急急忙忙赶到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总部，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机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近藤两手一摊，“摄影记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烦，河野上前营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馆正设法援助。”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刚刚恢复自由的同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留7小时的纪录，河野说这等于又得了枚勋章。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喝酒，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将经伦敦返回日本，近藤则穿过阿伦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和其他美军战地急救用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千万别太猛！遇事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约旦、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当恐怖袭来，我总想起与我几经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国，在北京新华社，我和久别重逢的河野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我当时竟怀疑是在梦中。不久前我从中东分社回国，我们又坐在小酒馆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诉我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尽管他每月需将全部工资的75％交给前妻抚养四个孩子，可他还是与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国帮助建起两所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与友人发起倡议，建议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并主动支付战争赔款。河野认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应主动做出表示，这样对日本更有好处。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女婿。

流入梦中的苏伊士

从10000米高的海湾航空公司波音航班朝下望，一段蔚蓝色的直线把原本联在一起的欧亚大陆同非洲大陆一斩为二。尽管在1:1200万的世界地图上这段蓝线长不足5毫米，可它使波涛滚滚的红海由此北上，流入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我这样写可能有人不同意。可我在苏伊士运河游泳时，它的确由南向北湍急地奔腾着，以至我横渡河口后竟被冲向下游200多米。茫茫大海上，成千上万的舰船向此汇聚，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井然有序地沿着狭长的水道挺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伊士运河。

在我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的3年里，我已记不清多少次乘飞机从它上面飞过，乘巡逻艇沿河漂渡、驾大吉普搭轮渡横跨运河上所有11个渡口，驱车穿越运河腹下的洲际隧道。我还冒着遭红海姥鲨袭击之险，在宽广的苏伊士运河河口从非洲游到亚洲……

对我来说，“苏伊士”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条河，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一个尸横遍野、有数不清的无名战士墓地的战场，一片焦黄干涸、满目荒凉的热带沙漠，更是我有限生命中最神奇的一部分。

通过运河

午夜，我随一群埃及“引水”（引航员）爬上一艘快艇，解缆起航，将笼罩在一片橘黄色灯光中的塞得港甩在脑后。大胡子水手嘴角的大烟斗在夜海中忽明忽暗，无线电对讲机中嘈杂的阿语问答一来一

往。我们的小艇随着起伏的黑浪一直驶向塞得港正北泊有上百条舰船的地中海锚地，坐在我身旁的十几位引水将各自带领一艘万吨巨轮由地中海驶向灯火阑珊的运河河口。

摩托艇靠上泊在锚地的“格兰纳”号，我随引水哈利德攀着扶梯爬上这条排水3.8万吨的挪威散装货船。“格兰纳”号来自汉堡港，满载钢材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引水哈利德一直爬上“格兰纳”号驾驶台，与挪威船长并肩而立，指挥船员升起埃及国旗，引导着这座水上城市般的庞然大物开向运河河口。

夜海中，摩托艇上其他埃及引水也已分别爬上余下诸船各自的岗位。由20几艘万吨巨轮组成的船队燃亮桅灯、尾灯，排成一条直线对准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河口的塞得港，左红右绿的舷灯像一条彩练。

由于苏伊士运河航道狭窄，运河管理局不得不实行单向通行规则，日通行能力为三支船队共78艘货轮。其中由北向南两支船队52艘，由南向北一支船队26艘。位于伊斯梅利亚的运河管理局中央调度室，根据当日情况灵活调配每天通过运河的舰船。

我们的“格兰纳”号夹在一支由北向南的船队中缓缓行进，右舷开始出现一座灯光灿烂的城市，正是刚才我们逗留的塞得港，这座始建于1869年运河正式启用之日的小城，已经发展成拥有50多万人口的现代自由港。现在，埃及政府已将其辟为免税区，街头商品五光十色，从Sony彩电到Cartier时装，从Rolex手表到Heineken啤酒，还有中国的清凉油、小五金，应有尽有。此时，第二程引水爬上船来替换了引水哈利德，船队开始进入河口。

新登船的引水将一台中继无线收发报机固定在“格兰纳”驾驶台上，据说这样可以把通过运河的船只的航速、位置及与其他船只的间距随时通知位于苏伊士运河中游伊斯梅利亚运河管理局的电脑中心。快艇载着哈利德等完成使命的引水返回塞得港，以下至伊斯梅利亚的

航程由这位光下巴的小伙子担任引水。

清晨，自塞得港由北向南航行了98.5公里的船队缓缓驶过埃及最美丽清洁的小城——伊斯梅利亚。这里，精致的总统别墅依山傍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多次在此会晤。此时，冉冉升起的沙漠旭日透过晨雾，阳光越过总统别墅直射到苏伊士运河管理局13层办公大厦顶端的控制塔上。控制塔是整个运河的神经中枢，现代化的计算机系统控制着整条运河及其出海口，向所有通过运河的舰船发号施令。



1993年12月，苏伊士运河拓宽工程接近尾声。运河日收入550万美元，是埃及政府的第三大收入。

在伊斯梅利亚，第三拨引水登船换下忙碌了一夜的上一拨引水，率领船队继续南下。进入宽广的大苦湖后，船队就地抛锚，等候当天早上从运河另一端苏伊士城方向开来的北上船队。午后，迎面而来的由30多艘油轮组成的船队终于交臂远去，我们的船队得以进入伊斯梅利亚以南的狭长河道，继续南下。

在黄昏夕照里，我们的船队终于看到苏伊士城河口清真寺高高的双尖宣礼塔。第四拨引水在此登船接替第三拨引水继续导航，一直将航行了一天一夜的船队送出苏伊士河口，通过苏伊士湾，驶向红海。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商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共用了近20小时。

运河沧桑

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南北全长161公里，加上延伸到大海中的水道共长195公里。其实远在法老时代，苏伊士地峡曾有过一条蜿蜒的小河，但随着时光流逝，沙漠的侵蚀使小河葬身其中。1859年，法国人勒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筹集资金发起“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利用数十万埃及廉价劳工开凿运河。勒塞普出生于法国官宦世家，23岁时任法国驻亚历山大外交官，其间偶然发现拿破仑的工程师佩尔勘测苏伊士地峡的报告。勒塞普遂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好友塞得·帕夏，塞得·帕夏是土耳其驻埃总督穆罕默德·帕夏之子。1854年，塞得·帕夏接任父位，授权勒塞普开辟运河。1859年4月25日，勒塞普组建的运河公司在以塞得命名的塞得港破土动工。当时埃及全国人口仅500万，为开通运河，埃及每月动用6万名苦力轮流去工地。在开凿运河的10年里，共有12万埃及苦力丧生。经过10年的挖掘，1869年11月17日，北起地中海塞得港，南至红海苏伊士城郊陶菲克港（Port Taufiq）的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

苏伊士运河通航把利物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2万公里，由科威特经运河到希腊，比绕好望角节省23天航程。巨大的商业利益使苏伊士运河承担了环球海运的1/10。此外，还有大量非商业舰船如军舰等取道苏伊士运河以提高效率。

1875年，英国趁埃及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买下苏伊士运河公司44%的股票，继而在1882年占领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了英国建在埃及的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密码、旗帜。到1955年，英国仅把全

年运河收入3500万埃镑中的100万埃镑交给埃及。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运河收归国有，推倒了立在塞得港运河河口的勒塞普像。英法联合以色列出兵干涉，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由于中、苏、美等国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埃及终于将运河收归国有。



1993年10月12日，美国“瓜达尔卡纳尔”直升机航母通过苏伊士运河直驶索马里，以加强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图中的双宣礼塔清真寺是苏伊士运河南端陶菲克港的标志。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先发制人，一举炸毁埃及的全部10个机场，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仅用6天时间就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苏伊士运河由埃及内河变成了交战的前线。无休止的空袭、炮战、水雷和小规模突击迫使运河关闭，埃及政府把运河两岸的75万居民撤至尼罗河沿岸，运河成了“死河”。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43岁的巴列夫将军取代拉宾继任以军参谋长，为能“以最小兵力取得最大防御效果”，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构筑了长160公里的“巴列夫防线”，苏伊士运河被无限期地关闭了。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巴勒斯坦联合发起突袭，第四次中东战争即“斋月战争”（战争爆发之日恰逢以色列赎罪日，故亦称“赎罪日战争”）爆发。埃军用高压水枪摧毁运河东岸的沙垒，在炮火支援下武装强渡，埃及人仅用90分钟就突破了防线，再次控制了运河两岸。

由于阿以冲突，从1967年至1975年运河关闭了8年之久，短短8年使世界贸易损失了140多亿美元。战争炸毁了苏伊士城85%的房屋，从大苦湖到陶菲克港，交战双方遗弃的各种重武器至今滞留在原地。俯拾即是的锈蚀弹壳讲述着悲壮的战争故事。

运河自1869年通航至今，先后扩建了10次，水深已从当年的6.75米变为今天的16.15米。运河横断面从304平方米增至3700平方米。1976年，运河重新开放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开始对运河全面整修，安装大功率无线定位导航雷达网，运河管理局中央控制室存储了全球近3万艘船舶和近千名引水员的档案资料。与此同时，运河河道上至今保留着各种古老的视觉航标、直线导标和水界导标，甚至还有雾角等声标，与现代化的电波航标配合使用。在狭窄而多雾的河段，还在沿岸修建了供紧急泊船设立的系缆桩，以防因巨大风浪而造成的船舶互撞。

已有130年历史的苏伊士运河历尽沧桑，静候着远来的船队。早在职1956年运河收归国有之前，运河管理局高层职员中根本没有埃及人，只有27名埃及人充任低级引水。

1992年，我作为随同摄影师随钱伟长访问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庞大的运作机构和运河研究所。据局长介绍，今天的运河局已发展成拥有3万多名员工的巨型企业，其成员全部为埃及人，其中1.4万人为运河局正式雇员，另外1.1万人在局属公司从事与运河有关的第三产业，如修船、餐饮。运河局设有自己的研究所，从事有关课题开发，还拥有自己的拖轮、挖掘船、修船厂和船坞等。1956年运河国有化以

前，仅能通行6万吨级以下的货轮，经过国有化后的几次疏浚，已可以通行满载排水量15万吨、空载排水量50万吨的巨轮。每条船经过运河的通行费在20万美元上下不等，视吨位和载货性质而定。收费标准以“船型”（Size of Ship）和“货型”（Type of Cargo）综合考虑而定。目前35%为油船，20%为集装箱货船。运河现在日平均收入550万美元，全部归埃及人所有。官方公布，1991年运河过河费收益为17.7亿美元，1992年为18.6亿美元，1993年超过20亿美元。据介绍，运河局虽归国有，但政府通过特殊政策给运河局独立法人地位，使其以私营企业形式经营，运河公司总经理不受官僚程式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管理权。“运河北段有泥、中段有沙、南段有石”，因此，运河局在使用的同时，还得不断地维护运河清水长流。现在，有21个国家的挖泥船帮助埃及拓宽运河。



西奈的巴列夫防线。



西点军校教程规定，学生主修科目必须和实地考察相结合。中间两位是西点学员，选修了有关中东的课程。右边的埃及军官是当地实践课导师，陪他们重游巴列夫防线。

沿运河徜徉

驾吉普车沿运河徜徉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从运河北端塞得港沿河南下，首先是一派热带沙漠景观，滚烫的黄沙上连仙人掌都不长。萨姆导弹阵地旁四联23毫米高炮和闪烁其间的穿土黄迷彩服的埃及士兵随时提醒你这是军事禁区。这一带，一般车辆是禁止沿河行驶的，可我的大吉普却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

1992年春，《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率团访问埃及，急需一名随团摄影师，我和我的大吉普就这样成了《人民日报》的队伍。可头一天就遇上了麻烦，东道主《金字塔》报的车队在开罗街头横冲直撞，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阿文报纸在中东比中央电视台在北京还要牛气10倍，可紧跟车队的我却处处受阻，连“7·26”大街的停车场都进不

去。在《金字塔》报为邵老总举办的接风宴上，一位自称是给《金字塔》报老总开车的小伙子对我万分同情，我忙不迭地告诉他，我是那个中国大人物的摄影师兼司机，小伙子两手一拍："玛菲士穆士希勒。"（没问题。）说着伸开手掌问我要大吉普车的钥匙，看着他那喝得像烤全羊一样紫红的脸，我弄不懂他要干什么。饭后，当我返回停车场时，只见我那位酒友正坐在我的大吉普中狠轰油门，大吉普前风挡下面赫然多了张足有一尺长的巨幅通行证。

尽管我的大吉普享有沿运河徜徉的特权，可我从未以此违法乱纪。在标有严禁摄影的区域，我总是将相机装入摄影包内以免引起误解。一次，我开车带三位同事过运河，其中一位老兄举着"傻瓜"乱拍，任我怎么强调军事禁区不准拍照，可他还乱照不停，结果引来了一队宪兵，非要没收相机不可。事情危急，我忙掏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的证件上去解围，可面色铁青的阿兵哥就是不肯宽容。万般无奈，我想起三天前在埃及第2机械化军学来的骂人话，指着那个同事用阿语大骂："真是个上面没长脑袋、下面没长那玩意儿的笨蛋！"不料这句流行于大兵中的阿语竟逗得宪兵前仰后合，朝我连连挥手："安拉宽恕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废人！"事后，我那位惹是生非的同事诚惶诚恐地问我对大兵说了什么，我说："我告诉他们你是上司，其余的人是你的下属。"我那位同事立即得意洋洋，"你看，人家就比你尊重领导！"

塞得港南55.5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坎塔腊渡口，在这里可以将吉普开上轮渡，直抵西奈。由渡口向东狂奔270公里就是阿里什，由阿里什直行50公里则是加沙地带。我曾经几十次往返于加沙至开罗间的沙漠公路，以至渡口的船工一见我的大吉普就高喊"西尼"（中国）。在这里过河我向来不用排队，而我每次过河总是以双喜烟、清凉油和圆珠笔作为对渡口船工的酬谢。

在塞得港南98.5公里处的伊斯梅利亚，有一家濒大苦湖而建的咖啡馆，有个令人回肠荡气的名字——"渔人"。这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农

业区，从尼罗河引来的甜水渠深入到农田阡陌之中，滋润着椰枣、桉树、柑橘和草莓。这里的男人骑在驴背上如阿凡提般沿小径匆匆而行，妇女则长袍垂地，在芒果林掩映的泥屋下洗衣煮饭。我常将大吉普开到泥泞的屋檐下，在棕榈树搭的茅棚下面河而坐。浓烈的阿拉伯香料与耳畔快节奏的阿拉伯音乐交织出迷幻的异国情调。坐在“渔人”咖啡馆里，享受一份煮蚕豆、霍姆斯酱大饼、烤鱼、蔬菜沙拉、鲜柠檬汁外加抽一袋“希沙”（阿拉伯大烟）不过15埃镑，而且全是正宗货。鱼是刚从运河中钓上来的，店主还亲自抓一把只有胡桃大小的运河柠檬为顾客榨一杯原汁。店门口有一排装满凉水的陶罐，向过往行人免费提供解渴饮料。



苏伊士运河北端赛德港。



1993年11月，穿着破裤衩的我横渡苏伊士运河，从非洲游到亚洲。水流很急，时有“红海姥鲨”出没。当地小孩儿崇拜的眼神让我很是受用。

每当我坐在“渔人”咖啡馆的木凳上，望着烟雨迷蒙中缓缓行进的运河船队，总会沉浸在古道热肠的感慨之中，直到船队中导航的雾角一声断吼，才把我从断断续续的遐思中拉回到吉普车旁。在我情思悠悠的“渔人”咖啡馆对岸，是伊斯梅利亚战争纪念馆，纪念碑是一支巨大的AK步枪。在几公里外就可以看见其突兀的枪刺直插蓝天，仿佛正对空鸣枪以纪念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双方战死的无名烈士。我先后17次前往那里凭吊战死的英灵，其中最后一次是陪同政协副主席吴学谦。那天我开着大吉普在前面带路，由于车速太快，连保险杠跑丢了都未发现，想不到竟被紧随其后的吴学谦的司机小陈捡了回来。就在我丢失保险杠的那段沙路上，埋葬着上万名无名战士。

隧道和航母

驾吉普继续南下至运河143公里处，就是著名的“A·H隧道”。该隧道南距苏伊士城17.5公里，1982年通车。其名“A·H”源于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麦德·哈姆迪少将的姓名字头。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哈姆迪少将亲自率人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浮桥，使埃军跨过运河，可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

A·H隧道自西向东在运河下42米深处横穿而过，长1640米，内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设施，双向车道宽7.5米，每小时通行能力为2000辆标准卡车或1000辆坦克。隧道静悄悄地在河底联结起亚非大陆陆路交通，具有举世罕见的战略意义。



苏伊士运河河畔一黑人对着美国航母大喊：“美国人滚回去！”



苏伊士运河边的卖水人，其传统始自奥斯曼帝国。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峡、沙特、约旦及亚洲的陆上捷径，也是我在中东驾车往来穿梭采访使用频率最高的通道。1993年底我驾吉普车由开罗前往约旦边境，迎接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

大校友、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从巴格达调任埃及。往返仅3天，去时隧道费还是1埃镑，可返回时隧道费已涨至1.25埃镑。

在运河区，最刺激的莫过于拍摄航空母舰通过运河。这类新闻由于属绝对军事机密，所以消息来源必须依赖美国记者。我在中东期间拍到了美国最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和“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等尖端舰只。

1993年6月28日夜，开罗工程师区我床头的电话铃突然振响，听筒中传来《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的公鸭嗓：“唐，你好吗？‘罗斯福’号已进入塞得港，对，第6舰队，明天中午，老地方。”

苏伊士城东有一座6层高的“红海饭店”，它是苏伊士城的最高建筑，其顶层是面向运河河口的餐厅。瘸腿巴利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这里。

6月29日中午，当我经过150公里的飞驰，风尘仆仆地把车开进红海饭店停车场时，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里，我将车头向外，占据了正对路口的位置，这是一遇风吹草动便可飞速逃跑的车位。

在红海饭店顶层面向运河的餐厅里，美联社的纳伯特和CNN的摄影师已占据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装模作样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面包黄油、西式汤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侧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静静的运河。工夫不大，瘸腿巴利、法新社的曼彻尔和其他一大帮摄影记者亦鱼贯而入，像一群溜边的黄花鱼，争相抢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来。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摄像机、照相机全都大张着镜头，紧贴着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点10分，随着WTN摄影师法鲁克的一声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齐落在盘子里，所有的面孔同时甩向窗外的运河，所有的右

手同时伸向桌下的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蓝灰色舰体姗姗而来，上层建筑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碟状天线旋转不停。几十架叠起双翼的F-14、F-18、EA-6B、A-6与E-2C鹰眼雷达预警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号，“尼米兹”级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9.5万吨，舰载高性能作战飞机90架左右。已装备海军的为“尼米兹”号CVAN68、“艾森豪威尔”号CVAN69、“卡尔·文森”号CVAN70、“西奥多·罗斯福”号CVAN71）。此时，只有广角镜头才能装下它庞大的舰身。

游出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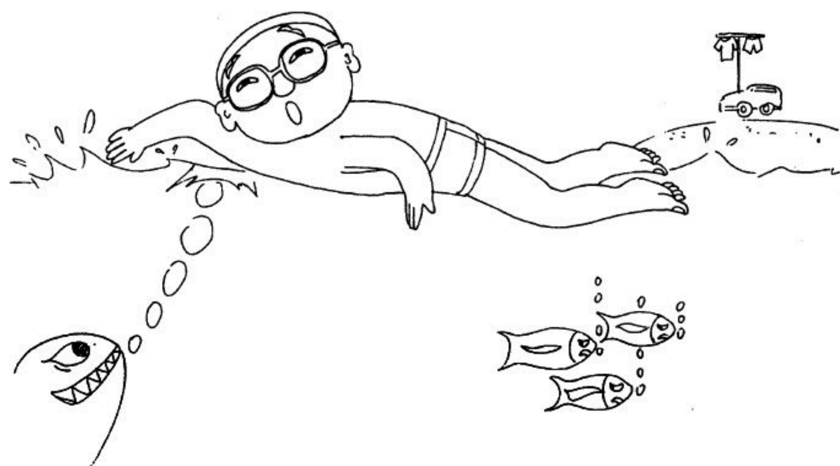
1993年12月3日，我最后一次将我的大吉普开进苏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出海口。在这里，我无数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忆我早已逝去的无限空虚的青春。在我停车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与其隔海相望的是亚洲西奈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结束3年的中东记者生涯，“走出非洲”。望着滔滔海水，我不禁产生一跃而入的渴望。

突发奇想的我不禁连蹿带蹦地扒掉衣裤，锁好大吉普，纵身跃入滚滚红海。

冰凉彻骨的海水扑面而来，河口浮游生物招来的沙丁鱼像无数支银箭从我身旁射过。右侧，又一队巨轮在海面上泊碇排列，准备过河，头顶蓝天上的片片白云正飞快地从非洲滑向亚洲。万吨轮螺旋桨推进器卷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结成七彩的光。深海翻卷而来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听到自己骨节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咔咔声，也许一条觅食的姥鲨已经盯上了我，可我喜欢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的一生

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持续的冒险使我饱尝恐惧的悲哀，同时刺激我狂热的工作激情。在与自我拼搏了40分钟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爬上西奈半岛，一种痛快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我从非洲游到了亚洲。



铸剑为犁的拉宾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总是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3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重回权力巅峰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着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挡、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拉宾和他老掉牙的“公仆车”。







1992年6月24日，以色列大选初步揭晓，工党遥遥领先于利库德集团。工党领袖拉宾得知自己获胜后，在特拉维夫工党集会上向自己

的支持者致意。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他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沙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4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内阁总理（1974-1977年）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偷了最后一发炮弹

拉宾在《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出生时说：“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结合于圣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后只身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想当英雄的鲁比佐夫报名参军保卫耶路撒冷，由于平足被刷了下来。可固执的鲁比佐夫趁人不备将自己的姓改为拉宾，走向另

一位矮个大头的体检官，竟奇迹般地混了过去。多年以后，成了以色列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小子！要不是我让你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开罗一年一度的“十月战争”胜利纪念日。

就这样，老拉宾进了英军第38营。可惜时运不济，等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近尾声。尽管一个敌人没见着，但毕竟朝天放了许多空枪。在镇压一场阿拉伯人骚乱之后，好歹也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拉宾没有白上战场，他俘获了惊人的“战利品”——一位楚楚动人、含情脉脉的犹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颇有教养的富商，“十月革命”后来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兹垦荒，天生丽质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磨炼，只好到耶路撒冷当了护士。那年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犹太移民的骚乱，高大健壮的犹太军人老拉宾用胸脯护住了她。老拉宾发扬参军时的那股犟劲，趁热打铁与姑娘成婚。一年后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蓝眼珠的伊扎克·拉宾诞生于耶路撒冷。

拉宾的母亲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当老拉宾还是金属工会积极分子

时，她已当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了。小拉宾先后在幼儿园、工人子弟学校长大成人，15岁考进了卡多里农技学校。课余，拉宾在加利利基布兹务农，白天种地，晚上在农场当警卫。从卡多里农校毕业时，拉宾由于成绩优异，得到英国7.5镑的“农具奖金”，可他根本没把钱用在农具上，至今还自称欠英国政府7.5镑。

像当时所有的基布兹社员一样，拉宾对土地本能地眷恋，为垦荒他甚至放弃了去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假如不是隆美尔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宾肯定在海法基布兹里当一辈子老农了。1941年，当一名神头鬼脸的大汉找到正在基布兹食堂喝汤的拉宾，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帕尔马奇（Palmach：希伯来语，意为“突击队”）时，拉宾对此还一无所知。

1941年5月的一个黄昏，拉宾和其他20多个同样激动的小伙子开进了南黎巴嫩破坏电话线，这是他参加帕尔马奇的第一个战斗。

1943年，21岁的拉宾出任帕尔马奇排长，很快他的排成了帕尔马奇9个排中火力最猛的一个。一次演习之后，拉宾顺手牵羊将一枚未打响的迫击炮弹藏进背包，混上公共汽车运回海法，因为他的排只有迫击炮而没有炮弹。不料就在他为自己的所为洋洋得意时，一纸盗窃弹药的传票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原来他偷走的那枚哑弹，是当时全帕尔马奇的最后一发炮弹。

1947年联大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可联结耶路撒冷至特拉维夫的公路一开始就被阿拉伯军队切成几段，耶路撒冷成了一块飞地。为了保障以色列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命令26岁的帕尔马奇上校旅长拉宾打通这条70公里的生命线。脾气暴躁但却雷厉风行的拉宾立即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不仅打通了纵穿“地狱之门”阿雅龙山谷的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还以暴力另开出一条“缅甸路”。

1991年1月到1993年9月，我先后4次赶赴以色列采访，特拉维夫

至耶路撒冷公路是我的必经之路。驾大吉普穿行于阿雅龙山谷之间，当年拉宾亲手改装的装甲汽车还扔在路边，被火箭榴弹击中的弹洞张着血盆大口，被后人涂上暗红色防锈漆，提醒人们牢记前辈付出的鲜血代价。

铁汉柔情

帕尔马奇队员拉宾在婚恋问题上一扫穷追猛打的职业雄风，更没有他老爹趁热打铁的魄力。

1944年，22岁的拉宾与亭亭玉立的丽哈邂逅于阳光明媚的特拉维夫街头。双方只是相互一瞥，就把一切全说明白了，其后是默默相向而立，深情凝视，丽哈一对明眸当即泪花滚滚。拉宾忙从军裤口袋中掏出皱巴巴、满是汗味烟味的大手绢递过去，可丽哈收下了手绢却没擦泪水。次日清晨，丽哈把洗得干净无比、洒了香水并绣了一颗“心”的手绢还给拉宾，拉宾当即心慌意乱，迈开军靴跨上一步，展开猿臂把丽哈抱了起来。

可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拉宾并不愿立即明确两人的关系，在长达4年的恋情中若即若离，不时玩弄“敌进我退”、打了就跑的帕尔马奇战术。其实，拉宾始终狂恋着丽哈，只是身为一名帕尔马奇军官，死神的黑翼一直笼罩在头顶，拉宾不愿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军队中，帕尔马奇军官死亡率历来居世界第一。我在以色列看过一部描写“六日战争”的纪实片，片名为《跟我来》（*Follow Me*），整部影片全是战地记者火线实拍的，影片字幕上圈了十几个黑框，因为这些记者早已笑卧沙场。影片中有达扬、沙隆、拉宾等人的实战镜头，战斗中的帕尔马奇军官从不说“给我冲！”而是一马当先说“跟我来！”拉宾深知自己职业生涯的危险性，他不愿让漂亮纯洁的丽哈把青春耽误在一个低级军官身上。



以色列女兵。

睿智的丽哈却偏要把一生赌在这个脏兮兮、穿军靴的傻小子身上，她先报名参加陆军，以后干脆也加入帕尔马奇，并巧弄手段设法编进了拉宾那个营，把自己完整地交给副营长拉宾指挥，继而几个冲锋把拉宾原本脆弱的防线打得千疮百孔。拉宾受伤后，丽哈寸步不离，百般柔情，终于彻底摧毁了拉宾的最后防线，开始筹划在战争间隙给长达四年多的恋情画上句号。

婚礼之后，拉宾全力投入“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他率领部队于1948年10月15日诱使加沙-内格夫的埃及军队开枪，借此越过边境直捣北西奈首府阿里什。连以色列空军也没想到拉宾的部队如此迅速地插入敌后，以至错误地朝拉宾的部队发起攻击。拉宾部队的突进再次引来本古里安总理的指责，可他的渗透给和谈争得了有利条件，他本人也由于亲临一线、了解战局而成了以色列和谈代表团的成员。

培养亡命徒式的火线军官

和谈是件令拉宾头疼的事，首先他除了军装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接下来的难题是长这么大从未打过领带，任司机反复教了多少遍，他也无法把那件“工艺品”系到脖子上。绝望的司机只好将领带打一个活扣，套在拉宾脖子上再轻轻拉紧。幸好拉宾对这种“一拉得”的绝招一练就会。

住进罗得岛玫瑰饭店后，宁静的和平气氛使听惯了枪炮声的拉宾睡不着觉，长夜难眠，多年野战生活造成的营养不良又使他饥肠如鼓。会议之余，他找来侍者请教希腊语“还要”怎么说，侍者告诉他是“Encore”。他于是坐在房中苦练了一刻钟。晚餐时，拉宾一眨眼就吞下了一盘肥牛排，随即指着空盘子说“Encore”，继而又得到一盘。那天晚餐拉宾至少重复了三遍“Encore”，才心满意足地走过瞠目结舌的侍者，缓步离去。



加沙归还前的以色列警察。

15个月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本古里安总理开始改组陆军，帕尔马奇军官以集体辞职反对削弱他们的地位，拉宾自恃与本古里安关系特殊，到本古里安家中为帕尔马奇请愿，并不顾取缔聚会的命令，因而被记大过一次，还丢了旅长职务。丢了官的拉宾像抽筋似的抬不起头来，可还恋恋不舍地赖在军中不走。好在总参训练部珍视拉宾的才干，力排众议任命他主管“营长训练班”。他以加倍努力报答朋友的知遇之恩，培养出许多亡命徒式的火线军官，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里尔·沙龙。

拉宾的勇敢忠诚和讲义气给他惹了麻烦，可这无法抵消其超人的军事天才，拉宾的实战经验和个人魅力有目共睹。1950年，28岁的拉宾升任总参作战部长。他在英国坎伯莱皇家参谋学院进修一年后归国，亲手编写教材筹建以色列指挥学院，继而赴美考察，确立“培养伞兵素质的步兵、突击队员型的坦克手”的建军方略。1956年，拉宾晋升为少将，任北方军区司令，不久又被哈佛大学管理系录取。他动用军队成功地将冰天雪地中10余万新移民妥善安置，深得民心。1964年1月，42岁的拉宾出任以军总参谋长，他从一名帕尔马奇队员爬至以军最高长官仅用了23年。

这期间，拉宾与和他年龄相仿、资历相近的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屡屡意见相左。佩雷斯温文尔雅，主张依靠欧洲发展以色列国防；而身怀奇才又咄咄逼人的拉宾以切身经验和一帮职业军人为后盾，倾心美国。两个各怀大志的才子不时在各种问题上发生龃龉，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为国尽忠的合作。

1967年6月5日凌晨，拉宾任总长的以军先发制人，出动全部200架飞机中的198架，一举摧毁埃及空军，几小时后，又将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彻底歼灭。拥有绝对制空权的以军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穿插，不费一枪一弹拿下沙姆沙伊赫，控制了蒂朗海峡。我曾先后14次赴沙姆沙伊赫采访，当年以军紧扼蒂朗海峡的工事已移交戴玫瑰红贝雷帽的多国部队观察员（MFO）。当初拉宾这一

举措使约旦、加沙地带、埃及、沙特失去了亚喀巴耶湾的出海口。拉宾的军队随之占领整个耶路撒冷，进抵苏伊士运河，攻占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仅用6天就大获全胜，占领了相当于本土3倍多的阿拉伯邻国领土，身为以军总长的拉宾被以色列人视为“六日战争”中的头号英雄。



耶路撒冷哭墙下，两名阿拉伯妇女与两名犹太男人擦肩而过，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圣地。

4年总长任期将满，从不满足的拉宾找到以色列总理，一句话差点儿把这位总理从安乐椅里震出来：“我想当大使，以色列驻美国大使！”

“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所有内阁成员都不希望锋芒毕露的拉宾出任驻美大使，但执拗的

拉宾得到了他那位德高望重的“大婶”——工党总书记梅厄夫人的全力支持。

1968年2月，脱下咔叽军装的拉宾走马上任。当时美国正陷入越战困境，好奇的美国人都想一睹这位用6天打败所有邻国的弹丸小国的三军总长，连罗伯特·肯尼迪也请求与拉宾合影。

尼克松未当美国总统前就是拉宾的好朋友，他身边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当时世界上最出风头的犹太人，而那位一直庇护拉宾、除了以色列什么也不在乎的梅厄夫人此时稳稳地坐在以色列总理的位子上。

拉宾的大使生涯并非一开始就得心应手。尼克松在白宫举办晚宴，拉宾不知道请柬上的“白领带”（White Tie）是什么东西，更弄不懂是必须佩戴还是严格禁止。好在他不耻下问，才在一个饭店老板那儿弄到一套硬衬条纹裤、黑燕尾服的“白领带”，像个“摩登时代”的机器人，呆头呆脑地进了白宫。

拉宾在大使官邸宴请美国官员，佳肴美酒之后，他兴冲冲地取出卡斯特罗送的哈瓦那雪茄请客人品尝，不料原本笑逐颜开的来宾一时像见了毒蛇猛兽，望烟而逃，只有拉宾自己一脸憨笑地独自享受卡斯特罗的礼物。原来美国当时正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而拉宾却在美国政府官员眼皮底下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

几天以后，拉宾才弄明白自己的失礼。他在宴请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时诚恳地为自己以违禁品待客表示歉意，不料这帮将军对哈瓦那雪茄这种“违禁品”神往已久。结果所有将军都凑到拉宾周围，醉人的古巴雪茄的芬芳弥漫于室。

在外交场合折冲樽俎之余，拉宾还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捍卫以色列国家利益，有时甚至有失外交官的风度。当美国根据联合国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六日战争”侵占的领土时，拉宾

竟敢指着基辛格的鼻子大吼："我告诉你！你们正在铸成大错！我将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反对你们！"其后在公共场合，他还指着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抨击了40分钟。拉宾此举在华盛顿外交界得了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的诨名。

拉宾并非永远这样鲁莽，在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拉宾则换上另一副面孔，哀求尼克松："总统先生，我再次诚恳地呼吁，作为唯一信任、同情、理解以色列的您，给我们急需的武器吧！"在尼克松的默许下，以色列使用美国支援的F-4鬼怪式战斗机飞越运河，轰炸了埃及腹地。

拉宾还巧妙地争取到美国犹太人社团的大力支持，进而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华盛顿邮报》攻击他通过犹太人插手美国内政。

在华盛顿，拉宾作为"六日战争"的英雄四处做巡回报告，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则像初中生似的坐在台下记笔记。对美国军方的各种要求，拉宾从不拒绝，他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美国国会拒绝海军建造航空母舰的预算案时，五角大楼把拉宾请进了国会。拉宾作为唯一亲手使用过所有苏美双方先进武器的常胜将军，竟娓娓动听地说服了国会追加拨款，为第6舰队再造了一艘航空母舰。拉宾丰富的战场经验、直率的性格和传奇般的经历很讨美国人喜欢。五角大楼甚至邀请拉宾参观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地下指挥所、核潜艇基地和其他绝密设施。

在拉宾担任驻美大使的两年里，成批的军火运往以色列，拉宾终于实现了多年前以美式装备武装以军的梦想。此外，他在华盛顿结交的朋友使美国舆论日益亲以。当拉宾行将卸任回国时，尼克松笑着问来访的梅厄夫人，拉宾回国后会得到什么职位，梅厄夫人说："那得看他自己的表现。"尼克松当即仰天大笑："如果你们不想要他，把他留给我，我想用他！"

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

1973年3月11日，兴冲冲的拉宾返回以色列。梅厄夫人曾数次许诺他当部长，可此时得到的仅是“先休息一段”的托词。拉宾凭借昔日战功和外交上的成就，开始为工党拉选票而奔走。半年多的犬马之劳感动了工党元老，他们悲天悯人地把拉宾的名字排在工党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名上，这让为工党卖命30年的拉宾伤心不已。

上苍有眼，1973年10月6日突然爆发的“十月战争”一夜之间把以色列推入混乱之中。相互揭短、指责、拆台把工党弄得一团糟。感情用事的梅厄夫人倚重佩雷斯、达扬，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这位76岁高龄的老太太最终不得不以辞职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佩雷斯首先站出来竞争总理职务，他早在本古里安时代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资历深厚。可拉宾看不起这个文质彬彬的文官，拉宾自身的地位是靠真枪实弹打出来的，而此时的工党正需要拉宾这样与党内瓜葛不深、出身名门而又喜欢讲真话的常胜将军。结果拉宾以295对254的多数票击败佩雷斯，出任以色列政府总理，时年52岁。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群众聚集在耶路撒冷市区欢庆协议签字，直到深夜。

拉宾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在此之前的历届总理全是苏联东欧移民。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一改他以前历届总理的形象，摆出鲜明的亲美姿态。可拉宾刚上台，美国历史上最亲以的总统就因水门事件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好在福特继承了尼克松的中东政策，拉宾被当作福特总统的客人访问白宫。

1974年9月10日，拉宾首次以总理身份访美，盛大国宴之后，响起悠扬的舞曲。顿时，全场目光都集中到福特、拉宾夫妇身上。精于此道的福特欣然而起，以骑士风度揽住拉宾夫人翩翩起舞。贵宾们随之以鼓励的目光期待拉宾与福特夫人共舞，可拉宾根本不会跳舞。他装模作样地谈笑风生，拖延时间，盼望能有仰慕第一夫人风采的“猛男”挺身而出，代他完成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可如此不懂外交礼仪的冒失鬼就是没有。无计可施的拉宾只好壮着胆子走向满面春风、翘首以待的福特夫人。他一脸尴尬，“对不起，夫人，我不会，一步也不会，我不想踩伤你的脚趾。”他原以为会得到宽恕，不料福特夫人明媚地一笑：“别怕，总理先生！我年轻时总教人跳舞，比您再笨的家伙也伤不了我。Come along（来吧）！”



化装成巴勒斯坦人的犹太人在拉宾总理府门口高举石头和短刀。

拉宾梦游般地被福特夫人牵进了舞池，身不由己地扭着笨重的身躯，紧盯着自己不听指挥的双脚。福特夫人一面引导着茫然不知所措的拉宾，一面敏捷地躲闪那双穿惯了军靴的大脚的袭击。乐队无休止地奏着舞曲，拉宾大汗淋漓，机器人般地摇来晃去，双眼露出乞求的目光。站在圈外同样不擅此道的基辛格兔死狐悲地读懂了拉宾的眼神，借口有要事，才把千恩万谢的拉宾救出圈外。多年后拉宾还对这

次当众出丑心有余悸。他说，即使基辛格从未帮过以色列，但仅凭这次救他出苦海的义举，也值得感激一生。

对恐怖活动决不手软

基辛格不仅帮拉宾摆脱舞会，还硬逼着他与埃及总统萨达特和谈。1975年6月，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协议，因“六日战争”封闭了8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以后，拉宾出访摩洛哥，托国王哈桑二世向萨达特转达愿意会晤的信息。拉宾还授意“摩萨德”查明卡扎菲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敢死队训练营，协助埃及突击队摧毁了企图在“7·26”革命节行刺萨达特的阴谋。

在积极与埃及谋求和解之余，拉宾内阁对一切危及以色列利益的恐怖活动决不手软。1976年6月，巴勒斯坦“人阵”将法航139班机劫往乌干达，机上254名乘客中有83名是以色列人。当时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屈服于恐怖分子压力，可以色列强硬的做法改变了以往的惯例。

拉宾亲自领导由他和国防部长佩雷斯、外长阿隆等人组成的应急指挥部，授权国防军制定强硬的“大力神”计划，准备从4000公里之外的乌干达夺回人质。

在比尔谢巴空军基地，39岁的伞兵司令肖姆龙准将装模作样地在婚宴上暴饮。国防部长佩雷斯在与来访的布热津斯基共进晚餐时，对他的同乡用波兰语热情长谈。在这些公开曝光之后，精神抖擞的肖姆龙立即潜回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空军基地。在那里，两架波音707和四架C-130“大力神”已为夺回人质进行了上百次模拟演习。



戒严中的加沙。

7月3日15时10分，拉宾在内阁郑重宣布，解救人质的部队已在20分钟前出发，若内阁反对，他将下令召回已经踏上征程的部队。

飞往4000公里外的乌干达执行任务的总指挥佩莱德空军司令是熟练掌握C-130“大力神”驾驶特性的空军专家，地面分队指挥官乔·内塔尼亚胡中校是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兄弟，他的神枪手全化装成黑人。为了出奇制胜，内塔尼亚胡专门挑选了一名长得酷似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家伙，准备与劫机的恐怖分子“谈判”。以色列空军的F-4E“鬼怪”战斗机在红海上空为这6架远征的飞机护航。

经过7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袭击部队飞抵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上空。一名伦敦口音的突击队员尖着嗓子向地面塔台请求允许“英国民航”迫降。为了控制“大力神”着陆时的轰鸣，以军飞行员没有改变螺旋桨桨距便着陆滑跑。身先士卒的哈佛毕业生内塔尼亚胡中校带着他的9名“黑人”部下乘奔驰轿车从“大力神”的机腹内冲出，莫名其妙的乌干达士兵在向奔驰轿车行礼之际已被迎面而来的无声手枪打翻在地。

内塔尼亚胡和他的部下一面用雪花膏擦去脸上的黑墨，一面用希伯来语高喊着“卧倒”，冲进关押人质的候机楼。45秒之后，以军全歼了劫机犯，取了指纹，并将所有人质护送上马达轰鸣的“大力神”。

与此同时，其余突击队员已将停机坪上的乌干达米格战斗机一一炸毁，还顺手收拾了机场塔台和雷达站。另一组突击队用吉普车上的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龙”式导弹“修理了”从坎帕拉方向赶来增援的乌干达陆军。提供空中警戒的两架波音707则按计划在空中巡航。

当人们欢迎凯旋的突击队员把所有人质救回以色列时，拉宾正在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仰望晴空，作为将军出身的总理，他为他部下的战绩泪流满面。内塔尼亚胡中校在行动中阵亡。海明威曾言：“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拉宾还来不及为自己的杰作得意，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民愤以及接连不断的打击使拉宾政府雪上加霜。先是拉宾内阁在安息日为首批飞抵以色列的F-15战斗机举行欢迎仪式违反了“摩西圣训”，议会为此对拉宾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继而是政府阁员的一系列贪污案在报上曝光，最后是拉宾自己在美国银行中的2000美元存款被《国土报》揭了出来。在以色列，作为一名政府总理在国外拥有私人存款是违法和极不道德的事。拉宾夫人因此被起诉，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宾以一个热吻将患难与共的夫人送进法庭，接受2.4万美元的罚款。此后不久，拉宾代表执政29年的工党把权力移交给贝京，从容下野。

成功缘于梦想

1992年夏，我亲眼目睹了拉宾大选获胜、再度辉煌的全过程。在沉寂了15年之后，他梅开二度，重新登上总理宝座。拉宾深知工党之所以获胜是由于国民渴望和平，以及国际和平力量施加的压力。拉宾自兼国防部长，任命自己的伙伴和对手佩雷斯为外长。拉宾动情地宣称：“人们的成功缘于他们的梦想。”他一上台就冻结了被占领土上的

100多个犹太人定居点，吸收巴勒斯坦人进入内阁，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等阿拉伯国家首脑访问以色列。

1992年7月21日，组阁仅仅10天的拉宾亲自飞抵开罗，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作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我有幸进入机场拍摄盛大的欢迎仪式，眼看着拉宾缓步踏着猩红色地毯神态凝重地检阅埃及仪仗队。其后，我蹿上大吉普紧随着国宾车队赶赴20公里外的开罗库巴宫总统府，数百名记者拥在这里采访中东和平进程。在大庭广众之下，穆巴拉克与拉宾的四只大手紧握在一起。这两位缔结和平的政治家曾是战场上的对手：拉宾曾任以色列总长，穆巴拉克曾任埃及空军司令。他们的军旅生涯和层层晋升都是在以对方为死敌的搏斗中完成的，而今两位劲敌绅士般握手言和。

当我大汗淋漓地钻出人群，才发现《时代》周刊的断腿巴利正痛苦地匍匐在地，相机和铝梯扔在一边。原来这老兄高烧39℃，可又不愿错过千载难逢的拉宾来访，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听到他的呼救，我忙把他连同一大堆器材扛上吉普，一直将他送到他太太手中才返回办公室发稿。一周后，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巴利的病中之作，我的照片也被《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采用。



1992年拉宾当选总理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埃及。

1993年4月14日拉宾二访埃及，我驱车赶往位于伊斯梅利亚的总统别墅时，拉宾的UH-60黑鹰直升机正缓缓降落。在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面向大苦湖的露天会场，穆巴拉克与拉宾并肩宣布将坚定不移地加速中东“实现和平”。1993年10月6日拉宾三访埃及，同年12月12日拉宾四访埃及，我都受命为拉宾拍照。

1993年9月，我第四次前往以色列，采访当时尚属子虚乌有的巴以秘密和谈。由于风传拉宾、佩雷斯与巴解组织秘密谈判，加沙、杰里科行将自治而引起全国的震惊。拉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上了街，在总理府前的小山上扎了营，全副武装的军警不得不设立路障以保障交通畅通。好在以色列人法制观念极强，尽管示威者也与军警发生冲突，砸路障、烧旗帜，但总的来说还算温和。在总理府门前，数百名记者争抢进入总理府的名额，因报道艾滋病而获大奖的瑞宁格摇晃着

总理府大门："我是犹太人，我的祖国为什么不让我进！"骚乱的示威者忽然扔出一个冒着烟的圆柱体，吓得我紧跟着军警趴在地上，原来是一颗烟幕弹，一个大个子警察用一罐可口可乐浇灭了它。



极端的犹太人手举标语牌游行，上写：“圣地是永远不卖的。”



1993年9月21日，以色列议会正式就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展开辩论。拉宾（右）一再着急地看表，但作为民选政府的总理，必须等待议会表决结果。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反对加沙、杰里科自治的议员激烈抨击政府的外交政策。沙米尔坐在议席上一语不发，阿里尔·沙龙火车头般地喘着粗气。一位坐在我左侧的亚洲女士突然用中文同我打招呼，自称是台湾《中国时报》的特派记者，掏出一张德文名片，竟是大名鼎鼎的龙应台。龙应台和我都被以色列议会的大辩论弄得不知所措，眼看着拉宾一再看手表，可就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外长是“犹太人”

1992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作为首位访以的中国高级官员前往耶路撒冷，我由于被列为钱外长的私人摄影师而在星夜从开罗赶赴以色列。途中，回想当年单枪匹马去以色列采访战争时的孤独和不久前中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我不禁为自己能有幸亲历这一伟大进程而得意洋洋。

在以色列外交部，一帮人围着为钱外长准备的礼宾车忙来忙去。一位司机仔细研究大奔驰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图案与苏联红旗的区别。拉宾总理府的一名司机则对中国外交艺术赞不绝口，说中国派来了一位犹太人外交部长，无疑会给以中两国关系打开新局面。他的话听得我直翻白眼，因为我这个随团摄影师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竟把我们的外长说成犹太人。大惑不解的我忙上前请教他怎么知道中国外长是犹太人，这老兄竟摆出十足的学者架子，在我右掌心用英文字母拼出"钱其琛"三字后说道："嘿！老兄！Cohen、雅可夫、伊扎克全是犹太人的名字呀！"想不到这位好钻研学问的犹太司机竟把钱其琛的"琛"（Chen）中间多加了个"o"，成了犹太人的姓名"Cohen"。

拉宾在特拉维夫国防部会见钱外长时，我和中央电视台记者都被拦在门外，气得我哇呀暴叫。经与拉宾的新闻秘书交涉，以方才同意我们进入会场，拍下珍贵的历史镜头。我深感军人出身的拉宾尽管严厉，但却通情达理。



世界新闻摄影大赛金牌得主瑞宁格被拒于拉宾总理府外。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攻下位于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汇入红海的顶点——沙姆沙伊赫，从此战火不断。而今，沙姆沙伊赫海滩上，阿拉伯长袍妇女与犹太妇女并卧于此，共享同一轮太阳，同一片海水。

1993年9月底，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在特拉维夫举行国庆招待会，大使林真让我给相机充足电，据说拉宾将参加中国国庆，可我始终将信将疑。几年来我到过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参加过多次国庆招待会，可还从未见过哪国总理亲自来使馆祝贺中国国庆。

黄昏，我懒洋洋地帮厨师小李在使馆草坪上挂国旗，突然来了两名以色列便衣，彬彬有礼地沿着半人高的围墙转了一圈后便悄然离去，可使馆外连一个岗哨也没加。招待会开始后，我逐一为与大使握手祝贺的来宾拍纪念照。就在我的闪光灯需要更换电池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来过的两名便衣正静静地排在鱼贯而入的队尾，站在他们之间的，竟是以色列总理拉宾。



我忙不迭地奔过去，手忙脚乱地给相机换上新电池。近在咫尺的拉宾身着暗蓝西装、白衬衣，打着蓝领带，双手在腹部交叉，身体习惯地向右前倾，谦逊有礼地排在来宾的队尾。

林大使与拉宾并肩沿花园小径缓步而入，我抢到他们的前面，透过取景器全神贯注于拉宾的一举一动。正当我心满意足地在拉宾眼前倒行时，一盏草坪地灯绊住了我。我只感到原本肌肉萎缩的右腿一下子失去控制，我和我脖子上的相机一齐失去平衡地仰面向后倒去。

就在我即将倒地的一刹那，拉宾身后貌不惊人的便衣像紧绷的弹簧扑向我，抓住我摄影背心的前襟，将我拎了起来，整个过程全是瞬间完成的，以至我现在根本无法回忆当时的感觉。惊魂未定的我忙不迭地向拉宾的便衣说“图达拉巴”（希伯来语：衷心感谢），而处变不惊的拉宾却咧开大嘴用英语告诉林大使：“我的保镖总是这样保护那些为我拍照而摔倒的人。”难怪他对我刚才的窘态习以为常。

也许是为我压惊，拉宾把为他准备的一份石斑鱼让给了我，而执行任务时连一滴水也不喝的便衣则将他的石斑鱼给了新华社驻以色列首席记者怀成波。还了阳的我又来了劲，“我是拉宾，他们是我保镖！”

在行将为我冗长的文章结尾之际，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共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们三位都接受过我的采访。拉宾获奖之后说，他获得的和平奖属于全体以色列人民，并宣布将奖金捐献给那些献身于和平事业的人，就像《圣经》中的骑士圣乔治。



我不认为拉宾是“和平卫士”，他只是为犹太选民服务，为犹太国家服务，为全体纳税人服务，效忠他身后的大卫星旗。

和平或战争都仅是现象而非本质

1995年11月5日，我正和一帮狐朋狗友围着火锅涮羊肉，腰间的BP机突然狂叫不止，低头细看，一行蝇头小字说：“快听广播，你的拉宾被刺。”一时间仿佛五雷轰顶，我手忙脚乱地摸出口袋中的松下RF-10短波收音机，慌乱中踢翻板凳险些烫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

情报是千真万确的。11月4日是犹太安息日，特拉维夫10万人在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集会。19点50分，拉宾结束讲演走向停车场时，一个名叫阿米尔的25岁犹太学生，用一支9毫米“帕雷

特”手枪，在拉宾背后连发4弹。其中3枪命中拉宾，分别射入脊椎、脾脏和肺部，19分钟后抢救无效，拉宾死于伊奇洛夫医院。

悲痛的我像听到枪响的士兵，《中国青年报》值班的副总编陈泉涌打电话让我写一篇拉宾的文章并问我能写多少，我问他能给我多大版面，他说一个版。《世界博览》任主编闻讯连夜赶回办公室帮我找来我拍的拉宾照片。11月6日拉宾下葬的同天，《中国青年报》用了一整版图文并茂地悼念拉宾。唯一遗憾的是没用我的标题“铸剑为犁”。

一星期前，我在中国新闻学院讲课时，有个学生问拉宾是否是和平卫士。我说我不同意“和平卫士”这个说法，我认识的拉宾是位国家利益第一的公务员，是位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理。他所做的一切是为犹太选民服务，为犹太国家服务，为全体纳税人服务，至于和平还是战争都仅是现象而非本质。基辛格在悼念拉宾时甚至提到拉宾“是勉强进入了和平进程”。拉宾从军27年，身经百战，打败周边阿拉伯国家占领耶路撒冷，直到1990年还命令部队开枪打断巴勒斯坦示威者的双腿。以色列的和平是通过1979年的《埃以和约》、1994年的《约以全面和约》完成的。拉宾令我尊敬的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而是忠于国家、忠于选民利益和勇敢真诚的职业道德。

我多次目睹拉宾会晤穆巴拉克时的情景，这是大国政治家间才有的场面，而以色列乃弹丸小国，不得不艰辛地在大国间折冲樽俎。拉宾遇刺前还不忘为约旦国王侯赛因生日写亲笔信，可他对巴勒斯坦仅仅是具有某种国家地位的自治。阿拉法特对拉宾夫人称赞拉宾“是一位和平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时，拉宾夫人说：“我丈夫把你看作他的和平伙伴。”伙伴不同于朋友。

以色列有一流的IDF国防军、一流的情报部“摩萨德”、一流的秘密警察“辛拜特”、一流的乌兹枪和“凯福拉”防弹背心。在特拉维夫当我为拉宾拍照摔倒时，站在他身后一米的保镖一跃而起，在我倒地前

的一刹那将我拎起来，足见镖技超群。可他们保护不了拉宾，因为拉宾生活在自己的选民里。一个身着防弹衣被保镖保护起来的人，在有200个政党的以色列不可能当选任何公职，更何况是总理，这一点只有亲历以色列生活的人才能深刻体会。看到国内一家报刊把拉宾遇刺归罪于警方情报不力、保密不完善、保安人员大意和拉宾与警方相互配合不力，我很不以为然。一位美国记者曾问拉宾夫人为什么不给拉宾穿防弹背心，夫人反问："你疯了吗？我们又不是在非洲。"的确，以色列人决不会承认一位被保镖铁甲包裹起来的懦夫当总理。在毕生为国家利益服务、身经百战的拉宾看来，穿防弹衣是一种侮辱。出埃及的摩西并没能活着到达迦南，但他的目标已经显现，拉宾也是如此。

梦系魂牵阿拉曼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1983年从北大毕业时，我慷慨激昂地找到“万岁军”坦克6师申请参军，自诩是最好的坦克师长，弄得这支王牌部队的首长眼光异样地打量我好久，给了我两个包子、一碗鸡蛋汤，礼貌而坚决地把我送出了军营。当时我22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着了迷，把自己当成了“沙漠之狐”隆美尔。

丘吉尔说：“阿拉曼战役前我们不知胜利为何物，阿拉曼战役后我们从未败北。”一直到海湾战争结束，我从巴格达转赴开罗任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才有幸拜谒我梦系魂牵的阿拉曼战场。1991年12月，当我兴冲冲地驾大吉普闯入阿拉曼东北著名的白沙滩时，一名穿沙漠野战服的埃及中士气喘如牛地跑过来拦住我。从他半英语半阿语的比画中，我终于明白我已经闯入二战德军的“魔鬼花园”，当年隆美尔军团在此埋下44.5万颗反坦克地雷。数十年来不断随沙漠滚动的反坦克地雷，随时可能把我这个解放军装甲兵学院的荣誉上校连人带车炸飞到空中。

阿拉曼战役

从开罗驾车穿过费萨尔路向西，至金字塔东两公里处转向西北，再沿沙漠公路狂奔220公里，就是被称为“地中海新娘”的千年古港亚历山大，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古灯塔遗址和庞培柱全在这里。出亚历山大沿海滨公路继续向西113公里，小镇阿拉曼（El　Alamein）就突然从蒸气腾腾的沙漠中跳了出来。50年前的这个季节，空前绝后的沙漠坦克军团曾在这里决一雌雄。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自比恺撒，扬言重建罗马帝国。他先以武力控制阿比西尼亚，使海尔·塞拉西皇帝流亡英国，继而觊觎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和北非。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东京-柏林-罗马”轴心正式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匆忙宣战，意军从利比亚进攻埃及，但不久即被英军击败。墨索里尼私下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表示：“应该把任务交给那些以战功求晋升的人，而现在司令官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元帅位子。”为了扭转败局，他向希特勒求援，希特勒一眼选中年轻的坦克将军埃尔温·隆美尔：“隆美尔知道如何激励部下，他是唯一可以在北非艰苦气候下打胜仗的人。”



1992年8月15日，亚洲人民庆祝日本法西斯投降之际，埃及人民正在为16个同盟国在阿拉曼打败轴心国的“阿拉曼战役”50周年做准备。一群埃及劳工在撒哈拉的烈日下抢修阿拉曼博物馆，他们身后是轴心国的“马克式”坦克和巴顿用过的M3坦克。

1941年2月14日，隆美尔人数可怜但富于献身精神的专业坦克部队在的黎波里登陆。他用木头、纸板和沃尔克牌卡车连夜改装成数百

辆假坦克，在沙地上拖着树枝荡起征尘。隆美尔的兵力与英军相差悬殊，可他的每句话都板上钉钉：“如果给养和制空权没有问题，我将拿下昔兰尼加，控制苏伊士运河。”这意味着他将在敌强我弱的大沙漠中直线推进2896公里。隆美尔的计划遭到上下一致反对，可他固执己见：“我将冒险违背一切命令，历史会证明我正确。”

1941年4月3日，在他的前任一再退守的阵地上，隆美尔开始反攻，他笔直地站在车顶，冲在坦克部队的最前面。沙漠高温使坦克机油变稀，通讯设备失灵，他乘一架“鹳”式飞机，飞在先头部队的头顶，给迷失方向的部队引路。一支摩托化步兵企图在沙地上偷懒时，隆美尔咆哮着从他们肩头掠过，接着扔下一纸卡片，“如不立即行动，我就在你们身上着陆！——隆美尔。”当第21装甲师被困地雷阵时，隆美尔的指挥车冲到了前面。他不顾横飞的弹片，若无其事地跳下指挥车，跪在沙地上小心翼翼地排雷，他的参谋们紧跟其后效仿他，这使第21装甲师仅用10分钟就冲出了雷区。隆美尔与士兵吃一样的配发食品，喝沙漠中的苦水，亲自给阵亡的战士遗孀写信，用夸张的乐观劲头感染情绪低落的伤员。这位古怪而富于传奇色彩的“士兵将军”只用两个月就推进了2000多公里，打进埃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受挫，日军在中途岛、珊瑚海、瓜达尔卡纳尔失利。1942年，英国把伊丽莎白公主（今女王）和其未婚夫菲利浦·蒙巴顿派到马耳他建立海军基地，切断了隆美尔的海上补给线。1992年夏，我赴利比亚采访卡扎菲时途经马耳他，正值英女王在此参战50周年纪念日，这才知道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浦亲王的世纪之爱竟是在与隆美尔的作战中孕育的。

1942年6月22日，年仅50岁的隆美尔晋升为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两天后，他兵临阿拉曼。为了顶住隆美尔继续东进，威胁苏伊士运河，丘吉尔倾全英联邦国力于阿拉曼，围剿隆美尔的北非军团，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受命统率16个英联邦国家的军队在阿拉曼与隆美尔决战。1942年10月23日21时，蒙哥马利的数千门大炮齐声轰击，兵强

马壮的盟军在月光下发起总攻，对失去制空权又弹尽粮绝的隆美尔军团开始合围。可隆美尔这只狡猾的“沙漠之狐”轻巧地一跃就跳出了包围圈，魔术般西撤了2000多公里，穿越利比亚，在突尼斯大败立足未稳的美国第二集团军，这就是电影《巴顿将军》开始时那尸横遍野的一幕，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巴顿重建美第二集团军。可当巴顿气势汹汹找到隆美尔拼命时，隆美尔已把他精锐的“北非军团”撤出了非洲。



这位埃及老人的工作，是为阿拉曼战役中阵亡的意大利士兵守墓。

隆美尔其人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提到隆美尔时我总说好话。”他在英国下院赞扬敌人隆美尔“是非常有魄力、有才干、卓越的将才”。隆美尔1891年生于海登海姆一个中学校长之家，18岁进第124符腾堡步兵团，后入但泽皇家军校，以“热情、坚强、守时、自觉、智力超人、高度责任感”的评语记入毕业档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隆美尔三次负伤，获蓝徽勋章和铁十字勋章，伊松索会战期间他孤军揳入敌后，以1名军官、13名士兵的代价俘虏意军8000多人。当时他凭借虚张声势、偷袭和迅速跟踪战术以弱克强，并疯狂地追逐荣誉，多次与战友反目成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隆美尔到斯登卡德当连长，对重机枪、内燃机、摩托车制造、造船、拉小提琴和滑雪都感兴趣。隆美尔生活俭朴，不吸烟、不饮烈酒，对妻子以外的女人不感兴趣。他用训练士兵的方法教育独生子，背着老婆让年仅7岁的儿子曼弗雷德骑马，结果摔破了儿子的头。隆美尔用1马克硬币向儿子行贿，求他不要把真相告诉妈妈，当儿子向妈妈告发隆美尔的“暴行”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儿子要回了作为勇敢奖赏的硬币。

由于丰富的火线经验加之辩才过人，隆美尔被任命为维也纳斯塔特军校校长，出版了《步兵攻击》。该书先后再版十余次，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连美国的巴顿当时也以能背诵该书部分章节而自豪。隆美尔由此成为青年偶像并引起希特勒的注意，成为元首大本营警卫部队司令。

波兰战争爆发后，隆美尔陪希特勒亲临前线，冒着被丛林中波兰狙击兵的冷枪击中的危险，观察快速运动的坦克冲锋。希特勒视察格丁尼亚时，隆美尔亲自站在路中央指挥，仅放希特勒和警卫的汽车通过，将大喊大叫的希特勒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拦在圈外。为报复隆美尔对纳粹党的羞辱，鲍曼等了5年。

波兰战役后，隆美尔任第7装甲师师长，带着10本《步兵攻击》开始了坦克生涯。上任伊始，他命令养尊处优的营长90分钟内离开营房。每天6点钟，他准时沿莱茵河慢跑。与士兵一起听7点钟新闻联播，把坦克编成各种能快速突进的队形。

身穿漂亮军服、胸佩勋章的隆美尔经常暴露在坦克顶上，用斩钉

截铁的鲜明手势发号施令，用戈培尔送的莱卡相机拍下惨烈的战斗。由于用兵谲智、揳入神速，连德军参谋长都无法捕捉到隆美尔的行踪。他的士兵在距他不足一码处中弹倒地，但他若无其事地用马鞭敲击坦克炮塔，指挥冲锋。

隆美尔是法国之战中最出风头的少将，也是第一个获得十字勋章的德国军官，他的部队被媒体称为“魔鬼之师”。联邦传媒对隆美尔的功绩大肆宣扬，一部名为《西部的胜利》的电影、一本畅销书《魔鬼之师》把报刊电台的赞誉推至极点。可纳粹宣传给隆美尔带来更多的嫉妒和仇敌，他渴望新的荣誉，但他咄咄逼人的气势和超人的胆识使机会与他无缘。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希特勒把他派到了非洲。隆美尔把他在欧洲本土创造的光荣带到了北非，沙漠小镇由此闻名天下，他自己则成了“沙漠之狐”。

狐狸之死

隆美尔在北非的传奇战绩使他成为第三帝国26名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可他的怪癖和来自最高阶层的支持，把人事关系弄得相当复杂”。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晋升使我超过大批战友，无疑引来许多许多嫉妒”，“我将在肩章上添更多的星”。就在隆美尔依靠才智胆识顽强地进行奥德赛式的远征时，出于嫉妒而产生的阴谋已在孕育之中。

隆美尔性格孤僻、傲慢、专横，在军队中他的敌人多于朋友。在一切由他支配的情况下，他是优秀并有独立见解的战场指挥官，可一旦受到过分的约束，他又是一个抗上而难于对付的军官。隆美尔先同德国空军闹翻，继而和墨索里尼发生激烈冲突。当他眼看着一年多来他的10000名士兵、9名将军在北非命丧黄泉后，他与希特勒的冲突终于爆发，竟敢面对面朝希特勒怒吼：“唯一能做的是撤出非洲！”

1943年，百病缠身的隆美尔回到德国，疾病给他留下深深的非洲

情思。帝国元帅戈林开始粗鲁地侮辱他，脾气暴躁的隆美尔已经失宠。

隆美尔是当时唯一与英美军队作战过并让敌人畏惧的德国人。考虑到此，希特勒一度让隆美尔任意大利“B集团军”司令，可隆美尔并未得到相应的部队。据戈培尔日记记载：“他们不愿隆美尔指挥太多的军队。他们嫉妒他。”

1943年底，隆美尔奉命赴英吉利海峡用钢轨、水泥、木桩、海水、沼泽、废炮弹和千奇百怪的各种地雷修建6英里宽、50个阿拉曼战线长的“大西洋壁垒”。连工兵司令梅斯将军也看得目瞪口呆，“他真是个工兵天才！”像以往一样，他对奢华的生活、名胜古迹不屑一顾，途经比萨时，他根本不理睬参谋们想去一睹斜塔的请求，“比萨斜塔已经斜了许多年，战争打完它还会斜着。”当他的参谋长高斯将军送给他一个古董花瓶时，他竟容光焕发，“瓷器！我们为什么不用陶瓷造地雷？”



阿拉曼战场上的盟军战士墓，一位当年的老兵正在寻找着战友的墓碑，他身后是棵橄榄树。

随着隆美尔回国后对纳粹暴行的了解，他厌恶地称：“纳粹头头们的手都不干净。”当他的儿子曼弗雷德想参加党卫军时，隆美尔怒不可遏，“绝对不行！希姆莱的集体屠杀在断送德国。”

诺曼底登陆后，隆美尔看到大局已去，无辜生命在白白送死。他来到苏瓦松，向希特勒当面请求政治解决。在伯希特斯加登，他不顾希特勒的制止，几次提出考虑“整个局势”，被希特勒逐出会场。

1944年7月，隆美尔遭轰炸颅骨粉碎，抢救3天才恢复知觉。这是他第6次火线负伤。至此，固执而闲不住的隆美尔只能在病床上挣扎着打苍蝇。由于失去左耳左眼，他连距离都已判断不准。此时，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已把隆美尔卷了进去，盖世太保怀疑隆美尔是密谋分子的核心，5年前遭隆美尔羞辱的希特勒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德军总司令凯特尔、坦克上将古德里安、坦克中将寇彻海姆等5人组成军事法庭，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人愿替隆美尔说公道话。



摄于1991年12月的阿拉曼德军无名战士墓。2004年我再次回到这里，在墓碑前留影，并用作《我的诺曼底》一书封面。

1944年10月14日早晨，身穿上开领非洲军制服、满身勋章的隆美尔还在等待希特勒把他派往前线的命令。可来访的希特勒副官布格道夫将军摧毁了隆美尔的全部希望：“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指控谋害元首。”面对种种天衣无缝的证据，谁也不相信他至今对谋杀计划一无所知。布格道夫宣布，鉴于隆美尔的战功，元首允诺，隆美尔死后实行国葬，家属享受元帅抚恤金。

隆美尔最后一次拥抱了妻子：“我将在15分钟后死去。”他把钥匙和钱包交给独子曼弗雷德，然后戴好军帽，穿上大衣，手握元帅杖跟在布格道夫身后，钻进前来接他的汽车。15分钟后，陆军元帅隆美尔死于车中。

纪念阿拉曼

1992年10月25日是阿拉曼战役50周年纪念，几十个国家的军政显要飞往埃及，缅怀这场“无仇之战”。从亚历山大到阿拉曼的旅馆被预订一空。24日日出之前，我就拉上英文记者润哥从开罗直扑阿拉曼。茫茫沙漠路我的时速就没下过180公里，6缸4.5升的庞大引擎发出喷气战斗机才有的啸音。沿海岸方向一直向西，左侧是撒哈拉，右侧是地中海。1992年4月，我曾沿海滨路一直到的黎波里谒见卡扎菲，蜿蜒而去直至天际的海岸公路两侧，成群的无名战士墓沉重肃穆。

马特鲁省人民已把当年隆美尔的指挥所改建成隆美尔纪念馆。这里原是罗马时代贮藏谷物的岩洞。现任德国斯图加特市市长的曼弗雷德·隆美尔将其父生前的皮大衣、望远镜、地图和私人照片捐献给这里，与非洲军团的旗帜、炮弹壳并排陈列在洞内。马特鲁人因曾遭受英国殖民统治，所以把隆美尔看作是反抗殖民主义的解放者。在加油站，牧民桑尼竟用德语朝我打招呼。放骆驼的老易卜拉欣已老得走不动路，歪在朝阳的沙坡上晒太阳。他告诉我，每当沙暴来临之际，他

都能见到他的老朋友隆美尔，说到此他还斩钉截铁地挥起干枯得像猫爪的手，“Angreifen！”（德语：进攻！）



参加过阿拉曼战役的盟军老兵。

阿拉曼战争纪念馆是奉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命令于1965年12月开始兴建的，这座环形纪念馆建在昔日战场上，用当地岩石构筑而成。纪念馆收藏了当年的武器、军装、旗帜、图片、绘画以展示昔日的激战场面。在沙盘作业室，按比例缩小的沙盘重现了德军从利比亚东进2000公里直逼苏伊士运河的态势。沙盘前，隆美尔与穆巴拉克的半身塑像并肩而立。隆美尔身先士卒的品行、对祖国的忠诚、勇敢顽强的战斗风格、超人的指挥才能和神奇的机动战术至今令世人赞叹。

1966年11月9日，曾指挥阿拉曼战役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写信，请求参加阿拉曼战役25周年纪念。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英埃关系一直不好，蒙哥马利估计他的请求会被拒绝，但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纳赛尔不仅同意他来阿拉曼，还把他作为官方客人。1992年，为纪念阿拉曼战役50周年，穆巴拉克总统拨款

对阿拉曼战争纪念馆重新扩建，以此欢迎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二战老兵。



参加过阿拉曼战役的德国老兵穿着当年的军装、开着当年的吉普车重返阿拉曼。

在阿拉曼战争纪念馆西北的高地上，矗立着德军战士墓，4200名阵亡将士的骨灰按籍贯分装在21个花岗岩石棺中，环列在罗马斗兽场般的墓地里。巴伐利亚州石棺上一束夹竹桃的花朵已经干枯，其后是镌刻着4200名阵亡者姓名的石壁。

由德军战士墓西行3公里，是意大利无名战士墓，4800名阵亡士兵的骨灰盒镶嵌在一座纪念大厅的汉白玉墙壁中。再向西300米，是纪念228名阵亡的利比亚士兵的清真寺。

阿拉曼战争纪念馆附近最大的墓地是英联邦战士墓，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希腊、印度、南非、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的11945名

士兵长眠于此。刻有犹太大卫星（六角星）、基督教十字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标志的墓碑并排静卧。隆美尔曾把战死的双方战士埋在一起举行葬礼，坚持给修工事的劳工与德国人一样的工资，他对白人战俘歧视黑人战俘的做法予以严厉惩罚，“因为身穿同样制服的黑人与白人生而平等”。他拒绝执行盖世太保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还要求部下不许在禁猎季节射杀野鹿。澳大利亚第9师的琼斯当年只有22岁，他说，他和他的战友们“对隆美尔非常尊敬，他是个出色的指挥官和真正的绅士”。美军救护车战地急救队的阿瑟·豪少校回忆隆美尔：“纪律严明，不虐待俘虏。”

79岁的老兵多扎凯迪斯是希腊老兵协会主席，他身穿当年的军装，打上绑腿，腰挂水壶，身背背包，还像50年前那么精神。站在他身旁的夫人一脸崇敬，声称她的男人只有29岁。76岁的好莱坞摄影师凯博50年前是英第8集团军的运输班长，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战事，他说：“怎么会忘呢？我们班8个人，一下就炸死4个。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德卡尔·吉默曼当年才22岁，阿拉曼一战使他成了独眼龙，他跪在墓地上默默祈祷亡灵超生，“我怀念50年前为我牺牲的同志，也怀念当时的敌人。”他面前的墓碑上刻着：“这里躺着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是为了救自己的战友而躺下的。”



1992年10月25日，当年参加二战的英、法、德、意等几十个参战国在北非阿拉曼纪念阿拉曼战役50周年。梅杰向老兵亲属献花。

1992年10月25日，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双手颤抖地把一朵朵海棠花大小、设计成子弹与迸射的鲜血图案的小红花，别到几十位年逾古稀、在阿拉曼失去丈夫的老妪胸前。我平端相机距梅杰不到两码，可他略带哭腔的男中音却像来自苍茫的天穹："50年前的事距今已经很久，可我说句真话：不列颠将牢记它500年。"蒙哥马利的儿子小蒙哥马利子爵已经64岁，他对父亲指挥的阿拉曼战役的唯一评价是"铸剑为犁"。年已63岁的隆美尔之子曼弗雷德引用《罗马书》中的话"仇恨罪恶，坚持美好，友爱兄弟，同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来回顾他的父亲。大会组织者的书面文告中称："对所有西部沙漠参战者的同志情谊和勇气、对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骑士风度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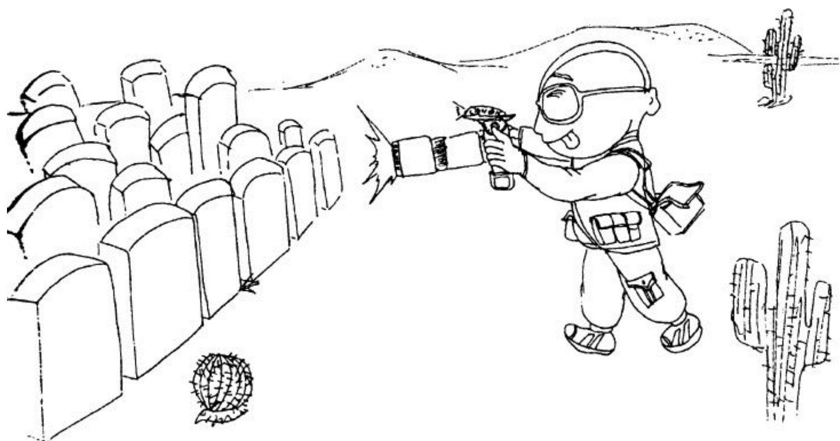
入夜，我平躺在盟军战士墓，仰望北非夏日深邃的晴空，一钩新月徐升，清光泻地，照遍树丛和数以万计的墓碑，白石嶙峋，一望无

际。海风拂过我赤裸的胸膛，仿佛时间已经凝住，风变成了固体。

不知何时，笨重的皮鞋声将我惊醒，起身望去，月光下走来两位比我还狼狈几分的青年人。他们自称是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的父辈——南非警察部队也参加了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长发的理查德挽着同伴赫克的手，把我引至一处普通的石碑前，这是由他祖母为他阵亡的叔叔立下的墓碑。手电光下，我看见两行端庄的碑文：

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

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四进巴格达

我刚会走路那年，便从我奶奶嘴里听说“天方”有个巴格达，巴格达有个孩子叫阿里巴巴，用开水烫死了藏在他家大木桶中的40个强盗。从那时起，我对我们家院子里的几口大荷花缸就充满恐惧，总担心从里面爬出一队明火执仗的江洋大盗，乃至天一黑就不敢到院子里撒尿。奶奶嘴里的巴格达除了遍地窃贼这唯一的缺点外，其他一切都像伊拉克蜜枣一样甜美，美得我忍不住产生愿为巴格达献身的念头。

巴格达位于两河流域富饶的新月形土地上，早在60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城市，发明了车轮，修建了灌溉系统，创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巴格达作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中东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贸易中心。千百年来，不同种族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不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聚居共处，使巴格达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世界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是在巴格达发生的。

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被新华社派往巴格达。在此后的3年里，我四进巴格达，直到把新华社图片传真机装到巴格达移动卫星发射天线上，使巴格达分社成了新华社第一个用卫星天线向外界传发照片的分社。中国人首次用卫星天线在世界上长距离传输图像。

一进巴格达（1990年12月-1991年1月）

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予以制

裁，国际封锁使出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为此，我得先从北京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全凭安拉安排。

临近烟波浩渺、黑云压城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浮现出我老妈随风飞舞的灰白头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对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充满了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从伊斯坦布尔换乘约旦的波音-727飞至安曼，安检更加严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别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混入“皮包炸弹”。每位旅客都领到一张白色传单：“根据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的事。



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始终处于国际封锁之中，昔日海湾第一大

良港巴士拉樯桅如林，被炸坏的商船沉浮于波斯湾中，无人问津。

在巴格达拍照难于上青天，刚摆脱8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广场、博物馆、集市、机场、车站一律严禁拍照，荷枪实弹端AK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警告我：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被取消了签证，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巴佐夫特被绞死，不守规矩的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在巴格达，如果没有伊拉克情报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高涨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典型的东方人的脸，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用中、英、阿文书写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由于日本海部内阁出兵参加海湾封锁，在伊拉克犯了众怒，在巴格达被误认为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光荣愉快的事。



街头的萨达姆像被人泼上了墨水，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在搜捕破坏者。



伊拉克政府组织记者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跚而行。我和紧靠我左臂的白人记者跟着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举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事后才知道，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向民兵发枪，机场售货员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车业务，奉命开往科威特前线，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巴格达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医院正把药品清点集中，装箱隐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军车成队，开往前线的军人在此尽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军饷。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反，老年人出奇地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太太哭诉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苏尔，可听说多国部队已把那里的核基地列为打击目标。



1993年2月16日，禁飞区内巴士拉的阿特曼清真寺，阿訇马姆站在自己被摧毁的清真寺前。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全是北大学长，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曹武官之父乃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曾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曹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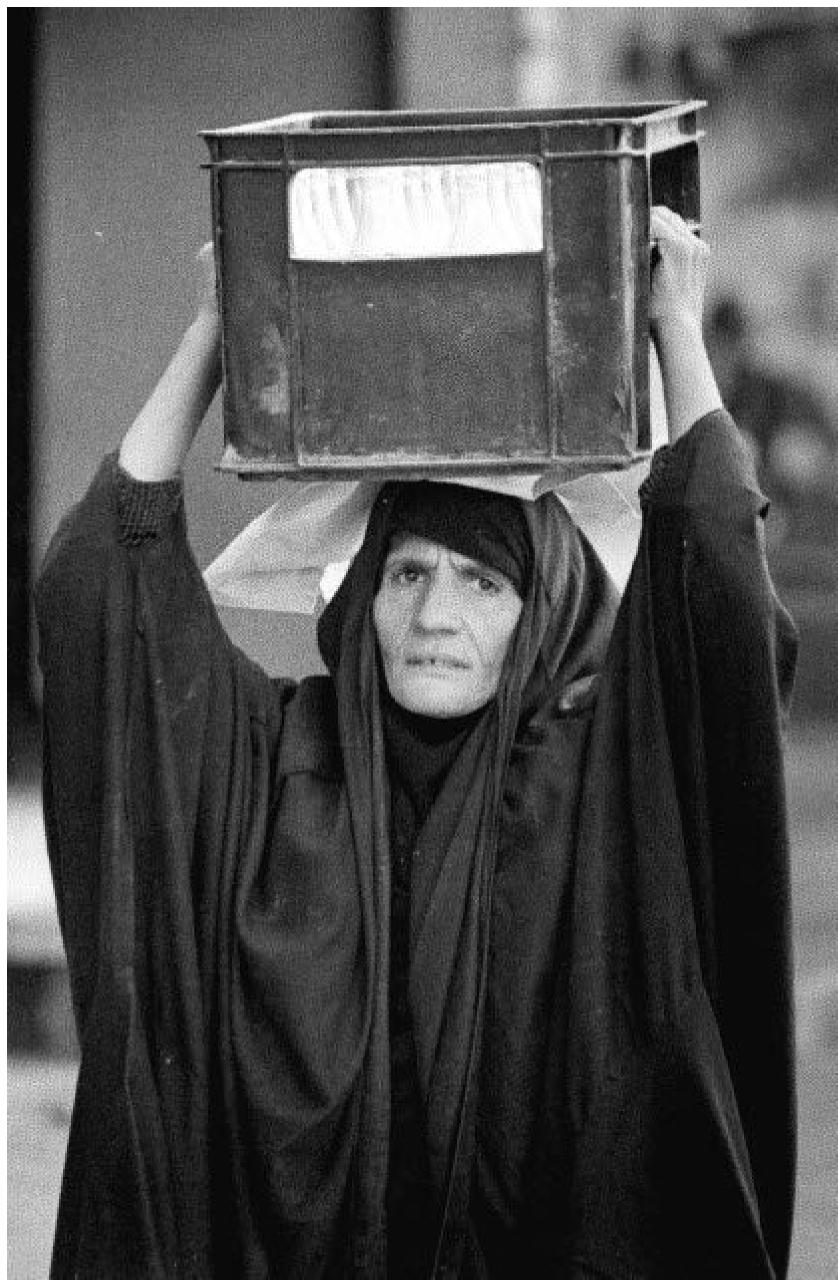
使馆计划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人员分批撤出。留守的我们在中国使馆楼顶用红漆画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冀以免遭轰炸之虞。

二进巴格达（1991年3月-5月）

我是在以色列挨“飞毛腿”袭击时接到再进巴格达命令的。由于以色列与伊拉克早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时代就结了仇，海湾战争使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为“匪谍”，我的伊拉克签证上早就注明“一旦该护照有以色列痕迹即告作废”。因而这次奉旨二进巴格达大有直接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件大白T恤衫，上书“我是海湾战争的幸存者”，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浑蛋上司瞎指挥”。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美国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尽管我向往陆上交火的科威特，对重返巴格达颇不以为然，可还是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因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上司总是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为了自我保护，洗去我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自作主张地先从以色列飞往塞浦路斯，再转道埃及，最后飞到约旦，再伺机进伊拉克。沿途，我扔掉一切有以色列之嫌的物品，把奥丽特小姐送的T恤衫存在了开罗。

我一直以为生死乃命中注定，非人力可改变。以前我读过一篇毛姆的小说，名字就叫《撒马拉相会》。撒马拉是伊拉克著名的通天之塔——撒马利亚螺旋塔的所在地，讲的就是命中注定的故事。巴格达有一位商人派仆人去集市买粮食，不大工夫，仆人狼狈地跑回来，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说：“主人，我刚在市场被人挤了一下，转身一看，挤我的人竟是死神。他见是我，做了一个吓人的手势，现在，请您把马借我，我要逃离巴格达，躲到撒马拉去。”商人立即把马借给仆人，让他逃往撒马拉。商人自己去市场，也碰到死神，他问死神今天早晨碰到仆人为什么做一个吓人的手势。死神说：“那不是吓人的手势，我只是吓了一跳。我为与他在巴格达相遇惊诧不已，因为今天晚上我和他在撒马拉有个约会。”

1991年3月1日在开罗机场，邂逅的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手捧我递上的名片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索嘎！索嘎！”地围着我直转圈。因为共同社眼中的唐老鸭大智大勇，绝不会傻到从以色列回伊拉克送死。直到看到中东分社给我的电令，他翻来覆去检查再三，才相信的确是我本人。



巴士拉街头，头顶牛奶的伊拉克老妪。

飞到约旦，中国驻约大使章德良一见我就大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备了酒菜，挤到我小屋里侃了一夜。章大使特别关照我，千万别向外人透露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难保。我则恳求章大使，尽快把我弄进巴格达。据章大使介绍，伊拉克最近驱逐了所有外国记者，想进巴格达得等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到来后再想办法。憋得我整天拿章大使的德国狼狗黑背开心。当初战争正酣之际，我每天都盗用使馆的大虾给她补奶，不想这美人聪敏过人知恩必报，以后我先后10次从约旦过境，她总是颠前跑后恩爱万分。

3月5日，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自埃及驾临约旦，这位北大老学长不仅给我补充了10000美金，还答应把我带进巴格达。3月15日凌晨4点，郑大使在我们的小汽车上升起五星红旗，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驶向巴格达。进入伊拉克境内后，高速公路上被炸毁的40吨油罐车和巨型集装箱载重车不时可见。公路上有美国空军标准装备20毫米火神机炮扫射的痕迹，一枚火箭命中中央隔离带，钢板断裂，扭曲一团。公路两侧的高压输电线像被刀砍过一样散乱如麻，庞大的架线塔被炸翻在地。我们的汽车竭力躲闪着弹坑，可还是轧在一块炸弹皮上，轮胎爆炸，险些栽进弹坑里。我既担心会撞上美国炸弹，又害怕被共和国卫队识别出来送上绞架。因为我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曝光的中国记者，而今又胆大包天地返回伊拉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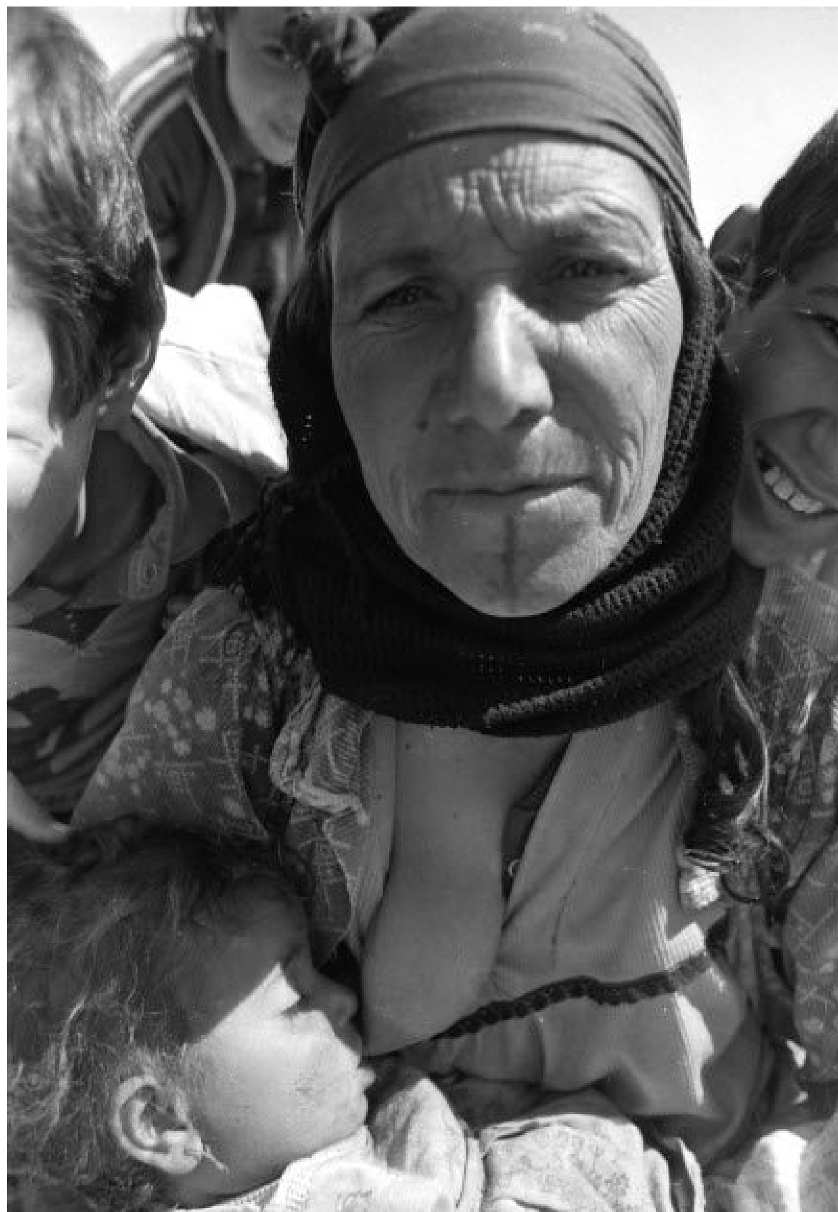


由于国际封锁，伊拉克人把政府配给的鸡蛋拿到黑市上卖高价。

昔日天方夜谭中美丽的巴格达此时已变成一堆沾满污泥的肮脏的水泥建筑。萨达姆总统府门前的“7·14”钢索桥被整个摧毁，与“自由者”桥相距800米的“共和国”桥被炸成四段，坠落底格里斯河中。都拉炼油厂被炸毁，汽车无油，人们纷纷以自行车代步，连曼苏尔富人区的富豪子弟也开始骑自行车。粮食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拉希德大街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第，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涨了129倍。巴格达街头烈日当空，人们手端塑料盆、水桶围着街心自来水管排队取水。五星级的拉希德饭店已经断水，我在一楼厕所撒了尿，可是没水冲。新华社只剩花园中的水龙头细水长流，用它冲完的胶卷挂着层莫名其妙的白霜。

我在伊拉克情报官员的陪同下拍摄战争废墟。此次战争，多国部队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能精确地钻入建筑物腹内爆炸，从外部看主体结构安然无恙，而腹内被炸得面目全非。阿米里亚地下掩蔽所就钻进了两颗“灵巧炸弹”，伤亡人数据称达1500人。废墟上高擎黑色挽幛的受难者家属看到有我这个外国人拍照，慷慨激昂地拥上来把我围在

核心高呼打倒美帝，好像我就是乔治·布什。



伊拉克北部逃难的库尔德人。

伊拉克贸易部长萨利赫接受采访时称战争封锁使伊拉克每人每月仅能得到1公斤大米，医院中的急诊手术往往得依靠烛光。哈佛大学研究所认为到1991年底至少有几万名儿童因饥病而死。国际红十字会迪利克医生告诉记者，由于缺少医疗设备，医生不得不重复使用注射器，这将使很多人有可能感染肝炎和艾滋病。这番话听得我不寒而栗，因为我已奉命挨了许多说不上名目的防疫针，而这些针的注射器全是反复使用的，伊拉克自国际封锁以来就很难找到一次性针头。

我还奉命与共和国卫队同行，到南方镇压穆斯林什叶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库尔德人叛乱。回到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萨东先生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他嘴角叼着一枚快要烧着小胡子的雪茄烟蒂，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烧毁的表店。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口咬定没拍，“萨东先生，您知道，我向来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则根本不按快门。”老萨东一对虎目盯了我好久，“据我的情报，你并不总那么听话。不过别害怕，现在是我求你，我们的部长出于某种兴趣，急需一张埃尔比勒那家被烧毁的钟表店的照片，可我手头现在没有。我听人说你路过那家倒霉表店时，手中的相机响了一下。”

三进巴铬达（1993年1月-2月）

1993年1月17日是海湾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美国空军再次袭击巴格达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巴格达市中心拉希德饭店也被一枚“战斧”导弹击中，炸死一名妇女，伤数十人，其中一名德国记者炸了个满脸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难民，直到10天之后才抽身飞到约旦，取道进入伊拉克。

自海湾战争以来，由于国际社会制裁，多国部队的F-15鹰、F-18A大黄蜂、F-14雄猫控制了制空权，伊拉克固定翼飞机就没敢升空，持续的空中封锁使伊拉克民航集体转业改开大巴士，专营从巴格

达到安曼的长途客运，战争使飞禽成了走兽。早上9点，我身背采访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帮我准备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饼，爬上由约旦首都安曼开往巴格达的“沃尔沃”长途车，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



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树都被伊拉克穷人砍光当柴烧。



巴格达市中心被炸的百货商店。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驶出约旦鲁维谢德，海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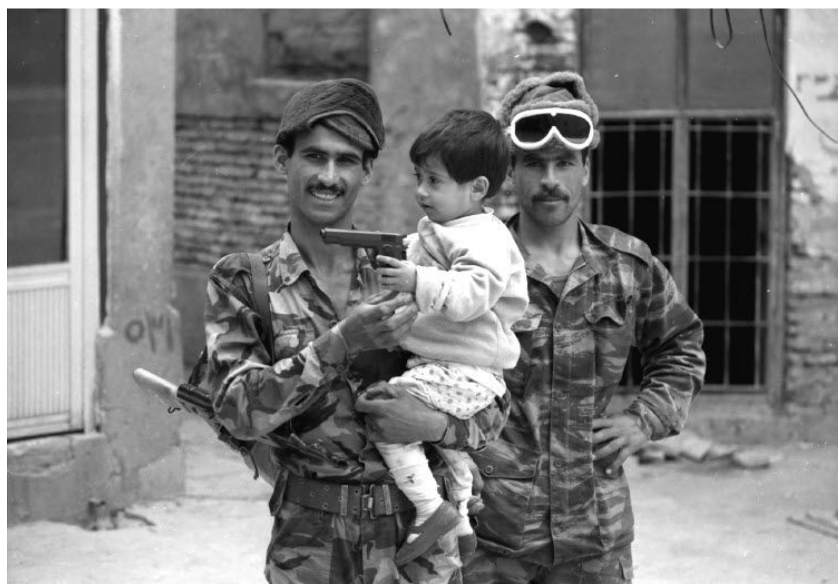
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协会在此修建的难民营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坑坑洼洼的帐篷坑。根据我战时模糊的记忆，约伊两国间有70公里宽的中立地带，可现在约旦的边界似乎向东推进了相当一段距离。伊拉克塔布里勒海关出现在眼前，红、白、黑、绿的四色伊拉克国旗懒洋洋地在烈日下飘舞依旧，只是国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绿色阿文“安拉最伟大”，这是伊拉克海湾战争之后修改国旗的硕果。

伊拉克海关认真地在我护照的第一页填上我携带的相机、镜头、录音机……这是以往两次没有的。我规矩地排在一名意大利商人身后等待过关，一位显然不谙英语的伊拉克边防警察用极奇怪的发音逐一点名，结果使所有听众对自己的姓名都顿感陌生。轮到我前面的意大利商人时，这位随时准备应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对警官高呼其名毫无反应，当即因装聋作哑把警察气得喉咙冒火，被恶狠狠地抛出队外。眼看着刚刚还绅士派头十足的商人老兄顷刻斯文扫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运真比蛛丝还细。好在我顺利过关，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继续茫茫未知的旅途。



巴格达街头的萨达姆像。

傍晚，我们的大巴士终于缓缓驶入神秘的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为加强摄影采访管理，把我和美国《时代》周刊摄影师罗伯特·斯特朗编在一组，采访当年被多国部队炸成一堆烂铁的儿童奶粉厂。据介绍，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该厂部分恢复生产，奶粉厂还送给我们每人两袋奶粉作为佐证。采访完毕，我掏钱请情报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达豪华的萨哈饭店吃午饭，连点了三道主菜都说没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可我敢打赌，这条鱼至少登陆了一个月，没鳄鱼牙、火鸡胃就别想咬碎并消化它。情报官瓦利德问我这次来巴格达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我说：“伊拉克人民更团结了。”他说：“当然，现在是战争。我警告你，一个人上街千万别背相机。”饭后，我发现瓦利德贪婪地注视着橱窗中的进口香烟，便主动给他买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获至宝地揣进衬衣口袋，一面请求我为他的同事再买一包。战前，这类进口烟成箱地摆在货架上，兜里揣满了用滚滚石油换来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采访完毕，瓦利德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市郊的家，领出一对天真美丽的双胞胎女儿，说要聘给我带回中国做老婆。



伊拉克北部苏莱马尼亚，全民皆兵。

2月7日，我和《时代》周刊的罗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车前往巴士拉，同行的还有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各国记者。我们被编成一队，连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报官员统一控制，意大利No．1记者皮鲁谑称之为“International　P．P．”（既有“国际采访团”之意，又可理解为“国际撒尿”）。

巴士拉是仅次于巴格达的伊拉克第二大城，位于伊拉克南部，东临夏特·阿拉伯河，市内河渠纵横，已有1300多年历史。海湾战争期间，巴士拉城北的公路桥被多国部队炸毁，至今未能修复，城内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污水四溢，恶臭冲天。夏特·阿拉伯河畔塑有99座死于两伊战争的烈士雕像，每座雕像下都镌刻了死者的名字、军衔、生卒年月，其中有战死的国防部长阿德南、第3装甲师师长拉希德、第5机械化师师长哈雅尼。

我们采访了巴士拉港区。港内上百条锈迹斑斑的巨轮歪在水中，有的已被炸沉，码头上杂草丛生。我们获准攀舷梯登上巨轮拍照，本

应繁华喧闹的中东名港此时竟比圆明园还寂静、荒凉，残砖败瓦和炸变了形的钢铁遍布甲板，船体上层建筑上简易的水泥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这里集中了世界各国的巨型货轮，海湾战争使其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络，静悄悄泊在锚地。

巴士拉省总医院院长阿拉艾拉丁称他的医院只剩三盒Humuliur。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冈本行正指着手术台上的药说是日本捐赠的，并一把抢过来仔细读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没了下文。意大利记者嘲笑道：“日本人，那上面是中国字吧！”说话间隔壁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胆战、毛发倒竖的号叫，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医生正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动手术。医生说：“麻药不够，这个士兵枪伤不重，身体又壮，用不着麻药。”

我们下榻的五星级巴士拉希尔顿饭店根本没有电，只在写字台上插了支火苗随风摇曳的蜡烛。洗手间水龙头用了吃奶的劲才拧开，先是血红的锈水，继而是浑浊的暖流。早饭只有干大饼和煎鸡蛋。《朝日新闻》的冈本行正点了果汁，可送上来的却是杯自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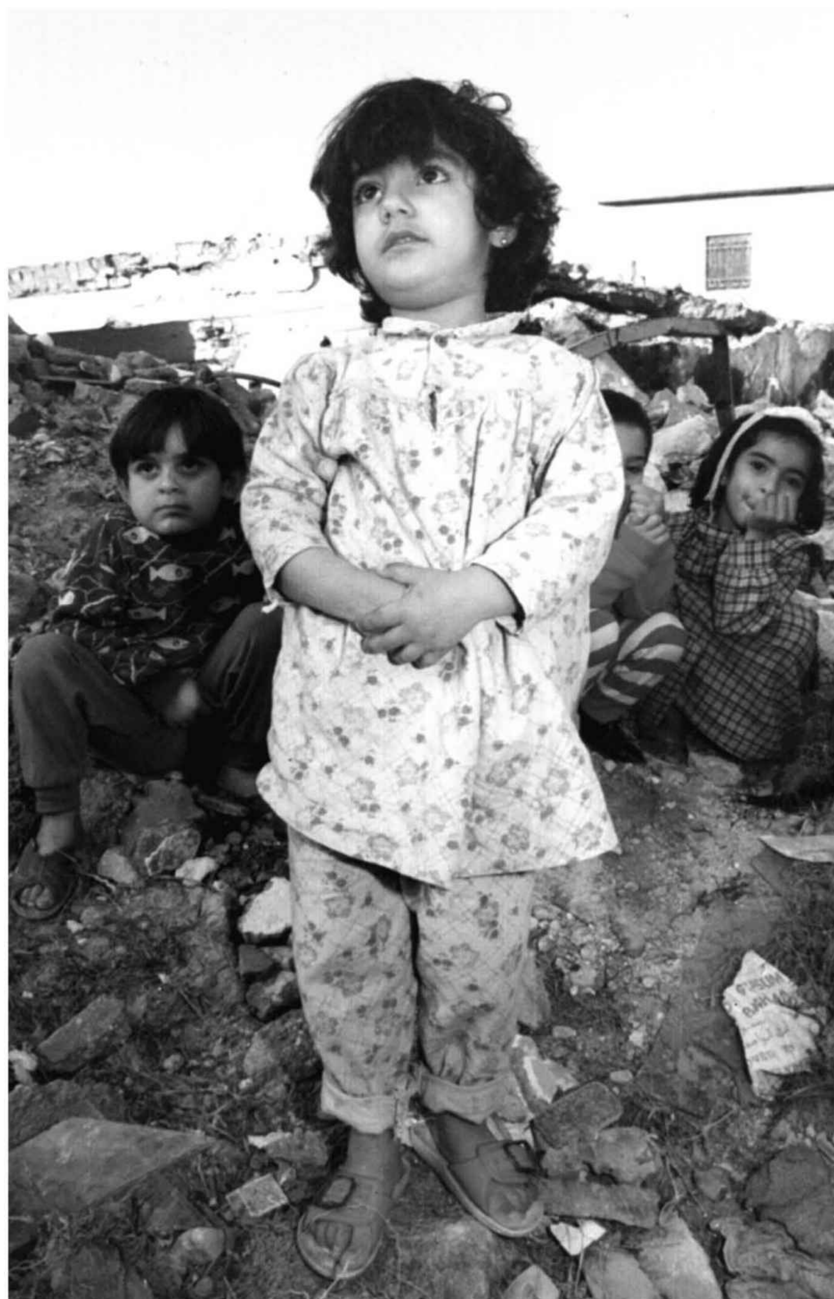
巴士拉医院的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士兵做手术。



坐在空食品篮边的伊拉克妇女。

沿途，所有记者还得分担七八个情报部陪同的饭费。由于缺乏配件和保养，汽车总出毛病，返回巴格达的时候竟有两辆汽车坏在野地里。所有情报部陪同和汽车司机都亮出家伙，围在四周担任警戒，由机械师抢修，尽管我们已付了租车费，可修车的费用仍由记者平摊。

沙漠黄昏的晴空蓝得让人发愁，寒风刺骨。我们几个摄影记者围着火堆一人一口传递着《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的一瓶约翰尼·沃克黑牌威士忌。皮鲁就着火光掏出一大把苏联勋章逐一别到我们所有人胸前作为纪念，他还有克格勃证件和苏共党证，据说全是在莫斯科现交钱现贴照片压钢印办来的。这老家伙年纪虽已62，可上蹿下跳倒像刚满26，他拎着酒瓶子把麦克阿瑟的绝句“老兵不死，仅仅隐退”（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篡改为“老摄影师不老，就是找不着焦点”。（Old Photographers never old，they're just out of focus．）



一枚巡航导弹夺走了这个小女孩父母的生命，她身后变成了一片废墟。



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士兵。



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在封锁中逐步重建。

返回巴格达，刚把同车的罗伯特送回旅馆，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说罗伯特已付了包车钱，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双份呀。可看到车子驶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说："我的确没钱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国大使馆或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我保证付给你合法所得，安拉做证！"

车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进去。分社首席记者李义昌担心我处理不了，我说，您还得常驻，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对付。我转身出门告诉司机，我刚和罗伯特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付了全部车费，因此只能给他50美元小费。司机说他可以给我多开发票。我说："中国前进了。你给我如数开我实付的钱，否则一个子儿也没有。"

四进巴格达（1993年7月-8月）

1993年6月29日，我和一帮西方记者拍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通过运河。在苏伊士河口，《时代》周刊驻开罗记者断腿巴利趴在我耳朵上让我和他一起去伊拉克"买手表"，"否则准会后悔一辈子"。我猜这小子话中有话，尤其是次日一早美联社的纳伯特也开车奔了机场，我就断定巴格达又要出事。我向上司表示也要到巴格达去"买手表"，可直到半个月后，我才接到进入巴格达的命令。

7月17日，开罗分社厨师杨子、贾三儿特意为我弄了顿"断头饭"，然后送我去机场。路上，我们撞了一辆菲亚特，一名埃及骑警一直尾随追到机场才把我们抓住，我将此视为不祥之兆。

约旦分社的几位老兄帮我弄了特许证，伊拉克政府破例同意我把"美联"图片传真机背进巴格达，通过海事卫星的无线天线向外界发传真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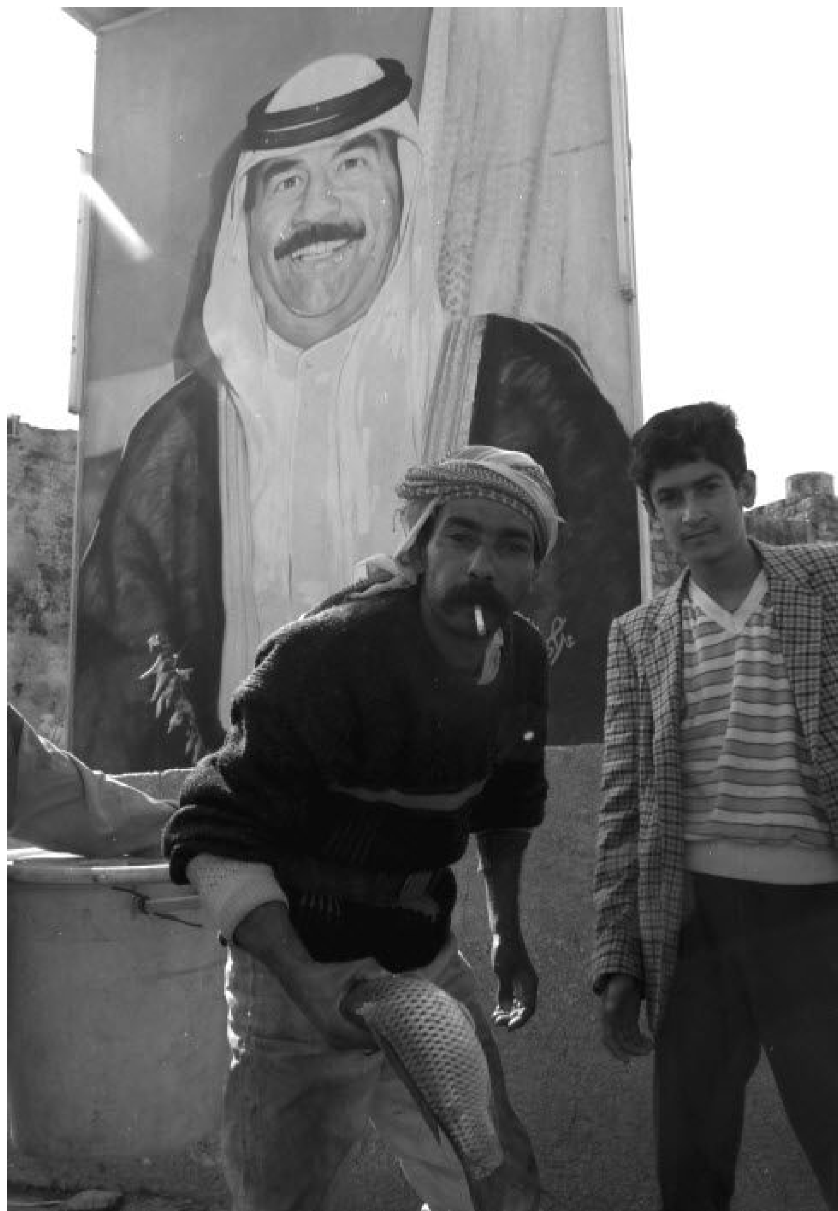
还是那条沙漠路，还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只是路况、车况更差。7月的中东沙漠酷热无比，而伊航长途大巴年久失修的空调

根本排不出一丝冷气。我已是第四次前往巴格达，全无以往的激情，像个失去奋斗目标的英雄，愁眉苦脸，苦不堪言。直到红海烈日西坠，阿拉伯繁星满天，我们这辆机件失灵的破车才穿过千里伊拉克大沙漠，摇摇晃晃进入巴格达。



由于食品短缺，椰枣成了粮食的主要替代品。椰枣旁的小贩正对着萨达姆像祈祷。

一到巴格达，我就跟着联合国核查组拍“安装监视用摄像机”，待我冲洗完照片，把美联图传机装上移动卫星发射天线时，才发现就是叫不通北京岸站。原来这种海事卫星移动发射天线的工作温度不能高于60℃，而我们那尊固定在水泥地上又加了把大锁的移动天线的表面温度超过80℃。1993年7月26日，我们终于让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移动天线向外界传发了照片“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艾克尤斯飞抵巴格达”。连美联社摄影记者贾西姆也跑过来伸出大毛手祝贺新华社也拥有了卫星传真装备。现在，这座我亲手安装在巴格达的发片装置还被锁在伊拉克政府新闻部院内的草坪上。



持续的经济封锁给伊拉克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灾难，他们喜欢吃的“祖拜迪”烤鱼已涨至每公斤90第纳尔，而伊拉克副部长月工资为750第纳尔。图为巴格达一鱼贩。

3年多的战争封锁，使大多数伊拉克人的购买力下降到只能购买政府每月凭卡供应的10公斤配给粮。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已上涨到每公斤90第纳尔，而伊拉克副部长级官员月工资仅为750第纳尔。勤劳的伊拉克人使市中心锈迹斑斑的马尔基娜雕像重新喷水，她神色凝重地向油瓮中浇水。可离这儿不远是一群脏兮兮的小孩，正伸出猫爪般的小黑手乞讨。

在国际新闻为美国一家垄断的形势下，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1995年全民公决萨达姆以得票99.96%的高分蝉联总统。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绝大多数伊拉克人比在原来西方统治者执政的年代生活得好得多。在持续多年的封锁下，萨达姆政府保障农产品自给自足，首先是蔬菜水果。肉制品虽不丰富，但仍保持最低水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有的是鱼，地下有的是油。伊拉克人不缺吃，也不少电。某些自己不生产的商品匮乏使居民生活受到影响，药品奇缺使伤病员尤其是儿童死亡率上升。但客观上的自力更生与主观上捍卫独立的决心使伊拉克永远不败。面对国际封锁，政府发给居民每人一卡，凭卡每月供应6公斤面粉、1公斤大米、0.5公斤黄油、0.5公斤糖、300克茶、1只鸡、1条香烟以及肥皂、洗衣粉和汽车轮胎。这些物品在遍布各地的特供商店免费供应，或仅需象征性地缴极少的钱。伊拉克90%的居民有自己的住房，煤气、电、水、电话费等基本公付，占每人工资比例不到1%。伊拉克保障私有财产，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自认为正在建设阿拉伯社会主义，因而优先发展国有经济。伊拉克独立前只能保住石油收入的6%，其余的全被西方国家拿走。现在，石油收入全部归伊拉克政府，这正是西方国家借口人权攻击萨达姆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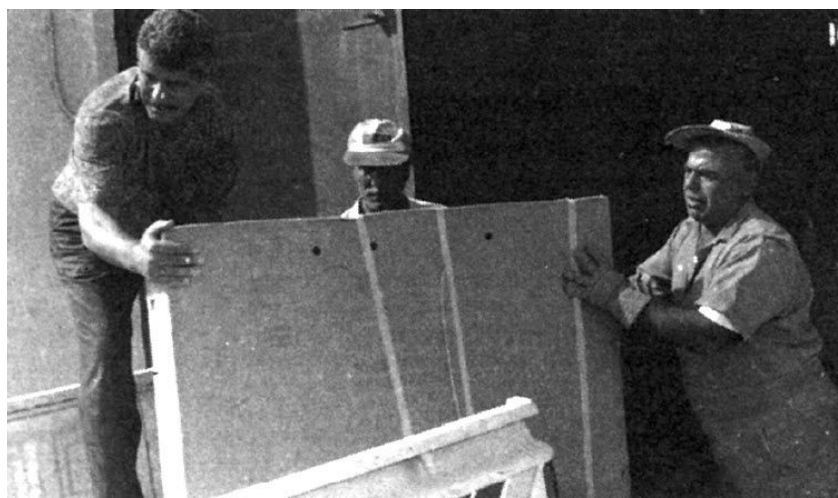
在被炸断的“7·14”桥头，一名伊拉克士兵拿着我的记者证，对面就是萨达姆总统府。当时的新华社记者证封面上没有一个英文字母。这里严禁照相，我佯装拍摄证件，拍下了断桥。



“领袖”和他的人民。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旧货市场，可以买到任何令人瞠目结舌的东

西，战争使伊国人对本国货币毫无信心，对美元却近乎疯狂地崇拜。一架德国产8×10蔡斯望远镜才20美元，而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头巾的家伙20美元卖给我一只“欧米茄”海王手表，可当我戴到手腕上才发现，除了秒针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这位潜入人流的老兄时，他已摘掉头上的围巾，露出满脸大胡子。他宽宏地同意“买回”那只表，不过只能“付”我10美元。当然，我也有赚的时候，一支派克45型钢笔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军刀3美元。在一个相机摊上，竟发现一台带MD-4马达、135mmF2镜头的尼康F-3，我屏气凝神强压住激动问摊主100美元能否成交，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美得我扔下120美元，抄起相机就跑。跑出百米之后，我才仔细打量这台磨得露了黄铜、镜头上还打着“美联社”标志的黑市货。可等我返回使馆，使馆的小于却迎面泼来一瓢凉水：“这台相机昨天开价才80美元！”



自1993年7月底开始，美国驻巴格达使馆开始秘密拍卖使馆财产，买主仅限于各国使团，不许记者采访。这表明美国一段时期内不大可能与巴格达改善关系。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也在秘密地拍卖财产，但避开新闻界，只对各

国使馆开放。我和小于开着中国使馆的卡车到美国使馆一举买下了美国人10台崭新的“将军”牌空调。波兰外交官托马斯作为美国利益代表现场拍卖，偌大的库房中堆满了冰箱、洗衣机、家具、吸尘器、铝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导我和小于到使馆后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后借机献媚：“小姐，你真美！美国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妈生在贝鲁特。你是记者？”

“不！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欢迎你来中国使馆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爱！”

“你真迷人！顺便问一下，那些电脑卖吗？”

“所有电脑都已卖给了印尼使馆。”

“真可惜我来晚了。亲爱的，能否这么理解：美国使馆把能卖的全卖了？”

“可以这么说！”

拍卖大厅的警卫不许我进，理由是我身上有相机，此间的拍卖是严禁记者采访的。我把大花裤衩卷至大腿根，红背心撩至胸口，腆起脏汗横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车车门上：“有我这样的记者吗？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我只想给自己留个影！”警卫对视了一下：“看来你也干不了用脑子的活儿。”当天，我在发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缀语：“看来，一个把房产之外的财产全卖了的使馆短期内不会改善两国关系。”这张质量极差的传真照片竟馋得美联社贾西姆啧啧称羡，这是1993年7月的事。

《纽约时报》驻白宫主笔迈克尔·凯利在他的《殉难日》一书中称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一名腰缠万贯的约旦投机商称：“这里到处都是漂亮小妞儿，你可以廉价地‘威凯威凯’。”我和新

华社驻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在底格里斯河畔就碰上一个在旅游学院学英语的姑娘，她的前胸赫然印了一行大字：“Suck it！（吮这儿）”还以职业的温柔死缠着和我们合影，我们不得不正言以对：“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不由想起一句悲伤的中国古语：“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入夜，古老的巴格达笛声悠扬、锣鼓喧天。伊拉克政府正在市中心猎人俱乐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9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的长子乌代也在其中。由于经济困难，伊政府号召人民摈弃传统奢华的阿拉伯婚礼，代之以爱国主义的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让其长子乌代以身作则。伊拉克政府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娘提供用后须归还的婚纱，向新郎赠送西装，并允许每对新人的50位亲戚免费出席集体婚礼，享受国际封锁下罕见的“库兹”（烤羊腿）。断腿的民歌手伊斯麦坐在椅子上唱着悠扬的歌，他的双腿是海湾战争中被美国飞机炸飞的。一位来着热闹的小姐国难不忘美容，卷了乌发、润了粉颜，还从容不迫地坐在民歌手身旁染指甲。



伊拉克集体婚礼。

举办集体婚礼的猎人俱乐部百米之外就是伊拉克军事情报总局，一群士兵仍在清理前不久惨遭轰炸的主建筑。防空武器昂首向天，一面伊拉克四色国旗在夜空招展，旗上的手写体阿文赫然分明：“安拉最伟大。”

埃及地震亲历记

护身符不翼而飞

1992年10月12日午后，我一觉醒来，中东烈日正透过百叶窗直射到我腿上，干枯的汗毛在侧逆光下金光闪闪，贴满止疼膏的膑骨火辣辣地疼。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突然发现脖子上的护身符不翼而飞。

我的护身符绝非价值连城的钻石、翡翠、和氏璧，而是一枚仅5分硬币大小、刻有六字真言的铜观音。可这枚祖传的铜观音陪我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抓大熊猫、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从天安门到巴格达。洪水、大火、动乱、战争……铜观音保佑我走遍世界。我将护身符的失踪看作是某种危险将至的征兆，就像海湾战争在特拉维夫挨“飞毛腿”前，尼康相机包的背带莫名其妙地断了3次。

不祥的预感像只庞大的阿拉斯加灰熊，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莫名的恐惧紧紧纠缠着我。尤其令我不安的是我放在冲扩店的4卷负片，竟不可思议地卡在冲扩机里。尽管店主哈利德一再以安拉的名义赌咒发誓“枯鲁塔麻姆”（阿语：一切都好），可我从中午到现在连跑4趟还是没有结果。

下午2点40分，我开着大吉普第5次去冲扩店，店老板哈利德干脆躲了出去，仅留下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伙计敷衍我，气得我直骂娘，发誓再也不来这家鬼店。

我离开冲扩店，开上大吉普回分社，看看左腕上的潜水表已是下

午3点05分。我爬到吉普后座上将昨天吃剩的罐头、面包塞进一只大塑料袋，又取出汽车收音机中的盒带，准备回房间伴着瓦格纳辉煌的旋律吃我的午饭，继续读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我左手提着塑料袋爬上楼，钻进洗手间准备把憋了半天的一泡尿先解决掉。就在这时，一阵闷雷般的轰鸣由远而近，大地上下震颤，继而左右摇晃，我根本无法把尿撒进尿池里。我用手撑住墙壁，抬起左腕看了一眼潜水表：下午3点09分。

地震持续了一分钟

整个震颤过程持续了一分钟。在这漫长的一分钟里，先是有人大呼小叫“地震”，继而是五音错位的喊夫唤妻。我根本不信真是地震，因为我脑子里只有“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我随着慌张的人流往外跑，迎面撞上一个脸色煞白带着哭腔找丈夫的女人，看着她的失魂落魄，我猛然想起我还是个男人。我逆着人流返回楼上，抄起床头的多姆克摄影包，又从冰箱中摸出五个柯达胶卷和一卷绷带，拎着落满灰尘的钢盔直扑停在车库的大吉普。此时，我就像一只全神贯注于捕鼠的大公猫，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我真担心持续的震颤会把我的大吉普砸在楼里，由于太紧张，连打了两次火才发动引擎。弄不清是大地的颤抖还是6缸吉普4500毫升发动机的轰鸣，我耳畔回荡着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我尽力稳定情绪将车倒到街心，大吉普咆哮着迎着惊慌失措的人流霸道地横在街心。我摇下玻璃朝外面大喊：“谁跟我走？”我称之为六哥的分社办公室主任应声上了车。我的铁哥们儿王波揪着自己小背心的背带、趿拉着拖鞋可怜巴巴地问我：“穿这个行吧？”我没等他完全爬进来就抬开离合器，大吉普吼叫着冲开人群。王波趴在我耳旁大喊：“咱们去哪儿？”“哪儿惨去哪儿！”我回答得咬牙切齿。

宽广的阿盟大街成了抱头鼠窜者的避难所，可我无心在此恋战。

我知道老开罗的旧房区肯定比这儿出戏，茵芭芭和舒伯拉区不砸死人才怪。可眼前一些胆小的可怜虫弃车而逃，把道路塞得死死的，好在我的大吉普四轮驱动可以蹿上爬下越野而行。“7·26”大街一幢5层楼震塌的一角堵死了干线，我不得不右转弯沿着濒尼罗河的科尼奇大道向南走。再往前是政府新闻部，我让王波下车去新闻部打听一下震中在哪里、震级多少。我则找路口掉头，将大吉普靠在马路牙子上追拍魂不附体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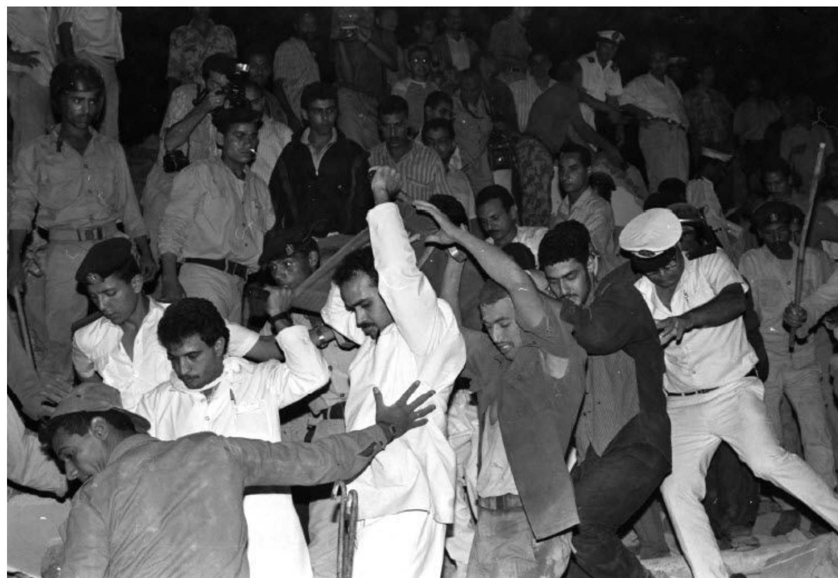


这是地震发生后10分钟，我拍到的开罗一户逃离房屋的幸存者。

六哥和王波四只拖鞋噼啪小跑着奔回来，争先恐后地大喊：“新闻部里的人全躲地震去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埃及人失魂落魄地一把拽住脖子上挂满尼康相机的我，其神态酷似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八路军的大春哥。原来新闻部后面塌了三座小楼，他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跟在这老兄身后亦步亦趋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终于来到一堆破烂不堪的废墟前，可房主说什么也不许拍照。

再向前就是舒伯拉区，根据多年的经验，我紧盯着一辆救护车的

屁股，轻而易举地到了现场。这里的房屋至少已有80年历史，自然惨象环生。紧挨着我的大吉普，一家人正颤巍巍地竖起大木梯把还困在2楼的孩子接到地面。数不清的灾民在破砖烂瓦中挑拣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地震救援中，挖掘出的尸体惨不忍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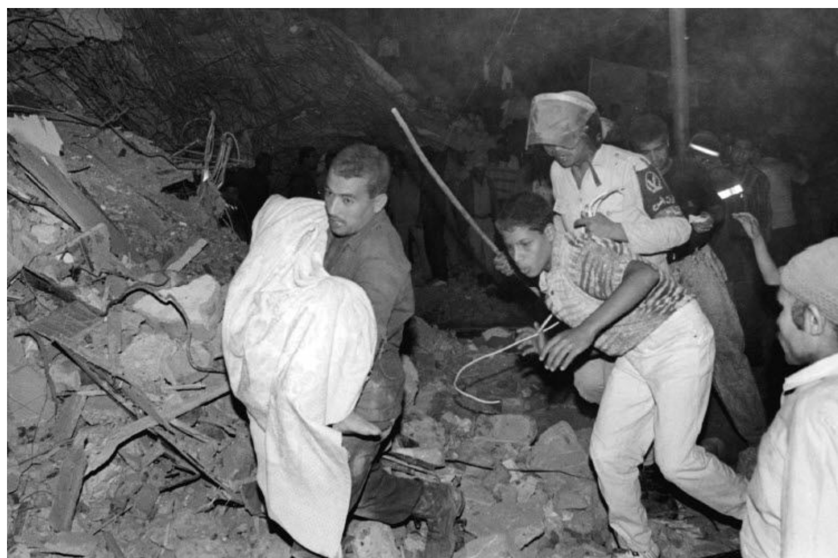
谁也不知道哪儿是震中，谁也不清楚地震有几级。一位安莎社记者告诉我震中“应该在地中海底”，我笑骂道：“应该是维苏威火山！”

我独自一人钻进新华社中东分社大楼的暗室里，冲胶卷时我才突然感到以往从未有过的恐惧，“死”仿佛近在咫尺。此时，我真盼望自己能有个儿子可以延续我的生命，我痛苦地感到我已经老了，以往的胆识已一扫而光，我真怀疑当初在巴格达、特拉维夫挨炸时我是否邪魔附体。为战胜自己的懦弱，我将收录机的音量开关扭至极限，让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驱散冥冥之中的恐惧，赶走死神的黑翼。

照片很快制作完毕，待写完文字说明才知道整个开罗与外界的电

话联络全部中断，我纵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

入夜，我开着大吉普奔赴开罗灾情最重的海利波利斯区，这里一幢有72套房间的14层巨厦被夷为平地。我看见路透社摄影记者阿莱、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法新社摄影记者阿尔多等人嘴上缠着白绷带，迎着刺鼻的血腥味往前冲，这是一群十足的捉老鼠的大公猫。我的老朋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断腿巴利也混迹其间，拖着他那条在贝鲁特打断的右腿一个趔趄栽下来，大脑袋正撞在我肚子上。我用力挽住巴利的胳膊，同时尽量保持住自己的平衡。巴利一面喊了声“谢了，唐！”一面挣扎着继续往废墟上爬，越过他倾斜的脊背，我看见他那大眼睛的阿拉伯女人正使出吃奶的力气，用肩膀顶着巴利的右腿。



抢救伤员。

寻找震中

午夜2点，我将大吉普藏在清真寺旁的一块空地上，偷偷摸摸地

钻回楼里睡觉。我绝非有意以武力试探社长不许上楼的命令的权威性，实在是我已太累，必须脱光衣服“真正地”睡一觉，因为我已打定主意，明早一定要第一个赶到那子虚乌有的“震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禁不住重温1989年山西地震的旧梦，那回我以一辆“大发”昼夜兼程2000公里，我的传真照片不仅占领了《人民日报》头版，还被美联、路透、法新、共同社们买去。光荣与梦想俱成历史，这里是开罗，地震仍在继续。紧张工作之余，我体会着小猫晒太阳才有的温暖，恍惚睡去。

当我被闹钟吵醒时已是10月13日凌晨6点。我邀阿文记者老杨与我同行，目标是100公里外卡伦湖畔子虚乌有的加托拉尼沙山，据埃及《金字塔》报透露，那一带可能就是震中。驱车出开罗沿着直通法尤姆的沙漠路狂奔，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溢于心头。

我开的这辆1991年款丰田大吉普曾随我二闯以色列，半年前以色列国防军围堵了我几十公里才在加沙城北将我拿获。法新社、路透社们把闯边界的我描写成“驾飞车的唐”，以色列国防军干脆叫我“飞人”。开快车成性的我按报上讲的经纬度迅速赶到开罗西南指定的坐标位置。可这里既无加托拉尼沙山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就连在这片沙漠中修路的筑路队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和老杨边走边问，一直围着卡伦湖转了大半圈，才在沙克舒克村口碰上一个自称知道此地的人。这个头裹绷带的家伙声称震中加托拉尼沙山还得再向沙漠纵深开70公里，可我的大吉普的贮油只能再坚持50公里。看着这老哥目无定睛的神情，我开始怀疑他那缠着绷带的下巴到底是房梁砸的，还是挨了左勾拳。

按理说小村沙克舒克是离震中最近的永久居民点，可灾情并不比开罗重多少。穿黑袍蒙黑纱的阿拉伯妇女若无其事，各自在破败不堪的屋檐下忙着家务。村旁的卡伦湖上帆影点点，捕鱼如常。

从沙克舒克村继续前进20公里，便到了北非古城法尤姆。我们的大吉普纵穿最繁华的穆罕默德大街，发现有五六处楼房受损，军队正在封锁现场，组织抢险。但总体看来灾情远远轻于开罗。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已中断对中国的出访回国，当天就视察了救灾现场。这次“埃及历史上最强烈的地震”至少已造成500人死亡、4500人受伤。仅开罗金字塔医院就处理了1000多名伤员，医院门口数十名痛失亲人的阿拉伯妇女哭号之声震天。

下场地震推迟到5点开演

开罗海利波利斯那座崩塌成一堆瓦砾的14层公寓楼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核心。由德国红十字会派来的寻人犬营救队正在仔细搜寻，每隔个把钟头就刨出一个垂死或已被水泥预制板砸扁的居民。阿拉伯人严禁给死人拍照，数十位义务人员高扯白布专门阻挡电视和摄影记者的镜头。炎炎烈日下，口干舌燥的德国寻人犬累得体力不支。戴眼镜的寻人犬饲养员克劳布小姐与她的爱犬共用一个水壶喝水。



埃及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德国红十字会抢救队员抵达开罗，立即投入抢救之中。一名女队员看到自己的寻人犬疲惫不堪，掏出自己的

水壶饮犬。

我没见过1940年的考文垂和1941年的珍珠港，可我亲历的特拉维夫和巴格达的战争废墟都没有这么大的腐尸味。此时开罗的最高气温将近40℃，尽管我已用涂了清凉油的绷带将口鼻紧紧包住，可令人作呕的臭气还是熏得我泪水横流。当一只克尽厥职的大公猫发现老鼠后，必然全神贯注于它的猎物，将所有器官、全部精力集中到这富于创造性而魅力无穷的劳动之中，此时，它也最易受伤害。一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下子从布满钢筋的二楼摔到一楼的瓦砾堆上。钢盔保护了我的头，可右腿膑骨至大腿根内侧却摔出一道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紫色血瘀来，疼得我匍匐在地，挣扎了好半天还只能蹲坐在原地干喘。

就在我像个摔碎的泥娃娃那样瘫倒在地时，已有5000年历史的金字塔却结实得让我嫉妒。与大金字塔相邻的斯芬克斯亦安然无恙，我开着大吉普围着它们连转三圈，就是找不出丝毫因地震造成的损伤来。守卫金字塔的警察对我深表同情，“本来也该给它们震出点毛病来，可是很遗憾，什么也没发生！”

由于谣传CNN播报了一条地震预报——下午4点将有强烈地震，致使新华社中东分社门前空地上坐满了翘首长空等待4点钟来临的人们，就像在等待一场准时开演的电影。新华社埃及雇员穆罕默德见我在楼内闲庭信步大为惊骇，我说我刚和安拉通了电话，下场地震推迟到5点开演。

我看到了神光

吉萨金字塔声威盖世之际，本应与其齐名的阿布森贝神庙却远远躲在上埃及非洲烈日的阴影里。在当今所有描绘古埃及灿烂文化的典籍中，有关阿布森贝的章节丝毫不比吉萨金字塔逊色，甚至偶有过之。几千年来，“神光”准时穿过61米长的隧道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脸上这一世界奇观，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前来瞻仰。

二等列车

1992年2月，埃及政府邀请部分常驻开罗的外国记者南下位于埃及-苏丹边境的沙漠小镇阿布森贝，见证阿布森贝神庙2月21日出现的“神光”。当时，我和国际广播电台的小高都刚到开罗不久，自然属“无名鼠辈”而榜上无名。尽管我使出当年在北京跑新闻的蛮劲，软磨硬泡了整整两天，主管此事的官员也动了恻隐之心，可最后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你们可以从开罗乘火车前往900公里外的阿斯旺，然后找汽车穿过300公里的南方沙漠，或者骑骆驼。”

偌大的开罗火车站内竟连一块英文标志牌都没有，到处是令人眼花缭乱、蚯蚓般蠕动的阿拉伯文。我们找到一位粗通英文的旅游警察（埃及负责旅游秩序的专门警察），才被引到游客售票处，一打听到阿斯旺的卧铺要217埃镑（约70美元），吓得我脑袋差点儿缩进脖腔里。转出候车大厅，钻进散发着异国气味的地下通道，还有一个脏兮兮、乱糟糟的售票室。这里挤满了缠头巾、穿阿拉伯长袍的埃及人，此处也卖去阿斯旺的火车票，不过只有二等硬座，票价仅为卧铺的1/10，每张才22.8埃镑（约7美元）。

埃及二等列车远比我们想象的好，许多勤俭的西方游客也挤在这里，光我们这节车厢就有三个美国大疯丫头、两条德国大汉和一名日本学生。

沙漠上的夜车冷得要命。我把羽绒衣拉锁拉到头，把脸埋在衣领里，生怕呼出的热气浪费掉。紧挨我的努比亚老人不停地咳嗽，将浓痰随口吐在我脚边。身后的阿拉伯少年一支接一支唱着又甜又快的情歌，我只听得懂一句“哈比比”（亲爱的）。一位用黑纱从头裹到脚的阿拉伯妇女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宛若乌木根雕。

终于熬到天明，步入列车厕所，才发现马桶堵塞，遍地“遗矢”，已无立锥之地，随着列车的有节奏的摇晃，恶臭徐徐扑面而来。列车溯尼罗河蜿蜒而上，两侧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可车内的空气却污浊之至。小高试图打开车窗透透气，但车窗密封着。我走到车厢的一头，发现车门竟是开着的，两条德国硬汉正蹲在敞开的车门边随手扯过一根根甘蔗，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嚼。我朝这两位条顿骑士喊了声“猫根”（德语，早上好！），他们就顺手扔给我一根。我掰了一段递给小高，自己捧着半根甘蔗蹲在他们旁边试着用牙咬住断茬剥皮。一位努比亚黑人见我啃得斯文，一把夺过去，在我的甘蔗上狠咬一口，又塞回我嘴里，教我从他咬开的断口处吸甜水。

每逢小站，火车并不停顿，仅仅减慢速度。旅客都像打冲锋、抢夺制高点似的爬上跳下，陌路途人则主动帮上下车的旅客抛接各种奇形怪状的行囊。

次日下午2点，火车终于缓缓驶入终点站阿斯旺。经过15个小时的硬座旅行，小高和我已变成涅槃的乌鸦，嘴角上挂着尼罗河甘蔗凝结的白汁，一脸痴相地爬下火车。

先有阿斯旺，后有旅游业

阿斯旺（Aswan）位于开罗以南900公里的尼罗河畔，面积783平方公里。历史上的阿斯旺几度辉煌，以秀美平和的热带风光和悠久文明震惊世界，故事片《尼罗河惨案》就发生在这里，阿斯旺纤夫凯特拉克特饭店也因“惨案”成为闻名于世的四星饭店。我坐在该饭店濒尼罗河的露天酒吧，手端用尼罗河水酿制的斯黛拉啤酒，面对点点白帆，耳畔回荡着《尼罗河惨案》的主题曲，仿佛置身于危机四伏的电影情节之中。

阿斯旺北邻卢克索，南有苏丹重镇哈尔发，早在远古就已成为东北非最重要的贸易城市。阿斯旺在古埃及语中称为“苏努”（Sono），意为市场。希腊人将其曲解为“看见”，科普特语念作“斯旺”（Swan），阿拉伯人在其前面冠之以阿拉伯字母“A”（阿里夫），约定俗成变成了现在的阿斯旺。

按阿斯旺旅游局长穆罕默德·阿哈米德的说法；“世界上先有阿斯旺，后有旅游业。”尼罗河美丽的自然景观、舒适的热带气候、丰富的文物古迹和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坝，使阿斯旺的旅游业特别发达。阿斯旺现有旅馆床位5050张，豪华游船床位20000张，每年吸引游客达百万之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阿斯旺旅游局仅有20名工作人员。

埃及领土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96%是沙漠，4%的可耕地全部集中在尼罗河沿岸。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尼罗河平均年径流量840亿立方米，但年际变化极大。1878年径流高达1510亿立方米，可1913年仅有420亿立方米。尼罗河的涨落不仅缔造了精确的历法、数学、天文学、建筑学，也让沿岸人民饱尝水旱磨难。自古以来，每年6月17-18日，尼罗河水变绿，继而暴涨，名曰“落泪”。到8月28日，当地人将盛装的美女载至河心，抛入激流为河神娶妇，名曰“忠诚节”。这种习俗一直沿袭了几千年，现在，每年8月28日尼罗河沿岸仍举行“忠诚节”纪念活动，只不过石膏人和鲜花取代了祭祀河神的少女。



每年的8月28日是一年一度的“忠诚节”，盛装的埃及少女模仿沿袭数千年的风俗，重现古埃及用少女祭河神的场面。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老穆罕默德开着辆连方向灯仪表板全没有的“标致504”。他虽然仅仅勉强小学毕业，可娶了个开罗农学院毕业的太太，为此特别得意，不停地炫耀太太的种种贤德。再有一件令他夸耀的事是1961年周恩来访问埃及，他给周恩来开过车。他自称家中珍藏着一张周恩来的“书法”。

汽车驶过1932年埃及革命前法鲁克国王修建的防洪坝，进入举世闻名的阿斯旺高坝管理局大门。高坝管理局局长哈马迪·M．贾哈尔详细介绍了这座历时10年（1960-1970年）、耗资9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巨坝的建筑过程。位于中东动荡地区的阿斯旺高坝利用山势，建在沙砾结构的尼罗河冲积层上，采用黏土心墙堆石施工法，坚固万分。当我问及阿斯旺高坝是否经受得住战略导弹诸如“飞毛腿”之类的袭击时，贾哈尔局长称：“原子弹也炸不塌，更何况埃及拥有一流的防空力量。”

驱车于111米高的阿斯旺水坝之上，脚下波涛翻滚的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被拦腰截断，放眼南望是宽15公里、长500多公里的纳赛尔湖。这座世界第二大人工湖吞下尼罗河的全年径流，实现河水多年调节，使1964年的洪水、1972年的干旱、1975年的特大洪峰和1982年以来的持续低水位都化险为夷。高坝西端是75米高的埃苏友谊塔，塔身并排镶嵌着直径2米的苏联和埃及国徽及纳赛尔、萨达特的画像。一大帮中学生正挤在纪念塔下拍照，天真的脸上洋溢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希望之光。



苏联援建的阿斯旺水库纪念碑上，可以同时看到镰刀锤子和阿拉伯鹰的标识。

“我不在乎记者，可我在乎北京”

由阿斯旺南行300公里才是阿布森贝，由于沙漠中没有铁路，只能乘飞机或搭长途汽车。饭店门口的出租司机开价240埃镑（80美元）才肯上路。我们转到长途车站，一位头缠白包头的努比亚黑人司机拦住我们。他用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名叫汉姆萨，家住阿布森贝，

正准备凑够一车人赶回家，如果我们愿意，每人只缴20埃镑（7美元）就行。

汉姆萨的这辆“标致504”最多只有五成新，车上三排座位满满塞了9个人。我和小高因为是外国人被优待坐在第一排，我紧挨在司机右侧，怀抱摄影包丝毫动弹不得。汉姆萨车开得极野，还没出阿斯旺城时速就超过150公里。他左手扶方向盘，身子倒向右侧，用右拳狠砸汽车收录机，破车随着他右拳的起落一蹿一蹿地向前冲。至少敲了10分钟，收录机才好歹转了起来，原来是一盘伊斯兰祈祷词，汉姆萨和全体乘客一齐跟着收录机唱起“安拉”来。

小破车以160公里的时速狂奔，小高还不断地鼓励司机“果义斯”（阿语：好）。就在他再次叫好的同时，只听左后轮胎一声巨响，继而是钢圈与路面摩擦发出的刺耳尖叫。破车在沙漠路上左右摇摆着冲向前方，一头扎进右侧的沙堆，旋即又反弹回来，在公路上做360度的原地转向，斜歪在公路左侧的沙地里。小高惊叫着撞开车门，以为车子马上就要起火爆炸。司机拎出一只塑料桶钻出车外，我猜他要灭火，可他竟坦然地立在沙地上撒起尿来。之后又从容地用塑料桶里的水认真地洗下身，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他才在沙地上支起千斤顶，若无其事地换上备用轮胎。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赶到阿布森贝。这里仿佛是美国西部片中的情景，一条沙漠公路蜿蜒穿过镇中心，四周是铺天盖地的黄沙，镇政府警察局小巧玲珑，挤在唯一的一条街道上。这里仅有的两家旅店已经爆满：纳费尔塔丽旅馆甚至拒绝我们在大堂逗留；另一家名叫拉姆西斯旅店的老板是位努比亚黑人，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大为热情：“先住在贮藏室，一会儿再想办法。我不在乎记者，可我在乎北京。”说罢从冰箱中端出两杯玫瑰红色的冰镇“卡拉卡狄”（一种粉红色花冲的水，是努比亚人常喝的饮料）请我们喝。一位站在太阳阴影里喝啤酒的美国人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分享他的套间。

据说约有数万人涌来此地，只为一睹2月21日凌晨太阳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脸上的壮丽景观。很明显，日本游客占很大比重，小高和我也总被误作日本人，弄得我们不得不劳神去解释亚洲只有中国才盛产一米八几的大高个。黄昏时分，小高和我在纳赛尔湖畔的落日余晖里认识了两位日本姑娘，她们都是东京大学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谈笑间，其中一位将我相机顶盖上的黑胶布一点点揭下，露出白花花的“Nikon”（尼康），我不禁勃然大怒。见我愤然，她忙用纤纤玉指将胶布复位，贴好按平，强作天真地追问我为什么把相机、镜头、闪光灯上的日本牌号全贴起来。我面对尼罗河没有回答，只对天发狠，有朝一日我要造最好的相机。



这就是那辆以160公里时速狂奔而后爆胎的标致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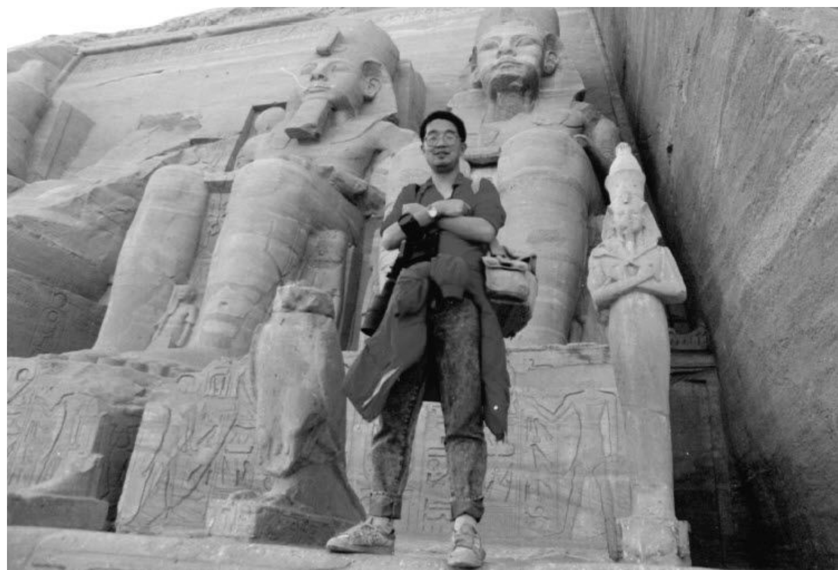


努比亚老人。

科学输给神威

2月22日凌晨4点，我和小高匆匆起床，跑步直奔阿布森贝神庙。尼罗河畔的空场上已聚集了数不清的旅游者，由于游客甚众，当地出动了军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

阿布森贝神庙是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姆西斯二世为崇拜太阳神于公元前1257年建造的。他是古埃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67年之久，还是位富于革新精神的外交家、建筑家和军事家。公元前1280年，拉姆西斯二世在卡迪什大败叙利亚国王海蒂特后，签订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条约，并强娶叙利亚公主为妾。他把这件事和其他所有值得夸耀的业绩一起刻在卢克索卡纳克神庙的石壁上。



我在阿布森贝神庙前。

拉姆西斯二世在阿布森贝修了两座神庙，大的为他自己，小的是为他的努比亚宠妃纳费尔塔丽。他自己的神庙雕凿在尼罗河西岸166米高的峭崖上，高31米，宽38米，深60多米。神庙外矗立着四尊巨大的自身石雕，每座石雕像仅嘴唇就长达1米，其巨大可想而知。与其毗邻的小神庙则小巧精致，拉姆西斯二世与宠妃纳费尔塔丽的二人雕像并肩而立，这是埃及历史上仅有的国王与王后举案齐眉、身材等高的雕像。在古埃及众多的国王和王后雕像中，王后身高一般不足国王身高的一半。因此，拉姆西斯二世还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主张男女平等的领袖。

举世闻名的拉姆西斯二世神庙具有极高的数学、天文学价值。几千年来，每年只有2月21日（拉姆西斯二世生日）和10月21日（拉姆西斯二世登基日）清晨，太阳光准时直射神庙大门，水平穿过61米深的柱廊直抵隧道洞底，不偏不倚地照在端坐神庙尽头的拉姆西斯二世石像上。人们称这两天为“太阳节”，2月太阳节是麦收的开始，10月太阳节是尼罗河涨水的结束。由此可见古埃及数学、天文学、建筑学

的文明程度。

20世纪60年代初，埃及修建阿斯旺高坝，库区500万人口被迫迁徙。为保护神庙不被水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50多个国家捐资4000多万美元，组织3000多位当代一流的科学家，采用瑞士人的方案将神庙切割成9～30吨的巨石1036块，上移60米后重新组装，搬迁耗时达5年之久。科学家们采用最新科技手段挽救了神庙，可终究留下了一个永世的遗憾：由于不可思议的误差，从此太阳光照在拉姆西斯二世身上的时间由21日后移至22日，现代科学在数千年前的拉姆西斯二世的神威下黯然失色。

自从1900年尼罗河修建第一座水坝以来，水位的提高已迫使当地努比亚人四次大迁徙，但阿布森贝神庙始终是努比亚文明的集中体现。早在公元前600年，阿布森贝就取代衰落的古埃及成为埃及、非洲、努比亚三种文化混合繁荣的核心。努比亚人世代居住在用阳光烤制的土坯房中，房顶用泥土和草秆制成。从外观看，所有房子都各不相同，墙壁上画满树木、旗帜、鸡和各种神像。在努比亚小屋的层层包围中，最宏伟的建筑是阿布森贝神庙外的拉姆西斯二世神像。从远古延续至今每年两度的“太阳节”不仅是对拉姆西斯二世的膜拜，还兼有捍卫努比亚黑人文化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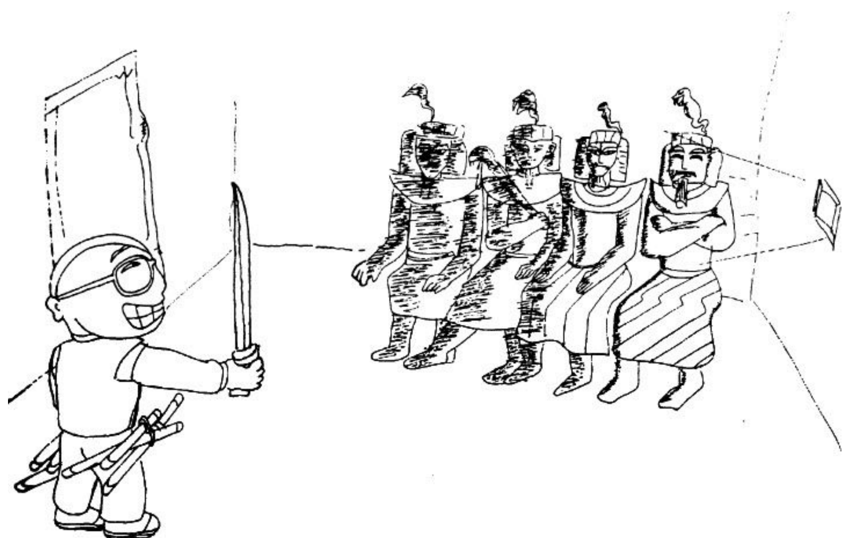
我离拉姆西斯二世最近！

据协助警察维持秩序的军官讲，今天的观光客应在2万之众，全为瞻仰神光而来。军警奉命解下武装带，拉起两道人墙，用警棍建立起法制的尊严。所有游人全被拦在庙外，只有极个别身份显赫的贵宾获准进入。我猛然发现缓缓前进的贵宾中有一位白发老者端坐轮椅之上，一位纤弱女人在沙地上吃力地推着轮椅。我灵机一动，主动冲上前，从她手中接过轮椅，推着轮椅昂首挺胸地进了庙。我回头朝小高一瞥，他正站在门外羡慕地朝我挥手。

我手推轮椅随人流缓缓前行，发现神庙乃是凿在岩壁上的一巨形石窟。庙由60余米的狭长柱廊和三重大厅组成，庙内50块壁画刻有拉姆西斯二世一生的军事荣耀、拉姆西斯二世与众神在一起及各种祭祀活动。柱廊尽头自左至右四座石雕依次是地狱与黑暗之神普塔（孟菲斯之神）、拉姆西斯二世、太阳神阿芒（卢克索主神）、太阳升起之神哈拉克蒂。我一直挤到第一排，支起三脚架。一位埃及记者在我身后拼命乱挤，朝我大喊："嗨！老兄！让开点儿，我在给政府干活儿。"我用后背挡住他："对不起，我也在给政府干活儿。"

5点30分，我身后的神庙洞口出现橙红色的霞光，所有人都心脏狂跳，敛气凝神，生怕因自己不慎吓跑了即将露面的太阳。5点50分，一线阳光准时从狭窄的正门缓缓射进神庙，水平穿过三道大门和61米长的狭长隧道，排开洞内污浊的空气，一直射到拉姆西斯二世脸上、身上。阳光由弱变强，拉姆西斯沐浴在万道霞光之中，犹如金铸的金刚。阳光下，拉姆西斯二世面部立即有了生气：隆准上翘、嘴角下撇，紫色的眼角眯成一线，仿佛微笑着傲视芸芸众生。洞内顿时快门声响成一片，继而是"别用闪光灯""住嘴"等断喝。阳光缓慢右移，3分钟后照到太阳神阿芒脸上，接着是哈拉克蒂，但在他们脸上，怎么也看不到刚才拉姆西斯二世面部独有的神威。阳光从拉姆西斯脸上扫过，直到从哈拉克蒂脸上移走，全过程为20分钟，而坐在拉姆西斯二世右手的地狱与黑暗之神普塔一直待在黑暗里，享受不到一丝阳光。这一情况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过。尽管拉姆西斯二世已经死了3200多年，但他的神灵依然每年出现。

我大汗淋漓，几乎虚脱，用尽吃奶的力气才挤出洞外。蹲在洞口大口呼吸，迎着扑面而来的尼罗河风喘息不止。阿布森贝神庙前至少聚集了两三万人，正翘首凝神，贪馋地望着我刚刚逃出的洞口。我不禁得意地朝尼罗河大喊："我离拉姆西斯二世最近！"



我的耶路撒冷

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总让我魂梦系之，一个是枫丹白露，再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我喜欢枫丹白露是因为这个法文译名文雅、亮丽、宁静、温暖的色调令我怡然心醉；喜欢耶路撒冷则源于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每当我启齿念Jerusalem（耶路撒冷）这个字时，舌头在嘴唇、牙齿、上颌间轻微颤动，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快感。耶路撒冷正是一座在人们唇齿间频频颤动而震惊世界、孕育出三大宗教的圣城。在我的印象里，耶路撒冷同天国一样遥远，是普通人难以涉足的神奇之地，想不到我3年内4次住在耶路撒冷，双脚踩着耶稣曾经背负十字架走过的石阶。

1991年2月，我因采访海湾战争首次涉足耶路撒冷时，中国与以色列尚未建交。我落脚的大卫王饭店的花岗岩石墙古色古香，这座以犹太开国皇帝大卫的名字命名的五星级饭店在40年前还是英国驻巴勒斯坦殖民军的司令部，当时英军司令正在通缉一名“身高1.73米、瘦弱、肤色灰黄、黑发、棕目、鹰钩鼻、戴眼镜、坏牙、平足的波兰籍恐怖分子”，他用炸弹炸飞了大卫王饭店一角，刺杀了70多名英国人，他就是梅纳赫姆·贝京。40年后，贝京成了以色列总理，由于与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协议》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历史就是这样沧海桑田般变化着。

在历尽沧桑的大卫王饭店旁边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园中有个不起眼的石井，那是希律王的坟墓。希律王在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统治耶路撒冷。希律本是一位阿拉伯公主与伊杜美部落贵族的混血儿子，聪明而残暴，被古罗马大将庞培立为犹太王。因为先知预言上帝

之子在伯利恒降生，并将成为以色列之王，希律王下令杀死伯利恒所有2岁男婴，以免取代自己为王。耶稣的父母在梦中得到神谕，让他们立即逃走，才幸免于难。希律王在位期间重整耶路撒冷，加宽城墙、扩大圣殿。希律王死后的2000多年里，以色列主权沦丧，直到1948年联合国决定重建以色列国。今天的希律王之墓不仅仅是个文物，耶路撒冷市长科利克说："耶路撒冷老城圣墓教堂中殿地面有一个洞，古代人一直认为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的中心，而这个洞是中心的中心。"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时在希布伦禁寺两端祈祷，中间坐着两名维持秩序的以色列士兵，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争端。

由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宗教、经济、政治、军事、心理等诸多不可胜数的因素，耶路撒冷成为无可争议的同时获得神与人青睐的圣城。而以色列事实上成了世界三大宗教圣地的保管者，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使这个仅有300多万人口的弹丸小国成为国际新闻中曝光最多的国家。

三大宗教的圣地

马克·吐温游历中东后写的《傻子国外旅行记》中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想象约旦河有4000英里长、35英里宽……可它的实际宽度还不如纽约的百老汇大街。那里的加利利海、死海长宽均不超过20英里，而我在主日学校上学时想象中的这两个海的直径都在6万英里以上。旅行和阅历摧毁了最为雄伟的图画，夺去童年最珍爱的传说。"说实在的，耶稣受洗的约旦河最窄处决不比龙须沟宽，用一根竹竿就可撑着跳过去。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以色列"阿尔法"式军用运输机穿过烟雨蒙蒙的地中海，降落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大雨滂沱的跑道上时，就像加加林进入太空一样激动。当我扛着湿淋淋的行李、蹒跚着走出机场，在英、阿、希伯来文路标下撞上一队电视上每天露面的倒背加里尔步枪的以军，才确信自己真的踏上所罗门皇帝的国土。

战时特拉维夫上空的"爱国者""飞毛腿"大战引得我跟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爬上楼顶翘首长空，根本无暇拜谒70公里外的圣城。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的本-阿巴小姐从我踏上这块是非之地起，就每天一个电话地劝我从"飞毛腿"横飞的特拉维夫撤往"迄今还没扔'飞毛腿'的耶路撒冷"，好像人类永远造不出可以命中圣城的弹头。

刚住进耶路撒冷的希尔顿饭店，就跳出一位名叫奥丽特的接线员小姐，她热情地用汉语为我接通北京的电话，还主动邀请我约会，使一向猎奇的我惊喜之余又满腹狐疑：莫非碰上"摩萨德"的女间谍了？奥丽特很漂亮，她的两腿可真长，仿佛直接长在肩膀上，腰又是那么短，髋前上棘至十二肋仅容得下一根最窄的腰带。她是希伯来大学的研究生，业余时间到电话局打工，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在台湾大学学过汉语，最大的梦想是爬长城。从此，奥丽特成了我在耶路撒冷的导游。

圣城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犹地亚山之巅，海拔790米，面积160平方公里，居民主要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公元前3000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迦南人耶布斯部落从阿拉伯半岛迁来定居，在靠近泉水的易守难攻之处修筑营地，将该地区命名为“耶布斯”。耶布斯国王麦基洗德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希伯来语“和平之城”），修建了圣殿，而今天的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古德斯”，即圣城。



导游奥丽特小姐。

耶路撒冷分东西两区，西区是19世纪新建的市区，古老的东区集中了许多宗教圣迹。自始建以来，耶路撒冷老城已重建18次之多。公元前1049年，大卫王曾统治该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将其夷为平地；公元前532年又为波斯大流士侵占。此后，耶路撒冷相继附属于马其顿、托勒密、塞琉古和罗马帝国。公元636年，阿拉伯帝国打败罗马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开始统治耶路撒

冷。11世纪末，罗马教皇联合欧洲君主以“收复圣城”的名义，组织了8次十字军东征，建立耶路撒冷王国。1187年，萨拉丁大王在北巴勒斯坦的赫淀大败十字军，穆斯林重新控制圣城。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耶路撒冷一直受奥斯曼帝国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将阿伦比捷足先登抢占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地，耶路撒冷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凡尔赛条约》授权英国“托管”耶路撒冷。1947年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决定巴勒斯坦分治，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管理。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约旦占领耶路撒冷东区，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西区，并于1950年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在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逐走约旦军队，占领整个耶路撒冷。1980年7月，以议会将耶路撒冷定为“永恒和不可分割的首都”。1993年12月，我在开罗最后一次采访拉宾总理时，他还在重申“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对耶路撒冷的地位归属，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一直有争议，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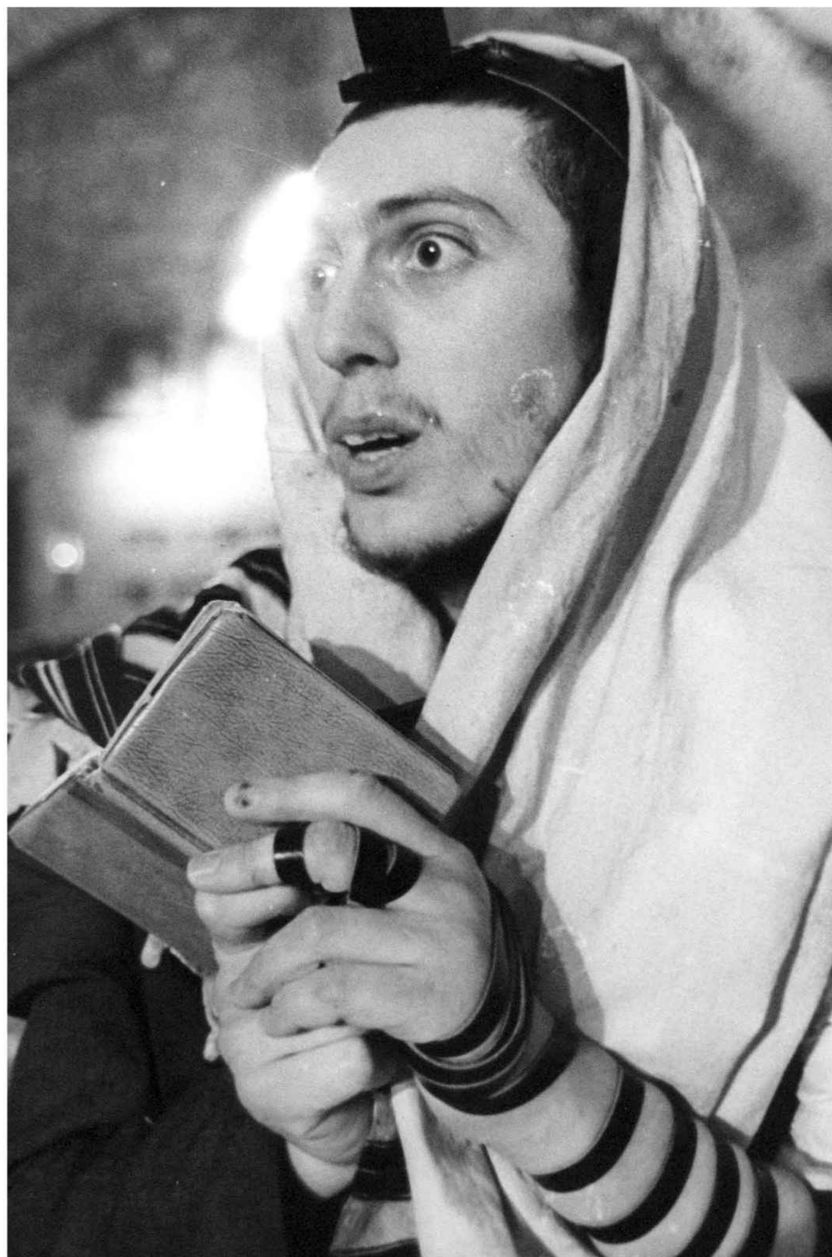
以色列人依据《圣经》和犹太法律千里迢迢地回到千年以前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把现住户赶走，说：“我祖先说过，我后辈有权享受这块土地，我按神的旨意回来了。”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承认其合法性，由此引发了当地居民援引《古兰经》和阿拉伯国家支援的圣战，一打就是几十年。三大宗教根据各自的传说，都将耶路撒冷奉为自己的圣地。自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锡安山顶修建第一座犹太教圣殿，这里就成了圣地。公元元年，耶稣生于耶路撒冷城南伯利恒，长大后在耶路撒冷传播福音，犹太教徒将其扭送罗马总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335年，罗马帝国海伦娜太后巡视耶路撒冷，在耶稣受难处建造圣墓教堂，因而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公元7世纪，传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52岁时的一个夜晚，随天使由麦加来到耶路撒冷，踩着一块岩石升上七重天，接受天

启。这段“夜行登霄”记载在《古兰经》夜行篇中，由此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圣地。

《新约》《旧约》《古兰经》提及的人物、事件在耶路撒冷都有相应痕迹可寻。西耶路撒冷锡安山大卫王墓旁边的“晚餐室”就是耶稣被钉死前夜与12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的场所。东耶路撒冷橄榄山顶的耶稣升天教堂，还遗留着耶稣死后3天复活并在此升天时的脚印。



犹太教宗教仪式：诵读写在羊皮纸上的《圣经·旧约》。



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哭墙下的圣殿读《圣经·旧约》。

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

奥丽特怎么也不肯进著名的大马士革门，尽管我反复阐明我对大马士革门神往已久，可她就是不干。因为那里聚居着阿拉伯人，她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永远别沾大马士革门。她说，那里的阿拉伯人肯定会朝她扔石头，除非她挽着我的胳膊装外国游客。按照传统她作为犹太人只走犹太人的加法门，我只得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

耶路撒冷老城由4个小区组成，其中东南区最大，我也最感兴趣。眼前一条条蜿蜒的小路通向沙漠，远近高低错落的民居、教堂、清真寺、墓地在阳光下变化着颜色。这里居住的全是阿拉伯人，狭窄的便道上是著名的阿拉伯市场，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军警不时穿行于平民之间。市场上出售的甘蓝、橙子、香蕉都是我平生所见最好的，2谢克（1美元）1公斤。金光闪闪的首饰店簇拥着举世闻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圣石清真寺。

阿克萨清真寺是仅次于麦加圣寺和麦地那先知寺的伊斯兰第三圣寺。“阿克萨”在阿拉伯语中是“极远”的意思，这个名称来源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那次神奇的登霄夜游七重天。我在东耶路撒冷的采访全仰仗日本记者村田，因为奥丽特死也不肯陪我东进一步。村田把我领到阿克萨清真寺正东的“卡斯”水池前，做礼拜前的“小净”。村田告诉我，伊斯兰教徒做礼拜前须先洗手、洗脸、洗肘、洗鼻孔、用湿手抹头、冲洗双足……这全称为“小净”。我紧跟在他身后“小净”之后，才扒掉臭球鞋进了高大庄严的圣寺。

该寺始建于公元709年，后几经翻修。主建筑高88米，宽35米，内耸53根大理石圆柱和49根方柱，设有神龛、木制讲台等，内部严禁摄影。

与阿克萨清真寺仅一箭之遥、位于圣殿山顶的是金顶清真寺，壮丽辉煌，以纯黄金片贴顶，阳光下金光四射，无比庄严。内置圣石一

块，据说当年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夜游至此石，才骑马上七重天的。

出阿克萨清真寺沿花岗岩小径拾级而下，经过昏暗狭长的花岗岩隧道，前面就是所罗门大帝第一圣殿的残墙，回首仰望，我发现阿克萨清真寺与犹太教哭墙仅一墙之隔，建在同一块地基上。我一直走向犹太教哭墙神殿底座，此时我的心好像承受着寒风苦雨，可仍安然自得地对着远山歌唱。

我大口吸着来自锡安山顶湿润寒冷的空气，微痛的喉咙立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我莫名其妙地咧开大嘴朝所有的人傻笑。

当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归来，也曾踏着这条小径拾级而下，当时他问以色列考古学家本-杜夫："当年耶稣真的在这里走过吗？"

本-杜夫答道："正是。"

阿姆斯特朗郑重宣布："我此时的心情比踏上月球时还激动百倍！"

穿过阿克萨清真寺西墙旁的一条花岗岩隧道，就来到了犹太教圣地——哭墙。公元前11世纪大卫王统一犹太各部落，以六角星为以色列国象征，定都耶路撒冷。其子所罗门，那个以钢锯巧断妇女争夺男婴案的聪明皇帝，高筑城墙抵御外敌，联姻埃及，用7年时间在锡安山顶建造了第一座犹太圣殿——所罗门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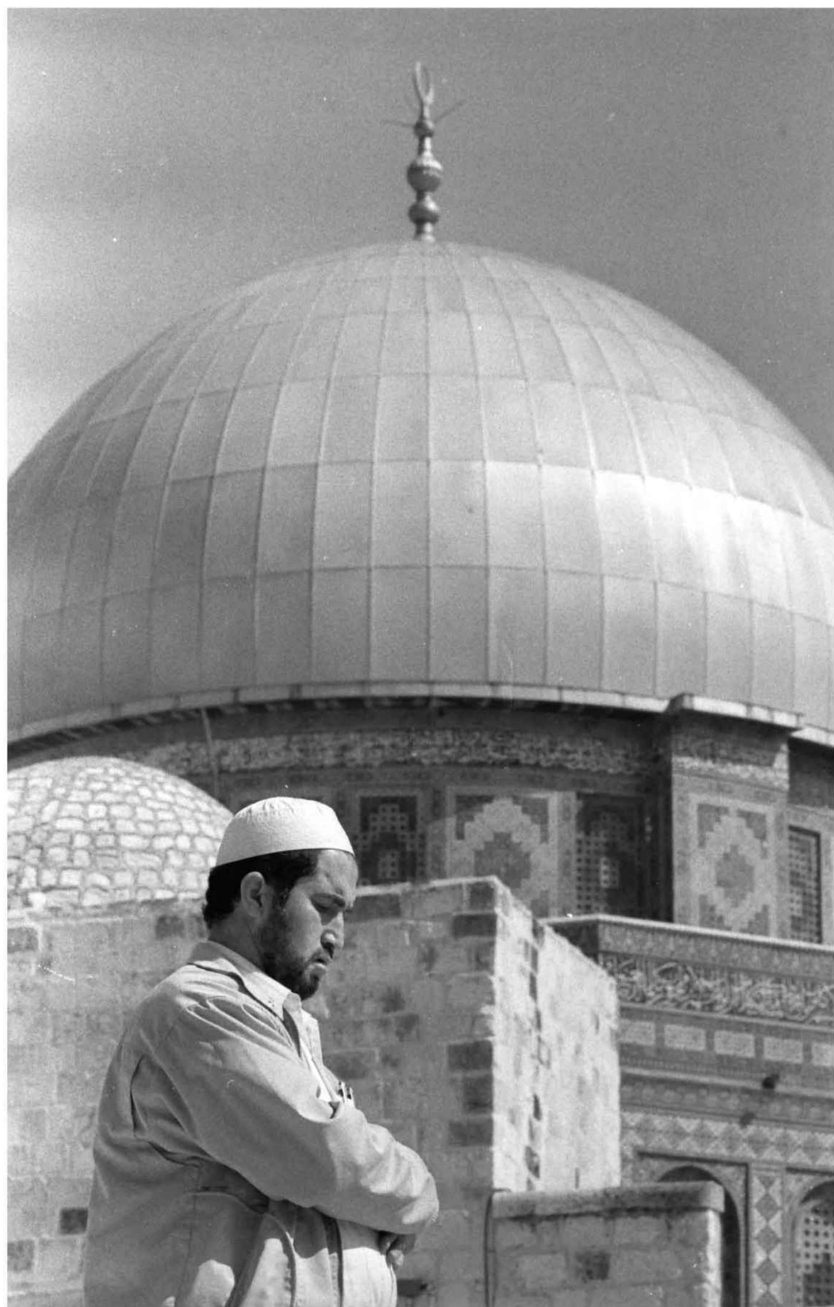
据《圣经》记载，所罗门圣殿长40米、宽13.3米、高20米。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时将第一圣殿付之一炬，犹太人将其重建后又被罗马人烧毁，阿拉伯人在此基础上修了阿克萨清真寺。

今天的哭墙乃是当年所罗门圣殿仅剩的一堵残墙，可犹太人将其视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哭墙长48.77米，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此号哭，寄托故国之思，颇似中国古代《诗经》所

抒写的黍离之悲。

至今，每逢安息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哭墙哀悼、祈祷，将写有自己的心愿的纸条塞入哭墙墙缝，以求神助。我亦将写有自己的心愿“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的纸条毕恭毕敬地塞进哭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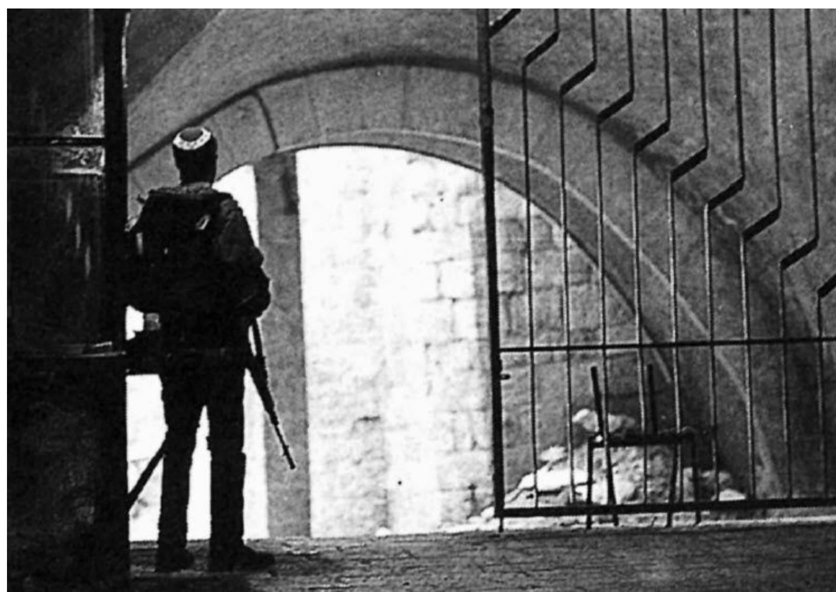
“哭墙”用铁栅栏把前来的男女一分为二，我与奥丽特小姐分别进入各自的群体，戴上拳头大小的犹太帽加入恸哭的人群。



以色列金顶清真寺。



哭墙下苦修的犹太人。



由阿拉伯人的阿克萨清真寺通向犹太人的哭墙之间的隧道，由以色列兵把守。

三个礼拜天

耶路撒冷城的所有路标和商业橱窗都以英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三种文字书写，耶路撒冷城的三个礼拜天——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分别为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休息日。准确地说，星期五是穆斯林的休息日，叫主麻日；星期六是犹太教徒的休息日，叫安息日；星期日是基督徒的休息日，叫礼拜日。同一座城中的不同人群，分别在不同的日子休息，这一点很令初来乍到者感到不便。

星期六是犹太安息日——“沙巴”。据《出埃及记》所述，上帝训示率众逃出埃及的摩西，犹太人应劳作六天，第七天休息，专事敬拜上帝，以此作为与上帝所立的盟约，凡亵渎圣日者，应处死刑。从安息日前一天黄昏开始，犹太街区的马路中央就被犹太教徒设置路障，以阻止汽车往来。此时，上至总理、部长、议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得步行。当然，这天“ELAL”（以色列航空公司，ELAL意为“向上向上”）的航班也绝对不会起降，就是大人物在安息日也不可乱说乱动。奥丽特小姐因在安息日陪我背相机上街拍照受到一群人的围攻，而我几次在安息日去约旦河西岸都是步行到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才能找到大巴士。1976年12月，拉宾政府由于在安息日到来前的黄昏主持了一个中队F-15战斗机的着陆仪式而引发信任危机，直至下台。安息日“沙巴”的耶路撒冷米希姆里区，虔诚的教徒顶帽束袍，跟着拉比（犹太教长）在狭长的街道上边行进边祈祷。

在美国官拜国务卿的犹太人亨利·基辛格出访耶路撒冷时，在一个“沙巴”之夜踱进一家小啤酒馆，要求喝两杯，可店主当即以“沙巴”名义拒绝。基辛格的侍从问店主，你难道不知道你拒绝的是超级大国的国务卿吗？店主淡然一笑：“我知道这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啤酒馆，可这里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哭墙西北犹太居民区辟有一处记录犹太人历史的遗迹陈列区。穿

过该区便是著名的大卫王塔。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著名的贤君，英勇善战多才多艺。他定都耶路撒冷，兴建耶和华神庙，钻研音律，南征北伐。《圣经·旧约》把他描绘成战胜腓利士人的英雄、编制献神颂歌的音乐家和诗人。今天扑克牌的黑桃K上，还保留着他抚弄竖琴的形象。大卫王墓得到极好的保护，棺木上盖着沉重的蓝色天鹅绒布，上绣巨大的白色大卫星（以色列国旗上的六角星）。



哭墙边祷告的人随身携带防毒面具。





1993年10月1日，以色列开始过“茅草节”，全国放假10天，人们住到茅草棚中以纪念犹太祖先摩西率众艰苦跋涉40年，经西奈回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狄斯街一名犹太人在茅草棚中背诵《出埃及记》。

初到耶路撒冷，我奇怪为什么犹太人家家门框上全钉着小木条，连五星级的希尔顿饭店也不例外。经奥丽特介绍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古老的门柱圣卷。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后将圣殿付之一炬，掳走大批犹大人，史称“巴比伦之囚”。至今以色列人一提伊拉克就咬牙切齿，更不用说萨达姆还三天两头地扔“飞毛腿”。继而罗马帝国的铁骑结束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长达1300年的历史，大批犹太人流亡北非，受尽埃及人的欺侮。据说，上帝为犹太人的苦难所感动，决定惩罚埃及人，降以十大灾难，其中一条就是杀尽埃及人的长子。上帝告诉犹太人首领摩西，让所有犹太人在门框上贴上门柱圣卷，以保他们的长子安然无恙，以后摩西率犹太人经西奈返回耶路撒冷。据《出埃及记》载，摩西遵上帝圣旨将羔羊之血涂于门楣之上，以便天使缉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之家即越

门而过，这便是“逾越节”的由来。

摩西之路

在基督教居民区，奥丽特带我沿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刑场的多洛罗萨路，看了耶稣见母处、耶稣墓和圣墓教堂。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伦娜太后所建，耸立于东耶路撒冷卡尔瓦里山顶。耶稣的坟墓和坟墓入口均在此教堂内，故基督教内部不分门派和所属教会，都把这里奉为圣地。

1943年12月，在中东作战的乔治·巴顿中将参拜圣墓教堂时，圣墓教堂由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和科普特教基督徒组成的小组联合管理，不知出于偶然原因还是共同的政治远见，看门人竟是一个穆斯林。这种惯例直到1993年9月我第四次赴以色列采访时仍未改变。当年巴顿将军钻进仅能容纳4个成年人站立的墓穴内，4个与巴顿将军同样高大的当地秘密机构的警卫也硬跟着钻了进去，巴顿在当晚的日记中对此揶揄一番：“在这样一个地方行刺，肯定不会成功。”50年后，我作为官方摄影师随钱其琛外长钻进墓穴时，4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警卫也躬身挤了进来，挤在墓穴墙角的我根本无法摆弄相机。



圣墓教堂内石板上的深红颜色据说是耶稣死后停尸于石板上留下的血迹。

圣墓教堂内的那块停放耶稣尸体的石板也是教徒顶礼膜拜的圣物，石板上的深红色的斑点据说是耶稣当年的血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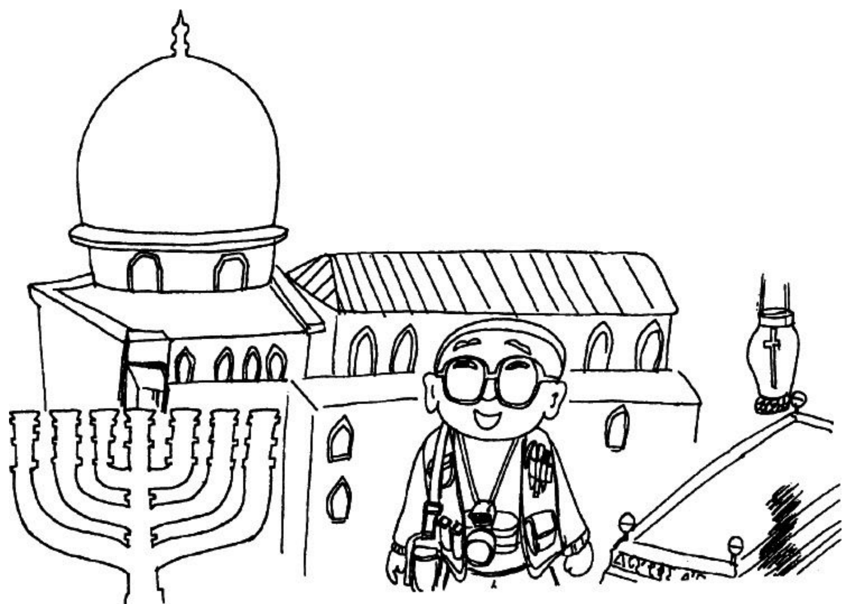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作为驻开罗的摄影记者，又数度前往耶路撒冷。但我早已失去战时的激情，对往返开罗-耶路撒冷的空中飞行也失去了耐心，驾车前往时竟无意中闯过边界，通过电台、电视、报纸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飞人”（Flying Man）。由此我最能理解耶路撒冷人开车为什么那么急不可待。今天，5分钟的路程也许要走5000年，这是我驾车沿摩西出埃及走的旧路渡红海、穿西奈、过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时悟出的道理。人生的乐趣就在定与不定之间。



耶路撒冷老城区的犹太人。

海湾战争期间，我头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奥丽特小姐把我领进距耶稣被出卖的朱斯马尼花园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岗岩建筑令我发出地老天荒的感慨。古老的石头，不变的色彩，永恒的宁静。我与奥丽特并排坐在圣像下，默默无言。我紧闭双目，享受紧张工作中短暂的宁静。万籁俱寂、天地纯洁，我能听到奥丽特小姐的心跳声。激动之余，我将当时的感受写下来发往北京，文章当天就登在了《参考消息》上，作为我海湾战争采访连载的一节。与此同时，我还接到上司的一纸弹劾，责问我把奥丽特小姐摆在哪儿了，怎么会听到她的心跳，任我怎么解释也不肯理解我所经历的神圣与宁静，因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险、紧张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将我的精神推至悬崖边缘，我在静谧中默默回忆历尽千辛万苦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过去，心中所有不快在圣像下化作一池平静的春水。自诩具有军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场的我也许将来会用全部退休金去买一群羊，过上摩西那种朴素恬静的生活。



我爱我妻

“买辆吉普！”

好多年前，残雪初晴的一个下午，在秦岭南坡一段泥泞难行的盘山路上，我与一位正在北大念博士的女孩跋涉而行。望着彤云散去彩云满天的山顶，这丫头突发奇想地问我：“有朝一日发洋财，你打算买什么？”举头仰望云端里的山顶，我不假思索地从泥沼中拔出右脚：“买辆吉普！”从那天起，拥有一辆吉普的梦想就一直残酷地折磨着我。

即使到现在，我还在顽固地坚持，只有吉普才是真正的汽车。劳斯莱斯的尊贵、凯迪拉克的气派、梅塞德斯的矜持、法拉利的奢华……已经把汽车糟蹋得不成样子。唯有吉普，坚固得像块高碳钢，简单得像枚鹅卵石，而其无所不能的综合效用却犹如一团烈火足以让任何汽车黯然失色。

几年来，我曾驾驶改装的BJ-212在海拔5000～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驾梅塞德斯-奔驰260E以210公里的时速在利比亚边境上飞驰去晋见卡扎菲，驾尼桑桑尼卡车徜徉于黑云压城的伊拉克街头，驾丰田陆地巡洋舰闯过以军封锁进入戒严的加沙，单人独骑从开罗到耶路撒冷，海湾战争中驾道奇羚羊大面包晨辞巴格达夜抵安曼，驾梅塞德斯200反复穿行于约旦河谷地，驾本田阿科德严冬翻越贝鲁特南黎巴嫩雪山，驾马自达929追随穆巴拉克横穿西奈，驾三菱大山猫参加法老沙漠拉力赛并以倒数第二冲过终点，随555富士车队在苏门答腊热带雨林拉力，参加“555”港京拉力赛用7天时间从香港跑到北

京，独自一人驾丰田科罗纳环绕美国……我还玩过外国朋友的宝马、别克、奥迪以及阿尔法·罗米欧、兰西亚、雪佛兰、波尔舍、沃尔沃、福特野马、兰德罗孚、欧茨谋彪、美洲虎、本特利……蹭过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嘎斯、以色列国防军的美式吉普、联合国军的悍马……随着阅历渐长，曾经沧海的我对吉普仍是情有独钟。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教养表现为可以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吉普，就是具有这种贵族气质的生命。

异想天开的丑八怪

1896年，德国人哥特莱伯·戴姆勒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它装有一台4马力内燃机和一个三速变速箱。两年后，美国温斯顿公司将一台单缸6马力汽油机装在货车上，这就是最早的卡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部队势均力敌在前方对峙，为扭转战局，法国“玛恩河出租汽车队”将法军奇迹般运至前线扭转战局，成了历史上第一支摩托化部队。卡车从此逐步取代骡马，成了军中不可或缺的装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今天，没有卡车的部队简直不可想象。

卡车的作用千真万确，可其庞大的车身在前线极易遭到炮火攻击。摩托车体小灵活，但噪音大、载重量小、安全系数低。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军方寻找一种更坚固、灵活、多功能的小型越野卡车。1938年，五角大楼拟定一份研制“低车身侦察车”计划，标新立异的美国人幻想制造一种重量不足半吨、载重1.25吨、短轴距、四轮驱动的轻型卡车。这种轻型卡车仅高1米，前风挡可以放倒，以便架设武器，向前方射击，宛若童话中的玩具。可当时连最具幻想的美国135家汽车制造商中，也只有两家对研制这种异想天开的丑八怪略感兴趣。

1940年9月23日，在超级设计大师卡尔领导下，宾夕法尼亚的班

特姆公司（Bantam，一家小厂）试制出第一辆样车。设计师以40公里的时速一气开了400公里，将其送到热带沙漠和沼泽地接受越野测验，又从一米多高的平台上飞驰而下……5500公里的破坏性驾驶使车底盘出现裂缝，可历史上还未有过如此禁折腾的汽车。美国军方对班特姆公司制造的这辆名为“布利兹帕奇”的小车的简洁、坚固、灵敏、耐久性大为称奇，当即将这辆标新立异的样车公布于世。毫无疑问“布利兹帕奇”对当时美国汽车制造业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

两个月后，威利斯-奥兰多公司造出两辆名为“夸德”（Quad）的可选择两轮驱动或四轮驱动的车型，紧随其后福特也推出了类似车种。军方将班特姆、威利斯、福特三家公司的优势集中起来，开始批量制造。

定型的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吉普车”（Jeep）装有一台4缸汽油发动机，载重1.25吨，结构简单坚固，性能齐全。由于装有分动器，可以四轮驱动越野行驶，爬60度陡坡，涉越小河，其公路最大时速可达105公里。

在军事上，吉普很快被当作多用途效用装备使用。它的英文名字G．P．就来源于英文多种用途“General Purpose”一词的缩写。吉普除运送人员和武器弹药外，放倒前风挡便可装上重机枪或无后坐力炮，装上电台等通讯装置就成了火线指挥车，稍加伪装可充当侦察车或当作轻型战斗车辆直接投入战斗，安装担架用于战场救护，装上装甲充当轻型装甲车伴随坦克部队作战，装上螺旋桨推进和防水外壳作为两栖登陆车使用。其超过额定要求的大马力发动机还保障它拥有拖拉机才拥有的牵引力。

我在埃及听说过一个故事，说西奈一位放骆驼的贝都因人在沙漠堆中挖出一辆当年美军废弃的吉普。这位老兄用骆驼把破车拖到了阿里什，经过简单清洗再加满一箱汽油后，竟能开起就走。其神奇的坚固性可想而知。

赢得战争的武器之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地记者把吉普车说得无所不能：“它像狗一样忠诚、像骡子一样强壮、像羚羊一样机敏。”五星上将马歇尔把吉普说成是“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贡献”。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把吉普列为“赢得战争的三大武器”之首。麦克阿瑟把吉普开到登陆部队的最前沿。最富传奇色彩的第3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把红色皮椅拧在吉普上，在车身上漆上自己的将星、装上高音喇叭和警报器，从北非一直开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因吉普车祸撞死在德国境内。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撇开劳斯莱斯改坐吉普，馋得利比亚总统巴克利羡慕不已。利比亚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两位总统坐吉普的纪念邮票。

1942年，阿拉曼战役前夕，北非的英第7集团军组织了一支吉普突击队，以90公里的时速在沙漠中昼伏夜出，专门袭击隆美尔的补给线，屡屡得手。同年“醋乔”史迪威借助吉普车穿过雨林，把中国远征军的几个师和一帮七长八短的战争难民传奇般从缅甸撤至印度。1943年，“哈斯基”作战行动中，巴顿的美7军攻入西西里，在靠近墨西拿海峡的一个小山村，贫困的山民正为榨油机发生故障断了生计而走投无路。美军当即拨出一辆吉普，一位机灵的学生兵将吉普引擎的发动装置连在榨油机上，5天榨出44吨橄榄油。美国兵还将吉普车的前轮抬起，用帆布带将前轮联结一台轮式锯，用吉普做动力带动轮式锯锯木头，西西里山民把美国兵当成一帮用吉普车变戏法的流浪汉。

在北非，吉普车成为美军的身份卡，“G．I．”（美国兵）、“G．P．”（吉普车）密不可分。突尼斯人一直以为美国兵在领取身份识别牌和军装的同时也配发了吉普。一天深夜，值勤的法国哨兵突然向一帮步行的美国兵开火，尽管对方一再声称是美国人，可法国哨兵就是

不信："如果是美国兵，他们为什么不开吉普？"

战地记者们发现，一线士兵对吉普的感情远超过艳星莲纳端娜。因为当艳星玉照趴在墙上飞媚眼时，吉普车正忠诚地与士兵浴血奋战，大兵把吉普车看成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活人，麦克阿瑟手下一辆在太平洋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吉普车因为负伤而荣获紫心勋章。

无论进攻还是撤退，吉普开到哪里，胜利便接踵而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把60万辆吉普装入板条箱运往世界各地，吉普被列为《租借法案》发往反法西斯盟国的头号战略物资。为了显示吉普神威，参议员米德干脆亲自驾驶吉普在国会山的花岗岩上表演爬台阶。进入70年代末，美军选用MI51　Mat取代威利斯洋洋自得了半个世纪的吉普，但毕竟由于吉普在轻型越野性能方面的独特品质，而至今在汽车史上占一席之地。

早在1950年6月13日美国威利斯公司将"Jeep"作为注册商标之前，"吉普"这两个中文字已成为中国人对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辆的简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吉普成了从滇缅中国远征军宋希濂到故事片《红日》张灵甫，以及《南征北战》张军长、李军长的必备之物。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乘坐吉普从延安打进北京城的。1958年，长安机器厂模仿美国CJ-5生产长江吉普。1964年，北京开始综合ΓA367、69，研制"BJ-212"。"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多次乘BJ-212检阅红卫兵。此后，"BJ-212"一度是中国大陆县团级干部的身份标志。

1984年1月15日，由北汽摩分化出的合资公司——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次年9月22日轻型吉普2021系列切诺基下线，与此同时，BJ2020S系列面市。BJ2020S系列发动机设计原理较旧，化油器水平低，油耗大，轴距过短，操作稳定性和制动性差，密封不好，悬挂较硬，但价廉且维修方便。2021系列切诺基基于1974年设计产品，发动机压缩比偏高，对燃油要求高，化油器水平低，一般评价认

为其性能落后于日本同时代产品。

冷钢的遐想

自从那年冬天在秦岭领略吉普爬山的英姿之后，美妙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在警察学院学驾驶时，我一再要求学吉普，可最终学了卡车，因为驾校没有吉普，而卡车性能接近吉普。1989年山西地震，我以一辆“大发”星夜从北京赶赴震中，沿途每遇坡崖沟壑，都为没有吉普而痛心疾首。尽管如此，我仍是第一个抵达震中的记者，我的图片和现场报道不仅占据了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国内报刊头版，还被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同时刊用。

1990年，我加入由几十辆越野车组成的可可西里探险队，从西宁沿青藏公路经格尔木、西大滩、纳赤台、昆仑山口、五道梁，在沱沱河兵站拐下公路直取长江源。北京吉普咆哮着冲上通天河，坚冰在车轮下隆隆作响。虽已是6月，可在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仍是大雪纷飞。高海拔、严寒、缺氧、干旱、辐射、风沙，复杂多变的气候造成举世罕见的高寒荒漠景观，格拉丹冬雪峰傲然耸立，铅灰色的冰峰闪着沉重的寒光。循着倒毙的野牛尸骸蜿蜒而行，乌鸦在紫色的天空滑翔，秃鹫趴在巨大的野牛头骨上虎视着我们的吉普车队。由于缺氧，我们全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红细胞增多症，原来75马力的北京吉普此时输出功率不足40马力。炽热的阳光穿过吉普风挡，强烈的紫外线将我的脸晒脱一层皮，用手一抓便纷纷扬扬。我的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为止痛我不时把脸紧贴在冷冷的车窗上，吉普的冷钢激起我的无限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勇敢者出不了事

海湾战争期间，我辗转中东各国5个半月，在烽火连天、沙漠万顷的中东，吉普是我出入战区的唯一工具。沙特王室似乎对三菱山猫

情有独钟，伊拉克陆军更倾心于尼桑巡逻兵，约旦哈希姆王朝仍坚持用英国的兰德罗孚，埃及总统卫队则是清一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以色列国防军大量使用美式雪佛兰大吉普，而美军却使用8缸6.2升柴油风冷引擎载重3吨的悍马。

随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欧洲梅塞德斯、兰德罗孚、兰奇罗孚、美式吉普正让位于亚洲吉普。亚洲的新型丰田、尼桑、三菱、现代、起亚等品牌线型排列6缸、V型排列6缸和水平对置排列式发动机成批制造着更优质的吉普。

亚洲轻型越野吉普车的品牌已不胜枚举。韩国的起亚（KIA）、现代（Hyundai）、双龙制造了大批性能价格比极优的吉普。其中起亚Sportage已被世界拉力赛列为“0”“00”赛车，承担为雪铁龙ZX、丰田Celica、三菱Calant VR4、三菱Lancer EvolutionIII、富士Impreza等著名四驱车开道的先导车。此外，日本微型铃木（Suzuki）的VITARA V6、五十铃（ISUZU）的Trooper，亦以物优价廉闻名。但综合性能执牛耳者，仍首推丰田陆地巡洋舰（TOYOTA LAND CRUISER）、尼桑巡逻兵（NISSAN PATROL）和三菱大山猫（MITSUBlSHI PAJERO）。丰田陆地巡洋舰4500采用线型直列六缸4汽门发动机，排量高达4.5升，被选为中东联合国军停战监督委员会UNTSO制式装备。尼桑巡逻兵采用同样原理的发动机，排量为4.2升，而三菱大山猫（欧洲出口型为MONTEO，意为将军），则采用V型排列6缸3升发动机，该型已屡屡在“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中夺冠。



1990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

与此同时，美国印第安纳AM　General生产的M998悍马，则为当今越野车又一革命典范。该车长4.58米，宽2.16米，高1.83米，整备重量3498公斤，采用排量6.2升8缸风冷柴油发动机，底盘高0.41米，轮距3.29米，最高时速105公里。可爬60度陡坡，涉水深度0.76米，该车采用中置式发动机，尽量提高底盘与地面间距离，装有车胎充气中央控制系统等令人咂舌的装备。它的军用型在海湾战争中大显神威，其民用型仅硬汉影星施瓦辛格一人就买了5辆。



驾“长腿跳鼠”从以色列采访大选归来。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调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在我辖区广袤无垠的沙漠上，以色列的达扬、拉宾、沙隆们运用吉普在五次中东战争中所向披靡。上任伊始，在战争中领略了吉普忠勇的我，发誓让新华社中东分社奔驰轿车群中出现一辆属于我自己的吉普。以1.9万美元买来的一辆三菱山猫使我美梦成真，虽说4缸2.4升的排气量对我来说小了点，但毕竟是车库中十余辆轿车中唯一雄性化的动物。半年后，我说服新华社领导将其换成了一辆6缸4.5升排气量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不想这种车一运回中国就被称为“沙漠王”，这让我平添几分厌恶，因为我这人素来对王侯将相权威倾国者敬而远之。以后发现尼桑赛德里克（Cedric）在中国叫“公爵王”，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日本共同社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赛德里克是古希腊一位美男子，位及公爵，国人好色之余更看重爵位，干脆百尺竿头再“封”其为“公爵王”。这也许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特色吧。多年来我一直坚信，大吉普的排气量就像老祖母的年龄，越大越安全、越慈祥、越可靠。



在中东，驾第一辆吉普车三菱山猫，第一次见到金字塔。

每说到我的大吉普我都忍不住泪珠潸然，她是我在中东唯一同床共枕、历经生死的伴侣，我叫她“长腿沙漠跳鼠”。她与我的尼康相机被列为我的“一妻一妾”。买她的头一个月，我就开了1.3万公里，从开罗跨过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奈、穿越加沙地带一直开到耶路撒冷。直到以色列南方军区动用M-113装甲车和AH-60“黑鹰”直升机才在阿什克隆终止我和我“爱妻”的蜜月旅行，我和我的长腿跳鼠的蜜月之旅由此上了法新社、路透社、《埃及华夫脱报》、《约旦时报》、《以色列消息报》1992年6月22日的头条。追踪突发事件之余，我的大吉普是当地最出色的导游。在我任职期间所有访问开罗的大人物都慕名乘我的大吉普进沙漠兜风，一睹胡夫金字塔风姿。政协副主席吴学谦、《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北大校长罗豪才……都曾是我的车上客。张百发对中国驻埃及使馆文化参赞郑重宣布：“全埃及的活动，只有唐老鸭和大吉普最有意思！”

我的大吉普一旦折叠起后座就成了新华社中东分社载重量最大的轻型卡车，为此我成了中国使馆常抓的卡车车夫。连中国驻伊拉克武

官曹彭龄调任埃及，也是我驾大吉普跨过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奈半岛，到约旦、沙特边境接来的。



驾CJ3吉普采访西奈巴列夫防线。

我的长腿跳鼠从未背叛过我，可我对她的爱意已变态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每当出差短暂分别，我都将她开到车库尽里边的死角，再拆掉她的电瓶连线、电路保险，以免他人染指。别人开我的车比开我更令我难受万分。在我的长腿跳鼠前后风挡上，分别是我手绘的手持相机狂奔的唐老鸭和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 News Photo”（新华社新闻摄影），还有我宿舍的电话号码，以此控制以开罗为圆心、2000公里为半径的突发事件。在我的长腿跳鼠的遮阳板上，我写了一段硬汉海明威的狂言：“勇敢者出不了事。如果你是好样的，出了倒霉事全怪你自己。”我已经无法回忆多少次我和我的大吉普陷在沙漠中，被恐怖分子围追堵截、被士兵扣留、被难民包围……为了自我保护，我的前风挡上贴了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拉宾、曼德拉、加利的合影，我说得最熟练的一句阿语是：“安拉最伟大。”

职业冒险之余，我喜欢驾大吉普探寻无人涉足的沙漠小径，体会妙不可言的冒险乐趣，在干涸的河床上露宿，让滚烫的浮沙埋过我赤

裸的躯体，洗去长途驾驶的疲惫，体会母亲怀抱的温馨。

在开罗，几乎所有摄影记者开的都是吉普，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时代》周刊的断腿巴利、法新社克里斯蒂安、路透社阿莱……我们还组织了英雄美酒俱乐部。

好好爱这无言的战友

直到现在，每逢金乌西坠，我都会变得魂不守舍，仿佛又变成一只沙狐，又回到金字塔西侧那片大沙漠。眼前总是一片金黄，一切全都凝固，没有声音也没有风，我坐在大吉普的引擎盖上，从汽车冰箱中摸出冰镇啤酒，遥望远方成群的撒哈拉沙鸽在晚霞中追赶沙漠落日，享受追赶新闻间的短暂宁静，默默体验天涯客的孤独，想象母亲花白的头发在炊烟中飞舞。

我爬下大吉普，在侧逆光的阴影里左右端详与我朝夕相处的“长腿跳鼠”。落日余晖里我的“长腿美人”不断变化着色彩，笼罩在神秘的红光紫雾之中，撒哈拉沙漠上拖着她长长的倩影，像玛丽莲·梦露在阿拉斯加封冻的育空河畔舒展玉腿……战斗、挣扎、死亡，反反复复永不休止。醉眠中我看到汉尼拔的纵队、马木留克的骑兵、拿破仑的方阵、隆美尔的坦克随着我的大吉普滚滚而去。我平端着尼康相机，在300mm镜头中看到我自己：在驾驶学校钻研吉普，在秦岭林海追熊猫坐吉普，在青藏高原探险开吉普，在海湾战争中往返“巴格达-安曼”还是吉普……



离职回国的那天凌晨，我和驻埃及武官曹彭龄将军最后一次将大吉普开上金字塔西侧的沙丘之顶。曹不仅是我北大的校友，还是海湾战争中我在巴格达结成的刎颈之交，也是在开罗唯一理解我心志的中国人。与大吉普耳鬓厮磨之后，我最后亲吻了我的“长腿美人”，在她的右风挡遮阳板上，我用黑色记号笔留下最后的爱意：“老兄，好好爱这无言的战友，她到过海湾，还挨过恐怖分子的石头……她有生命，勇敢忠诚，从不妨主。”

此车1994年1月奉调回国，后归新华社青海分社所有，与我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直到2001年7月24日，《北京晚报》汽车版发表了北大考古系教授齐东方的《唐老鸭吉普奇遇记》，我才再次获知“爱妻”的消息。齐教授称，他到青海都兰考古时邂逅一辆深陷河中的大吉普，爬上去一看，上面写着“如果你是好样的，出了倒霉事全怪你自己”。再看遮阳板，也密密麻麻地写着些字：“老兄，这车挨过加沙的石头，被以色列直升机追了50公里，穿过撒哈拉沙漠，被埃及恐怖分子袭击过……还到过海湾。这东西有生命，能逢凶化吉，是新华社中东分社唯一未出车祸的。请善待它。1993.12．开罗。”左侧还用红笔大字写着“勇

敢者出不了事”。

齐教授在文章中写道：“看到这熟悉的口气，我立刻想到唐师曾，莫非这是他开过的车？问记者，果然如此。这辆车还在服役，目前属新华社青海分社所有。这车是日本丰田牌，越野性能极佳，有‘陆地巡洋舰’之称。不过它的命苦，跟唐师曾在中东服役后，又发配到青藏高原……遗憾的是‘巡洋舰’再也不能表现出唐师曾描绘的那般雄风，遇到第一条河它便深陷进去，尽管它咆哮发狂，仍没冲出河滩。难道它老了？当年的威风何在？望着这曾经征战沙场的汽车，竟然在小沟里翻了船，我只好带着一丝怜悯来表示敬意……车如其人，我不由想到素未谋面的唐师曾，听说他患病住院，正如这辆发配边疆的英雄车。”



驾雪佛兰开拓者，背负前妻的“遗骸”穿过西夏王陵返回北京。

看到这篇文章，我心如刀绞，立即联系在青海地质队工作的朋友霍云，让他抽空帮我照看一下我的大吉普。霍云的回话让我坠入冰海：“你的大吉普出了车祸，粉身碎骨，被青海分社卖了废品。”我当

即大哭一场，痛责自己没能为“至爱”收尸。我甚至怀疑大吉普是因为思念我而故意坠落山崖的。

又过了一年，2002年8月，我驾雪佛兰开拓者途经西宁，头一件事就是向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党周打听大吉普下落。党周曾与我同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活4个月，情同手足，下令“一定要找回唐老鸭的大吉普”。司机齐师傅说，知道老鸭重情重义，处理废品时，特意留了残存的轮毂和车顶支架，等我来寻。

“出事那天，大吉普从德令哈返回西宁，司机酒驾，翻下悬崖。说也奇怪，尽管摔得七零八落，整车报废，可就是没伤人。”

我把大吉普的遗物捆绑在雪佛兰开拓者的车顶上，一路把它们背回北京。尽管乌黑冰冷的钢铁没有生命，可它们却有灵魂。

“长城-金字塔”在召唤

近几年来，我除奉命在神农架原始森林追拍野人一年多之外，基本赋闲。外语没地方用，车技也荒废了许多，老朽垂死，陷入沉寂无声的绝望之中。男人一旦失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没办法给他补充。

经验告诉我，在地球上努力保持自我虽然痛苦，但未必是坏事。尽管造物主希望世界上的人类形形色色花样越多越好，可人类自己在疯狂杀戮各种动植物的同时，也拼命消灭自己同类中的各色者。办公室像架庞大的水泥搅拌机，每天把水泥、石子、沙土、石灰……搅拌在一起，铸成一团什么也不是、可坚硬无比的废物。把一切有生命的有机物，变成无生命的无机物。分不清谁是水、谁是泥。邻居家的窗户飘出的舒曼钢琴曲总让我魂不守舍，探首窗外，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类生命、心智、情感的唯一源泉。生命在于运动，我渴望大自然。

中东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一方土地，具有创造三大宗教的超自然神力。如果有人现在对我说昨晚外星人把胡夫金字塔从开罗搬到了耶路撒冷，我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中东。

海湾战争之初，我辗转千里从巴格达赶到耶路撒冷，夹在虔诚的犹太人中间把写有自己宏愿的纸条塞进哭墙：“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从此开始了我的中东摄影记者征程。也许是冥冥之中众多神灵的庇佑，种种不可思议的机遇使我有幸亲临一些耸人听闻的地点，接近一些世人皆知的人物。

1993年，我结束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工作时，突然萌生驾我那辆历经战火的大吉普自金字塔出发，经开罗、塞得港，跨过苏伊士

运河，经西奈、加沙、贝鲁特、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杰拉石、贝特拉、安曼、巴格达、巴比伦……返回万里长城下的北京的梦想。中国驻埃及公使程远行、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对我的狂想大加赞赏。一向沉稳的新华社以色列分社社长也在我的计划书上签名，表示坚决参加。因为他和我还有我的大吉普都将在1993年12月底期满回国。我向上司解释说，这样不仅可以省两张飞机票和一辆大吉普的托运费，还能采访到许多一流的“重大新闻”。可我的上司不支持堂吉诃德式的远征。

回国后，我出版了萧乾先生作序的《我从战场上归来》，还一口气在《世界博览》上发表了十几篇中东见闻，承蒙读者不弃，许多文章还被一些大报大刊转载。许多忠厚的好心人写信给我，告诉我千万不可住笔，由此再次激发了我“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宏愿。



坐回到北大图书馆，我仔细研究了这一宏愿的可行性。首先，中国与中东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金字塔尼罗河、耶路撒冷约旦河、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泰姬陵恒河印度河、长城长江黄河……其次，中国与中东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第三，中国和中

东有深厚的传统友谊，河南开封自宋朝就有犹太人，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无条件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度。中东各国历来对中国友好，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第四，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有中国人最具备横穿中东的政治条件。我在中东时的一些白人记者朋友把我屡屡出入的一些国家视为禁地，而我黑发黄脸却从未碰到过真正的危险。

我除坐享上述“我是中国人”的优势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我是身强力壮光棍一条，曾在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雪山抓过大熊猫，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探险，在海拔-406米的死海游泳。第二，北大国际政治系、北京警察学院驾校、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使我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技能。第三，从“飞毛腿”横飞的海湾战争到中东缔造和平的3年里，我有幸经历了全过程。此外，我是唯一单人独骑横穿埃及、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并顺利完成各种采访的中国人。我曾与加利并肩在科普特大教堂做圣诞弥撒，在卡扎菲帐篷中做客，和阿拉法特勾肩搭背，吃了拉宾的石斑鱼，与伊拉克总参谋长兼共和国卫队司令拉维同桌共饮，被以色列总参谋长巴拉克称为“最喜欢的人”，当了两年穆巴拉克总统府摄影师，独家获得伊朗政府新闻采访签证……第四，先后在《世界博览》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幅照片、几十万字文章，承蒙中外读者抬举，经美国的电脑网络输入后更加谬种流传，在伊拉克、以色列、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受到欢迎。第五，我在中东结交的一大帮朋友会给我的梦想开绿灯。

接下来的情况令人感动，先是《世界博览》的一位拉美华侨读者自愿解囊相助，继而山东一位中学生省下半年早餐钱共166元寄到《世界博览》编辑部转我……对于这些好心人的好意我唯有坚辞退回原处、更奋力笔耕而已。接着，中国银行海外部总经理朱华先生约我到香格里拉，详谈资助，据他说三菱银行是中国银行的重要客户，三菱吉普可以出车供我远征。只可惜我的主管上司非要中国银行先把

300万打到新华社新中国图片公司账上，由此弄得泥牛入海，让挺高尚的出使西域以铜臭冲天而夭折，使我平添岳武穆奉诏一别朱仙镇，“惊回千里梦，起来独自绕阶行，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



1993年1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忧心忡忡地赶到开罗自己祖上的科普特教堂，为混乱的世界局势做圣诞弥撒。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办埃及节目时，同在金字塔下喝过酒的辛少瑛导演让我帮忙准备一下。我推荐了我在埃及的一帮朋友：驻埃及公使程远行、驻埃及文化参赞王贵发、国际台记者马为公、我开罗的新华社同事水均益。旧友重逢，重又勾起我梦系魂牵的中东情结，现为国际台新闻部主任的马为公仍像老大哥那样提醒我要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酷似以色列名将阿里尔·沙龙，“熟知如何同阿拉伯人作战，却不知如何同犹太人相处”。我说我不怕，我绝无仅有的经历是无法剽窃的。小水说他能帮我拉赞助，我感激涕零地感慨道：“水性的女人心最难测，水姓的兄弟情最坚贞。”当年，我从炮火纷飞的以色列撤下来，假道埃及回伊拉克前线，在开罗滞留了两夜一天。当时我衣衫褴褛精神濒于分裂，像只家

园被火山吞噬的大猩猩。素昧平生、仅在电脑前编辑过我写的“飞毛腿”稿子的小水和我一见如故，喝了两夜啤酒。他还弄来一辆蓝奔驰，把我带到尼罗河西岸的露天酒吧饱览夜色，樽前共叙弟兄情，拿尼罗河当易水，风萧萧兮为我送行，使我紧张的神经在斯代拉酒精麻醉下短暂松弛。他当时好像不很开心，酒后大有乘风西去之意，果然日后凤栖梧桐去了中央电视台。



吉萨大金字塔。

报刊读者数以万计，可电视观众是以亿计算的。战争期间，我的头像登在《人民日报》上，成了纸上的英雄而有脱离群众之嫌。现在又被电视们一访，把头伸进人家窗户大谈各种冒险。于是各路朋友接踵而至，先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中国代理戴天鸣老板对我的“长城-金字塔”大感兴趣，只可惜本田只出轿车而从不造大吉普。接着有人送我一辆旧吉普，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免费帮我把这辆吉普整修一新，旨在勉励我为中国人争光，早日踏上西去之路。北京切诺基的几位朋友也有意参加，可这些汽车都无法达到初驶里程10000公里无故障的标准。

使我的美梦从空想到科学的是原北京电视台台长，曾任北京有线电视台总编辑的裴有权。这老兄年轻时也是个不要命的摄影记者，既属同行，又是前辈。听说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自然喜出望外，大有提携后进之意。几经点拨，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文化意义。裴老总称，“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费用不必我管，我唯一要做的是撰写一个每集20分钟、共20集的电视剧本。无奈我生来一个尖屁股，对横冲直撞地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就怕坐在屋里“策划”，能力不足之外，还总觉得“策划”一词离阴谋不远，都是我被别人阴谋策划怕了。北京有线电视台影视部年轻有为的主任周林，自己掏腰包请我喝了三顿酒，旨在让我酒后意气风发将脚本一挥而就。可我每饮必醉，醉而不醒，所以脚本至今还没写出来。因而我的经费也始终没有到位，不知是否有人愿意资助而不必经过令我头疼的繁文缛节。



驾丰田大吉普在金字塔前。

有人劝我不要去冒险，可哪知对我而言，没有危险的生活不会有生气，危险和恐惧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人生经历远比所有书本

上的道理伟大、重要得多。我们不必盲目忠于那些我们本来并不了解的人和事，像只绵羊亦步亦趋。持续的和平生活让我闲肌难耐，任何人为的善意阻拦都动摇不了我心中的“长城-金字塔”。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给国政系丢人现眼

1998年2月28日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北大往事》首发式上，我正神气活现上蹿下跳围着季羡林先生拍照，突然脑后飞来一掌，原来是宣传部赵老师，命我10天之内作文一篇，献给母校百年华诞。谁都知道我这人既无文采，更无寸箭之长可献，上学时异想天开四处叫嚣世界大战，只给国政系丢人现眼。环顾左右学长师兄，众目睽睽已无法遁形，只好领命。可回家思前想后搜肠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笔。一直到现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饿，那时候每天晚饭吃5个馒头还顶不到晚上10点，跑回宿舍发现挂在床头毛巾口袋中的馒头被同屋的饿狼吃了，仅剩下搪瓷饭盆空空如也。于是我自己也像觅食的猛虎悄然潜行，见别人桌上有什么吃什么，连大茶缸里的凉水也不放过。

现在的大讲堂当时是大饭厅，名曰饭厅可连一张桌子都没有。3000多人都蹲在地上鸡啄米般地进食，场面十分壮观，遇有人行走飞沙走石拖泥带水也没人叫唤不卫生。大饭厅西北角承受圆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砖头掉了，露出一尺见方的窟窿，是我藏饭盆的地方。那时大饭厅连存饭盆的地方都没有，所有学生不知为什么都用毛巾缝个口袋，装上吃饭的家伙，装在书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当当地四处乱走。据说这源于大革命中的串联，属于我军光荣传统。当时79级以上的学兄学姐大多上山下乡经历过大革命，令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万分景仰。偏偏我们37楼432与434一脉相通是个大套间，乌压压12条汉子几乎都刚离开高中不久，啸聚山林与兄姐们分庭抗礼，自称“西部财

团”。为安定团结，系里调了一位二十五六岁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铺，加强党的领导。

这老兄名叫王青松，来自河南信阳，原是地委机要干部，现为我班团书记。举手投足透着大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他也时不时地与民同乐，甚至和我们比赛俯卧撑，可总是不得要领有些隔阂。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归宿，窸窸窣窣弄上半天，洗脸烫脚悠然而睡，天长日久犯了众怒。先是有人在门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后加码到一盆凉水。人多势众争强斗狠，最终将学校发给每人一个的12个方凳同时翻过来，48条腿一齐朝上码在地上，我身居上铺负责拆去管灯憋火，黑灯瞎火摔他个鼻青脸肿，他也不急。

当时沈仁道老师还未调到北京市当政协主席，仍在国政系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讲到选举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偏巧这时团支部改选，各位同学半开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主，不想真把他选下去了。事后我们都挺后悔，觉得玩笑有些过火。

几年后，我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学校请来一位门徒200万的“石松大师”传授气功，大师一口气下去从书记到校长上千人满地乱爬。我闻讯忙背上相机赶去拍照，不料大师竟是王青松。他站在台上高声断喝：“众徒儿散开，来人是我同学。”还是那口信阳乡音。言罢把我拉上台握手拥抱，让信徒们万分羡慕，感动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卡帕转世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的，“师曾参之孝”全为我那90多岁的爷爷。我爷爷兄弟俩全是戊戌变法由秀才举人摇身一变进京师大学堂的，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仕学馆，爷爷毕业于文科中国文学门。他教导我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勇敢诚实、科学民主、济世救民……就是失业找工作也比别的学校毕业生容易。在爷爷高瞻远瞩的监督

下，在填志愿时我写上了一句“服从北大分配”。其实当时我更想报考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生一样，幻想当个巴顿、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师长。为能和爷爷历数的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着牙进了北大。

开学头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拍照传统，60多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创建中国第一个摄影团体——“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庙前，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欧战成名的名记者萧乾就是他的门生。在北大37楼432宿舍的棉被里，我用饭盆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国际政治系，我始终算不上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谲诈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历史系罗荣渠、国政系王炳元的战争史我最感兴趣，偶尔还跑到红山口的军事学院去偷听。好在北大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干什么都没人管，各班没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这样不务正业的流寇四处乱走，边走边听。1992年在班加西，我与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为我在北大读过他的《绿皮书》。天长日久校园内渐有虚名，物理系79级一位姓黄的学兄慕名而来，和我探讨航空母舰的前甲板，力学系去38军坦克6师考察，也捎上我。尽管我也亦步亦趋跟在同学屁股后面钻图书馆，可“其东走者同，所以东走者异也”。抛开老师开的必读书目，英国《简氏武器系统》《简氏舰船年鉴》等成了我的宠物，一套“时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课本中种种费解的阐述产生怀疑。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战地记者闯进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镇压学生，他身背相机逃往西欧，与海明威并肩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二战中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巴顿将军……直到1954

年在越南踩响地雷，还不忘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把卡帕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日记本上："他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连身上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千真万确，我们俩都在18岁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同样狭隘自负，坚信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北大前辈

1983年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学生。校长江平、党委书记解战原看在校友面上对我照顾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断刊登我照片的编辑正是同年从北大分来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诗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殉诗。

扭转我教书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学，也是同一年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沈红，她对我"痴迷的摄影癖"大加赞赏，建议我去投考新华社摄影部。与此同时，我考中了《中国青年报》国际部。当时该报正筹办《青年参考》，负责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两级的师兄，同一个系的学生主考，我自然在应试者中稳拔头筹。但我最终放弃了《中国青年报》，因为我更想当"横行世界"的摄影记者。我的同学穆晓枫当校学生会秘书长时，我给他当过记者，由于痴迷摄影，居然还当选为校学生会优秀干部。他与我同学4年，坚信我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勇敢诚实，而且生来一张直肠子驴才有的大嘴，最适合去新华社。

新华社摄影部一大帮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毕业生，先民主后科学，最终面试犹如王八瞅绿豆。一位姓谢的副主任还随手送我一

只三条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励。主任徐佑珠则一再把我投放到灾难、探险、暴乱乃至战火之中。我以行动敏捷不畏刀剑日夜工作独家新闻而屡受社长褒奖。后来才发现社长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顺”走北大一把钥匙的北大学长。此后徒步长城、可可西里探险、秦岭追熊猫、神农架找野人处处离不开北大前辈。

1990年12月，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我单枪匹马经伊斯坦布尔、安曼闯入巴格达。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神态凝重，正在屋顶上画五星红旗以防挨炸，对我的贸然前来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东语系高才生的心情，他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负责。海湾危机以来，郑大使已组织上万人马经约旦回国，而我却逆人流而入给大使添乱。我现在仍保存着一张摄自巴格达西北鲁特巴的照片，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弹坑旁，站着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东语系毕业）、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毕业）。

曹彭龄将军不仅北大毕业，还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将军虽为武人，可著作颇丰，这也许是家学渊源所致吧。战争中曹武官对我处处照顾，源于北大民主科学教育传统，我们关于战争态势的分析也较为一致，忘年的管鲍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战时跨国界流动采访，除人地生疏语言障碍外，战时法规、新闻审查、散兵流弹都会使孤身一人的记者陷入灾难。在挨炸的巴格达拉希德饭店，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记者河野彻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国际部记者，早稻田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大进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过。从此，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生死与共，同行同止，分享新闻线索，直到他奉调去科威特。那天在约旦一家小酒馆，河野含泪把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场急救用品塞给我，酒气冲天珠泪满面：“剩下你一个人千万别太猛。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这里有我的同类

和平中的生命有时比在战争中更脆弱，许多比我年轻的学弟学妹不幸先我而去。我采访过的生物系81级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摔死的，是他家的独子，佛坪馒头山下有他的碑。10年前地理系柴庆丰勇斗歹徒，被流氓的一粒气枪子弹击中大脑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长刘镇山、刑侦处长张良基率一帮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缉拿归案。以后道听途说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进死在四川、戈麦自沉万泉河、骆一禾在行进中倒毙……这还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温杰，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学，后进北大，是中文系81级的学生。与我同年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殉诗。国政系80级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的学弟朴京一，径直地爬上教学楼顶，跳了下去……一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开吉普住帐篷，持续半年的高寒、缺氧、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长期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几次想一头撞死。

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励我为他太太、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世界博览》写些亲历，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由中东而北美，到现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离开北大时眉清目秀侃侃而谈满脸灿烂，现在是萎靡不振满嘴粗话，一听见警报声就想卧倒。开罗和平医院说我患了战争持

续紧张压力综合征，也许等上十年八年，也许终生恢复不了。尽管我右腿肌肉萎缩，可无碍我马奔雀跃地四处乱跑，去年还一人开车环绕美国。技物系学长邓朴方送我个奖杯，上写：“师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当时自己一定狰狞可怕，穷凶极恶。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活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少得让人害怕。人生总有一死，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为此我探险同时珍爱生命，打针吃药顽强地活着。

1994年“一二·九”，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画脚，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跋
用生命写成的书

任幼强

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是在医院完成的。鸭子躺在病床上，拖着病弱之躯对全书做了三遍校改，口授了几百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当他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自序》的写作时，他读给我听，竟几次哽咽得读不下去。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因为这是他用生命写成的书。

1992年底，鸭子将一份稿件托人从埃及带回国，由他的老父亲亲自送到编辑部，这就是《我见到了卡扎菲》，是他为《世界博览》写的第一篇文章。看完全文，我相当震惊，为文中行云流水般的气势、强烈的镜头感、幽默的文笔和精练的语句。从此我不敢对人说我是中文系毕业的。

转眼又是一年。1993年底，鸭子结束了新华社中东分社的工作回国。一天，他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老了”，天真得像个孩子，岁月哪能不留痕迹呢。他从怀中掏出一卷纸莎草画送给我，继而开始讲述中东的种种趣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到激动处还手舞足蹈，甚至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表演穆斯林如何祈祷。吓得我连忙请起，以免此时走进我办公室的同事产生误会。从此，他就不断地来讲故事，每次都是风风火火地来，匆匆忙忙地走，有时甚至来不及敲定下一个选题。而下一次他来交稿时，写的

正是我最想让他写的题目。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想让你写这篇呢？”他答：“我讲这段故事时，看见你眼睛一亮。”一次鸭子告诉我，新闻记者应每人配备一架望远镜，因为人对世界的感知力60%来自视觉。

鸭子虽然名气很大，可我却从未把他当成名人，我始终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天真可爱的大男孩。他与我的弟弟任凡一样大，都是七九级的大学生。因此，我对他总是像大人对孩子一样，训斥起来毫不留情，难怪他在文章中总爱用“大发淫威”“勃然大怒”等十分严重的词来形容我。记得我修改《我的耶路撒冷》一文时，感到他的标题过于轻狂，怎么能把圣城称为自己的呢！于是，我武断地将标题改为《圣城之恋》。鸭子知道后不高兴，他给我打了将近半个小时电话，希望恢复他的原题，并对文中其他改动提出异议。我拒绝接受他的意见，一意孤行地按我的修改发了稿。此事过后很久，我才慢慢悟出他是对的。鸭子对每篇文章都倾注了他的感情，他是从低角度来仰望圣城的，对这个诞生了三大宗教的圣地充满了景仰之情，他的标题正是这种感情的表达。在编辑此书时，我首先做的就是把这篇文章恢复原题。

鸭子总是在白纸上笔走龙蛇，从不在稿纸上写文章，他受不了格子的束缚，正如他那天生无拘无束的性格。从他龙飞凤舞的字迹以及字距、行距都无章可循的卷面，容易让人产生他写东西很草率的印象，其实不然。在写《铸剑为犁的拉宾》一文时，他看了整整一本英文版的拉宾自传*Rabin*。我不知道那本书有多少字，但足足有四厘米厚。鸭子勤奋好学、见多识广、博古通今，每篇文章都是他丰富的经历和深厚的知识的积累。他的文章天文地理、历史风情、政治军事无所不包，常常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我怕改错，每次都要与他逐一核对文中一些关键内容，他总是耐心地讲解。有好几次，我对他说：“鸭子，我改不了你的文章了，许多常识我都不懂。”而他总是用“你平时没有注意这些事”或“你们女的都不注意这方面的事”等安慰话来减轻我

孤陋寡闻的尴尬。

鸭子的文章是《世界博览》最精彩的一笔，在期刊界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本杂志仍保持着可观的发行量，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几乎众口一词："我是因为喜欢唐师曾的文章而喜欢上《世界博览》的。"不少报刊用高稿酬的许诺想把他挖走，我对他说："如果你愿意给别人写，我不阻拦，我也希望你的文章物有所值。"可鸭子却认真地说："只要你在这儿当主编，我就一直写下去，再说我也要对得起喜欢我的读者。"他的至仁至义让我感动，在他心里的天平上，金钱无法与校友间的情谊和读者的信任相比。就这样，5年多来鸭子忠心耿耿地为《世界博览》笔耕不辍，才使今天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我第一次见到鸭子是8年前他从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归来，那时他满面红光，神清气爽，身体壮得像只填肥的鸭。如今，他躺在病床上，张中行先生形容的他那"长而秃的头"更加显秃，面色苍白，标准的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我真不相信"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可怕疾病会降临在这个生龙活虎的孩子身上。医生怀疑他的病是遭受核辐射所致，也许就是在采写本书的某一篇文章或拍摄其中某一张照片时，他受到了核辐射的袭击，也许还不止一次。

鸭子是笑着告诉我他的病情的，他竭力表现出坚强。我想安慰他，却找不出合适的词，一切词汇在这时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想起鸭子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应该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差的。"这是他的人生信条。我坚信，他能承受病魔的侵扰。所幸的是，他用生命写成的这本书就要付梓了，书中的内容许多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全都是些不掺假的真玩意儿"，而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读鸭子的文章，我为蕴含其中的如此丰富的知识而惊叹，为他描绘成彩色的异国风情而陶醉，为他总结出的鞭辟入里的人生哲理而折服，为无处不在的幽默诙谐而捧腹。然而，更多的是为鸭子永远亲临

一线采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忘我精神而感动。这种精神的魅力正是他的作品最震撼人心之处。

鸭子在扉页上庄重地写下了“献给母校北京大学”，而我想再补充一句：把此书同时献给鸭子那善良的母亲和慈祥的父亲，感谢他们养育了这么个好孩子。

（本文作者为原《世界博览》主编，1998年版《我钻进了金字塔》责任编辑。）

1998年4月2日

我从战场归来

I Survived The Gulf War

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

——俾斯麦

唐师曾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从战场归来 / 唐师曾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54-6896-3

I . ①我…

II . ①唐…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5167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　曦　罗小洁

装帧设计：谷　宇

媒体运营：张　坚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　　版：



長江出版傳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10

传真：027-87679300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　　编：430070

发　　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58678881
传　　真：010-58677346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　　编：100028
印　　刷：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8.25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0千字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缅怀战火中丧生的无名英雄

献给他们的母亲

目录

CONTENTS

再版前言　战场归来二十年　唐师曾

序·2007　笼中之豹　唐师曾

序·1998　梦回世纪之战　唐师曾

序·1994　直面死亡的记忆　唐师曾

序　豁出命的唐老鸭　萧乾

从雪山到火海

上下同欲

飞往巴格达

并非天方夜谭

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打起来了！”

安曼祈祷和平

鲁威谢德难民营

贝卡难民营

告别约旦

另纸签证

从拉纳卡到本古里安

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飞毛腿”袭来之际

戒严中的加沙

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坦克，进攻！

耶路撒冷

重返拉纳卡

“我要上前线！”

烙饼

我和河野

“死亡之路”

我们的家

劫后巴格达

去南部——什叶派地区烽烟又起

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撞车、撞车、再撞车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罗伯特·卡帕

新闻检查

再见巴格达

跋　多余的话　许延滨

附录1　大街上拣回一个宝　徐佑珠

附录2　鸭子这家伙　刘忆分

附录3　中国记者在海湾　孙　伟

附录4　红色在行动　罗更前

附录5　唐师曾印象　辛少瑛

返回总目录

再版前言
战场归来二十年

唐师曾

老鸭《战地三部曲》都是老书，其中最老一本已诞生20年，先后被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四次再版。尽管时过境迁，但因独家、客观、亲临一线而不可替代。

老鸭这辈子做对两件事：上对一所大学；选对一个职业。亦做错两件事：误入一个组织；错结一次婚。或许人生本来就没有对错，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老鸭在新华社有两大发明：（1）闪击，将古德里安的“闪击战”应用于突发事件，在孕育期潜入，在爆发时采访；（2）语像，利用“语言＋图像”跨界叙述，产生热核武器的聚变效果，突破传统单一表达的局限。

老鸭以往的两位责编都是比我大十来岁的北大中文系学姐，退休前给老鸭极高的文学滋养。此次再版，责编陈曦是比老鸭小二十多岁的机械系小妹，高中四中、本科清华，人生的基础是靠“高中＋本科”浇筑的。

我就是从“高中＋本科”开始崇拜卡帕的，亦步亦趋一直走到现在，capa@sohu.com已经坚持了十多年。我为海南出版社《卡帕传》写序，为中国摄影出版社《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前沿50年》《〈生

活〉画报和〈生活〉摄影师》……等书写序。意大利使馆让我代表中国参加“中意战地记者论坛”，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命我为《戈雅，所有战争的新闻记者》写前言。日本共同社河野把价值连城的“Leica III”送给我这个“中国卡帕”（河野语），它是卡帕在越南踩地雷时最后一刹手中的“名器”，通过旁轴取景器偷窥枪口，感到毫无遮挡的恐惧时按下快门。

家族和北大的综合教育，使我养成独特的写作习惯：亲临现场、自然定位、社会延展、独立思考、文学描述，五个维度缺一不可。作为新闻记者，我只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基本加工，简单处理后，以新闻的特点、速度即刻传播。不计时间成本地对某个问题深入研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上星期，我和北大中文系学长河野彻在东京久别重逢，彼此庆幸都还活着。1990年我们相识于战火下的巴格达，当时我们初出茅庐、满腔热血、无所畏惧，为一张独家照片可以出生入死。现在，河野是共同社国际局次长，老鸭因“再生障碍性贫血”“海湾战争综合征”原地踏步20多年。运气更差的是在巴格达结识的巴萨姆·库巴，他2004年6月殁于汽车炸弹，时任伊拉克副外长。库巴出任驻华大使6年期间，每到周末都和我去密云水库游泳，还为我的《重返巴格达》写序。

改革开放之初，受传统等多重桎梏，中国新闻采集方式严重落后，妄加评论者多，亲临一线者少，复制转帖，“愚乐”大众，误导政府。1991年1月15日海湾战争爆发之际，时任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处长的陈佐夫告诉老鸭，某中南海会议上，新华社社长穆青拍案而起，“巴格达没中国人了，只有一个新华社的唐老鸭！”

12亿中国人中，我是被选中进入巴格达拍摄海湾战争的唯一者，年轻气盛，血性方刚。凭与生俱来的新闻本能追逐“异动”，用镜头捕捉画面，以文字交代因果，国际视野、职业素养，合成有生命的新闻“语像”。新华社副总编王文卿看了我的传真说：唐老鸭写的干草都

带着露珠。

以科学的眼光，用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这是我的书20年后仍能以不错的印数和版税再版的基础。

唐师曾　于什刹海

2013年10月31日

序·2007
笼中之豹

唐师曾

海湾战争以来，我就像只残废的豹子，被人锁在笼子里。

本书是海湾战场旧作，1990-1991年写于中东。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首次出版，大受欢迎，迅速售罄。199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旋即销售几十万册。此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编辑，第三次出版，为尊重历史，我对文字内容不作修改，只补充一些我拍的照片，以助理解。

感谢为再版付出大量劳动的谷望宁、开来、呼延华、章开元、欧阳冰清、刘牧雁、霍云、林源、唐勤、唐子千。感谢为本书画插图的凌晨。

感谢本书的历任责编：一版甘琦，二版任幼强，三版孟庆晓、江林。

遥祝我的儿子唐亚述6岁生日。

2007年6月6日

于解放军301医院

序·1998
梦回世纪之战

唐师曾

作为战时唯一反复往返交战国双方的记者，在海湾战争远去多年之后还津津乐道自己年轻时亲历的世纪之战，不觉汗颜。之所以厚着老脸重拾自己牙慧，怀着极大痛苦回忆逝去的青春，主要是受了一拨又一拨年轻朋友的怂恿，他们在读了我的另一本书《我钻进了金字塔》后，更想知道我在中东的前一半生活。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确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天赐——20世纪仅次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湾战争。从部队正规化、装备、训练、实战经验看，伊拉克军队的钢铁含量远远高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的中朝、越南部队。伊拉克飞机、坦克在数量质量上的相当优势，使其可动用空军和上千辆坦克进行以师为单位的坦克战。

我总觉得把4年前的一本小书原样再版太有负于喜欢我的读者。除更正原书的错误外，我补充了一些鲜为人知又被我忽略了的细节，共约3万字，同时增加了50余幅照片——它不仅变厚，也更为丰富，从而成为《我钻进了金字塔》的姊妹篇。

再次感谢每一位朋友。

1998年6月

序·1994
直面死亡的记忆

唐师曾

我是摄影记者，按传统不该写文章。海湾战争中，由于战时法规对摄影采访的诸多限制，逼得独居虎穴的我不得不另辟蹊径，在拍照、冲洗、放大、传真之余操起钢笔，想不到因此受到新华社总编室通报表扬、万千读者的欢迎而势成骑虎。其实我写得很臭，只不过代表12亿中国人在恰当的时间到了一个恰当的地点，偶作蛩鸣而惊天下。如果没有新华社摄影部不停地踢我的屁股，我绝不可能趴在吉普车的引擎上，蹲在长途采访的旅途中以膝代案，一篇一篇地炮制战地飞鸿。

由于斯巴达式的身体健康、生活简单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海湾战争爆发前，我被选作新华社越境作战的“伞兵”单枪匹马派往巴格达，从此成为战时涉足国家最多的中国人。只可惜我资质愚钝，不得不倾全力于战事而无暇他顾。我到过伊拉克没游览空中花园，到过以色列没拜谒伯利恒，到过约旦没游死海，到过埃及却不知金字塔为何物……聊以自慰的是，作为最后一批撤离伊拉克的中国人，我坚持用“新华社巴格达”电头发稿到最后一刻，使我的国家及时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在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行完吻腮礼之后，我又戴起纸叠的犹太帽与以色列国防军并肩缩在“爱国者”阵地后等“飞毛腿”，从而幸运地成为往来交战双方并与这时宿敌同食共饮的唯一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

个使用“以色列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

回到北京，我国唯一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战地采访的新闻界老前辈——萧乾先生鼓励我将战时激情扩写成一本小书。可我生来有个坐不住的尖屁股，没干两三天就泄了气。关键是我已失去了战时的激情。我深知，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呆坐灯前，昔日的记忆无比奇妙：血汗、梦想、死亡、荣誉……夜静更深，我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候再赴前线的军令。

多亏一帮朋友软硬兼施地逼我，几经增删，总算做完了这份比打仗还折磨人的功课，从而使我这个世纪之战的见证人得以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触、所感看似慷慨地拿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不要求本书成为一部既有注释、又有索引的鸿篇巨著，我只想把我那点儿不掺假的玩意儿，老老实实地奉献给大家，以对得起我所经历过的历史，并以此感谢帮助过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1994年1月

序

豁出命的唐老鸭

萧　乾

50年代，每当学习会上听到有人振振有词地批判个人奋斗时，我心里就嘀咕：难道这社会只容得下“叫干啥就干啥”的听话干部吗？70年代初在咸宁干校有位专攻古典文学的“五七战士”在床铺底下藏了几本线装书，于是，早晨“天天读”时就有积极分子十分激动地指责起他的“白专道路”。在“斗私批修”时，甚至任何个人兴趣都在贬斥之列。

那时我常想，社会有如一辆大篷车，个人的追求也是轮子的转动。倘若轮子都成方形的了，这社会还如何前进！

命运（或者说组织上的安排）原是要“唐老鸭”——师曾站在黑板旁执教鞭的。偏偏这不尽合乎他的理想。他嫌那天地太窄，变化太少。他的志向在于背上一台摄影机去闯四方。

照过去，这可是上好的批判对象。嗬，分配你教书，你不安心工作，竟敢胡思乱想，岂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来示众以儆效尤的反面教员。

可是当他闯进新华社摄影部的大门时，徐佑珠主任不但没硬赶他走，更没通知原单位叫他上大批判栏，反而对他表示热情欢迎，为他创造最好的条件，重用他，放手让他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事实证明，他个人的理想与集体事业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大篷车与轮子之间

相互依赖的关系。

理想只是个目标。实现理想则还有赖于毫无保留地拿出个人的才智、天赋和血汗。这也正是有所追求与好高骛远的不同之处。

“唐老鸭”进入新岗位之后，可以说是豁出命来干的。山西地震，淮河水灾，尤其是比高技术的海湾战争，他都背了相机，站在第一线上。他不但摄影技术好，笔头快，能吃苦，有胆识，而且善于同人（包括洋人）打交道。谁不喜欢这个高大结实、亲切、爽快的小伙子！

如今，他要我为他这个集子写个序。

我向来最怕为人写序了，总是千方百计地推辞。然而这位非凡的年轻同行一定要我为他写个序，实在不容推托。

世界在前进，祖国在前进。他还有几十年可闯荡，我这名新闻阵线上的老兵祝他路子越闯越宽，同时，越写越有深度。希望继“唐老鸭”之后，还将出现“张老鸭”“李老鸭”。让中国的新闻事业真正走向世界。

萧乾

写于1992年夏

从雪山到火海

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翱翔的翅膀。

——以色列伞兵

1990年的整个春季夏季，我都在海拔5000～6000米的世界屋脊探险。与北大师兄、《民族画报》的摄影记者“米老鼠”凌风同住双人尼龙帐篷，吃军用罐头，喝冰山融水。当时我健壮得像头大牲口，心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我之所以到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完全是听了北大一位女学生的煽动。她是我初恋的女孩，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因为她学的是科学，我又迷信北大的民主、科学传统。我的朋友、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教授教导我，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闹革命，一是谈恋爱，如果两件事搅和到一起，那就是极致人生。我猜我当时五迷三道就是这样。果然，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对我当时的乌托邦思想大为不满，而我又是个有恋母情结的乖孩子。既然老板认为我的居京生活到1989年底已至尽头，我便义无反顾地在1990年初离京去了西藏。

可可西里是蒙古语，藏文叫“阿钦公加”，原意为高山环绕的上百个湖，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新疆、青海、西藏接壤的夷蛮之地。大体位置在青藏公路以西，唐古拉山以北，昆仑山以南。在我们进入之前，几乎没有人类痕迹，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块处女地”。

我们的北京吉普咆哮着冲上封冻的通天河，坚冰在脚下隆隆震

响。虽然早已是盛夏，可在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是大雪纷飞。眼前，长江之源格拉丹冬雪峰傲然耸立，铅灰色的冰塔林闪烁着沉重的寒光。脚下，晶莹透明的西金乌兰湖平和如镜，宛若一块蓝色的冰。



1990年7月，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我是国家可可西里综合考察队的替

补司机。（《民族画报》凌风　摄）



1989年6月，我和北大生物系吕植在黄花城长城。我之所以到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完全是受了她的煽动，她是我初恋的女孩。20年前我就断定，她未来肯定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现在她是北大教授、美国Smithsonian　Institute兼职科学家、WWF中国物种保护区负责人、“全国十大优秀青年”……（新华社记者李明放　摄）



赵浩生对我说，人一生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闹革命，一是谈恋爱。如果两件事搅和到一起，那就是极致人生。（韩美林　摄）



我在可可西里——开北京212吉普，住简易帐篷，在无人区生活了3个多月。（霍云　摄）

此次探险，我是作为替补司机加入可可西里探险队的。为此，行前特地在警察学院强化训练了3个多月。此时，炽热的阳光穿过吉普车风挡，强烈的紫外线将我的脸剥去了一层皮，用手一碰便纷纷扬扬。由于空气稀薄，一行人全都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红细胞增多症。75马力的北京吉普由于缺氧，输出功率竟不足40马力。持续的高寒缺氧加上没有新鲜蔬菜，嘴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为止痛，我不时将脸贴到冰凉的相机上，莱卡的冷钢激起我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1983年大学毕业时，我曾找到燕山脚下“万岁军”坦克6师申请当装甲兵，可他们硬说我是近视眼，在给了我两个包子一碗鸡蛋汤之后，礼貌而坚决地把我送出了兵营，使我这个胖乎乎的自由主义分子终生失去了参加陆军的机会，只能远远羡慕那些因战斗致残的英雄。

我龟缩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授了近4年的战争史，终于在1987年通过新华社摄影部招聘考试，被当作“大街上捡回来的孩子”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崇拜富于冒险精神的悲剧式英雄，恺撒、隆美尔、巴顿和踩上地雷还要再摁一下快门的卡帕。我生性执着地追求亲身体会，为了获得某种体验而不惜冒险，以此显示自己的勇气。



我在可可西里腹地，身边是尼康FM-2、FM和莱卡M-5。（《民族画报》凌风　摄）

18岁时，我读到以色列伞兵202旅的一句格言，这句话印在绿身红翅的飞蛇军徽上：“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翱翔的翅膀。”（Before you can earn your wings, you must learn how to fly！）人生就是如此，直到我30岁从海湾归来，受聘装甲兵学院上校研究员时，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装甲兵。

几天前，派我来世界屋脊玩命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林川，托补充给养的油罐车给我带来一箱胶卷，想不到中间还夹带着一台松下RF-10短波收音机。8月3日，我和《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正缩在

帐篷里听新闻，“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令我灵魂出窍的消息：“1990年8月2日中东时间凌晨1时，伊拉克共和国卫队3个师越过边境，仅有2.03万人的科威特军队稍作抵抗即全军崩溃，除5000名散兵撤至沙特，全军覆没。”

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我屏气凝神生怕漏掉半个字，直到转播《时事经纬》，我才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海湾战争后，我到装甲兵工程学院讲课，为学员签名《我从战场归来》。我戴解放军坦克帽、英军鹿皮手套，身后是著名的“59改”式坦克。（许延滨　摄）

新华社社长穆老头把“摄影”比作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我做梦都想当翅膀上的硬羽毛。缩在鸭绒睡袋中，我打着手电起草去海湾的申请。

尊敬的部领导社领导：

新华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讯社的行列，中东是最好的突破口。中东位于三洲交会、五海包围之地，集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矛盾于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伦与石油命脉纠缠一处。帝国主义殖民经济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联、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国受欢迎。

我1983年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大战史”近4年，并获讲师职称；1988年毕业于新华社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1990年毕业于警察学院驾驶学校。身体健康曾达北大锻炼标准。盛夏走过长城，严冬爬过雪山抓熊猫，在世界屋脊探过险，在摄影部新闻中心从事突发事件报道3年半，有丰富的“闪击”经验。无妻儿、恋人拖累，最适合飞往中东采访战争。我决心为新华社争光，报答人民哺育之恩。

就是这篇用军用“小八一”电台发出的明码电报，日后竟被嗜血的人传为血书。其实我这个人最怕见血，更何况在海拔6000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6860米的布喀达坂峰脚下，连氧气、淡水都不够，哪挤得出多余的鲜血。

我又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请新华社军分社王建民帮我准备防弹背心；另一封让技术局传真员袁满到北大国际政治系预借有关海湾危机的书籍。

熬过一个不眠的寒夜，我仿佛已飞过寒光闪烁的布喀达坂雪山，来到炽热的中东沙漠。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中心，把由近而远的东方各地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一政治地理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东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指以西亚为主，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

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

这一片辽阔富饶的土地约740万平方公里，是东西方交通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出口量约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2/3，故有“石油海洋”之称。

美国总统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宣称，“仅仅从地理学上讲，整个世界战略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而海湾又是中东的核心。

海湾位于西亚南部，是印度洋伸入阿拉伯半岛与伊朗高原之间的陆间海。伊朗称之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称之为阿拉伯湾，统称海湾。海湾地区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8个国家，统称海湾国家，总面积480万平方公里，人口9159.6万。



1989年后，我与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许延滨少将成了莫逆之交。海

湾战争结束后，他把我请到装院“兼职”任教，头衔是“少校研究员”。参政政委冯少武将军听了我一次“语像”之后，认为我的水平至少应是“上校教授”。相关文件送到新华社总编室、人事局……都说没有先例。许少将是中国首任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独子，给我的命令是为“四化”多做贡献。多年过去，我仍把装甲兵工程学院视作第二母校。这是2006年年末我怀揣磨毛了的二级坦克驾照重返母校，重温旧技。左二是总参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将军，左三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现任院长梁永生少将。

海湾地区处中东中部，北扼高加索山、黑海，南濒阿拉伯海，东临南亚次大陆，西接红海，是连接亚、非、欧三洲要道。此外，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优质的石油，埋藏浅、产量高、油质好、储量大。已探明储量6517亿桶，占全球储量65%。中东五大产油国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均在海湾。

中东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一直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和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将近50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从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六日战争”、“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以及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阿以争端是中东动荡的重要根源，其中的关键是巴勒斯坦问题。另外，塞浦路斯问题、黎巴嫩内战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风云多变、冲突迭起的中东，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动乱地区，也是国际新闻界追踪的热点。尽管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认为海湾要打一场大战，可根据我的知识和直觉，一场大战非打不可。我祈祷茫茫宇宙，促成我的海湾之行。

上下同欲

上下同欲者胜。

——《孙武·谋攻》

从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热火朝天的亚运会，我冷一阵热一阵地处在焦虑的等待中。“去海湾玩命非我莫属”，我心里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压倒性优势”。

鉴于多年打打杀杀，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远，新华社让我负责“突发事件”，意思是一旦炸个什么东西，我应立即出现在现场。可见当时我无孔不入的天才已为官方所认可，可整个亚运会并没有出现“敌对势力”期望的响动。唯一凸现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孙王效芝。

我强耐野性坐在亚运会主新闻中心新华社摄影部大工作间，向美联、路透、法新、共同社的同行兜售新华社照片。自从拍完亚运会开幕式，我就宣告失业，因为我分管“团结、友谊、进步”和突发事件。可挂在脖子上的4个胸卡却无助于我在亚运村内的任何活动。两天前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萨马兰奇，趁张百发向陈希同、伍绍祖介绍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口的胆大包天之机，我就参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给他发了4页文传申诉我在亚运村内寸步难行。今天上午亚运会新闻发言人吴重远通知我，张百发已给予我这样的“驻村记者”特权，可刚才的经验告诉我：就连丁维峻指着鼻子说列为第一照顾的“新华社唐老鸭”也休想跨越警戒线一步。我的“特权”与所有采访亚运会的中外记者别无二致。

“鸭子，买卖来了！”这天，万伯摇晃着一页文传，坏笑着朝我咧嘴，示意让我过去。万伯是摄影部亚运报道组的“总协调人”，我以为他又在逗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文传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当服务员的照片。“没戏”，我脱口而出，可万伯却恶狠狠地命令道：“你给我想招儿。”黑亮的眼睛狡猾万分。



1990年9月，我在亚运会推销新华社照片。右一站立戴胸卡者，为主管整个亚运会摄影报道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林川。（新华社记者袁满　摄）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线索，终于弄清毛主席女儿李讷有个18岁的儿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现在亚运村内当服务员。可面对处处禁地、庞大复杂的亚运村，我简直无从下手。我规规矩矩地先到村长办公室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王效芝不许采访。”任我拿出苏秦、张仪的本事解释王效芝最能体现“团结、友谊、进步”，就是毫无效果。足足在村里游荡了一整天，我才打听到“王效芝好像在10号楼”。可亚运村内全是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

没有10号楼。

嗅着运动员餐厅的菜香，当了一天马路天使的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身后齐声大喊“唐老鸭”，循声望去，竟是乒乓球队的马文革和乔红。联邦德国40届世乒赛时我和他们混了3个多月，情谊颇深。这帮家伙连拖带拽地要我去中国队驻地J楼，可我戴着的4枚胸卡无一能让我进入村内任何建筑物。望着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为英文第10个字母的J楼莫非就是10号楼？

次日，我和文字记者梁金雄趁采访王震送给中国队礼品之机再次来到J楼门口，陪同我们的亚运村礼宾官员王大波是我北大国政系的校友，尽管他已安排好中国队的官员在楼口迎接，可硬是不许我们进楼。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无线电话找村长，警卫见状说他再请示一下。又过了5分钟，我们终于进了J楼，可楼内根本没有王效芝。结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广告”——印有我随身电话号码及《中国青年报》、香港《明报》、联邦德国《鲁尔报》等采访我的复印件——分发给保安人员，这才悻悻离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听筒中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点名找我：“刚才你在亚运村散发非法印刷品，马上给我到J楼指挥部来。”我觉得声音挺熟就问：“你是谁呀？”“我是你大哥！”我一听就乐了。这位“大哥”是我北大4年同寝室的好友，毕业后当了警察，可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亚运村安保指挥部。从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楼。

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

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4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待一会儿），足足聊了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4个服务生，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9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9楼，4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我追到另一端时，4个服务生只剩下了1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

“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儿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瘫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们就这样聊在一

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摁几下。

快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3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泰克斯”，其纯真聪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3位的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这位无胸卡者有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咔咔咆哮，激动得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9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儿，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1990年北京亚运会，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左）在亚运村当服务员。他是毛与江青所生女儿李讷的儿子。从照片上看，他比毛新宇更像毛泽东。（唐师曾　摄）

我慢吞吞地走下8层，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啪啪”过了3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

“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

“行，小子！”

万伯“咔嚓”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儿。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

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价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柯林渭的父亲柯华，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也是首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科林渭的妹妹叫柯小明。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妞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3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3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巴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3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柬埔寨战火中历练过的老记

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话。



新华社总编南振中十分欣赏我名片上的"昼夜工作"。我成年累月住在

摄影部值班室里，桌上有包括红机子在内的七八部电话。我是中国顶级新闻机器上时刻紧绷的一束弹簧，一旦触发就跳将出去。这是河北清西陵，封建帝王的陵寝就像一顶巨大的乌纱帽高悬在我的头上。我挂着两台尼康FM2 + MD - 12马达，睡觉也不肯摘下来。屁股后面是当时国内罕见的奔驰230E，它是我的坐骑。我搂着我的老板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在党看来她是十三大代表，在我看来仅是我的北大学姐、我的高级编辑。左边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郭蓝冰，我老板指挥我为她写的文章拍过插图。徐佑珠玩笑说："我的文章不如蓝冰，蓝冰不如（郭）超人……可是一旦鸭子扔掉相机拿起钢笔，那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都得下岗回家。"



"在明白人手下，和聪明人干活。"穆青（右二）记者出身，因报道焦裕禄名震天下，对我超乎常人的"疯话"一贯欣赏。他主张"把摄影变成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把我当成雄鹰的"大条"弄进了新华社。右一为曾建徽，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也喜欢我的"异端邪说"。左一为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他们视我为天生的新闻机器。（新华社记者张燕辉　摄）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

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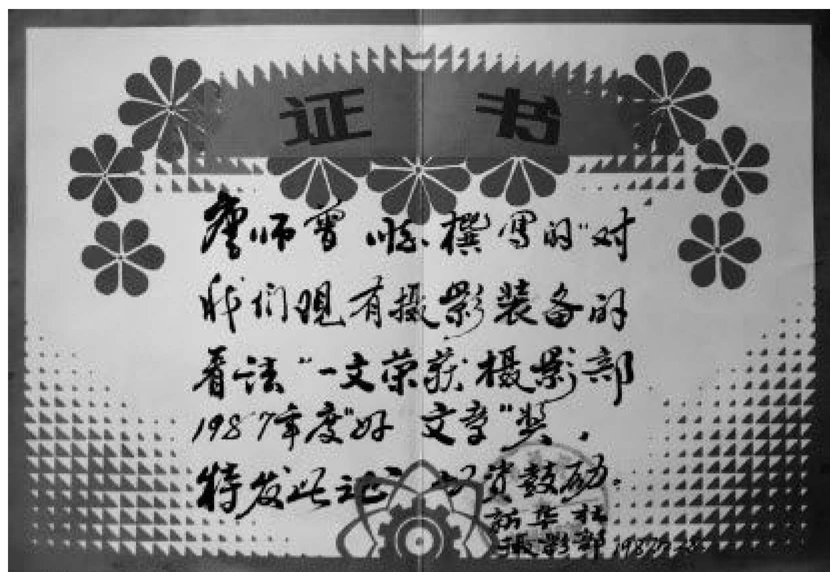
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无法理解，我最后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于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10000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唯一能在3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

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我们现有摄影装备的看法》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新华社新闻闪击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20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世纪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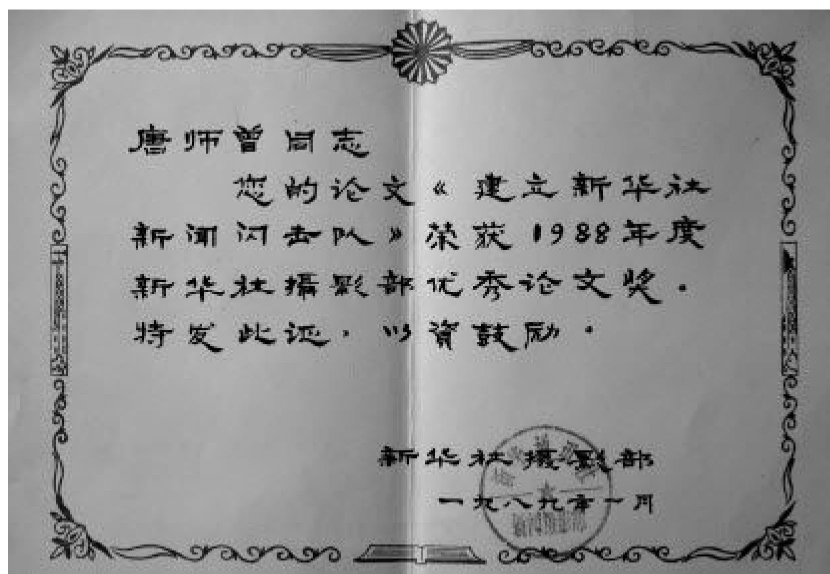

证书

唐师曾同志撰写的"对我们现有摄影装备的看法"一文荣获摄影部1987年度"好文章"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新华社摄影部

1987年获奖证书


唐师曾同志

您的论文《建立新华社新闻闪击队》荣获1988年度新华社摄影部优秀论文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新华社摄影部

一九八九年一月

1988年获奖证书



美国西点军校出身的巴顿将军



《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古德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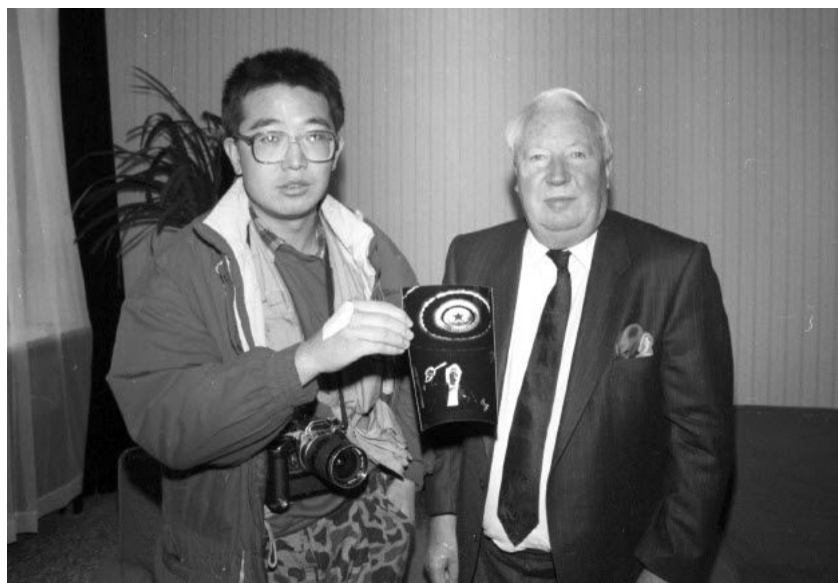
我拍的独家新闻：卢沟桥被雷击的石狮子。（唐师曾　摄）

德国装甲兵总监、普鲁士贵族、“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揳入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

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龙组建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3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4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4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4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3个方向各有一枚棋子”。为了将这3枚棋子连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式的人物。



1990年11月30日，我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合影于钓鱼台。我手

里拿的是几年前希思在人民大会堂指挥中国残疾人乐团时，我为他拍的照片。（《新观察》李晓斌　摄）

3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了《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思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思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思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云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

两年后，组建有20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大利亚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总编兼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尔·海因茨·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飞往巴格达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则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须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

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

送4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们儿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3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我的女孩吕植哂然道：“你怎么总在做梦……”我生长于命运多舛的艰难时世，由于物质生活极端匮乏，故只能靠梦想生活。我的理想是做

一个靠自己打拼天下的孤胆英雄，靠勇敢和学识，历尽苦难创造人生，美梦成真。（新华社记者李明放　摄）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渺、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1990年冬天，摄影部主任徐佑珠等同事给我这个总“无事生非的短命鬼”过生日。左起：徐佑珠、郭蓝冰、庄国庆、李明放、丁玫、林川、马挥、陆小华。（唐师曾　摄）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和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1990年，同处中东的伊斯坦布尔和平安详，蓝色清真寺与圣索菲亚大教堂和睦相对。一位分不清种族和宗教信仰的老者与一只花猫在晨雾里散步。这种不同宗教信仰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让我想到我的出生地什刹海。（唐师曾　摄）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

是蓝色，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6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珀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宫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6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

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待上3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按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互相帮助）。"



一到巴格达机场，我们就被软禁了。我忍不住用挂在胯上的莱卡偷拍下这一场景。（唐师曾　摄）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谟拉比师”；“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呼吸着冰凉的夜风，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Xinhua News Agency
وكالة أنباء شينخوا

并非天方夜谭

这座城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因为我平生不曾到这样的海洋中航行过。

——《一千零一夜》

怎么也想不到真有不许拍照的城市。当一位曾常驻巴格达的记者给我讲到某位摄影记者的传真机被扣在萨达姆国际机场、他本人在街头拍照被没收相机的故事时，我曾将其归结为“天方夜谭”。4年来，我徒步走过长城，在秦岭抓过熊猫，上世界屋脊探过险，洪水、大火、骚乱、地震……连轰动一时被警方严密警戒的“长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独家新闻都弄过的人，会有什么“不可能”？可与巴格达通了一次长途后，我顿时傻了半天。巴格达分社的李大伟说：“你在北京碰得到的危险顶多一百八，而这里至少三百六。”

我飞到安曼，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给我讲了他在巴格达因为拍照被安全人员抓住、器材被没收的经历，劝诫我在大战爆发前夕更不可鲁莽行事。经与总社林老板电话磋商，决定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暂存在约旦。我脖子上挂着快门轻得不能再轻的莱卡M-4进了巴格达。

头一天，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就对我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出事。比如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的马蒙就被取消了签证，7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一名好抢独家的意大利记者……最后是这位记者本人，他因与英美记者过从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说话间另一朋友又插进来一个笑话，说是半年前他们

商量每星期五早上5点起床去钓鱼，可担心早上起不来。想不到星期五早上5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几个星期五的早上5点，电话铃都响，这位记者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老兄看我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



海湾战争，约旦安曼严禁摄影。注意他的右手，正捏着我刚贿赂他的一盒“龙虎牌”清凉油。这是当时我唯一送得起的礼物。（唐师曾摄）

中东历史总如中东游牧民族异彩纷呈的服饰，让我头昏眼花。其疆界大概又由于游牧民族的游走而变化多端。这一带历史最悠久的首推伊拉克，远古便以两河文明、空中花园、《汉谟拉比法典》闻名于世，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王国是这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元6世纪建立的阿拉伯帝国，统一了中东地区，阿拔斯王朝的曼苏尔把巴格达建成帝国的都城。

今天的伊拉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与土耳其、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为邻，东南为波斯湾。可全世界的穆斯林全把波斯湾叫作阿拉伯湾，波斯湾是操波斯语的伊朗人的说法。伊拉克现有面积44.44万平方公里，人口1180万，阿拉伯人占4/5，库尔德人占1/5，先后挣脱奥斯曼、英国人的统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建立伊拉克王国。同一时期，大沙漠中内志王国（Nejd）纳季特省酋长伊本·沙特扩张至海湾，1924年吞并汉志王国，自称汉志内志苏丹国王，1932年改名沙特阿拉伯王国。

巴勒斯坦地区16世纪后一直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受英国委任统治，192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西称巴勒斯坦，东称外约旦酋长国。直到1946年3月22日英国才承认外约旦独立，1946年5月25日改称外约旦哈希姆王国，1950年4月与西岸合并，定名约旦哈希姆王国。哈希姆家族原在阿拉伯半岛游牧，后被沙特击败经伊拉克辗转到了此地，今天的约旦国旗上还保留着当年阿拉伯半岛王旗的颜色。

今天的科威特国（The State of Kuwait）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波斯湾西北岸。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历史上的科威特一直归伊拉克属下的边远蛮夷之地，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将其划归都城巴格达下的一个省，以后归奥斯曼帝国统治，1899年英国与科威特订立条约，令其不得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威特沦为英国保护国，直到1961年6月19日才获独立。中东发现石油后，科威特与沙特对一块油田发生争执，1970年和平划定边

界。奥斯曼帝国时期，科威特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个县。第一次世界大战《洛桑条约》在英国干预下成立了伊拉克王国和科威特埃米尔王国，可是伊拉克一直不予承认，一直叫嚷要祖国统一。在历史悠久的伊拉克人看来，不论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科威特对伊拉克犹如台湾属于中国一样。而科威特人则视自己为脱离马来西亚的新加坡。

总之，老奸巨猾的英国人不论从哪里撤走，都一定留下一屁股屎。新、马、印度、巴基斯坦乃至整个亚非拉，为的是让独立的国家越乱越好，以所谓“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从中牟利。英国人得意洋洋地自诩为“均势外交”（Balancer of the Power），即迪斯雷利首相“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圣诞之夜，我在拉希德饭店伊拉克新闻部的办公桌旁拍摄身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萨达姆画像前歌舞升平、购买圣诞礼物。我的陪同满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挤到我旁边，用低沉的英语命令我：“听着，我不许你拍我的姐妹在那个人画像下欢笑。”我莫名其妙，连连表示歉意。回到分社，我请教老朱，他说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1990年12月25日，伊拉克最后一个繁荣的圣诞节。摄于巴格达拉希德饭店。当时伊拉克共和国是海湾地区最开放的国家。（唐师曾摄）

当晚，巴格达所有教堂在9点关闭。此时距联合国最后通牒生效期还有整整10天。

次日，我奉命到美国使馆前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跚而行。一位紧靠在我左边的白人记者边拍边问我是哪天来的，我俩肩并肩地跟着人群大喊口号“打倒布什”，义愤填膺声嘶力竭，此举深得伊拉克人民敬意。事后才知道，这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4年抢新闻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培尔·金特》中的真理：“当狼群在外边嗥叫时，最保险的是跟着一起嗥。”

顺着萨东大街往回走，看着两侧空空如也的玻璃橱窗，我胆子大将起来。我用右手捏着装了35毫米广角的莱卡，漫不经心往前走，估

计差不多就摁一下，从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拐过两条街，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还臭的英语问我是不是拍了路边的橱窗，我说绝对没有。我说我始终拎着这只破相机，准备赶回新闻部发稿，相机里仅有妇女儿童反美大游行的壮观场面。警察说他刚接到举报，有日本人偷拍商店。我说那有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是兄弟，你没见我身上大写着“人民中国”吗？说着翻出衣领下写有中、英、阿文的身份识别牌。警察将信将疑地读完我的血型B，说可能是弄错人了。我又喊了几声“打倒布什”，弄得警察肃然起敬，这才问警察怎样才能叫到去新闻部的出租车。



1991年1月14日，海湾战争一触即发，巴格达城防危如累卵。几个儿童胸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跚而行。（唐师曾　摄）



一位母亲正给孩子穿上衣服准备逃离巴格达，天真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的伊拉克丰衣足食。（唐师曾　摄）

卡迪西亚广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广场四角各有一柄高达几十米的巨剑，握剑的大手分别是按萨达姆和尼布甲尼撒（即那位一把火烧了耶路撒冷、把犹太人掳为巴比伦之囚的国王）的右手成比例放大的，剑柄的流苏由成千上万个伊朗士兵的钢盔堆积而成。四柄巨剑两两交叉，像横亘苍穹的彩虹，矗立在广场两头。据介绍，“卡迪西亚大捷”原指古巴比伦战胜波斯的一次战役。公元637年（回历16年），12万波斯异教徒侵犯巴比伦，波斯人以33头战象为前导杀到海拉。被囚于卡迪西亚监狱的死囚埃布纳赫吉戴罪请战，率3600名穆斯林大败12万波斯人，史称“卡迪西亚大捷”，这也是历史上阿拉伯人唯一扬眉吐气大败波斯人的胜利。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人认为打败了伊朗人，伊拉克一方认为法奥之战可与卡迪西亚大捷相媲美，特建此广场以示庆祝。据说一旦临战，卡迪西亚广场可作军用机场使用，所以自然被列入头号保护目标，担任警卫任务的有陆军、伞兵和精锐的共和国卫队。



行希腊罗马举手礼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领袖萨达姆同志，和不按领袖指引方向前进的老妪。（唐师曾　摄）

我脖子上挂满了尼康，右手捏着丑陋的莱卡M-4径直向带班的共

和国卫队走去。一位少尉命令我停止，可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口念“萨拉马利空”（穆斯林间的问候语）与他行了吻腮礼，他的大胡子弄得我挺痒。接着是“爱赫兰，雅嘿，西尼夏比，索哈菲（好啊，兄弟！人民中国记者）。”他也极有礼貌地向我问候。我对他举起莱卡，比划着摁了一下，“素拉蒙肯（照相可以吗）？”他连连摆手，“木须蒙肯（不行）。”接着双手一合，做了个戴手铐的姿势。我温顺地将一堆相机扔在地上，从他们手中的AK-47冲锋枪侃起，说中国军队用的也是同族步枪，不过叫“56式”。山南海北乱侃，直侃到叙利亚的女孩最美。“暴力色情”迅速扭转了士兵对相机的注意力，可我心里明白，我有了独家的卡迪西亚广场照片。



卡迪西亚广场，四柄巨剑两两交叉，像横亘苍穹的彩虹，矗立在广场两头。卡迪西亚大捷是古巴比伦人大败波斯人的一场胜仗。（唐师曾　摄）



守卫卡迪西亚广场的共和国卫队。握巨剑之手是萨达姆和尼布甲尼撒右手的成比例放大，剑柄垂下的流苏是法奥之战缴获的伊朗士兵的钢头盔。（唐师曾　摄）

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

——恺撒

1月12日夜，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当时我已和指挥我的新华社摄影部失去联系一个多星期。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严厉指责我没拍到联合国秘书长在巴格达的照片。其实所有到过巴格达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天方夜谭的国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伊拉克，这块土地在学者们眼里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古代巴比伦文化的发祥地”。人类早在6000年前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富饶的新月形土地上，建筑了城市，发明了轮子，创建了灌溉系统，创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并将各种法律编纂成册。据说有证据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要比古埃及早1000年，比中国的夏朝早1000多年。巴格达作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伊拉克中部，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距幼发拉底河仅30余公里，4000多年前就是一个重镇，公元762年成为阿拉伯帝国都城。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统治两河流域后，出身哈希姆家族的曼苏尔王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修建都城“巴格达德”（Baghdad）——该字源于波斯语，“巴格”意为花园，“达德”意为真主，即真主花园。巴格达一名沿用至今，它是阿拉伯历史上第一座圆形城市，由城中心的中央木兰巴广场辐射出东北呼罗珊门、西北叙利亚门、西南库法门、东南巴士拉门。以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修建鲁萨法卫城，形成今天的大巴格达。786-833年成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文化与贸易中心。不同肤色的民族——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

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持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四方杂处，各种衣着千奇百怪，使巴格达充满奇异的魅力。世界古典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以巴格达为背景，因此人们称巴格达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乡。



世界上第一条沥青路，建于巴比伦王国时期。（唐师曾　摄）



伊拉克古巴比伦遗址。就在这片废墟附近，构筑有共和国卫队的地下工事。把军事设施隐蔽在世界文化遗产、大学、医院、平民社区之间，是这个极权国家的战略部署。（唐师曾　摄）

可今天，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却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在巴格达，拍照之难好比上青天。刚摆脱8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这里英文不流行，出租车司机、百姓、士兵甚至连长途电话台都说阿语。不光是获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难，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亚洲人的面孔，我的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我面带微笑不停地向四周大喊：“我是伊拉克人民的兄弟，安拉最伟大！”

巴格达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国家机关、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集市、广场、车站、机

场一律不准拍照，生怕记者把楼顶上的高射炮拍了去。荷枪实弹端AK-47步枪的士兵满地都是，数不清的眼睛紧盯着你，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只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所有来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全部被当作“客人”住进了拉希德饭店，该饭店与因人质而闻名于世的曼苏尔饭店遥遥相对。日本记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200多美元，而且只许在此停留10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闻部负责。

伊拉克不许外国记者携带传真机入境，我不得不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扔在了安曼。不过，据说也有神通广大的，美联社的多米尼克就在美国使馆有台可以用卫星发照片的机器，听得我直走神。《巴黎竞赛画报》的勃鲁诺坏笑着说他压根儿不用传真机。而跟随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来访的共同社大河源利男则的确带进一台底片传真机。大概惨的只有我了，我发传真照片必须依靠伊拉克通讯社，花美元且不说，要命的是线路根本没保障。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在巴格达开幕，我雇了辆出租车颠前跑后地折腾了半天，手捧着10寸传真照片传了3个小时就是传不出去，还白缴了60美元。不过抱怨归抱怨，可不能真让美联把咱们镇了。



海湾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反萨达姆极权统治的政治势力纷纷揭竿而起。狙击手、冷枪流弹、汽车炸弹四伏。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摄影采访，头顶上时刻掠过死神的黑翼。为了把自己区别于交战各方的战斗人员，我始终穿大红色上衣，祈祷在耳边掠过的冷枪、弹片放我一马。（伊拉克情报部　摄）

1月13日天一亮，首席老朱就帮我打听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行踪，毫无结果。在伊通社传完两张照片后，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饭店14层的共同社河野。在这里黄种人相见就有一种亲切感，更甭说我们还是北大校友，并在北京一起跑过新闻，这老兄也在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来访急得团团转。我们俩约定：互通信息，患难与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弄到，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分社。老朱在洗菜做饭，我一边打下手，一边给河野拨电话，可老占线。差一刻晚8点，老朱说再找你那位北大师兄问一问，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通了。河野张口就问我机场怎样了。“什么机场？”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么还待在家里？德奎利亚尔8点到机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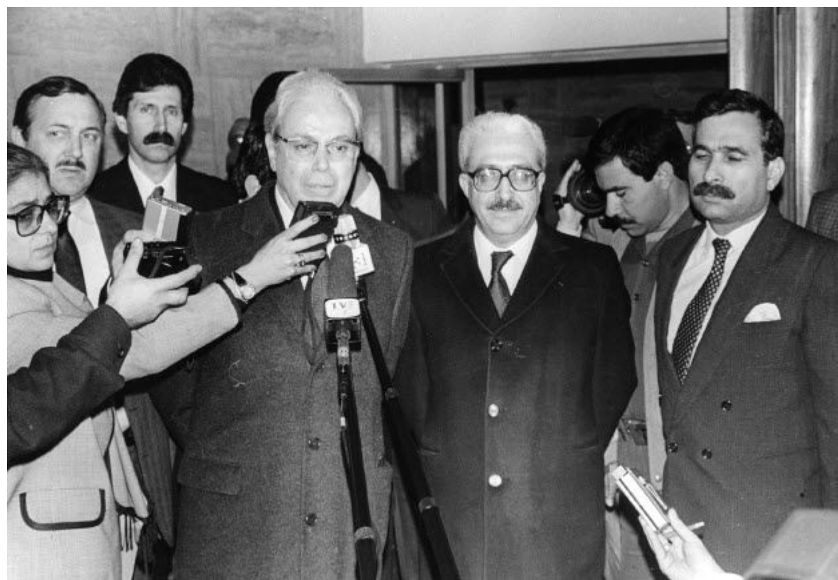
扔下电话冲进厨房大喊：“老朱，快开车上机场！”

分社的奔驰230E前几天才找回来。偷车的给毙了，可打碎的车门玻璃由于禁运全巴格达也配不上。据说这种1990款奔驰的玻璃只有欧洲才有。我们只好开丰田克罗纳，可这辆破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一过80公里就哆嗦。车灯劈开雨雾，引擎盖上蒸气腾腾。老朱把油门踩到底，车轮在雨水中飞转，水花四溅，雨夜中持枪站立的军警一闪而过。老朱已经接连3天没睡觉，此时似睡非睡地问我：“刚才咱们关了煤气没有？”一边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提神。我挪到车座右侧，抓紧安全带，生怕车子一个急转弯，滑出积水的路基。

晚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足足有200多名记者挤在这里，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还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黑压压的一大片也是记者，偌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一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儿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在那儿可以见上联合国秘书长一面。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像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胆小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帖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兀自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

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更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正是给中国露脸的时候。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森帕克”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被后面一冲，眼看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缝挤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了”。



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到巴格达做最后的和平努力时，我在恰当的时间抢到最好的拍摄位置。该照片为国内外众多媒体广泛采用。（唐师曾　摄）



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正在用美联社底片传真机（AP-Leafax）帮我传输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稿件，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我的照片再次从“风眼”巴格达传向世界，占领外国报纸，香港《明报》称我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共同社　摄）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凌晨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驾汽车扔炸弹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美联图片传真机，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联合国的全面制裁使巴格达成了一座孤岛，以往我与外界的联络全靠我那当传真员的徒儿袁满为报道战争在国际长途上“侃”出的一帮“女朋友”。袁满是战争前夕唯一能将国际长途从北京辗转香港、纽约要进巴格达的人，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为此在总编室会议上得意洋洋地称之为秘密武器。但此时此刻，我开始怀疑袁满和他的国际娘子军是否也

加入了联合国军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这张传真照片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让共同社摄影记者“折”了一回，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我的照片再次从“风眼”巴格达传向世界，占领外国报纸。香港《明报》已称我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商报》称我是“新华社摄影部20年来最大的发现”。这还不算德国和美国报纸。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衡量一个记者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发出的新闻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体采用，而不是其他。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丘吉尔

19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一大早，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还有一帮记者挤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6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置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缴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丝”。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

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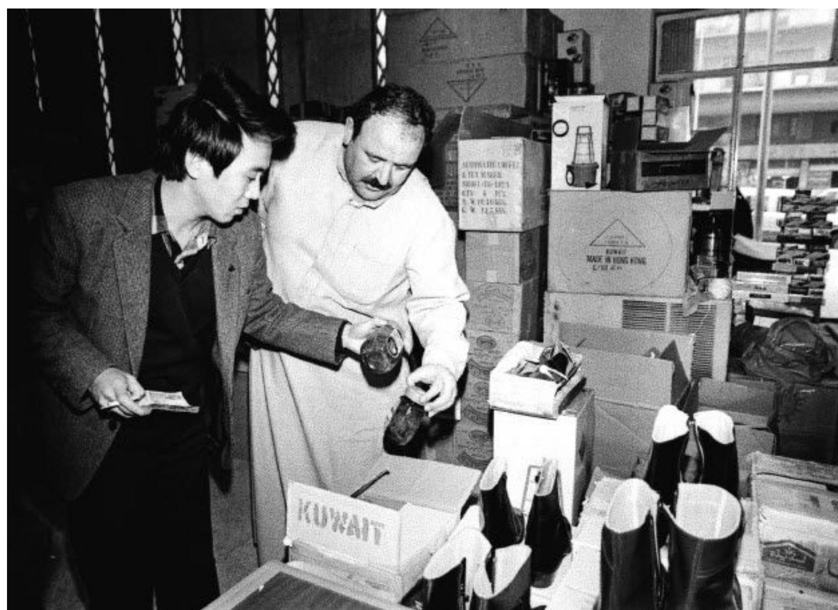
二楼大使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半米大的美国国徽，女秘书正坐在门口的皮转椅上紧张地打字，一头金发在门外射进来的灯光下飘拂，犹如黎明时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写“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挂着一幅挺大的萨达姆卡通画，画中的萨达姆被人从椅子上掀翻在地，透着美国人的天真、随和、霸气。



战争一触即发，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厨师卷起铺盖准备“逃跑”。来巴格达之前他在北京远东饭店工作，现在估计已经退休了。（唐师曾摄）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已经回国，在大使办公室接见记者的是临时代办威尔逊，他正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手托一大杯矿泉水。代办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镶着镂花的金属片。柜上摆着一枚迫击炮弹，弹体上涂满了各色油彩。靠墙的高桌上摆满了大使家人的照

片，还有一张巨幅的性感小猫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照片经电子分色处理，脸部颜色简化到黑、红和深绿。与其相对的墙上是纪念美国什么博物馆200周年的招贴画，画面杂乱，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着陆的82空降师伞兵和一顶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红、绿、蓝色充满了画面。大使的办公桌空着。皮转椅旁是一面美国国旗，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战前巴格达商店出售标有科威特字样的商品，新华社记者李大伟在购买咖啡。这些商品都是伊军从科威特"统一"来的。（唐师曾　摄）

1月13日22点10分，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200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时任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5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依然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罗孚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些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129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1第纳尔3.228美元的官价相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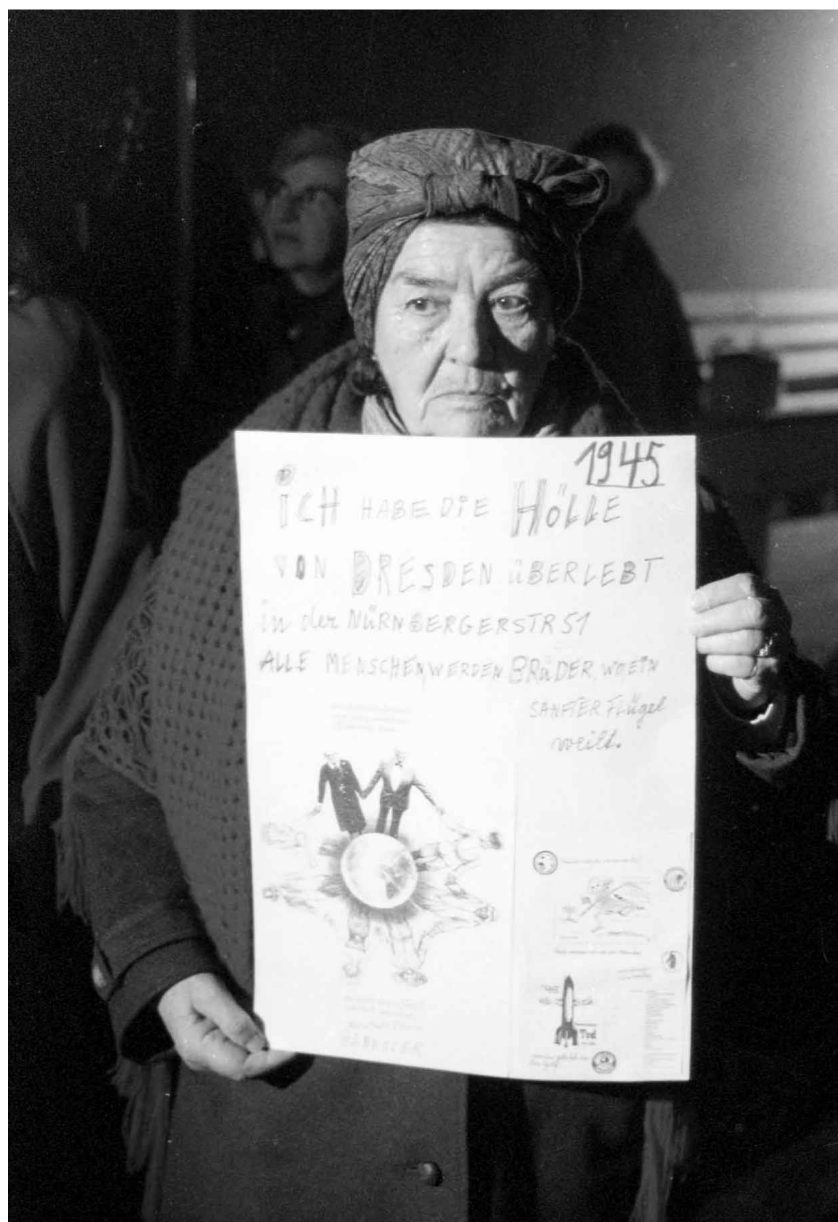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

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个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和萨达姆，“No chemical weapons!”（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伫立，我只认识德文“Ich”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伦堡。

传真照片发回北京，让精通德语的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一翻译，才明白是借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句唱词：“我们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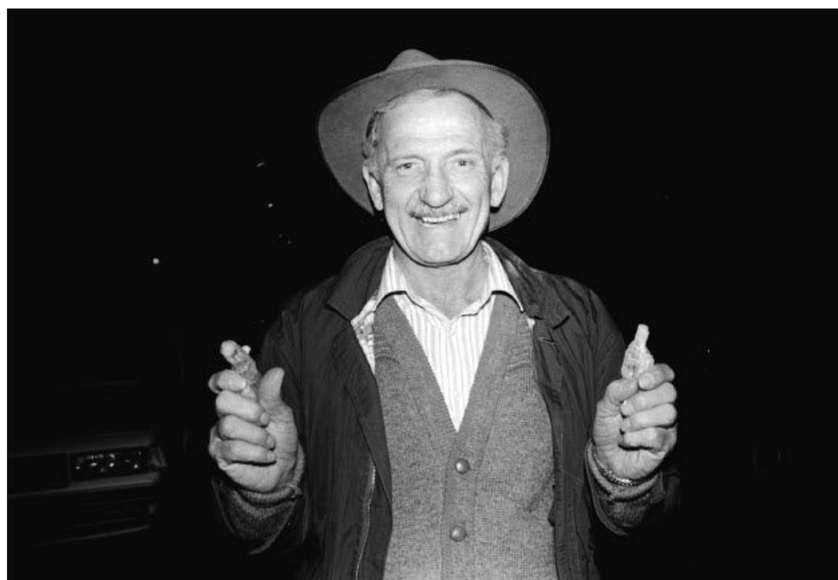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



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伫立。上面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句唱词：“我们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唐师曾　摄）



巴格达市民在大战前夕囤积生活必需品，此时食品并不短缺。（唐师曾　摄）



澳大利亚牛仔要把两支玩具手枪分别卖给布什和萨达姆，希望这两位政治家以“水枪”互决，不要牵连劳苦大众。（唐师曾　摄）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应，老年人则出奇地平静和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那儿有化学武器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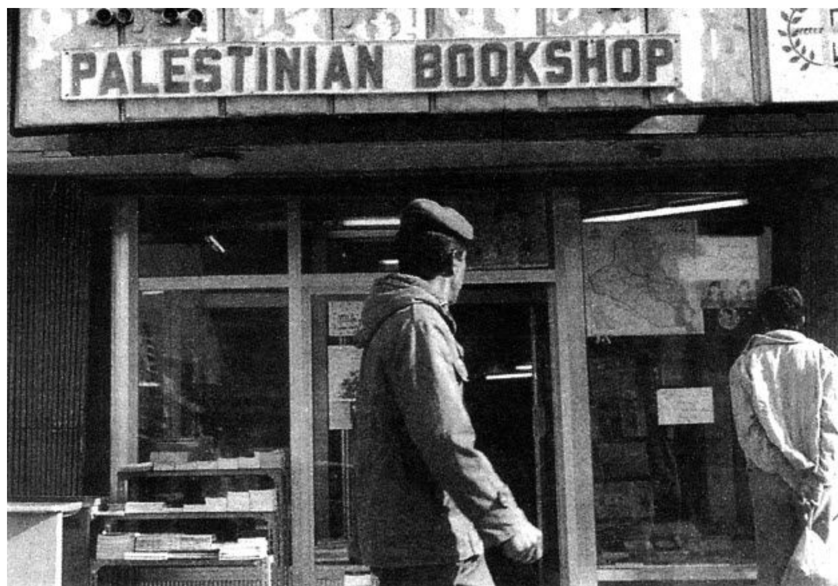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梦都想当摄影记者的传真员徒儿，我仅用200美元就从这位宪兵手中买了台带马达镜头、口径为1.2的尼康FE，准备战争结束后如果还能活着回去，就把这台相机带给他。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2点30分，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3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荡。

萨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卡迪西亚广场，4座按萨达姆和尼布甲尼撒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4把“卡迪西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看上去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藤一人，美国之音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巴格达街头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图上的科威特

已成为伊拉克的一个省。历史上的科威特一直是伊拉克的一部分，科威特独立乃至加入联合国伊拉克人都不予承认。以西方观点，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统一”类似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对德语地区奥地利、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波兰西部和但泽的“统一”。（唐师曾　摄）

我们在一家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巴黎竞赛画报》的摄影师勃鲁诺闯了进来。我问他这几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说除非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交情。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5个人，其余的工作人员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楼顶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面积占满整个楼顶，冀以免遭轰炸。我和首席记者老朱作为“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3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汽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4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

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它日益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拉马丹是伊拉克军队领袖，权力仅次于萨达姆，还主管民兵组织。这张仿佛拉马丹向我敬军礼的照片，几次帮我逃脱伊拉克军警宪特的严惩。（唐师曾　摄）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唯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成1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1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没。



郑达庸大使（右二）召集留守巴格达的5个人开会。郑大使北大东语系毕业，以勇担责任、仗义执言被外交部称为"郑大炮"。海湾战争期

间屡屡拯救我于水火。战后还写了长篇文章，回忆“老鸭”的勇敢。（唐师曾　摄）



海湾战争开战前夕。大使郑达庸（左二）、武官曹彭龄（左三）、武官夫人卢章谊（右一）和我，全部是北大毕业生。（新华社记者李大伟　摄）

可好景不长，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俸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开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进机场拍些撤退的场面，可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让你进？！”我突然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我也把3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1991年1月14日，联合国对伊拉克空中封锁前，伊拉克航空公司的最后一个航班，满载难民即将飞往约旦首都安曼。（唐师曾　摄）

在机场，我由于没办离境签证手续而被扣押。在战时伊拉克，常驻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办签证手续。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没有随其他同事办出境手续，打算潜伏下来，现在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约旦，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不想在边境上被捕。使馆几位同胞上前理论毫无用处，还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躬亲担保劳工等人，镇静、灵活、耐心、坚定而又不失风度。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继续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伺机而动。

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他们都是些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

——杰弗里·迈耶斯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纷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洲际饭店成了各色记者的总部，工作性质各异、身着奇装异服的记者们冲劲十足地上蹿下跳，从上至下充满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投入气氛。

在这里，只需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3个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的采访通行证，但对那些刚刚飞离巴格达的西方记者来说，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到过巴格达成为一种荣耀，共同社近藤由于1月16日才离开巴格达而被视为英雄。

在洲际饭店主楼8层，美国CBS租用了半层楼作演播室，雇员们手持对讲机神气活现地奔上跑下。在巴格达和我一块玩儿过命的共同社河野也在5层包租了一个大套间作为工作室，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在这里架起了自己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坐镇听电话的是共同社中东首席近藤。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大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约旦伞兵扣留7个半小时，约旦军方弄不懂，记者为什么对死海感兴趣，而按

规定死海因与军事沾边不得采访。最后竟惊动了日本大使馆。可肇事的日本记者却洋洋得意，“因为每扣一次，就等于一枚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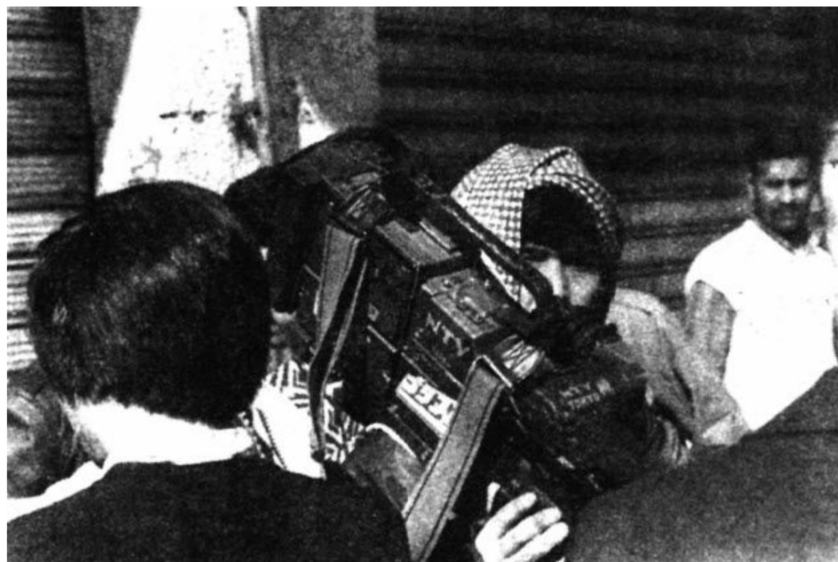
约旦士兵没收我的尼康相机时，我忍不住冒险用膝头的莱卡M-4相机拍下这一瞬间。（唐师曾　摄）

我自己的遭遇并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经无法统计相机被扣的详细次数。我早已习惯双手举着相机紧贴在后脑勺上走向端枪的大兵听从处理。不过，就在大兵收走我的相机时，我也还是忍不住来点小动作。

为了自我保护，唯恐天下不乱的各国记者高招纷呈。日本NTV电视台的记者买了阿拉伯人的包头“哈代”装扮起来，希望为此博得好感，方便采访，但仍寸步难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来搡去，险似风雨中一叶小舟。

美国记者斯蒂芬·拉赫曼胸佩两枚加拿大枫叶徽章，站在约伊边界

难民营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大讲反对战争。在他的前衣襟上还别了一枚大铝牌，上写“No Blood For Oil”（不要为石油流血）。这位自称1989年在西单路口认识我的美国佬，指着我胸口上的五星红旗，让我当众证明他是加拿大人。



日本NTV记者头顶阿拉伯头巾，以期拉近自己与当地阿拉伯难民的距离。（唐师曾　摄）



自称1989年在西单路口认识我的美国记者斯蒂芬·拉赫曼，在遭遇阿拉伯难民围攻时，借助我的“东方脸”为自己解围。（唐师曾　摄）



我和台湾“台视”记者朱增有等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采访。

台湾有30多个记者住在约旦洲际饭店，可彼此封锁消息，竞争自然激烈。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国驻约旦使馆呈报名单，恳请予以照顾。章大使在接见台湾记者时还几次让我作陪，让我神气不少。时报报系、联合报系、自立报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时报报系的摄影记者林少岩是刚从亚运会上撤出来的，一见我连称“世界真小”。时报的张升日前又爆冷门，居然得到一张前往巴格达的签证，引得西方记者又羡慕又嫉妒。

瑞典电视台摄影师在自己前胸后背挂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写：“血比油贵·瑞典电视。”财大气粗的路透社在约旦洲际饭店通过闭路电视向所有房间播放它的英文快讯，一帮胆小的白人记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两眼发酸。这里还可以看到以色列电视台连续24小时的节目，引得一些记者跟着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习。老牌的军事记者则权威地指着屏幕上出现的场面：这是F-14公猫战斗机，那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



约旦首都安曼警卫伊拉克大使馆的约旦部队，这是装备12.7毫米机枪的轻型装甲车。（唐师曾　摄）

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正暗中准备去以色列，英国战地记者钱德勒就是一个。他连声解释说是因为英国关闭了驻伊拉克大使馆他才没能进巴格达的，并一再追问我在巴格达是否弄到什么“绝的”。几位台湾记者也在暗中筹划去塞浦路斯，据说那里很容易得到以色列签证，而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旦护照上印有以色列的痕迹，整本护照就告作废。我的好朋友近藤也将于日内去特拉维夫，安曼的工作由一个新手接替。近藤认为一个好记者必须有天赋、学校教育和丰富经验。他由于多年战乱经验而扮演共同社中东“救火队员”的角色。

连续3天的阴雨给安曼带来一丝喜悦，因为谣传化学武器最怕大雨滂沱。但军事专家劝告大家不要盲目乐观，地中海的西风会把以色列上空的空气原封不动地吹到约旦，现代战争中没有幸存者，吓得约旦人举家外迁，以避战祸。各国记者则作壁上观，注视中东风云。

“打起来了！”

我下令把“一切能飞的东西”都动员起来。

——尼克松

1991年1月17日。约旦首都安曼。

中东时间凌晨2点10分，我被新华社约旦分社的小陈叫醒：“打起来了！”新华社安曼首席记者老符跑上4楼看电传。我们则用胶条将传真室和小陈、老符及我的卧室封起来。老符发给我一支Eveready牌手电，红色的。

2点30分，我给洲际饭店的河野打电话，打不通。BBC报道说，海湾战争的第一枪是由美国战列舰打响的。现代战争没有前线，也没有后方。在1月17日凌晨多国部队的飞机发起攻击之前，“密苏里”号战列舰和“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向伊、科境内的目标发射了上百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据美军宣称，命中率达90％以上。

“密苏里”号战列舰是艘历史名舰，以杜鲁门总统的老家密苏里州命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就是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当时美国五星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国在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按美国人的说法，他共用了五支钢笔才签完他的大名。他首先用第一支笔写了“道格”，将笔送给了母校西点军校；又用第二支笔签上“拉斯”，将笔送给了国会图书馆；之后又用两支笔签上麦克阿瑟，将两支笔分送给当年丢失新加坡的英国白西华特（Percival）将军和丢失菲律宾的美军中将温莱特；最后，他用一支小红笔签上他的军

衔，这支小笔送给了麦克阿瑟夫人。该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未被美国海军封存的战列舰，改装后曾在海湾为科威特油轮护航。今天，这名“老将”又立下新的战功。



美国参与海湾战争的最巨型战舰——“尼米兹”级核动力攻击型航空母舰（唐师曾　摄）

4点，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这不是越南，我决不会束缚将军们的手脚，直打到独裁者垮台，打到科威特解放，合法政权建立。

4点30分，小陈给他的约通社朋友打电话，得知约伊边境的伊导弹基地被击中，伊拉克只有一枚导弹发射到沙特。

开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各型飞机，发射“Tomahawk”（战斧）巡航导弹等实施大规模袭击，重点是攻击对美军和多国部队造成严重威胁的伊拉克战略性目标：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指挥中心、通讯枢纽、导弹基地、核生化设施、空军机场、交

通枢纽等。

多国部队的空军作战飞机主要由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和土耳其起飞，从伊拉克南部和北部进入。海军作战飞机由波斯湾的3艘航母和红海的3艘航母上起飞，从伊东南部和西南部进入。B-52战略轰炸机由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和沙特的吉达机场起飞，从伊南部进入。“战斧”巡航导弹由波斯湾的战列舰、其他水面舰只、红海及地中海的潜艇发射，从伊东部和西部进入。





海湾战争爆发后，我奉命在约旦首都安曼待命，由于风闻伊拉克要使用生化武器和原子弹，中国驻约旦使馆的留守人员武装到牙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伦比将军开辟的阿伦比小道，是以色列通向约旦的咽喉（唐师曾　摄）

5点50分，接新华社总社总编室来电，通报表扬我。

6点，房东老太太来电话问到底出了什么事：“谁打谁了？”

7点30分，到使馆吃饭，街上静悄悄，不见异常。

上午9点，与小陈去叙利亚使馆办事。街头出现戴钢盔的士兵，警戒重要部门和使馆。我在车上用80-200加倍f4、1/1000“扫射”。车走到半路抛锚了，请约旦人帮忙。问我们会阿语吗？我们答“Shiway-Shiway”（一点点）。问我布什坏不坏，我揣摩着他的心思，头由右上向左下，似摆似点。他挺高兴，“撒狄克（朋友）。”修车的小伙叫哈利德，我刚拿起相机，就冲过来一个人朝我们怒骂，小陈劝我快收起相机。

14点，总社摄影部来电，要求拍机场，可无交通工具。传了一张4个大兵的10寸传真。

晚上，无钱无权的我开始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与“日本鬼子”联手出击。北大师兄河野建议千万带上一面中国国旗。我与河野约定，明早7点半去洲际饭店拉上大河源利男、近藤一起去边境。

夜里，河野来电，不去了。因为伊拉克袭击了以色列。共同社的近藤准备沿十字军阿伦比将军开辟的阿伦比小道偷越国境去以色列。我将自己想与近藤合伙的想法报告了中东总分社的上司，结果又被训斥一顿。

老符让打行李，拆机器，凌晨搬到使馆。整个约旦仿佛已被化学武器击中了似的，印度驻约旦大使跑到中国使馆问章大使要塑料薄膜。家家户户都在用塑料布构筑防毒室。

安曼祈祷和平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化剑为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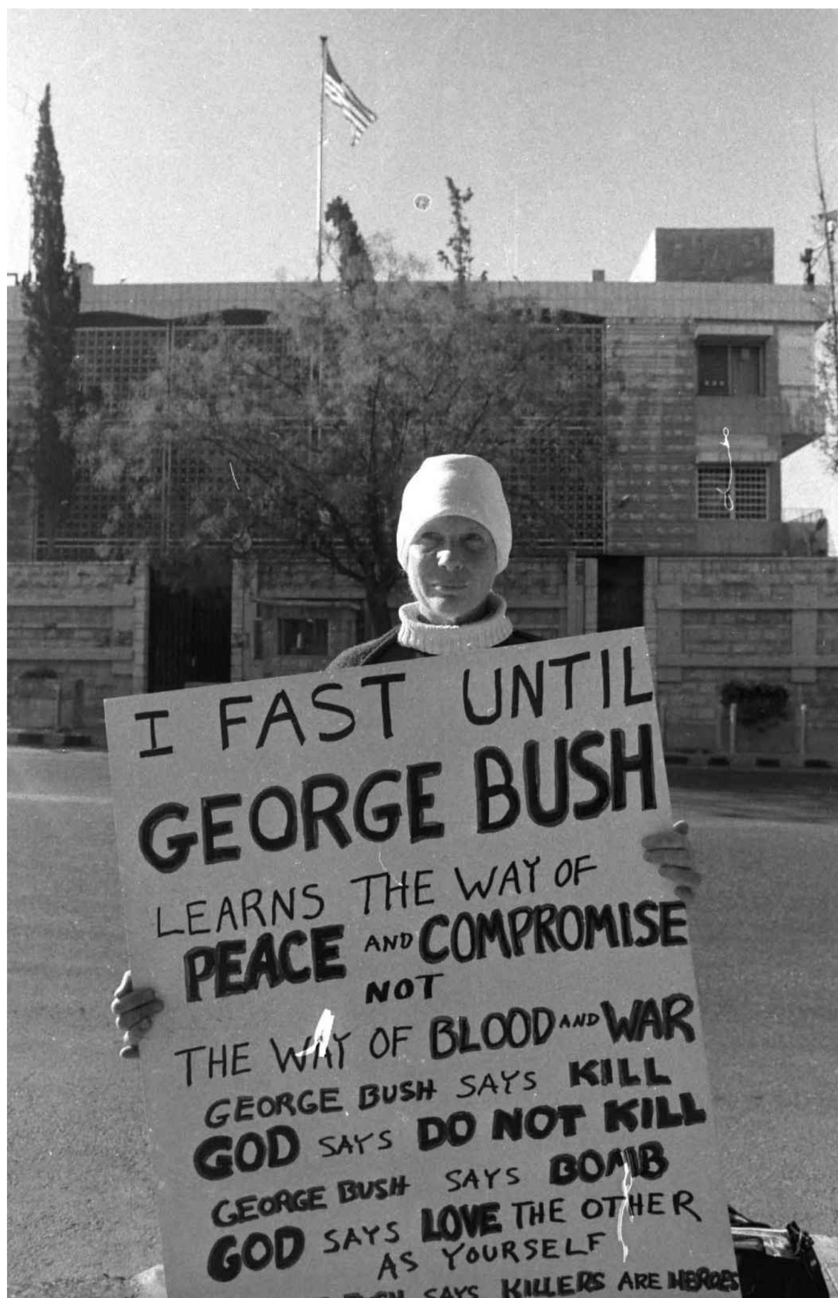
——《圣经·旧约》

1月18日，周五。

今天是伊斯兰教“主麻”日（阿拉伯文alDjum'ah的音译，意为“聚会”。伊斯兰教定星期五为聚礼日，通称“主麻”。这一天正午后教徒举行的集体礼拜称主麻礼拜。穆斯林习惯称一周为一个主麻）。在安曼最大的清真寺——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数千名穆斯林在此聚礼，祈祷和平。下午1点整，这座以侯赛因国王祖父命名的清真寺里座无虚席，前来参加聚礼的人一直排到清真寺外的广场上。穆斯林们人手一席，富有的用毛毯，贫穷的以一张硬纸垫在身下，几个小孩专门给赤手空拳者送旧牛皮纸。数千名穆斯林或坐或跪，口中念念有词，雄伟壮观。几位正在值勤的警官也暂停自己的公务，虔诚地匍匐在地，引得几十名外国记者争相拍照。日本NTV电视摄制组也穿着阿拉伯民族服装，头缠花头巾，在祈祷的人海中穿行。

与此同时，在美国使馆门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退休教授艾伦·罗塞尔博士正在静坐绝食，抗议布什政府动用武力解决海湾危机。她高举一块用英阿两种文字写满上帝和耶稣教诲的纸牌，朝过往行人大喊：“上帝让我们人人相爱。”在艾伦身旁是一位不肯透露自己姓名的约旦人，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这位中年男子手捧《古兰经》，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来此静坐。他对我称赞“中国是热爱和平的”。青年们则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弄得不知所措。出租车司机穆罕默

德说到激动处竟双手离开方向盘，任凭汽车像脱缰野马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他双手模仿端枪姿势，口中“哒哒哒”地大喊“我真该去打仗”。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痛苦地说：“我们不是不要和平，他们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中国人知道。”



艾伦博士在美国使馆前静坐绝食，抗议布什动用武力解决海湾危机。（唐师曾　摄）



数千名穆斯林在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参加聚礼，场面蔚为壮观。（唐师曾　摄）



“主麻日”，伊斯兰教徒或坐或跪，在毛毯、硬纸垫上祈祷和平。（唐

师曾　摄）

我也真该去前线！作为一名战地记者，邻国硝烟滚滚、战火纷飞，我却安然坐等在这块“中东的瑞士”，在街上逛着，在屋里窝着。

我想起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康熙帝在畅春园射箭，忽有大臣来报，广西反了吴三桂，福建反了郑经（郑成功之子）。康熙帝仅说了声“朕知道了”，就继续射箭。

事后有人问康熙为什么不立即调兵平叛，康熙从容答道：“福建、广西距京师数千里，奏章往来传递需半个月之久，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朕远离前线降旨指挥未必得当。他们不执行御旨是抗旨不遵，盲目执行御旨则非打败仗不可。我既已委派他们为督抚镇守地方，高官厚禄的封疆大吏理应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久，两处叛乱果然平定。可我觉得现在的“封疆大吏”未必有康熙时代官员的觉悟。我想，我必须越级告诉北京我所处的态势，使北京同意我开赴一线。于是，我忍无可忍提起了笔：

总社摄影部值班室：

在安曼待命的指令已收到，作为士兵，我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像一周前服从由巴格达撤出的决定一样，我再向你们申诉一下。因为，从工作考虑，安曼可上镜头的东西已经没有，将战地摄影记者放在一个中立国等待转机，有点浪费时间。在这里已很难碰到从巴格达撤下来的摄影记者，他们已分数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安曼太安全、太平静了。

1．安曼已不是重返巴格达的跳板。伊拉克已关闭了约伊边界，并停止办理签证。我已去过伊拉克驻约旦使馆和约伊边境地区。

2．巴格达水、电、交通瘫痪，无法摄影、采访、发稿。

CNN有卫星发稿，而我什么也没有。

3．除非以色列假道伐虢，一般在约旦拍不到战争场面，这里太安全了。理由有三：（1）伊拉克不愿失去西部安静的边界，为把陆军装甲单位集中在北纬31°线防范美军登陆，伊希望西部无战事；（2）以色列不必自己冒激怒阿拉伯国家之险，从国家利益考虑，不会主动进攻约旦河东岸；（3）约旦既要维护自己利益，保住哈希姆王朝，又要以“前线国家”自诩，满足经济上的好处。因此，约旦很可能成为中东的瑞士，因此不适合战地摄影。

4．以色列参战与否完全视其国家利益而定。除非遭到伊拉克化学、生物武器袭击，伤亡重大，否则一般不会因一两颗“飞毛腿”而反击。而伊如要动用生化武器应在盟国陆军深入伊境内、伊濒临崩溃时。而盟国在炮火准备未达一个月之前，不会贸然登陆。所以安曼无战事。

5．如以色列进攻伊无外乎两种手法：（1）空军轰炸。这点不可能，因为以的空军不可能比盟国空军优秀，一向以出奇制胜闻名的以空军现在已不可能取得1982年“巴比伦行动”轰炸伊核反应堆的奇袭效果；（2）坦克奔袭。这点现在也不可能，由于补给线太长，以色列无力保障2000公里的油料供应。按每小时推进40公里的速度，也无法造成突袭效果。故作为战地记者，在安曼意义不大。

我现在处境就像1944年12月巴斯托尼的巴顿。山本五十六反对向美开战，可既然天皇让打，他就拼了命打好。我会服从在安曼待命的决定，就像一周前我被撤出巴格达一样。

鲁威谢德难民营

驼背到了坟墓里自然会直的。

——俄国谚语

海湾战争爆发后，大批战争难民逃离伊拉克，混乱之际大多未办理合法的护照、签证手续，因而在伊拉克、约旦边境受阻。茫茫大沙漠中，成千上万的各国难民在伊拉克、约旦边境一带风餐露宿，饥寒、瘟疫开始流行……联合国难民救济组织迅速在边境上遣送、救助战争难民，在伊、约边境修建起3座战时难民营，因为靠近边境驿站鲁威谢德，故命名“鲁威谢德难民营”。

1月17日战争爆发时，新华社摄影部即电告我设法采访位于伊拉克、约旦边界附近的难民营，可直到1月18日晚上，我才获准采访。这封用英阿两种文字签署的文件注明：“兹有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一人获特许前往鲁威谢德（Ruweished）难民营（沿途一切军事地点除外）。此证仅供一天使用，必须于当日下午2时前离开鲁威谢德边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临的是交通问题，难民营离我所在的安曼有296公里，分社的两位文字记者因工作需要必须日夜照看几台电传机，收发文字消息，无法送我去。尽管分社有两辆奔驰轿车。可都跑了有10万公里，车况不好，而且我的国内驾驶证还没有换成约旦执照，无法一人跑长途。可我决不想坐失首批进入难民营的良机。此时，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达工作过的共同社记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兴致还大，他立即出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并在电话中告诉我，明早6

点整到我住宿的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来接我，我只负责准备食品。

1月19日凌晨4点，我悄悄地起床，发动了白色奔驰，先赶回分社传照片，可使馆的两条德国黑背一阵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海湾战争爆发后，大批伊拉克难民涌至约伊边境，在烈日下等待过关。（唐师曾　摄）

凌晨6点，河野的出租车准时来到中国驻约旦使馆门前，我们立即出发。车内除约旦司机、河野和我外，还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约旦司机声明，沿途严禁照相，必须把相机放进包里。

汽车驶出安曼，以120公里的时速向正东飞驰，迎面而来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红通红，公路像一条连结我们和太阳的金色飘带。河野诗兴大发，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条金光大道！”大河源激动得端起佳能相机就要拍太阳，吓得司机连忙制止，弄得我们的满腔柔情全没了！

因为担心多国部队轰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时有载重40吨的巨

型油罐车迎面驶来。河野问是不是从伊拉克来的，约旦司机坚决否认。这些“奔驰”、“沃尔沃”和“曼”牌载重车被压得轮胎边缘凸起，钢板弹簧紧绷，显然是重车。

在安曼以东80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庞大的无线电阵地，天线塔密如蛛网。远处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车载移动式雷达，雷达天线飞速旋转，附近是一群群草绿色的拱形掩体，估计是防空导弹发射器。沿途关卡林立，不断查验我们的证件，并在记事本上记下我们的姓名、国籍、服务单位、通过时间等。我不断地用仅会的几句阿拉伯语与他们打招呼：“萨拉马利空，西尼夏比，索哈菲，孰克兰。”（人民中国记者，你好，谢谢。）他们一听说中国，总是连声说：“西尼，撒狄克。”（中国，朋友。）这些值勤的士兵头戴美式盂形钢盔，钢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意大利造的M式步枪，腰系帆布武装带，腰右侧挂子弹袋，穿黑色高腰皮靴，两腿叉开，呈警戒姿势。公路上，涂迷彩的兰德罗孚军用吉普不时飞驰而过。公路两侧有蓝灰色的轻型轮式装甲车，车身下半截埋在黄土掩体里。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Peter　Fierz在约伊边境收容难民。画面中的两个箭头，一个指向伊拉克，一个指向日内瓦。天堂、地狱在此一分为二。（唐师曾　摄）

在阿兹拉克附近，我们迎头碰上从伊拉克方向开来的三辆外交车，上前一问才知道是刚从巴格达撤出来的埃及外交官。这位开白色奔驰280的外交官说：“巴格达情况糟极了，各国使馆间不能彼此联系，我们只能听广播，看电视。据我所知除苏联使馆外，各国在巴格达的使馆全都撤空了。”当我们问到边境地区难民状况时，这位外交官摇着头说：“不能说。”河野追问：“为什么不能说？”外交官回答：“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我忍不住钻进汽车拿出相机拍下这些场景。共同社大河源也拿出他的佳能T-90一阵猛拍，继而摁下快速回片装置，将照完的胶卷退出。

就在这时，一名端M-16步枪的士兵大踏步走来，一把夺走我的尼康相机，同时没收了我们约旦司机的驾驶证。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复用阿文说：“中国，人民中国！”这家伙才稍有松动，但坚定地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拍照！”说罢强行打开照相机后盖，没收了我的胶卷。

出租车司机已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半蹲在地。多亏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颜悦色地向士兵讲好话，士兵扭头走回50米外的哨位，河野坚定不移地紧跟着他，我拎着被曝了光的相机，遥望河野指手画脚地恳求那个士兵。约摸过了10分钟，河野终于要回了出租车司机的执照，可出租车司机蹲在沙地上再也不肯往前开了！在河野再三央求下，直到逼着我把相机装入器材包，拉紧了拉链，才嘟嘟囔囔地发动了车子。我暗自赞叹河野的三寸不烂之舌，更佩服大河源快速装胶卷的功夫。

在鲁威谢德边防检查站，我们先到军方办理了手续，之后又到边防站警方办理手续。这里十几辆伊拉克汽车正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进入约旦，车顶上捆绑着各种行李。一辆大雪佛兰的右后轮胎扎了，几个人正在修轮胎。

一位自己驱车由伊拉克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着她的老式别

克休息。她告诉我们：她和她的父母是昨天下午离开巴格达的。“巴格达到处是飞机、枪声和导弹。我的朋友亲眼看见美国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被抓。”这位少女咬着美丽的嘴唇说，“可我一点儿也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是一场对整个阿拉伯的战争。”

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入口处，边防警察查验我们的证件后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上缺少一位长官的签名和军衔，为此我们必须返回30公里外的指挥部补签。我们只好顺原路返回。



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协会设在伊拉克边境地区的难民营。（唐师曾　摄）



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协会向女难民发卫生巾。（唐师曾　摄）



鲁威谢德难民营帐篷前的3个孩子。（唐师曾　摄）



海湾战争是全新形式的现代战争。处于战争核心地带的难民，需要靠收听广播来了解自身的处境。即使广播里胡说八道，也只有听的份儿。一位难民正在通过收音机了解外面世界的形势。（唐师曾　摄）



一位从伊拉克逃出来的难民喜不自胜，“可逃出来啦！”（唐师曾

摄）

共同社大河源准备用佳能相机偷拍，立即被一名穿灰制服的安全警察制止。我们拿出军警签发的允许拍照的文件给他看，他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难民营再向前开30公里。"眼巴巴看着列队的汽车长龙擦肩而过，我和大河源相视苦笑，默默无言。

鲁威谢德难民营位于约伊边境的中立区，沿公路共有3座大型临时营地，每个营地有面积近100平方米的帐篷二三十顶，上百名埃及难民在列队办理登记手续。几名苏丹人正围着临时架设的自来水龙头洗脚。在一座草绿色帐篷门口，4个苏丹儿童在吃一种白面做的薄饼。妇女们用黑纱裹得紧紧的，不许记者靠近她们的帐篷。

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一辆兰德罗孚警车前，问一位警官我可以拍什么。他用缓慢的英语说："营地中的难民。但不许把警察拍进去！"我告诉他那些难民拒绝拍照，"如果他们攻击我怎么办？"警官面无表情地说："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抓紧时间小心翼翼地拍照，竭力避免拍进警察或激怒神经质的难民。我尽量朝每一个人微笑，迅速判断这个对象是否会允许我揿下快门。我耳旁回荡着大河源佳能T-90快速过卷和回片的马达声，紧张而有秩序。河野此时已远离我们去采访营地的国际红十字会官员。

一刻钟后，河野跑过来喊我和大河源，已经到返回的时间了。我对准肩扛行李步入营地的埃及难民，揿完最后几张，才恋恋不舍地钻进汽车。窗外，一队天蓝色挂有联合国标志的卡车正驶入营地。可我不敢再冒胶卷曝光的危险了。我摸出带来的大橙子，用瑞士军刀切开，递给河野、大河源和约旦司机。"好吃，真好吃！"河野连声赞叹。

这里离安曼近300公里的路，河野伸了伸懒腰说："还要开几个钟头呢，咱们睡会儿吧！"梦中，我梦见我向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哭诉士

兵抢走了我的尼康F-4。

贝卡难民营

狠心的人把烟末子撒在猕猴眼睛里，平白无故……

——索尔仁尼琴

阴雨已持续了4天，到今早（25日），已变成纷纷扬扬的小雪。约旦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终于来临，气温是-1℃。此间大股的外国记者已分几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记者待在洲际饭店中作牛蛙状冬眠。只有个别不安分的记者不顾风雪，策划着新的冒险。

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克持是我在巴格达的老朋友，他约好我今早去街上转转。在洲际饭店门口，精神抖擞的麦克身背索尼录音机，穿一件黑色羽绒夹克。在他身旁缩头缩脑地站着一个小巧玲珑的亚洲女孩，麦克介绍说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丽，是印尼《坦波》（*Tempo*　）杂志的文字记者。麦克早已雇好了出租车，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司机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我们4个不同种族的人，组成了一支小联合国军。

我们先到伊拉克驻安曼使馆，使馆大门口站着3个安全警察。一辆深灰色轮式轻装甲车堵在使馆正门，车上的重机枪上包着绿色防雨套，操纵机枪的士兵缩在雨衣里抽烟。我们敲开伊拉克使馆的小铁窗，声称要去巴格达。小窗内有3个伊拉克人，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小窗中递出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满了英文字：“亲爱的旅客，由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侵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暂停办理签证。我们欢迎您在不久的将来到伊拉克

游览。”任凭麦克和尤丽怎么说，里面的人就是不吭声。

出租车司机穆罕默德自告奋勇地要带我们去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贝卡难民营，他保证绝对没问题，他的家就在那里。



美国CBS记者迈克·克持，向巴勒斯坦儿童解释自己是不同于乔治·布什的“美国好人”。（唐师曾　摄）

由安曼驱车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车玻璃蒙上一层厚厚的哈气，司机穆罕默德从汽车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纸，让尤丽帮他不停地擦前挡风玻璃上的水汽。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已进入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摇下汽车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说：“你尽管照相，警察来了也不用怕，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这时，他突然踩住刹车，招手喊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汉子过来，扔给那汉子一枚硬币。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说，这汉子是个疯子，“想回家都想疯了”！

司机穆罕默德几乎认识这里所有的人，路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竟

是他的亲家。他把我们带到一座围有铁栏杆的清真寺门口，就一头扎进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祷告了。我和麦克、尤丽也分头行动：我要的是照片，麦克要的是录音，尤丽自称有个什么专访。

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一举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不友好国家”的空军。以色列装甲兵向西一直跨过苏伊士运河，向北楔入叙利亚，向东攻至约旦境内。大批阿拉伯难民流离失所，流向中东各国。其中约10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约旦河东岸约旦境内，联合国为此修建了贝卡难民营。

这里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巴勒斯坦人。当地居民每家一般有两三间小平顶屋，屋顶堆放着木柴，拉满晾晒衣服的细铁丝，屋内用小煤油炉取暖，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妇女不许外人照相。联合国还为难民营修建了简单的医院和学校。

凯米尔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一家共有三间平顶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正在装修，我和麦克脱掉沾满黄泥的球鞋，被引进他家的客厅兼卧室席地而坐。凯米尔年轻美丽的妻子在屋内正中的煤油炉上为我们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夹着只有中国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麦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丝丝的，带点薄荷味。我双手紧捧滚烫的咖啡杯，生怕洒到崭新的羊毛地毯上。凯米尔说，地毯是沙特制造的。沿屋内四壁墙根是叠放整齐的毛毯，供晚上睡觉用。房屋正东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幅画像，上面萨达姆怀抱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画像右下角贴了一张5寸彩色照片，是凯米尔的漂亮妻子。3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缩在凯米尔妻子的身后看电视，20寸的索尼彩电正播放美国轰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轮，石油散布到海面上和海鸟死亡的镜头。凯米尔说他用了2000约旦第纳尔（大约2500美元）买了这座房子，这还得感谢约旦当局，而科威特则拒绝了他买房子的请求。

凯米尔两手平伸，“萨达姆并没有给我一分钱，我也并不特别喜

欢他，问题是他想着我们巴勒斯坦人。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说到这里，他朝妻子一努嘴，温顺的小妻子立即跳起来，爬到柜顶上取过一个小布包。凯米尔拿出一个暗绿色的小本，说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证。他说他感谢联合国在贝卡难民营开办了学校，尽管水平仅仅“OK”，谈不上好，但毕竟是免费的。说到这里，他朝我鞠了一个躬，“中国也出钱为我们建了一所学校。”说着他叫过4岁的女儿里奇·哈丹给我们表演用英文数数，小哈丹可以数到“10”。凯米尔说，她的英文全是跟着电视学的。



约旦百姓向伊拉克捐款，支持萨达姆“抗击”美帝侵略。（唐师曾

摄）



历史上的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有血缘关系，类似我们与

朝鲜、越南的唇齿相依。海湾战争期间，上述国家、地区的人民普遍举行支持萨达姆的大游行，更有志愿军到伊拉克直接参战。（唐师曾 摄）



1991年1月25日，贝卡难民营举行盛大反美游行，支持萨达姆。（唐师曾 摄）

此时，街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涌上街头开始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和平、支持萨达姆和打倒布什的口号，队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大画像。凯米尔说这里“有15万巴勒斯坦难民”，这种规模的游行是经常性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围着贝卡难民营缓慢行进。

告别约旦

单独旅行的人走得最快。

——吉卜林

1991年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我，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我进以色列的申请。原来这天晚上新华社例行的编务会，总编南振中展示了我要求去以色列的文传申请。副总编王文卿说："唐老鸭的干草都有露珠。"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趁机列数我的忠勇。正巧新华社副社长兼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此时走进来，问："谁要去以色列？"众人说："唐老鸭！"曾建徽当即指示："唐老鸭！应该去！"1989年6月3日，曾建微曾带我和几位军队记者采访过六部口被围的汽车。当时我几进几出完成拍摄任务，给老人家留下极深印象。摄影部副主任林川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朝我大喊："鸭子，力争当第一个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你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应该懂我们的立场。我只要你快！给我拍'飞毛腿''爱国者'导弹，还有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约旦分社用电话帮我预订了2月1日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约旦与以色列是敌对国家，没有任何交往，连电话都不通。约旦河谷阿拉伯人与以军的流血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由约旦首都安曼开车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两个多小时，可两军对峙，我只好绕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为

地中海第三大岛，主要由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组成。

中午，约旦分社小陈陪我去取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交款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竟有一班飞往塞浦路斯拉纳卡的飞机，这意味着可以争得3天时间。我请求换乘这班飞机。小陈用电话请示了分社首席记者后，帮我改了机票。小陈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到空中再找立脚点。这趟航班要求3点以前到达机场。

我回到分社，老符开上奔驰就往机场赶，此时只差10分钟就3点了。老符把车开到时速150公里，结果被警察截住，罚了20美元。赶到机场才知道，飞机推迟起飞。

约旦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外，坐满了难民。一群一周前在鲁威谢德难民营认识的苏丹难民一见我就齐声大喊：“西尼，索哈菲！”（中国，记者！）我忍不住端起莱卡摁了两张。正想变换角度，走过来一个身着深灰制服的警察、一个戴红色贝雷帽的士兵和一个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气地说了句：“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话，他却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机。任我百般解释，毫无效果。面对他那双酷似强奸未遂者的肉眼和四周无所事事跟着瞎起哄的难民，我气得脸色发白，双手发抖，不再解释，只想尽快结束。我在约旦碰到此类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长记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几张就把胶卷退出来。现在只能为这个胶卷流泪，恍惚记得这卷有偷拍的伊拉克驻约旦使馆、约旦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刚才的难民。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国防军在巡逻。（唐师曾　摄）



约旦长途汽车站，逃离战火的老母亲。（唐师曾　摄）

离起飞还有5个小时，我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旁边是几个菲律宾小保姆，一个自称是叙利亚人现在美国当雇佣兵的家伙用谁也听不懂的英语唠叨个不停，非缠着我让我解释菲律宾人、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我不耐烦地挥挥手，“中国人长得最高，像我这种一米八几的在中国算是矮的，其他几国一个比一个矮，罗圈腿。”

我情绪坏到极点，找了辆行李车推着自己的5件行李往里走。一个鸡胸驼背、獐头鼠目、就像刚丢了驴的阿凡提似的约旦人抢着帮我推车，任我怎么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开，傻呆呆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直到我朝他大吼一声：“没有美元！”才悻悻离去，果然他不想学雷锋。

3道安检过后，我的防毒面具、钢盔、防弹背心等弄得满地都是。英国WTN电视编辑古斯塔斯走过来帮我收拾行李。作为回报，我给他讲了一下巴格达的战前形势。

耗到晚上9点，本应下午5点起飞的航班才开始滑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着陆。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塞浦路斯入境签证。塞浦路斯是个欧化国家，由于我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而无需随大队旅客排队。我先到移民局申请入境签证。我的钢盔和防毒面具镇住了海关，我对移民局讲，我是从巴格达过来的，准备绕道这里去以色列，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签证，请高抬贵手，帮我入境。移民官员连说问题不大，但先得给他们讲讲伊拉克、约旦那边的形势。一刻钟后，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国土。

另纸签证

我时常跨到敌对阵营去，不是当逃兵，而是做侦察员。

——赫胥黎

以色列驻塞浦路斯使馆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为防备恐怖分子，胡同两头已被铁丝网路障封死。我们的奔驰轿车奉命停到两条街口以外的停车场。把守路口的两位肩扛AK-M式冲锋枪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细盘查后，放我和新华社驻塞浦路斯首席记者陈德昌穿过路障。

踏着积水的石子儿路，呼吸着清新的地中海空气，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陈就给以色列使馆二秘梅隆先生打了电话，将我姓名的英文拼写和护照号码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层小楼就是以色列驻塞使馆，一面蓝白相间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飘舞。四五个塞浦路斯武装警察平端着冲锋枪往来巡逻。使馆铁门紧闭，我们通过装在门上的对讲机与楼内的保安人员对话3分钟后，铁门才“咔嚓”一声自动打开。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道自控门，经过同样程序后，进入使馆会客厅。

会客厅不大，正面和左侧墙壁上各开了一个半平方米大小、装有数层防弹玻璃的窗口，我们隔着10厘米厚的玻璃，通过对讲机与里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语对话。我奉命将填好的表格和护照，通过防弹窗下侧的特殊暗道递到里面。

坐等回话的时候，我开始打量这间罐头盒般的小屋。屋内的陈设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除了书架上的旅游介绍和宣传品外，什么也没有。门旁整齐堆放着十几支蓝色包装的灭火器。右侧墙上有一个小佛龛样的东西，上盖一块丝绒帘，绘有六角形的“大卫星”。撩起帘子，是个小柜子，我没敢打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

EMBASSY OF ISRAEL

שגרירות ישראל

CONSULAR SECTION
NICOSIA - CYPRUS

המדור הקונסולרי
ניקוסיה, קפריסין

VISA ON SEPARATE SHEET

SURNAME: Mr. S H I Z E N G :שם המשפחה

NAME: T A N G :שם פרטי

PLACE AND DATE OF BIRTH: B E G I N G 24/01/1961 :תאריך ומקום הלידה

NATIONAL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אזרחות

אשרה זו יפה רק אם תוצג יחד עם דרכון / תעודת מסע

מס' שינתן ב -

T H I S V I S A I S V A L I D O N L Y I F P R E S E N T E D

W I T H P A S S P O R T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EOPLE'S REPUBLICOF CHINA

N o : 447969 I S S U E D A T B E G I N G

האשרה ניתנה בתנאי שנושא התעודה לא יקבל עבודה במדינת ישראל

This visa is given to the holder of this travel-document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would not accept any employment in Israel

Mr. Tang Shizeng

EMBASSY OF ISRAEL (Consular Section) NICOSIA
שגרירות ישראל (המדור הקונסולרי) ניקוסיה

Visa No. KK-91/1065362

Category B-2 -2

Good for one entry

Valid until 01-03-1991

For a stay of 01-MONTH-ONE

Number of persons ONE מספר הנפשות

Date 31/1/1991 תאריך

ELIAHU LEVY אליהו לוי
SECOND SECRETARY מזכיר שני

BEN GURION 01-02-1991 VISIT B/2 1 MONTH 52

BEN GURION BORDER CONTROL EXIT 22-2-1991 115

Embassy of Israel Nicosia

我进入以色列的另纸签证（Visa On Separate Sheef），由以色列驻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大使馆签发。当时中以无外交关系，北京被称为“Beging”。（唐师曾　摄）

对讲机里一个男低音命令我进去，我以为这下子可以见到梅隆了，不料从自控门进去又是一间小隔离室。一名安检人员用对讲机隔着同会客厅一模一样的防弹玻璃开始盘问，声称“为了你本人和我们大家的安全”，从我的职业、毕业的学校、访问过什么国家、发表的作品、宗教信仰、使用的器材、在伊拉克干了什么一直问到我有什么慢性病。最后问我，为什么头一次到中东地区，护照上就填满了塞浦路斯、土耳其、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几乎所有中东国家的签证。我直视着大秃顶的眼睛，缓慢地说；“我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个古老的学派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创始人叫墨子，主张‘非攻’。其历史可能比犹太教还长。基于和平观点，我走遍中东各国，拍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唤醒人们热爱和平的本能。为此，我计划走遍所有有战火的角落，所以这本护照已经快签满了。”秃顶犹太人似乎很感动，也许是被中国历史的悠久慑服。他用对讲机招呼被隔在会客厅的老陈进来，打开最后一道自控门，让老陈和我通过，辗转上了2楼。

二秘梅隆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举止文雅，说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语。他请我们坐下，表示欢迎中国记者去，并答应尽快帮我办签证。我翻开护照印有巴格达签证的那页指给他看，上面有一段紫色的英文：“该证件一旦印有以色列印记全部作废。”梅隆只瞟了一眼，说：“我知道。阿拉伯国家全不喜欢我们，我给你做‘另纸签证’，保你不留丝毫痕迹。”

梅隆说，由于战争，飞往以色列所有的航班全中止了。目前，只有一家私人小飞机后天（2月1日）中午飞以色列，可有一定危险性。为保险，可以乘船去海法。

老陈问我意见，我说：“越快越好。”

从拉纳卡到本古里安

速度可以弥补任何弱点。

——摩西·达扬

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是我北大老学长，经参处二秘小陆是我北大师兄，他开着使馆的奔驰260一直把我送到拉纳卡机场。新华社分社的老陈夫妇像嘱咐3岁的孩子，关照个没完没了。

我早就读到过“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一段话：“速度可以弥补任何弱点。”这与我的“闪击”哲学不谋而合。在候机厅问询处旁的长沙发上，我们终于找到那家搞私人飞行的Sunnit公司的代表。这位西装革履的瘦高男子建议我们先去咖啡厅坐坐，一会儿他会找到我的。

20分钟后，瘦高男子鬼鬼祟祟地进了咖啡厅，像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示意我跟他去。在候机厅厕所旁，已聚集起十来个旅客，两位便装的犹太男女逐一检查旅客们的行李。一位戴眼镜的秃顶犹太男子正用一箱仪器探试旅客们的行李。一位大胡子阿拉伯旅客的箱子的夹层被撕开，东西散落一地。一位要到特拉维夫当保姆的波兰女人正被女警察盘问。

轮到我，那位秃顶戴眼镜的犹太人并不动手检查我的行李，只是说他是警官，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必须配合他一下。他先问我从哪里来，在巴格达干什么，在约旦去了哪里，住在尼科西亚什么地方。这些行李是不是全是我自己的，有没有什么陌生人碰过我的行李，是否

有人送我电子玩具和巧克力。当他听说我是乘中国大使馆的车到机场的，且从未与任何陌生人接触，便表示没有问题，感谢我的合作。我端起莱卡想要拍一张安检的场面，这位秃顶犹太人立即制止了我，让我为他和大家的安全考虑一下。



据《古兰经》记载，阿拉伯穆斯林男子可以娶4个女人，这是一家人。此照片为街头抓拍，根据法律和伊斯兰传统，严禁拍摄阿拉伯妇女。（唐师曾　摄）

一刻钟后，那位漂亮得像《三个侦探》中的波蒂的女便衣走到我面前："我是警察，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请回答我的问题。"接着，把刚才的提问几乎重复一遍。提问过程中，美丽的大眼睛直逼我，一眨不眨，犹如尼康照相机幽深的微距镜头。回答完问题，我早已出了一头冷汗。女便衣说感谢合作，之后掏出一卷不干胶纸，撕下几片1厘米见方的小黄纸，在上面用记号笔画上个希伯来符号，逐一贴在我的5件行李上。整个安检结束，既未开包也未用探测器。

直耗到晚上7点多飞机才起飞，据说这种不定时的改变时间也是

为了防范恐怖分子。几十年来，数不清的针对以色列的劫机犯罪令人不寒而栗。飞机是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像二次世界大战时的B-17轰炸机。机内很简陋，算上安检人员、两个驾驶员和包括我在内的旅客共有14人。飞机滑跑时震耳欲聋，我就坐在驾驶员背后。越过他的肩膀，可以看到发出绿色荧光的仪表板。地中海上空细雨蒙蒙，小飞机在风雨中上下颠簸，窗外漆黑如墨，只能看到雨滴打在我左侧舷窗上划出的直线和前排驾驶员膝盖旁雷达屏幕上飞转的绿色影像。我感到我像秋雨中的落叶，飘飘摇摇。

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左前方45°天际出现一线金光，驾驶员说那是海法。举目望去，以色列笼罩在一团橘黄色的灯光之中，若隐若现，神秘安静。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聚集点。它位于巴勒斯坦西岸中部，大致北起雅尔贡河下游，南到雅法湾，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

差一刻晚9点，我们的破飞机吼叫着在本古里安机场大雨淋过的跑道上着陆。当飞机起落架平稳地接触地面，机上旅客齐声鼓掌。

大胡子的驾驶员扭过头问我：“飞得怎么样？”

我问：“你是问驾驶技术还是问飞机？”

“两者。”

“飞绝了！”我竖起大拇指，“可美国飞机造得也不错。”

没想到，这家伙竟大为不满，“嘿！这飞机可是我们自己造的，型号叫‘阿尔法’。”

偌大的机场内静悄悄空无一人，刚才的旅客眨眼间如水银泻地不见踪迹。循着英、阿、希伯来文路标，我扛着被雨水弄得湿淋淋的行

李爬上2楼敲开移民局办公室的大门。一位着土黄军裤瘦得像眼镜蛇似的中年汉子开门发给我一个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药粉，挥动着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飞毛腿”，中毒后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将药粉涂到被糜烂型化学武器弄伤的皮肤上。

机场问询处的小姐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一声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帮人围着我看新鲜，刨根问底地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朝鲜人的区别。我只得把先前的理论重又兜售一遍：凡是像我这样一米八几的大汉一般都是中国人，其他各国一个比一个矮。

深夜，在我落脚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我湿淋淋地赶到以色列新闻部办公室。

一位官员正在锁门，“你是苏联人？”他指了指我摄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红旗。

“不，中国，北京。”

他“哦”了一声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对不起，我从未见过北京来的中国人。我马上就给你办采访证。你打算待多久，10天？我先给你开15天，如果不够，我再给你延期。”

2月1日是夜，特拉维夫没有遭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仅有一架小型私人飞机载着14人在特拉维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湾战争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飞行。

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犹太谚语

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古称迦南（Canaan）。迦南是《圣经》上的国家，在《圣经》中它是一块辽阔无垠的土地，所有读过《圣经》的人都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点。而现实中的迦南即巴勒斯坦地区并不比海南岛大。它的最北端是黎巴嫩冰雪覆盖的赫门雪山（Herman）脚下的旦城（Dan），南端以“南地”内格夫（Negev）为限，西为地中海，东是约旦河谷地。现在以色列国都的特拉维夫坐落在这块土地西沿中段的地中海海滨。

2月2日早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西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气候温湿。也许由于是周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怎么也找不着饭吃，我住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的法国大菜贵且不说，我连菜单都看不懂。

指挥我的摄影部让我饿了上街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的自来水。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说，欧洲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要我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看着往来脑满肠肥、西装领带、眼镜背头的大胖子矜持庄重地迈动锃亮的皮鞋，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

位于市中心的华人餐馆Tenli Chow的主人因为怕轰炸不知去向。一位名叫Hayarkon的、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自告奋勇地推荐我去他朋友开的小馆子Avazin吃“希希利克”（一种炸鸡块），好歹填饱了肚

子。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马特冈（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



海湾战争中无可奈何的以色列人，左面墙上是一颗大卫星。（唐师曾　摄）

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

废墟上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竖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拉马特冈在公民们的支持下坚强挺立）。

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的第6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6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美国《新闻周刊》日本雇员、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车司机Haime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以色列街头的广告牌。竖着念为"海湾"，横着念为德国的"毒气"、俄国的"飞毛腿"、法国的"原子弹"。正如中东政治的谜局，本来就是超级大国玩弄权术、争夺利益的结果。（唐师曾　摄）



面具下面的一群以色列中学生，齐唱《萨达姆是坏蛋》。（唐师曾摄）



以色列姑娘的防毒面具包装盒上，印着迈克尔·杰克逊为海湾战争而作的新歌《萨达姆是坏蛋》（*SADDAM is BAD*）。注意这里萨达姆与魔鬼撒旦的拼写仅一个字母之差。（唐师曾 摄）



街头小憩的老人，随身携带防毒面具。（唐师曾　摄）

当晚，我和加拿大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犹如魔鬼耶利哥的喇叭。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G-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2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接着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200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以暴力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整个世界就"月朦胧，鸟朦胧"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17层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里，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

客赶入设在6层的防毒室，就像驱赶一群步入传送带待宰的呆猪，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6层的所有通道。



为防备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袭击，以色列法律规定人人必须佩戴防毒面具。婴儿由于太小而被装进类似鱼缸的防毒箱里。（唐师曾　摄）



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队员。（唐师曾摄）

可对干记者这行的，警报声就好比兴奋剂。每逢警报一响，各国记者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记者们赛着炫耀各自的军用品，“台视”朱增有左腿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具”，原是准备防备“共军”的，不想竟与海峡这边的我挤在一起拍“飞毛腿”。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队员，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Israel-Life Behind the Mask”（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的影展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开幕，40幅黑白、彩

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上都有防毒面具。



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的情侣片刻不离防毒面具，接吻时手不离枪。这是一名女空军坐在一名男陆军大腿上，对自己的至爱发动“空袭”。（唐师曾　摄）

《耶路撒冷邮报》曾刊登过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片刻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六三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地对地导弹

（SS：地对地导弹简称，原文为Surface to Surface），使参加影展开幕式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撅着屁股挤在展厅里发呆。

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担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飞毛腿”袭来之际

如果你是好样儿的，出了倒霉事就该怪你自己。

——海明威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6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有线电视）、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帮摄影师，CBS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美国《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待在一起，脚边的防毒面具玉体横陈，就像一堆骷髅头。

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这倒不是我勇敢。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也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的英姿，由于用的1/4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2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200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清一色地背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200美元的美国“多姆克”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的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镜头（如尼康80-200f4），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澳大利亚记者使用美联社底片传真机AP-Leafax发稿，这种机器让我羡慕不已。（唐师曾　摄）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来一大堆外国同行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News Limited*摄影记者Ray Strange笑称我用的是19世纪的机器，问我为何不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清一色地用美

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1.5万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底片（亦可用彩色底片）只需6分半钟，而我用的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需10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AP-Leafax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D-76显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保安人员Yos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B门，他用烟头给我们画一个"爱国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仨一块儿领普利策奖。乔则气得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了，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的结束，犹太教安息日的开始（希伯来文shabbàth，意为第七，犹太教每周一次的圣日。根据《圣经·创世纪》，上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完工休息，故尊第七日为圣日，名安息日。犹太教规定在该日停止工作，礼拜上帝，名曰守安息，基督教承袭这一说法称礼拜日），正好与巴格达的"六三革命节"连在了一起。为此，我还与村田

打了赌，可连响两回警报，却一无所有。

大约凌晨2点30分，我第三次被凄厉的警报声吵醒。我将头钻到枕头底下，认为这次还是“狼来了”，电话铃又响起来，听筒中一个男人用英语命令我闭灯、关水，迅速隐蔽。我摸黑爬上阳台，可特拉维夫全城仍是灯光灿烂。我返回房内拉上落地式大窗帘，这样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横飞。我抄起莱卡、戴上钢盔重新返回阳台上，俯瞰沉睡的城市。



我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楼顶，等候“飞毛腿”来袭。与我朝夕相处的是美国《新闻周刊》日本雇员村田信一。他一直靠高价出售战争照片为他的巴勒斯坦新娘买黄金首饰。从这张信手拈来的夜景可以看出村田的手段。“35毫米不剪裁”，即使在暗夜也用1/8秒慢门，且稳若泰山。（村田信一　摄）

城市中的灯光一片一片地熄灭，我感到肾上腺素直往上涌，心脏狂跳不止，我正面临我职业记者生涯中最富于挑战的几分钟。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下去，不知道能拍到什么东西，我只是尽量地深呼吸，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正北方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直冲夜空，待升到

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几秒钟后，再度出现。继而传来两声沉闷的巨响，楼板跟着一抖，“飞毛腿”真来了！强忍住袭来的恐惧，我哆里哆嗦地摁下了莱卡相机的B门。

我从防火梯跑下一楼大厅，已经没有丝毫的恐惧，往日经历过的兴奋与刺激再度回归到我的全身。这里空无一人。门口竟没有出租车。两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绝我的搭车请求，绝尘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厅。这时迎面跑出一个法国人，先用法语，后用英语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开上你的车，我知道在哪儿。

出饭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队消防车，我们紧随其后，更多的消防车、救护车闪着红黄蓝色的警灯汇入我们的队伍。



1991年2月，被“飞毛腿”摧毁的特拉维夫民宅及汽车。（唐师曾摄）



特拉维夫市中心，一对兄弟站在被“飞毛腿”炸毁的自家房屋前。（唐师曾　摄）



以色列工兵牵着“黑背”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唐师曾　摄）

空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自来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卫—本古里安街的路中央有一个直径七八米的弹坑，几辆汽车已烧作一团乌铁。数名消防队员正用水龙灭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后一辆看上去崭新的Oldsmobil牌车被炸坏的水泥预制板砸破了车顶。牵着德国黑背军犬的工兵救护队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

附近没有灯，只有消防车顶上的探照灯和乱成一片的手电光，红黄蓝各色警灯闪烁不停。士兵的军车首尾相连形成路障，上百名背M-16步枪的志愿者手拉手配合军警将所有记者赶离现场。救护队员将5名轻伤员抬上救护车，我冲过去，消防水龙喷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个士兵几次用手挡住我的闪光灯，气得我破口大骂。一位呼呼大喘的大白胖子指手画脚地指挥灭火，满头白发在夜风中飞舞，竟是以色列住房部长阿里尔·沙龙。

路边一对可怜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脸，求我别照了。一条壮汉朝电视记者大吼：“告诉萨达姆！我们要扔原子弹，炸得他屁滚尿流！我们自己打，我们不用美国人！”



子夜，逃出被炸房屋的老人惊魂未定。（唐师曾　摄）

这是一周来伊拉克导弹首次攻击拉马特冈，也是弹头第3次落入该城。共有5座住宅被毁，150座受损，26人受伤，无人死亡。被毁的建筑物包括缅甸使馆。这是犹太安息日凌晨首次遭受的攻击。

对于以色列的反应，外界一直颇为注意。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70%的市民主张克制。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今晨亦在收音机里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对此次袭击仍将克制。可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后果可就难料了。他指出，过去5次“飞毛腿”袭击每次都仅发射一枚导弹，说明伊拉克的发射能力已大为减弱。到目前为止，“飞毛腿”导弹已使4名以色列人死亡，270人受伤。

一位住房被毁、名叫Rondi的男子说，警报响后约一分钟他看到四面墙壁都向内压来，玻璃碎片向四面横飞，他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尽管房子塌了，可自己仅仅是手臂受伤，还算幸运。在现场协助救护的一名女军人说，这次袭击十分万幸，因为该区不少居民已离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26人受伤。



一对被“飞毛腿”命中房屋的老年夫妇不知所措。（唐师曾　摄）



特拉维夫被“飞毛腿”摧毁的以色列民宅。受害者正从废墟中抢救可再用的生活用品。（唐师曾　摄）

我找了辆出租车赶回希尔顿饭店，甩掉鞋赶紧冲胶卷。趁显影之机，写了篇《“飞毛腿”袭来之际》的短文，送到新闻检查处。再跑回房间，用湿淋淋的底片放传真照片。摄影部值班室听说此时我仅剩一张涂塑传真相纸，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我拎着传真机和水淋淋的10寸传真照片跑到新闻检查处，要回审定的《“飞毛腿”袭来之际》文字稿，传往新华社巴黎分社。等到穿军装的以色列新闻检查官在我的送审照片上盖完审查章，北京新华社摄影部的林川、袁满已要通了我。我装上图片，只听袁满大喊一声：“调幅120转，开发。”湿淋淋的图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画出一条线。我抓起另一台电话向林川口授了图片说明。林川指示；战争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占领土。

发完照片，已是早上5点钟。我收起传真机，将两卷彩色负片交给新闻中心的小姐，请她帮我冲一下。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天一亮好去被占领土。爬上楼才发现，刚才放完照片忘了关放大机，湿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据官方说，昨夜发射的“爱国者”拦截“飞毛腿”导弹没有成功。

戒严中的加沙

夜幕降临的时候，泊在岸边的渔船上灯火在空中摇曳，主宰了夜，隔开了海。

——史蒂文斯

加沙（Gaza）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濒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盛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橘和橄榄等。加沙城附近长约40公里、宽6～8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带”。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1978年，萨达特与贝京达成埃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一直未履行诺言。

2月4曰，以色列政府同意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坦波》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辆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UH-1H休伊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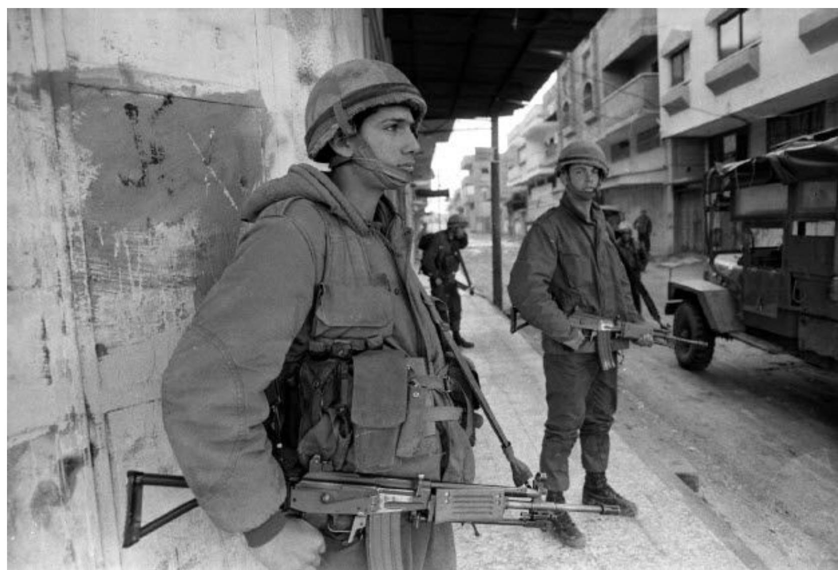


戒严中的加沙，妇女儿童早已习惯在枪炮炸弹下生存。人类不同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在这里千钧一发。（唐师曾　摄）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40谢克，合20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

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M-16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M-16一样，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自动步枪是60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

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以色列军队装备的步枪主要是M-16和以色列自产的加里尔。我国通用的“56”“63”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式最为著名。



加沙Nosserat小镇，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的以军严阵以待。不时有巴勒斯坦狙击手的冷枪划过头顶，继而引来以军枪炮的毁灭性报复。我手端相机穿行其间，深感生命的脆弱。（唐师曾　摄）

在数辆装有4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橘子林，3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橘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地隐没在橘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100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的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儿，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多，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1.6万美元。我当时的感觉犹如鬼子进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员。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追捕打冷枪的巴勒斯坦人，我夹在他们中间迅跑，子弹“嗖嗖”飞过我的头顶，“啪啪”打断头顶上的树枝，尘土落叶钻进我的脖子里。（唐师曾　摄）

下午1点，我们抵达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2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

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军用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车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里呱啦乱叫。阿米尔的紫色贝雷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



在加沙地带，执行戒严任务的以军士兵让我上了装满防护网的吉普。车上的铁网是防石头的。我现在是鬼子进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员。（唐师曾　摄）

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龙，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

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4年，女子3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拳打脚踢地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凯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可以想象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恶战。街上看不到行人踪影。



以色列部队正在逮捕恐怖分子。根据英文解释，凡出于政治目的对政府、组织、个人……实施莫测暴力攻击的，全属于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彻底颠覆了深印在我头脑中的游击队形象，进而对自己的革命价值观开始反思。（唐师曾　摄）



一名阿拉伯人高举一只活老鼠对记者说："我们的生活不如老鼠！"他马上被以军士兵的枪托砸回家中。（唐师曾　摄）



镇压巴勒斯坦起义的以色列士兵一手持枪，一手持棍。这样的情景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似曾相识。（唐师曾　摄）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4名以军士兵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橘子林。

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里去，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橘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的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的吉普车顶，用80-200毫米镜头连摁两张，三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个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我像个在刑场上突然被刽子手私放了的死囚，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背后致命的一枪，可枪就是没响，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

——马克·吐温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里科（Jericho）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名义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的阿拉伯记者证。从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以东到整个约旦河西岸，大胡子的村田无人不知，甚至没人知道他是日本人“Shinichi”（村田）而称他为“Mohanmed”（穆罕默德）。村田自称如此玩命地拍照不是勇敢而是为钱，因为他爱上了巴勒斯坦女人，“巴勒斯坦女人一是眼睛大，二是腿长”。可聘礼需要挺大一笔黄金首饰，再有两个月他就能赚够买黄金的美元。可直到1993年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看见村田还赖在大马士革门前。拥抱、喝酒之后，我问他“美目长腿”怎么样了，他苦叹道“一言难尽”就没了下文。

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相片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

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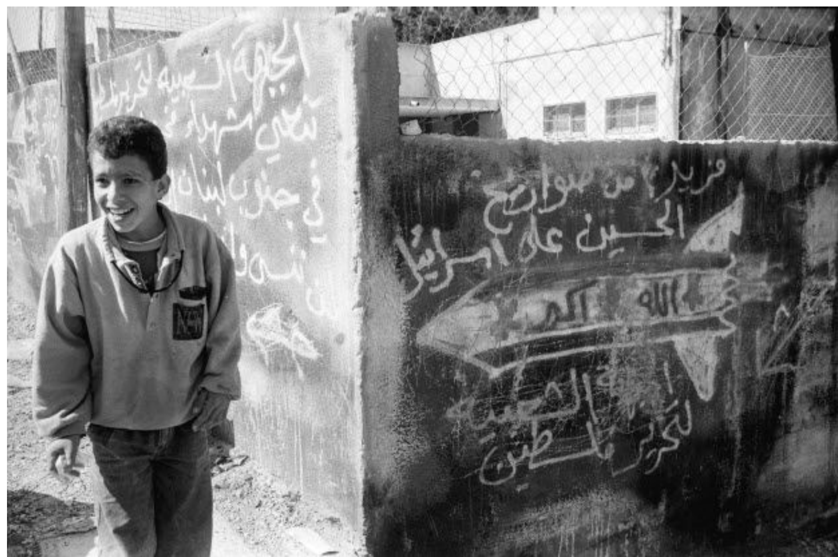


我和CBS记者麦克·克持在约旦河西岸采访。这里的孩子在你死我活的枪炮中长大，人生哲学就是"战斗、胜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30多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烧柴油的加长奔驰240D轿车，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总参谋长拉宾指挥的以色列空军一天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所有敌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号称"以色列长臂"的以空军控制了中东的制空权。其后，以陆军向西打过苏伊士运河占领整个西奈半岛，向北占领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领土，向东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称西岸为Judea，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

占领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纳布卢斯、伯利恒和希伯伦。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拉姆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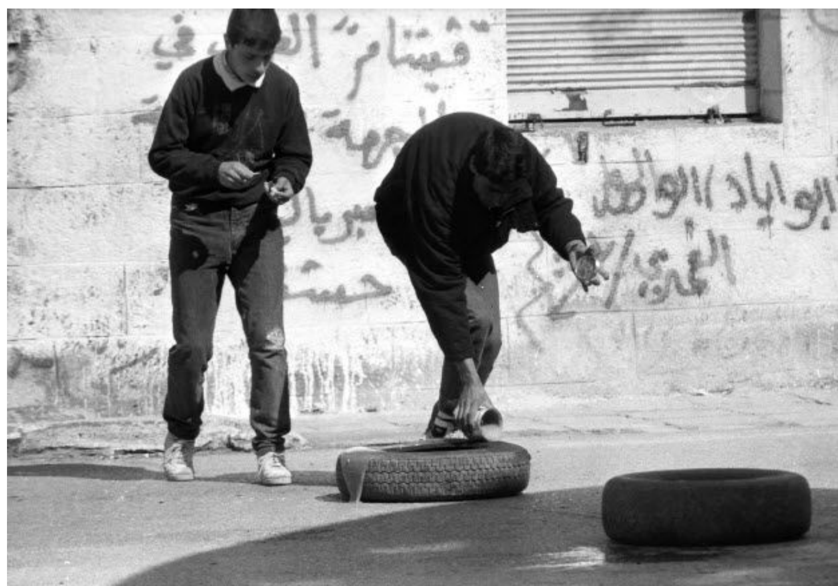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小孩在墙上涂鸦“飞毛腿”导弹，欢呼萨达姆为巴勒斯坦人民报仇。伊拉克一直是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最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反击以色列的国家。（唐师曾　摄）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姆拉，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长着一对斗鸡眼。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眯起有些斜视的双眼，凝视着我身后无穷远的天际：“你会看到真正的战斗。”让我猛然想起儿时看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人兴奋。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蒙上阿拉伯花格头巾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像加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枪和加

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三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枪，像豪猪身上的长刺。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疾行，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待着别动。



巴解战士正在戒严区点燃汽车轮胎，以此表示对以色列占领的不满。（唐师曾　摄）

突然，拐角处冒出3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笛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车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摁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

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这对小兄妹的家人因持续反抗以色列而被捕，家门被以军焊死。两个孩子无家可归，目光仇恨。（唐师曾　摄）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

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村庄，几乎个个都是难民营，村庄的出入口被人为封死，人们从曲折古怪的水泥墙和汽油桶间的“秘密小路”穿行。其间狙击手无数，冷枪不断。谁也不知道此时已被谁的枪口锁定。（唐师曾　摄）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

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4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待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制高点上，以色列士兵用望远镜监视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唐师曾　摄）



这位巴勒斯坦妇女的丈夫、长子因反抗以色列占领而死。她手捧他们的烈士遗照，准备复仇。（唐师曾　摄）



Nafy一家，因“连续出现恐怖分子”，被以军推平了房屋。萨达姆出钱

给反抗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帮其重建家园。（唐师曾　摄）



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希伯伦禁寺，埋葬着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他就是被巴勒斯坦人奉为阿拉伯祖宗的易卜拉欣。以军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分开。图左为巴勒斯坦人，图右角为犹太人。他们正在此祭奠各自的祖先。而这位祖先眼看自己的后代互相残杀，躺在坟墓中无能为力。（唐师曾　摄）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车。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

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

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艾奥瓦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迷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在约旦采访的西方女记者。（唐师曾　摄）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龙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11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接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

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直到海湾战争过半，以色列政府才给巴勒斯坦人发放防毒面具，他们担心巴勒斯坦人拥有防毒面具后，无法用催泪弹镇压。（唐师曾摄）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们儿。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　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大参考”上看到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听可口可乐。这顿仅有七八块草莓大小的犹太炸鸡，是我每24小时补充的唯一一次动物蛋白，直到连沾了鸡油的香菜、辣椒也吞下肚

去。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10天的经费用上20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陆时的巴顿一样：“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就要180美元。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IDF（Israel Defence Force，以色列国防军）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立即在登记处报了名。



以军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小姑娘无助地坐在烈日下。以军全副武装，满腹经纶，而巴勒斯坦则像人类的弃婴。（唐师曾　摄）



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持续向约旦河西岸移民。一家苏联移民正从平板车上卸家具，小姑娘在玩洋娃娃。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住房部长是阿里尔·沙龙。（唐师曾　摄）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大学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部队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战争史上，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像德国的古德里安、隆美尔；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龙。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M-1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式-II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能一睹以军的装甲演习令我振奋不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

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德国国防军所向披靡。

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把空地协作、步坦配合发挥到尽善尽美、战无不克的程度，直发展到1982年阿里尔·沙龙率以军揳入贝鲁特，将巴解总部驱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由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条件是“以色列不参战”，类似“九·一八”后的中华民国，以自己的“不还手”换取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能征善战的以色列士兵只能朝有萨达姆像的纸靶练习射击。（唐师曾　摄）

为了一睹以军装甲集团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辆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20名记者中的第18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兰大吉普，车尾两根4米多高的鞭状

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盂形钢盔、穿凯福拉背心的警卫。

进入内格夫大沙漠后，我们沿着一条用以色列国旗和红白、绿黑、红黑、绿白、黄黑相间的标志旗指引的一条简易公路飞驰。

我们租的“桑巴路”底盘不断地碰到地面，随着车队，我们爬上一处高地。放眼四望，周围布满了雪佛兰吉普。我们被安排在山坡朝阳的一面，头顶上架好了尼龙防空网。不远处，几辆拖曳式炊事车正准备早餐。我走过去，随手拍了辆炊事车，问做饭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一位以军士兵礼貌地带我走进沙漠上一处用白铁修的小屋，这就是野战厕所，令人吃惊的是厕所还准备了绿色的手纸。所有垃圾全部装入黑色塑胶垃圾袋内。只有如此热爱自己所处环境的部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很难想象一支随地吐痰的部队能攻取什么，又能保卫什么。



以色列军事演习，以军肩章上的兵种识别符号是活动的。折上去什么也看不见，保持机密。翻下来互相识别，在混战中避免误解或自伤。

（唐师曾　摄）

以军为参观的记者准备了免费早餐，饮料从橙汁、热牛奶到咖啡一应俱全，热气腾腾，全是那台炊事车变出来的。吃罢早餐，有以军士兵将丢弃的垃圾杂物装入黑塑胶垃圾袋运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我只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古德里安的“G”坦克军中看到过如此整洁的部队。小时候看《说岳全传》中宗泽考岳飞的一段台词至今还能背诵：

令行阃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罚明。

将在谋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

获献元戎归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

其治军精髓与以军不谋而合，只可惜今天如此严整的部队并不多见。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别着贝雷帽的上校，他正倚着一辆雪佛兰吉普用希伯来语派兵遣将。我走过去，一位卫兵告诉我不能拍这位军官。

一位自称“希蒙上校”的军官用英语简要介绍今天的演习科目。远方简易公路上平板拖车载着南非制造的155毫米G-5加农炮沿公路快速突进，消失在远方的山包后面。5分钟后，这群G-5加农炮开始向远方轰击。炮火持续10分钟左右，我们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动，迷彩布骤然揭去，原来数十辆M-60坦克和M-113装甲车一直潜伏在我们眼皮底下。



M-60A坦克上的以色列装甲兵。我因为爬上坦克拍摄这张照片被捕，经审查后释放。他们怀疑我拍摄了坦克炮塔上的“技术细节”。（唐师曾　摄）

挂着主动式装甲的M-60喷着白色烟幕冲向前，行进中利用地势迂回跃进，互相掩护作抵进射击。M-113装甲车则紧随其后，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护。



M-60A主战坦克与M-113装甲车互相掩护着交替冲锋。（唐师曾摄）

我们分乘3辆十轮重型卡车紧随其后，观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冲锋。偏就在沙漠鏖战之际，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就拆下MD-12马达，可用手过卷还是搬不动。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照相机、传真机是我赖以为生的贵重器材，一旦毁坏，我就彻底完了。因为仅19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个胶卷，等于快门开合了25200次。从1987年起，我可怜的尼康们已这么干了4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拧下镜头，痛苦地发现反光板已翻上去，连结钛合金钢片快门的螺丝钉早已磨断，快门碎成几片……美联社摄影部主任宣称：“我必须给那些用生命做赌注的好小伙子装备一流的设备，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可我的相机全是用了多年的旧货，而且FM-2从来就不是专业型机种。

幸亏我还背着离开北京前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给我的一台莱卡。

可这台莱卡只有35毫米广角。为了拍到大一些的图像，我跳下十轮卡车，趟着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恼了身后一个自称给法新社干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烧了你的护照！"我不知道这个白人崽子是在喊我，径自爬上一辆M-60坦克，不料这小子竟直追过来，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嘿，拿莱卡的，你再往前冲，我们可要合伙儿揍啦。"我猜这小子的爸爸或是爷爷准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就是他妈被太君蹂躏了，弄出他这个杂种，否则他不会把一切黄种人都叫山本。看着我兀自不服的样子，这小子转过身对一个打扮得像大花蘑菇的大白妞儿感慨道："哪儿有日本人，哪儿准坏事！"



以色列的M-60A扫雷坦克。诺曼底登陆时，美军类似的扫雷设备装在M-4谢尔曼坦克上，美军称之为"鞭打路易"。（唐师曾　摄）

两架AH-1"眼镜蛇"式反坦克直升机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用火箭攻击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于相机坏了而兴致大减。从M-60坦克往下跳时，我不知挂在什么地方，牛仔裤腿被撕开一道半尺长的大口子，我像只中了箭的兔子大头朝下坠落在地。

我坐在光秃秃的沙包上，满嘴全是沙土，放眼望去，乘M-113装甲车的以色列国防军已跳出装甲车开始冲锋，硝烟四起，加里尔自动步枪低沉的点射声声回荡，AH-1“眼镜蛇”在山脊上悬停，螺旋桨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虎视着步兵扫荡残敌，引擎震耳欲聋。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康布雷—亚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已看不到一点儿旧时的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压制敌军火力掩护坦克进攻的“施图卡”式强击机也荡然无存。自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将UH-1直升机配备给美陆军骑1师以来，军用直升机就成了陆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火力、通讯、机动性更强的武装直升机已直接参与坦克进攻。

我眼前的这支部队充其量不过是个装甲旅，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军事行动中，参加的兵种涉及侦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电子干扰兵、通讯兵、工兵、运输兵和陆军航空兵。

在当代陆军中，以色列国防军是唯一屡战屡胜从未吃过败仗的军队。这一点在半年后我应聘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研究员后得到专家许延滨将军的证实。难怪以色列的沙龙狂称：“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迄今为止，我是唯一与这支号称“世界第一陆军”的骄傲的部队一起行动过的中国人。

我没有看到诸如以制梅卡瓦式坦克，或美制M-1艾布拉姆斯式坦克，甚至连M-2布莱德雷式步兵战斗车也没有，更没有AH-64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机。由此可见，这场演习，不过是对伊拉克“飞毛腿”袭击虚张声势的政治反应而已，但由此更坚定了我认为以军不可能从陆上攻击伊拉克的估计。因为即使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袭速度，也只有每小时70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于60公里的时速，在穿越一千几百公里的阿拉伯领土之后攻入伊拉克。因为500个摩托小时需检修的坦克主机、坦克单车1000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战补给线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从军事角度上讲，这种奔袭将失去以军

神出鬼没的沙漠突袭效果和主动权，从政治上讲失去的将更多。

3天以后，我终于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机，为换这个该死的快门，用了我近300美元！我只恨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抛弃了我。

耶路撒冷

圣地是不卖的。

——《圣经·旧约》

我从内格夫沙漠采访以色列装甲兵演习回来那天，想发回去几张以军演习的传真照片，可耶路撒冷到北京的国际长途无论如何也接不通，急得我手捧4张照片抓耳挠腮。万般无奈，我拨通了以色列国际电话局，一听我要中国，接线员们万分惊喜，用英文连说："请您稍候，请您稍候。"俄顷，听筒里传来使我感到亲切的汉语："我叫奥丽特，我现在就帮你接北京。"

晚上回到房间，我收到一张饭店服务员送来的便条："请给244101奥丽特小姐回电话，她是今早和你讲汉语的人。"我又好奇又狐疑：莫非碰上摩萨德女间谍了。我按条子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就通了。"我是奥丽特，请您在大厅里等我，我和我的朋友想认识从北京来的中国人。"清晰的中文使孤军奋战了两个多月的我好似回到了北京。

在一楼大厅，我那电话中认识的美丽的女朋友已经来了，她的双腿可真长，仿佛直接长在肩膀上。希伯来语中奥丽特是"光"的意思，她生得果然光芒万丈，笑起来灿若朝霞，千娇百媚。奥丽特和她的3位女伴热情邀请我参加当晚的舞会。我说对不起，我从不跳舞，只侃大山。她们一听迅即改变了主意，开始就中国提出一连串诚恳而又愚蠢的问题。

奥丽特是希伯来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曾到台湾大学学过中文，现在正回国念研究生，业余时间在电话局当接线员挣钱。奥丽特的最大梦想是爬长城。这帮女孩子告诉我，这里有位青年一年前去中国爬过长城，还去了西藏。回来后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于是成了以色列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可惜这位青年英雄从西藏得来一种怪病，不幸夭折。说到此，这帮姑娘个个珠泪潸然，就像一群红眼白兔。我见她们这么喜欢中国，就给她们讲1987年我随中国著名的长城摄影师成大林由八达岭走到山海关的经历，讲1988年冬天在秦岭跟踪野生大熊猫，讲1990年在青藏高原无人区探险……听得她们大眼瞪小眼，仿佛我就是圣保罗。奥丽特说她特别想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视片，还问我是否愿意入伙。我说我巴不得与如此美丽的女“上帝的选民”为伍。按犹太教说法，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



对中国文化十分痴迷的奥丽特，在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脑子里，她肯定是摩萨德女特务。（唐师曾　摄）

次日，应奥丽特之邀，我来到她们在Queen Helenny No.5的住

处。她和一个学建筑的女孩合租这套公寓，满屋色彩艳丽的物件制造出平和幸福的气氛，弥漫着大学女生宿舍特有的气味。那个学建筑的女孩正跷腿蹲在椅子上画图，见我进来朝我龇牙一笑。

奥丽特给我看她拍的黑白照片，大都放成8寸，多为风光和老人、儿童，之后又给我看她在台湾的纪念照。她的屋里满是中国货。天花板上吊着一把巨大的油纸伞，上面画的是达摩祖师十年面壁的故事。地上一个巨大的黑色床垫，上面扔了张辛欣的《北京人》《有趣的汉字》等，墙上挂满了中国画，有泼墨山水，也有工笔重彩的鸟虫。她说这些全是在台湾大学留学时买的。我说学中文得去北大，北京的琉璃厂的字画才是最出名的，比如荣宝斋。

从奥丽特的窗口望出去是一座天蓝色屋顶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教堂旁边是一座围着铁丝网的警察局。我指着警察局门口长廊上排队的数百人，问她那是干什么的，奥丽特说是等候探监的，这些人全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亲属由于“参与恐怖活动”而被捕。奥丽特责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劲啊，把我的满腔兴致全弄没了。”我这才恍然今天是去参观圣城。

耶路撒冷是一座集《圣经》《古兰经》和好莱坞于一身的圣城。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城，一直被视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它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犹地亚山区之巅，海拔790米，居民主要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全城面积约160平方公里，古称耶布斯城。

约在公元前3000年，迦南人耶布斯部落从阿拉伯半岛迁来，定居于此，因此命名“耶布斯”。相传公元前1020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王国，耶布斯国王麦基洗德在位时建立都城，并把它命名为Jerusallem（耶路撒利姆），即后来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词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和平之城”，犹太人曾先后在这里兴建规模宏大的圣殿，成为古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阿拉伯人则习惯称

它为“古德斯”，即圣城。

耶路撒冷分东西两城区，西区是19世纪起新建的市区，布局别致，景色秀丽。东区则包括集中了许多宗教圣迹的老城，是西区的两倍。老城历经战争创伤，始建以来，已经重建和修复过18次之多。公元前1049年，曾为大卫王统治下的古以色列王国老城。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今伊拉克）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此城，把它夷为平地。公元前532年，又为波斯大流士王侵占。公元前4世纪后，耶路撒冷相继附属于马其顿、托勒密、塞琉古诸王国。公元前63年罗马攻占耶路撒冷时，他们驱逐了城内的犹太人。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暴政，引起了4次大规模的起义，罗马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了100多万犹太人，并有大批犹太人被掠往欧洲，沦为奴隶。劫后余生的犹太人纷纷外逃，主要去向是现今的英、法、意、德等地区，后来又大批流向俄国、东欧、北美等，从此开始了犹太人悲惨的流散史。公元636年，阿拉伯人打败了罗马人，此后，耶路撒冷长期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



耶路撒冷鸟瞰。（唐师曾　摄）

11世纪末，罗马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以“收复圣城”的名义，多次发动十字军东征，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随后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延续近一个世纪。1187年，阿拉伯的苏丹萨拉丁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赫淀一役，大败十字军，收复了耶路撒冷。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耶路撒冷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1917年盟军占领耶路撒冷，1922年起由英国“托管”。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8号决议，规定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管理。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旋即占领了耶路撒冷西区，并在1950年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耶路撒冷城东区遂由约旦控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进而占领全城。1980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永恒和不可分割的”首都。此举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



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前的七头烛台，远处是以色列议会。（唐师曾

摄）

更有意思的是，三大宗教根据各自的传说，都奉耶路撒冷为圣地。

公元前10世纪，古以色列王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后，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教徒们来此朝觐祭神，耶路撒冷从而成为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建有犹太教圣殿的锡安山由此成了圣山。

公元1世纪，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出现。传说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生于耶路撒冷南郊的小镇伯利恒，长大后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区传播上帝“福音”，后被犹太教当局拘送给罗马总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耶稣受难后第3日复活，40日后升天。公元33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伦娜太后巡游耶路撒冷时，在耶稣受难处及墓地建造圣墓教堂，因而这里也是基督教的圣地。

公元7世纪，传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在他52岁时的一个夜晚，随天使由麦加来到耶路撒冷，踩着一块岩石，升上七重天，接受天启，黎明赶回麦加。这次神奇的“夜行与登霄”，记载在《古兰经·夜行》中。这样，耶路撒冷又成为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个圣地。

耶路撒冷城有三个安息日，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分别是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安息日。市内街道路标和商业橱窗里至少标以三种文字——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英文。

耶路撒冷悠久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宗教圣迹。《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提到的人名、事件和有关地方，城中几乎都有相应的痕迹可循。在西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有大卫王之墓和“晚餐室”，后者据说是耶稣被钉死前夜和12个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的处所。老城区的圣迹更多，东部有块伊斯兰圣地，雄踞于摩利斯山，占地26万平

方米，略呈长方形，四周围的院墙有10座敞开的大门和4座关闭的大门。圣地内南侧是宏伟的阿克萨清真寺，中央是绚丽的萨赫莱清真寺（即岩石或圣石清真寺）以及4座耸入云霄的宣礼塔、1座图书馆和1座伊斯兰博物馆等。而城东的橄榄山，则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又一圣地，不同宗教信仰的墓地遍布整座橄榄山。

从Queen Helenny大街拐出来就到了耶路撒冷老城。我想进著名的大马士革门，可奥丽特坚决不干，因为那里聚居着阿拉伯人，她说她从小就不去大马士革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会用石块砸她，犹太人只走犹太人的加法门。我只好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

耶路撒冷老城由4个城区组成，其中东南区最大，在这里居住的全是阿拉伯人，狭窄的街道上便是著名的阿拉伯市场。到处在卖新鲜水果、蔬菜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阿拉伯小吃。菜花、橙子、香蕉都是2谢克（合1美元）1公斤。金光闪闪的首饰店四处都是。

举世闻名的黑顶阿克萨清真寺与金碧辉煌的圣石清真寺并肩矗立在这里。阿克萨清真寺仅次于麦加的圣寺和麦地那的先知寺，是伊斯兰教第三圣寺。“阿克萨”在阿拉伯文里是“极远”的意思，这个名称来源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那次神奇的登霄夜游七重天的传说。该寺始建于公元709年马利克哈里发时代，公元780年毁于地震，后几经翻建，现保存的大部分建筑是公元11世纪扎希尔哈里发时代留下来的。这座清真寺主体建筑高88米，宽35米，内耸立53根大理石圆柱和49根方柱。圆顶和北门为11世纪增建。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把清真寺的一部分改为教堂，另一部分当作神庙骑士团的营房和武库。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从十字军占领下收复耶路撒冷，下令修复这座清真寺，重建神龛，用彩石镶嵌的图案修饰圆顶，并在寺内安置木制讲台。

清真寺里还有一座长方形的大礼拜寺——欧默尔礼拜寺（欧默尔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死后的第二位哈里发）。清真寺的北门有

一座高大的门廊，系阿尤王朝的苏丹伊萨于1217年所建，由7个独立的拱门组成，每一座拱门又与清真寺大殿的一扇门遥遥相对。清真寺前有“卡斯”水池，人们常常聚集在池边作礼拜前的小净（小净为阿文Wudu的意译，原意为“洁美”。按伊斯兰教义规定，教徒在呕吐、流血、睡眠之后，作礼拜时须先洗手、洗脸、洗肘、漱口、洗鼻孔，用湿手抹头、冲洗双足等；如入厕还须洗下身，俗称“净下”。以上统称小净）。

以色列军警在这座清真寺门口检查进入寺内的阿拉伯人，年轻的阿拉伯男子必须把身份证抵押给军警换得一张白色卡片后才许进入。奥丽特不敢靠近，一个劲儿催我快走，仿佛这里就是地狱的入口。

紧贴着阿克萨清真寺的西墙，有一条长约50米的隧道，持加里尔步枪、身穿防弹背心的以色列士兵正在入口处检查一位阿拉伯女人的菜筐，其态度怎么也难以用“和善”两字形容。可姑娘却“脉脉含情”凝视着张着血盆大口的枪口。一位士兵粗粗翻看了一下我的摄影包，就放我和奥丽特过去。穿过隧道，就是著名的犹太教圣迹——Wailing Wall（哭墙，又称西墙）。

奥丽特告诉我说，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了犹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到了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他用了7年时间，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即壮观华丽的所罗门圣殿。所罗门亲自主持了圣殿的落成典礼，并代表全体臣民向神主祈祷，这一盛大节日延续了两星期。圣殿的建成，不仅使所罗门威望大增，而且使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人崇拜的圣地。教徒们来此朝觐和献祭者不绝，从而成为古犹太人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将圣殿付之一炬。以后重建，可又被古罗马人烧毁。阿拉伯人在此基础上盖了阿克萨清真寺，所罗门圣殿仅剩这一堵残墙。可犹太人仍然珍惜之，这段墙被视为犹太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据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常聚在这里哭泣。此后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犹太

人常从各地来此号哭，以寄托其故国之思。这与中国古代《诗经》中所抒写的黍离之悲相似，此墙因名“哭墙”。如今，每逢犹太教安息日，成千上万的人到哭墙去表示哀悼，进行祈祷，将写有心愿的纸条塞入哭墙墙缝，以求神助。奥丽特说她小时候就常常跑到这里偷看犹太人许愿的纸团。应奥丽特之邀，我亦偷偷写了自己的心愿：“当个好记者，娶个好姑娘，生个好儿子。”毕恭毕敬地塞进哭墙。



犹太教徒把脸贴在“哭墙”上痛哭。（唐师曾　摄）

摄）



“哭墙”圣殿内苦修的犹太教徒，身上缠着皮制的苦修带。（唐师曾摄）

“哭墙”有铁栅栏把前来的男女分开，几位身着黑衣、留小辫子、身后拖两条长绳的“黑衣犹太”朝我大吼Shabbath（安息日），一群只有六七岁的小孩指着我身上的相机，颇认真地说“沙巴”。一帮“黑衣犹

太”围着奥丽特大喊大叫并做怪样。我大惑不解，问奥丽特怎么了，她脸红红的不肯说。在我再三追问下她说他们在骂她，极难听的骂人的话，因为她在安息日拍照。“沙巴”希伯来文意即“休息”，犹太教每周一天的“圣日”。据《出埃及记》所述，上帝训示摩西：以色列人应该劳作六日，第七天休息，作为与上帝所立的盟约；凡亵渎圣日者，应受死刑。犹太教规定该日停止工作，专事敬拜上帝。

奥丽特说，这些“黑衣犹太”自诩为最纯正的犹太，他们只讲希伯来语和Idish（意第绪语，一种与德语接近的语言）。正宗的“黑衣犹太”除了念经和与老婆睡觉之外一无所长，而他们的女人除生孩子做家务外，还外出工作挣钱。他们在安息日不工作，因此也不许我们拍照。

在“哭墙”以北的犹太人居民区辟有一处记录犹太人历史的遗迹陈列区。穿过该区是著名的大卫王塔。大卫，是古代“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约公元前1000年—约公元前960年），本为犹太部落首领，继承扫罗的事业，打败腓力士，合并以色列北方地区，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在位期间，他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常备军，对约旦河以东各部落作战，定都耶路撒冷，兴建华丽王官和耶和华神庙，力图统一宗教信仰。《圣经·旧约》中把他描写成战胜腓力士人的英雄，统一“以色列—犹太”的贤君，并被誉为编制献神颂歌的音乐家和诗人。

再往前是犹太死难者纪念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死难者。纪念馆旁边是著名的大卫王之墓。同样，由于是安息日，严禁拍照。

走出大卫王之墓，我指着门框上的一条小木块问奥丽特这是什么。因为我发现在以色列的所有门框上都有这样的小木条，甚至在现代化的希尔顿饭店也不例外。奥丽特告诉我这是一种古老的神符。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灭犹太王

国，烧毁圣殿，俘大批犹太人而归，史称“巴比伦之囚”，从此结束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历史的最后一页。



正宗的“黑衣犹太”留着马克思式的大胡子，身穿黑衣，他们除了念经

和与老婆睡觉外一无所长。养家杂务仰仗妇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文字工作或与上帝沟通。一般只讲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对现代文明持抵制态度。由于“飞毛腿”导弹威胁，这位“黑衣犹太”手提塑料袋内为防毒面具。（唐师曾　摄）



大卫王塔。（唐师曾　摄）



耶路撒冷老城亚美尼亚教区。（唐师曾　摄）



耶路撒冷犹太教区。（唐师曾　摄）

公元前64年，罗马帝国的铁骑闯进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野蛮统治，幸存的犹太人绝大部分被驱赶或逃出巴勒斯坦，流向世界各地，从而结束了这个民族在巴勒斯坦生存了1300多年的历史。大批犹太人流亡北非，受尽埃及人的欺侮。上帝为犹太人的苦难所感动，决定惩罚埃及人，降以十大灾难，其中一条就是杀尽埃及人的长子。上帝告诉犹太人的首领摩西，让他在所有犹太人的门框上贴上神符，以保他们的长子无恙。以后，摩西率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神符的习俗传流至今。据《出埃及记》载，摩西率犹太人出征埃及时，上帝命令宰杀羔羊，涂血于门楣之上，以便天使缉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之家即越门而过，故亦称“逾越节”。

在基督教居民区，奥丽特带我看了耶稣见母处、耶稣墓及耶稣墓所在地——圣墓教堂。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耸立于东耶路撒冷老城的卡尔瓦里山上。耶稣的坟墓和坟墓的进口都在此教堂之内。故基督教徒不分教派和所属教会，都把耶路撒冷奉为圣地。

在圣墓教堂，一位身着黑衣的神父问我信耶稣吗？我摇头。他又问信穆斯林吗？我又摇头。“那你信什么？”他目光炯炯地逼视着我。我说我信科学，信历史，信人的价值。他掏出十字架挂在我脖子上，接着问：“我的孩子，你有兄弟姐妹吗？”我说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又摸出两个十字架塞进我手里，“耶稣保佑你们。”接着伸手跟我要30谢克（15美元）。我说：“我的钱全放在出租车里了。”他当即毫不犹豫地收回了刚以上帝名义给我的3个十字架。

圣墓教堂外的花岗石墙壁上涂满了标语，还有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国旗，其中最大的一面是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奥丽特说这些全是巴勒斯坦人干的。我还拜谒了古色古香、由花岗岩石砌成的大卫王饭店。40年前，搞复国运动的以色列前总理贝京在大卫王饭店曾用炸弹刺杀了70名英国人。

由于天降暴雨，时间不够，我们没能去亚美尼亚教的城区。春雨

如酥，奥丽特小姐在雨中美丽地狼狈着，迷离了我的眼。奥丽特把我领进一家基督教堂避雨。这里空无一人，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声，我们坐在一排长椅上默默无言面对上帝，万籁俱寂，天地纯洁。我双目紧闭，享受紧张工作中这短暂的宁静，仿佛自己变成了一股蒸气，上升，上升……耶路撒冷这座几千年的古城，不仅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孕育了这里神奇古怪的民族。为了争夺这块土地，几千年血流成河……难怪《圣经·旧约》讲："圣地是不卖的。"



圣墓教堂外的花岗石墙上满是涂鸦，从左至右是伊拉克国旗、苏联国旗、巴勒斯坦国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海湾战争爆发的潜在原因。（唐师曾　摄）

出耶路撒冷老城加法门西去，可以看见一架古老的风车和一片红房子。奥丽特说这是最早离城索居的犹太人的家。远古时代，所有犹太人都集体住在城里，只有极个别的勇士才敢住到城外，为了缅怀他们的勇敢，这些建筑保留至今。现在那一带已辟为艺术家住宅区："因为人一旦住在那里，便会有创作激情。"

黄昏，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走回住处。明天就要告别这里飞往塞浦路斯，之后辗转开罗重返巴格达。我的行装里增加了一件奥丽特送我的画有萨达姆像的雪白的大背心，上书一句黑体英文：“当海湾战争正酣之际，我在以色列。”

重返拉纳卡

睡梦中的冒险和醒着的冒险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米兰·昆德拉

2月21日，我好不容易订上了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全以色列只有这一家私人飞机肯飞，条件是如果遇特殊情况比如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一切听天由命，飞机主人不作任何赔偿。售票处拐角处，一对即将开往前线的恋人正在忘情地吻别，以至于顾不上我的相机的存在，使我这个就要飞离这块是非之地的匆匆过客一阵心酸。

次日早上5点起床，分两次把行李搬出房间。6点10分赶到本古里安机场。见我到问询处前探头探脑，一位干瘦的男人用更干瘦的英语问我是不是去拉纳卡，他让我跟他去那边检查行李。一位自称是安检官员的女警官过来问我从何来，行李是谁打的，是否离开过，一直住在哪儿，是否有人给我送礼品，到过什么地方，有无记者证。之后又来了一个比她丑得多的穿长筒皮靴的女人，左顾右盼就像一个轻佻的西部吧女，她又重问一遍上述问题。我问是否要开包检查，她们说不必，这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请我谅解，然后给我的行李贴上了合格标签。

辗转到2楼，还是只有我一个乘客。3个美国空军在免税店买宝石，这里有一个特大柜台售“以色列钻石”，可我只有有数的美元，连条裤子都买不起。一周前我的老板在电话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给我买裤子，感动得我真想哭。



生离死别的以色列恋人，一个耗尽十万卡路里的热吻，让前线士兵短暂告别地狱，升入天堂。（唐师曾　摄）



西线无战事，战壕旁的士兵，把自己的心上人严丝合缝地摆放进炮车

压出的沟壑里，再将两个人“焊”到一起，进入永恒。（唐师曾　摄）

终于可以登机了。这次的飞机更小，只有7个座位。2个飞行员、2个安全警察和3个乘客，只有我们7个人。我最后一个挤进机舱，飞行员是从我身上爬过去的，他帮我关上门，说千万别碰门旁的机关，不然门一开我就掉下去了，“摔下去可是地中海”。



我乘小飞机离开以色列前往塞浦路斯，地上散落着我的6件行李。当时国产的箱包随时开线、裂缝，金属箱上的轮子歪歪扭扭、七零八落。（以色列飞行员　摄）

小飞机摇摇晃晃颠簸着升了空，上下抖动，向地中海上空飞去，左转弯的时候，左翼朝地，右翼向天，我整个身子全压在机舱门上，紧张得不行，生怕小门禁不住我的分量把我漏出去。我的座位椅背已经断了，没有上半截，我只得用保险带使劲捆住自己，绑附在破座椅上。看着烟波浩渺的地中海，我本想忙里偷闲抒抒情，可由于太疲倦，没过多久已酣然入梦，千奇百怪地与巴顿将军喝起啤酒。

醒来时，小飞机已经在拉纳卡机场上滑跑，机场上风很大，夹有小雨。小飞机像只雨打的耗子似的钻到候机楼旁。我们还未站稳，一辆塞浦路斯警察的轮式装甲车就停在身旁，注视着我们3个乘客的一举一动。安全警察把我带进一间小屋，命令我脱去上衣，仔细检查随身的各种物品，用枪托轻敲我防弹背心上的钢板，怀疑藏有海洛因，使我油然产生我是黑手党教父的错觉。



活着的新华社记者上《人民日报》，空前绝后。“这是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海湾战争爆发前，并非军事记者的他主动申请去海湾地区采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拍摄了数百张反映海湾局势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亚尔访问伊拉克》为国内外多家报刊采用。他还写了《飞往巴格达》《临近摊牌的巴格达》等通讯，目前，他正活跃在海湾地区，采访战事。”——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黄文　摄）

海关给我两周签证。

分社老陈已在机场门口等候。老陈问我飞机飞得如何，我说我睡

着了，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陈夫人已经把饭做好，吃得我胃直疼，因为很久没吃中国饭了。老陈给我留了不少剪报，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也来了。由于《人民日报》登了我的“尊容”，他们都想看一眼我这个头号大浑蛋。这是有史以来《人民日报》头一次吹捧一个新华社记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牺牲的活物。看得我自己也不由对报上头顶钢盔、手捏莱卡的鸭子肃然起敬。

很困，很累。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

“我要上前线！”

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亨利四世

2月23日，小雨。中午吃鱼汤，我吃不下。老想起沙特的战事，让一个精通二战史和美军的战地记者站在圈外看101师真不是滋味。在最需要用快刀凯普的时候竟不用。

我从无贬低他人之意，只是说我有干得更好些的主观条件。我老板怪我太张狂得罪了领导。我这才知道是我无意中得罪了中东大法老，可又万般无奈。社会主义国家坏人本来不多，我更不能怀疑我上司。1983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时，30人投考二次大战史研究生，我在社科院因一分之差名落孙山。我一直怀疑自己是19世纪的普鲁士骑兵转世，或是隆美尔的装甲兵再生。因为我总是身不由己地融入军警之中。我坚信我前生一定在北非沙漠与巴顿作过战，我能轻而易举地将美军将官姓名拼写无误。我会像在以色列那样博得美82师的好感而与其一起行动，拍来真正的独家。

晚上看CNN，觉得陆上已开始接触。茫茫黑夜像一团墨，我终于在黑暗中发现点点星辰，我徒劳地等了一夜。东方开始泛白，迎面飘来一团团滚动的红云，像刚切开的三文鱼。美军马上就要表演“黎明前的揳入”了。我猜101师和82师将降落到伊拉克境内，海陆战1师将在晚些时候抢占滩头，“从长滩到牛轭湖”。

十几年的准备将付诸东流。

现在《人民日报》会用巴格达废墟吗？人们感兴趣的是战斗、格斗、俘虏，和胜利后的美军大阅兵、科威特人的狂欢……可我却在做梦！



流亡埃及的科威特人，庆祝美军光复科威特。（唐师曾　摄）



流亡开罗的科威特人开着“大奔”欢呼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为其收复家园。（唐师曾　摄）

我最烦等，什么在约旦待命、在哪哪哪待命。奉行全面防守的军官打不了胜仗，伤十指不如断一指。有快刀就该现在用。我坚信进攻是永恒的军事原则，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巴顿说：“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

夜里写战地特写，一度挺兴奋，但老想82师，我了解李奇微和这个师，李奇微上前线腰上总带手榴弹，背春田式步枪。

唉，做梦都想科威特。

我又忍不住给摄影部及社领导打报告，力陈南线的重要，希望派我上前线：

> 昨天曾向北京汇报现在形势极似1944年的欧洲和1945年的日本，布什一个月前就曾说过：“我决不会束缚住将军们的手脚。”美国是要彻底摧毁中东一切强大而又不友好的军事机器。

美国将领九成是西点的毕业生，一成来自弗吉尼亚军校或奔宁堡。装甲部队、骑兵师、空降师受的全是巴顿教育。施瓦茨科普夫已喊出巴顿1944年8月“眼镜蛇”行动时的名言：“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帮西点们决不会就此住手，他们的信条是占领，否则无法改变伊拉克的现政体，像他们的学长巴顿对德国、麦克阿瑟对日本一样。因此，去巴格达的大门不在安曼，而在101师的搜索营。

巴顿一直以为自己是拿破仑的骑兵元帅，1943年7月与英军将领蒙哥马利竞争着解放了南意大利，以后由于痛打怕死的士兵被调往英国，连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霸王计划”都不能参加。他愤而上告罗斯福总统，唤醒西点校友艾森豪威尔的同情。1944年8月1日指挥“眼镜蛇”行动，解放了巴黎、德国、捷克，最后死在曼海姆。当时由于巴顿酷爱摄影而允许卡帕等人随军参战（德国隆美尔亦然），因而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精彩的史料照片。我想申请与101师、82师一起行动，这种可能性很大。一位美82空降师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营的驾驶员曾送给我一枚该营的军徽，那是一只展翅腾空的飞马，原因仅仅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师长是加文将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01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82师师长马修·李奇微（前者当了越战司令，后者当了朝鲜战争司令，两人全当过陆军参谋长，写了《剑与犁》《不定的号角》《朝鲜战争》等书）的奇闻逸事我如数家珍。他们极可能像1944年12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样作战，即西点标榜的“从长滩到牛轭湖”。英装甲7旅是蒙哥马利阿拉曼时的“沙漠鼠”，法国装甲部队源于1944年的勒克莱尔。

在这种状况下，多有几个战地记者随英、美、法军分头行动，则可以拍得一手的照片，强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请去战场，争取随军行动，钻进一辆“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战地照片。我想我能争取和美军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点进攻。

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师曾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受了200处战伤的尤金·史密斯曾质问不许他上火线的老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死！”战争中除了战伤和勋章之外一无所有，可我至今还未受过一次伤，想想真没劲。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海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分东、中、西路对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面战争。与此同时，我接到中东分社社长的命令：“马上回到伊拉克去！”我仿佛听到亨利四世在阿克尔得胜后嘲笑格里永公爵的那段话：“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烙饼

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

——歌德《浮士德》

我自作主张地从塞浦路斯撤至开罗、假道约旦回伊拉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洗干净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一直怀疑被我顶撞了的中东分社社长这么指挥是想把我交到伊拉克人手中弄死，其实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上司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与伊拉克在“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之囚”时就结了仇，更不知道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作匪谍，而我奉旨进巴格达大有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件大T恤，上书“我是海湾战争幸存者”，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后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浑蛋瞎指挥”。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老符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可我多年受的教育都说唯有上司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

在开罗，我把奥丽特送我的大T恤和钢盔、面具存在英文编辑张海燕处，张是位光长心眼不长肉、英文极佳中文平平的老小姐。与她一同毕业于兰州大学的英文编辑水均益与我同样是个口似拦江网的酒鬼。我在开罗停滞的两夜几乎全是与这两位大仙喝酒度过的。这两位散仙当时并不开心，整天埋怨没人派他们去前线，酒后骂的粗口脏话绝不在我之下。以后凤栖梧桐一个嫁到加拿大，一个去了中央电视台。我猜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他们在电脑前坐井观天是其不满的最大原因。战后油田灭火张海燕好歹去了回科威特，总比水均益运气好些。

与二位相比，我真不该再怨天尤人。



以色列女朋友送我的大背心，上面写着：“我是海湾战争的幸存者。当海湾战争正酣之际，我在以色列，你在哪儿？”大背心下面系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武装带。交战双方针锋相对，都把我视作双料间谍，可他们的装备在我身上竟然高度和谐。



1991年，在开罗新华社英文编辑部工作的水均益，对“从一个前线转战另一个前线的唐老鸭”十分羡慕，请我去牧羊人饭店喝啤酒。（唐师曾　摄）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是他的“仲人”（证婚人）。当我呈上我的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理由是唐老鸭大智大勇，现在只能在科威特，不可能飞回伊拉克。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身旁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51、52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非得丢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讲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大使则让我多讲故事好好表现，并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意思是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其实，牛马不过是多讲故事而已。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6人留守，加上新华社3位记者和我，10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掺和。我本是个大懒蛋，可炒菜舍得放好东西，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它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母子俩一见我就往我身上扑。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弹尽粮绝的我带来10000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

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领着我们“6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鼠疫，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儿就升到38.2℃。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不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故只有请驾了。



海湾战争使阿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自左至右为：叙利亚外交官、埃及外长穆萨（不久为阿盟秘书长）、以色列驻埃及大使。（唐师曾摄）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脑子却清晰得像块刚擦过的玻璃。老杨哆里哆嗦地帮我抻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

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委屈地一个人先走了。我试着披上件萨达姆的军服，眼前的写字台仿佛旋转着朝我砸过来。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色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几次险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挂着一挡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7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5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双下巴的罗马

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彻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彻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

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我在约旦的街头采访。我身后的巨幅标语是“弄死美国”，下面是巨大的耶路撒冷金顶清真寺的画像。（美联社　摄）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

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蒂芬，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住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CBS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绝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7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7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家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7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阿伦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

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旦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1991年1月，共同社记者河野彻（左）、大河源利男（右）在伊拉克。两位都曾是驻京记者，与我情同手足。大河源身背三台佳能T-90。（唐师曾　摄）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红，红得像我送他的小红旗。

“死亡之路”

我撤出来了。可别忘了：我还要回来！

——麦克阿瑟

我们终于在3月15日凌晨4时告别打扰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达的征程。整整两个月前，我被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北大校友老郑揪着右胳膊最后一个迈出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海关。今天，郑大使又率队重返故地。而仅在3天前，包括CNN彼得·阿内特在内的所有外国记者被限令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郑大使御驾亲征，我特兴奋。我们一行共有四辆汽车，开道的是伊拉克驻安曼使馆的一辆白色丰田，车上满载着大米、白面，远远地跑在前头。我坐第二辆车，同车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并不感到寂寞。第三辆车坐着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最后一辆是20吨奔驰卡车，装了满满一车食品和400箱矿泉水。

太阳就在我们的前面，安曼至鲁威谢德高速路好似奔腾的伏尔加河蜿蜒而去，这段路长292公里，我已跑过两趟，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层层盘查，不过比前两次客气得多，因为我们车上插了中国国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开道，后有中国大使作后盾。

上午10点，来到鲁威谢德边防站，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再穿过78公里的中立区就要进入伊拉克国境了。公路上，十几辆40吨的集装箱车正在等候过关，车身上挂着整幅白布，上用朱笔写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说写的是“阿拉伯运输协会”，运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资。其中一辆白色工具车尤为醒目，车身上画有红十字。我过去一

问，是两个说法语的比利时医生，他们是志愿为伊拉克送医药的医务人员。边防站外，所有开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车都装得满满的，连小轿车的顶上也堆满了粮食和汽油，用尼龙绳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加足汽油，将备用油桶灌得满满的，因为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就停止给市民供应汽油，黑市汽油比官价油贵90倍。



被多国部队炸毁的“安曼—巴格达”高速公路。（唐师曾　摄）

10点30分，我们驶入约伊之间的中立区。两个月前，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一带沿公路修了3座难民营，专门收容伊拉克难民，我前来采访过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Peter　Fierz。可现在这里已经空空荡荡，仅剩穿深灰色制服的约旦警察照看着空空如也的大地。路口有一堆炸弹皮和其他爆炸遗物，全是美国轰炸伊拉克的产物，被集中在这里，向人们展示“美国的罪恶”。其中一个挺新挺大的家伙，涂着草绿色的无光漆，由于车速太快，我没看清是副油箱还是没爆炸的巡航导弹。

11点，我们驶入伊拉克边境，雄伟的伊拉克海关在路北傲然耸

立，疲惫的士兵四处可见。趁办入境手续之机，我想把憋了一路的一泡尿解决掉，可就是找不到厕所，找士兵问，他们全然不懂英语，急得我原地打转儿。情急生智，我解开裤子模仿撒尿的姿势，士兵们顿时恍然大悟，甩手一指，我进了一座小楼。这里根本不分男女，厕内“遍地人遗矢”，毫无立锥之地。我踮着脚尖，看看寻找净土无望，只好就地解决，得意时吹着口哨四下乱望，猛抬头，抽水马桶的陶瓷水箱上赫然四个大字“中国制造”。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沿途的种种不快也随着排泄出去。



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左一），北大东语系毕业，曹靖华之子。他在被炸断的“死亡之路”上，手握“战斧”巡航导弹的碎片，向伊军了解战况。武官助理李天天（右二），北大法律系毕业，是著名女将军李贞的孙子。海明威说：“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唐师曾　摄）

返回汽车，只见四个阿拉伯人正往我们车顶上装面粉，非要搭我们的车，任凭我们怎么制止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郑大使亲自出马，

用阿拉伯语叽里呱啦一嚷，他们才作罢。听司机讲，这几个伊拉克人由于食品短缺才到约旦来弄粮食，这会儿准备运回伊拉克，可没想到“劫”了外交车。按伊拉克法律规定，伊拉克人不准搭乘使团车辆，这帮穆斯林兄弟原想捡便宜，险些惹了祸。

11点30分，我们进入伊拉克境内，大路豁然洞开，又宽又平，与刚才约旦境内的狭窄公路顿成天壤之别。这里全是完好的高速公路，双向车道至少有6条快速分道线，交通标志也醒目，路中央设有水泥隔离装置和钢板防护墙，路两侧是停车线和防护网。整齐的防护网将高速公路完好地封闭起来。公路上很清静，看不到其他车辆，只有我们的车队以100公里的时速风驰电掣。再向前，公路的中心隔离带被拆掉扔在路北的沙丘上，形成80多米宽的宽广路面，曹武官说这完全可以辟作临时机场，供大型飞机起降。小李则提醒人们注意观察四周，这一带常有人持枪抢劫。这条自约伊边境开往巴格达的高速公路修得尽善尽美，每10公里一座立交桥，像一条金线将沿途城镇连接起来，完全不亚于我见过的波恩到科隆的联邦德国公路。

曹彭龄武官是北大世家、俄语系主任曹靖华之子，文学造诣颇高，家学渊博，睹物言志，不时大发感慨，动人心扉。武官助理小李在北大与我同年级，我在国际政治系，他在法律系，其连襟陈刚是冰心之外孙，亦是我的摄影朋友。侃起居京朋友，感叹世界真小，海阔天空一通神侃，不知不觉出去几百公里。

车到鲁特巴附近，立交桥下出现加伪装网的双联23毫米高炮阵地，操炮的士兵头顶钢盔，懒洋洋地在阳光下打盹儿。公路两侧的高压输电线像被刀砍过一样散乱一团，巨大的架线铁塔被炸翻在地。路上被炸毁的40吨油罐车和翻在路旁的巨型集装箱卡车不时可见。公路上有美国空军标准装备20毫米火神机炮扫射的痕迹，一枚火箭命中路中央的隔离带，钢板断裂，扭曲一团，一辆公共汽车斜在路基上，大火后风吹雨打，早已锈迹斑斑，失去了本来颜色。我们的汽车竭力躲闪着弹坑，不料还是轧在一块炸弹皮上，右后胎爆裂，司机紧踩刹

车，横扭着冲出100多米才停住。

郑大使指着我鼻子说：“唐老鸭，出门前你胡说八道什么来着，看你们的车，先撞坏车门，再让人走私面粉，现在又车轮放炮，全是你‘妨’的！”我朝他大喊：“我是福将。半个月前撞断12根隔离桩都没事！这全赖你们小李昨夜看见黑猫‘妨’的！”

趁换车轮之机，大使、曹武官、小李和我跑到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武官拣了一块鱼形弹片说要拿回家做盆景，我拍了张负片对武官说：“我要把这张照片投给北大校刊，让北大看看她培养出的这帮东西！”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在“死亡之路”上收集弹片。（唐师曾摄）

车到Ramadi和Haditha立交桥，突然拐下普通公路，司机说前方的路面被彻底炸断。武官告诉我，西方将Haditha列为化学武器基地，属重点轰炸目标。我们车队沿一条铁路缓行，前面是一个小编组

站，一列球型油罐车装的不知是什么宝贝液体，正靠在站台上。车站未遭袭击，一群儿童赤着脚在站前沙地上踢足球。十字街头，一辆大拖曳车正拉着两辆轮式装甲车向北开去，装甲车上的加农炮直指蓝天。在一幅巨型萨达姆像前，几个共和国卫队士兵拦住我们的去路，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曹武官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使馆！"一位民兵竟用标准的英语说："欢迎来巴格达！"曹武官说，这座城就是安巴尔。

16点48分，我们缓缓驶上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旧桥，桥头掩映在树丛中的57毫米单联高炮历历在目，我们已进入巴格达远郊。成行的树被拦腰斩断，露着雪白的新茬儿，有人正用自行车驮着树干往家运。遍地是士兵，荷枪实弹，还有戴红肩章的退伍军人和持AK-47步枪的民兵。不断有人检查我们的证件，我们仿佛在千万双眼睛中行走。

城区一片漆黑，路口站岗的士兵饿得直向我们要阿拉伯大饼。一张乌黢黢小脸上全是脏兮兮胡茬子，嘴唇干裂，双睛如豆。干瘦的小手有如猫爪。可见多国部队打击下的阿拉伯弟兄已经饿得小鬼不如。

使馆内没水、没电、没汽油。车库中所有汽车的油箱全被撬开抽干，我们摸黑卸完车上的20吨货物，每人泡了一包方便面。武官助理小李和我两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共度良宵。入夜，我不堪屈辱搬到地板上，一觉到天明。

睁眼一看，郑大使司机老王和报务陈林已在使馆上空升起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蓝天白云，分外鲜艳。晴空里马达轰鸣，例行侦察的美军F-15战斗机正划过巴格达上空，故意在拉烟层拖着长长的尾流，像一只铅灰色的苍蝇。



我们的家

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卡尔·海因茨·冯·古德里安

一到巴格达，头一件事是打扫卫生。昔日天方夜谭中美丽的巴格达，此时仅是一堆沾满污泥的、肮脏的水泥建筑。美国人高兴什么时候轰炸就派飞机来轰炸一番。由于战争停了两个多月的电，我们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4只冰箱全臭了，山珍海味成了十足的动物的尸体。鱼肉化作脓血流得遍地都是，腐肉用手一触，就化作一摊烂泥，苍蝇成团地往脸上撞，有一只竟飞进我嘴里。清理足足用了一整天。

我们院子里也落下过一枚“炸弹”。一个直径3米多的土坑早已被人填上。可房东说这是一架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干的，宪兵在上面发现了个高级照相机。

夜里没有电，房东送来两包蜡烛，是伊拉克自己产的，长得像我的大拇指，忽粗忽细，苍白无力，用火柴一点，噼啪乱响，火苗忽大忽小，黑烟腾腾。房东老太太笑着说她家里还存有中国蜡烛，可舍不得用。她再三感谢1月14日凌晨撤离前我送给她的防化服和防毒面具。

清理完我们分社，首席朱少华和我开车出去看看其他中国单位。市中心的解放广场静悄悄的，部分商店照常营业。人们在弹坑前做着各种交易，一架带液晶后背的“佳能小霹雳”相机才卖30美元。

从外观看，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完好如初。可中国民航办事处

的玻璃被打碎了一块，用木板顶住。存在屋后水池中的十几桶汽油已荡然无存。我找来一根木棍捞了半天，连空桶都没捞着。中建公司可就更惨了，我和老朱翻墙跳进院内，养鱼池中一条黑狗想朝我们呼救，可饿得已经叫不出声来。这家伙大概饿极了跳进干涸的水池抓鱼吃，可体力消耗太大，再也爬不上来。老朱帮我把这黑家伙抱上岸，弄了我一身臭泥。这黑狗长得很像我在秦岭拍熊猫时候的猎狗“魁恩”，当时“魁恩”每夜都和我一个被窝睡觉。可眼前这家伙却是一条十足的可怜虫，它把嘴紧贴在我鞋上，两只前爪平伸，喉咙呼呼响，不停地舔我鞋上的污泥。我找来一盆清水给它喝，这家伙一对水汪汪、亮晶晶、清澈见底的大眼睛纯洁天真，真像我在北京养的老猫“大咪”。

中建公司后院车库中的汽车油箱与中国使馆内的汽车一样全被撬开，汽油抽得一干二净。2908丰田皇冠车仅剩一只车轮，它旁边的一辆“奔驰300”连引擎盖上的奔驰标牌也被人掰走。

正对总统府的“7·14”钢索桥被整个摧毁，“自由者”桥还算完好无损，可离它不到800米的“共和国”桥被炸成4段，坠落江中。事后听一位朋友讲，横穿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上共有10座大桥，其中3座被摧毁。



正对萨达姆总统府的“7·14”钢索桥被多国部队炸毁，断成数截坠入底格里斯河。（唐师曾　摄）



伊拉克妇女把政府平价配给的雀巢奶粉拿到黑市上牟利。（唐师曾

摄）



巴格达黑市上卖面粉的少女。（唐师曾　摄）



食品短缺，伊拉克椰枣成了主要食品。（唐师曾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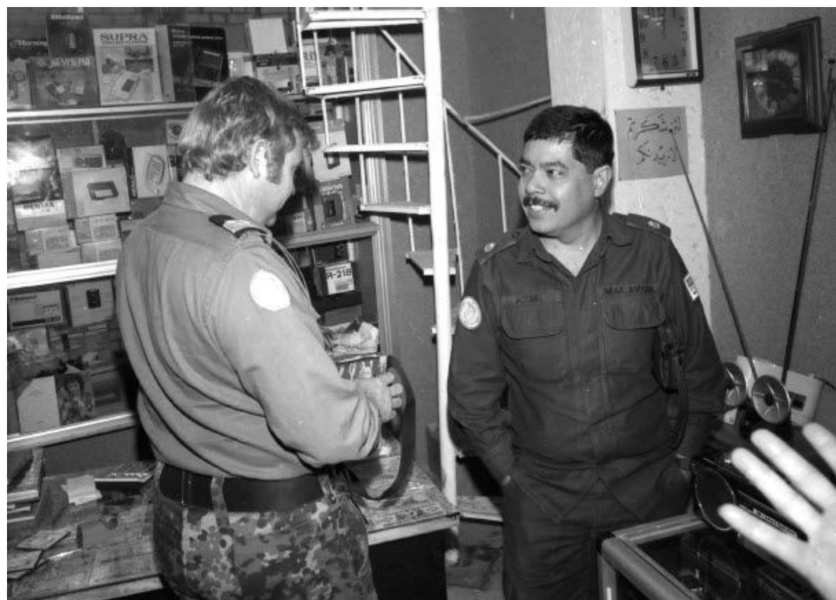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手表黑市，各种手表被用来换吃的。我用20美元买了一块TAG　Heuer，同样的手表当时在北京卖10000元人民币。（唐师曾　摄）



拉希德大街发电机市场生意兴隆。（唐师曾　摄）



巴格达街头花木枯死，市民用塑料桶接水。（唐师曾　摄）



联合国军丹麦士兵在黑市倒卖美元，陪他的是多国部队马来西亚士兵。（唐师曾　摄）



汽油短缺，巴格达富家子弟学骑自行车。大家闺秀，用纤手遮住玉面

不让我拍照。（唐师曾　摄）

与中国使馆毗邻的阿富汗使馆外的空地挨了一颗炸弹，铁丝网围墙被撕开一个七八米的大口子，树木焦糊，扭曲的弹片嵌进树干。曹武官和我在树干上剥下许多弹片。

街头静悄悄，汽车很少，大都静静地停在路边，开动的几乎全是军车。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当局下令停止向市民供油，每辆车每20天可凭卡购买汽油30升，这仅够我们奔驰油箱的一半。黑市汽油每升7～10第纳尔，比官价汽油贵90倍。

汽车靠边，人们纷纷以自行车代步。连巴格达市中心富人区——曼苏尔区的富豪子弟也开始学骑自行车。我为了照相而去与他们交朋友，与他们一起骑车兜风，发现他们中除伊拉克自产的“巴格达”牌外，还有不少中国的“飞鸽”和“金鹿”。“斋月十六日”大街一家自行车店的普通中国造26飞鸽男车售价竟达400～500第纳尔，合官价美元1500多，而稍好些的台湾造变速轴的自行车售价则在2000官价美元以上（官价1第纳尔＝3.228美元）。



海湾战争期间由于汽油断档，巴格达自行车热卖。（唐师曾　摄）

粮食因短缺已不得不实行配给制，黑市议价粮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涨了几十倍。拉希德大街上的白面（精制面粉）黑市价每公斤7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的每公斤0.054第纳尔上涨了129倍。在巴格达最繁华的拉希德大街的萨达姆像下，黑市交易在光天化日下进行。400克装NIDO奶粉原价0.6第纳尔，黑市价9第纳尔；2.5公斤装奶粉原价3.6第纳尔，黑市价50第纳尔。

自来水奇缺，新华社只有花园里的自来水够得上细水长流，用它冲完的胶卷挂着一层莫名其妙的白霜。外国记者一度居住的拉希德饭店一层大厅的洗手间全上了锁，唯有靠近餐厅的厕所开着。我进去撒了一泡尿，可是没有水冲。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二楼以上断水，只有一楼的水管才有涓涓细流。在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人们手端塑料盆、水桶，围着街心细细的自来水管排队取水。中东的烈日高悬当头。据当地德高望重的哈尔米医生讲，由于缺少消毒剂和杀菌剂，巴格达的自来水已不符合卫生标准，无法饮用。随着夏季来临，巴格达白天气温可达40℃～50℃，伊拉克南部一些地区盛夏时最高气温达70℃，那时缺水现象将进一步严重。拉希德饭店的喷水池现已干涸见底，亭亭玉立的阿拉伯少女喷水雕塑锈迹斑斑。



劫后巴格达，水、电、燃气供应中断，市民点起了油灯和煤油炉子。（唐师曾　摄）

入夜，我们驱车横穿巴格达，但见点点灯光寥寥无几，即便是这些灯光，也有许多是私人小发电机发的电。由于巴格达南郊的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被彻底摧毁，巴格达成了黑暗之城。据曼苏尔区一位着军装佩手枪的负责人讲，政府正设法集中巴格达附近的中小电厂向巴格达供电，但由于能源不足，情势仍很紧张。拉希德大街的发电机市场由此兴隆起来，一台4000瓦的二手本田柴油发电机卖价8000第纳尔（合25000官价美元）。

中国人称阿卜杜·瓦哈卜广场为“刘文学广场”，因为这里矗立着一座酷似刘文学的雕像，其实这是萨达姆等人当年行刺卡塞姆的纪念碑。这里的黑市美元一日一变。战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丹麦人曾用5.56的价格抛出美元，而今已上涨到6.68美元。而官方规定1第纳尔为3.228美元，倒挂竟为18倍（到1993年7月我第四次去巴格达时，1美元竟可换100第纳尔）。形形色色的“倒儿爷”们把千奇百怪来路不明的各种物品拿到黑市上换美元。



巴格达街头市民排队等自来水。（唐师曾　摄）

1月13日我曾光顾的乍巫拉影院已经关门，往日流行的欧美片和电视连续剧已经绝迹，巴格达电视台只播放一套节目，信号极弱，颜色忽有忽无，仿佛下小雨，除政府声音外，全是阿拉伯历史剧。

原来16版的官方《共和国报》已减至8版，纸张质量低下，油墨黯淡，照片模糊不清。英文的官方报纸《巴格达观察家报》已经停刊。

全城已没有电话，因为所有的通讯中心、电话局全被美军摧毁。与外界联系全靠架在拉希德饭店的三部卫星电话，分别属WTN、AP和VIS NEWS（Reuters，NBC，BBC）三家所有，对外开价每分钟15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

在萨东大街路口，两个神色诡秘的青年拦住我，问我支持美国还是支持伊拉克。我说我听不大懂，我是个摄影师，不懂政治，但我妈说我一生出来就是伊拉克人民的忠实朋友。这两人一听恶狠狠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我们库尔德人快饿死啦。"

市内所有的路口，都有安全警察、士兵、共和国卫队和民兵把守，盘查过往车辆。我们由于是中国人而备受礼遇，获免检待遇。警卫拉希德大街拉菲丹国家银行的士兵见我们重返倍感亲切，拥抱不止，并忙着索要上次我给他们拍的照片。

入夜，美国飞机轰鸣而来，吵得人睡不着觉，没有地面武器还击。战后德国总理阿登纳说过："忍耐是战败者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劫后巴格达

忍耐是战败者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阿登纳

3月18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第3天。

一大早，我像饿红了眼的恶狼，坐在中国驻巴格达使馆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等出租车。可巴格达的出租车好像全跑到爪哇国去了，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连个车影子都没有。

直到中午11点，我总算到了闻名遐迩的拉希德饭店。饭店大门口一扇铁门紧闭，客房大厦的玻璃自动门被一扇仅可一人通过的三合板木门取代。所有的玻璃全贴上了“米”字形防空胶条。

饭店里没有电，当然也没有电梯。312房间NBC的不干胶纸依然五彩斑斓，可屋内已易主人，几个伊拉克官员正坐在里面喝茶。116房间居然还住着个“巴解”记者，正在吃午饭，桌上地下摆满了各种方便食品，其丰盛程度令我惊讶不已。

伊拉克新闻部的“小胡子”见我一头撞进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唐，你怎么又来了，不是所有外国记者全离境了吗？”我说我是上个主麻日（3月15日）随中国大使一起重返巴格达的，这家伙听罢竟有些肃然。

我说作为人民中国“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我有义务拍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将其展示给世界人民。“小胡子”一摆手，“我明

白了，你得等我去请示一下。你知道，现在全城没电话。”

我一个人被“晒”在大厅里坐等，又冷又饿又憋得够呛，连推了几个厕所全锁着门，最后才找到靠近餐厅的厕所，总算有个没锁的。



因海湾战争闻名于世的拉希德饭店，门前的喷泉锈迹斑斑，滴水全无。（唐师曾　摄）





常驻伊拉克的美联社记者，正狗撒尿般跷着大腿用卫星电话发稿。他的笔记本电脑、移动卫星电话上标着巨大的AP（美联）标志。在中东，AP、CNN是无冕之王，而我囊中如洗，除了勇敢一无所有。（唐

师曾　摄）

踱出大厅，美联社记者正狗撒尿般跷着大腿用卫星电话发稿。我挺在行地问“美联”，一分钟多少钱？他翻了翻白眼：“至少150美元，但不能传图片。”我冲他随手摁了下快门，拍了张这小子的尊容。

返回大厅，“小胡子”还没回来。我半躺在大皮沙发上养神，仰面朝天数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尽量提醒自己要耐心等待。猛然一阵香风拂面，不知何时对面坐了两位阿拉伯少女，我们彼此无言，各想各的心事。

这时又过来一个小伙子，一脸的无知相可偏戴了一副名牌的罗登斯德眼镜，他坐在我旁边情不自禁地和那两个姑娘套磁。大概想露一手，他竟用英语问我：“日本人？”我摇摇头。“朝鲜人？”我又摇摇头。“台湾人？”我朝他大喊：“怎么你没见我身上的五星红旗吗？！”小伙子说：“对不起，原来是俄国的。”

尽管我爱搭不理，小伙子并不生气，面带微笑地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说在等新闻部官员，那位官员答应带我去拍美国人轰炸民房的现场，让我等“Shiway-Shiway”（阿语：一会儿），可我已坐了两个钟头。小伙子一听说：“那边是主管阿拉伯事务的头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请示大人物呢？”



美联社记者在用卫星电话向世界发稿。（唐师曾　摄）

这个大人物身着笔挺的灰西装，50岁上下年纪，头戴阿拉伯花格头巾，两撇胡子挺像阿拉法特。我用英语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他听罢大吼一声，“小胡子”变戏法似的跳了出来，连说“Nam Nam”（是，是）。

“小胡子”把我交给一个高个儿、戴眼镜、花白头发的斯文男子。“小胡子”一走，斯文男子就问我饿不饿，尽管我早已饿得看什么都是双影，可硬挺着咕噜作响的肚子说不饿。他拍了拍他的肚子，“可我饿了。”我说：“哦。”他又问：“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去吃午饭吗？”我坚决地说：“我吃过了，我可以在这里等你。”由于我口袋中根本没有够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一顿饭的钱，一个人饿着肚子站在弥漫着食物香味儿的大堂里，尽管腥膻之气不合口味，可仍然充满了诱惑，让我想起饥肠辘辘的大学时代。原来任何人在饥饿面前都有沦为乞丐的可能。

又过了半个小时，斯文男子终于回来了，告诉我一小时100个伊拉克第纳尔（合332官价美元），我说行。他捅了我胸口一下，“换美

元吗？”我说：“对不起，我的美元已经换给拉菲丹银行了。不过明天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由于战争破坏，污水横流。（唐师曾　摄）



巴格达儿童奶粉厂被多国部队当作化学武器基地摧毁。（唐师曾

摄）

我们雇了辆红色“皇冠”，看样子司机是斯文男子的朋友。我们先到了被炸成四截儿的“共和国”桥。斯文男子从西装口袋中掏出个小本子一晃，守桥的共和国卫队闪开了一条路并告诉我只许站在哪个位置、朝哪个方向拍。

照完后，我爬上了断桥，两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仍然紧跟着我，我用脚掌走路，后仰着身子，沿断裂后坠向底格里斯河的沥青桥面往下走，直到陡得往下滑时，才连滚带爬地回来。士兵见状哈哈大笑，让我站直了别动，围在我背后读我摄影背心上的阿文字“人民中国·新华社”，连竖拇指，“中国，好。”

地方政府部和司法部坐落在同一街口，都已被彻底炸毁，持枪士兵和民兵正检查过往车辆，一群小孩在废墟上捡木头，脏兮兮令人心酸。司法部看似完好的废墟门口有一座十来米高的萨达姆画像，可惜太侧了，24毫米镜头收不进去，我变换着角度，试图将其和被炸毁的大楼拍在一起。这时来了几个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抓住我的胳膊不许照相。幸亏斯文男子走过来，掏出个小白牌向他们一晃，老百姓才立即散去。



IBN-SALM大街，Bishir Peter一家被夷为平地。（唐师曾　摄）

市中心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座百货商店被炸散了架，根根钢筋直指晴空。由于有斯文男子保驾，我爬上炸烂的混凝土块鸟瞰脚下清理杂土的推土机。正得意时，只听“叭”的一响，不好，裤裆裂了。我的第一条牛仔裤在以色列内格夫沙漠演习爬坦克时剐烂一条裤腿，第二条昨晚帮使馆清理冰库中的臭肉弄了一身脓水，没水洗扔在了分社，第三条太瘦，致使如今登高现眼，逗得看热闹的阿拉伯人哄堂大笑，窘得我顿时英雄气短。

此次海湾战争，美国及盟国使用了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它可以精确地命中目标，钻入建筑物腹内爆炸，造成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建筑物的外部主体结构安然无恙，而腹内则被炸得一干二净。

英国圣桑切斯特军校的一位教官曾把80年代初的马岛战争比作“昨天的战争”，而把以色列攻打贝鲁特的黎巴嫩战争比作“明天的战争”。当年，以色列就曾使用过类似的炸弹将巴解炸出贝鲁特。

中国使馆附近的一座“阿米里亚”地下掩蔽所钻进了两颗“灵巧炸弹”，炸死了1500人（伊通社数字，西方媒介报道为400人）。掩蔽所附近的住家门口都挂着黑色挽幛，上书白字。斯文男子说，这些人家就近躲入掩蔽所，结果举家蒙难。看到有我这个外国人在此拍照，一群排着队的受难者家属慷慨激昂地向我控诉美帝罪行，好像我就是乔治·布什。

外国记者居住的拉希德饭店安然无恙，可与其只隔一条马路的伊拉克议会大厦被炸掀了屋顶。许多建筑物表面看来完好无损，只是窗口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腹内却已被炸空。据传，巴格达的能源基地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全是这样炸毁的，可惜这两处不许参观。

在IBN-SALM大街，Bishir　　Peter一家被夷为平地，仅他一人幸免，拄着拐杖瘸瘸地走。陪我的斯文男子见我面露怜悯之色，便义愤填膺地朝对面的AHRRAA GERCHOR教堂一指，“他们还轰炸教堂。”

在废墟中捡木柴的伊拉克儿童见我照相，竞相围上来，高擎着手中的破木块，兴高采烈地大喊“索拉，索拉”（照片，照片）。望着他们纯真美丽的大眼睛，我不禁珠泪潸然，心酸欲碎。



一群在废墟上捡破烂的儿童，发现一块家具碎片可做木柴，如获至宝。（唐师曾　摄）



被炸得散了架的百货商店。城市如同地狱，市民如同鬼魅。（唐师

曾　摄）



被炸毁的巴格达司法部大楼。以往挥手致意的萨达姆，此时仿佛手足

无措。（唐师曾　摄）



被摧毁的巴格达电话局前，一儿童抱木柴而归，喜不自胜。（唐师曾　摄）



伊拉克通讯中心，电视塔开战后即被摧毁。这是开战前夕我躲在使馆

汽车后排用长镜头偷拍的电视塔。该塔被夷为平地后，伊拉克人民在此重建了萨达姆塔，后又被美国飞机摧毁。（唐师曾　摄）



美国使用激光制导导弹可精确命中目标，政府部门被炸成废墟，而清真寺完好无恙。（唐师曾　摄）



伊拉克的巴士拉港与伊朗的阿巴丹并列为海湾两大油港。开战后，巴士拉港成为重点轰炸对象，沉船堵塞了码头。（唐师曾　摄）



伊拉克被美国禁飞，伊拉克空军无仗可打，军人只能在清真寺祷告。民航飞行员纷纷改行，开出租汽车。（唐师曾　摄）

去南部——什叶派地区烽烟又起

假使法军不在杜穆里兹大败，山岳党人也不会夺取政权。

——约米尼《战争艺术》

与友惠小姐约好，3月26日一起去看轰炸现场，所以不到7点就匆匆起来做早饭，没有煤气没有电，只能用矿泉水冲奶粉。

友惠小姐是位日本姑娘，他们10位日本人组成了一个“海湾和平团”，带了一车药品和食物来援助巴格达，可来后又挺失望，她“担心物资到不了需要的人的手里”。

与分社文字记者江亚平一道赶到拉希德饭店，江去楼里找日本人，我则守在门口，以防与日本人走岔了，北京警察管这一手叫“蹲坑”。我这人总喜欢边想边干，手脚眼耳口鼻并用，随机应变，在等待中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我最精彩的灵感总是在无意中产生。江进去了好久，我忽然看到伊拉克新闻部的“小胡子”走了进来，他朝我一咧嘴，“唐，去不去，1500伊拉克第纳尔。”我说太贵了，我还是跟日本人走。可转念一想，他要去干什么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就拒绝了呢。正巧这时日本朝日电视新闻（ASAHI TV NEWS）的伊拉克雇员侯赛因·马根走过来，我拉住他问今天要去哪儿，侯赛因朝我大喊一声：“去南部。”就抱着摄像机钻进一辆红色“皇冠”，尾随“小胡子”的另一辆红色“皇冠”飞驰而去。

好不容易等到江从饭厅里出来，我一把揪着他跑到饭店门口，告诉他有更好的买卖了。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子走过来，张口开

价“1750，这是新闻部定的官价”。一辆乳白色“皇冠”开过来，我们一头扎了进去，一看手表，早上8整。

出巴格达向南，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已成废墟。两辆T-72型坦克扼守着通往南方的8号公路，炮口对准公路尽头。沿途不断地有宪兵拦住我们，司机用阿语一解释，立即放行。司机名叫苏海尔，车开得挺猛，时速一直没下过120公里，甚至敢鸣着喇叭超军车。江亚平叽里咕噜地与司机交谈，弄得本来会不了两句半英语的司机苏海尔直分神，车到尤斯费厄竟开错了方向。幸亏我瞄了一眼坦克车后面的路标，大喊“Stop”，才拨乱反正。

沿8号公路南下，不时可见路旁虎视眈眈的T-72坦克。这种苏制T-72主战坦克是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战后第三代坦克。火炮为125毫米滑膛炮，可发射穿甲弹、破甲弹及榴弹等多种炮弹，采用自动填装机，火炮发射速度可达每分钟8发。火控系统则配备有电子计算机、红外夜视仪、激光测距仪等装置。火炮口径大，火力强，初速高，装甲防护性好，外形低矮，不易被击中，最大时速60公里，涉水深可达1.8米。其前装甲位置有一块三角形钢板，与T-62及中国的“59”和“59改”型迥然不同，极易识别。



巴士拉附近，大型平板车正将一辆伊陆军王牌坦克T-72运往北方。我边开车边偷拍，影像模糊，但仍可看清T-72前装甲特有三角形结构。（唐师曾　摄）



镇压叛乱的伊拉克政府军，飞驰电掣般从我身旁掠过。（唐师曾

摄）

在泰菲安桥头，竟看见一辆法国造GCT-120毫米装甲自行火炮。巨型油罐车不时从我们车旁咆哮而过。成队的大型平板拖车载着双联37毫米高炮、T-62坦克向北疾驰。路旁可见军用帐篷和帐篷旁拾柴禾的黑袍阿拉伯妇女。

9点，我们离开8号公路向东拐入一条岔路，两辆不明型号、重心极低的履带装甲车紧扼路口。右前方45°是一个庞大的无线电阵地。一队军车迎面飞速驶来，一辆平架着37毫米高炮的兰德罗孚吉普开道，操枪的士兵头戴尼龙软帽，只露双眼，大风镜上是涂了迷彩的钢盔，令人不寒而栗。

10点钟，我们由岔路拐上巴格达到巴士拉的6号公路。显然这条路正在运兵。大型平板拖车正将数不清的T-62、T-72和“59”“59改”式坦克由南方运往北方。为了节油，军用卡车则由直径七八厘米、长五六米的钢管做硬牵引，三四辆卡车一个编队，由大马力的MAN或奔驰、斯堪尼亚牌卡车牵引，余车熄火滑行，紧随其后。路旁沙地上，一辆T-72坦克和一辆履带装甲车沿着公路往北狂奔，弄得飞沙走石，征尘滚滚。

10点45分，进入巴格达南160公里的库特，关卡告诉我们，的确有伊拉克新闻部的两辆红车开过去。库特城里的大转盘上停着一辆巨型坦克，好像是英国的“百人酋长”式。奇怪的是，由巴格达到库特这段通向巴士拉的公路竟未受到盟军的空袭，连路旁的高压输电线也完好无损。

12点，距南部屯兵重镇阿马拉还有60公里，我们再次被共和国卫队截住，司机苏海尔打开车门钻出车去，与士兵耳语了什么，我们立即被放行。借停车撒尿之机，我仔细打量了我们的白色“皇冠”，居然挂的不是红色出租牌而是白色私车牌。我们的司机是个特务。

继续前进，依然是数不清的坦克、自行火炮，右前方45°居然还有一架“米-4”直升机在盘旋，显然，装甲部队正在这段濒临泄湖区的快速路上集结，然后搭乘大型平板车北上。我注意到，一些军车上画有白底红字的“红新月”标志，一辆法制GCT自行火炮的侧装甲上竟画了直径1米的“红新月”。

12点34分，我们驶过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一座旧桥，进入位于巴格达东南450公里处的军事要塞阿马拉。底格里斯河从该城穿流而下，经过巴士拉后注入波斯湾。阿马拉不仅扼守巴格达到巴士拉的水陆路交通，而且东距伊朗边界仅40公里，是伊拉克南部的重要军事要塞。据伊拉克当局介绍，不久前一些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穆斯林控制了该城，直到3月16日伊政府军才收复了该地。

阿马拉城外，一座5米高的伊拉克士兵塑像被榴弹打成三截儿匍匐在地。像沿途一样，这里也严禁照相。雕像背后的十字街头有枪战过的痕迹。一座两层楼被火箭弹击穿一个1米见方的圆洞，屋角坍塌下来。伊拉克政府军士兵蹲在双联23毫米高炮后面，炮口平伸，当作战防炮使用。

在阿马拉市电讯中心的废墟旁，我们终于追上了载有伊拉克政府新闻部官员和其他外国记者的两辆红车。而所谓其他“外国记者”不过是西方新闻媒介雇用的伊拉克雇员而已，因为伊拉克早已下令所有外国记者必须离境，连CNN大名鼎鼎的皮特·阿内特也被赶到了耶路撒冷。



残酷的巷战，冷枪跳弹，尸横遍野。（唐师曾　摄）

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官员不客气地拉开我们的车门，一屁股坐在司机旁边，扬起右手，让我拍阿马拉市被炸毁的电讯中心，“这些全是美国人干的，所以伊拉克没有电话了。”我跳下车，蹲在路边，等有几个伊拉克士兵进入画面时按下快门。不料阿卜杜拉钻出汽车直指我的鼻子，“不许拍军队，我警告你，你拍了两张。”我解释说我需要有些活动的人作前景，可阿卜杜拉强硬地说：“这我不管，但决不许拍军人。”

在阿马拉市政府门前，我们奉命停车。此次我学乖了，先问阿卜杜拉可以拍哪儿。市政府斜对面马路中央，一辆挂黑色军牌的汽车被烧成一堆乌铁。阿卜杜拉说：“从现在开始全是穆斯林什叶派的暴行。”据他介绍，“3月2日至16日，受伊朗支持的穆斯林什叶派叛乱分子在此烧杀抢掠。他们干脆就是伊朗人，连阿拉伯话都不会讲。”

在中东地区，伊朗人（即古波斯人之后）与伊拉克为首的阿拉伯人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这两大文明古国的种种冲突，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逝世后由于继承权问题形成的宗教矛盾。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故意在两伊间制造矛盾以便从中渔利，伊朗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的两伊在政治、宗教、领土诸方面的矛盾有所缓和。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上台，两国间一度松弛的局势再次剑拔弩张。



伊拉克南部，被什叶派穆斯林烧毁的警车。（唐师曾　摄）

1980年4月1日，亚洲学联在伊拉克穆斯坦两大学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发生两起爆炸，险些炸死副总理阿齐兹，伤亡数十人。行刺者是名伊朗裔伊拉克人。随后伊拉克开始驱逐伊朗人，提出收回历史上隶属阿拉伯人现为伊朗占领的大通布、小通布、阿布穆萨三岛。1980年4月5日，萨达姆首次将两伊冲突上升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冲突”，其实在我这样的外人看来，两者种族上很难区分，宗教上都信仰安拉，只是分属逊尼、什叶两大派别。今天的波斯已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只是语言上差别大。就像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书写也是由右向左，许多数字、单词发音几乎一样。此后双方互相攻讦，伊朗往往更激烈，甚至制造了萨达姆已被刺身死的谣言。当初霍梅尼遭巴列维国王镇压时，伊拉克曾允许他避难，1975年两伊《阿尔及尔协议》

后，伊拉克、科威特表示不宜继续收留霍梅尼从事反政府活动，霍梅尼极为不满。霍梅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自以为可以在伊拉克、科威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继续成功。不料由于霍梅尼的宗教国家概念、拒绝归还三岛、坚持“波斯湾”名称令阿拉伯国家大为不满。由于三岛传统上归阿联酋所有，阿联酋人少力薄。阿拉伯国家中最富强的老大哥伊拉克自视肩负着维护阿拉伯大家庭的重任。从1980年9月22日开始到1988年8月20日，两伊战争打了8年，动用了生物化学武器，战争结束时萨达姆出人意料地归还了占领的伊朗土地。萨达姆总统继而实行民主改革，被视为富国强民改革开放的伟大领袖。



伊拉克南部重镇巴士拉市，巴士拉中心医院，手术没有麻药，伤兵躺在担架上惨叫，医生束手无策。（唐师曾　摄）

瑞士军事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一书中称：“假使法军不在杜穆里兹大败，山岳党人也不会夺取政权。”伊拉克的形势就像当年的法国。据伊拉克政府官员介绍，2月28日，布什宣布多国部队实行停火、海湾战争基本结束后，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地区出现了反对萨达

姆政权的骚乱，它几乎蔓延到南部和中南部的所有城市，严重威胁和动摇着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导的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两大穆斯林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伊拉克两派穆斯林的矛盾纷争由来已久。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围绕继承权问题，教徒们发生了争执。多数人赞成阿拉伯的选举传统，挑选了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4位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以《古兰经》和六大《圣训集》为自己的学说，并以此作为立法根据，这一派被称为逊尼派，也叫正统派。逊尼派由于得到历代哈里发或政府的大力支持，流传甚广，世界穆斯林的85%属于逊尼派。

另一派则坚持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应由其后裔继承，认为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才是合法继承人，其余三人是非法篡位者。支持阿里的这一派被称作什叶派（什叶，即追随之意）。什叶派代表了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贵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主流阶层的愿望。就这样，逊尼派和什叶派正式分裂为两大教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贯穿了以后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

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中，伊拉克是仅有的几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之一，什叶派占全国穆斯林总数的60%，聚居在伊拉克南部地区。虽然什叶派人数多于逊尼派，可后者却地位优越，在伊拉克政府机关及军队里占有重要位置，历史的结怨加上现实的矛盾，如两派因社会地位悬殊，造成了尖锐的利益矛盾与权力之争，使得伊拉克两派穆斯林难以调和。



共和国卫队欢呼平定北方叛乱，在制高点上鸣枪庆贺，溅落的子弹砸在我的钢盔上叮当乱响。（唐师曾　摄）

20世纪70年代初，伊朗宗教领袖、什叶派的霍梅尼曾流亡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对伊拉克什叶派造成很大影响。这使伊拉克当局十分气恼，其间将4万什叶派教徒驱逐出伊拉克。而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成功后，伊朗成了海湾国家唯一的什叶派穆斯林掌权的国家，这对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是极大的鼓舞。伊拉克当局为此又清洗镇压了上万名反政府活动分子。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反政府组织曾策动过什叶派反对萨达姆活动，但都遭镇压。现在，一度被压下去的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势力在海湾战争后又冒头了，它趁伊政府军溃退之机迅速在南部活动起来，并一度控制了南部重镇巴士拉。伊拉克当局不得不抽调军队来对付这股反政府势力。

在夺回的阿马拉市政府门口，一门20毫米四联高炮横在路中央，几位头戴乳白色钢盔穿作战服的伊政府士兵虎视着过往行人。他们身后有一辆架着无后坐力炮的美式吉普。市政府楼顶一面伊拉克国旗在烈日下懒洋洋地飘舞着。楼前小广场的四角则布满了82毫米迫击炮，

不知是战利品还是防守武器。

在一位戴黑色贝雷帽的陆军少校陪同下，我走进这座两层楼的建筑物。一进楼门，迎面高悬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崭新玻璃镜框，里面是一幅萨达姆的黑白照片，在四壁满目疮痍中分外显眼。阿卜杜拉指着满地的灰烬让我拍，我一通猛拍以示合作，可光线太暗，我的SUNPAK-3000领时就是二手货，此时怎么也不肯“赏光”亮一下。

出得楼来，陪我们的陆军少校指着二楼一个被火箭弹击穿的大洞让我“索拉”（照相），我朝那边望去，几个伊拉克士兵正持枪站在洞口，摆出姿势等我照。我得先请示阿卜杜拉，他把眼睛一眯，“我已经警告过你。”其严厉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手势使我知难而退。陆军少校一缩脖子，再也没敢吭声。

门外广场上，乘另外两辆“皇冠”到此的伊拉克新闻官、司机及四位为外国新闻单位雇用的伊拉克人，让我走慢点儿。朝日新闻电视台的侯赛因·马根和VIS NEWS的小瘦猴争着拍我，还让我亮出左胸上的五星红旗及后背上的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侯赛因·马根说：“唐才是彻头彻尾的外国记者，红衣服也很漂亮。”



收复失地的共和国卫队喜不自胜。（唐师曾　摄）

下午1点30分，我们奉命离开阿马拉返回。3点30分，途经库特停车参观一座被烧毁的建筑物。门口一巨幅萨达姆像，双手平端一个大簸箕，一副劳动人民的模样，高达五六米，居然完好。一位一瘸一拐头缠阿拉伯头巾的老头儿，拄着拐杖领我们进去拍照。老头手脚乱抖，义愤填膺地大骂穆斯林什叶派。

再往前是库特的商业街，许多士兵正在喝加香料的土耳其咖啡，旁边居然还有烤羊肉串的，腥膻之气刺鼻，这在食品短缺的巴格达是看不到的。满街都是兵，可陪同的新闻官只让我们拍对面被烧毁的超级市场，但我和侯赛因·马根对此不感兴趣。我们的陪同阿卜杜拉买了一大塑料袋食品带上车，准备带回巴格达，显然这里的食品比巴格达充裕。

阿卜杜拉示意开车，向左伸出的大毛手勾住司机的椅背，左腕上一块金光闪闪的大金表赫然在我眼前，上面印着“CNN International”。我故作崇拜地问：“阿卜杜拉，你陪过CNN？”他吐了

口烟，“当然，皮特·阿内特。”他左腕动了动，“在中国也能看到CNN吗？”



萨达姆双手平端一个大簸箕，革命领袖带头义务劳动，一副劳动人民

的模样。（唐师曾　摄）

沿6号公路返回巴格达，路旁仍是装甲兵阵地，大约每一公里就有一辆装甲车在路旁警戒。士兵们在夕阳中生火做饭，炊烟袅袅，金乌西坠，令我产生一种“断肠人在天涯”的思乡惆怅。

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一盎司的成功，需付一加仑的鲜血。

——乔治·巴顿

4月1日，凌晨4点，巴格达首席老朱把我叫醒，没电，我们摸黑用凉水擦了一下脸，然后扛起铁锹去拉屎。由于水电无保障，楼内的冲水马桶根本没法用。夜漆黑如墨，我们打着手电仔细挑选地面，因为附近已被我们“拉遍”。

5点整，我们赶到拉希德饭店。记者们正在楼下静立，等候伊拉克新闻部官员到来。除约旦记者自己开一辆“尼桑巡逻兵”外，所有西方记者俱财大气粗，掏出整打的美元，雇伊拉克新闻部的汽车。战时伊拉克规定，所有外国记者外出，必须乘新闻部的车，不许随便自己雇车，连狂得不行的CNN也得服从。我们则受到优待，获准开自己的奔驰260，但必须让一个新闻官员“全陪”，服从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给我们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周他曾陪我拍过挨炸的儿童奶粉厂。穆罕默德检查了我们后备箱里的150升备用汽油后下令上车待命。

直耗到6点钟，我们才接到出发的命令。所有汽车全编了号，必须依次行驶，不得超越。约旦记者被编在我们前面，大胡子摄影记者朝我挥了一下特大号烟斗，“但愿路上别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刚学的法语：“Bon voyage（一路平安）。”

由于通往基尔库克的2号公路正在运兵，我们不得不向右绕行走

另一条低等级公路。

驶过小扎卜河大桥，左侧丛林中有几十辆烧毁的IFA牌军用卡车。路边开始出现烧毁的建筑物。持AK-M步枪的爱国民防团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检查过往车辆的证件。



从前线撤回的伊拉克精锐——共和国卫队。（唐师曾　摄）

天气仍很阴晦，像雨后的湘西张家界，雾气迷蒙，令人怀旧、忧怨、伤感。公路两侧被火烧毁的IFA军车连绵不断，公路沿线的制高点都筑有碉堡，上插红、绿、白、黑四色伊拉克国旗。向阳的山坡上架满了双人帐篷和班用帐篷，洼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I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边所有的萨达姆画像全被毁坏，上面布满AK式步枪7.62毫米的弹洞。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车队在军车中蜿蜒穿行。

中午时分，跟在我们后面的皇冠车直闪大灯，示意停车。原来我们潇洒的大奔驰右后轮被弹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气。趁老朱换备用车胎之机，我又给我们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经过6个多小时的飞驰，我们抵达巴格达以北400公里的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这里是前天刚收复的。街头不时可见被击毙的库尔德人尸体。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库尔德农民，诚惶诚恐像惊了枪的兔子一样四处乱跑。由于天气转暖，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招得成团的苍蝇乱舞，绛紫色的污血在柏油路上龟裂，臭气冲天。

一向被视为伊拉克骚乱根源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了国际关注。很多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库尔德问题不但关系到萨达姆政权存亡，而且正在成为关系到伊土、两伊和叙伊关系的地区性棘手难题。

库尔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伊朗西部和苏联的亚美尼亚。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

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主要以游牧为生，受居住国或居住地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库尔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经济、文化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谋生手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区居民一般定点放牧或继续游牧，平原居民则从事农业，而居住在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地区的库尔德人则多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约有2500万库尔德人，他们的大体分布是：土耳其约1200万，伊朗约550万，伊拉克约500万，叙利亚约50万，其余的则分布在苏联、黎巴嫩、约旦、阿富汗等国。库尔德人居住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主体民族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说这是个地区性问题。而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种种因素，使这种矛盾在伊拉克表现得最为强烈。

据同行的西方记者介绍，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苏莱马尼亚和埃尔比勒省，其余的则居住在基尔库克、摩苏尔和迪亚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战期间，排外情绪极强的库尔德人与英国占领

军发生过武装冲突，规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义虽屡被镇压，但产生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巴尔扎尼。二次大战后，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巴尔扎尼领导其追随者屡屡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请求，遭拒绝后又几次揭竿而起，几次签订停火和平协议。两伊战争中，各派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立运动。萨达姆不顾战况吃紧，冒险从前线抽调重兵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驱赶，从1983年至1988年，约有25个库尔德镇及4000个村寨被毁，50万库尔德人被驱逐境外，150万人过着流浪生活。面对库尔德人的反抗，伊政府军甚至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使萨达姆的战争潜力和军事机器遭到严重削弱，趁共和国卫队和伊军主力东调之机，北部苏莱马尼亚、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三省的库尔德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克了苏莱马尼亚和埃尔比勒省省会并对基尔库克油田形成了包围，伊政府被迫紧急调用精锐部队平息暴乱。

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莱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AFP”，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80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行李箱中搜出5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双联23毫米高炮，当作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夹，扎鞋硌脚，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遭劫后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共和国卫队从一辆丰田车的行李箱中，搜出5个库尔德孩子。（唐师曾　摄）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占领了警察局，烧毁了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声称至少有10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尘冲向库尔德人阵地。

市政府左方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4月5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马尼亚奔驰。基尔库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单门独户，内带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被击毙的库尔德反政府分子，鲜血还没有凝固，汩汩流淌。（唐师曾　摄）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巴格达的宿敌以色列耶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都是军人。一个至少由50辆军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雷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40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像运往菜市场的竹篓

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榄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时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20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孚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像VCD盘上的越战。

行至苏莱马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所有记者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以致我连车门都打不开。我的80-200毫米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此到山口几十公里被军车与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水牛、阿拉伯马和毛驴拖曳着满载被褥、缝纫机、大闹钟等的木板车在军车间缓慢挪动。恶臭扑鼻，哭喊之声震天。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满脸鼻涕泪水、天真可爱的小孩竟怀抱一只死去的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人头攒动，并不见有人倒下。



围剿库尔德叛乱者的共和国卫队。（唐师曾　摄）



清剿叛乱的伊政府军的加农榴弹炮与库尔德难民。（唐师曾　摄）



共和国卫队用T-72主战坦克镇压库尔德人。（唐师曾　摄）



伊拉克北部禁飞区，逃难的伊拉克难民。（唐师曾　摄）

我和BBC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拄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BBC的摄影师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

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所不同之处仅是兵蚁与工蚁之别。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手持AK-M冲锋枪，登上一辆镇压库尔德人的T-72坦克。（唐师曾　摄）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摁一气，我用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摁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

“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BC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像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儿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4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沱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在塞浦路斯我又遭遇车祸，把一辆小福特撞碎。（唐师曾　摄）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唯一有危险的营生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违制”。



塞浦路斯车祸，右角是我受伤的沃尔沃740GL。“敌车”粉身碎骨，我车仍可行驶。（唐师曾　摄）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挡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

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逾80℃。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6个缸而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2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5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儿。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为我那90多岁的爷爷。我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民主科学、乐于助人。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竟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60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学生宿舍，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无所不

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他还不忘按下快门，终于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转世。



郑达庸大使在伊拉克一处废墟，脚下是被美军飞机20mm火神机炮扫射过的高速公路。（唐师曾　摄）

我儿时皈依的师父、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像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久居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4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明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

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



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与伊拉克总参谋长、共和国卫队司令亚德·哈利法·拉维将军。（唐师曾　摄）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4年

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7个人当中，我是唯一没办此手续的，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在巴格达潜伏下去。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尔饭店当作人质充当人肉炸弹。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好人并没有减少。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萨达姆的高级军官，左二为总参谋长兼共和国卫队司令拉维将军。

（唐师曾　摄）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彻。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并肩合作，结下兄弟般的友谊。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3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6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4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上帝啊！

请赐予我，

不为金钱所动的人，

不为权力所害的人，

讲真话爱思考的人，

担责任珍视荣誉的人，

勇敢的人。

罗伯特·卡帕！

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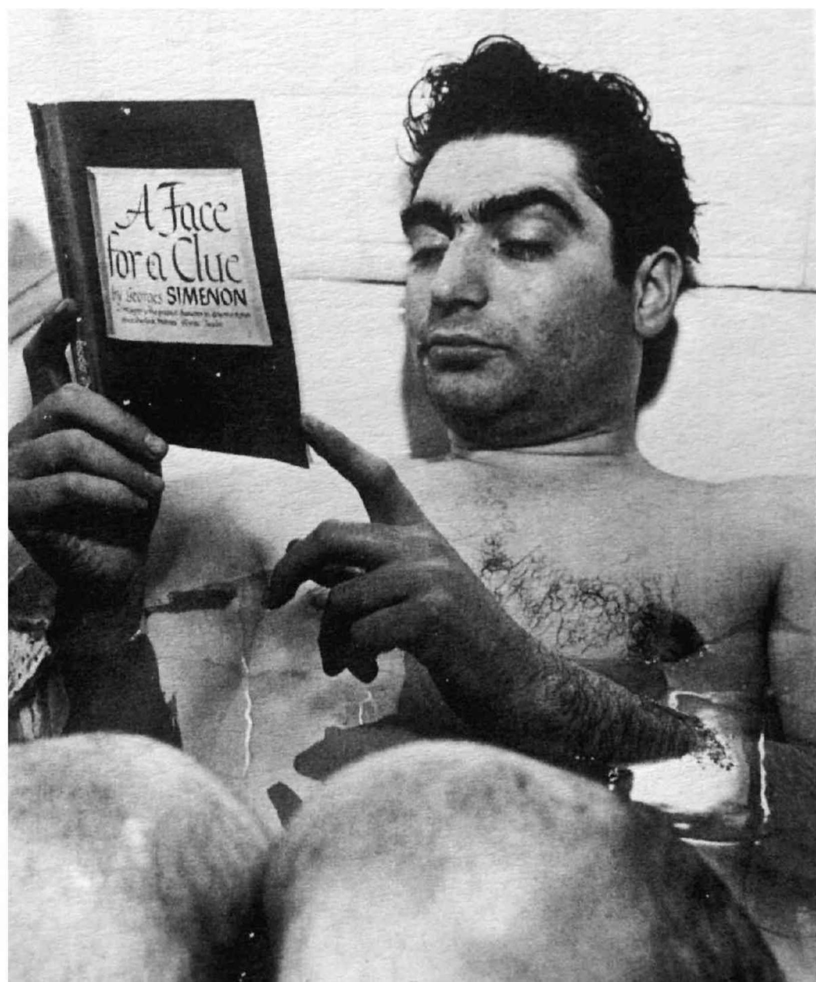
——英格丽·褒曼

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学生时，我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为了应付以苛刻闻名的北大考试，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往图书馆跑。然则“其东走者同，其所以东走者异也”。英国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简氏舰船年鉴》《简氏战机年鉴》成了我的宠物。那套“时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我们课本中种种令人费解的阐述产生了怀疑，身不由己地被这批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传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发现在种种版本的历史书中，众多惊心动魄的战争照片的右下角，经常标有一行细小的黑字：Robert Capa（罗伯特·卡帕）。显然，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产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的自传中又看到了这个名字。褒曼把这位与她有过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写成“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在书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这位游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为安德烈，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可毕业那年正赶上纳粹党上台，匈牙利霍尔蒂亦效法德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迫害进步青年，逼得他远走巴黎。由于穷困潦倒、一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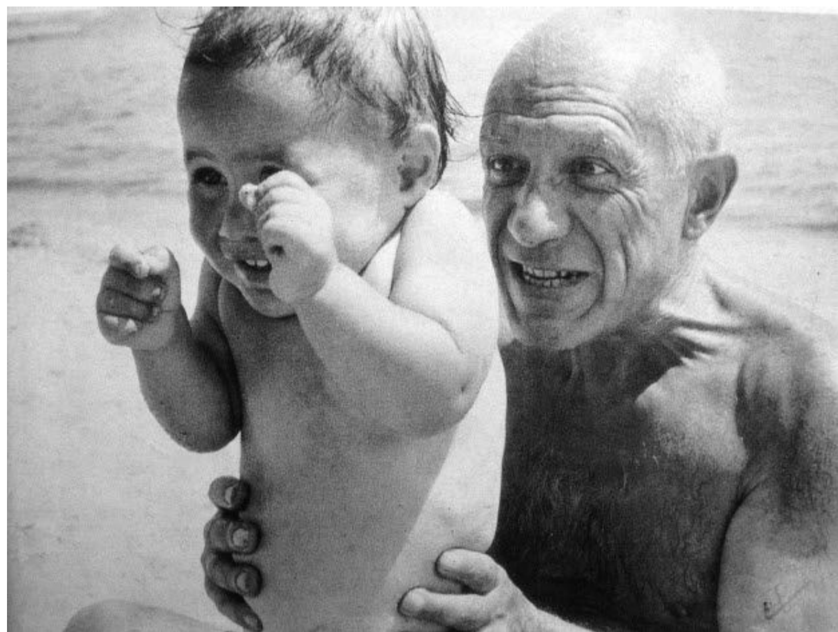
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机卖照片为生。但时运不济，尽管拼死工作，收入仅勉强糊口。



卡帕喜欢泡在浴缸里喝酒、读小说。这一嗜好已经被我全盘继承。

就在这尴尬时分，一位名叫塔罗的小妞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心甘情愿地给流浪汉做搭档。塔罗人小鬼大，自称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图片经纪人，而她那穷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俪“狼狈为奸”，照

片却以五倍于以往的价格成批地抛售出去，法郎美金滚滚而来，而凭空杜撰出来的“罗伯特·卡帕”成了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卡帕拍摄的毕加索父子。

1936年，苏联肃反成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与列宁并肩站在铁甲列车上向苏俄红军挥手致意并被列宁称为“唯一可以在3个月内组织起一支攻无不克的红军”的托洛茨基，此时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从列宁身旁抹去。社会主义苏联开辟了用暗房技术随意更动历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到北欧，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从革命副统帅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为国际传媒追逐的热点。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每逢公开演说，必先将所有持相机者逐出圈外方才开讲。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无法拍到托氏尊容。欧洲当时最著名的《VU》杂志总编辑重金悬赏天下勇夫，并亲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

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而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往回装。



卡帕拍摄的海明威父子。



卡帕拍摄的巴顿上将。

当夜，小妞儿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嗨，小妞儿，别再啰嗦了！快让你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来我这儿上班！”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干脆公开改名为罗伯特·卡帕，挽着小鬼塔罗的胳膊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开始职业战地记者生涯。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这幅力作到底出自这一对儿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儿塔罗死于战火后，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扉页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士兵之死》。这是卡帕最早出版的画册封面，意大利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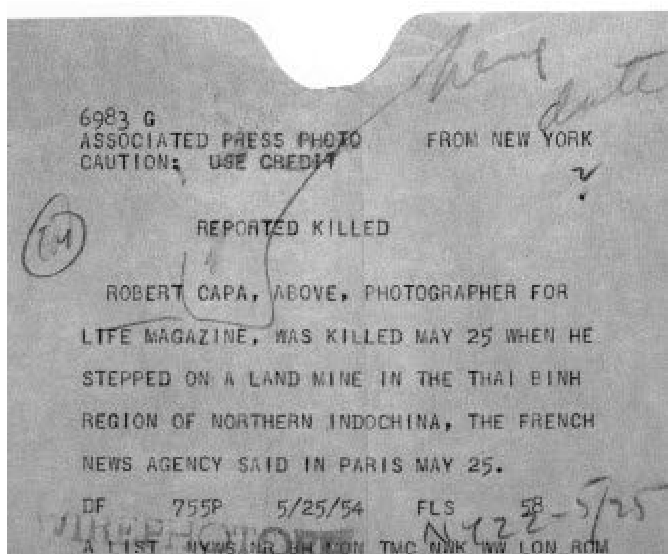
这以后，罗伯特·卡帕流着眼泪告别了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了台儿庄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中，卡帕是300万盟军中最先在诺曼底犹他滩登陆的先头部队的一员。

随着科技的发展，卡帕敏锐地预见未来战争愈来愈不适合摄影采访，“战争就像女人，已经愈来愈老，失去魅力。”尽管如此，对当代的每场战争，他都要御驾亲征。卡帕说如果未能参加进攻，“就犹如在美国星星监狱关了五年的囚徒，连与艳星莲娜端娜的幽会都没有兴趣”。

在参加了所有现代战争之后，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中踏响了地雷。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罗伯特·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他生来一文不名，死时两袖清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在献给这位好友的挽词中写道：“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正如卡帕毕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靠得不够近。”



Wire photo and caption, May 25, 1954. (AP)


6983 G
ASSOCIATED PRESS PHOTO FROM NEW YORK
CAUTION: USE CREDIT

REPORTED KILLED

ROBERT CAPA, ABOVE, PHOTOGRAPHER FOR
LIFE MAGAZINE, WAS KILLED MAY 25 WHEN HE
STEPPED ON A LAND MINE IN THE THAI BINH
REGION OF NORTHERN INDOCHINA, THE FRENCH
NEWS AGENCY SAID IN PARIS MAY 25.

DF 755P 5/25/54 FLS 58

A LIST [illegible] TMC NWK WW LON ROM

1954年5月25日卡帕在越南触雷而死。这是美联社当时的传真照片。电头是“美联社有线传真，1954年5月25日”。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0岁，短短的一生中参加了5次战争。卡帕尝言：“那些在胜利到来之前壮烈牺牲的人们是最杰出的，可活着的人却马上忘了他们。”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西班牙内战中冲锋陷阵、饮弹身亡的普通战士，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在莱比锡阳台上中弹倒地的美军大兵……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就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我满身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俩都是18岁那年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还有，就是我们俩都有着同样狭隘的自负，仿佛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新闻检查

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但不可同时表现。

——丘吉尔

19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科克亲自主考。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t（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许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钻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果然不出两年，从北京到巴格达，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

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至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巴格达新闻部众多卫星天线，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我靠租用外国同行的卫星电话发稿，1分钟100美元，家书抵万金啊！（唐师曾　摄）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

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因此没惹什么麻烦。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3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反弹道导弹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蛰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了。

我和法国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

产。当日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爱国者”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发射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FN马达＋300mmf4，我用尼康FM2机身＋MD-12马达＋80-200mm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偌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



特拉维夫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用80-200mmf4加TC-201接圈拍摄。（唐师曾　摄）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田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坏笑着劝村田，拍负片有拍负片的好处。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爱国者”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6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M-4＋35mm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35mmf1.4，B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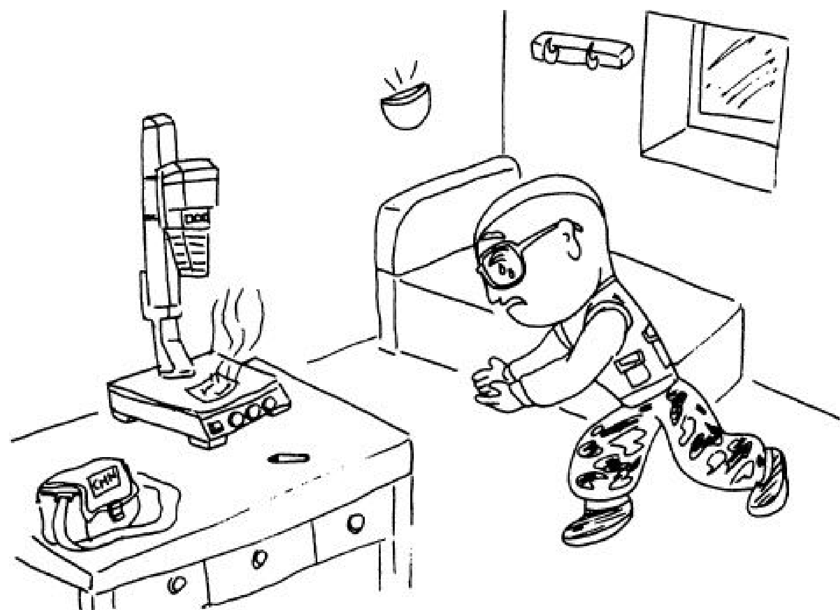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无法根据“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以免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灾难。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

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08613073426（这是当年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接口）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怒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又做了个局，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仿佛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然后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关键时刻，一向沉稳得让我着急的朱界飞踱着方步摇摇摆摆进来了，我顿时像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北京俚语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玩现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戛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时，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迎头拦截“飞毛腿”弹道导弹的“爱国者”反弹道导弹。（唐师曾　摄）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的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



再见巴格达

玩耍后睡眠，暴风雨中航行后入港，战争后休整，生之后死，这都是最大的快乐。

——斯宾塞《仙后》

1991年5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检验就得等10天。而出入境的常驻外国人必须不停地提供血液证明。

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里胡哨、似乎进化得不够年头的囫囵小姐却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长约900多公里，由东向西穿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老学长郑达庸张开熊臂拥抱了我之后，让他的司机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毁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填上新鲜的沙土，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团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一半路，车顶4大桶备用汽油就已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

而来的热风至少50℃。太阳照在沙漠上，蒙蒙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长达五个半月的紧张采访已经使我对危险的感觉变得迟钝。



乔治·布什的头像被镶嵌在拉希德饭店门厅地板上，任人践踏。地上的阿拉伯文是“布什总统有罪”。萨达姆总统至死，都尊称布什为“布什总统”，至少在字面上看，萨达姆总统是个文明的人。（唐师曾　摄）

车到卡迪西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

库”（没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挂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这位佛国大使双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收了我们两罐茶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之后是阿弥陀佛之类。我亦虔诚地背诵起“般若波罗蜜多”。



因生活窘迫辍学、兜售香烟的巴格达小孩。（唐师曾　摄）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第3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7·14”大桥、饥饿的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

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中国脸”的海洋，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担心自己身上的“新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几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见方的3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小邵在人群中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海鲜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5个多月以来吃得最美的一顿。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鸭皮”。当年腐败还不盛行，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在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战争锻炼了我异于常人测知哪里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眼睛，才能观察到细致入微的东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果。泰戈尔老人诗云：“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我骄傲，我飞翔过。”

回首战时的5个半月，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彻、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

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更应该如此。"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历史成全了我，让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干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老板们、帮我保障传真线畅通的传真员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们儿了。



年轻的军人双目炯炯，唯有被战争弄掉一只眼睛的老兵，对世界才一目了然。（唐师曾　摄）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老板，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

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战争结束了，我们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没有休息。

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了，

可我们的兄弟没能回来。

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

……

跋
多余的话

许延滨

有师曾的书，有萧乾先生的序，有德生老的题词，我的话似乎是多余的。但年轻的编辑说，既然老一代文人武将都如此赞赏师曾，作为中年坦克兵指挥官，且熟识鸭子，又何必避讳说几句多余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古老的国度，缺的怕就是肯为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说些多余的话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人。词锋如此犀利，我只有从命。

认识师曾是在1989年夏天，说来偶然，也不尽然，像人生中的许多相识一样，似乎包含着某种缘分。后来，我们多次作长夜谈，论军事、战争，谈生活、社会，道历史、人生……我感到，这个禀赋特异的年轻人对这一切有着惊人的知识、敏锐的思考和判断力。长时间灵感不启动的我被他刺激得不断更换视角，来审视我的职业、我的观念乃至我的思维方式。而潜意识中，仿佛还存在着某种更为深层的东西使得我和这个年龄阅历极为不同的年轻人如此投缘。是什么呢？

当我看到编辑提供在案头的原稿及照片时，这个疑问迎刃而解。这种联结我们心灵的更为深层的东西就是对共和国的热爱和忠诚，是为维护民族尊严不惜生命的性格和基因，这一点正是我们从老一辈那里承袭下来的最为宝贵的东西。而完善自我、超越时代、实现跨世纪理想的勇敢与坚韧，又恰恰是时代的呼唤。

我是在烈士们的鲜血哺育下、在马背上的摇篮里成长起来的。当年同喝延河水、同吃陕北小米的那一代同辈，目前已活跃在共和国的各条战线和领导岗位上，但儿童少年时期对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的深切感受却不能不在这代人的潜意识中刻下烙印，使我们对共和国的成长怀有一种急切的心情。而这种急切心情在新一代年轻人唐师曾的书中得到了再现，我在欣喜的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作为战地摄影记者，唐师曾为民族赢得了国际荣誉，他和他的同辈正在倾心尽力使我们的民族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的崛起，使我们看到了共和国的精神血脉在新一代青年身上的延续。为了那个令他无限骄傲的“人民中国·新华社”，为了“和美联、路透们比个高低”，为了使“新华”早日步入世界一流通讯社的行列，他用勇气、智慧和生命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了一笔。一份份请战报告，一次次临危涉险，他有如一员虎将，而“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却不可同时表现”的狡黠又使他俨然是一位战术家；软磨硬泡、省吃俭用时他绝不冒充英雄，拳打脚踢抢新闻的架势又全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公鸡”……当我们翻看这本小书为其智识的深广所感叹、为其轻描淡写的情节所吸引、为其幽默顽皮的口吻而忍俊不禁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不能不为这个非凡的青年对共和国的忠诚、对民族尊严的维护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所震撼。难怪当年指挥过上甘岭战役的德生老人看过书稿后感慨地说：“这么能干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于是他以80高龄奋笔疾书了“我从战场上归来”！

海湾战争是一场现代突发的高科技战争，它为我军研究现代战争提供了一个实在的模型。其变化万千的态势、军人处境的极度孤独、新式装备的千奇百怪有如现代游乐场中的种种“玩具”，这一切构成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而唐师曾的这部小书正是这场世纪之战的目击式报道的合集，它使我们这些未能亲临前线的职业军人得以取得对这场战争的实感，也使军队教育工作者得以据此为参考塑造新一代的军官和士兵。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我们又身处一个变革的时代，新的东西太多了。当职业军人研究现代高科技战争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一切有关现代战争的新的见闻、新的视角、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相信师曾的这本小书不仅能鼓舞军队指战员对于共和国的献身精神，同时能激发职业军人研究现代战争、提高业务水平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在报道了唐师曾的事迹后，号召青年人为国争先，那么在我们的军队里更需要倡导这种精神，使我们的新一代军人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结合起来，在未来的卫国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动中为维护民族和人类的尊严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将这部小书推荐给大家的初衷。

当然，这部书远非尽善尽美，它的长处是显见的，短处也是显见的，就像被许多年轻人视为传奇人物的“唐老鸭”其人一样。但它真诚、朴素、率直、坦白，使读者和作者同等地作为活生生的人来交流。比如当我读到“‘飞毛腿’袭来之际”，主人公“强忍住袭来的恐惧，哆里哆嗦地摁下莱卡相机的B门”时，我一下子联想到我在前线战火中的亲身体验。当炮火响起、看到战友流血的时候，我也产生过类似的恐惧，但当看到战友牺牲的时候，恐惧变成了愤怒。恐惧是人的本能，真正的战士不是没有恐惧，不过是没有被恐惧吓倒。而真诚和坦率却是当代青年最可爱的品质。因此，在我和编辑共同商讨后，决定保留书中的种种短处，将这本战地札记以它的原貌真实地呈现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有如把“唐老鸭”作为一个普通的朋友介绍给我们的年轻军人。

富兰克林说过：“你想知道未来的样子么？那么请你看看身边的年轻人。”当我读到全书的最后一章，这个被视为传奇英雄的年轻人朴素地说“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历史成全了我，让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干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

已”时，我想我看到了未来的样子。

（本文作者为陆军少将、军事学教授、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

1994年8月于北京

附录1　大街上拣回一个宝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　徐佑珠

《人民摄影报》连续发表了唐师曾从海湾发来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之后，《人民日报》2月3日又在“每周文摘”版摘登了唐师曾的戎装照片。一名专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他的相片被几家报纸转来摘去，这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

“唐师曾是怎么来新华社的？”

因为据《人民摄影报》介绍，唐师曾1983年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所以人们有这样的疑问。

“从大街上拣的。”

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引荐一位想当摄影记者的校友。没待我开口，这校友便虔诚地捧过一本贴了他几十张见报照片的大本子，证明自己在新闻摄影方面的建树。我接过来翻了翻，未见佳品，随即就递还给他。也许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顿时涨红了脸，急切地介绍自己如何爱好新闻摄影，说如果让他当新华社记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样玩命地干活，而且什么要求都没有，除了两台莱卡或尼康……

“来了就想当记者？还要两台相机？”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没有，也不能来了就当记者。如果新华社要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不给相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让我来新华社。”

他从我办公室出去后，走廊上满打招呼。奇怪，摄影部怎么这么多他的熟人？一问，有个把是校友，多数都是大街上采访时认识的。小伙子们说，到哪儿都有他，这人一见背相机的就亲，见面熟，又挺谦虚，所以对他都挺有好感，听说他想来新华社，都帮他说好话。

政法大学也愿意成全他，尽管舍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员，但他实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那些在大街上认识他的“老新华”逗他说是拣来的。

只看照片未谋其面的人可能以为唐师曾很魁梧，其实这个形容词对他不合适。他虽说是一米八三的个头，但有些罗锅，不着意挺起胸脯，得减去3厘米，身材偏细长。一张清秀白净的脸上架副近视眼镜，摘掉钢盔，一副书生气概。可在我们摄影部，谁要把“书生”这个概念和唐师曾的形象连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脑软件出了毛病。有谁见过唐师曾稳稳当当地走路、按台阶爬楼呢？他什么时候都是急匆匆的，仿佛屁股后面永远跟着追兵。

“下雨啦！”刚来的那年夏天，一个下午，他冲进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兴奋地大叫。

下雨谁看不见？下雨有什么可激动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烦，骂他“神经病”！

他生气地嘟哝：久旱下雨，就是新闻……转身背起相机冲向大雨滂沱的大街小巷。晚上回来，浑身湿透，却眉飞色舞，捧给编辑一摞千姿百态的雨中人物照片，连骂他神经病的小姑娘也高兴地夸他“唐老鸭真聪明”。一组《雨中曲》专题照片发到香港，大受报纸欢迎。

这以后，他仍然经常犯“神经病”，又经常在挨骂之后得到夸奖。

他拍的照片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随之多了起来。两台尼康已经不在话下，他还要BP机，要无线电话，要汽车，车上还要有麦考尔用的那种警灯，遇到紧急情况，能像麦考尔那样，把警灯往车顶上一放，红光闪烁，警笛长鸣，通行无阻。这过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骂。但他坚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长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传，这些东西都是记者必备的。他的要求终于被理解，除了麦考尔的警灯没指望，专用汽车在国内暂时也没条件。BP机和无线电话到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个字：“昼夜工作。”摄影部成立新闻中心的头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他“昼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没完没了，从要设备，转而要任务。

山西大同至河北阳原间发生地震，电台广播后刚半小时，他已从家里骑车到新华社，连蹦带跳地冲进摄影部值班室，全身颤抖地抓起电话要国家地震局。买10包饼干，乘一辆“大发”，飞车千里，赶在救灾的解放军之前到达震中地区。连续38小时工作，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发出第一批独家新闻照片。

北大生物学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正是秦岭山区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他穿着普通的羽绒衣跟了去，在海拔两三千米的林海雪原跟踪搜索。人过竹林中的大熊猫通道必须爬行，竹丛上一寸多厚的积雪灌进脖子，两层防寒服都湿淋淋地贴在脊梁上，大头鞋也灌满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大熊猫，就足以补偿一切。当大熊猫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泪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积雪。

他珍惜这年冬天的经历，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为了揭开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纱，他随国家科考队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无人区。那里严寒、缺氧、干旱、强辐射，由于从来无人涉足，被称为“神秘的死亡地带”，轻微的感冒就可能导致肺水肿，几小时内丧命。死亡的威胁挡不住他对那“野生动物乐园”的向往。为了追拍云端里的野牦牛，走几步就得趴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这光景，他竟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湾战云密布，他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以至于直接上书社长，要求派他去拍摄第一手战地照片，和美联、路透们比个高下。40天工夫，他从巴格达到安曼，又从安曼到特拉维夫，单枪匹马，拳打脚踢，已经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见诸报端。

在新华社3年，他去了不少没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唯有一次例外，1989年初春去德国多特蒙德采访第40届世乒赛，是组织派遣的。

他整天东跑西颠，看不见他有安分的时候。摄影部办青年记者培训班，请他讲讲采访社会新闻的体会，早就跟他打过招呼，但从不见他坐下来准备，办班的人提醒了几次，果然准时上讲台，带着厚厚的讲稿还有若干张卡片。从中国讲到外国，从鲁迅讲到黑格尔，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有理论，有实践，令听课的老少同行折服。

讲课的时候，离他去巴格达还有5天，他在课堂上说，要去巴格达，要当卡帕，最好是单身男青年，别结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预见有巴格达之行，才没谈恋爱，甚至以为他会为事业抱独身主义，那可就上当了。

他刚来新华社那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当时两伊战争还没结

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贝鲁特。他问介绍人，姑娘有尼康吗？她能去贝鲁特吗？具备这两条，我就同意。态度挺诚恳，气得介绍人骂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点儿傻。

装傻，是他应付难题的绝招儿，这招数到巴格达还真用上了。临战的巴格达，不许任何外国记者随便拍照，背相机上街被视为“违法”。老百姓不懂英语，他不会阿语，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国记者好朋友），说完这句话，就冲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样子和气，便朝他友好地挥挥手，不再纠缠。

在巴格达机场采访联合国秘书长时，他又一次靠装傻得逞。军警命令所有记者列队进入一间屋子与德奎利亚尔见面。他俯首听命，规规矩矩，趁其不备，一个急转身，迈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秘书长一行，紧贴着贵宾往里走。这回真的是后有追兵，他却佯装不知，抢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联、共同记者望尘莫及的镜头。

有道是大智若愚。识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载《人民摄影报》1991年2月13日头版）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转载）

附录2　鸭子这家伙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刘忆分

鸭子这家伙，有时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真累。一米八三的大个儿，坐不住，老在你面前晃悠。盯着你，滔滔不绝，高兴处，不仅眉开眼笑，还舞之，蹈之，手脚恨不能全比划上，简直能把人侃晕乎。这时，你会惊讶，这傻鸭子会有这思路、这学问、这口才。

京城摄影圈里有句极精辟的话，叫做：唐老鸭是写的比拍的好，说的比写的好，干的比说的好。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此话不知是褒是贬，反正他听了挺乐乎。这人，就喜欢听好听的。要是满脸乌云，准是谁说到了要害，也不管周围人多人少，高兴与否，一屁股坐一旁发呆。可有一点，这家伙干起活来，真是不要命。1987年他刚进新华社，就和法国记者一起徒步走长城，照片居然被西帕、西格玛们买了去。1988年他为美国一家公司拍野生熊猫的照片，进入人迹罕至、冰天雪地的秦岭。人们印象中的国宝都是一副温驯可爱的模样，坐在地上啃着竹叶，悠哉悠哉，偶尔还能表演个节目什么的。可在高山大林中，熊猫却野性十足，灵敏轻捷，奔跑跳跃在锋利的竹丛与冰硬的雪石之中。给它拍照片，你得在茫茫雪岭中细心寻觅，双腿不时要泡在刺骨的雪水中，而且一蹲就是几十分钟。一有动静，恨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追着那野物跑上几里地，可累得你都喘不上气来时，熊猫又已无影无踪。当他的老板专程去美国捧回那精美的大画册时，他又像个孩子似的只知道嘿嘿傻乐。只是在夜深人静时，他会躺在床上不停地揉着贴着虎骨膏药的双脚。

1990年他又从海拔五十米的北京移师到海拔五六千米的青藏高原，加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科学考察队。可可西里，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也以严酷的自然条件闻名于世。刚去的一段日子里，他每早穿衣服都得十几分钟。一个大小伙子，愣是气喘吁吁抬不起胳膊套不上衣服。3个多月，没有新鲜蔬菜。回到北京，多了个习惯，吃个水果，恨不得把籽儿也全嚼了咽下去。可是新华社有了一套完整的关于这地区的照片资料。

1989年山西地震，他听到广播就从家里冲到社里，钻进他老板备好的汽车，成为震后首位进入震中的记者，连续工作了38个小时。“新华”的照片不仅占领《人民日报》等国内大报，就连美联、法新、路透用的也全是“新华”的。

外交部招待所大火，被警方严密封锁的“长城情死”，不愿见中国记者的阿兰·德龙到京，蒲黄榆火车相撞，故宫宋墙倒塌，卢沟桥狮子被雷击劈，采拍押送回国的劫机犯……他要么风风火火赶到现场，要么能在机场上守一夜。追踪轰动一时的京石公路事件，追捕杀害北大学生凶犯案件，他能星夜驱车赶到外地。

在可可西里雪山上，他听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立即给社领导打了请战报告，并迫不及待地拍电报让好友准备资料。下山后，他就颠儿颠儿地部里、社里、外事局、北大东语系、公安局、使馆……一关又一关到处说好话、表决心。累极时，撩起裤腿发愁，“这两条腿越发的一条细，一条更细，怎么办哟。”于是每天用那条细腿练蹲下站起。明知道该上医院治疗，可就是不敢，怕耽误时间，上不了前线。就这样，他迈着粗细不一的双腿，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这回从雪山到火海，他身着缝有五星红旗、涂写着“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的摄影背心，只身转战于伊拉克、约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五个多月，凭着几句现炒现卖的阿文，操着半生不熟的英

语，居然跑遍了大半个中东。

朋友们说，他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儿来源于办公桌上挂的那张卡帕照片。他常说，这位踩着地雷还不忘摁下快门的罗伯特·卡帕，似乎在天天催促他：鸭子，别闲着，快，出去干活去。

几年新闻跑下来，不仅京城的新闻圈熟悉了他，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同行们也渐渐知道了这个为“新华”、为抢新闻玩儿命的唐老鸭。为拍片，为给中国争脸，对老外他照样不买账。第一次领教这种厉害的可能是法新社的凯瑟琳。那次他们为一个最佳拍摄位置互不相让，鸭子一急，差点连北京痞话都出口了。结果赢了，法新、西帕、西格玛买下了“新华”的片子。活儿完了，凯瑟琳也成了他的朋友。鸭子去中东后，这位金发女郎还打听他的情况，为他的安全担忧呢。

因报道艾滋病而获世界新闻大奖的瑞宁格、英国汤姆森国际培训中心的老鲍勃……这些资深的名记者都不知为什么被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迷住了，他们乐于与他神侃，教授他一些用皮肉之苦甚至是生命危险换来的拍照“绝招”。在海湾时，各国各大通讯社都纷纷派出自己的最佳阵容加入到这场世纪之战也是新闻大战的角逐中。在巴格达，在以色列，日本共同社的老朋友河野几次提供了无私的援助；关键时刻，美国的斯蒂芬把他当作“救命的稻草”，加拿大的乔与他患难与共；印尼的、法国的、英国的、巴基斯坦的记者们在共同的采访中也不得不对中国记者刮目相看了。河野说：“新华发的德奎利亚尔为和平斡旋来到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也是‘新华’的。”他对各类武器、装备型号、性能的熟悉，对世界军事战况的把握，使他成了这帮外国同行的“军事顾问”。遇到个什么坦克、导弹，不时有人要拉住他问个长短。

可是，为了这一切，他准备了十几年。上高中时，他从家传的一台老“禄来”开始接触摄影，看着一本20世纪30年代柯达公司的英文小册子《如何拍好照片》，他依样画葫芦给自己钉个印像箱，天天盼着

日落西山好关门印照片。五外公部力子的好友黄翔成了他的启蒙老师。这位大摄影家告诫他，摄影功夫在摄影技术之外，可他当时似懂非懂。

1979年他进入北大国政系学习，耳目顿觉一新。喜好读书的鸭子在北大图书馆熟知了斯诺的好友——那位曾拍过“台儿庄大捷”“宋庆龄和周恩来在武汉”的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卡帕的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几乎拍遍所有的现代战争。鸭子为卡帕的经历、卡帕的精神深深感动。他认为，卡帕精神就是一种为人类进步拼命工作的献身精神。从此，他迷上了卡帕。

1983年毕业后他被分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讲台成了释放、施展他才能的起点，努力勤奋的敬业精神、活泼生动的授课方式、广博深厚的学识，使他成为受欢迎的教师。正课之余，他还开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选修课，读了3年在职研究生。这是段自在轻松的日子，至今他常怀念政法大学那宽松的学术环境，小小课堂给他起飞前的自信与预演。但教课的同时，他始终不忘他的相机，他的卡帕。他仍在积累着，准备着——从理论到实践。

终于，1987年初，他叩开了新华社摄影部的大门。从此他如鱼得水，天天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而什刹海边的那个家，就简直像个旅馆了。他白天黑夜不着家，家人理解：为新华社干活去了。他要是有一天在家闲着，家里人倒不习惯了，还得提防着躲着点儿，一没活儿干，他就难受，瞧着谁都要横眼运气。可他妈妈乐意：不管咋的，看着儿子在身边就安心。可以让他喝上碗热粥，吃上几张娘亲手烙的馅饼。要不这几年跑新闻跑出来的胃病怎么好得了呢。

可要一听见腰间的BP机嘀嘀作响——准是又有新闻了。他顿时像只候食多日的老虎，浑身一抖，精神大振，冲将出去。

他喜欢红色，因为“骑自行车撞不着”，于是不管走到哪里，一袭

红衫成了他的标志。那个红色的身影一出现，人们就知道又有麻烦了。《红色在行动》——1988年《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关于他的一篇特写表明了圈内人对他的认可、国外人对他的了解。

他人缘不错，那满脸的灿烂，赢得了上至部长下至平民男女老少的信任和友情，可是他那憨憨的眼神中不时闪过的一丝狡黠告诉你：这小子不傻。为达到目的，他会使尽浑身解数。那年，他就是夹着一卷登有他拍的头版照片的破报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一副极诚恳的青年样儿，来到我的办公室，得到了一张记者采访证。就连北京市公安局长苏仲祥、副市长张百发也成了搭肩搂腰站在一起合影的朋友。翻开他那破破烂烂、贴了又贴的通信录。看看那分门别类排列的上千个地址与电话，就知道这家伙几年下的功夫。

不知底细的会以为他有多大背景，同龄人则羡慕他的好运气，其实，他就想当个好记者，是中国的好记者。在这个金钱与权势被相当一些人信奉至上的社会里，记者，尤其是国家级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本是个很不错、相当有油水可捞的职业。凭他的相机、他的名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大把的人民币、美元或港钞。但他信奉的是：我要忠于我的“新华”。他能放弃参赛得奖的机会，听命于“老板”的调遣；为了“新华”，他能扔下发大财、得大件、出国旅游、休假的好事，就知道忙于那不来钱的拍照、冲卷。有时晚上一个活动结束了，别人都回家睡觉了，他还是回社里冲卷发稿，因为“新华的稿是新闻稿，要当天的”。当今，大批年轻人都往美利坚、法兰西、英格兰涌去，他却主动申请去那整天不得消停的中东。海湾打起来时，他迎着炮火去那儿玩了一趟命，回来后，没立功没授奖，没涨工资没分房，可他也没吭声，照样背起相机，从前线到了洪水灾区。他那股要献身理想的真诚，那股认真得近乎学究的憨劲儿，使我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惊讶：在这20世纪90年代的京城，从事着这时髦、现代的行当，居然还有这么书卷气的记者。如果说，不凡的家世、良好的家教，熏陶了这位年轻人比同龄人更深厚的文化功底，4年的北大教育培养了一

种信仰与精神，4年的执教生涯训练了他的思维与表达能力，并且给予他一种理论的修养与准备，那么，4年“新华”的经历与环境对他的成长与成功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念念不忘“新华”对他的“恩情”：“新华”老总们对他的关怀、老小记者们对他的帮助教诲，“新华”为他提供了BP机、手携式移动电话，送他进汤姆森国际新闻中心培训，送他学开车……要是“新华”有谁夸他一句，他能乐得屁颠屁颠的，恨不得能记一辈子。

生活中，他有时显得很有些迂，有些不合时宜。他能把应得的礼品全送给随车司机，因为“他比我更辛苦”；他能在刺骨的冰水中背着老人与女孩过河，一声不吭；他能为大奖赛中弄虚作假、欺负百姓的罪恶“惯常”行为痛苦得辗转难寐；他能为一篇小说感动得涕泪交加，在火车上出尽洋相；他能倾尽身上所有给饥饿的孩子；他能为与一只小狗的分离而珠泪潸然；他还会踩缝纫机，家里的缝纫机还是买来后他自己装配成的；他会弹吉他，他会下国际象棋，兴起时还愿教你一两手。他闲暇时会给你吹上一段不成调的口哨，唱上一曲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侃上一段令人捧腹的民间故事……

是的，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更爱他的祖国、他的人民。去年他申请赴海湾前线的报告批准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摄影背心的前胸后背分别缝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海湾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不管多苦多累多难，他牢记的是：绝不给中国人丢脸，要为“新华”争光。

今天他又踏上赴中东的行程，背负着中国新华社的使命：他成为新华社中东分社常驻记者。他又开始活跃在开罗的街头巷尾、古迹遗址，用自己的镜头去捕捉、去反映埃及人民的古今生活。他往往是一上班就驾车出去“野”，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分社冲卷做片子。从国内各大报纸不断亮相的照片、文字，朋友们又好像见到了他。这小子还是闲不住。半年来，鸭子不仅在埃及境内转悠，从开罗到南部的阿斯旺到北部的阿拉曼，还和他的同事在利比亚被联合国制裁的当间冒险进

入利比亚。两周内，他们克服重重障碍，抢拍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还意外地受邀采访了卡扎菲，参观了利比亚女子军事学院。前不久，他又千里单骑穿越埃及的大沙漠赴以色列采访，收获又是大大的。当朋友们羡慕他能亲临目睹吉萨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惊呼“这小子居然和大名鼎鼎的卡扎菲坐在一起照相”时，人们可曾想过，这段日子他碰到了多少困难：语言不通，像个“聋子”、“瞎子”似的与阿拉伯人比比画画，连蒙带猜，彼此才似懂非懂；生活习惯相异，在京城他最怕牛羊肉的膻味，可如今只能天天凑合，愁得他妈老想给儿子包顿猪肉馅的饺子送去；还有，遇上中东这块动荡之地，人的神经总是紧张兮兮，“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格外紧，略有不顺眼，相机就要遭殃，胶卷被强行拉出曝光，人也得挨刺儿受辱。碰上个非常事件、是非之地，还老得后脑勺上长只眼，以提防那不长眼的枪弹。可鸭子不愿提这些，整日还是“嬉皮笑脸”的。就是有一点他很认真，让他“深情”：“我想我的祖国。真的，我不想家，但想我的祖国。”——跟真的似的，可这时他的确乐不起来了，好像有许多许多往事在回忆、在追忆……

瞧，忘了介绍大名了，鸭子人称“唐老鸭”，中国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也。

（本文原载《大学生》杂志1992年第5期）

附录3　中国记者在海湾

《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　孙　伟

海湾战争中，本来在中国新闻界就已小有名气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从去年12月底到战争停火的两个来月时间里，他从战区发回100余幅传真照片，其中50多幅发表，全国各大报纸几乎天天都有他拍摄的照片，登来载去，尤其是那张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人物表情、摄影角度都绝了！据说当时香港12家报纸全部采用了这张照片。

特殊时期，在巴格达拍照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的带领，背相机上街都是违法的。士兵、警察，甚至老百姓都可以没收你的相机，揪出胶卷曝光。唐师曾便将五星红旗缝在摄影背心上，前后还都用中、英、阿三种文字写上了“人民中国·新华社”。他特意学了一句阿拉伯语：“西尼夏比撒狄克！”意思是：“中国记者好朋友！”逢人便讲，讲完就笑。这一招儿还真灵。人家看他挺和气，就不太和他“较真儿”。借机，他抢到了不少珍贵的镜头。

1月12日夜，唐师曾接到北京的命令：设法拍到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照片。然而，要我到这位秘书长谈何容易！13日他和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朱记者整整奔波了一天，直到晚上8点才追到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

大厅里聚集着200多名各国记者，都在等待着秘书长的出现。

德奎利亚尔终于在官员们簇拥下来到机场。一时间记者挤作一团，相机、三脚架互相碰撞，叫声响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铝梯、三脚架根本支不住。唐师曾顺手将早已物色好的一把椅子抢过来，一步跨了上去。本来他就一米八多的大个儿，再站到椅子上，角度太有利了，馋得美国记者翘着脚直问：“怎么样？”他边拍边得意地说：“绝啦！”

德奎利亚尔进了一个专门的小厅，记者们被拦在门口的铁栏杆外，唐师曾挤在前排，他显出规规矩矩的样子，还不时冲警卫微笑。于是，警卫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几个西方记者身上。就趁他们稍不留意的机会，唐师曾猛然抬腿跨过栏杆，三步两步追上了德奎利亚尔一行。他听到了身后警卫的怒骂和追赶的脚步声，但他头也不回，紧贴着官员们往里去，终于抓到了最好拍摄机遇。事后，外国同行问他：“你就不怕他们开枪？”唐师曾乐呵呵地答：“不会的，我离阿齐兹那么近！”

开战后，唐师曾随最后一批记者离开了巴格达，后经安曼飞抵塞浦路斯，从这里办了进入以色列的签证。

此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全停了。但唐师曾一分钟也不想等，因为每一分钟以色列都可能爆发新闻。他冒险搭乘一架小型私人飞机。2月1日，天下着雨，这架螺旋桨飞机在风雨中颠簸，窗下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窗户上疾下的雨滴。突然，飞机猛一下沉，唐师曾心里也一沉，不由自主地把“尼康”紧紧抱在怀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考验，好不容易到了特拉维夫。在以色列政府新闻部办公室里，一位官员惊奇地盯着他胸前的五星红旗感慨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来的人，您打算待多久？我马上给您办证件！”

在特拉维夫14天，天天赶上空袭警报，警报一响，工作人员便将

所有客人赶入设在六楼的防毒掩蔽室。唐师曾却没有一次进掩体，而是一听警报便抄起家伙往外跑。有时在大街，有时在阳台上仰望天空，等候“袭击”。2月9日凌晨2点多，警报再响，唐师曾照常爬上阳台等待，这次“飞毛腿”真来了，一条火龙划破夜空，接着两声巨响，楼板都震得颤抖。唐师曾拍下这珍贵镜头后，立即冲下楼，往爆炸点赶去。那里，房屋炸塌，煤气管、水管崩裂。前来抢救的人乱成一团，唐师曾立即举起相机。但一个以色列士兵却上前挡住他的镜头。这下他急了，再也笑不出来，破口大骂……

在电话里，唐师曾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绝不会给中国人丢脸。我会给新华社玩命干活！”

新华社摄影部的徐佑珠主任对她的这个兵十分满意。她带有几分得意的口吻补充说：“除了拼命的精神以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唐师曾是‘全天候记者’，会外语，能拍照片，又能写文字稿，还会开车。为此，新华社下了不小的‘本’。但如没有这些条件，他们海湾报道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载《北京青年报》1991年3月8日）

附录4　红色在行动

——记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

新华社记者　罗更前

影星阿兰·德龙到京，在一个不允许任何记者拍摄的场合，却有一台相机硬是挤了进去，操作这台相机的是个穿红色上衣的青年记者。

京津公路上，一辆“奔驰”牌轿车，以140英里的时速，紧紧尾随着公安局的警车，车上坐的又是这个身着红上衣的青年，在抓获杀害北大研究生的凶犯时，他摁下了快门。

外交部招待所起火，迅速到达现场，冲进火场，端起相机的，还是红色上衣……

这个经常身着红色上衣活跃在新闻现场的青年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他喜欢红色，需要红色，他认为红色有紧迫感，红色热情、好胜，容易给人留下记忆，为下次采访提供方便。

一年半之前，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再往前，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凭着他的勤奋，凭着他那一张张用草板纸裱糊的半生不熟的作品，去年1月，他敲开了新华社的大门。从那时起，摄影部的发稿栏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几乎每天都有。同行们很快就将这个名字和那来去匆匆的红色身影对上了号。就在小唐担心自己的潘太克斯相机不定哪天就会因劳累过度而罢工的时候，他领到了尼康。

“发我两台尼康……”他激动得像范进中举一样逢人便讲，以致在工作时不慎被裁刀铡破了手。几天后，他又因如愿地领到了镜头，高兴地一跃，头撞在门框上，打了“补丁”。小唐的确兴奋过度，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战火的士兵才懂得武器精良的重要。

就在大家认为唐师曾踌躇满志、如鱼得水的时候，小唐突然感到心虚了。他拼命向有经验的记者学习，希望能集众家之长于一身，他有一大帮师傅。他一面向周围的同行拜师求教，一面像当年着迷于世界战争史一样开始津津有味地研究世界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是如何工作的。

他敬佩美国的罗伯特·卡帕，在踩上地雷的一瞬间还不忘摁一下快门，并含笑死去，他觉得为自己所酷爱的事业献身是值得的。

他把路透社驻菲律宾首席摄影记者维科所说的“我为我的传真线拼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只着眼于他每天的发稿量，只关心他的“老板”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照片、人民想看什么新闻、自己怎样拍到这样的新闻。他希望他的读者能在采访现场、在见诸报端的新闻照片署名中结识他、承认他。从他领到相机到现在的400多天里，他已经向国内外发出了700多张照片，这样的工作效率确实令新华社的同行们刮目。

有人觉得他不像是官方通讯社记者，这大概是因为他不够气派，或许是因为他的采访途径太不正式。确实，小唐获得的许多采访线索是有点邪门儿，这是因为他的人缘儿好、交际广，从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到某传达室的看门老头都是他的结识对象，都有可能成为他的“眼线”。

人们看他憨厚、滑稽，而且又姓唐，便给他冠以“唐老鸭”的外号，他欣然纳之。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的机敏。谁能相信他曾经采用被值勤人员抓进去的方法接近采访对象，他曾经大敞着镜

头，风风火火地将一张张新华社摄影部的广告煞有介事地塞进值勤人员手里，当人家展开阅读时，他已混进了包围圈，到达了拍摄现场。

唐师曾这位27岁的年轻记者，尽管所拍摄的照片水平还有待提高，尽管他还很不成熟，但他那红色的身影毕竟在行动……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8日）

附录5　唐师曾印象

中央电视台导演　辛少瑛

1994年末，在我赴南美拍片的前一天，意外地收到了你寄来的这本小册子《我从战场上归来》。由于这是一个小开本的“口袋”丛书，我没有多想就把它顺手塞进了已很满的行囊中。飞行途中，当我不经意地翻开它时，却一下子被你的清新生动的叙述风格所深深地吸引了。那跳动在字里行间的诙谐与亢奋，活脱脱地把你跃然在纸上，仿佛我又听到了你那滔滔不绝的诉说……说实在的，你的确有一种魔力，凡接触过你的人，都会被你的真诚和热情所感染，你似乎也特别愿意把你那旺盛的精力尽情地挥洒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在异国他乡的漫漫征途中，你的这本小书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后来我们的摄制组开始传阅这本书，它成了我们旅途中的最好的伴侣。尽管你并不陌生，尽管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你绘声绘色地谈起你那不平凡的经历，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被你的小书给拽了进去，拽进了你那特有的情感世界和你幻想中的战争狂想曲，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你时的那样……

1993年，埃及的开罗，我们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正在此拍片。这天傍晚，中国驻埃及大使朱应鹿先生邀请我们来到大使官邸。在昏暗的厨房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位正在胡吃海塞的愣头小伙子，那样子活像一只饥肠辘辘的狼，这就是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记得你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叫唐师曾，外号‘鸭子’，刚从西奈采访回来。”我心里一震，这就是在海湾战争中从炮火纷飞的巴格达不断发回独家报道的那位新华社记者？因爱穿红色T恤而被中青报称为“红色在行动”的那个

唐师曾？不错，这一天你当然还是穿着红色的T恤，那褶皱的衬衣上浸着汗渍。我连忙向你打听西奈岛的情况，因为第二天我们将奔赴那有着著名的巴列夫防线的昔日中东战场拍摄。谈到战争，你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你自诩为“沙漠之狐”隆美尔，以当年德国皇家军校给隆美尔的评语“热情、坚强、守时、自觉、智力超人、高度责任感”而自律。你推崇的是隆美尔作为一个军人所具备的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献身精神。你还把自己喻为巴顿再世，在形容你自己只身开车闯进以色列时，说是“就像当年的巴顿强渡莱茵河”。我觉得你一定是精通世界战争史的，因为你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了发生在北非沙漠中的历次战事，从当代由拉宾指挥的那奇迹般的“六日战争”、二战期间惊心动魄的阿拉曼之战、一直到古罗马的著名统帅恺撒和安东尼，你都有极生动的描述和独到的见解。我猜想着，你之所以崇尚红色，可能就是因为当年的恺撒大帝身披红色战袍，打赢了一场场战争的缘故。我记得你曾经巧妙地把德军闪击战的理论腾挪到记者的采访方式上：最好的通讯设备、最强的体力加上灵活机动。正是根据这种理论，你于1987年就装备了“大哥大”，同时你也是全新华社最早安上BP机的记者。正是通过这台BP机，朋友们为你提供了无数的信息，你也正是凭借着灵通的信息和年轻强悍的体魄，闪电般地四处奔波，为我们拍回了《故宫的墙塌了》《卢沟桥的狮子被雷劈了》等不为他人所在意的好新闻。你把自己比喻成一辆坦克，具有极强的突破能力。这一点早已从你一次次突破重围、终于采访到那些世界风云人物的成功经历中得到证实……

在开罗的那一晚，我们过得特别地愉快。我记得那是一个月光皎洁之夜，你开着吉普车送我们回饭店，已沉静下来的开罗街头和月光粼粼的尼罗河散发出更加神秘和迷人的景色。伴着阵阵和煦清凉的晚风，你边开车边喋喋不休地说着希望回国后能去拍摄中国的珍稀野生动物……以至于这周围宁静而优美的和平环境根本不能使你所动似的，我知道，你所神往的似乎只有战场和冒险。

不过，我更觉得你从来都像是个富于幻想的大男孩儿，你好像只认得武器装备和各种类型的汽车，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吉普车和尼康相机早被你当成了不能割舍的一妻一妾。

后来，我曾经请你作为嘉宾，参加了《正大综艺·埃及专集》的节目，我记得在演播室内，在强光照耀下的嘉宾席上，你显得极为局促不安，你的手脚一直在动。当时，我在导播台上就想，这里不是你自如驰骋的地方，只有广阔的大自然和炮火连天的战场，才真正属于你。

尽管平日里我们接触不多，但我总是从《世界博览》里你的文章中，追踪你的足迹，知道你后来真的为拍摄野人去了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知道你去了美国尝试当农民，而且还驱车横贯了美利坚……你是那样的天马行空，来去无踪，以至于连《世界博览》杂志的任幼强主编都曾经无奈地说："我们只能等待他的消息。"

去年，在著名的诺曼底战场遗址和巴顿将军墓，我都不由得想到了你，因为你对战争的幻想和对军事天才的狂热和执着追求，于是我又想到，或许你此刻正把你的这辆极具突破能力的坦克，轰轰隆隆地驶向一个个采访的战场，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居然会住进了医院！

作为同行，我欣赏你的才华，敬重你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作为朋友，我享受你坦诚的友谊，喜欢你那孩子般天真纯洁的心灵。此刻，在病床上，你还能是一辆突破能力极强的坦克吗？我想，如果真有上帝保佑的话，那我一定会虔诚地为你祈祷。但我更坚信，你还会创造奇迹的，我期待着你奇迹般的康复，期待着你所有美好的一切。

1998年6月于北京

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麦克阿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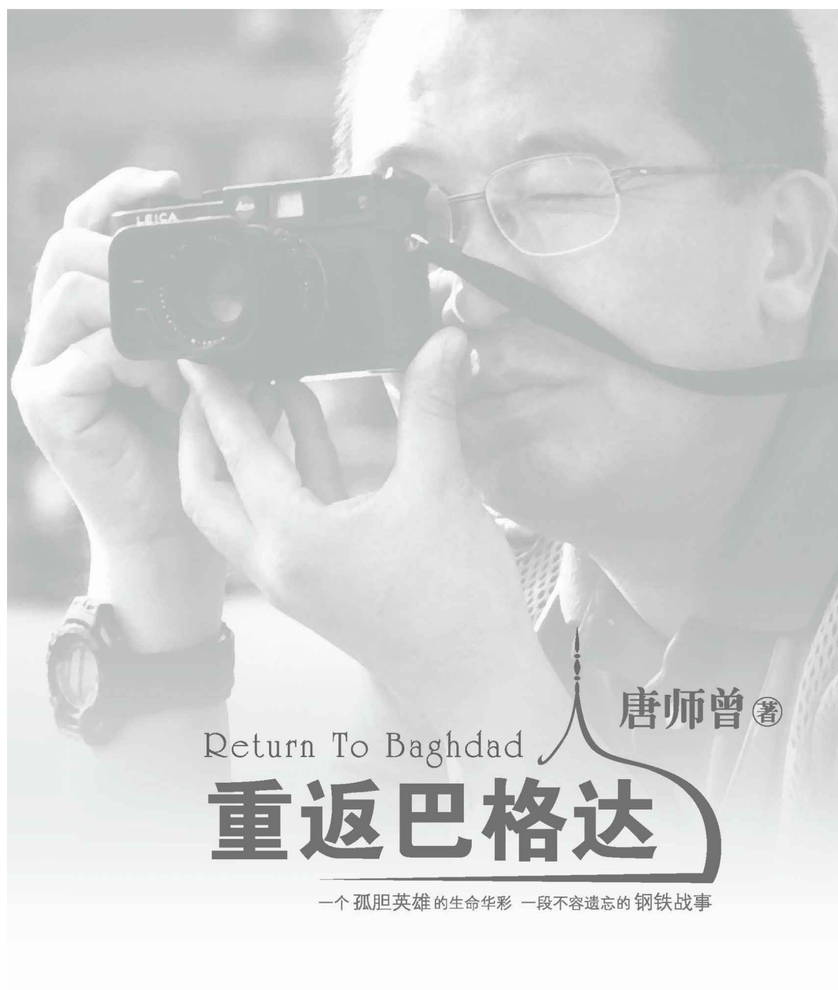


唐师曾 著

Return To Baghdad

重返巴格达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巴格达 /唐师曾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54-6900-7

I．①重…

II．①唐…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5166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　曦　罗小洁

装帧设计：谷　宇

媒体运营：张　坚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10

传真：027-87679300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　　编：430070

发　　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58678881

传　　真：010-58677346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　　编：100028

印　　刷：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5.5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0千字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这是已遭毁灭的那些市镇的消息，我把它告诉你。那些市镇有废墟犹在的，有荡然无存的。

——《古兰经》第11章

目录

CONTENTS

战场归来二十年　唐师曾

为唐老鸭大唱颂歌　季羡林

为真理服务　巴萨姆·库巴

世纪初的远行　唐师曾

我师萧乾

直播金字塔引起的故事

美梦成真

最黑的一天

重返巴格达

死亡之路

过关留下买路钱

鸟瞰巴格达

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

家有莱卡

防空洞里的冤魂

贻害无穷贫铀弹

沉重的母亲

破车当道

撒马拉转塔

消失的巴比伦

浮在油海上的国家

石油重地被捉记

哭泣的河流

不灭的火焰

跋　多媒体时代到来之前　唐师曾

返回总目录

再版前言
战场归来二十年

唐师曾

老鸭《战地三部曲》都是老书，其中最老一本已诞生20年，先后被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四次再版。尽管时过境迁，但因独家、客观、亲临一线而不可替代。

老鸭这辈子做对两件事：上对一所大学；选对一个职业。亦做错两件事：误入一个组织；错结一次婚。或许人生本来就没有对错，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老鸭在新华社有两大发明：（1）闪击，将古德里安的“闪击战”应用于突发事件，在孕育期潜入，在爆发时采访；（2）语像，利用“语言＋图像”跨界叙述，产生热核武器的聚变效果，突破传统单一表达的局限。

老鸭以往的两位责编都是比我大十来岁的北大中文系学姐，退休前给老鸭极高的文学滋养。此次再版，责编陈曦是比老鸭小二十多岁的机械系小妹，高中四中、本科清华，人生的基础是靠“高中＋本科”浇筑的。

我就是从“高中＋本科”开始崇拜卡帕的，亦步亦趋一直走到现在，capa@sohu.com已经坚持了十多年。我为海南出版社《卡帕传》写序，为中国摄影出版社《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前沿50年》《〈生

活〉画报和〈生活〉摄影师》……等书写序。意大利使馆让我代表中国参加“中意战地记者论坛”，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命我为《戈雅，所有战争的新闻记者》写前言。日本共同社河野把价值连城的“Leica III”送给我这个“中国卡帕”（河野语），它是卡帕在越南踩地雷时最后一刹手中的“名器”，通过旁轴取景器偷窥枪口，感到毫无遮挡的恐惧时按下快门。

家族和北大的综合教育，使我养成独特的写作习惯：亲临现场、自然定位、社会延展、独立思考、文学描述，五个维度缺一不可。作为新闻记者，我只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基本加工，简单处理后，以新闻的特点、速度即刻传播。不计时间成本地对某个问题深入研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上星期，我和北大中文系学长河野彻在东京久别重逢，彼此庆幸都还活着。1990年我们相识于战火下的巴格达，当时我们初出茅庐、满腔热血、无所畏惧，为一张独家照片可以出生入死。现在，河野是共同社国际局次长，老鸭因“再生障碍性贫血”“海湾战争综合征”原地踏步20多年。运气更差的是在巴格达结识的巴萨姆·库巴，他2004年6月殁于汽车炸弹，时任伊拉克副外长。库巴出任驻华大使6年期间，每到周末都和我去密云水库游泳，还为我的《重返巴格达》写序。

改革开放之初，受传统等多重桎梏，中国新闻采集方式严重落后，妄加评论者多，亲临一线者少，复制转帖，“愚乐”大众，误导政府。1991年1月15日海湾战争爆发之际，时任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处长的陈佐夫告诉老鸭，某中南海会议上，新华社社长穆青拍案而起，“巴格达没中国人了，只有一个新华社的唐老鸭！”

12亿中国人中，我是被选中进入巴格达拍摄海湾战争的唯一者，年轻气盛，血性方刚。凭与生俱来的新闻本能追逐“异动”，用镜头捕捉画面，以文字交代因果，国际视野、职业素养，合成有生命的新闻“语像”。新华社副总编王文卿看了我的传真说：唐老鸭写的干草都

带着露珠。

以科学的眼光，用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这是我的书20年后仍能以不错的印数和版税再版的基础。

唐师曾　于什刹海

2013年10月31日

序

为唐老鸭大唱颂歌

季羡林

过去，常常有人，特别是外国人，在我们耳边聒噪：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只能当东亚病夫，任人宰割。只有西方的哥伦布才能算是冒险家。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西方的冒险家虽多，但是，目光短浅，居心不良，其用意不过是寻找黄金、香料，侵略和奴役别的民族，甚至灭绝别的民族，保持自己的“天之骄子”的桂冠。

这样的冒险我们必须鸣鼓而攻之。

说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完全出于诽谤。古代的张骞凿空、甘英西使、高僧万里求法、学子千里寻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哪一件事情里面没有冒险精神。鲁迅先生在“中国的脊梁”中列举了许多“脊梁”，其中之一就是“舍身求法的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名字，但是明眼人一看就能知道，他心目中的人是唐僧。

到了中国近现代，有冒险精神的人就更多更多了。我必须在这里补充几句：“冒险”一词有褒贬二义，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之分，我取其褒义，取其积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冒险者，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封建统治能够摧毁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建立吗？

我们要为积极的冒险主义大唱颂歌。

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北大仅仅是中华民族这个大体系中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而掀起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就正是北大中一些冒险家，当时也有人称之为“叛逆者”。这个运动，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影响了世界；不但影响了现在，而且也影响了未来。

我们要为北大的冒险家和“叛逆者”大唱颂歌。

唐老鸭师曾仅仅是改革开放后考进北大的一个小弟弟。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人们可能称他为“小人物”。然而，他的冒险精神却并不小，他是“胆大包天”的。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冒险精神，一方面又继承了北大的“叛逆”精神。他曾步行走过万里长城，他曾在秦岭追踪拍摄大熊猫，他曾到可可西里无人地探险，他曾只身采访海湾战争，他曾独自开车环绕美国，他曾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等等。其中任何一项都能令人舌挢不下，师曾却能集众奇于一身。

我们要为唐老鸭大唱颂歌。

然而问题还不就到此为止。唐师曾还有超越前人的地方。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新千年。我们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在芸芸众生中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包括那些仍然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各国领导人在内，他们也大都是懵懵懂懂，而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更为稀见。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提出过警告：“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真不愧是马克思的朋友，这观察多么犀利，多么深刻，又是多么正确。到了现在，自然界的报复日益明显：人口爆炸，疾病丛生，淡水匮乏，资源将尽，大气污染，臭氧出洞，生态失衡，气候变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哪一件不是大自然报复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件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见到这种情形的人并不多，唐师曾是其中之一。他的行动不仅仅在于冒险，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想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保护地球的环境；他不但看到人类的现在，而且看到人类的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

唐师曾不但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继承了北大的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行动发扬了这种“冒险”的传统，不仅仅是不怕死，不要钱，而且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超前的境界。

我们要为唐师曾的《重返巴格达》高唱颂歌。

2000年12月9日

序

为真理服务

巴萨姆·库巴

我亲爱的朋友唐师曾先生让我为他写伊拉克的新书作序。虽然我读不懂汉语，但我很了解作者以及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长久的职业生涯，他总是以勤奋和真诚追寻真理。

事实上，早在本书成书之前，我们就谈论过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当他准备与他聪慧的妻子一起踏上巴格达之旅的时候，我们又在一起讨论了许多事情。

唐先生不止一次访问过我的国家。他过去访问伊拉克时，曾深入到人民中间进行采访，那时伊拉克的条件比现在好得多。当他最近一次访问我国时，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的确，唐先生是一位客观而值得信任的目击者，他目睹了伊拉克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目击了在强大而野蛮的列强们的股掌之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这些列强只寻求他们的利益，而不顾他们的政策给一个完整国家的人民的命运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唐先生不遗余力地寻求真理。他和他的妻子离开了自己舒适的家，去采访那些失去了家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甚至自掏腰包去写那些被剥夺了金钱和财产的人们。

我敢肯定地说，这本书将给读者提供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无

法借助其他手段得到的。

我非常感谢和赞赏唐先生和他非凡的妻子王女士的勇气，他们通过这次艰苦而困难的旅行为真理服务。

伊拉克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Bassam Kubba

2000年7月于北京

自序
世纪初的远行

唐师曾

感谢我师萧乾，是他鼓励我重返巴格达并答应再次给我写序。恩师不幸于去年初逝世，我这里完成的是他布置的最后一次作业。

海明威致菲茨杰拉德的信中说：“战争可以最大限度地调集物质力量，加快行动速度，这在平时需要耗费毕生精力才能达到。”说到10年前的海湾危机，我总忍不住浊泪潸然。那是我生命中最华彩的一段时光，当时我还不到30岁，还没尝过和女人同居的滋味。我三十而立的成人大PARTY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高楼顶层防空武器丛中举行的。那天有好几枚“飞毛腿”划过夜空向我鸣炮祝贺，我活这么大从没看过那么大的焰火……

我在海湾战争爆发10周年前夕重返巴格达，亲眼目睹了战争对生命、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不愿看到人类子孙重蹈巴格达覆辙，我写这本书就是希望引起人们对这场危机的思考：如何在新世纪善待有限的地球资源，如何尊重曾经辉煌的文明，国与国之间应该怎样平等相待，国际公法在各国制订政策法律的过程中应起什么作用。

中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的祖宗早在上千年前就和黑衣大食、白衣大食、绿衣大食们有过密切接触，其中黑衣大食指的就是伊拉克。

《重返巴格达》极为毛糙：一、除本人文化素养有限外，我因患血液病蒙新华社照顾“劳保”在家，生理、心理机能都不适应伏案写作；二、巴格达是一个被制裁10年的战乱地区，无法按通常规则采访；三、重返巴格达是纯个人行为，经费来自有限的劳保工资和亲友借贷，囊中羞涩无法深入采访；四、在本书进入收尾时，我已经到达亚布力进行“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考察”适应训练，由于身体素质太差而魂不守舍……

《重返巴格达》讲的是一个普通人靠自己努力、持私人护照美梦成真的坎坷过程。我只希望《重返巴格达》能像1990年12月我潜入巴格达等待海湾战争爆发那样，再次告诉我的国家那里发生了什么。

唐师曾

2000年12月

我师萧乾

按计划这里本来应该是我师萧乾的一篇序，就像几年前他为《我从战场归来》作序那样，很可惜他老人家不幸作古。多年来我师萧乾一直和我以“同志”相称，“同志”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所以我把自己看成是萧乾播下的种子……

都市里的乡下人

萧乾是20年前我念大学一年级时崇拜的偶像，也是我开始初晓人事、胡乱崇拜并坚持至今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在此之前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已日积月累向数不清的英雄人物学习致敬：挖地道触电身亡的胡业桃、抢救串联红卫兵牺牲的李文忠、面对新沙皇“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于向阳、“身居长工屋拉革命车不松套”的王国福、“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的杨水财……连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越南的阮文追都是我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当时祖国江山一片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帝阵营中的革命派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远有《老三篇》中“去年春上到延安”的白求恩，近有被毛主席请上天安门的斯诺。我由于赶上一个英雄辈出的革命年代，英雄太多又逝者如斯，到现在除了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救一根电线杆子被大水冲走外，其他已记不清谁是谁。任主编批评我这么写对革命先烈有失尊敬，可我想得更多的是比我年轻的新一代如何把仅有一次的生命过得更有价值。

1979年我年满18，侥幸考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终于开始第一次有价值的人生崇拜。那年我在未名湖司徒雷登故宅正东发现有座斯诺

墓，斯诺是伟大领袖屈指可数的美国朋友，自然属于崇拜之列。据系里老师介绍，斯诺半个世纪前来中国参加革命，先在燕园教书，后投身学生运动，再潜入延安，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请上天安门。20年前的北大国政系还很时髦，老师中有声震华夏的“梁效”，同学们大多在广阔天地经过风雨，个个文韬武略期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唯有我胸无大志驰心旁骛，整天沉湎于武器、弹药、战争史，梦想当格瓦拉式的革命英雄。天长日久连老师也发现我朽木难雕：既无政客的城府，更不是当学者的材料。唯一可取之处是笃信国际主义，对参加世界革命的里德、斯诺、卡帕顶礼膜拜。老师以为我根红苗壮，殊不知我自幼游手好闲东游西逛，自然对走南闯北以革命为业者肃然起敬。

斯诺不仅追逐热门新闻，而且热衷一切有价值的进步事业，这更令“爱管闲事”的我神往。为勉励后人热爱生活尊重历史，斯诺还立下遗嘱把自己遗骨埋在北大，继续充当民主科学的种子。由此我才知道记者不仅可以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可以留下一种精神。从此我把斯诺、里德和阵亡的卡帕视为人生偶像，每次下课路过斯诺墓，都不忘献上一花一草以示缅怀。北大是中国民主科学的始发圣地，可正如民主科学在中国步履艰难一样，想在中国全盘效法卡帕、斯诺，总有点隔山取火。幸亏斯诺亲手带出一位中国徒弟，由于赋予了西方思想，中西合璧土生洋长，终于成为跨越时空的世界级记者，这就是萧乾。

萧乾一直到现在都感激斯诺：“我学新闻也是受了埃德加·斯诺的影响。当时我在大学英语系读书，斯诺先生是新闻系的教授。自与斯诺先生接触后，我感到执教英语的局限性太大，大学三年级时，就从英语系转到新闻系。”“从斯诺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新闻记者决不仅是一个热门新闻的追逐者，对于世界事务决不能作壁上观。他必须认真观察，通过表面现象透视到本质。他必须侠肠义胆，坚决站在受欺压者一边，揭露邪恶，反对横暴。他的职务是报道，他更加神圣的职责是扶持正义、捍卫真理。”至今萧乾回忆创作欲望最旺盛的时期，还

念念不忘未名湖学生时代。当时他为节省住宿费搬到湖边六楼，人多屋挤，就躲到湖心石舫上去写。我为应付考试，也常去石舫背《苏共党史》，可总没有萧乾讲过的那种“脑中冒出的灵感”。

整整20年弹指过去，沧海桑田，我已从“而立”奔向“不惑”，可年届九十的萧老仍然是我“勇敢诚实”信条的楷模。穷其原因，大概唯有对萧乾的崇拜发自内心。沈从文教授把萧乾称作“生气勃勃勇敢结实的都市里的乡下人”，由于我们情趣接近又同属劳苦大众，亦友亦师才保持至今。

“唐老鸭在巴格达给萧乾买的”

在萧乾影响下，我还没出校门就幻想自由翱翔，仿佛越渺茫越合乎我漂泊的心。以后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大约在1986年，政法教书的同事吴霖不知从哪儿弄到萧乾地址，带了我找上门去。当时我诚惶诚恐，只记得萧乾养了乌龟之类的小动物，其他什么也没记住。此后我抛弃大学教书的稳定工作，连考几家报纸，最终进了新华社。鉴于萧乾写文章沦为右派的惨痛经验，我发誓永不写字，铁了心只当摄影记者。1987年我在新华社开创BP机、手提电话跑新闻的方式，几乎控制北京地区的所有突发事件，名声大噪。《中国青年报》用半个版介绍我和我的“闪击”理论，受到我师萧乾喝彩。他称赞我“就像当年的美国记者一样，脖颈上挂着一具弧光摄影机，以强烈刺目的灯光，一闪闪把咱们照个糊涂。然后照相机向肩后一背，又拿出一册速记本子开问，真是闪击”。老人家还特别送我一本他的《北京城杂忆》，并题词：“师曾同志惠存，并祝鹏程万里。”勉励我继续探索新的新闻采集方式。

1991年5月，我结束半年多的海湾战争采访，打点行囊准备回国。行前，我特地到巴格达曼苏尔食品店买了一听巴格达咖啡，准备献给我师萧乾，报答知遇之恩。回到北京，头一件事是跑到萧乾家展

示我的战场心得。他见我足登美军军靴威风凛凛，十分艳羡，继而感慨万端。说当年采访欧战，他也有这么一双，一直穿在脚上炫耀，不料后来竟被诬为勾结美帝罪证，现在也不知道穿到什么人脚上去了。他看我送给他的咖啡罐上全是蚯蚓般的阿拉伯文，就让我写上“唐老鸭在巴格达给萧乾买的”，说：“唐老鸭从战场背回来的东西得有个标识才好摆在桌上，向客人展示。”他看到我拍的照片中所有以色列人每人一个防毒面具，还有人给面具配上好看的塑料盒子，说上次大战他在英国，“每人也都发了一具类似的防毒面罩。很奇怪女人戴它远比男人更热心，而且和巴黎一样，许多彩色‘面罩匣子’还被陈列在市面上，花上三五先令，便能把这猪八戒脸谱似的玩意儿装饰起来，天蓝、水绿、橘红，很富于个性”。接着萧老一口气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老百姓可笑的“爱国发明”：军靴上绑刺刀，遇上敌人可以拿脚踹；步枪上装电钮，肉搏时电钮一按，刺刀霍地飞出将敌扎死；平地撒鱼网，网上装有《七侠五义》中的那种响铃，专捉敌国伞兵；在空草坪上缠以蛇腹铁蒺藜，使着陆敌机如藏珍楼里的白玉堂插翅难飞；向敌后散布毒蛇饿鼠；将天空彩云冻成冰蛇子再架上高射炮……每天都有上百种发明送到英国陆军部，稀奇古怪十分好玩，“可惜不是唐老鸭，没有‘闪击’‘抓拍’，没能留下证据”。说着萧老想起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

说莱茵河畔有个家伙好吹牛，曾向村民夸口自己亲手杀了3000犹太人，不料德国战败后遭人举报被捕。《伦敦画报》一名摄影记者听说此事，想趁机造个噱头。他见萧乾不搞摄影不构成竞争，就请萧乾当帮手：“一个杀过3000犹太人的战犯！一定轰动！”萧乾问：“要是那家伙瞎吹，谁也没杀呢？”这名记者说：“我只管拍照片，不是战犯判决。”搬桌弄椅、架相机、试镁光泡，还请来两位会德语的少校并排坐在上首扮法官。折腾到更深夜静，才把好吹牛的家伙押上来。他以为要被枪决，一进门就瑟瑟发抖。问什么都先打一躬，再矢口否认。《伦敦画报》记者几次提醒法官设法“激怒他，逗他露出狰狞面目”，可一直审到半夜，镜头前只有“熊相”不见“凶相”。别说亲手杀了

3000犹太人，也许连杀三个的胆子也没有，只会一口气地喊“饶命”！……记者失望之极，最后干脆亲自出马，命令他表演行纳粹礼，可这家伙就是不敢配合，一个劲儿点头哈腰：“当时全这么敬礼，现在打死也不敢了。”各位原本要他扮演一个死硬纳粹，可这草包只配演悔过者。阴差阳错，摆拍一张“新闻佳作”的努力就这样落了空。折腾了半夜的《伦敦画报》记者一边收拾器材一边破口大骂：“希特勒白栽培他了，敬个礼也不肯，真他妈的！”

对活人刻薄，对死人宽宏

我一直认为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勇敢男人。战争是表现勇敢、承担责任的最佳机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随美4军挺进莱茵河，还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我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疲惫不堪的萧乾满怀着赤子之心回到祖国，看到国内腐败甚为愤懑。“余以人民利益为至上，国家利益为第二，党的利益为第三。”为躲避迫害，萧乾佯装洋人以“塔塔木林”为笔名，抨击社会不公。呼吁：“民主在中国不再是专供玩弄之名词，而应变成一种上下共同持有的态度！”“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存在。”他还呼吁文艺界应该“为祖先为子孙，替窒息而枯涸的文坛开条生路，想法增加作品的销路，保障其著作版权，减少官方登记的留难……把笔放到作品上，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写下这一辈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悲哀、遭际与奋斗，使文坛由战场而变为花圃：在那里，平民化的向日葵与贵族化的芝兰可以并肩而立”。

1946年，萧乾借英国文豪萧伯纳逾九十高龄、生日那天还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稿之事，批评中国文人不该在国家贫血、国民神经衰弱

的国情下以权威自居，动辄操办五十大寿，劳民伤财，腐蚀民众。无意中开罪了操办五十大寿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郭老，引来飞来横祸。郭老祭起红色大旗，将沈从文斥为“桃红小生”、朱光潜贬作“蓝色警察”、萧乾则沦为反动的“黑色鸦片”。郭老写道：“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舶来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地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钻在集御用于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大量发散其为幽渺、微妙的毒素。”

1957年萧乾与几十万知识分子因右派沦为次等国民，一去22年。“中国向来对活人刻薄诋毁，对死人忠厚宽宏。”“越是对有能力、贡献大的，下起手来就更凶狠，株连起来也漫无边际。”可勇敢者萧乾从未在训斥面前低过头，“继续为这个东亚病夫挤脓、剜疮、清除积垢”。“尽管自己不是马列学院的毕业生，手里什么地图都没有，可作为普通中国人，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摆脱贫穷愚昧。”“人类历史绝不是命定的，它是由有脊骨的人们用血肉筑成的。”“和平时期的冷静、坚定、尽责比不上战士的英勇，可的确是好公民的起码品德。”

1999年2月4日，北大老学长张中行做九十大寿，管鲍之交鱼龙混杂，我夹杂着与张中行、启功、王世襄、钟敬文共坐一桌。席间张中行列数居京老友沧桑飘零，我插话说前一天去看望萧乾，他由于大面积心肌梗塞、冠心病、肾功能衰竭等病，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有余。一句话引得诸位九十老翁唏嘘不断，说这都是由于年轻时为国九死一生，不懂保养，过分透支了生命。人到中年，连连反右文革，在牛棚喝了太多脏水，切去左肾……看着诸老摇头晃脑感慨万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师萧乾在文化界著名耄耋老者中竟有如此好的口碑。启功老对我苦笑道：“我是满人，满人是胡人，胡人是胡说八道之人，代表不了主流社会。萧乾是蒙古人，蒙人和满人一样都是胡人，在今天时髦社会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

跑吧，跑吧，把世界跑遍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上司心血来潮，突然看中我的领袖天才，想让我当新闻中心的头儿。尽管我这人素来政治觉悟低，深知当官紧邻发财，可鬼使神差恍惚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悬。于是找到我师萧乾，萧乾慨然长叹：“民国以来，中国的毛病是官员们做的是民国的官，心里却还在当皇帝。”我这才知道还是当我的记者好。负隅顽抗了半年，终于遂愿去了中东。行前与萧乾道别，他送我一本《红毛长谈》，题字：“师曾同志惠存。萧乾1991年11月。”踌躇一阵又找出一本《西欧战场特写选》给我，题词道：“师曾同志，跑吧，跑吧，把世界跑遍，但不要忘记写日记、记笔记、积累生活经验。萧乾1991年11月。”他告诉我，但凡伟大的作品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要尽量体验多种人生。接着萧老让夫人文洁若去休息，说他“要和唐老鸭谈些男人之间的事”，由锻炼身体、注意卫生到结交女友……连我老爹都从未如此细致地指点我的人生。关照再三，才依依惜别。

次年4月中旬，我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采访卡扎菲后，给我师萧乾寄了一张与卡氏的合影。6月17日萧乾给我老爹写信：“您可真培养出一个虎将，他的前途是不可计量的。与卡扎菲的合照我认为应刊载（如新华社的《参考报》），如能有师曾的访问记则更为出色。因卡扎菲确实是80年代的新闻人物，我一直以为他是位混世魔王。师曾的文及画如交给新华社的出版社编成一书，定能畅销。希望老鸭多掌握外语。”

在萧乾指示下，我在开罗连夜炮制了《我见到了卡扎菲》，“图文并茂”地寄回北京。因不合时宜辗转多处，最终被《世界博览》主编任幼强一眼看中，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从此开始我在《世界博览》的连载生涯，萧乾为此，把任幼强大姐比作“唐老鸭的杨刚”。因为当年萧乾走上新闻道路，也是多亏一位未名湖校友——杨刚大姐帮助，

才飞向世界的。从此日渐发现，我与萧老相似之处甚多，连生日都同为一月下旬。萧老笑我：“跟人学，变狗毛；跟人走，变黄狗……”我接着唱：“跟人上大街，变个大土鳖；跟人迈门槛儿，变个炉灰渣儿……”

此后萧老软硬兼施，硬逼着我这只“懒鸭”把海湾战争亲历写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他亲自给我作序。这才有了那本至今已畅销20多万册的《我从战场归来》。

1995年2月，萧乾把再版的《人生采访》送给我，自称他自己“总把生命看作是一次旅行。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不能老待在上层，处处占上风，甜酸苦辣都得尝尝”。“自然美大有可描述的，我们更应该继承杜甫那种一生关心民间疾苦的衣钵。”“一个驻外记者的心情就更是这样：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刻把它带回国来；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幸免。”“我认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是讲真话，实事求是，或者至少做到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此后我到贫困的鄂西北神农架寻找野人、独自驾车环绕美国、不间断地给《世界博览》写连载……都不忘我师教诲的写作真谛。



在北京医院D-214病室，看望病榻上的恩师萧乾。（王淳华　摄于1999年2月）

萧乾同时代的旅美记者赵浩生教授对我说："世界上大多数新闻记者的作品，生命力不足一天，有些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的新闻作品寿命更短。现在有些记者不会跑新闻，或者会跑而不会写新闻。萧乾不同于一般记者，他的作品不仅有新闻的时效，而且有文学的艺术、历史学的严谨。他把文学技法，把对历史的严肃感情写进新闻，所以他作品的寿命不是一天，而是永远。萧乾是一个成功的人。"

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现在我不仅崇拜萧乾九死一生的人生，更崇拜他坦然面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他镇定地把庄子"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始"与英国诗人约翰·邓恩"人的一生是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死亡"联在一起，把人生说成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文革"黑色的世界笼罩头顶时一度把死亡看

得比生命更美丽”，他索性吞下一整瓶安眠药，结果被人发现后送至隆福医院强行洗胃，自杀未遂。尽管我师萧乾归根结底是热爱生命的，可这匹识途老马已经预感自己走到生命的尽头。1999年1月27日，萧乾按中国传统给自己过了虚岁九十大寿生日，朱镕基亲笔致贺：“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的文学、新闻、翻译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其时已死过几遭的萧乾大概再次听到了死神的脚步。

1999年2月3日是星期三，按星相学每逢三六我逢凶化吉。在此之前我大病住院一直没敢去看我师萧乾，原因之一是怕两个病篓子互相交叉感染；二是由于朋友嘲笑我命硬妨人。因为我采访过的陈岱孙、潘国定相继过世，吓得我九十岁的姑父邓广铭不敢让我去医院看他。直到我手术、住院、获释出院，才获悉邓广铭教授已然仙逝，我这才恍然国宝们相继陨落与本人无关。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敢贸然参加我师萧乾的九十华诞。偷偷查了皇历，择良辰吉日，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

辗转找到北京医院D-214病房，我全身紧张不敢敲门，担心贸然前来，萧老耄耋之年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倒霉蛋。我轻轻推开房门，只见我师萧乾仰面朝天躺在昏暗的病房里，原本仪表堂堂的大汉，已缩成一个小老头。病房内四季换洗衣服、咸菜腐乳一应俱全，一双破布鞋摆在床边。

听到人声，萧老睁开睡眼，喊着“唐老鸭”一脸委屈地坐了起来。由于他鼻孔、四肢插满了各种管子，只得把起居生活固定在管子长度的范围之内。萧老熟练地捋顺管子，侧身蹭到沙发里，坚持坐起来听唐老鸭讲讲外面的事情。他见我掏出照相机，竭力想拔除鼻子上的细管，做出英武之态，但旋即就放弃了努力。他让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胶卷，省下胶卷去拍普通人。他还要求我永不停息地闪击，“要想办法重返中东，实现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梦想”。他不顾自家病危，反倒关心我的病情，问我何时可以恢复工作。我说我正像神农皇帝一

样遍尝百草，一位中医给我开的药方竟是每天活吞4个麻雀头。萧老听罢大笑，说国术历来如此，他自己10岁前也喝了不少兑香灰的圣水并囫囵吞下一只活癞蛤蟆。提到蛤蟆我向萧老吹牛，说我可以一整天不喝不尿，这是多年追逐新闻锻炼出来的特异功能。萧老闻言连说不可，当年他被押送渤海劳改，十几人合睡大炕，众人劳累一天，起夜颇不得人心，为免犯众怒少惹乱子，他干脆过午滴水不进。当时他颇为得意，以为找到人生窍门，谁知日积月累盐碱水在肾里结成一块块碎石。直到十几年后偶然照X光，左肾阴影，才发现一大簇肾结石，最大的已有蚕豆般大，手术开刀从此失去一个左肾。

说到这里，萧老已经衰弱得不能再讲下去。“唐老鸭，现在只能你说，我听了。”说着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见我没有动静，他催促道：“快说！唐老鸭，我在闭着眼睛听呢！”我强忍泪水抖擞精神，向我师报告独自驾车环美采访的经过，讲一个礼拜挨三次骨穿，讲《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一路畅销已经累计卖了几十万本……萧老嘴角嚅动：“5年前，我就说过你行。”当我毫无遮拦地比较中国、中东、美国文化风物时，他喃喃自语：“你胆真大。或许你更应该重返中东，或许能为人类干点儿大好事。”临别，我蹲在我师膝前，拉着他柔软的手，问他需要什么吃的，我下回带来。他说：“给我带些杂志，你看过的旧杂志就行。”临出门还不忘再次提醒：“千万别忘了重返中东，再来一本《重返伊拉克》。”

想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那天我顺手拍的几张照片，竟成绝照。次日我师萧乾不幸摔倒，从此昏迷，1999年2月11日18时仙逝于北京医院。就在萧老逝世前一天，《北京晚报》还发表了他最后的一篇散文：“在医院的这两年我经常想到死亡这个词，人在一场假死之后，就能正确地面对死亡了。死，使我看透了许多，所以从1979年重新获得艺术生命之后，我就对自己发誓要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同天，汕头89岁的小学教师萧曙雯突然梦到萧乾。萧老太太是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中“漂亮的大眼睛的潮汕姑娘”，是萧乾的初恋

情人。“那天我突然做了梦，梦见萧乾坐在椅子上，面带微笑，过了几天就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一直都在寻找刊登这一不幸消息的报纸，一直都没有找到。”

早在20年前萧乾已经为自己拟好了墓志铭：“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一个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时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我强忍泪水抖擞精神，向我师报告独自驾车环美采访的经过，讲一个礼拜挨三次骨穿，讲《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一路畅销已经累计卖了几十万本……萧老嘴角嚅动：“5年

前，我就说过你行。”

1999年2月24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萧乾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前北大校长丁石孙、书法家启功、剧作家吴祖光、遗孀文洁若、子萧驰、萧桐等出席。我为我师萧乾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我师萧乾》发表之后，收到萧师母文洁若的信：

师曾同志：那天香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给您打电话时，我刚好在场。《我师萧乾》是迄今我看到的写萧乾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我把他寄给马来西亚柯杰雄去发表，没有稿费。如果同意，就不必打电话了。文洁若1999.5.10.

我师萧乾在病榻上已经答应为我重返中东的书写序，不料天不遂人愿。我将此文放在本书的第一篇，权作对我师萧乾的纪念。

直播金字塔引起的故事

空前绝后的现场直播

1999年2月23日星期二，在家养病的我突然接到一个香港长途，来电话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郭先生。郭先生姓郭名滢，是凤凰卫视的创作总监。远在香港的他再三关心我的身体之后，提出邀请我到香港住两天。他说凤凰卫视正与美国默多克集团联手，策划一场世纪末空前绝后的现场直播，他读过我的《我钻进了金字塔》，希望我能出镜解说。我说我对一切没试过的新鲜事儿都感兴趣，尤其喜欢阿拉伯人，希望加深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只要时间别太长，身体顶得住就行。五分钟后他又来一个电话，让我务必在次日上午把护照送到凤凰卫视北京办事处，他好派人安排签证。我说这不太可能，因为24日我得去八宝山为我师萧乾送殡，萧乾与我有师生之谊，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我指点迷津，并为《我从战场归来》作序。况且我目前身体不大好，住得又远……对方闻言立即急切地说他们自己来取。放下电话，果然马上派过来一位欢蹦乱跳的小姑娘秦欢，小姑娘虽年龄不大，可俏丽温婉，办事稳重，取走护照时还主动留下一张“借据”。

2月24日星期三，我照常参加我师萧乾的追悼会。25、26日到河北给27集团军讲课，面对教室头排七八位戎装笔挺、认真笔记的将军，我全神贯注不敢分神，早已把去香港直播的事忘到九霄云外。

2月27日星期六，我回到北京。一大早就接到《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的电话，问我“最近凤凰卫视每天滚动播出广告：3月3日泛亚地区独家直播金字塔发掘仪式，那个‘神秘嘉宾’是不是你？”我这才想

起3天前凤凰卫视曾派人拿走我一本护照，提到过现场直播，可究竟是怎么回事，确实一无所知。况且去香港的手续比美国签证还难，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没戏。1995年英美烟草公司曾邀请我随车队采访“港京汽车拉力赛”，并为我出具全套手续，可仅仅因为时间不够无法获得签证，我只好到深圳等待，没拍到香港昂船洲的发车仪式。想到此我告诉《北京青年报》，我自忖这次香港之行希望渺茫，尽管久闻凤凰卫视神通广大，但港人治港毕竟是法制社会，必不可少的官僚程序势必延宕宝贵时间。现在已是2月27日星期六，明天28日使馆仍然不上班，而这个月偏巧只有28天……听得电话那头连连点头称是，说听我这么一白唬，觉得这个电话都白打了。可事后她又顽固地坚持，非得与我见一面，因为她以女人的直觉认定我这次“一定能行”。

2月28日星期日，吴菲到我家继续讨论金字塔问题。不巧那天我手头正有《北京晚报》“老鸭侃车”的稿债，不得不边敲笔记本电脑，边心不在焉地回答各种问题。最后我被问蒙了，干脆掏出一本《我钻进了金字塔》，说我所知道的全写在这本书里。

当日下午4点半，凤凰卫视助理台长钟大年自香港返京驾临寒舍，给我带来两盘英国BBC拍摄的埃及考古片让我参考。偏巧我的破录像机多年不用，没有画面只有噪声，我凑合着断断续续“听”了几句，好像讲的是埃及方尖碑，我说这与金字塔风马牛不相及。钟先生笑了笑，说：“不是让你去考古，而是要以一个记者的眼光去描述。”他安慰我，一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3月3日会挖哪儿、会挖出什么东西来。但他信任我的知识和口才，相信我能随机应变，更看中我神秘埃及生活的广告效应。吴菲在一边问：“为什么非选唐师曾？”钟大年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钻过金字塔的人。”吴菲又问：“如果唐师曾签证下不来怎么办？”钟大年说：“我们会一直等到最后一刻。”吴菲继续逼问：“万一签证下不来呢？”钟大年咬了咬牙：“不会签不下来，我们准备了多种方案。万一不行，我们换香港考古学家，但用专家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3月1日星期一，凤凰卫视为我安排的多种签证方案一一搁浅。钟大年原计划帮我做一张越南或泰国的旅游签证，借机从香港过境。因为凭盖有第三国签证的私人护照，可以在香港合法停留7天。不料泰国使馆领事突然回国述职，加急签证停办。与此同时，越南使馆也遇到了类似无法逾越的麻烦。

3月2日星期二，签证之事仍无结果。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派来一辆“丰田子弹头”，司机说从现在起这辆车归我调度。他告诉我，为抢时间行车方便，该车特地办了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特别通行证。同来的秦欢小姐递给我一张港龙航空公司“北京-香港-曼谷-香港-北京”的联程机票，一扫往日笑颜，严肃宣布：“现在就去泰国大使馆坐等，一直等到使馆下班。有签证就直奔机场，没有就去退机票。”我梦游般跟在秦小姐屁股后面钻进汽车，突然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兴奋。猛然发现人生最美妙之处，就是对未来命运茫然无知。无知使索然无味的生活充满生机，让人享受冒险的乐趣。

我被当成了“神仙”

泰国使馆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一刻给了签证，我则立即直奔机场，搭港龙航空公司当天最后一次航班飞上蓝天。此时，距约定的直播时间还有10小时。4个小时过后，我风尘仆仆地在香港着陆，一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出机场后该找谁。想不到香港新机场竟设了A、B两个出口，弄得我左顾右盼不知道何去何从。按经验两利相权A为大，可我望穿秋水围着出口“A”转了20多分钟，非但没找到接我的人，反而招来两个虎视眈眈的巡警。双方一打眼，我就发现自己这身皮夹克与香港人民热火朝天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于是掉转头鬼鬼祟祟朝出口“B”摸去，这时只听背后有人大喊：“唐老鸭在这里！”猛回头，正是凤凰台长王纪言，带着手下几员大将朝我傻乐。

我与凤凰台长王纪言初次邂逅于199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月黑风高

之夜，当时我刚出院不久，正躺在家中静养。一天子夜，这位王台长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一位广院毕业生带领下突然造访，嘘寒问暖，关心备至，自称全家都是我的追星族。我这人乃一介布衣，权势朋友不多。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关心到家，都是看当年师生之谊的情面，并非为官之道。王纪言素昧平生贵为台长，嘘寒问暖真让老实人不知所措。

低头钻进王台长的大奔驰，悄然驶向位于维多利亚湾的海逸酒店。据王台长介绍，香港回归时江泽民、李鹏等中央大员都下榻于此。这次凤凰卫视安排我在这里落脚，主要是考虑我久病不愈，想让我“沾点豪气”。李嘉诚的海逸饭店位于九龙半岛东南，面向维多利亚湾与香港岛遥遥相望。放眼望去，夜海茫茫波涛滚滚，点点灯光之下碧波粼粼，源源不尽滚滚东流，汇入无边大海。扑面的海风腥热潮湿，缠绵性感，让人躁动不安。使人恍然觉悟：世间万物都在流动之中，伴风而来，又随风而去。

还没等住进房间，凤凰卫视的创作总监，那位始终在长途电话中遥控我的郭先生已经在房门口翘首以待。他说为了他们的节目已经顾不得我的健康了，忙不迭地向晕头转向的我布置工作，说金字塔作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建筑，至少存在了5000年。可世界上至今没有找到古人建造金字塔的确凿证据，由此谬种流传，产生种种说法，怀疑金字塔是外星人或神怪所为。半个多世纪前的1941年，曾经准确预言人类将在19世纪末发现胡夫金字塔入口的美国大预言家埃德加·凯斯预言：1999年至2000年的世纪之交，埃及金字塔的建筑蓝图将重现江湖，由此揭开金字塔的建筑之谜。恰巧埃及现有一座金字塔即将挖掘，时间偏巧是北京时间1999年3月3日星期三上午9点，农历正月十五后的第一个早晨。由于这次发掘与“凯斯预言”的时间十分接近，因而引起普遍关注。为此世界媒体大王默多克，斥资一亿美元用于直播发掘现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首次跨洲际直播发掘古墓。一周前，香港凤凰卫视得到泛亚地区华语直播权，只可惜苦于找不到真正了解金字塔的

专家。由于他们全体凤凰都读过《我钻进了金字塔》，所以把我当神仙了。

我闻言忙解释我对金字塔毫无研究，只不过对其爬上钻下的次数不少。据我所知，埃及现存的96座金字塔基本都是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第三王朝至第六王朝所建。其中以第三王朝左塞尔的阶梯状金字塔最为古老，以第四王朝斯尼夫鲁、胡夫、哈夫瑞、门卡拉祖孙四代的角锥状金字塔最为著名。从地域看，埃及金字塔大多集中在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附近，其中以吉萨高地为最。到十八王朝以后，埃及人不再大规模建造金字塔，坟茔基本集中到上埃及卢克索、阿斯旺一带（就是《尼罗河上的惨案》推大石头砸大侦探波洛的地方），在上埃及形成帝王谷、王后谷墓群……我猜这次挖掘的金字塔，一定离吉萨高地不远，但这一带十有八九什么也挖不出来。



金字塔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

郭先生果断地一拍桌子："明天只当你和鲁豫两人聊天，看见什么说什么，就像现在一样。"

地球公敌

3月3日星期三早8点，我被凤凰台长王纪言送进了直播室，坐在我左边的是该台新闻主播陈鲁豫。陈鲁豫是王纪言在广播学院工作时的嫡系学生，曾获英语讲演第一名，嫁人后夫君是一老美，耳鬓厮磨英语愈发精进。凤凰派出久经战阵的名牌主持陈鲁豫充任口译，由我配合她对直播现场做进一步的解释。鲁豫说她当学生时曾在《世界博览》上跟我周游世界，两年前还在珠海航展上见过我，可我当时过于傲慢，不易接近。我说但凡遇见太美丽的女孩，我总不敢正视，怕管不住自己，所以不近女色。一旁的王纪言说，那你得赶紧看，因为做完这场直播鲁豫就去美国领馆换美国护照，变美利坚人了。到那时你要敢乱看，就得按美国法律告你性骚扰了。在一旁的窦文涛马上铿锵发问，鲁豫换美国护照是开玩笑还是真的，王纪言说当然是真的。窦文涛闻言立即恶狠狠地大喊：“老唐！赶紧替哥们儿狠狠地骚扰她一回，趁她现在还不归美国海军陆战队保护。”



当年的鲁豫像刚出笼的冰激凌，老鸭不敢碰，一碰就化。

8点半现场直播开始，此时比北京晚6个小时的开罗刚刚凌晨2点半。透过屏幕上跳动的信号，我的灵魂仿佛脱离身体，重新回到尼罗河三角洲，正穿过潮湿温暖的沙漠夜风，飘向撒哈拉沙漠东缘那块熟悉的高地。现在人们通常说起的金字塔，指的就是吉萨高地的金字塔群，共有大小金字塔十余座。这一片金字塔几乎都是角锥状，其中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共有九座，当年我大吉普轧出的花纹遍及金字塔群的沙漠小径。胡夫金字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高146.5米，与它相邻的是胡夫的儿子哈夫瑞的金字塔，再向西是胡夫的孙子门卡拉的金字塔。胡夫祖孙三代大小三个金字塔构成吉萨金字塔群的核心。由胡夫祖孙金字塔向西南沙漠纵深，有三座小金字塔一字排开，据考证是法老王后的金字塔。这里断壁残垣，一派破败景象。今天即将打开的，如我预料就在这里，是古埃及皇后卡蒙若内比悌二世（Khamerernebty II）的金字塔以及附近一座不知名的古墓。据说卡蒙若内比悌二世是法老门卡拉的皇后，可又有人怀疑她是门卡拉的女继承人。

我不是考古学家，有关埃及的知识除书本外，更多的来自在埃及两年多的居住经验。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天神乌悉利斯将根据每个人一生所为进行终极审判，尸体仅是灵魂在人世的住宅，而没有住宅的灵魂是不能进入天堂的。所以，古埃及人总是千方百计保护尸体的完整，据说木乃伊就是这么发明的。可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打开金字塔时，并没有发现木乃伊，也没有碰到任何阻止外人闯入的防御装置，更没有证据显示此前曾经有盗墓者闯入。由此有人怀疑金字塔并非为死去的法老修建的陵墓，而是让健在的法老修身养性的场所。有人把法老置身于完全黑暗之中，令他在金字塔内克服恐惧，坚强意志，强化精神，为即将到来的漫长旅程——飞向外星球作准备，就像我做跨时区飞行时的长睡。由此进一步假设金字塔是通向彼岸世界的秘密通道，是地球文明通向更高级文明的通天之路。

在民族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一切伟大成果都被各国政府民族化为爱国主义，金字塔也不例外。金字塔发掘现场的埃及科学家，就念念不忘金字塔是古埃及人的劳动成果。与此同时，美国人正竭力把发掘过程引向外星，引向宇宙。此前，还有以色列人宣称：金字塔是犹太人摩西出埃及前的伟大作品。近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传统的国家界限日益模糊，马克思由此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的伟大创意。作为地球居民，我倒宁愿把长城、金字塔之类看成是全体地球居民的共有财产，如果非得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政府，那就属于联合国，属于安理会。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把这一切归属于太阳系，归属于银河系，归属于无穷的宇宙。

多少年来，我一直怀疑所谓的“人类”不是地球居民，而是宇宙间星外来客的子孙。因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以尊重自然法则、不破坏地球总体环境为生存前提。它们都是自然生物，相生相克形成连绵不断庞大的自然生物链，由低等到高等、由草食到肉食，组成地球生命的巨大金字塔。唯有所谓“人类”持续有计划地向大自然单向索取，将石油、煤炭等矿物分解成塑料袋、矿渣等不可降解的污染物，粗暴打断自然生物链的良性循环。“人类”还有组织地发动运动、策划战争，疯狂地消灭异类乃至同类，以一切生物、矿物为敌。人类自己在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已经变成了地球的公敌。



“人类”原本来自遥远的其他星系，由于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而进化出一对蜻蜓复眼，或戴着配有风镜的飞行头盔。它占领地球后肆意蹂躏地球上的狼、猴子和猩猩，生出了白人、黄人和黑人。

1990年我随综合科学考察队在可可西里探险时，动物学家冯祚建研究员告诉我，地球生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而人类打破这一自然循环过程。1995年，我随野人考察队去神农架，该考察队队长多年从事神秘现象研究。他给我看过一幅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只刚出土的玛雅陶罐，陶罐上一个生着蜻蜓般复眼的怪物正与一头母兽做爱。据野人队长介绍，这种生有巨大复眼的生物就是“人类”。“人类”原本来自遥远的其他星系，由于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而进化出一对蜻蜓复眼，或戴着配有风镜的飞行头盔。它占领地球后肆意蹂躏地球生命：与地球上的狼做爱孕育了白人；与猴子做爱孕育了黄人；与猩猩做爱孕育了黑人，他说至今可以在任何人身上找到当年惨遭蹂躏的痕迹。我立竿见影，当即就找出队

长浑身上下的猴气。当时我俩置身荒山旷野，一时觉得队长极为恐怖，由毛骨悚然到肃然起敬。一直到现在，我总是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满街走的都不是人，而是披着狼皮、猴皮、猩猩皮的幽灵。难怪现在罗马还以“五狼城”自居，它的城徽是母狼哺婴图案；而中国、印度则对孙猴子顶礼膜拜。

时间最怕金字塔

众多媒体对这次直播作了很高评价，如《北京青年报》等许多报刊都开辟整版篇幅推波助澜。1999年3月15日的《文汇报》整版评介，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对埃及皇后卡蒙若内比悌二世金字塔的发掘进行了直播，采取的办法是现场直播、演播室的主持人与嘉宾的解说和历史文物资料的插播相结合，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它已完全跳出了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活动的范畴，通过采用现代传媒快捷、跳动、不受时空限制的种种手段，改变着‘人最怕时间，时间最怕金字塔’的定说，使数亿人通过时间隧道，去寻觅远古的足迹，去寻觅自己。这是电视的一次现代化革命，是电视的一次飞跃”。我庆幸自己参与了这次革命。

有人批评美国人把一场严肃的考古活动直播成一场艺术表演，其实这似乎更像一场事先策划好的商业活动。任何科学都是发展的，活泼的美国人完全没有必要把发掘金字塔弄成吊唁活动，科学的意义在于教育民众，我主张围观的人越多越好，只要不破坏现场就行。埃及不愧是文明古国，把金字塔扔在沙漠上几千年没人保护，绝对没人偷走一砖一石。我在观看默多克以1亿美元投资文化谋求利润的同时，也学会了人生一世，就必须随时准备以开放的思想去接受任何可能。毫无疑问，耐克公司为降低成本把臭胶鞋厂搬到亚洲的同时，也帮助亚洲解决了下岗就业问题。就在亚洲人超前消费、脚蹬空气耐克、憧憬美国科技的同时，美国人却用2亿美元的《泰坦尼克》赚回12亿美元。显然，今天的发达国家正借第三世界发展经济之“需”，把高消耗

低产值的钢铁、水泥、石油、化工“支援”给第三世界，自己则靠文化娱乐，靠迪斯尼、好莱坞等无本经济花天酒地。1996年我驾车环绕美国，发现美国人封死得克萨斯的油井代之养牛，理由是世界石油只够再用40年，所以美国人对卡扎菲、萨达姆们的石油特感兴趣。与洋鬼子相比，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金钱问题。

俄罗斯火箭之父、也是世界公认的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尝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们不断地争取生存世界和生存空间。起初小心翼翼地钻出大气层，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这一概念在他死后不久就被科学证实。1961年4月12日，苏联尤里·加加林乘飞船环绕地球，人类首次进入太空。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1976年7月20日，美国“海盗一号”登上火星。1983年6月13日，美国“先驱者10号”越过海王星轨道……

1993年12月21日，我在中东奉诏回国的那天早晨，我开上大吉普，拉着埃及武官曹彭龄将军去和金字塔告别。晨雾中我将大吉普开出尼罗河谷，爬到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沙山顶端。回首东望，我和我的大吉普仿佛已爬到胡夫金字塔的最高一层，可还没来得及得意，滚滚流沙已从车轮下悄然滑过，提醒我：我和我车都是泥足巨人。团团朝雾随尼罗河腥风扑面而来，寒意中暗藏杀机。越过金字塔高高的尖顶，文明古国埃及的公民们开始上班，蚂蚁般的人群匆忙地爬来钻去，全神贯注于各自的眼前利益，我反省到我自己就是这堆蚂蚁中的一员。

就在我鼠目寸光沉湎于祖宗功德之际，超级大国正通过手中的超级经济、超级科技操控世界，继而觊觎地球以外的广大宇宙。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像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那样，向其他星球移民，充当下一个新世纪的新殖民者。有趣之处是我这个普通中国记者，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的某一个24小时之内，从古都北京坐上超级大国的波音737，打盹儿的工夫就到了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香港（现在这里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区）。接下来我坐在凤凰卫视恒温恒湿的演播室里，身边是每天在屏幕上倾城倾国的小同胞鲁豫，可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小同胞的丈夫竟然是全身长毛、卖“耐克”鞋的美国佬。而我们又中美联手面对一大堆日本机器，向亚太地区10亿华语观众展示几千年前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堆石头。眼前的机器吐出一团团电线，漂洋过海一直通向遥远的埃及，那里聚集着一帮全世界公认的优秀科学家，正齐心协力发掘一座5000年前的古墓。在此之前，我一直顽固地坚持，人一生只能活70年，即25550天。到现在我才突然发现，凭借超级科技，一个人完全可以跨越时空，目击几万里之外、数千年以前的奇特事物，享受生理生命以外的其他意义。金字塔的答案可能会来自考古，也可能藏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人类社会已经拥有了相当卓越的科技成就，但精神世界却相对匮乏，直播金字塔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接触祖先，鼓足勇气迈向下一个世纪。

美梦成真

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在1999年第9期《世界博览》上，整篇文章充满年轻人的冲天热情。当时我正沉浸在轻信的蜜月里，现在重读自己激扬的文字，依稀可见上个世纪年少时的天真。

用冒险填补地图上的空白

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素来讲究先做后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从这一点讲，我这个直肠子大驴嘴预先宣布“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即将启动显然有悖祖宗传统。无奈《世界博览》像其他月刊一样有相当长的印刷周期，也许就在诸位批评我在这里放马前炮的同时，我大吉普的前轮已经碾过西奈半岛。当然，更存在我趴在床上哇哇大哭的可能性。人生的乐趣就在“是与不是”的不确定之中。

回想1000年前，我祖宗“翰林院检讨华甫公”（录自《毗陵唐氏家谱》第1卷）经历人类第一个千禧年时，人类发明的各种科学还不成体系，当时也不兴盗版，大宋朝仅靠四大发明就能施福全世界。大概从那时起，我爷爷的爷爷们开始心满意足地享受四大发明的恩泽，枕着祖宗福荫优哉游哉。生活已经精致到鸟笼上的钩子必须是什么铜、笼子里的鸟喝水得用什么碗……

现在，祖宗精血经过几十代孕育才辗转到我，千难万险终于靠近2000年，这可是人类每隔几十代才能碰上一次的“千年之喜”！所幸我今年三十有八正值壮年，自忖仍拥有八成的雄心、六折的健康、五分的知识和三流的领悟力。就在我砍森林、卖沙子为自己脱贫致富沾沾

自喜之际，太平洋那头的硅谷正用同样的黄沙炼出一颗颗“奔腾的芯”。1999年7月18日，中央电视台“经济30分”的万红、张雪梅光临寒舍采访我，问我对网上侵权有何感想，我这才知道可以在搜狐网站上找到“唐师曾”中文网页728个、在新浪网564个……而我到现在还对这几百个“唐师曾”及其业绩一无所知。一篇自称很了解唐师曾的网页居然列数了我在台湾、香港的女朋友，说我在若干年前早已实现了两岸三地的直接三通。今天的“伊妹儿”使地球居民足不出户就能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现代科技面前，任何阻碍正常交流的不良企图都无从下手。与此同时，地球村更需要村民间的直接交流，这就是我坚持要驾大吉普“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初衷。

1992年4月，我在撒哈拉采访卡扎菲之后，受法老图特摩斯启示，突然萌生假舟楫机器跨时空翱翔的梦想。恍惚间我趴在大吉普的方向盘上，借助钢铁的物质威力，抖起鼠胆向新华社总社提交了《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跨国采访计划。想把我的大吉普从埃及开回家乡，一寸一寸爬过四大文明古国。亚洲作为一个人为划定的地理区域，极为神秘有趣。如果把西边的埃及划进来，从东经30°到130°、北纬10°到50°之间，自西向东依次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横跨100个经度、40个纬度，人口、物产资源均雄踞世界第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印度河、长江、黄河，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大河文明，创造了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儒教和道教……

激动之下洋洋洒洒一挥而就的请愿书立即得到新华社耶路撒冷首席记者李红旗、中东分社英文编辑于大波的签名支持，只可惜因当时各种条件不成熟而夭折。8年过去，老友李红旗已经是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于大波也已乔迁新华社南非分社首席记者，只有我这只拔了毛的病鸭子还在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顽强跋涉。著名探险家阿尔多·利奥波尔（Aldo Leopol）在他的名著《地图上的空白》中写道：“地图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那些空白，有

朝一日，我将用我的冒险去填补所有空白。”

离太阳越来越近

1994年初，北京电视台《人海撷英》栏目采访我，首次在电视屏幕为“唐师曾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征求做梦伙伴，国宝季羡林先生特地为这个浪漫计划题名“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节目播出当天，素不相识的“蓝波万”老板张维新就把自己的旧吉普送给我，装甲兵学院院长许延滨（许光达大将之子）派战士将此车拖进坦克修理厂，准备让它随我做堂吉诃德式的远征。我把采访我的CCTV《东方之子》拉上“西部玩儿闹”（一种美国吉普），一直开到长城底下，我告诉《东方之子》的摄影师，这里将是唐师曾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起点和终点。

同年我在外交部《世界博览》上发表《“长城-金字塔”在召唤》，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约旦时报》、埃及《金字塔》报等上百家中外报刊介绍了我策划的这一行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北京音乐台张树荣、北京经济台孙萱北等先后在广播、电视中邀我现场直播，为“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寻找伙伴。



1995年，北京有线电视台拍摄的《摄影记者唐师曾——光荣与梦想》完整叙述“金字塔-长城”行动，由于该节目极富煽动性而获全国一等奖。

1996年，我孤身一人驾车环绕美国，为“金字塔-长城”做道路实验。1998年，我因再生障碍性贫血卧床，先后辗转北大医院、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当时大夫断定我时日无多，我赶丧般把“金字塔-长城”作为倒数第2章收入《我钻进了金字塔》一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印数超过20万，入选德国贝塔斯曼读书网。

1999年春节过后，凤凰台长王纪言来看我，自称“全家都是唐师曾的崇拜者”。这令爱听好话的我十分舒服，随即把花了700块钱在中国作家协会注册（注册号ZY00017）的8万字电视脚本《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电脑软盘、各种地图提供给王纪言参考。

1999年4月，应凤凰台长王纪言请求，我把新华社摄影部办公室主任刘洁、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郭崇立约到外交部街吃饭。反复协商后确定三家合作：新华社摄影部提供摄影器材、沿途各分社关系和新华社网络；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世界博览》独家连载，提供外交部和沿途使馆关系；凤凰卫视提供资金。新华社享有唐师曾图片，世界知识出版社享有唐师曾文字，凤凰卫视享有唐师曾电视成果。1999年7月26日，香港凤凰卫视派专人到新华社呈送措辞谦恭的公文，郑重表示要与新华社唐师曾合作“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跟随拍摄唐师曾的活动”。新华社摄影部研究后表示支持，因为新华社很想填补这一地区照片资料的空白。一直到这一时刻，我才初步确定，我坚持了8年的“金字塔-长城”即将美梦成真。我立即把这一天大喜讯告诉我在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大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这位习惯说阿拉伯语又精通美食的老大使听罢竟然蹦出一句英语：“Delicious！”（美味！）

从这一时刻起，我的工作机器才开始全面启动，凤凰卫视派车把我这只鸭子弄进凤凰会馆，还把我弄到首都机场游说STAR-TV总裁张振中，争取投资支持。仅帮我设计行车路线的就有十几位资深的中东外交官，他们都是我十几年的老朋友：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亚非司司长吴思科，条法司司长王厚立，驻也门、伊拉克、沙特大使郑达庸，曾当过乔冠华秘书的驻埃及公使程远行，驻伊拉克、埃及、黎巴嫩武官曹彭龄，驻叙利而立化参赞王贵发……



凤凰台长王纪言（左一）率众来鸭窝开会商榷未来行程，还给我派司机保镖，好掏走老鸭更多思想。右一是原北京律师协会主席徐家力。

此外提供热情帮助的还有一大帮老外，他们是埃及驻华新闻参赞撒克、伊拉克驻华大使库巴、阿曼驻华大使法西、约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尤素福、尼泊尔驻华使馆二秘塔帕、印度驻华使馆二秘卫古玛、希腊驻华使馆一秘佐衣托斯、伊朗驻华使馆高级文化助理伊扎迪、巴勒斯坦驻华大使萨法日尼、巴基斯坦新闻专员达哈尔……

中国与埃及、伊拉克、印度同属于四大文明古国，是世界大河文明的发祥地。可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到1999年之际，埃及还和邻国有领土纠纷；伊拉克、印度还都被迫卷入不同程度的军事冲突；遥远的中国突然发生“八国联军”“误炸”中国使馆的残暴事件，仿佛100年前《辛丑条约》再现。这不能不说是全人类的悲剧。2000多年前战国时的兵书《尉缭子》上讲过，“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近代欧洲战争也还能正确判断战斗、非战斗人员的区别。根据战争法

则，对那些非战斗人员理应“概不加害”。但想不到文明进化到2000年，科技发达、机械进步，战争竟堕落到以毁灭后方老百姓为取胜途径。

人类有成效的劳动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毁灭一些曾经辉煌过的古老文明。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计算，人类历史一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种已经绝迹，6种正在衰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埃及、伊拉克、印度、中国的四大文明延续时间很长，自古至今从未完全间断过，特别是中国文明发展幅员广大，发展过程曲折复杂，具有罕见的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但除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外，文明古国还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祖先留下那么令人自豪的辉煌遗产，而今天我们的感受却不那么令人愉快？

我在千禧年来临前夕，把我的大吉普从金字塔开到万里长城，就是要呼吁世界从战争走向和平。探寻东经30°到130°广大神秘区域的灿烂过去，用科学、环保、人性的眼光审视历史，重温四大文明古国的往日辉煌，轻装迈向下一世纪。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自己离家越来越远，离太阳越来越近。8年来，我的小屋中堆满各种有关“金字塔-长城”的书籍、地图和梦想，现在我这只涅槃的秃鸭即将带领一群“火凤凰”去迎接21世纪的初升旭日。

以科学的眼光，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

公元1271年，年仅17岁的威尼斯青年马可·波罗在父亲、叔叔率领下，从陆路千难万险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才从海路返回家乡。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不幸卷入战事，被俘后关进热那亚监狱，服刑期间完成《马可·波罗游记》。在他来华的600多年以前，唐僧玄奘法师已经孤身一人跨国旅行，其行为显然要比马可·波罗的团队更为壮烈。唐僧自幼学佛，15岁出家为僧，遍访高僧研习佛

理，云游大江南北。唐僧发现，尽管中国佛教门派众多，但多有谬误，于是立志西天取经。公元629年，由于朝廷封闭不予批准，唐僧孤身一人偷偷上路，十几年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成为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三藏法师。公元645年，唐僧将佛经657部、舍利子150颗、三尺五寸金佛一尊和多种花果种子带回中国，唐王李世民亲自在洛阳摆驾迎接。但学成归国的唐僧坚决不肯当官，专心埋头译经，把17年经历写成《大唐西域记》。公元664年二月初五深夜，唐僧在工作中圆寂。

我是跟我爷爷长大的，崇尚古老的简单生活。他老人家从小教导我要洞察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要以科学的眼光、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重温历史放眼未来，只有那些对多数人有益的才是文明；反之，凡是对多数人有害的就是野蛮。国家只有凭借科学进化才能达到强盛地步。欲求生存，唯有奋起直追，不可甘居人后。进化要统筹考虑，善于学习，缩减缺点，发扬优点。“去恶就善曰进，舍善就恶曰退。”“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与洋鬼子相比，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金钱。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其自传《我对祖国的职责》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中东地区，可对自己存在的价值缺乏认识。”与这位谦逊的国王相比，我的中东知识近乎为零。我喜欢外出旅行，喜欢拜访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尘封的城市，因为城市是人类的杰作和栖息地。我喜欢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寻找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将其记在脑子里，闲暇时拿出来一点点反刍品味，窃以为这才是逍遥自在的上乘享受。我此行的出发地位于地中海之滨，地中海具有博大的包容精神，孕育了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伟大的文明，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也应该是21世纪的精神。创立历史学的希罗多德2000多年前在埃及感慨：“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古希腊供奉缪斯神的地方MUSE　UM，就是现在英语中的博物馆一词“MUSEUM”。今天，博物馆是人类反思自我、学习科学、感悟艺术、启迪人类继往开来的神圣

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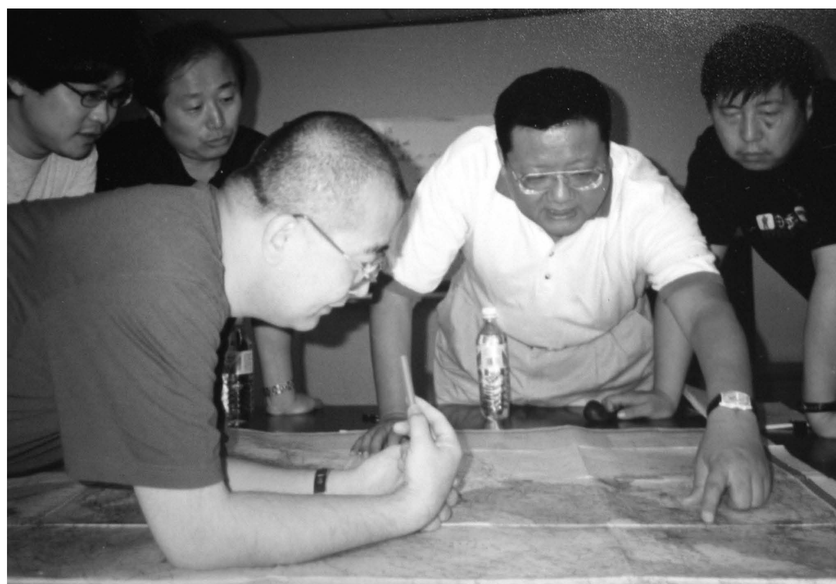
1997年埃及政府郑重发布的《埃及与21世纪》文告宣布：埃及政府要“用开放的头脑和有抱负的思想，敲开21世纪的大门”。文告指出，由于当代世界变化神速，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已经促使经济与社会体制发生迅速变化。这就要求各国人民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逐渐趋向一体化。地球已经日益变成一个小村庄，村中的所有居民都必不可免地在一些共有的规则下竞争生存。文明古国如果不为明天作好充分准备，就会变得日益僵化，脱离时代步伐，远离世界中心，最终被现代文明所抛弃。公元2000年是百年之交、千年交替，我们已经错过了文艺复兴，也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现在文明古国的子孙应该以泱泱大国之风热情参与。

某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1999年7月24日，我和两个师弟到北医三院看望因肺出血住院的任彦申教授，任教授是北大党委书记，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托任教授帮我办两件私事：一个是请他帮我办个手续，万一我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请他把我的死尸献给北大医学院解剖，我害怕北京现行捐献的烦琐程序；再一件就是万一我受伤、残疾，不能再当新华社记者，请他在母校北大给我留个教员位置。1998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纪念北大百年华诞”晚会上曾经当众感慨：“如果我没上北大，新华社决不会要我！”我一直把新华社看作是我这棵小草枝长的叶，北大才是我的根。我酷爱远行，也深知没有危险的生活不会有生气，所以要求自己实事求是。1996年我独自驾车环绕美国时，发现现实的美国人把生死看得很达观，所有驾车者领取驾照时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发生车祸出现不测，如何处理你的尸体？”领驾照者只需在指定地方做一个两毫米的记号，就完成了捐献手续，简单易行。我自然很乐于把自己献给需要我的美国人民，当即在驾驶证上表示愿意捐献自己尸体。最近，早稻田大学校长奥岛孝康提出“全球地方思

想”（GLOBAL），即以地球居民的眼光办好自己家乡的事。重申早稻田创始人坪内逍遥“自恃、自信、自省、自责”的教育宗旨，即凭借自己实力、相信自己能力、时刻自我反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想人生最高境界也不过如此而已。

7月30日上午，凤凰董事长刘长乐在“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策划会上发表讲话，说我的“金字塔-长城”是雪中送炭，会使凤凰卫视在各方面得到巨大提升。他慷慨激昂地讲道：这是最热门的电视频道迄今为止最宏伟的现场报道计划。合作伙伴是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著名记者唐老鸭，参加主持的有最醒目的凤凰明星。这是全球华人最强悍的工作班底，使用最先进的传播手段，进行最直接的现场直播。决不同于CCTV录播的《话说长江》、上海东方台录播的《飞跃太平洋》。这是首次货真价实的直播，使用海事卫星每天直播不低于15分钟，并持续播出三个多月。这次走的是一条最漫长的采访路线；使用最精良的海事卫星设备、最新式的对编机；报道目标是最悠远的文化、最神秘的生存空间、最富争议的敏感地区、最危险的旅途；由于选择了最恰当的历史时期，千禧年和百年交替，又是龙年的开始，理应是最精彩、最复杂、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报道。报道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报道内容覆盖五大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



凤凰董事长刘长乐自称面慈，心善，佛相，屈尊驾临鸭窝，目光如Minox将老鸭的世界地图拍进大脑。

我这才知道凤凰卫视计划派出它的“六大花旦”跟随我在漫漫旅途中做阶段性现场采访：杨澜负责希腊，许戈辉负责埃及，陈鲁豫负责以色列和伊拉克，曾静漪负责伊朗，李辉负责印度，吴小莉负责中国境内。这一来弄得我十分紧张，担心这帮淑女会束缚我驰骋的想象力，失去老鸭天马行空的闪击风格。

大自然是人类生命、心智、情感的唯一源泉，生命在于运动，我渴望大自然。想到这儿我的魂灵已经飞出凤凰会馆的会议室，飘向遥远的中东，沙海茫茫、烟雾腾腾，远处是残阳如血的大漠落日。我仿佛飞回耶路撒冷，看到2000年前鲜血淋漓的耶稣正背负十字架沿多洛罗萨大街走向髑髅地，这条被耶稣鲜血染红的石板路从罗马总督府一直通向耶稣被处死升天的地方。升过天的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之后曾经访问耶路撒冷，他问陪同的以色列考古学家本·杜夫：“当年耶稣真的从这里走过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激动地

说：“我此时的心情比踏上月球还激动百倍。”

我已经先后四次前往耶路撒冷，而且马上就要开始第五次。我至今记得1991年海湾战争正酣之际，我第一次沿多洛罗萨大街走向圣殿山的情景。当时我耳边回荡着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一段名言：“休斯敦！登月舱‘鹰’号已经着陆。某人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The Eagle has landed …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今天，跨世纪的2000年前夕，我走在耶稣走过的石板路上，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古老、最封闭大国的代表，我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就是5000年文明古国改革开放迈出的一大步。

最黑的一天

文明和野蛮掉了个儿

耶稣在创立公元纪年后的某个13日被犹大出卖，那天恰逢星期五。从那以后，人们总是尽量躲过13、星期五这些不吉利的“黑暗日子”。1999年8月13日赶巧又是星期五，那天清晨我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滑倒，摔得我1.83米、90公斤的胖大躯体仰面朝天动弹不得。我老婆急忙找人把我抬到附近的中铁建医院，我的左腿表层组织血肉模糊，右腿踝关节严重扭伤。医生说很难见到两条腿同时这么五彩斑斓的病人。从X光片上看，我踝骨外侧的间隙比正常人大半个多厘米，这是12年前在秦岭拍摄大熊猫摔断韧带所致。

就在此前24小时的8月12日中午12点，当年和我一起追拍大熊猫的北大教师李进军在八宝山火化升天。我没有像其他亲友那样向遗体献花，只把自己当月的工资塞进埋在我怀里失声痛哭的李大嫂的衣兜里。李进军是我1988年在秦岭结识的刎颈之交，1995年还和我在神农架寻找野人……他是我投身野外科考以来，第五位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知心朋友。眼看着兄长胖大的尸骨浓缩成一抷黄土，纯洁的灵魂化作缕缕轻烟，我突然感到生命之轻……

摔腿的那天子夜，我在噩梦中看见有人企图偷走吉萨金字塔，群情激愤的阿拉伯兄弟根据伊斯兰法律，群起而上，准备就地剁掉他的双手。念我佛慈悲，我奋不顾身冲上前去竭力阻止，这才使那双颇具艺术气质的长手免遭处罚……

就在我躺在床上坐井观天、强忍双腿表皮组织到踝骨深处的立体疼痛之际，我突然被凤凰台长告知，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新华社摄影部已经不再是合作者，凤凰卫视只需要“利用唐师曾先生具有的丰富知识储备和人脉关系促使本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计划已经改为“千禧之旅——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内容：“唐师曾＋一位内地知名女星或名模穿越四大文明古国。”继而蜕变成“千禧之旅——从巴特隆神殿到长城”“跨世纪之旅——从巴特隆神殿到长城”“千禧之旅——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要我演唱主题歌，沿途演出四场晚会，刘德华、柯受良、刘晓庆等明星同台登场，还要邀请小燕子。最让我恼火的是沿途雇佣司机，汽车海运、空运、人员乘飞机绕过危险地区……我认为这些商业炒作、电视剪辑欺骗观众的做法已经离我的“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计划相差甚远。同时我也很担心这种背叛会破坏与外交部、新华社的友好合作，让我言而无信对不起朋友，无法面对我的百万读者。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曾经说：“我想知道人类由野蛮进到文明每一阶段的详细情形。”想不到短短几个月里我却亲身经历全过程，只不过文明和野蛮掉了个个儿。

跨世纪的“君子一言”

实事求是地讲，凤凰卫视是我众多合作伙伴中的另类，在祖国内地它往往以境外媒体面目出现，可我所知的“境外”却看不到它的存在。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沿途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官员中就有人问我：“唐老鸭怎么带来一个‘鸟电视’？”（What is a bird TV?）我解释说：“鸭子也是鸟。我的‘鸭’在中文里写作‘甲鸟’，就是天下第一鸟！”

作为个人，我欣赏凤凰卫视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但作为职业记者，我对其所谓的“商业运作”极不适应。此前不久，我意外地发现，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凤凰卫视竟然把《我钻进了金字塔》一书中我和阿拉法特、加利、拉宾等人的亲密合影，印到凤凰卫视的招商广

告上。拉宾是我崇拜的四次中东战争的英雄，我做梦也不敢想他死去的英灵竟被人拿去牟利！我暴跳如雷地朝凤凰一通咆哮，严厉指责他们连起码的外交常识都没有，把各国元首肖像用于商业目的，不仅影响我“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行动，还会破坏中国与中东各国的良好关系。

主持人

• 唐師曾
—新華社主任記者
—其著作："我鑽進了金字塔"及"我從戰場歸來"久居中國最暢銷書籍排行榜前十名
—當代傳奇人物

我钻进了金字塔

www.phoenixtv.com

唐師曾

客戶千載難逢的機會

• 參予這個跨國探險之旅
• 贊助探索隊伍
• 成為這史無前例旅程的一份子
• 透過這旅程，將你的品牌從這世紀帶進下一世紀

節目製作

• 鳳凰台過往精彩節目製作：

專題節目：
—歷史性的超越 —【飛越黃河】
—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
—連續七十二小時現場轉播香港回歸實況
—中美半生緣（"飛虎隊"）
—現在 ... 「千禧之旅」

www.phoenixtv.com

不伦不类的“商业运作”使我确信，我播下的龙种已经孵出了跳蚤。

由于相信凤凰台长王纪言“跨世纪的君子一言”，1999年8月20日的《北京青年报》、8月31日的《北京晚报》分别用一个整版报道我和凤凰的“强强合作”。上海《新民晚报》所属的《新民周刊》、南京《都市文化报》、四川《华西都市报》等也作了相应报道。

路透尝言：“最好的记者是干通讯社的。”新华社记者代表国家折

冲樽俎，不仅在诡谲多变的国际风云中积累了特殊的工作经验，还培养起超乎常人的职业敏感，我深知新华社记者在国际政治中的象征意义。作为国家通讯社记者，新华社为我提供一切生活方便，我不必为每日三餐蝇营狗苟。坚实的生活保障，确保了精神上的创作自由。我一直认为记者的良心分量应该大于其他职业，虽然记者不是专家权威，但由于职业赋予的特殊使命，尤其切忌信口开河。

我发现辅助我设计节目的这位港兄，对中东各国情况不是所知无几就是一窍不通，满脑袋装的全是些不合情理的奇怪念头。他甚至不理解“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所经过的国家是文明、科学、幽默、文化、宗教等的发祥地，而是执意要把我的大吉普变成娱乐搞笑的汉堡包。此外，我对凤凰卫视配给我的“女名模”十分恐惧，认为他们给我设计的一些噱头如“大波妹在回教国家憋得没处找洗手间，唐先生趁机从旁捉弄，使花容失色……”不仅有悖伊斯兰教传统，而且对柔弱女子也过于残酷，颇有性歧视的色彩。我当即郑重说明：“即使从一个纯自然人角度讲，我这人也素来怜香惜玉，肯定对憋坏了身子的女人下不了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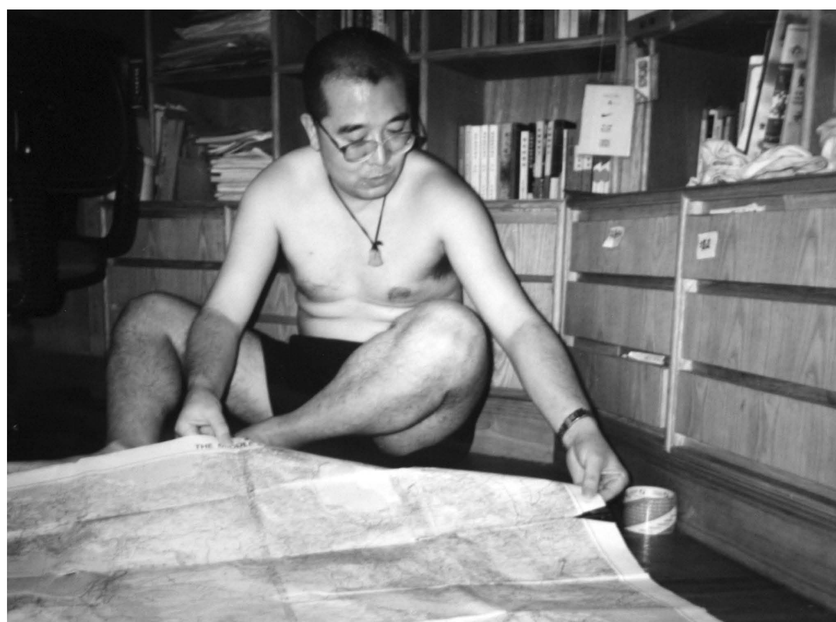
至于“台湾人在国外生活得很好，大陆人在海外艰难打工”的插科打诨更是无稽奇谈，据我所知，在中东的大陆人和台湾同胞过得同样滋润。金字塔下最火爆的餐馆老板王珂就是改革开放的四川辣妹，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吴思科当过埃及公使，可以证明我说的全是真的。我把这些无聊的商业搞笑看作是对我的人格侮辱，“我播下的是龙种，而孵出的却是跳蚤”。我的声誉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不想做廉价电视节目的三流道具。

从“路虎”到“丘八”

尽管我的情感大受伤害，但毕竟和凤凰有过“直播金字塔”的合作，特别是凤凰最高领导一直表现出惺惺相惜，弄得没见过大世面的

我受宠若惊，以致投鼠忌器。我讨厌三流商人的唯利是图，把本该温馨的合作降到最低点，相信凤凰台长“一切错误全部是董事会某些人的错误认识所致”，等待他“立即纠正手下的不妥之处”。可酒过三巡，他又反过来抱怨自己权力有限……坐在一边旁听的《中国日报》陈雄当即嘲笑我：“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唐老鸭发现‘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商人发现了谁能卖钱。”

多年来我一直把“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看作是自己呕心沥血的孩子，我愿把我的血肉当作四海开花的美丽种子。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新华社记者，我把自己看成是把撒哈拉和喜马拉雅缝到一起的一根针，我的大吉普是联结四大文明古国的人与自然、历史与现代、战争与和平的一根线。我和我的大吉普必须经历4个月的炼狱煎熬，历经夏、秋、冬3个季节，碾过4万多公里复杂地形。



生活和我开了个大玩笑，但一百个磁铁指南针也抵不过一个男人的决心。

据驻港部队陈知庶副司令介绍，喜马拉雅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体每年仍在以1毫米的速度上升，板块挤压塌方不断，许多公路每年修3个季度，通车不到1个季度，一流的汽车性能是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重庆警备区陈知建副司令已经通知西藏军区：“给唐老鸭一切必要的紧急支援！条件是唐老鸭一定要坚持开回祖国境内。”其气势仿佛其父陈赓大将下达战斗命令。可令我恼火的是，就在凤凰台长反复征求我的意见之后，港方经理却把我的坐骑一换再换，从一开始的路虎（Land Rover）到陆地巡洋舰（Land Cruiser 4700）、到丰田路霸（Prado 3200）、再到五十铃丘八（Isuzu Trooper）……也许下一步就要换成三轮摩托“狗骑兔子”。生命的存在第一，生命的感觉次之，战士理应知道自己武器的详细性能。而一直到快要出发，我连随我远征的坐骑的照片也没见过。果然如中国律师协会副主席徐家力预料的那样，王台长拿走“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就不再露面，以往三天两头往我家跑的一个大活人突然泥牛入海，甚至连我的电话都不再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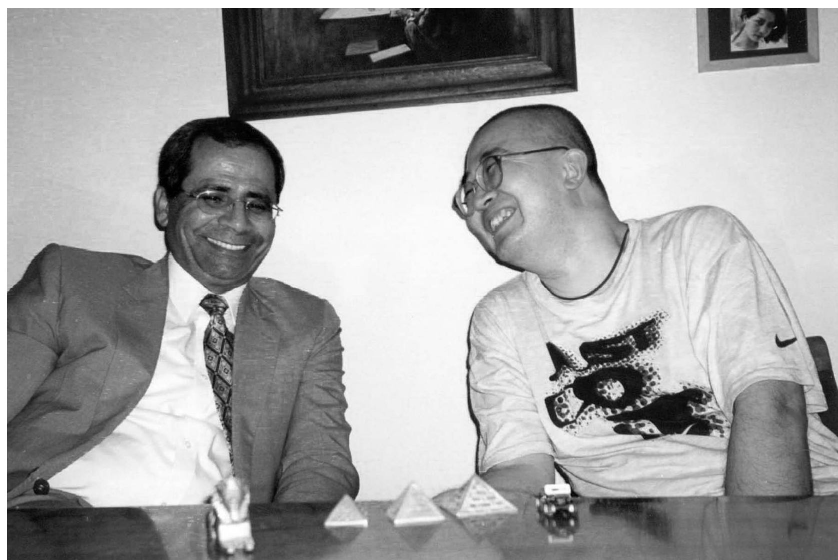
就在我的坐骑性能日渐衰退之际，没毛鸭子的凤凰尾巴却越长越大，中央电视台《瞬间世界》制片人告诉我，她亲眼看到著名歌星刘德华坐在那辆即将陪我远征的“丘八”上载歌载舞。除凤凰自己的“六大花旦”外，据说还要邀请柯受良、小燕子们在某些特殊阶段“飞入”老鸭的队伍。我对刘德华先生的声乐造诣素来敬重，对柯受良先生的勇敢飞黄、小燕子的倾城倾国更是仰慕已久。只担心我天马行空的龙蛇之走，是否承载得了那么多的千金之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我一直自诩具有沙漠犹太人才有的“忧患”和“选民意识”，即使身处危机四伏的死亡之地，也能牢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首古老的犹太歌曲*This Land Is Mine* 这样唱道：“这土地是我的，是神给我的……尽管我孤身一人，但与神同在，将所向无敌。”我喜欢这支歌的大无畏气魄，与我同在的神就是我的千百万读者。海湾战争期间每

当灾难降临，我都会用尽各种方式表明我的中国身份，我来自人类最大的种群——有令人咋舌的12亿人口的中国，我的国家拥有联合国至高无上的“一票否决权”。

也许就因为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民族气魄，才赢得其他地球居民对“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尊敬。看到《北京晚报》介绍我的报道后，日本佳能公司要求“为唐师曾提供佳能相机，不要任何回报”；美国摩托罗拉通过媒体找到我，主动提供铱星电话：“希望铱星电话能伴随唐先生一生，摩托罗拉不以此谋求任何经济利益。”柯达公司市场开发副经理苏立钢先生怕我腿伤行动不便，亲自把最新型的柯达胶卷送到我的宿舍。豪华的赛特集团决定为我这只蓬头垢面的秃鸭制装，“欢迎唐先生来赛特挑选所需的任何装备”。埃及驻华使馆文化新闻参赞撒克先生亲自开车到我家中探视我的腿伤，希望我尽快痊愈，因为埃及的报纸已经开始爆炒“唐老鸭从金字塔到长城”了。



埃及驻华新闻参赞撒克老兄，陪我畅想金字塔到万里长城之旅，把三个金字塔和斯芬克斯摆上老鸭餐桌。

今天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得益于他们祖先的勇敢勤奋，高山敢攀，深河敢漂。与西方相比，我们民族往往读书者多、勇敢者少，懂科学的勇敢者更少。我们境内的高山大川，纯粹被中国人自己征服的并不很多，科学意义上的征服则更为稀少。就在美国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整合世界向外星球拓展的同时，我也想以自己的体力、知识和领悟力，向世界展示华人的聪明和勇敢。虽然今天12亿中国人还挤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我们完全可能在下个千年向外星球拓展生存空间。

北大校长罗豪才访问埃及时曾经对我感慨："唐老鸭'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是跨越时空的遨游。"《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的题词"天马行空——唐师曾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概括了我的一贯作风。季羡林老先生开始担心我即将踏上不归之路，忧心忡忡地打来电话让我老婆"要让唐老鸭周围的人把他的生命放在重中之重，不要为他人做无谓的冒险"。装甲兵少将许延滨提出给我派随行军医。感激之余，我深深体会到长辈对儿女远行的拳拳之心。在此我想引用好友曹彭龄将军1999年8月20日写给我的一封信：

师曾：

你好！衷心祝愿你"梦想成真"，去实现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壮举。不过路途遥远又艰辛，你也不是当年年轻体壮，企望沿途多加小心。我们会时刻关注你，为你祈祷！我想起年轻时我的一位老师、叙利亚著名作家哈吉姆·哈吉即将远行，我们按穆斯林的习惯对他说"真主与你同在"，不料他摇摇头，笑着说："不，不是他。是你们与我同在。"他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并不笃信宗教，却珍视友谊。我想说，无论在哪段路程上，在哪片星光下，祖国人民、广大读者、像追"星"一样追逐你的少年少女们都与你同在！多多保重！

下面把你沿途可托付的朋友们的姓名、电话抄给你，需要帮助时，尽可以请他们协助。

接下来是我国驻十几个沿途国家武官的详细通讯地址。

1999年9月9日，凤凰台长派人送还我的护照，该护照在凤凰卫视手中滞留一个多月，上面没有任何签证。显然，我这个“唯一总策划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被聪明人狠狠策划了一把。与此同时，凤凰阵容庞大的“××之旅”按照鸭蹼划过的痕迹坦然上路。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几个月前凤凰台长所谓“跨世纪强强合作”的含义，我被王台长按在2000年的门槛上，跨世纪地“强”了一把。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尽管在12亿中国人中我算不上优秀，与凤凰派出的淑女们相比更是粗鄙不堪。但我坚信我是莽莽沙漠中的佼佼者，因为地球上最完美的生物就是男人，一百个磁铁指南针也抵不过一个男人的决心。与我的合作伙伴相比，我判断每件事的唯一标准就是好玩，决不屈从经济利益，由此获得最大的自由。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国际歌》“让思想冲破牢笼”，使我脑袋里萌生的灵感如恒河沙数，每颗沙粒都拥有各自的灵魂。多年来我一直爱惜名誉胜过生命，我最重要的名声就是无所畏惧。现在我要把我的“无所”再次投向正确的方向，用双腿负载着自由的灵魂肆意遨游，用自己所长脚踏实地地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使我的民族在世界各地受人尊敬。



重返巴格达

生命中最华彩的一章

“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被狸猫换太子之后，我两眼冒火欲哭无泪。我气呼呼地关了灯，迷迷糊糊摸索着走进自己的卧室，和衣躺在床上，泪水夺眶而出。病体由于激动而更加虚弱。我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凝视天花板，谢绝了中国律师协会副主席徐家力、中国作家协会版权委员会张树英等帮我讨回公道的建议。法院只能对此给经济补偿，而金钱对我这个白血球、血小板不足常人一半的病人并不重要。301医院血液科军医王永平到我家警告我：再这样下去小命难保。于是我开始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吃饭，颤抖的手把菜汤洒了一桌子，桌上铺着凤凰台长刚派手下还回来的地图。看着面前一片狼藉，我忽然想起老爹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话：“世界随时都在毁灭每个人，就在那些毁灭的地方，往往站起许多强者。”我狠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满脸的络腮胡子告诉我，自己还是个男人。

我这人生来一张屡教不改的大驴嘴，命中注定干不了大事。兵法云“兵行诡道”，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一度打败以色列，就得感谢当时埃及空军参谋长穆巴拉克，因为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笃信“一切胜利，依赖于严格保密下的持续的闪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情报局长海纳里斯将军反复教导手下情报人员：“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就不是秘密了。”结果他自己却为人事机密，最后被希特勒处决掉。

尽管我一再因言获罪，吃了不少心直口快的亏，作为装甲兵上校

研究员，我也深谙保密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实践中我从事的采访，大多是前无古人的准军事行动，但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我还是习惯对我的读者坦诚相告。

不久前，我到缅北“金三角”地区了解罂粟替代种植情况，在边境上与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联络处处长董胜不期而遇。董胜是一级警督，鼻子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手投足仿佛《渡江侦察记》中的情报处长。作为资深情报官员，又是国际上著名的“金三角问题”专家，董处长对我这个臭名远扬的“鸭嘴记者”充满戒备。因为不久前，一些媒体对滇缅边界和境外“金三角地区”不负责任的炒作，给边陲的改革开放带来不少麻烦。就连境外“金三角地区”的外国弟兄也对“不负责任的记者”咬牙切齿。我碰到的某国某高级将领，几次弦外有音地提醒我“那些动机不良蓄意编造的记者，他们的下场只有死”。作为一名闯荡江湖的摄影记者，我对这位长官的看法和能力毫不怀疑。

为打消疑虑，我首先肯定我和“董兄”之间的共同之处：我们都写文章，也都拍照片，都是信息的寄生虫。其次才是我们彼此间使用资讯的差异：董处长是警察，通过情报控制犯罪，所以遇事首先强调严格保密；而我是职业记者，我的天职是尽量客观、翔实、快速地传达信息，把真相大白于天下。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重复我10年前在海湾前线领悟的一段旧话：“要让我的人民知道世界上正发生什么。”（见《我从战场归来》自序）

说到10年前的海湾危机，我总忍不住浊泪潸然。那是我生命中最华彩的一章，当时我还不到30岁，还没尝过和女人同居的滋味，我很担心自己就这么未经人事地夭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不能对不起我奉行传统的爷爷。

我30岁的“成人大PARTY”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高楼顶层防空武器丛中举行的。那天有好几枚“飞毛腿”划过夜空向我鸣炮祝贺，我活这么大从没看过那么大的焰火。从此我“三十而立”，摇身一变成了新华

社驻外记者中最年轻的主任记者。

哪来的“鸟”电视？

说来惭愧，10年过去，我不仅寸箭未长原地踏步，某些方面甚至越活越抽抽，但我依然快活。我在失去健康、勇气、机会的同时还给他人带来灾难。

首先向我提出抗议的是阿拉伯国家使团副团长、文化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大使萨法日尼，他一上来就破口大骂：“你这只鸭子怎么搞的？你的‘凤凰’怎么在伯利恒宣传以色列治理得好？还挥舞以色列的旗子！我要向你们提抗议！”



阿拉伯文化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大使萨法日尼（左）、伊拉克大使库巴（右）等阿拉伯外交官批评“唐老鸭引荐害群之鸟”的罪行。（王淳华　摄于1999年12月）

萨法日尼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是我多年的同门师兄，话无遮

拦情同手足。上北大前，他一直在中东打游击，绰号“铁锤之父”，还当过阿拉法特的大保镖。能把我师兄气成这样，决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我低眉顺眼地让大师兄发完雷霆之怒，这才小心翼翼地解释此事确实与我无关，因为我早就和圣地一起被出卖了。说出卖还不准确，因为整个过程没拿一分钱，属于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一样的“强占”，中国老话叫“鹊巢鸠占”，就是一种鸟的窝被另一种鸟抢了。凤凰台长“强暴”我的当天，埃及文化新闻参赞撒克就在我家里，撒克参赞可以证明我的清白。我对师兄萨法日尼重复当初在饭桌上对凤凰背诵的马克思语录：“我播下的是龙种，而孵出的却是跳蚤。”

当天，萨师兄聚集几位阿拉伯驻华大使在“一千零一夜”饭店愤怒声讨我的罪行，因为这一切都是“鸭子这只坏鸟引起的，不然怎么会冒出‘鸟’电视”？最后还是使团公认的绅士——伊拉克大使库巴出来为我解围，尽管阿拉伯国家都被“换太子的狸猫”骗了：“唐老鸭虽有失误，罪责难逃，但还属于阿拉伯兄弟。”

于是萨师兄又恢复我的合法席位，授权我重新组织一个记者团前往中东，继续我的梦想。但这次必须严格审查成员资格，只限兄弟，不要飞禽走兽。随后海湾国家阿曼驻华大使法西让我翻译《阿曼苏丹国的2000年》……我这才得以重返阿拉伯怀抱。

从阴影里站起来

2000年4月5日黄昏，伊拉克大使库巴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晚上是否有空，说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来了，希望见见我。习惯共享新闻线索的我立即给当年开罗的老搭档——新华社国际部中东编辑室主任刘顺打电话，问他是否想见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刘顺曾常驻伊拉克，是新华社的伊拉克权威。刘顺说他已经获悉伊拉克部长来访，还告诉我这次给部长当翻译的是文化部的一个“小眯缝眼翻译”。我闻言大喜：在中国讲阿文的“小眯缝眼”恐怕只有小石。

小石是文化部外联局阿文翻译，曾在埃及使馆文化处工作，8年前就是我一丘之貉的酒友。1998年5月26日，小石前往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文化处上任时，在伊拉克“死亡之路”遭遇车祸，脾脏粉碎，所以到现在都不能喝酒，而且一听“伊拉克”就有生理反应。

拨通小石的手机，这小子正陪伊拉克代表团吃晚饭。听说是“鸭哥”呼唤，立即详细汇报伊拉克代表团行程，自此保持和我的手机热线联系，每30分钟汇报一次。

4月6日上午，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部长胡马姆·阿卜杜·哈利格博士在库巴大使陪同下参观新华社，会晤新华社副社长南振中，我在一旁拍照。胡马姆部长在社领导面前两次用阿文夸我，只可惜社领导不懂阿文。

饭后陪同伊拉克代表团返回贵宾楼，发生了一件小事，颇令我感动。

按外交礼节和国际惯例，所有来访代表团在华期间，都能享受一笔数目不大的零用钱。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使者，包括欧美客人无一例外。据我所知，五湖四海的来宾大都笑纳主人的好意，而伊拉克代表是我知道的唯一说“不”的国家。胡马姆部长坚持：“我们感谢主人的好意，但我们的传统是不拿兄弟的钱。”

伊拉克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油水”的富国。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大河穿过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底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田。海湾危机以来，近10年的国际封锁使伊拉克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巴比伦的后代坚强不屈，与我们祖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不谋而合。

出于古老的礼节和对伊拉克人民的尊敬，小石总想向客人送点礼物表示心意。机会终于来了，小石发现，胡马姆博士对楼下商店的香炉很感兴趣。这是一尊微笑的弥勒佛，肚子里插香，嘴里吐烟。胡马

姆博士经过砍价，似乎还觉得有些贵。小石见状自作主张把香炉买下送给胡马姆博士，可胡马姆博士一直到上飞机也不肯接受。因为礼品贵重，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说到这里我两眼发酸，因为当今世界如此严于自律的政治家已属凤毛麟角。

胡马姆部长回国不久，就通过库巴大使邀请我，“希望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勇敢记者旧地重游”，看一看今天的伊拉克。德高望重的库巴大使立即亲自为我的私人护照做签证，并免收签证费，还在私人护照上注明“唐是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的客人”，要求边境海关“给予照顾，行李免检”。



小石自作主张把香炉买下送给胡马姆博士，可胡马姆博士一直到上飞机也不肯接受。因为礼品贵重，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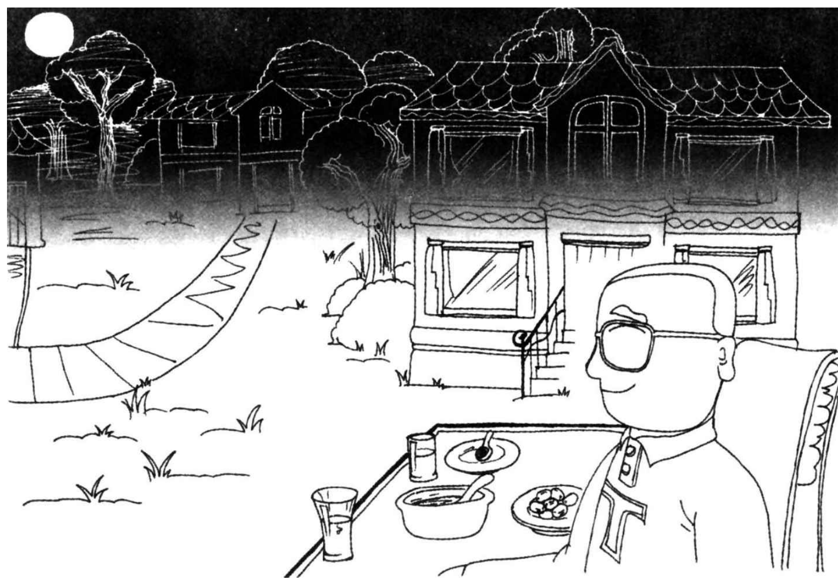
消息传出，海湾战争给我很多帮助的原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再次出山，通知他沿途的朋友，尽力“确保病鸭子平安无事”。外交部礼宾司长鲁培新亲自光临寒舍，在我的书桌上给驻莫斯科大使武韬、公使王凤祥写信：“今有一事拜托，我的朋友唐师曾途经莫斯科……请帮

助解决。”

消息灵通的西格玛图片社总编帕皮斯从纽约通过新华社特稿部转告我：他们“始终对巴格达的所有事物感兴趣，特别是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设施”。我对给我传话的同行说：“我感谢外部世界关注伊拉克，但我担心有人会轰炸美丽的巴比伦。我必须确认我的照片只用于新闻目的，而不是其他。”

我一路蹦跳着为中东之行作准备，亲眼目睹我从痛苦中恢复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祖根在食堂二楼感慨道：“鸭子终于从凤凰的阴影里站了起来。”

出发的前夜，伊拉克大使库巴夫人在官邸为我做饭饯行，眼泪汪汪叮嘱我：“乖孩子要安全去、安全回。再来吃我的阿拉伯饭。”



我嚼着甘甜的伊拉克蜜枣，坐在伊拉克使馆官邸的草坪上欣赏树尖的明月。万籁俱寂，时光倒转，我仿佛又回到10年前孤身前往海湾的那个夜晚。

我嚼着甘甜的伊拉克蜜枣，坐在伊拉克使馆官邸的草坪上欣赏树尖的明月。一阵清风吹过，我恍然发现北京、开罗、纽约、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月亮原本就没有任何区别。万籁俱寂，时光倒转，我仿佛又回到10年前孤身前往海湾的那个夜晚。

死亡之路

上帝的思维也是跳跃的

佩雷斯在《新中东》一书中写道："我们正处于一个罕见的关键时刻，它迫使眼光敏锐的政治家进行跳跃性思维。"历史上的犹太人由于智慧被誉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佩雷斯曾经两次当选以色列总理。能两次担任犹太总理者决非等闲之辈，我猜佩雷斯的个人悟性决不在爱因斯坦、马克思等犹太同胞之下。

20年前我在北大当学生时，就沉溺在"跳跃性"的胡思乱想之中。由于读了过多的二次大战历史，我把自己当成"沙漠之狐"隆美尔。为实现梦想，我每天刻板地饮食起居，准时围着圆明园长跑。在找到38军坦克6师，吃了两个包子一碗鸡蛋汤之后，被礼貌而坚决地送出了军营。尽管生活上我屡遭重挫，可痴心依旧不思悔改。受伤的大脑不断地短路、变频，很快从坦克军官"跳"到战地记者上。有人把我的"跳跃性思维"看成脑神经短路，濒临精神分裂，可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思维也是跳跃的。

10年前我奉上帝旨意，从可可西里雪山跳到中东沙漠，以装甲兵学院上校研究员的身份在阿拉曼拜谒隆美尔。我还在海湾战争前夕潜入巴格达，以战地记者身份约会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战争。多年来，"跳跃性思维"使我屡吃苦头又获益匪浅，一直到现在我还热衷一切和跳跃有关的户外运动。报刊由此经常跳跃我的名字，貌似事业有成吃穿不愁。可他们不知道打针吃药使我的工资所剩无几，这是多年透支生命的代价之一。存钱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生存方式，可像我这样

生命无多者已无需为明天忧心忡忡。芥川龙之介曾经说：“人生犹如一盒火柴，严禁使用是愚蠢的，滥用则是危险的。”生命的全部奥秘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

随着海湾危机10周年悄悄临近，我敏感的战争神经又蠢蠢跳动，本能地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伊拉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早在6000年前，人类就在两河流域构筑城市、发明轮子、修建沥青路、创建灌溉系统、使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古巴比伦人还将各种法律编纂成书，形成人类第一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完整复杂的社会结构，甚至比古埃及文明还早1000年。

进入近、现代以来，拥有石油、水资源和古老文明的伊拉克不断被异族侵占，陷入永无宁日的战乱之中。数百年民族冲突和反征服战争，使伊拉克民族培养起强烈的自尊和好斗的个性。伊拉克一直把海湾战争称作“战争之母”，认为“伊拉克打败世界上32个军事强国”。联合国制裁伊拉克已经10年，我血迷心窍地想再次前往巴格达，亲眼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年轻时的历次冒险截然不同：10年前我不满30岁，拥有大牲口般的健康，天真幼稚、热情奔放、淳朴如泥、清亮如雨；如今我人到中年，秃头、瘸腿、血液败坏，靠药物和新华社劳保工资苟且地活着。10年前我孤傲、任性、激情似火，由于反对上级撤离巴格达的命令引发希腊式的悲剧冲突；如今我低眉顺目，已经习惯尊重各路权威。10年前我是请命而去，持公务护照，花公家美金，有恃无恐；如今我用普通护照，花自家美元，靠个人魅力以民间身份战地重游。10年前替我担心的有鬓染霜雪的父母，如今还搭上我老婆……

I Shall Return

2000年5月18日，我第五次前往巴格达，由于掏自家腰包，我选择最便宜的“北京－莫斯科－安曼”航线。为我送行的《首都机场报》

总编华铁、《中国民航报》记者刘建峰，都很为这条廉价航线的安全担忧。我故作镇静地重复麦克阿瑟1942年撤离菲律宾时的豪言壮语：“I shall return（我一定回来）！”就在我起飞的同时，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的豪华专机在同一机场降落。



1990年12月赴海湾前夕留影。照片作者黄文9年后采访了科索沃。

俄航舱门砰然关闭，祖国被关在窗外，四周是北极的寒冷，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油然而生。放眼四顾，机舱内阅读灯、安全通道、卫生间等标识仅限俄文，充满了超级大国的霸道气势。和我同机的还有一位挂满勋章的库巴索夫，属于“新沙皇”中苏交恶时代的老外交官。库老1951年来华学习中文，以后在哈尔滨、北京搞外交，官至驻华公使。这次来华是作为罗高寿大使的私人客人，纪念“5·9”反法西斯胜利日，我们很高兴能找到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

传说俄航飞机都是整天失事的图-154，但现实中的俄罗斯早已今非昔比。从彼得大帝就盼望全盘西化的老毛子目前飞美国的航线全部

飞机都是最新式波音-767，提供头等舱、公务舱、普通舱三种服务。此外，还有A-310空中客车直飞华盛顿，正快马加鞭地奔向资本主义。至于飞墨西哥等美国邻邦则使用新式的IL-96。图-154作为社会主义的传统产品，只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

在莫斯科机场转机时，我突然发现莫斯科比北京离中东更近，俄国总理普里马科夫曾经就是塔斯社驻巴格达记者，俄罗斯兄弟对中东的关心历来超过我们。现在，莫斯科每周至少有两个航班直飞安曼，机型是老掉牙的图-154。在中国，图-154由于事故频繁几乎绝迹。1995年6月6日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图-154在西安坠毁，全体乘员遇难；1999年2月24日，又一架图-154在温州坠毁，无一人生还……图-154的频繁劣迹让我不寒而栗。

俄航提供的食品也不尽如人意，连喝水也要自己动手，而且连喝两次之后立即遭受恶狠狠的白眼，使人产生干坏事被现场活捉的错觉。坐在我右手的是亚美尼亚商人Araik P．Sargsyan，笑嘻嘻地欣赏我惨遭白眼之后，从屁股底下的大麻袋中摸出法国红酒和我分享。Araik是经济学博士，“经营莫斯科到巴格达的转口贸易”，这次去伊拉克是出口俄罗斯矿泉水，“因为巴格达的水源遭受贫铀弹污染，不能饮用”。这更加重我对伊拉克兄弟险恶处境的关心。

凌晨2点，图-154跌跌撞撞地在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俯冲降落。从机场进城，约旦司机趁月黑风高，开口就要35约第（50美元），足足比该付的多一倍。我在市中心找到一家名叫格兰纳达的小旅馆（Granada　Hotel）好歹住下，这是飞离北京21个小时后第一次在床上睡觉。

“谁让你们去巴格达的！”

1991年3月15日，我在发给新华社的《重返巴格达》一稿中，第一次把“安曼-巴格达”公路称作“死亡之路”，此稿由新华社广为播发，

无数媒体立即沿用了这一说法。当时这一带谣言四起，霍乱、伤寒流行，我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作为首批在海湾战争后重返巴格达的中国人，亲身领略了“死亡之路”。沿途，我们不断躲避弹坑、散兵游勇，慌乱中撞坏车门，由于轧上弹片而轮胎爆炸……死神的黑翼一次次掠过我们的头顶。我在《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两书中简要描述过当时的情况。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伊拉克已经被封锁了10年，“死亡之路”始终是巴格达联系国际社会的唯一通道。10年来，仅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的冤魂怨鬼就多达千人，其中包括泰国驻巴格达大使、印尼使馆一秘，还有斯里兰卡使馆官员一家四死五伤……多年来，许多国家请求联合国允许使节乘飞机出入伊拉克，可美国人却说：“谁让你们去巴格达的！”

1998年5月26日，中国驻伊拉克使馆一辆黑色GMC载着外交官从安曼驶往巴格达。在靠近约旦、伊拉克边境时两个轮胎突然爆炸，汽车以160公里的时速翻滚着冲向沙漠，车身扭曲成一团废铁。20分钟后，拥有沙漠独峰驼和效用直升机的约旦警察赶到现场。在“死亡之路”见多识广的约旦警察以专家的眼光朝破车一瞥，立即断定残骸里不会再有活人。他们用切割机分开车身，从扭曲的废铁中拖出6个血肉模糊的中国人……

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小石就在这辆车上，汽车翻滚的一刹那，他就被撞昏过去。20分钟后，全身是血的小石第一个被警察挖出来，作为全车唯一会讲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他强忍疼痛指挥警察把受伤的司机、机要员、二秘、随员，还有自己骨折的老婆送往急救中心。

小石把所有伤员送进医院才疼得瘫倒在地，可他神志清楚，口齿流利，连医生也找不出疼痛的原因。侯赛因医疗中心一位经验丰富的古巴医生，抄起一根管子朝小石腹部捅进去，鲜血顺着管子喷射而出。医生说小石腹腔中全是鲜血，脾脏粉碎，失血1000CC的小石当

场昏死过去。

最先赶到医院的是约旦使馆政务参赞黄杰民，黄参赞曾任外交部杨福昌副部长的秘书，见过大场面且勇于负责，当即以亲属名义签字，授权医院做脾脏摘除手术。事后医生告诉小石，如果黄参赞晚到10分钟，小石的小命肯定没了。

说起车祸小石至今毛发倒竖："这绝对是'死亡之路'，当天约旦电视报道了这次车祸。唐外长发来慰问电，约旦外交部礼宾司长对我遇难表示慰问，都以为我死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实行全麻，我什么也不知道。约旦刘大使赶到医院想知道我是不是确实活着，非要和我说话。医生打了一针催醒剂，人是醒了，可差点把我疼死。医生见状马上又把我麻了回去。一直到出院后很久，我还头晕，我一直怀疑是那针催醒剂闹的，可约旦大夫说不是。直到回国后听其他大夫也这么说，我的头才不晕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我才知道自己的脾没了。'脾'在英文里叫SPLEEN，阿文叫TUO　HA　LE（屠哈拉）。当时我只听他们老说这个词，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怕影响康复，我一直以为'屠哈拉'就是大出血。一个月后偶然接到北京一个电话，说小石摘除了脾脏，我这才知道脾没了。人只有一个脾，是身体的血库。我恨死美国人了，没有'屠哈拉'，我再也不能喝酒了。幸亏车祸发生在安曼以东60公里，若再晚一点，进入制裁中的伊拉克，我肯定完了。"

入其国，其教可知

年轻时我历来勇往直前，可这次出发前由于听了小石的遭遇，再加上带着号称照顾我的老婆，心情总有点惴惴不安。在安曼做准备工作时，我把老婆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让北大师兄老鲁、小李陪她去游死海、杰拉什。心想万一路上翻车，也不能让人家姑娘跟我白来一回。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研究了一整天地图，然后开始约会四山五岳的

出租车车主。

“安曼-巴格达”沙漠公路长达1000公里，由于艰险，车主开价从200美元到350美元不等。经左右权衡，我选中了一家名叫AL-DAYAFA的伊拉克公司，原因之一是这家伊拉克公司的开价比约旦公司便宜，而我又偏爱伊拉克人。AL-DAYAFA公司老板自称名叫阿卜杜，他声称自己“经营‘巴格达-安曼-大马士革-贝鲁特’的长途业务已有上百年历史”，可我断定这小子的年纪绝超不过30岁。

我没有对阿卜杜的狮子大口杀价，反而多给他50美元。因为我知道《古兰经》说：“如果要让仆人尽义务而没有权利，就应该付丰厚的报酬。”但我提出车况一定要尽量好，轮胎一定要尽量新。我还掏出和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说我的兄弟们决不希望我死在一辆不合格的破车里。

黄昏，阿卜杜带着另一个伊拉克人来到我的住处，阿卜杜向我介绍这是司机巴桑，也就是这辆“新车”的车主。车是98款的美国GMC Suburban，是Yukon的长轴版，美国外勤特工的标准坐驾，V8汽油发动机，排气量7升，橙白相间的车身像个熟透的大芒果，挂的是伊拉克牌照。Suburban是通用汽车公司“卡车-客车部”的传统产品，V8发动机和修长的车身适合城市间的长途客运。缺点是该车稳定性差，结构松散，车身钢板较薄。目前往来“安曼-巴格达”的大多是这种汽车，1998年让小石丢了一个“屠哈拉”的，也是这种怪物。

“死亡之路”是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用海湾国家提供的石油美元修建的。当时阿拉伯国家和波斯人的伊朗就海湾的几个小岛发生争议，伊拉克自视为阿拉伯整体利益而战，也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这条单向、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宽阔、平坦、单向3～4车道，其中部分路段宽达百米，装有永久跑道灯。所有跑道灯上都铺有加厚的钢化玻璃，可以随时辟作机场供战时使用。



重返巴格达租用的GMC Suburban。（王淳华　摄于2000年5月）

海湾战争前，这条公路把海湾六国和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串联起来，构成阿拉伯国家间的脊梁，是中东地区最繁忙的战略公路。从地中海各口岸的转口货物，必须经过“死亡之路”运往伊拉克和海湾各国。海湾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制裁，这条路成为伊拉克联结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尽管十几年国际封锁使公路疏于维修，但由于建造时精于施工，其钢筋混凝土和石灰稳定沙砾混合结构坚固如初。美国贫铀弹炸开的弹坑显示公路基础结构层厚达2米，这样的超等级公路即使在世界上也是超一流的。

如果说这条路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太宽、太直、太平、太好。每到夏季，中东沙漠气温高达70℃以上，暴晒下的路面温度可达100℃。由于多年战乱疏于维护，尽管石灰稳定沙砾结构层完好依旧，但道路表层的改性沥青老化，沥青中的玄武岩沙砾摩擦殆尽，细料风化，只剩骨料，造成公路摩擦系数增大。由于道路过于平直，所有司机习惯忘乎所以地以150公里时速飞驰，全然不顾夏季中东的高

温。暴晒下的公路和飞转的车轮摩擦生热，任何强烈的刺激都会导致轮胎爆炸。美国飞机炸出的弹坑和炸弹碎片像无数定时炸弹，使这条危言耸听的死亡之路更加危机四伏。



每当我感到心中没数时，都要抓紧一件实在的东西克服恐惧，我习惯的实在之物就是莱卡。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我之所以选择黄昏上路，就是为躲过中东5月骄阳。但夜间行车可能遭遇歹徒劫匪、散兵游勇和反政府分子。尽管如此，我宁愿与人周旋也不愿意与自然作对。一上车，我就把老婆绑在座椅上，自己则紧握手中的莱卡。每当我感到心中没数时，都要抓紧一件实在的东西克服恐惧，我习惯的实在之物就是莱卡。冰冷的莱卡具有灵性，曾随我探险可可西里、经历海湾战争，现在仍要随我进入茫茫黑夜。天才、财富、权势都无法代替亲身感受，亲身感受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我把自己扣在座椅上，把生命交给黑暗，在恪尽人事之后，听天由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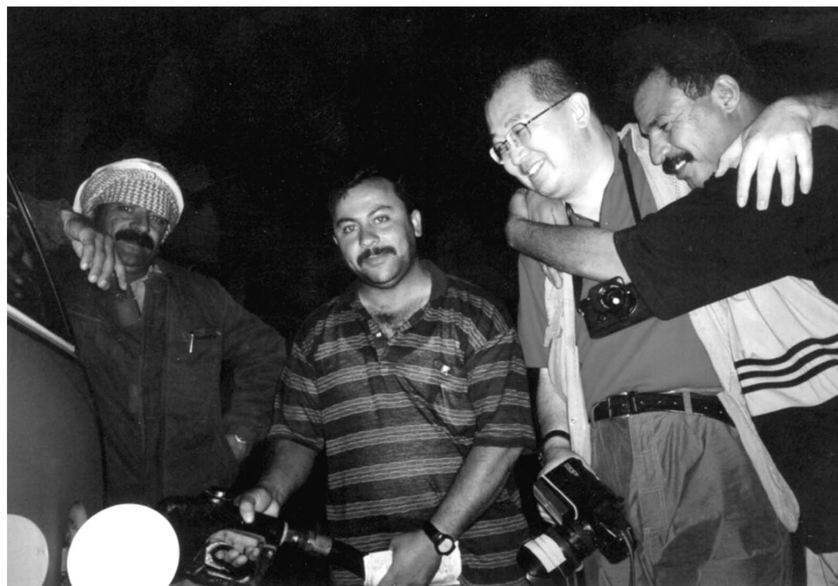
过关留下买路钱

饥饿使人尊严扫地

我被开车的巴桑推醒时，细长的GMC已经悄然驶抵约伊边界。朦胧中极不情愿地揉开沉重的上眼皮，原本漆黑如墨的汽车玻璃开始跳跃橘黄色的路灯……高达丈余的萨达姆画像迎风屹立，就像文革中无处不在的毛主席。此时我才发现，在安曼和我们同乘一车的小胡子和彪形大汉不知何时下了车。大概由于我一路吹嘘自己是卡扎菲、阿拉法特的铁哥们儿，伸胳膊蹬腿，弄得人家很不舒服。低头看看脖子上的莱卡还在，车身后部的行李也一件不少，眼前晃动着司机巴桑的剪影，正比画着让我准备护照。我习惯地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大铁表，时间是伊拉克时间2000年5月20日凌晨1点15分。

我最后一次来伊拉克是1993年7月，距今已经有7个年头。1998年我因血液病住院期间，看到一本《CCTV现场直播巴格达》，说中央电视台一行8人“租用4辆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GMC‘巡洋舰’越野吉普”，在大使夫人率领下前往巴格达。沿途在“死亡之路”上胆战心惊险象环生。一行十余人在约伊边境被约旦扣留，由于大使夫人出面担保才重获自由，可还是被抹掉了一盘录像带……从这些情况看，约伊边界的险恶情况正日趋恶化，越来越难以捉摸。尽管我的签证上特别注明我是文化新闻部长的私人客人，可我还是对过伊拉克海关忧心忡忡。国际传媒习惯把卡迪西亚说成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海关，几乎所有的西方报刊都把伊拉克描写成“公然违背国际准则的国家”，有人自称过关花了20多个小时。我真不知道现有的各种手续是否管用，下一

步会发生什么。



尽管阔别多年，边界加油站的伊拉克朋友却一眼就认出我，亲热地走上前勾肩搭背。往来于此的外国人本来就不多，更何况是像我一样爱穿红衣服、黄背心，背好几个照相机的中国人。（王淳华　摄于2000年5月）

卡迪西亚海关是伊拉克骄傲的象征，原来叫塔布里勒，萨达姆上台后弘扬爱国主义才改名卡迪西亚。公元637年（回历16年），12万波斯人以33头战象为前导入侵巴比伦。被囚于卡迪西亚监狱的死囚埃布纳赫吉戴罪请战，率3600名穆斯林大败12万波斯人，史称“卡迪西亚大捷”。

现在，整座卡迪西亚海关笼罩着一层很厚的灰尘，灯光昏暗，气氛沉重，仿佛刚挖出来的兵马俑。闷热的空气到处弥漫着灰尘和各种悬浮物，无数小虫正围着浑浊的管灯跳舞。我摇下车窗，四周热闹但寂静无声，估计是刚才睡得过死短暂失聪，于是赶紧狠拍自己的太阳穴，加速大脑的清醒过程。恍惚中想起一段古诗：“朝臣侍漏五更

寒，将军铁甲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想必“铁甲夜渡关”指的就是眼前这种情形。

GMC在第一个岗哨前缓缓停下，司机看似随意地把一团钞票塞给围上来的黑影，这颇令我大惊失色。在我的印象中，伊拉克公职人员是拒绝小费的。海湾战争以来，我曾经连续7次通过卡迪西亚海关，可这种公职人员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还是首次目睹。伊拉克生活水平一直很高，伊拉克人骄傲而在乎面子。《古兰经》严禁说谎、贿赂、盗窃等不义行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骄傲的伊拉克人决不会行此下策。

海湾战争前，我曾向帮助我的伊拉克官员赠送礼品，他们大都谨慎地把礼品摆进各自办公室，因为这是工作中的职务行为。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一贯把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视作反革命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萨达姆总统更是以身作则，坚持把世界各国送给他的礼品集中到博物馆，开辟了8个巨大的展室供人参观。想不到饥饿使人的尊严扫地，持续战乱摧毁固有的良知和社会价值观，生存成了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从个别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可以推测政权的腐败程度，10年封锁已经使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沦落到这等地步。我开始为伟大的伊拉克人民担心……

“兄弟间是不要钱的”

我被带到一间大约40平方米的移民局办公室，按常规填写各种入境表格。令我担心的是伊拉克移民局怎么也不相信我就是护照上的那个英俊少年，任我掏出身上的身份证、驾驶证作为佐证，他们仍然将信将疑：“你们中国人都像烟雾一样变化快吗？1996年的护照还不到5年就天翻地覆，连头发都掉光了。”我说那得赖美帝的贫铀辐射，我大病一场靠中药、藏药才活到今天。5年前我眉清目秀满脸灿烂，现在萎靡不振、满嘴粗话，一听警报就想卧倒。别说你不认识我，连我

妈都不敢认我。听得移民官连连高呼打倒布什。



我委托胡马姆博士将袁先生的画转交萨达姆请他签名，他如约照办，萨达姆还表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由于得意，我到新华社驻伊拉克分社转了一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不知他们出于

什么心理，立刻把这事儿通报给了新华社总社。新华社总社告外交部发明码电报给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命令唐师曾立刻回国，不许采访萨达姆。虽然萨达姆没有采访成，但他还是在画上签了名，被秘密带回中国，现在北京朝阳公园内金台艺术馆的某面墙上挂着。金台艺术馆的主人就是画家袁熙坤。在这个商品的时代，我没有向任何人索取一分钱的酬劳。在这个一切唯上的时代，我的行动也没有请示任何领导。一个真正的人，做真正的事时，是不为权力和利益驱使的。

基于多年浪迹江湖的血泪经验，我首先拿出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司令的合影炫耀一番，接着把箱子里最大的镜头、最唬人的相机、马达堆满一桌子，以此显示自己不同于普通旅客的特殊身份，从而赢得士兵尊敬，避免逐一开箱检查。尽管我两只箱子中除了食品、药物没有任何违禁品，可真要由着这帮沙漠饿狼性子来，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随身行李中最大的一个包裹是一幅萨达姆画像，这是著名画家袁熙坤先生的大作。袁先生以专画各国领导人著称，先后为邓小平、克林顿、密特朗、撒切尔、叶利钦、曼德拉、穆巴拉克、海部俊树、加利等几十位世界政要画过像，并请他们在画作上签名。这次他画了萨达姆，却弄不到萨达姆签名，找到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鲁培新帮忙想辙。鲁培新也没辙，又找到中国前驻巴格达大使郑达庸。郑师兄说这事儿只有唐老鸭能办成，于是袁先生把画送到了我的新华社宿舍，我又背着它来到巴格达。我一直担心这帮小子点点戳戳会弄破袁先生大作的包装纸，伤了萨达姆总统的脸面。好在我护照上注明是文化新闻部长的私人客人，司机巴桑又不停地变戏法般地金钱铺路，所以没费太大周折就得以顺利通过。

接下来我被一位瘦高官员单独带往海关，重演刚才经历的一切。途经黑暗的拐角时，瘦高官员干脆开门见山地向我索取贿赂，而且声明只要美元。面对一长溜饥渴觊觎的眼神，我开始担心身上的美元没带够，无法应付深不可测的黑洞。我印象中的伊拉克人一直以自己是

优秀民族而骄傲，骄傲到拒收一切小费，因为“兄弟间是不要钱的”。想不到国际封锁仅仅10年，就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外国记者，我获礼遇穿过曲曲弯弯的回廊，几位全身黑袍的伊拉克妇女，正瑟瑟发抖缩在墙角里面壁思过，反思自己的走私罪行。脚下磕磕绊绊到处都是罚没的美国烟、英国酒，看来全世界走私犯热衷的无外乎这几种东西。

海关最后一项是逐一检查我的所有器材，这项手续也是以往四进巴格达从没遇到过的。他们详细登录每一个机身、镜头、三脚架、电脑、充电器的型号之后，拆下笔记本电脑的调制解调器，说这个东西是不许带进去的。这又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伊拉克不许使用移动电话，想不到还殃及笔记本电脑。现在轮到我真心实意地想花钱“买路”了，可这位大爷就是死活不肯通融。尽管我一直崇尚清教徒的生活简单、为人吝啬，但是在漆黑如墨的世界里，我倒宁愿克服十二分的不情愿，从摄影背心不同的口袋中掏出不同面值的美元。我不是舍不得钱，而是不喜欢这种笨拙的勒索方式。显然，卡迪西亚的伊拉克人已经不再拿我当兄弟了，我可不想在一个不是兄弟又没有钱的荒郊野外等到天亮。



海关人员详细登录每一个机身、镜头、三脚架、电脑、充电器的型号之后，拆下笔记本电脑的调制解调器，说这个东西是不许带进去的。

最后我一直坚持找到海关的领导，推门进去，这位领导正在电脑上欣赏麦当娜！我以为碰到知音，立即向这位老兄表明自己一直喜欢玛丽莲·梦露。他承认玛丽莲的确摄人心魄，不过现而今更流行麦当娜这类直接的。我以为谈话很投机，可一转到MODEM卡上，这位老兄立即端起一张扑克脸，说MODEM卡涉及国家安全，无论如何都不许进去。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位麦当娜的热爱者，能有如此坚强的操守。

我怕验血

除海关之外，我还怕一件事，就是检疫验血。像所有酷爱传统的单一制民族国家一样，伊拉克历来重视本民族的血统纯正和血液安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前我第一次到伊拉克，就接到《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令》：“所有进入伊拉克的外国人，必须在5天内接受血

液检查。……没有抽血检查的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惯于调皮捣蛋的我，当即乖乖到指定医院抽血，我可不敢用武力试探伊拉克政权的稳固性。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在巴格达的不同医院里至少抽过四次血，开始还是一次性针头，后来干脆是我国困难时期曾使用的那种用铝饭盒高温消毒的针头。而这里地处亚、非、欧交界之地，属于各色人种杂居的战乱地区，抽血的危险性可想而知。一直到1998年我因血液病住院，在北京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等处四次骨穿，显示“骨髓受到辐射伤害”，我都怀疑是我年轻时打针抽血的硕果。尽管战争以来多国部队在伊拉克投掷了60万枚贫铀弹，可至今没有直接命中我。而海湾战争期间我周游土耳其、埃及、约旦、塞浦路斯、以色列、伊拉克……却有七八支号称“防疫”的针头直接刺进我的血管。

《旧约·利未记·第17章》教导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可能古代犹太人就发现所有血液的不洁。《古兰经·筵席（马以代）》也规定：“禁食死物、血液、猪肉……”

现在，美国有3/5的超级市场开辟“脱血处理清净食品”专柜，出售按犹太教“Kosher”标准处理过的清净食品。“清净（Kosher）”成了和穆斯林“清真”同样时髦的卫生食品，连国际闻名的M＆M's巧克力、雀巢咖啡、都乐果汁都宣布自己符合“Kosher”标准。一直到现在，我对所有血液都心怀敬畏，对鸡血、猪血、鸭血之类的“佳肴”更是绝对不碰，我甚至怀疑某些民族的饮食习惯会直接引发肝炎。

我的好友、新华社国际部中东编辑室主任刘顺也像我一样害怕抽血，1998年他去巴格达采访途经卡迪西亚海关，就坚决拒绝抽血。由于他精通阿语，又带了一大摞和巴格达要人的合影，所以顺利幸免。而同时到达卡迪西亚的中央电视台十几位同仁就全体罹难，不仅遭受皮肉之苦，还得每人缴50美元现钞，因为使用了“进口的一次性针

管”。

由于此前我曾四进伊拉克，早已被人验过几次，所以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倒是我老婆害怕那乌黑的针头，担心它会殃及子孙。还好，我护照上库巴大使手书的那行“特别关照”还真管用，不仅抽血免了，最后连行李也免检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整个过程会这么简单，只用半个小时就顺利进入伊拉克。除扣下笔记本电脑的MODEM卡，其他物品丝毫无损。只是帮我办理手续的几位大爷还余兴未尽，缠着我还要“意思意思”。连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巴桑都被弄急了，开始当着我和边境上的公职人员争吵：“你们还想要多少？他们是记者，你们就不怕他们把这些写出去吗？”最后他拿出我刚送给他的清凉油，逐一在没拿够钱的人脸上抹了抹，算是普施恩泽，好歹帮我解了围。

同甘共苦的人互称兄弟

“同甘共苦的人互称兄弟”，昨夜还神头鬼脸的司机巴桑突然变得可爱起来，他才是我熟悉的真正的伊拉克人——好客、智慧、善良，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艰难的生活、夜以继日的长途奔波使巴桑面相很老，可实际上他刚满33岁。巴桑原来在学校工作，现在人连饭都吃不饱，谁还会去学校呢？巴桑家里人口不多，有父母妻子和一个宝贝女儿。随着时间推移，10年制裁使伊拉克原本高于周边国家的生活水平，变得大大落后于国际社会。哲学家罗素说：“要想整个人生都过得舒服、愉快，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具备一种应付逆境的态度。”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本能地逃离生活艰难的地区，流向生活优越的区域。据说伊拉克人只要向政府缴够2000美元就可以出国，可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而那些有本事搞来2000美元的要人，哪个又愿意离开自己的位置呢？

随着国际封锁加剧，能够穿越铁幕成了令人尊敬、羡慕又有利可图的职业。巴桑开始离开学校到“死亡之路”上给人当帮手。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他学会了请客送礼、找后台托门路，终于通过这种手段买了这辆崭新的98款GMC“郊区人”。这种美国车很适合长途客运，尽管排气7升的V8发动机很费油，但伊拉克汽油历来比矿泉水便宜。而且出入这条路的大多是外国人，缴的都是美元现钞，所以成本不高。当然也有打劫、翻车、挨炸的危险，再就是得沿途打点，但赚到手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美元呀。海湾战争前1伊拉克第纳尔换3.228美元，可现在1美元换2000伊拉克第纳尔，通货膨胀高达6456倍。

巴桑每周从安曼到巴格达跑两个来回，行程超过4000公里，离家时把整个行李箱都装满汽油，从安曼返回时带回少量的药品和食品。起终点两头都有伊拉克同胞帮忙揽活，路上一律睡在汽车里，“国外再便宜的旅馆也得50美元，相当20个伊拉克人的月工资了”。这种人在旅途的奔波使巴桑一家得以维持中上等生活水平，尽管沿途拼命挣扎，但温饱的小康生活足以维持人类本能的良知。听着巴桑磕磕绊绊的故事，我大脑一片空白，语言全都变成感情而不是句子。



古老的巴格达萨法黑尔铜器市场，由于海湾战争以来的国际封锁没有外国游客，传统工艺品无人问津。（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后，约旦国王侯赛因对自己的夙敌发表悼词：“假如人们依旧抱有控制局势的责任心，和平——就指日可待！我们发生过1994年的希伯伦屠杀案，以色列境内也出现过类似暴力；我们有刺杀我祖父的凶手，以色列也有杀害拉宾的极端分子……如今，少数心胸狭隘的人想阻止中东和平，对此我沮丧万分。”约旦是中东沙漠中最古老的弹丸小国，侯赛因国王是先祖哈希姆41代传人、先知穆罕默德第38代子孙，哈希姆王族的疆土曾经包括整个阿拉伯半岛、地中海东岸和海湾地区。至今许多中东国家的国旗上还保留着哈希姆的黑、白、绿、红标志。今天，穿过约旦的“死亡之路”成为伊拉克和外界联系的唯一“血线”，侯赛因国王构造和平桥梁的宏大气魄远远超过约旦狭小的国土和有限的经济能力。我崇拜这种气魄！

几经磨难之后曙光初照，原本一脸可疑的巴桑，也像沙漠旭日变得愈发可爱。历史上的许多战乱都来源于贪欲和交流不畅，而我坚信直接的民间交流可以完善整个人类。

鸟瞰巴格达

阿拉法特和卡扎菲的朋友

2000年5月20日上午8点半，我们的GMC穿过上百辆油罐车组成的长龙，风雨飘摇地钻进巴格达。进城前，我们穿过5道由陆军、共和国卫队、民兵和安全警察设置的检查站。这种久违的森严气氛让我兴奋，就像久困牢笼的豹子突然放归旷野，呼吸到熟悉的血雨腥风。每遇检查，司机巴桑都骄傲地把各种证件递出去，用沙漠民族习惯的招摇方式说："这是中国记者，是阿拉法特和卡扎菲的朋友。"

我们下榻的曼苏尔（AL-MANSOUR）饭店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濒临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它和距此不远的拉希德饭店是巴格达两家最好的五星级饭店。海湾战争爆发前，伊拉克把上百名西方人质囚禁到曼苏尔饭店，宣称一旦遭到攻击，就把人质当"肉弹"使用。可一直到现在，多国部队已经把伊拉克炸了整整10年，伊拉克始终没把哪个肉弹怎么样。我早就发现文明古国喜欢发表慷慨激昂的过激言论，可一旦真正动起手来，总缺乏现代国家的实事求是。只有日本那样的蛮蒙国家才会铤而走险袭击珍珠港，招得美国大打出手，把手里仅有的两颗原子弹全扔给日本。假若换了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难免心慈手软下不了黑手，顶多代之以口诛笔伐。海湾战争爆发前，我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派驻另一个文明古国的摄影记者，几次试图靠近曼苏尔饭店、接触被囚的西方人质，都被荷枪实弹的共和国卫队挡回。因为伊拉克担心美国特种部队会像突袭伊朗那样劫持人质，所以对曼苏尔饭店重兵把守，不许任何外人靠近。人生无常，想不到10年过后，我旧地重

游以游客身份入住戒备森严的曼苏尔饭店。所不同的是：我不是任何一方的人质，而是自愿穿越铁幕“打洋狗的肉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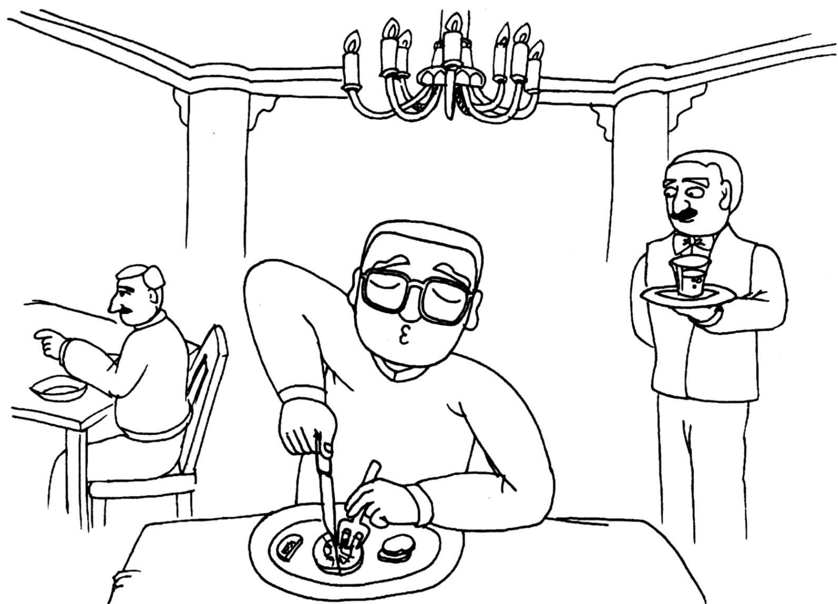
曼苏尔饭店大堂门口至少等了20个黝黑的苏丹人，正张开血盆大口欢迎我这个肉包子。他们争先恐后地扑向我的行李，就像东非草原上掠食的鬣狗。我一个人拎了一路的两只箱子，现在竟然需要6位身高腿长的黑大个抬着走。伊拉克作为富足的石油大国，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埃及、苏丹、也门、约旦、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的廉价劳动力。持续战乱、封锁使巴格达游客锐减，偌大的巴格达已经很难见到我这样的荤腥。

萧条的曼苏尔饭店标准间一夜90美元，可服务条件还不如中国云南边陲沧源、孟连的县级招待所。环视四周曾经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年久失修，已经失去昔日的浪漫光彩，就像一位落魄的贵妇人。电梯不灵、油漆剥落、地毯破损、灯光不全、电话失灵、冰箱内空空如也、卫生间马桶故障、水龙头锈迹斑斑、肥皂黑糊糊满是杂质、又硬又脏的毛巾早已毛了边……

我踮着脚草草洗去满身臭汗，饥肠辘辘地从四层找到一层，才发现堂堂五星级饭店只有一层餐厅还勉强营业。一头撞进去，萨达姆画像明镜高悬，虎视眈眈注视着空荡荡的大厅。几十张台子人迹寥寥，坐着一帮面容紧张的外国人。我朝各位逐一打过招呼，知道有六位俄罗斯老毛子、两个日本鬼子、三位韩国人和四位中国同胞，都是铤而走险来发战争财的商人。

这里名曰西餐，可整张桌子上连一副成套的刀叉都配不齐。早餐只有凉水、干面包、一小块奶酪、四块酸黄瓜和两片西红柿。我找服务生询问饭店内是否还有其他餐厅，回答说10年前有过意大利餐厅、中国餐厅……可所有的外国厨师都害怕轰炸，早就卷铺盖走人了，所以不存在换个餐厅的可能性。打开菜单，一日三餐只有那么几个菜走马灯般地移来换去，做法单调，原料可疑。好在我是个不讲吃喝的粗

人，即使味同嚼蜡，也狼吞虎咽，而且心怀感念：这已经比海湾战争期间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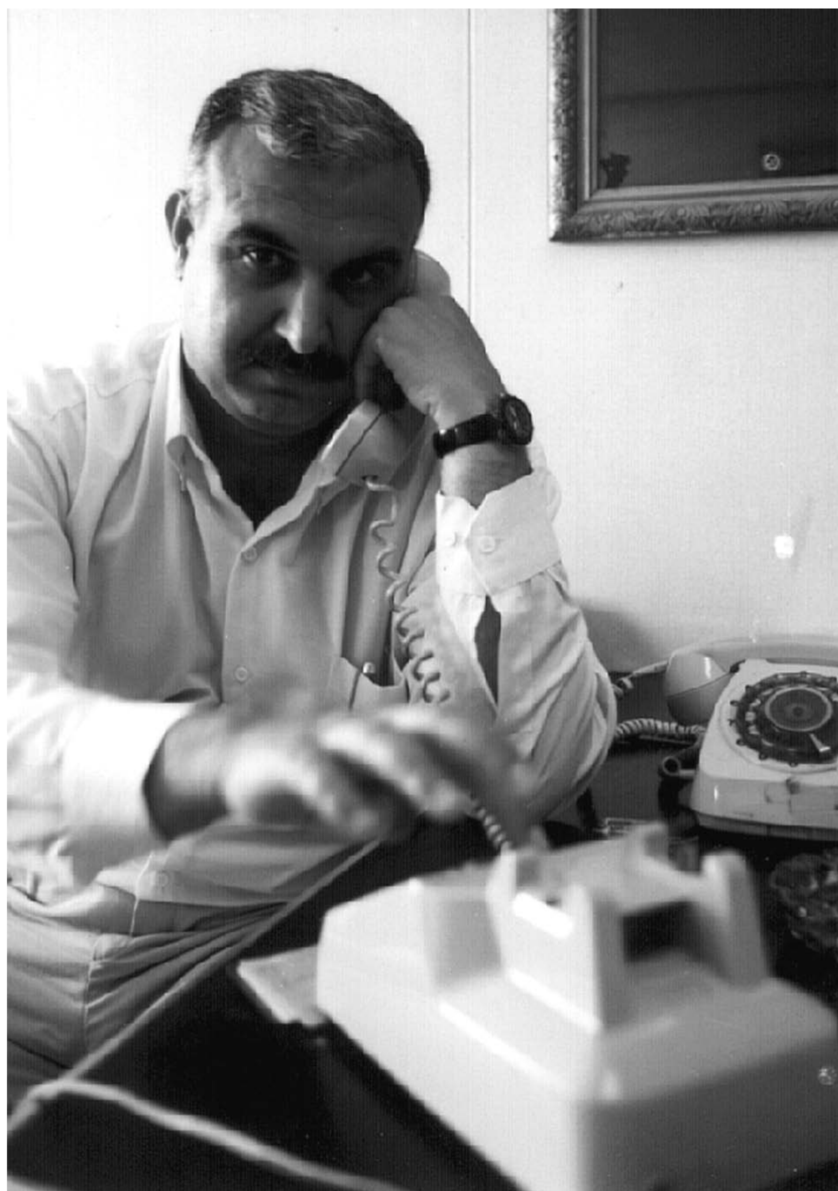
堂堂五星级曼苏尔饭店只有一层餐厅还勉强营业。这里名曰西餐，可整张桌子上连一副成套的刀叉都配不齐。早餐只有凉水、干面包、一小块奶酪、四块酸黄瓜和两片西红柿。

通货膨胀6000倍

一觉睡到下午，我被沉重的敲门声吵醒，原来是文化新闻部的陪同到了。来人一共三位：前面略微秃顶的是新闻官穆罕默德，紧跟其后的是戴眼镜的哈迪德，走在最后的是司机塔米姆。这三位首先代表礼宾司长哈利德致欢迎词，说哈利德司长还保留着我10年前拍的照片，在此预祝我故地重游能有新的好作品问世。

英语说得最好的穆罕默德是巴格达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家中有一个老婆五个孩子，每月基本工资1万伊第，加上奖金、加班补助总共4

万伊第。如果按海湾战争前的美元汇率，穆罕默德每月收入至少12万美元，可按时下汇率只有区区20美元。他一上来就自称陪过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中国人豪爽慷慨，小费一出手就是100美元……穆罕默德刚满32岁，大概因为生活负担较重，所以面相颇老。以后我发现穆罕默德胆小怕事，但工作努力。10年来，伊拉克通讯设施已经被多国部队轰炸殆尽，由于联合国严禁伊拉克进口现代通讯设备，所以巴格达不仅没有无线手机，而且连司空见惯的程控电话都没有。整座城市只有时断时停的老式脉冲电话，靠人工插线的老式交换机勉强工作。连我住的五星级曼苏尔也无法直拨当地市内电话，每次有事都得先要饭店总机，再由总机按先后次序排着队往外打，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每遇这种情况我都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拳把面前的破电话砸了。而穆罕默德却都能平心静气，守着毫无希望的破电话耐心地拨下去，实在不行就跑步赶回街对面的文化新闻部，直接带口信和有关部门协商，工作十分认真。由于生活拮据，穆罕默德上下班都坐公共汽车，只有偶尔特殊情况才敢“打的”，所以总是显得疲惫不堪。



陪同官穆罕默德在这座既没有通讯、也没有程控电话的城市里坚定不移地拨打电话。（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戴眼镜的哈迪德轮廓分明目光犀利，东京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精

通东方文化，认识个把汉字，说英语时喜欢夹带日语。他有过迷人的日本女朋友，但迫于“传统和宗教原因”，最后娶了伊拉克人，到目前尚无子女。哈迪德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另外两位，优雅细长的手指得意地玩弄着奔驰钥匙。他对中国存有偏见，总抱怨中国只会投弃权票，还说中国缺少新闻自由。我不得不纠正他的说法：中国不是“只会投弃权票”，而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对所有武力解决方案持弃权立场的国家”。说到自由，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人数比伊拉克全国人口还要多。我这次来伊拉克就纯粹是个人自由行为，我自由发表的各种看法还将自由出现在各种自由的媒介上。我客气地告诉哈迪德先生：可能是伊拉克被封锁久了，所以哈迪德先生对外界尽知的事情缺乏了解。说到这儿我想起10年前路过约旦，新华社安曼分社记者杨立勤向我抱怨全安曼分社三对夫妻忙活一年，才有3条新华社消息在约旦报纸刊登。10年过去，看来这种令人沮丧的现状似乎改进不大。多年在中东地区工作的经验告诉我，阿拉伯民族始终渴望了解中国，只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陈旧，事倍功半，白白浪费了许多宣传经费。以后我逐渐发现哈迪德为人处世果断，显得重权在握，做事也比较通情达理。许多穆罕默德不许拍摄的东西，只要向哈迪德解释拍摄理由，大多可以顺利达到目的。

司机塔米姆开一辆白色雪佛兰，是北部库尔德人，原来在共和国卫队当兵，后来复员到外交部礼宾车队当司机。塔米姆没上过什么学，英语表达很吃力，说话时东张西望目无定睛。他在部队时给首长开车，复员后继续给特权人士开车，所以满脑子都是破坏法规的特权思想，这辈子没学过什么好东西。他开车霸道，总是抖抖擞擞表现自己的优越感，从不遵守交通规则。对挡他路的车总是故意猛别两下，再在人家前面急刹车，显示自己汽车上的“国宾34号”字样，还指着人家鼻子大骂一通。令我恼火的是他几乎天天迟到，而且把理由全归罪到美国身上，说因为美国封锁了汽车配件才使他的老爷车经常抛锚。塔米姆显然不喜欢背景优越的哈迪德，他几次向我暗示哈迪德有其他背景，说哈迪德是“有肩章的军官”。还指给我看哈迪德停在椰枣树下

的本田车，说哈迪德每天都在小本上详细记录我的所有言行。

把布什踩在脚下

我一直把伊拉克人当朋友对待，在当今世界上能够被称作朋友的人还真不多。首先伊拉克人粗犷、豪爽、侠肝义胆的民族性格就与我不谋而合，伊拉克女人的温柔贤淑更令我心仪已久。由于都是文明古国，所以相通之处很多。自1958年建交以来，两国反帝、反修相互支持，伊拉克蜜枣就是那时候传进来的。此外两国尽管不在同一地理区域，但历史发展过程惊人地相似，因而两个民族的价值判断趋向接近。作为一个骄傲的古老民族，伊拉克特别喜欢沉浸在值得夸耀的回忆里，习惯把自己当作世界中心。巴格达作为千年古都，以战争、胜利日命名的建筑物到处可见。比如卡迪西亚广场名称来自战胜波斯人的卡迪西亚大战，“7·14”大桥源于1958年7月14日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而更多的建筑物则直接以萨达姆命名，如萨达姆医院、萨达姆机场、萨达姆桥、萨达姆村、萨达姆城……

巴格达还有一些以历史人物命名的街道和建筑，如海湾战争前扣押西方人质的曼苏尔饭店、海湾战争专供外国记者停留的拉希德饭店，都以伊拉克历史上的著名国王命名。10年前海湾战争爆发时，拉希德是专门接待西方记者的指定饭店，各国的亡命记者都集中于此，向世界各地报道海湾战争。如今我故地重游第五次重返巴格达，兴奋中努力辨认当年熟悉的遗迹：厕所、餐厅、拉希德门口喷水的跳舞小人、没收我相机的岗楼……可惜除了玻璃上预防轰炸的“米”字防空条，其他早已物是人非看不出任何的痕迹。以往生机勃勃的老一代革命家悄然逝去，一批陌生的新青年又开始津津有味地重复革命先烈的未竟之业。

一直到现在，伊拉克仍然认为1961年独立的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统一祖国，让流落的海外赤子回归祖国怀

抱。新闻官哈迪德干脆把科威特等同台湾问题，说既然伊拉克支持中国统一台湾，那么中国也应该支持伊拉克收复科威特。他和穆罕默德都坚持是美帝先把战火烧到海湾地区，伊拉克保家卫国主动出击，这才爆发了海湾战争。

为了表示对海湾战争的仇恨，拉希德饭店把“战争罪魁”——乔治·布什的头像镶嵌在大堂入口的水磨石地板上，下有一行英文字：“布什有罪。”这幅画像做得很大，正好撑足一扇门，任何进出这家饭店的客人都不得不踩着乔治·布什的大脸才能通过，以此发泄对布什总统“发动侵略战争”的切骨之恨。1993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2周年纪念日，美国空军再次袭击“巴格达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结果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偏离目标，“误炸”拉希德饭店，当场炸死一名妇女，炸伤十余人，其中一位强壮无比的德国记者被炸个满脸花。炸弹残片上的“加利福尼亚制造”再次激怒走投无路的巴格达人，无数老百姓涌向拉希德饭店狠踏布什总统的老脸。



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口地板上镶嵌着乔治·布什像，供人践踏。10年前，乔治·布什是美国总统，发动了“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几年来我每次进出拉希德饭店都尽量避免踩着布什总统，这倒不是我嫌贫爱富喜欢乔治·布什，而是小时候见到过太多的“把某某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总觉得这一切都滑稽得不堪回首。想不到时光发展到2000年，这种永世不得翻身的做法在有7000年文明史的伊拉克仍然很时兴。

海湾战争10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记者、游客来去匆匆，布什总统始终仰面朝天龇牙咧嘴，任四山五岳的宾客蹂躏，这使所有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伊拉克人十分满足。每天清晨，都有一个清洁工准时来给布市先脸，目的是让客人更容易看清这张老脸，选择最解气的部位下脚。

世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

距痛苦不堪的布什总统不远，就是巴格达的最高点——萨达姆塔。海湾战争前这里是马蒙电报电话通讯塔，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第一天就被多国部队摧毁。马蒙是拉希德国王的儿子，由于开拓疆土备受伊拉克人尊敬。伊拉克素有建造空中楼阁的传统，传说《圣经》中的通天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是古代伊拉克人的杰作。《圣经》中的诺亚子孙向东游荡到示拿地建造城市命名“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巴比伦”是“神之门”，与此对立的希伯莱语中“巴比伦”是“变乱”的意思。当时诺亚子孙在巴比伦计划修建通天塔，希望高耸入云直达天庭，显示人类的力量，这就是巴比伦塔。上帝又惊又恐：天下民众都是一个民族，讲一种语言，一旦建成宏伟的城市和高塔，还有谁怕上帝？于是上帝设法搞乱人类语言，使其因语言不同而矛盾重重，最终离散各地。

犹太人一直把巴比伦塔看成人类虚荣心的象征，因为尼布甲尼撒二世消灭犹太国，毁灭耶路撒冷和犹太圣殿，强行把上万犹太富人、手工业者和平民迁往巴比伦。以色列一直把象征巴比伦强盛的通天塔

看成狂妄和压迫的象征，疯狂诅咒伊拉克人，希望上帝降灾惩罚巴比伦，毁灭通天塔。

而伊拉克人一直把通天塔看作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海湾战争结束后，封锁中的伊拉克入地无门，怀着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转向空中发展。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组织人民自力更生，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终于在马蒙电讯塔的废墟上建成巴格达最高的建筑物——萨达姆塔。穆罕默德和哈迪德都为203米高的萨达姆塔自豪无比，说这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听得我将信将疑。因为我在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也听过类似的自豪，而东方明珠塔的实际高度是468米。

萨达姆塔下是一堆经过丑化处理的外国领导人，“他们都是萨达姆总统的手下败将”：布什、撒切尔、沙特国王法赫德、科威特国王萨巴赫和其他参加军事打击的强国领袖。一直到现在，伊拉克人民都坚信伊拉克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32个强国，粉碎了帝国主义侵占伊拉克的狼子野心，保住了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

通过电梯可以直达萨达姆塔塔顶，再向上爬是餐厅和小卖部，只可惜一个客人也没有。这里由于地处顶层又没有空调，所以奇热无比。塔顶的服务员面色凝重，腰里鼓鼓囊囊揣着武器，好像刺秦王的荆轲。从萨达姆塔顶远望，一种辽阔孤寂的感觉油然而生，远处是蜿蜒曲折的底格里斯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椰枣林。俯首下望，突兀而起的塔身随风摇曳无处可依，使我产生正迅速坠向地面的错觉。由此肾上腺素突突分泌，从腰部往下感到从来没有的沉重。恐惧中头昏眼花，似乎有七八枚“战斧”巡航导弹正悄然向我逼近……

由于萨达姆塔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紧邻萨达姆总统府，所以陪同严格限定只能朝他手指划定的方向拍摄，以免引发“不良后果”。即使顺着陪同划定的狭窄视角看去，巴格达的巨大、美丽依然让我震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一个重镇。1200年前，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Khalifah）艾卜·哲尔法尔·曼苏

尔在这里建造三重城墙环绕的圆形都市——“巴格达德”（Baghdad），“巴格”意为花园，“达德”意为真主。“真主花园”作为阿拉伯第一座圆形城市，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距幼发拉底河仅30余公里。城中心耸立的哈里发接见大厅金碧辉煌，拱顶高达130英尺。由城中心的木兰巴广场辐射出东北呼罗珊门、西北叙利亚门、西南库法门、东南巴士拉门，横平竖直的街道呈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以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修建鲁萨法卫城，形成今天的大巴格达。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自己重建的萨达姆塔（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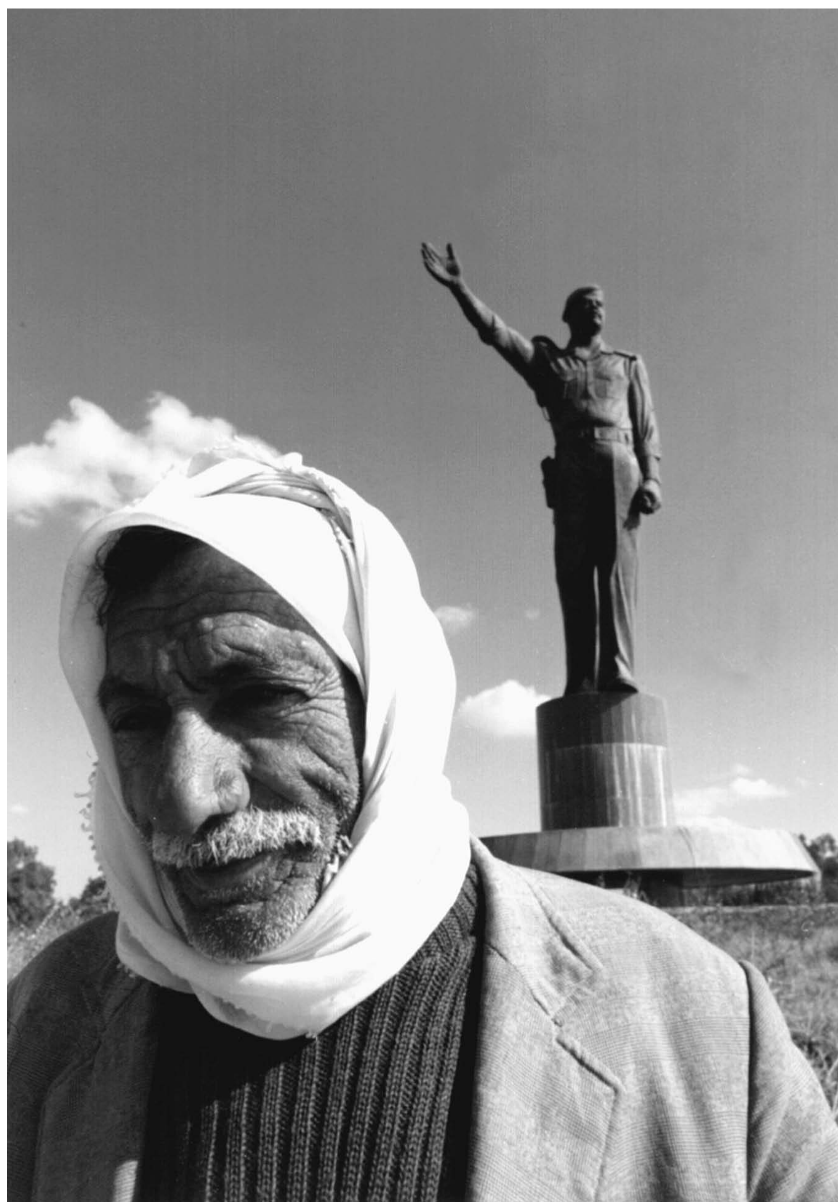
鸟瞰巴格达。（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恍惚中，天空传来《一千零一夜》中才有的悠扬音乐，阿拔斯第七任哈里发正让人把新娘放在镶有珠宝的地毯上，“歌女们奏着鼓乐围着新娘欢唱、狂舞、撒喜钱……连那些女奴的身价，都以和她们体重等重的黄金计算……”可现在这一切只能在萨达姆塔顶的美梦中重温。

当我这只疲惫的野鸭子结束一天的采访、精疲力竭地回到住处时，再次发现古老文明和现实生活间的巨大差距。曼苏尔饭店大堂里一大帮异香扑鼻的妖艳女郎正簇拥在威严的曼苏尔塑像前，淫声浪语、热力逼人，“10美元让你干一次！”能把保守的阿拉伯妇女逼上开放搞活的市场经济，全仗海湾战争的“累累神力”。难怪《纽约时报》白宫主笔麦克·凯利在《殉难日》一书中把巴格达称作“世界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假若当年修建巴格达城的曼苏尔大王黄泉有知，非得一口气憋得再死一次不可。



沦落风尘的妓女在曼苏尔饭店大堂曼苏尔塑像前拉客。（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萨达姆热爱我热爱，萨达姆支持我支持，萨达姆指示我照办，萨达姆挥手我前进。”



战争封锁下的巴格达人平静面对困难，悠闲地抽着“希沙”（大烟）。



两河文明的子孙，在底格里斯河畔，为《圣经》中记载的“奶与蜜之地”祈祷。

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

四海为家

3个月前我送妹妹去加拿大，偌大一架波音777，挤满了新一代黑发黄脸的科技人才。在首都机场候机厅，我与几位和妹妹一样纯洁可爱的大学生邂逅，得知这些“至新大陆”的新移民虽然国门未出，就已获得加国医疗保险等多种社会福利，连加航提供的移民机票都是打折的。如此优厚的招聘条件，自然令在火车站撒泡尿都要缴5毛钱的穷学生兴高采烈。首都机场每天都有这样的大飞机“至”新大陆，这还不算更热门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底特律、达拉斯……飞往超级大国的航班远比前往冰天雪地的航线更热火朝天。

我历来把托福、GRE看成是发达国家的联合收割机，是合众国设在不发达国家的人才收集器。我熟悉的许多成熟的好学生，都是一夜之间被美国托福托走的，这颇让我义愤填膺。中国现在每年有200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只有90万佼佼者能通过竞争，享受百里挑一的高等教育。据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介绍：“在这90万佼佼者中，每年约有占半数的高考状元被北大录取。”而据《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调查文章《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去了哪里》披露：仅在1997年就有457名北大应届毕业生、357名清华应届毕业生被托福收走。16年前国庆阅兵，高举“小平您好！”标语的北大生物系81级，已经以“整班编制”去了美国。连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问题专家里奥·奥林斯也感慨：“谁都无法确切知道，现在或1978年以来的任何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学习。”两年前，北大王选考察美国硅谷后

发表文章："硅谷公司没有美国人并不奇怪，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就在各路神仙纷纷腾云驾雾西去之际，我这个四体不勤的国际浪人，悄悄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唐氏农场，重整旗鼓返回伊拉克。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我历来坚持四海为家，也希望地球上所有居民都像我一样在更广阔的时空上自由漫游。我主张人类应该在地球乃至宇宙的每个角落展开劳动竞赛，避免军事对抗，享受美好生活，实现《共产党宣言》"工人无祖国"的美好理想。

10年前，我因海湾战争涉足中东国家，在没有战事的晴好天气，我喜欢躺在小旅馆里打开空调看电视。我发现马耳他、土耳其、约旦、以色列、塞浦路斯、埃及、海湾……除利比亚卡扎菲和伊拉克萨达姆外，所有电视台都在播放同一首节奏很强的MTV。我由于在娘胎里被妈封了五音，没有音乐细胞，但耳濡目染次数多了，再配以莫斯科坍塌画面，好歹分辨出唱的是《一起走》（Together）。面对阿拉伯世界铺天盖地的可乐、汉堡，我哀叹即使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惨败，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早已经兵不血刃占领了整个中东。



1990年12月巴格达圣诞前夕。（唐师曾　摄于1990年12月）

2000年突然出现的生命基因图、电脑互联网翻天覆地，已经远远超出我的知识范畴和理解能力。当年“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的苏维埃俄国，突然跨越时空去追赶彼得大帝。连俄罗斯航空公司也匆忙涂掉镰刀斧头标志，把最好的机种调整到美国航线上，使我不得不冒险乘坐“前”苏联的图-154，老态龙钟地重返“后”中东，拜访坚持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的伊拉克。

天赐之都

多年来我一直顽固地认为，伊拉克是世界上最值得宠爱的一方水土，是神给人类的天赐，是地球上最适合生命繁衍的地方。古希腊人把这块“新月形”土地称作“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位于两河之间的良田。以我狭隘的纯自然眼光看，伊拉克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最有“油水”的富国。伊拉克石油的质量、储量、产量长期稳居世界前茅，亚述附近的油汽田已经至少自燃了一万年。与伊拉克比邻的科威特、沙特虽然也有石油，可由于缺水饱受干旱之苦。一海之隔的埃及虽然有条尼罗河，但缺乏石油，更不用说苏丹、也门、约旦、叙利亚、以色列那些缺油少水的沙漠国家。

伊拉克富甲一方，就在埋藏万顷石油的沃土之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世界级大河滚滚流淌。早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就在这里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字和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伊拉克一直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富足、最具国际性的开明国家。

大概正是因为这里过于美妙，所以才屡屡遭受异族入侵：古波斯阿赫梅尼德王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波斯萨珊王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大帝国。阿拉伯统治中心也从麦地那迁到大马士革，

又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进入鼎盛的“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巴格达成为世界的中心。



伊拉克石油资源丰富。日常农民做饭会驾着驴车去“打油”当柴烧，滴滴答答流得满地都是也没人心疼。（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早在萨珊王朝时期，故都泰西封附近20公里处，就有一个小村叫“巴格达”，意思是“天赐”。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艾卜·哲尔法尔从帝国各地调集10万工匠，历时4年，在“天赐”之地建立都城曼苏尔，“曼苏尔”是胜利者的意思。曼苏尔城分为内城、外城和禁城，有3道城墙组成3个同心圆，4条大街由城中心穿过东南西北4个城门，笔直地向外辐射。巴格达自建成之日起就对外拓展疆土，到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疆域已经西抵比斯开湾、东到印度河和中国边境，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超级大帝国，疆界远远超过罗马帝国。当欧洲沉沦于封闭落后的中世纪时，阿拉伯汲取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的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天堂。

像所有封建帝国那样，辉煌之后开始腐败。为稳固政权，哈里发招募生猛的突厥奴隶守卫巴格达，但没想到突厥人得宠后拥兵自重，最终杀死哈里发。十字军东征后，巴格达被蒙古骑兵占领，其后沦为土耳其人、英国人的领地，阿拉伯再也无力恢复庞大、统一的帝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废墟上，先后建立了22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遍布整个西亚北非。

1932年，伊拉克费萨尔王国率先在名义上摆脱英国宣告独立，阿拉伯复兴党、伊拉克共产党、民族民主党、民族联盟党、独立党、库尔德民主党、青年军官组织跃跃欲试，都想成为新国家的新主人。

越狱

1937年4月28日，遗腹子萨达姆·侯赛因在提克里特农村出生，侯赛因家族具有悠久的抗击奥斯曼和英帝国占领的传统，“萨达姆”的原意就是“坚定不移的战斗者”。萨达姆出身贫寒，父亲马吉德在他还未出生时就离开了人世，母亲为了生计，改嫁他的叔叔易卜拉欣·哈桑。萨达姆从小争强好胜，崇拜的人不多，但对舅舅海拉·塔勒法却尊重有加。萨达姆9岁时离家出走到舅舅塔勒法家里，在那里上学读书，塔勒法不仅是他的精神父亲，后来还成了他的岳父。受舅舅历史修养熏陶，萨达姆从小便喜欢历史，特别是对阿拉伯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正因为他太熟悉阿拉伯复杂的历史和各国之间千丝万缕的政治、宗教关系，才会导致他领导伊拉克发动一系列恢复伊拉克历史地位的民族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拉伯人试图摆脱英国统治四处寻求国际支援，包括耶路撒冷伊斯兰大法官哈吉·艾明·侯赛尼在内的大批阿拉伯人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国殖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萨达姆的父辈由于借助德国争取独立，遭到英国人的残酷报复，房屋被毁，家族成员牺牲。以致萨达姆从幼年起，就对二次大战英美确立的

强权格局心怀不满。以后英国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反对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1950年叙利亚、伊拉克等国联合成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萨达姆狂热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之中。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模仿纳赛尔建立“自由军官组织”，在20旅旅长卡里姆·卡塞姆准将领导下杀死国王费萨尔二世、王储以及王室其他成员。费萨尔二世是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堂弟，21岁的萨达姆参加了杀死23岁国王的民族革命。曾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此时已是美国总统，他对威胁战后格局的伊拉克革命十分反感，宣称：“一夜之间，我们从平定混乱到面对一场不可等闲视之的危机。”



刚刚被政府军收复的苏莱马尼亚人高举萨达姆像。（唐师曾　摄于1991年3月）

革命后的伊拉克联合政府政变不断，权力纷争导致革命前拟议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无法建立。1959年初，萨达姆因“谋杀地方官”被捕入狱，出狱后到巴格达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从事党务工作。不久，党派出5人行动小组行刺卡塞姆总理，萨达姆在暗杀中担任掩护。行动开始后一名刺客毙命，萨达姆左腿中弹。但他一直坚持到掩护同伴撤离后，才用剃刀挑开伤口，用剪子挖出弹头，换上阿拉伯长袍，怀揣仅有的23个第纳尔逃出巴格达。他用10第纳尔买下一匹老马，在贝都因牧民帮助下逃到巴格达以北150公里的撒马拉。此时逮捕萨达姆的通缉令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可由于通缉照片取自萨达姆的中学档案，时过境迁，与萨达姆长相有很大差别，这使化装成贝都因人的萨达姆从警察眼皮底下溜了过去。受伤的萨达姆在寒冷的夜晚脱光衣服，口含短刀游过底格里斯河，辗转到达阿拉伯复兴党的发源地叙利亚。

1960年2月21日，萨达姆离开大马士革前往开罗，补习后考取开罗大学法学院，参与阿拉伯复兴党在开罗的各种政治活动，由于组织才能出众当选支委，并从纳赛尔办公室争得活动权利。在开罗期间，他和表妹萨吉达·哈依拉拉结婚。

1963年2月8日，伊拉克复兴党发动政变处决卡塞姆，贝克尔出任总理。萨达姆奉召回国，在中央负责农民工作，同时在巴格达大学法律系深造。此时，年轻的萨达姆由于反对党内腐败得罪上层，惨遭整肃，几乎被杀。据萨达姆回忆，当时“党内蔓延着恐怖气氛，形成许多派别和小集团，为那些献身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设置障碍”。由于党内不团结，11月8日，阿里夫趁机推翻上台9个月的阿拉伯复兴党，萨达姆秘密逃往大马士革。

在大马士革，萨达姆参加了阿拉伯民族复兴党第七次民族大会，这是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的联合大会。在叙利亚已经掌权的叙利亚复兴社会党领导人米歇尔·阿弗拉克与萨达姆彻夜长谈，确定今后目标是：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强大、集中、统一的党。

会后，萨达姆潜回国内密谋武装斗争，他还亲自撰写对付警察审讯的小册子，不久被捕。萨达姆在狱中十分勇敢，不仅利用法律自我辩护，还组织绝食、在看守中挑拨离间制造不和、鼓励因酷刑丧失信念的同志。他还用锉刀偷偷锯断监狱铁栏，伺机越狱。不料行动前调整监舍，被萨达姆锉断栏杆的监舍突然住进一帮共产党人，他们伸胳膊蹬腿高呼革命口号，无意中碰断萨达姆锯了一半的铁栏杆。看守认定是共产党阴谋越狱，立即予以镇压。危急时刻萨达姆挺身而出，主动承认监狱栏杆是他锯的，与共产党人无关，从而赢得监狱中所有犯人包括警察的尊敬。不久，萨达姆又组织了一场越狱，并顺利逃脱。

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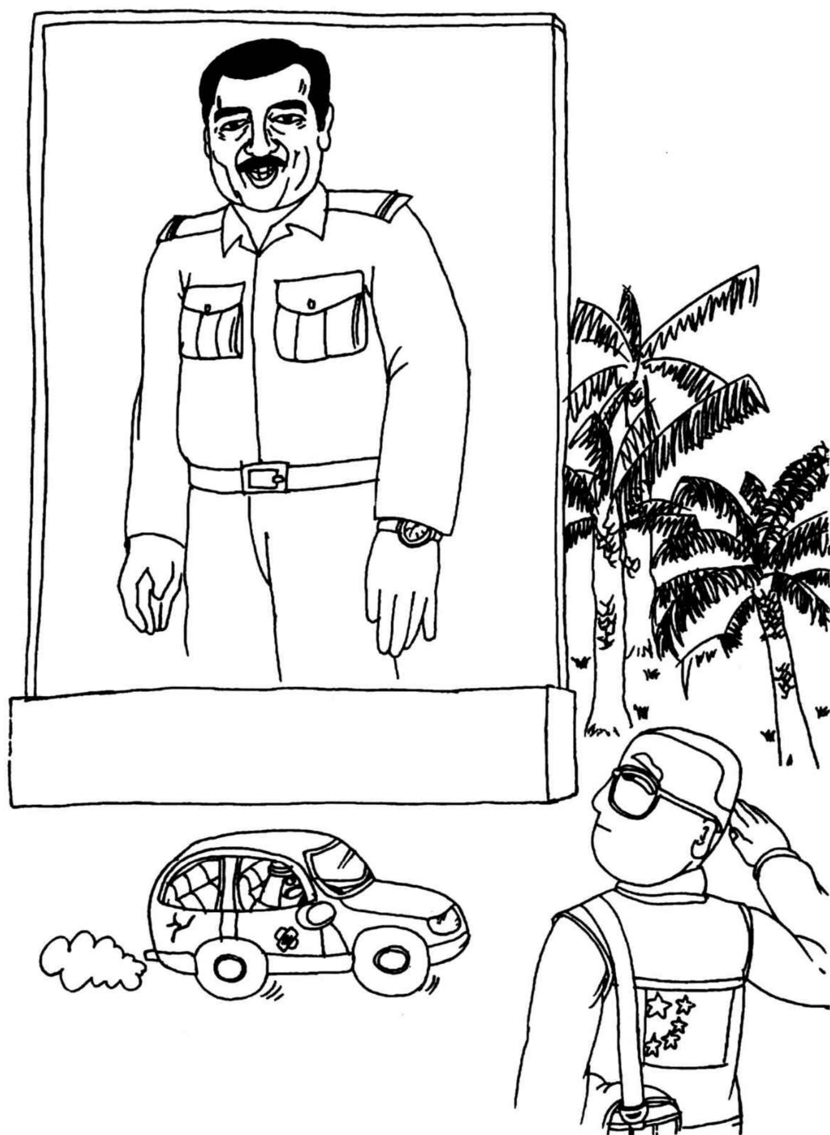
1968年7月17日凌晨3点，萨达姆率领坦克部队攻克伊拉克总统府，结束阿里夫为期五年的独裁统治。复兴党元老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出任总统，31岁的萨达姆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酷爱政治书籍，1968年伊拉克革命后，他除广泛阅读阿拉伯复兴党的著作外，还曾认真地读过马列著作。他酷爱民族音乐，特别喜欢听伊拉克西部民谣和阿拉伯世界著名女歌唱家欧姆·克苏姆的歌曲。他会弹阿拉伯琴，还跟伊拉克已故音乐家巴希尔学过打击乐器。至于戏剧和西方音乐，他没有丝毫热情，从未到剧场看过任何表演。他对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小说兴趣也不大，但他很喜欢听诗人朗诵赞扬他的诗歌。

贝克尔总统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他对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在舷梯上踉踉跄跄、浑浑噩噩的葛罗米科在联大会议上当众晕倒可醒来后依然紧抓权力不放十分反感。他认为所有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年富力强的、朝气蓬勃的人来领导，所以屡屡以糖尿病、心脏不好为由，坚持要把权力让给萨达姆：“我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承担革命指挥委员会交给我的职责……我坚持辞去我的全部职务……萨达姆·侯赛因同志始终敢于面对一切困难、承担全部责任，是值得全

党信赖的好同志……”

1979年7月17日，在贝克尔推荐下，萨达姆正式继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称这是“自然而然的、符合道德与宪法规范的交替方式，它来自纯洁的阿拉伯民族精神、伟大的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崇高理想”。

与一般阿拉伯人不同，萨达姆习惯穿戴整齐，时间观念极强。他不嗜烟酒，喜欢喝凉奶和阿拉伯黑咖啡，主张减肥、健身，经常以身作则带领阁员们在底格里斯河游泳。由于从小喜欢历史，功底深厚，无论闲谈还是发表讲话都喜欢引经据典。酷爱政治书籍的萨达姆不大出国，就是正式的国事访问也极为有限。由于他在农村长大，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到伊拉克的农村度过，他和普通农民一样，用铁扦子叉着鲜肉自己在火上烧烤。我总觉得萨达姆的许多生活习惯颇似毛主席。



伊拉克受国际制裁10年，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但在许多伊拉克人心中，萨达姆仍是不可替代的民族英雄。

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拉克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萨达姆在百姓中的声望直线上升。当时，他外出时常身穿欧式服装，外加一件阿拉

伯长袍，嘴叼古巴雪茄，伊拉克青年竞相模仿。目前伊拉克受国际制裁多年，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但在许多伊拉克人心中，萨达姆仍是不可替代的民族英雄。

萨达姆处事果断，建国初期伊拉克人曾经为国名争论不休，是“伊拉克阿拉伯共和国”、“伊拉克民主共和国”还是“伊拉克人民共和国”？萨达姆认为，伊拉克属于阿拉伯世界毋庸置疑，真正人民民主的政府更不必把“人民”“民主”挂在国名上。最后根据萨达姆意见，定名为“伊拉克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raq）”。

萨达姆是一个敏感的人，喜欢独自微服私访。他认为警卫簇拥不但没有意义，还会引发人民的反感。巴格达流传着许多萨达姆的故事：1979年10月8日，亲自开车上班的萨达姆碰到一位要求搭车的小学生，萨达姆问小孩：“你是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者吗？”小孩说：“是的。”于是萨达姆一直把小孩送到亚提菲叶赫第二小学。又有一个早晨，萨达姆敲开一家房门：“萨达姆要吃早饭，吃你们平常吃的那种早饭。”“可平常我们没有鸡蛋呀！”不久，巴格达有了充足的鸡蛋供应……

萨达姆还命令电视台举办《每月讨论会》，要求官员公开解答人民的各种难题。萨达姆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人民的负担，而是谋求幸福的捷径。”他还发布了许多类似《毛主席语录》的名言，如“骄傲自满会造成头脑不清”“笔和剑同样锋利”“教育是摧毁一切的武器”“收割多于播种、消费多于生产的民族没有发展前途”。

萨达姆在党内实行自我批评制度，就像基督教徒在教堂里所做的一样。每周定期举行党会，党员起立，坦白自己最近做的错事，众人在一旁分析批评，最后表示“今后一定改正”。

萨达姆要求所有人互称同志：“我想让人民感到生活由正义支配，而不是靠拉关系。”他对贪污腐败一律严惩，因为“国家已经付给

足够的酬劳，只要革命就可以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受贿毫无理由”。1980年2月16日，他亲自宣判4名有轻微受贿行为的副部长、工程师、商人死刑……

海湾战争以来，考虑到安全因素，萨达姆很少公开露面，就是电话也不直接去接，行踪不定，更不公开露面。他有时发表电视讲话，也是在总统府摄制室里完成。

萨达姆有早起的习惯。每天起床后，在体育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体育锻炼。他擅长骑马，他有一群精良的阿拉伯马，饲养在小儿子库赛的赛马俱乐部里。他还喜欢打网球和游泳。

萨达姆对新闻媒体极为重视，听广播、读报已成为他的习惯。到办公室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看经过筛选的阿拉伯文报纸和政治文章并且阅读赞扬他的诗歌。萨达姆有专门的摄影和电视记者组，报刊刊登他的照片和电视中有关他活动的镜头都要由他亲自审批。

狼吃羊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这里一再饶舌介绍萨达姆，是想在以往见闻的基础上切入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共和国与一般共和政体不同，萨达姆总统的个人影响力就像章鱼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就在我第五次访问巴格达之际，一位资深外交官仍然用“金字塔”来形容萨达姆政权的稳固。按这位伊拉克问题专家的说法，今天的伊拉克很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而在敌视萨达姆的西方国家看来，萨达姆及其复兴社会党的未来是无法预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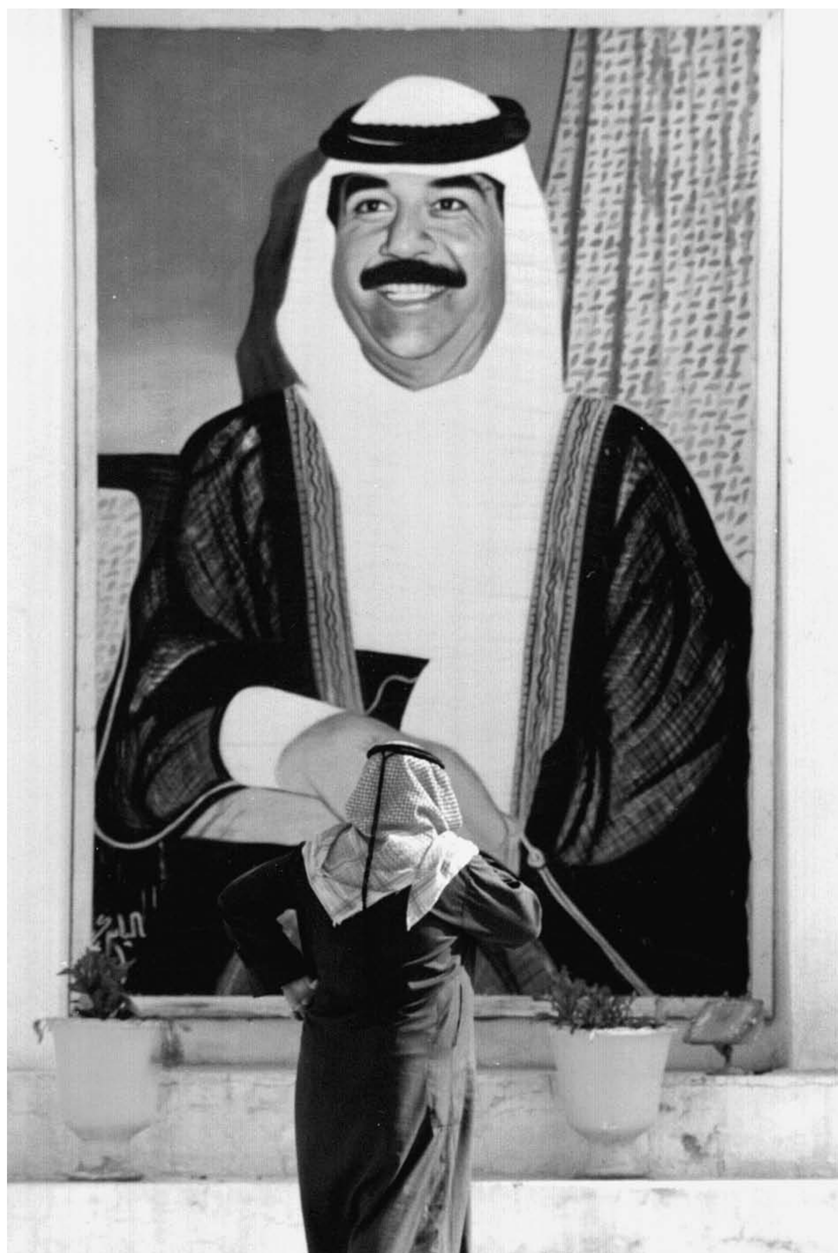
萨达姆和复兴党关于“先分别在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夺权执政，然后在整个阿拉伯范围实现统一，最终恢复阿拉伯祖先的光荣”，就像共产党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一样令洋人害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始终对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约旦、伊拉克等国的阿拉伯

复兴社会党持警惕态度。只不过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把精力放在防止共产主义扩散上而无暇他顾。苏联解体，热衷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萨达姆、卡扎菲迅速暴露为矛盾焦点，成为英美生活方式的对立面，最终成为打击目标。

我在开罗曾经请教一位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许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老兄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中东石油是整个地球的血库，必须保证绝对安全，所以不允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我接着问，以色列也是中东国家，为什么它就可以拥有类似武器？这老兄说，因为以色列每隔四年就进行一次全民大选，政体健康。而伊拉克永远是萨达姆一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国家随时都可能危害整个人类。我继续往下问为什么……不料这老兄极不耐烦地打断我：“别问了，现在就是要打他！”可见狼要吃羊是不需要理由的，更何况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自己主动为西方送上了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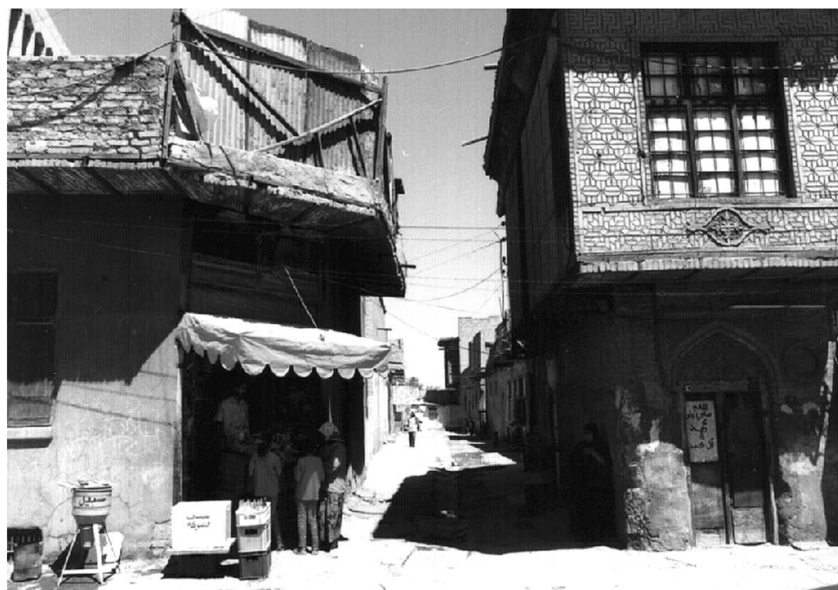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汤姆在巨幅萨达姆像下不知所措。（唐师曾　摄于1992年2月）



街心公园，这位老人面对萨达姆像倾诉着什么。（唐师曾摄于1992年2月）





巴格达的老房子疏于管理，摇摇欲坠。（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依我个人偏狭的眼光看，伊拉克犹如一位天赐美女，自恃美丽而怀春，但红颜薄命，因“怀春”招致持续的残酷蹂躏，而且由于“冶容诲淫”无人同情。在42天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持续空袭伊拉克的飞机超过10万架次，其中最紧张的几天，巴格达空隙密度高达每5～6分钟一个波次。此后是接连10年的封锁禁运，数不清的“沙漠”行动……

海湾战争是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战争，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的两极格局土崩瓦解。这是历任美国总统前仆后继、始终追求国家利益的必然结果。反法西斯巨人罗斯福、冷战总统杜鲁门、欧洲解放者艾森豪威尔、青年才俊肯尼迪以及约翰逊都试图武力进入中东。进入70年代，尼克松、福特、卡特通过《戴维营协议》促使萨达特、贝京达成埃以和平。海湾战争终于给乔治·布什机会，美军再次以拯救者身份打了一场世界大战，名正言顺地进驻海湾。克林顿总统把这种有利的军事、政治态势固定下来，并转化成其他利益资源。



辍学帮家长卖编制塑料筐的儿童。（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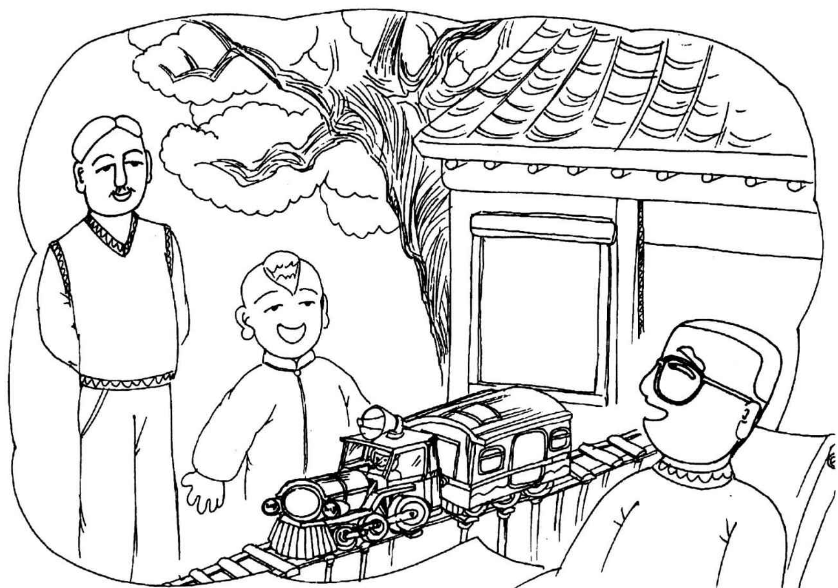
历史上每过一段时间，超级大国都要用武力解决陷入“死结”的棘手问题，这对任何国力不够的国家都是惨不忍睹的悲剧。一次大战的德、意、奥，二次大战的德、意、日都因战败蒙受屈辱，进而牵连站错队的小国弱国。今天，坚持几十年反帝的萨达姆已经连一个盟国都没有，仍然悲壮地“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家，萨达姆总统勇气可嘉，可战争受害者却是那些既无美国护照也没有绿卡的伊拉克人民。

家有莱卡

好男人一辈子离不开玩具

2000春节过后，我终于下决心给自己买了件心仪已久的心爱玩具——莱卡M6。一个黑机身配35毫米非球面镜，一下就花了我3万多块。尽管这对只拿60%劳保工资还得打针吃药的病人决不轻松，可一想到自己可能生命无多，就立即宽恕了自己。何况美国人说“只有好男人才一辈子都离不开玩具”。我抱着刚到手的黑美人几夜难眠，丝绸般滑润的机身让我联想到女人精密的皮肤……多年来，我一直被莱卡的梦瘾纠缠着，记不清多少次徘徊在相机橱窗前，就像迷上玩具店里电动火车的孩子……

小时候我爸给我买过一套玩具电动火车，从那时起德国机械的精密工艺就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火车是工业社会每个男孩子都梦寐以求的最佳玩具，它不仅启迪男孩必须循规蹈矩奔驰在特定的轨道里，还教育孩子应该遵守时间，对时间任何轻微的不尊重都会损害心爱的玩具……直到现在我都感谢我爹，我最初的法制意识和时间观念，都是玩具火车培养的。这些和世界接轨的良好习惯使我长大后受益匪浅，即使浪迹天涯也能在时空中任意翱翔，避免一些国人容易犯的错误。所以我计划有朝一日生儿子，一定要多买几列火车，让他把我宿舍的每一个角落都铺上铁轨。



小时候我爸给我买过一套玩具电动火车，它不仅启迪男孩必须循规蹈矩奔驰在特定的轨道里，还教育孩子应该遵守时间。

伊拉克是一个和国际社会不接轨的伊斯兰国家，不仅像大多数中东国家那样限制拍照，而且由于战争状态而绝对禁止。根据1990-1993年间我四进巴格达的血泪经验，在伊拉克拍照应当尽量选择简单可靠、不引人注目的轻巧器材，目前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莱卡。莱卡相机轻巧精密、坚固可靠、不引人注目，轻巧的幕帘快门几乎没有什么噪音，万无一失的质量可以提供绝对的安全感，即使像我这样胆小如鼠的懦夫一旦摸到莱卡也会变得无所畏惧。美联社总编曾经说：“那些用生命冒险的亡命记者，有权拥有顶尖的摄影器材。我决不容许由于器材原因葬送冒险的勇敢者。”

2000年初，我曾向我的领导试探过伊拉克问题，可领导明确表示对巴格达不感兴趣，还劝我不要惹是生非。可我敢用我残破的生命打赌：“再过5个月，一些聪明国家会率先打破伊拉克的国际制裁……”尽管我一直患血液病在家休养，可我的脑子却从未休息。10

年前我曾向新华社社长穆青准确预见海湾战争在5个月后爆发；5年前我在《世界博览》和其后的《我钻进了金字塔》中再次预见逮捕我的巴拉克将军将来会成为以色列总理。我曾经为这些预言挨过处罚，可我坚信自己是卡帕再世，可以准确嗅出暴风雨前的腥味。

“乞力马扎罗是座白雪覆盖的高山，高19710英尺……在靠近西峰之巅，有具冻得硬邦邦的豹子的干尸。谁也说不清豹子到那样高的地方去寻找什么。”我就是海明威说的那只冻死的豹子。眼看着近视眼的功利社会堕落到对金钱爵位以外毫无兴趣，我开始按自己的道德准则单独行事。我崇拜的无数革命先辈董存瑞、彭德怀都曾为“解放新中国”破坏纪律，其实革命本身就是在破坏中发展壮大的。

首先我像小时候纠缠家里买玩具那样，软硬兼施取光家里的存款，买了莱卡、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冰冷的莱卡立即让我恢复了自信。1990年我和《民族画报》米老鼠凌风在海拔5000～60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连起码的淡水、氧气都没有，我把发烧的热脸贴到冰冷的相机上，莱卡的冷钢激起我无限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10年过去，对于一个几次濒死而生命无多的亡命徒，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可怕的。

机器时代的手工制品

莱卡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考验的相机，是伟大机器时代硕果仅存的纯手工精密产品。上个世纪初，年幼的小奥斯卡·巴纳克幻想当一名风景画家，可他老爹坚持把他送到柏林学习机械制造。凭着德意志特有的严谨，巴纳克很快在下萨克森制造出笨重的5×7相机。1911年巴纳克在35毫米电影机基础上制造出首部莱卡，人类从此多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莱卡采用全新的机械设计，使用便宜的35毫米电影胶片，坚固轻巧、简单可靠。这顶发明使摄影师摆脱笨重的三脚架，更容易贴近生

活拍摄生动逼真的现实主义作品。从1914-1923年制造了31台莱卡原形机，1926-1943年共生产了1500台莱卡II。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顿、隆美尔脖子上挂的都是这种玩具。莱卡使卡帕、西摩等战地记者破碎的生命以图片方式延长，老爹海明威称“它不仅看到事物的发展，还记录世界的变化”。人类社会从此进入“报道摄影时代”。

我买的莱卡M6是莱卡M系列的最著名的一代，它由950个零件组合而成，全部经受过-25℃～60℃的苛刻温度考验，每个工序都是德意志精神的经典体现。由于延续了百年精密机械工业精髓，所以凭借坚固机身和顶级镜头的完美组合，打败世界上所有电子产品。由于莱卡镜头没有任何突出物或连杆，即使在全黑情况下也能顺利更换镜头。根据规定，每台莱卡出厂时都编号存档，可以随时查到出厂时的机身、镜头、皮套编号，以及装配、检验员的姓名。

与日本镜头普遍使用的树脂玻璃不同，莱卡镜头傲视全球的秘密在于：每片玻璃都采用珍贵的天然莹石。为避免冶炼过程产生气泡，严格控制每小时温度变化不超过1℃，让玻璃释放出连肉眼也看不出的微小气泡，这使制造一片镜片需要一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莱卡独步世界的7层低温蒸熏镀膜处理，再由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用莱卡独家的泥液手工研磨，使其具有丰富色彩、饱满层次、刻画锐利表情的能力。世界所有镜片研磨的中心偏差率都是3.5/10000毫米，只有莱卡是1/10000毫米。

用过日本电器的人喜欢日本的奇技淫巧，其实真正稳固耐用的经典之作大都出自德语民族之手。去年我在北京赛特买了一只卡西欧TREK电子表，这只售价1880元的卡西欧除具有秒、分、时、日、星期、月、年外，还有指南针、海拔计、温度计、气压表，可谓功能齐全。想不到这个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碰上我这个混世魔王，一到巴格达就停摆不走。幸亏我还戴着海湾战争前在巴格达买的TAG Heuer，10年来这只瑞士大铁表随我游过死海、红海、地中海……这才好歹没有误事。回国后找到中仪大厦卡西欧维修部，光检查就花了87元，先

说没电，后来又说是接触问题。我在3个月里光电池就换了6块，还不算修理费、车钱和耽误的时间。我这才恍然施瓦茨科普夫指挥海湾战争时为什么要戴两块手表。

我在北京为我的莱卡配过一片售价800元人民币的原厂UV，买回家才突然发现不论怎么漫不经心拧上去，UV侧面的“莱卡”商标都精确对准镜头上的调焦标志，拆下来信手拧上去还是如此。我打赌东洋的龟田们就是再过一万年，也车不出这么精密的一刀螺纹。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考验的相机

我第一次接触莱卡是在1988年冬，那年我去秦岭拍摄野生大熊猫，老板担心尼康相机受不了严寒，随手扔给我个旧莱卡。秦岭位于我国零度等温线上，是古北届和东洋届动物的分界线，冬季气温远达不到冻坏尼康的程度，自然也显不出莱卡有什么过人之处。1990年我到海拔5000～60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生命禁区的一场大雪让我的三台尼康同时失灵。首先是20毫米广角漏油，以后灾情迅速波及所有的镜头，造成反光板抬起、快门张开时光圈收缩不到位，曝光严重过度，更不用提镜头解像力和坚固程度都不如尼康的佳能了。幸亏我还有备用的莱卡，危难之中才体会到什么叫“压力之下毫无惧色”。

从那以后我总随身带个莱卡，仿佛触摸莱卡就能获得安全，对神鬼莫测的未知命运也平添几分自信。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至今认为相机能摄取人的灵魂，对莱卡而言，这是真的。拥有莱卡可以体会平等自由的切身感受：简陋的外貌隐身于市井之间，旁轴取景器易于平等面对每一张面孔，轻微的幕帘快门时刻尊重被摄者的天赋人权……决不像佳能、尼康那样怀着十二分的职业优越感张扬着大炮般的镜头，马达快门咔咔咆哮，就像当年的“歪把子”。

莱卡是世界上唯一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肉搏考验的相机，特别是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残酷的战场肉搏，使莱卡由于“浴”血而获得灵性。德国陷落前，远在非洲的隆美尔匆忙给家里写信，要妻子把莱卡埋到森林里。巴顿座机飞临德国受到攻击时，担任掩护的飞行员看到巴顿掏出一件亮闪闪的东西比比画画，起初以为他用手枪自卫，事后才知道是用莱卡给自己拍遗像。这位最终被吉普车撞死的血胆将军坚信：“飞机一旦坠毁，只有莱卡是摔不碎的。”

1992年我到北非马特鲁港为隆美尔的指挥所献花，发现了隆美尔当年穿的雨衣、莱卡和望远镜。1996年我独自驾车环绕美国时，特地到位于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巴顿博物馆拜谒，在那里找到三台巴顿使用过的莱卡和一大堆莱卡镜头。和这三台幸运的收藏品不同，攻克柏林的苏联红军把莱卡拿来砸核桃。曾经为我的《我从战场归来》一书作序的著名战地记者萧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在德国买过莱卡，当时“美国兵用枪逼着德国女人睡觉……用1000支香烟从德国女人手中换一台莱卡”。

真正让莱卡死得其所的还得说摄影记者大卫·西摩，他脖子上挂着莱卡横躺在被高射武器打烂的吉普里。罗伯特·卡帕被地雷炸死时左手攥的就是莱卡，血脉贲张，仿佛正抓紧自己的生命。法国驻北越司令康尼（Rene Conny）将军打扫战场捡回两个打不烂的莱卡，冲洗胶卷后得到《罗伯特·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

21世纪使人类进入光电集成板的网络时代，上个世纪车、铣、刨、磨、钻出来的精密手工机械产品已经所剩寥寥。手工制造的莱卡突然像旧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那样炙手可热，有钱人开始把莱卡摆到书架上增加闲情野趣。可我总觉得把莱卡当股票投资是亵渎圣物。

偷拍

据最近出版的《文摘报》报道，由萨达姆长子乌代负责的一个部门最近颁布法令，将那些散布伊拉克谣言者处以“割舌”之刑。海湾战

争以来有关伊拉克的谣言铺天盖地，尽管我对此将信将疑，可伊拉克的确是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据此“法”类推，10年前我就该被处“剜眼”之刑。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前，我单枪匹马秘密潜入巴格达，丧家犬般穿行于巴格达的大街小巷。我右手捏着装了35毫米广角的莱卡，估计差不多就按一下，从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由于拎着公家相机所以并不在乎会不会被警察没收，“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新华社记者丢相机虽说不上家常便饭，但早已像雨后的蘑菇不胜枚举。我师傅在采访世锦赛的飞机上丢过整个器材包，还有各级领导纷纷把相机丢在汽车里、客房里、包厢里、大海里……就是没人把相机丢在战场上。最后一位采访2000首脑会议的老兄，居然在江主席抵达前，在餐厅里一次弄丢价值30多万人民币的全套装备……

海湾战争爆发前一天，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在阿布·努瓦兹大街叫住我，用比我还臭的英语质问我是不是拍了路边的橱窗。我告诉他，我可以对安拉发誓：绝对没有。我始终拎着这只破相机，根本就没端起来。警察说他刚接到举报：日本人偷拍商店的供应情况。我说极有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兄弟，你没见我身上大写着“西尼夏比（人民中国）”吗？说着翻出衣领下写有中、英、阿文的身份识别牌。警察将信将疑低下头一直读完我的血型B，才说可能弄错人了。我又喊了几声“打倒布什”，弄得警察肃然起敬。正如《培尔·金特》所言：“当狼群在外面的时候，最保险的是跟着狼一起嚎。”



警卫卡迪西亚广场的共和国卫队严禁拍摄，这是用莱卡M4＋35mmf1.4偷拍的。（唐师曾　摄于1991年1月）

卡迪西亚广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濒临萨达姆总统府，政治上相当于天安门，军事上可以充当战备机场。海湾危机以来一直被列为伊拉克头号战略目标，由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守卫。据说英国《经济学家》的巴佐夫特就是拍摄了这里的军事设施，才被伊拉克判处死刑。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为此专门跑了一趟巴格达，最后劳动撒切尔出面也没能留住巴佐夫特的小命。海湾战争爆发前两天，我脖子上挂满尼康，右手捏着其貌不扬的莱卡径直走向值勤的共和国卫队。一位少尉命令我停下来，可我坚持走过去，抱着他行“萨拉马利空”吻腮礼，他的大胡子扎得我挺痒。我对他举起莱卡，比画着按了一张：“素拉蒙肯（照相可以吗）？”莱卡轻柔的快门丝毫没有引起士兵注意。他连连摆手：“木须蒙肯（不行）。”接着双手一合，做了个戴手铐的姿势。我温顺地把满身的相机堆在地上，从他们手中的AK-47冲锋枪侃起，直到叙利亚的女孩最美。“暴力色情”迅速扭转了士兵对相机的注意力，我就这么有了独家的卡迪西亚广场照片，这张照片被新华社编

发后上了数不清的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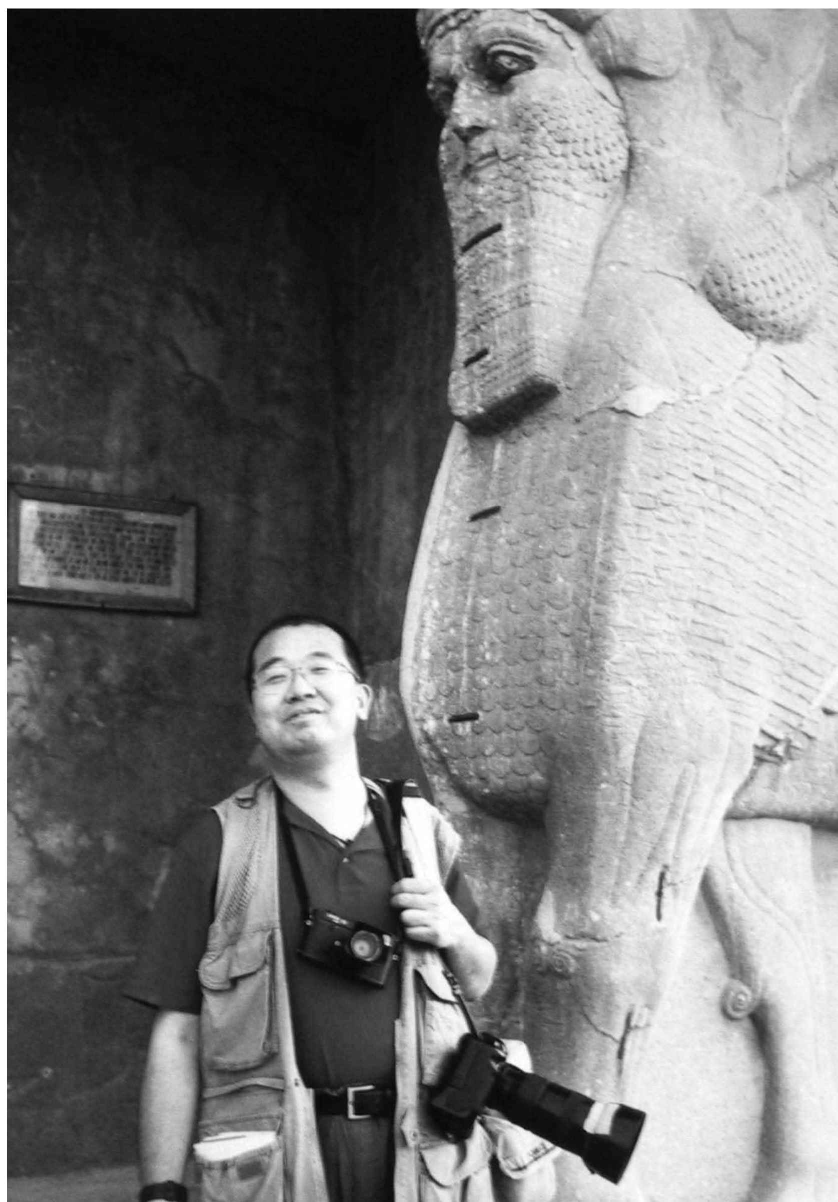
玩火车的男孩信守诺言

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伊拉克冒险，一个40岁的男人应该把莱卡放在书架上静等升值，韬光养晦。可我理想中的人生不是正处正局、谋点赃钱，而是10年前就对耶路撒冷发过誓的“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尽管10年过去，我也觉得当年这三条愿许得挺孙子，除第一条给自己树立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外，第二、三条都是苛刻他人。但“玩火车的男孩必须信守诺言”，所以尽管疾病缠身，我还得努力履行当年在耶路撒冷和神立的约定。

2000年5月20日，我脖子上挂着莱卡重返底格里斯河畔，耳轮中响起熟悉的穆斯林晚祷声，月色朦胧可以辨别出圆顶清真寺和细高的宣礼塔。微风拂面，迎面吹来阿拉伯大烟和土耳其咖啡的混合辛辣味，以及污浊的河水带来的粪便恶臭搀和着椰枣树的芳香。在各种气味中，我迅速辨别出一种暗藏的特殊霉味，像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旧书，弥漫着一种年代久远的味道。还有就是强壮士兵发达汗腺在棉布军装上蒸发的咸味，它让我油然产生一种冒险犯难、铤而走险的莫名激动。

昔日武装到牙齿的广场依然戒备森严，我背着新买的莱卡，轻车熟路地来到卡迪西亚广场。这是1990年以来我首次重返卡迪西亚广场，自从那次成功的偷拍以后，尽管我四进巴格达，都始终没敢再来。多年来我疯狂追求的不是工作的结果，而是一个完美的连续过程，我喜欢享受工作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体会不为名不为利的纯粹冒险。就像听交响乐不能穿T恤、吃西餐需要有幽雅的环境，采访伟大事件也必须使用伟大的相机。我蓄谋已久地故技重演，再次偷拍死气沉沉的卡迪西亚，尽管我很担心自己的莱卡会被共和国卫队没收，倾家荡产动摇我活下去的勇气，可我更希望我的莱卡在巴格达淬火。我

再次对自己重复红袍恺撒的语录："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



这里是伊拉克古城亚述，也称"狮城尼尼微"。我的儿子唐亚述就是在这里孕育的。



2000年5月，安曼。中国驻约旦使馆还没上班，在门口等得百无聊赖哈欠连天。海湾战争时期我在这里住过。那时我是这座建筑的主人，持公务护照，算“外交人员”：现在是“因私出国”，只能住旅馆。



我的镜头前是中东四个与美国叫板的国家的前驻华大使。右一为前伊拉克驻华大使库巴，回国后出任伊拉克副外长，2004年6月死于汽车炸弹。右二为前利比亚驻华大使，回国后亦任副外长。

防空洞里的冤魂

战争是无限制地使用暴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西点1899级学员麦克阿瑟属于同一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靠武力开拓疆土的年代里。那时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罗斯福的联合国还孕育在襁褓中。毛主席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祖宗基业的沃土上重建一个国家；麦克阿瑟“在读书写字之前就会骑马打枪”，从美国西部大荒地一路打到菲律宾、朝鲜、日本……

各国政治家习惯引用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所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所有军人都喜欢克劳塞维茨紧接着说的另一句话：“战争是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和平环境里的人们即使驰骋天才的想象力，也无法理解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坐在餐桌前品着冰镇啤酒欣赏施瓦辛格战争大片，与离开自来水、交流电走向神鬼莫测的现代战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长期乏味的平静生活，容易诱导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产生不着边际的浪漫想法……我就出生在一个上山下乡、砍树填海、大炼钢铁、反帝反修的浪漫年代，由于到处都潜伏着阶级敌人，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你死我活的血腥味。

我上小学时正赶上中苏交恶，毛主席战略调整“国际支左”，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我们大翔凤小学全体革命师生分批前往圆恩寺影院，先看《地道战》后拆安定门。每人书包里一块城砖，浩浩荡荡一直运到后海边上的大翔凤小学，再全部转入地下修了防空洞。那时全民皆兵每户必须按人口上缴几十块砖坯，连我

们胡同口上的革委会也建起了砖窑，桌子板凳黑烟缭绕。每条胡同都开肠破肚构筑防空洞，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只可惜北京胡同原本狭窄，“自攒”的地道委蛇曲折难免触及墙基，一场大雨淹掉了不少，还弄塌许多房子。那些残存的防空洞也在1976年大地震中灰飞烟灭……天性邪恶的是非之人将其解释为“阶级敌人破坏”。

由于自幼对防空洞倾注血汗感触颇深，所以这次重返中东路过莫斯科，特地拜谒因反法西斯战争闻名的莫斯科地铁。从红场钻进莫斯科中心地铁站，仅从外观看其深度就令我震惊，保守估计这里的深度至少是我们家八宝山地铁站的5倍，更不用说当年我在大翔凤小学参与的一人多深的防空洞了。至于建筑材料更是苏联最拿手的钢铁水泥，老大黑粗千年不朽，不像我妈的土坯酥脆易碎或是我从西直门拆来的城砖裂纹斑驳……194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阅兵后，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从这里开赴苏德战争前线。想到这儿，我的后脖颈子直冒冷汗，幸亏当年社会主义老大哥仅在新疆和珍宝岛擦枪走火没动“核武”。毛主席英明决策及时从“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转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上，又从大西洋请来了尼克松。否则很可能就没有我这张鸭子嘴在这里聒噪了。

阿米里亚掩蔽所

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在讲到巴格达时说：“1991年海湾战争中，巴格达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军事联盟的广泛轰炸。财产损失程度、平民伤亡人数及对巴格达全体人民的社会经济影响，在空袭停止数月后尚不清楚……”

中东多年战乱，早在海湾战争以前巴格达就是一个饱受轰炸的城市。由于生活在以色列、伊朗空袭的阴影里，伊拉克所有人口密集的生活区都修建了大型防空掩蔽部，仅巴格达市区就有大型防空掩蔽部44个。这些现代化的掩蔽部全部由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防空经验、严

守中立的北欧国家芬兰、瑞典设计施工。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防备核子武器、生化武器的功能，发生空袭时50吨重的巨型金属门会自动关闭。



巴格达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警告牌：“遇空袭，这里有地下

掩蔽所”（唐师曾　摄于1991年1月）

在新华社巴格达分社通往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路上，有一个外形酷似奶油蛋糕的乳白色建筑，整座建筑没有窗户，白墙上装饰着深绿色伊斯兰图案，墙的边角上有一个关闭的铁门，用阿拉伯文写着“公用掩蔽所”。10年前我第一次去巴格达就注意到这座漂亮的神秘建筑，以后每天从分社开车去大使馆路过这里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只是当时黑云压城濒临战争，守卫这座漂亮建筑的士兵不允许外人靠近。直到1991年2月被多国部队摧毁后，伊拉克政府才组织记者参观美帝的滔天罪行。

被“暴行”袭击的掩蔽部位于巴格达阿米里亚区（Amiriya）。从外观上看，整座建筑完整无损，只有通风口残留着烟熏火燎的痕迹。据伊拉克官方介绍，阿米里亚区共有10个类似的民用防空掩蔽部，全部由芬兰、瑞典设计建造。1991年2月13日巴格达时间16点，多国部队的两颗激光制导炸弹命中这里，造成上千人死亡，经CNN报道后引起世界震惊。伊拉克外长阿齐兹立即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对多国部队蓄意袭击民防设施提出严重抗议。而美国只承认“误炸”，他们声称“根据确切情报，那里是伊拉克军队的作战指挥部”，且只承认炸死了400多人。巴格达把阿米里亚惨案归罪于当年参与设计的“外国人”把图纸出卖给美国人，所以对所有背照相机的外国人都深恶痛绝，殃及我这样的摄影记者。

杀死每一条生命都是残酷的

一位被称为“海达妈妈”的老妇人一袭黑衣，闪亮的金项链上挂着一个小镜框，镶着10年前她和儿子海达的合影。想不到眼前这位衣着肮脏、形容枯槁的老妇人，就是照片上那位满脸灿烂的美少妇。陪同穆罕默德介绍：在美国的这次“误炸”中，海达妈妈失去了9个亲人，全家只有她一人幸免。难怪我在巴格达的几天里看到的都是畸形、扭

曲、木然的脸，凄苦、无奈又默默忍受。这种表情只有我在北京医院骨穿手术台上才会看到……战争不仅在生理上消灭人的躯体，更在心理上摧毁人的意志。



1991年2月13日两颗激光制导贫铀弹命中巴格达阿米里亚平民掩蔽所，伊拉克声称炸死平民1500多人。（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1991年2月13日16点，海达妈妈因为晒衣服临时离开阿米里亚掩蔽部。就在这时，一枚激光制导的贫铀弹穿透几十米的地面和钢筋水泥墙体，把掩蔽部炸出一个大洞，火光伴随着爆炸的巨大压力把人撕成碎片贴到墙壁上。5分钟后，第二颗激光制导炸弹从刚打开的大洞一直钻入掩蔽部内，这是一枚2000磅的燃烧弹。凝固汽油燃起冲天大火，烧焦的尸体在墙壁上形成人形图案。大火造成4500℃的高温，转瞬间把没被炸死的老人、儿童烧成灰烬。掩蔽部的自动灭火装置为灭火喷出高压水龙，大水和密封的高温交汇成沸腾的开水和滚烫的蒸

汽，顺着通道流到下面一层，把底下一层炸伤、烧伤的活人全部烫死……只有14人由于外出幸免于难，海达妈妈就是其中之一。



在阿米里亚掩蔽部丧失9个亲人的海达妈妈在轰炸现场谴责美国罪行。1991年2月13日，多国部队空袭这处掩蔽部，两枚燃烧弹先后从同一洞口钻入，据伊拉克官方介绍杀死1500多人。临时出去晒衣服的海达妈妈侥幸成为幸免者。（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4500℃的高温把被炸死者的双手贴到天花板上烧成焦炭。（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葬身火海的亡灵不仅有伊拉克人，还有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约旦人、黎巴嫩人、也门人、苏丹人……据陪同穆罕默德介绍，“阿米里亚防空洞中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但美国只承认400人的死亡数字。作为记者，我无法判定哪一方的数字更为精确，追究1000人或400人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死每一条生命都是残酷的，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对世界，阿米里亚仅是一条灾难新闻；对海达妈妈，她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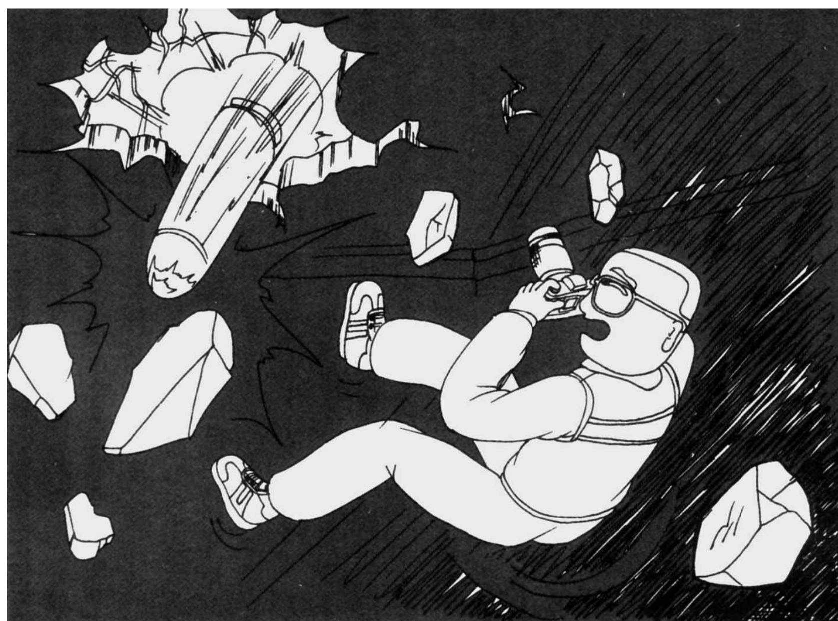
实力悬殊的高科技屠杀

据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宣布：海湾战争持续42天，联军出动飞机10万架次，损失38架；陆军摧毁伊拉克坦克3800辆，损失15辆；装甲部队100小时推进405公里，是战争史上最神速的装甲行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部队损失超过10万人，而多国部队伤亡、被俘、失踪

加在一起不到100人。显然，海湾战争更像一场实力悬殊的高科技屠杀。

出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能的危机意识，美国一直夸大伊拉克的军事实力，但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不等于具备现代化作战能力。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堪称局部战争之最，两个石油富国投入1000亿美元以上的先进武器。但由于军队文化素质低，始终没有正规空战，轰炸机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装甲部队把最好的坦克固定在地面当火炮使用……

我在《我从战场归来》中引用圣·桑切斯特军校对1982年发生的两场战争的评价："英阿马岛战争是昨天的战争；以色列沙龙在黎巴嫩进行的是明天的战争。"可惜并未引起足够注意。中东不仅是《圣经》《古兰经》的诞生地，也是人类有记载的第一次战争——图特摩斯法老征服叙利亚战争的发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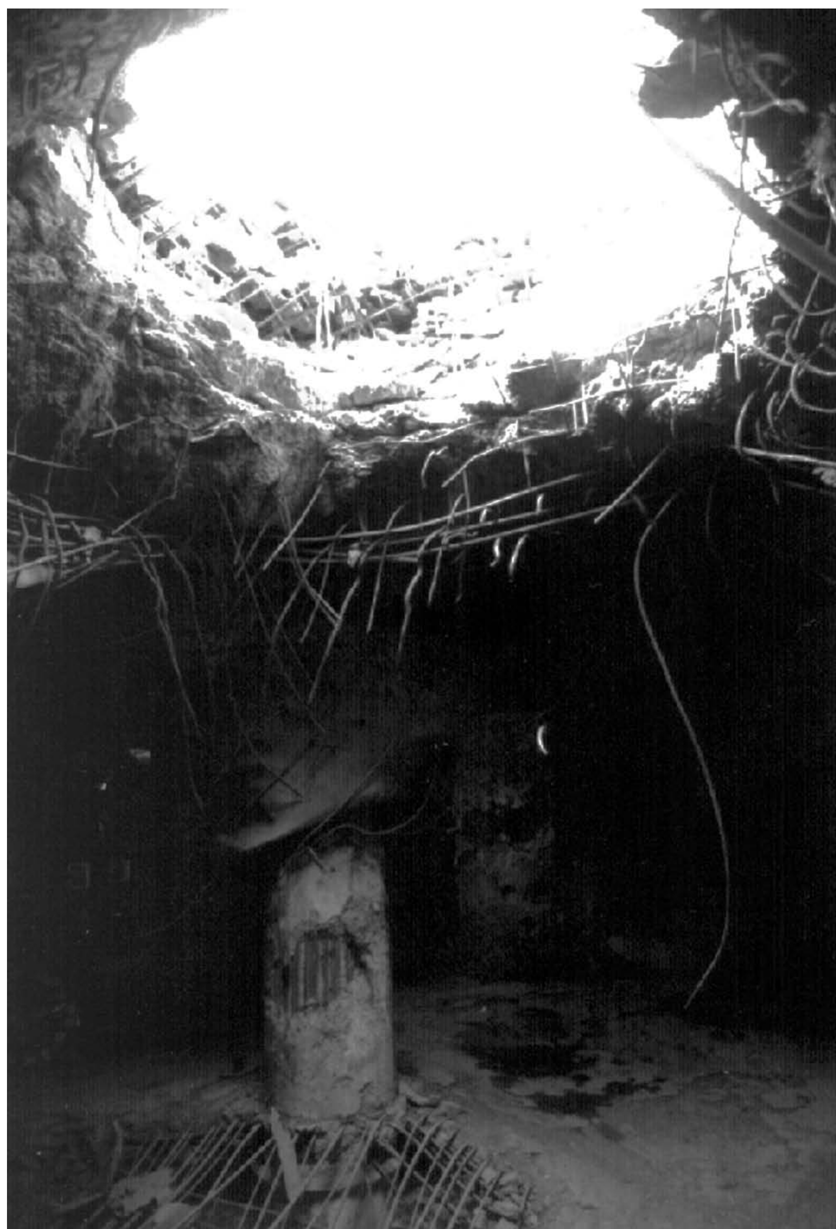


海湾战争中通用的精确制导炸弹是由MK-84常规空投炸弹改

装的，在弹头加装了精确制导装备，重达900公斤，能从通风口钻进通风道，到达建筑物深处爆炸。

据巴格达民防部队比沙拉中尉介绍，海湾战争和越南战争不同，集束炸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已经取代传统常规炸弹。这些激光、电子制导系统的精密武器可以在火箭发动机驱动下主动飞向目标。海湾战争中通用的精确制导炸弹是由MK-84常规空投炸弹改装的，在弹头加装了精确制导装备，重达900公斤，能从通风口钻进通风道，到达建筑物深处爆炸……海湾战争首次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飞行时速高达550海里，可自动辨认地形、修正航路，弹头上的摄影机把摄取的图像与计算机储存的图像精确比较，再由计算机对导弹的机翼、尾翼作最后调整，把弹头精确导向目标。

贫铀是对核反应堆进行处理后得到的一种副产品，又被称为武器级铀。贫铀弹被美军视为20世纪90年代的超级武器，有“银弹”之称，在海湾战争及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都曾被大量使用。仅在海湾战争中，美英发射的贫铀弹就达70～100万枚，共有1400多辆伊军坦克被击毁。一枚120毫米口径的反坦克贫铀弹装有4公斤固体贫铀，杀伤力相当强。它能不费吹灰之力穿透坚固的装甲，并在爆炸后燃烧，产生许多有毒及辐射性碎弹片和尘埃。贫铀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导致癌症、不可逆的肾损伤、免疫系统紊乱、生殖功能下降，甚至还有研究人员称贫铀会从基因上改变细胞。



1991年2月13日16点和16点05分，两颗激光制导炸弹从同一弹洞炸穿具有现代防护能力的巴格达阿米里亚民防设施。（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在42天的海湾战争中，美国花费了70亿美元，其他国家共花费540亿美元，其中2/3是沙特和科威特出的，余下的1/3是德国和日本出的。各项经费总和610亿美元，是20世纪钢铁含量和科技含量最高的战争，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战争。海湾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科技、经济对不同人群的融合，美国从此合情合理进入中东。

20世纪充满了战争。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科技水平最高、破坏程度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耗资最昂贵的战争均发生在这个世纪。20世纪又是人类艰苦追求和平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由于人类汲取大战教训更热烈地企盼和平、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所以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均为局部战争。随着历史的进步，对和平的渴望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而科学、经济的发展又缩小了不同人群的距离，20世纪成为人类从战争逐渐走向融合的世纪。



丽娜是贫铀弹辐射的受害者，母亲对患白血病的丽娜绝望之极。（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切尼把海湾战争胜利归功于“先进技术和高质量人才”，特别是高质量人才。可惜历来重物轻人的中国人还没有注意到人才的重要性。其实恩格斯早就讲过：“枪自己是不会动的，它需要坚定的心和勇敢的手。”

贻害无穷贫铀弹

癌症、畸形、基因缺陷

《中国环境报》1999年5月26日报道：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居民已开始限制户外活动。据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说，通常在南斯拉夫栖息的大批鸟已经迁徙到马其顿避难，这些鸟显然遭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新华社巴黎1999年8月7日电：英国生物学家罗杰·科格希尔认为，美国飞机在南联盟投下的贫铀弹使巴尔干地区的白血病、癌症患者明显增多。到2000年秋季，巴尔干将出现第一批因放射性污染造成的白血病、癌症患者，死亡人数将在未来几年内超过1万人。

据介绍，美国对南联盟投掷的贫铀弹已经使整个巴尔干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放射污染，截至1999年6月中旬，希腊北部城市的放射指标高出正常标准25%；在保加利亚，这一指标达到正常值的800%；在南斯拉夫则达到了3000%。各国专家普遍认为，贫铀炸弹会使受害地区相当数量的居民罹患白血病等癌症，并导致婴儿严重畸形。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英国专家提供的数字，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78天的轰炸中使用的导弹、航空炸弹含有23吨贫铀弹芯，潜在的杀伤性直接威胁50万人的生命健康。爆炸后的铀芯蒸发并随风飘散，伤害人和动物的肺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导致白血病和神经紊乱。



激光制导炸弹准确命中政府部门，与其比邻的清真寺安然无恙。（唐师曾　摄于1991年3月）

希腊的24个环保组织集会，就北约轰炸的后果提出警告：“由于

北约轰炸地区处在欧洲东南部广大地区的中心，鉴于塞尔维亚是欧洲地下水最大源泉之一，其危险程度是非常可怕的。其严重的后果将持续几十年，危及好多代欧洲居民。”

轰炸引起的油库和炼油厂大火造成滚滚浓烟向大气层释放二噁英，它可以积累在人的脂肪中，损害生殖器官，造成下一代先天缺损，导致基因障碍和不育症。据科学家报告：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初期，空气中的二噁英含量增加了14倍。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雅典分会的谢尼声称：“北约轰炸破坏多瑙河湿地环境，毁坏了整个生态系统。”

看到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我开始担心年届40、依然无嗣的我真要断子绝孙。北约维和部队开进科索沃没多久，便有士兵说全身无力、眼睛昏花，怀疑自己染上“海湾战争综合征”。剑桥大学世界保护监督中心肯特·卡赛尔斯日前警告说，5万名科索沃维和部队都可能会染上这种怪病。好在美国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评估，联合国已经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评估科索沃战争对人类健康及其环境的长期影响。

但与位于欧洲家门口的科索沃不同，尽管连美国的海湾战争参加者也普遍患上“海湾战争综合征”，可海湾战争10年来，始终没人调查贫铀武器对海湾地区的污染。

谈“铀”色变

贫铀是铀235的衰变提取物，简称“贫铀”。其密度为18.7克/立方厘米，是钢的2.5倍，军事上用于摧毁坚固的建筑物。美军目前生产的贫铀炸弹有5种口径（20毫米、25毫米、30毫米、105毫米、120毫米）共8个型号，最大穿甲厚度可达800～900毫米。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装备贫铀弹的国家，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

（Aerojet）和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早在1976～1979年间就为A-10攻击机生产了约1000万发30毫米航空炮弹（GAU-8），其中47%为贫铀弹芯穿甲燃烧弹。同时还研发了贫铀合金破甲弹、贫铀穿甲燃烧弹和贫铀装甲等。1991年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主要使用了口径30毫米航空炮弹和120毫米坦克炮贫铀穿甲弹。

截止到20世纪末，常规铜药型罩破甲弹的破甲性能约为筒圆锥药型罩最大直径的7倍，而铀合金半球形药型罩的破甲深度竟达到了药型罩最大直径的10倍。100毫米常规铜药型罩坦克破甲弹破甲深度只有700毫米，如果将药型罩材料换为贫铀合金，则破甲深度将陡增至1000毫米。贫铀合金穿甲时本身具有的燃烧性可以增加穿甲、破甲后效，成为不加燃烧剂的穿甲燃烧弹。

人们之所以谈“铀”色变，主要是贫铀弹的放射性弹片、碎屑、粉尘和氧化物的放射性长期存在，它所造成的污染将持续4000～5000年。贫铀粉尘及氧化物一旦通过食道、呼吸道进入人体，就会形成远期内辐射，人的肺、肝、肾脏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贫铀还具有砷、汞、铅等重金属具有的毒性，其半衰期为71亿年。当贫铀弹击中目标时往往断裂成较多碎块，四处飞散，散布面积很大。美军30毫米航炮发射的贫铀穿甲弹，每秒钟射出或回落至地面16～20千克铀合金，而且呈大面积散布，相当一部分弹头还将射入地下，给战场清理造成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除进行人工探测和洗消外，需要以探测车进行大面积探测清扫。由于贫铀金属的燃烧性，击中目标时产生大量贫铀氧化物以烟尘状态附着地面，污染食物链和饮用水链，成为危害人畜健康的隐患。



一枚没有爆炸的2000磅贫铀弹（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1998年12月2日新华社巴格达电：到当时为止，多国部队已经在伊拉克投掷了700～800吨贫铀炸弹。海湾战争10年来，伊拉克国土由于受到贫铀污染，出现许多奇怪的疾病。大批儿童患血液病，白血球、血小板降低；脱发、流鼻血、记忆力下降、免疫力丧失……

几年前我不幸罹患血液病，辗转多家医院住院治疗，三次骨穿、一次骨髓活检、一次活体培植……依据自身经验先实践后理论苦中作乐，学了不少血液病知识。综合北京军区总医院血液科秦似龙军医、301医院血液科王永平军医、协和医院血液科主任张伯龙博士的说法，血液病的主要症状是：贫血、血小板减少造成的出血，和感染造成的发烧。贫血可以有多种表现：血小板减少会引起牙龈、鼻子出血，严重的还会脏器出血，如肺出血、脑出血导致死亡。感染方面主要表现为发烧、白细胞增多或减少。

战争综合征

2000年9月10日《北京晨报》报道说，法国保护海湾战争受害者利益协会8日致信法国总理若斯潘，要求政府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参战士兵患“海湾战争综合征”的情况展开调查。该协会同时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目前共有155名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老兵不同程度地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征”，其中55人症状明显。他们大多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甚至癌症，还有一些士兵生下严重生理畸形的后代。

2000年9月3日，欧洲核医学协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前美国陆军上校阿萨夫·杜拉科维克宣称，“海湾战争综合征”的真正祸源是美军所发射的大量贫铀弹，“数万名”美英海湾战争军人正因贫铀弹辐射而面临死亡的威胁！

杜拉科维克现在是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一名核医学教授，曾主管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事务部驻达拉瓦医院的核医疗工作。他领导的一个由美加科学家组成的联合小组发现，在海湾战争结束9年后的今天，海湾战争参战军人体内仍存在足以危及生命安全的超标准贫铀。他们对其中17人所进行的检测表明，这些人70%的尿液及骨头中均发现有贫铀。他的结论是，参战的军人吸入了微小的铀颗粒物。

海湾战争期间，美陆军第3装甲师士兵杰里·维特驾驶M-2“布雷德

利”步兵战斗车，在混战中先后两次被友军击中，因受伤获美军“紫心”勋章。战争结束后他回到老家新墨西哥州，不久发现关节、腹部、头部等处经常不明不白地隐隐作痛，贫铀弹不仅让他身患怪病，也连累了他一家人。自从他回家后，他家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他的长子乔因呼吸困难住进了医院，而在此之前乔一直都是好端端的；战后出生的小儿子德里克双手长出了奇怪的水疱，连医生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妻子流了产；去年，维特肩上又长了个肿瘤。

越战期间美军在越南撒下了大量有毒的橙剂，并在越战结束多年后一直掩盖真相。有人认为，美军在“海湾战争综合征”问题上与越战同出一辙。迫于公众压力，五角大楼多次出面解释“海湾战争综合征”的原因可能是紧张、油井大火和伊拉克的生化武器。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率领，由斯坦福、哈佛、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开始调查“海湾战争综合征”。

道格·洛克是美国陆军医疗防治司令部中尉，海湾战争中率领陆军医疗组负责清理被贫铀弹击毁的受污染车辆。洛克认为：“显然军方知道真相，但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1991年3月开始清理被污染的装备和伤亡人员时，我们曾收到两份秘密备忘录，其中一份被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备忘录》。”该备忘录由M. 兹耶姆中校撰写，其中提到：“贫铀弹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没人证明贫铀弹在战场上的有效性。由于贫铀弹政治上不被接受而禁止使用……望在撰写报告时谨记保密。”

第二份备忘录是国防核研究局下发的，该备忘录称：“使用过的贫铀弹所产生的阿尔法粒子（即氧化铀尘埃）对健康的影响应予以关注，弹片及贫铀弹产生的贝塔粒子会严重威胁健康……”洛克认为，这两份备忘录足以证明美军高层事先知道贫铀弹对人类和环境的恶劣影响。

目前，不少海湾战争美军人员仍在奔走呼号，希望能向五角大楼

讨个说法。12名曾在前南地区服役的英军士兵以身患“巴尔干综合征”为由，正准备起诉英国国防部。他们所患综合症与北约在科索沃使用贫铀弹有关。研究表明，贫铀弹爆炸后产生的放射性、有毒微粒和尘埃会污染水源和土壤；重金属污染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例如癌症、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以及生殖系统退化。

贫铀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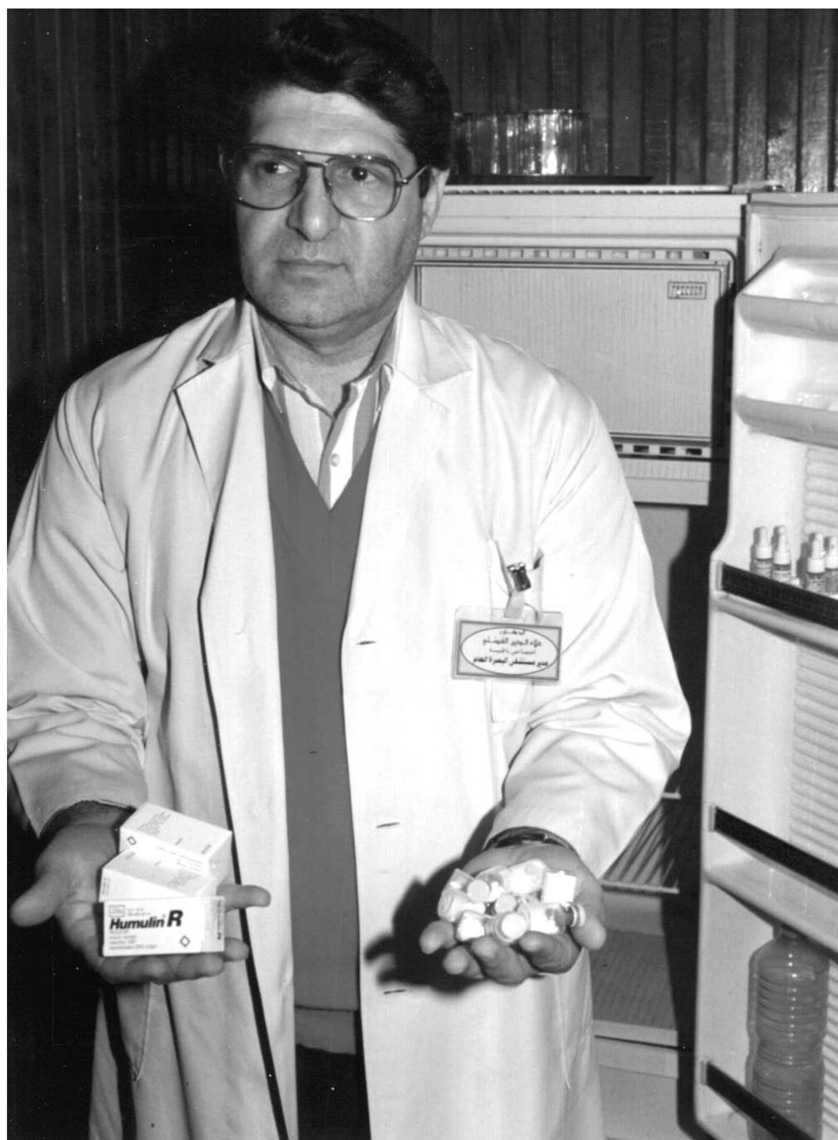
在国际制裁伊拉克10周年前夕，我流着鼻血拖着病躯冒着开除公职的危险，持因私护照重返伊拉克，就是希望用相机和笔让世界了解战后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状况。10年国际禁运使伊拉克人民饱受摧残，伊拉克已经有130万人死于制裁导致的食品和医药短缺。目前伊拉克的发病率、婴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比例已经和南撒哈拉沙漠地区不相上下。

我妈从小就看出我是只没长头的大苍蝇，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率性而为的荒唐事，我甚至怀疑“荒唐”这个词就是因我而来。尽管我残破的人生中充满了戏剧性的突变，可在伊拉克陪同面前仍是小巫见大巫。同行的伊拉克陪同做事很怪，事先从不告知次日的活动安排。每天清晨都是上车以后才突然告诉你要去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个人性格决定，还是有什么其他考虑。这天早晨，我们照例先上车，等汽车开出一段距离之后才被告知：要去参观萨达姆儿童医院。这种突然袭击的安排使我连事先准备的礼品也没能带上。

萨达姆儿童医院建于1986年，曾经是中东地区最先进的儿童医院，擅长治疗癌症和各种急慢性传染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长达10年的国际封锁禁运，造成药品奇缺、医疗设备严重老化。许多一般的小病由于缺乏必要的处理而酿成大病，比如严重缺少抗生素使普通感冒发展成肺炎，空气和饮用水污染又加剧了病人的病情恶化。海湾战争前平均每两天死亡一个病人，现在每天都要死三四个人。伊拉克

患癌症的病人人数，较海湾战争前增加了大约10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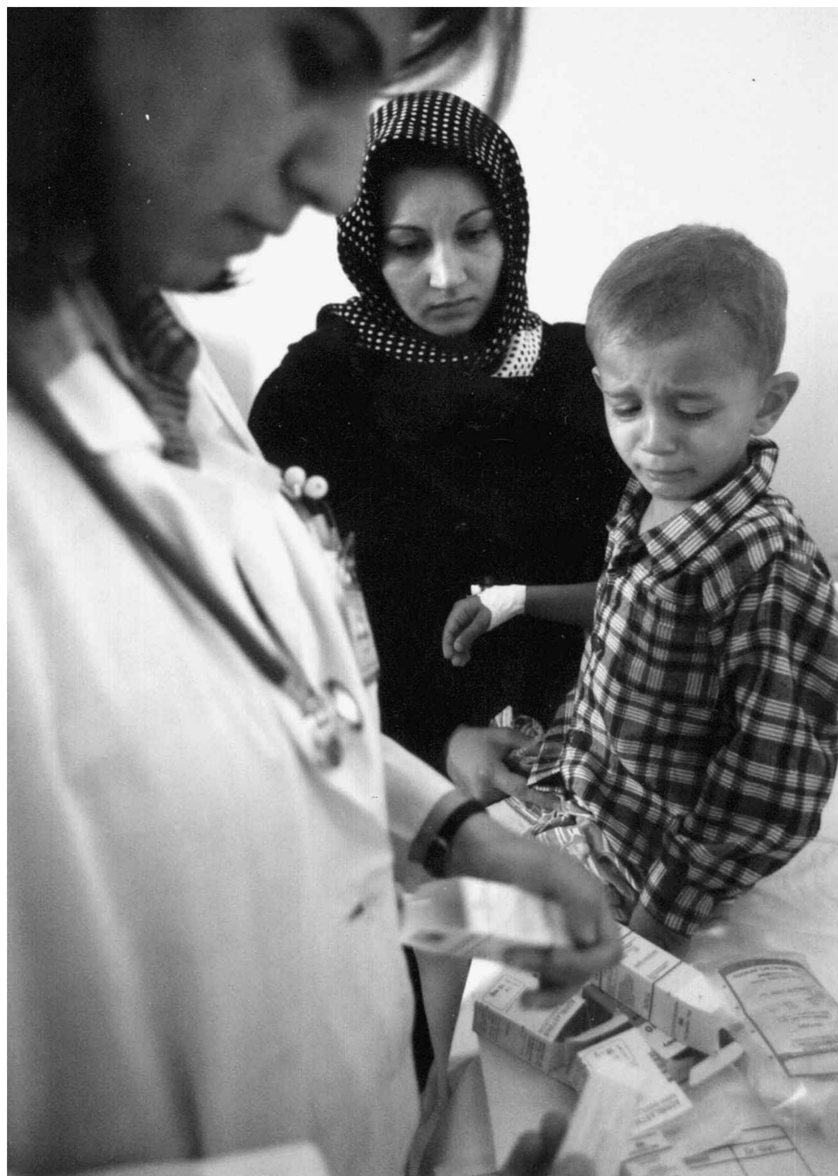
萨达姆儿童医院现在开设两个急救中心，有370张住院病床，专门救助那些遭受贫铀武器伤害的重症儿童。接待我们的巴西姆（Basim A．Abidiili）医生介绍，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许多此前从未发现的奇怪血液病大量出现，至今查不出病因。病的症状是流鼻血、出血不止、瘦弱……萨达姆儿童医院每天门诊超过1100多人，其中1～2人为急重病人。尽管该医院建成时曾经是中东地区设备最先进的医院，现在却只有一个血库，连CT都不能做，并且目前全巴格达只有两台CT机。由于国际禁运，不仅急需的医疗设备不能进口，就是用于一般治疗但要求严格保温条件的医药和血液制品也根本没办法空运进来，平均每天都有几个得不到妥善治疗的儿童夭折。



巴士拉省总医院院长阿拉艾拉丁告诉我，他的医院仅剩这几瓶药。（唐师曾　摄于1993年7月）

一位妇女嘴里不停地机械重复着“钱，钱”，她正通过乞讨为她毫无希望的孩子筹集医疗费。一进病房，一股腥臭夹杂着潮湿的热风扑

面而来，挤了十几张病床的病房里寂静无声。夏季巴格达的最高气温接近50℃，由于没有空调，几位身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正摇晃着扇子和硬纸板为各自的孩子降温。嘈杂的风声加强了不安的感觉，连往来飞舞的苍蝇振翅声也突然变大。战乱造成巴格达水荒，连伊拉克传统降温的水风机也无法开动，医院无法保障洗澡用水，甚至没有清洁的饮用水。所有病人都面无表情，像一座座雕塑。病房里一片死寂，只听见机械失灵的鼓风机的不规则转动声。望着他们一个个瘦弱病态的身躯、一双双茫然无望的眼睛，我手足无措不知该问些什么。我把口袋里的钱、食品全掏出来，直埋怨陪同没有提前告诉我今天来这儿，否则我会带更多的东西给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害怕打针的侯赛因·巴桑，5岁。（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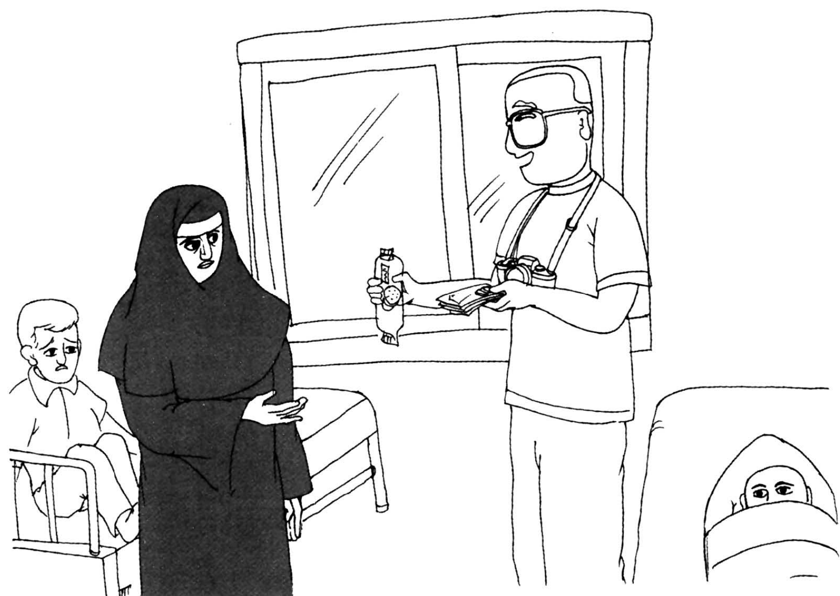
与我们同时到达萨达姆儿童医院的还有美国人丹尼·加西亚（Danny　Garcia），这位家住加利福尼亚圣迭戈的老美从约旦首都安

曼沿“死亡之路”徒步走了近1000公里，一直走到萨达姆儿童医院，呼吁全世界关注伊拉克的贫铀弹儿童。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同情伊拉克人民的遭遇并开始采取一些人道主义援助，呼吁尽早解除对伊拉克的国际禁运。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期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自1990年联合国对伊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来，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伊拉克儿童的人数同制裁前相比增长了两倍多。伊拉克政府把海湾战争以来出现的大量怪胎、先天缺损、白血病和儿童癌症归罪于多国部队的贫铀武器。巴格达官方数字显示：1989-2000年伊拉克死于腹泻的人数上升了2084.9%；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上升了1989.9%；死于营养不良的上升了3074.4%。但美英政府指责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应对此负责，美国务院发言人称，由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就没有出现儿童死亡率上升的现象。



贫铀儿童芭提玛，13岁。（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一位妇女嘴里不停地机械重复着“钱，钱”，她正通过乞讨为她毫无希望的孩子筹集医疗费。我把口袋里的钱、食品全掏出来给了她。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些孩子生下来就在一个污染、制裁的环境里，像一群出生在笼子里的小鸟，让我想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中国成语。我个人认为，即使他们的父辈犯过与国际规则和惯例不符的罪责，但把由此带来的灾难后果放到这些无辜的孩子身上，都是残忍和不公平的。我不忍心再看眼前的一切，我唯一能做的是让人们知道这里的孩子的生活状况。孩子们无助的眼神、母亲们无言的泪水，似乎在写着什么……



身边躺着芭比娃娃的海达，7岁。（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为防止鲜血乱喷，5岁的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的鼻孔塞满棉

花。（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沉重的母亲

悲剧无处不在

萨达姆儿童医院的压抑气氛让我喘不上气来，我请求陪同是否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医院以外的其他儿童。也许被刚才医院里的无助气氛和我在病孩子面前流露出的本能的同情心所感染，陪同竟然爽快地应允我们可以任选一家民宅“破门而入”。

敲开巴格达Athamiya区的一个普通人家，家里有婆婆、儿媳和孙子三世同堂，孤儿寡母对我们突如其来的造访显得手足无措。年轻妇人的丈夫在海湾战争以来的某次轰炸中失踪，她的公公、老妇人的丈夫在两伊战争中战死。缩在年轻妇人怀里的儿童叫格桑·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虽然已经四岁但看上去只有一两岁的样子。由于先天没有食道，吃饭得用手指强行把食物直接捅进胃部。据说这是一个受到战争污染生育的怪胎，由于没有医疗器械无法进行手术。

他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已经很破旧，但仍然显得很温馨。房间里摆着德文版的文学名著，居室陈设也很有情调，可以看出主人的品位。两代寡妇守着他们的宝贝孩子，一再请求能否呼吁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并留下详细通讯地址：Baghdad Athamiya Haybat Khatoon 314, 11， 10。希望有看到我文章的好心人给予帮助。我回国后问了一些医生，医生说：这种手术可以做，只是禁运封锁，我们怎么去，而这生病的孩子又怎么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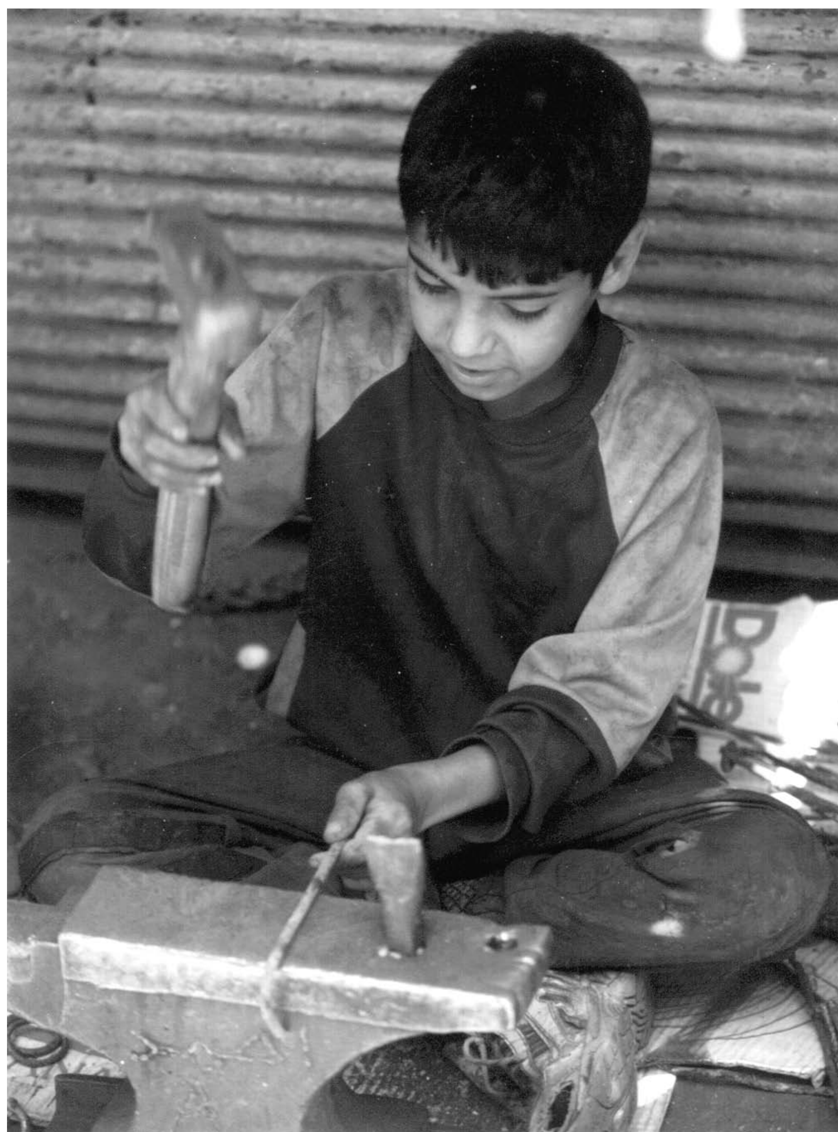
海湾战争造成的核辐射和空气、水污染使怪病横生，巴格达Athamiya区Haybat Khatoon的儿童格桑·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缩在母亲怀里，他由于战争污染造成先天没有食道，食物需要靠手帮助才能进入胃部。（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院子里传来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小院的主妇名叫替撒，“替撒”是阿拉伯语“九”的意思，也许我应该叫她“九姐”。替撒在一家小学做勤杂工，丈夫在街上帮人干零活。三个儿子易卜拉欣、海达、阿玛尔长得一律身材高大，可智力都很弱。据陪同官介绍：“这都是父母怀孕时受到战争污染所造成的。”我对造成孩子畸形、弱智的原因没有研究，但我担心这家人的生活来源。由于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经济受到重创，失业率极高，他们夫妇没有正式工作，更没钱供弱智孩子上学，全家只靠伊拉克政府每月配给的食品补给过活。

伊拉克现在每月给每个居民9公斤面粉、2.5公斤大米、2公斤糖、1公斤动物油、0.25公斤茶、150克盐、1升洗衣粉、2块肥皂、250克牛奶，有婴儿的家庭另加6听奶粉。所有这些只象征性地收700

伊拉克第纳尔，相当于30美分。而所有这些食品只够正常消费20天，其余的靠自己克服。

谈话间，主妇的大儿子易卜拉欣回来了，这个失学的傻孩子现在也帮父亲在街上揽活儿，像我们重庆的“棒棒军”，帮那些拿不动东西的人提包、拉车。我提议能不能让我看看政府发的补给卡，可主妇翻箱倒柜，满头大汗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三个弱智儿子坐在一旁没事儿似的看热闹。一群小狗躺在一棵砍倒的椰枣树的树荫下打瞌睡，只有大狗有事儿没事儿地乱叫，就像这个无助的家庭。



辍学儿童在正在砸一根废钢筋。海湾战争以来，大量儿童失学流浪社会，靠做童工补贴家用。（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制裁把我们的生活搞糟了”

伊拉克是伊斯兰教国家，在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身披黑纱的传统阿拉伯妇女，其间也点缀着大量现代、时尚的新女性。按穆斯林的传统，在经济来源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男人最多可娶四个老婆。伊拉克一直是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最开明的国家，娶四个老婆的习俗在伊拉克现代城市和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多见。在以男人为中心的阿拉伯国家，妇女从小就懂得不许单独出门，小时候由父亲陪伴，长大后由丈夫管理，处处受男人保护。这些传统颇似我国的“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伊拉克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据伊拉克驻华大使库巴解释，英语husband（丈夫）的原意就是“箍、套之类的环状物，以后引申为勤俭的管理者或种地的农民”，最后才是管理妻子的主人。伊拉克人一旦结了婚，丈夫就开始养家，妻子一般不外出工作，只在家里照顾孩子。伊拉克人很重视家庭以及家族的利益和荣誉，很多大家族时兴族内通婚，以避免财产和荣誉外流。对女人来说，丈夫、孩子就是生命，她们对孩子细致周到，对丈夫温柔体贴。偷情违背教规，是很丢人的事。新型的夫妻也有离婚的现象，如果离婚，丈夫的财产分一半给妻子，以保护妇女的经济利益。

伊拉克曾经是富足、先进、开放的国家，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大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可以说漂亮的英语、法语、德语。伊拉克妇女在中东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职业妇女的比例也最大。萨达姆提倡：“婚姻最重要的是男人一定不能让女人感到她被踩在脚底下，如果这样，婚姻也就完结了。”

由于近20年伊拉克烽火不断，大批壮丁应征入伍，全国有1/3的青壮劳力去了前线。很多生活重担落到女人身上，海湾战争和10年封锁使原本富足的伊拉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以往在家料理家务的传统女性不得不外出求职以增加收入。作为家庭核心的伊拉克妇女在失去亲人的同时，还要在悲痛中承担更多的工作。在日益恶劣的经济形势下，伊拉克妇女往往外出兼职干两三个班以上的工作以获取食品。博

物馆解说员、教师、售货员、工程师、企业经理、政府官员中的女性比例急剧上升。据说政府各机关、企业中女职员和管理人员占半数以上，个别地方占到80%～90%。



以往靠丈夫养家的妇女不得不外出多兼几份工，以添补家用。（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海湾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北部逃难的母子。（唐师曾　摄于1991年3月）

“哈卜拉”意为山口，是巴格达Athamiya的一个普通社区。海湾战争破坏了单个家庭的抗灾能力，家住哈卜拉的牙医伊拉哈姆·贾巴·赛洛利用业余时间，成立家庭互助组帮助家庭妇女培训就业技能。牙医赛洛有点儿像我们的兼职妇联主任，她用业余时间联合几个姐妹，在政府帮助下租了一套房子，主要工作是帮助这一片儿的妇女摆脱目前的生活困难，帮她们找工作，教她们养家糊口的技能。“以前我们从没有因为生计发过愁，节假日要添新衣服，还会买许多食品，鸡呀、肉呀。但是现在呢，很多生活必需品还没有买，钱就不够了，制裁把我们的生活搞糟了。制裁给我们造成各种苦难，营养不良，收入降低，即使努力工作到深夜也无济于事。婴儿死亡率世界罕见，孩子连起码的药都没有。”

哈卜拉美容美发培训中心专门教家庭妇女美容美发的技能，使那些没有财力美容的妇女在家人和朋友之间互相美容。自食其力增加微

薄的收入，分担丈夫养家糊口的重担。



巴格达Sukein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美容美发中心，互相帮助，开源节流。（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哈卜拉中心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正在教20多个孩子唱自编的儿

歌："妈妈妈妈不要哭，妈妈妈妈要挺住。"奶声奶气令我动容。穆罕默德·卡利姆今年6岁，像所有海湾战争以来出生的孩子一样，这辈子还没见过飞机。他只知道飞机是扔炸弹的，一有飞机出现就拉警报就地卧倒。

我们需要友谊和支持

1999年8月15日，中央电视台援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8月12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因长期遭受制裁，伊拉克南部和中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比10年前增加了1倍多。埃拉夫生下来还不到三个月，患有肺炎、营养不良、血液中毒等疾病。穆罕默德一家15口一个月的口粮可以保证他们不饿死，但是营养不良和死亡的阴影时时缠绕着他们。有个6岁的男孩得了大脑性麻痹症和癫痫，医院没有合适的药，只好用普通的麻醉剂来治疗。贾那比医生说，他知道这有危险，但没有更好的办法。由于国际禁运，伊拉克全国2200万人口中至少有1000万营养不良。平均每个月死亡5000多人，主要为老人、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拉米指出，联合国的常年制裁造成伊拉克食品和药品短缺，而伊拉克政府分发食品不及时、国际社会援助不够等等都是造成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

据伊拉克自己公布的数字统计：海湾战争以来，多国部队共向伊拉克投放炸弹10.8万吨，其中大量为贫铀炸弹。今天很多伊拉克人特别是儿童患有各种放射性疾病，而当年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成千上万老兵则患有"海湾战争综合症"。各国专家普遍认为，贫铀炸弹会使受害地区相当数量的居民罹患血液病或癌症，并导致婴儿严重畸形。巴格达方面认为自1991年以来出现的怪胎、婴儿先天缺损先天畸形、白血病和儿童患癌症现象都与美国使用贫铀武器有关。



贫铀儿童萨勒万，11岁。（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巴格达观察家报》总编Nasra Al Sadoon夫人介绍说："伊拉克健康部和联合国基金会调查的数字表明，5年来伊拉克死了100万儿童，这对只有2200万人口的伊拉克不啻是天文数字。制裁想杀死所有的伊拉克人，这对文明社会是极端残酷的。儿童需要特殊照顾，而现在不但得不到照顾，还遭受屠杀，鲜血把底格里斯河水都染红了。这说明有人正在灭绝伊拉克种族和人民，特别是美国，它已经干了10年，不知道它还要干多久。制裁前伊拉克每座城市都建有医院，可现在90%的伊拉克人没有医疗救治。伊拉克许多家庭都有去医院的痛苦体验，没有实验室，没有医疗设备，医生在病人面前无能为力。中国和伊拉克是老朋友，伊拉克在各种问题上都总站在中国一边。我恳请中国朋友发挥常任理事国作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相信制裁必定失败。伊拉克人民勤劳勇敢，始终没有停止重建家园，在没有外国支持的前提下，伊拉克的基本重建只用了18个月。"

伊拉克人民永远牢记那些在最困难时期帮助过他们的个人，他们

是美国的Ramsey Clarck、英国的Tony Ben、George Gallaway、Edward Heath、法国的Chevennement、Michel Jaubert、意大利的Benjamain先生。还有许多民间组织如美国的荒野之声（Voice in Widerness）、国际行动（International Action）、英国的Miriam Appeal、法国的解救伊拉克儿童（Save Iraqi Children）、意大利的“Ponte de Baghdad”……“现在还有来自伟大中国的你，这是一个发明甲骨文文明的国家对楔形文字文明国家的道义支持。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行动起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友谊和支持，伊拉克不是难民营。”

母亲的价值超过了军队

西方专家估计恢复伊拉克基础建设需要20年时间，伊拉克经济走上正轨、适应世界贸易形式至少需要几十年。拉希德大街拐角处的查克马奇音响店老式的双卡录音机正播放阿拉伯著名女歌手如泣如诉的哀怨情歌，催人泪下。巴格达物价已经从海湾战争爆发时的一天三变逐渐趋于稳定，街头巷尾促进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商贸大军，基本是妇女和儿童。



重建家园的伊拉克人（唐师曾　摄于1991年3月）

在Elkifah大街，专为适合工薪阶层购买的一种散装饼干每0.5公斤售价600伊第；普通奶糖每0.25公斤售价500伊第；鸡蛋每标准盘售价2200伊第；美国Kent香烟每包2000伊第；伊拉克国产的名牌黑Sumar烟每包300伊第……以往很少抛头露面的伊拉克妇女整齐排列在Shorja Market of Baghdad市场的两侧，面容神圣、荣辱俱忘、骄傲无比。在她们身旁依偎着嗷嗷待哺的孩子，正协助母亲在烈日下叫卖从各种渠道弄来的紧俏舶来品，就像一支列队出征的整齐军队。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曾经写道："军队在失败环境中的挺立不动，其价值远胜于在胜利中勇敢争先。"伊拉克母亲在维护伊拉克民族繁衍上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伊拉克的军队。

4年前我独自驾车环绕美国，顺道拜访了墨西哥边境的阿兹特克（Aztec）、可可帕（Cocopah）和东部的切诺基（Cherokee）3个印第安部落，他们生活在超级大国最不发达的落后地区。作家史铁生也参观类似部落，印第安人为来宾"跳熊的舞、唱鹰的歌"。作为回报，史铁生把一盒中国音乐盒带回赠主人，其中一些歌词如"我是一只小

小小小鸟，飞呀飞呀飞也飞不高”令崇尚野性的印第安人大惑不解。再翻看磁带封套，小生们一个赛一个地奶油，这更让络腮胡须的印第安人困惑。地球上所有种群的衰落都是从种子开始的，人类的种子是男人。

并非每个人都是绅士淑女，人非草木，不知不觉便萌生不轨之心。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我一定娶个伊拉克姑娘，以确保我播下的危险种子能在逆境之中长大成人。



海湾战争结束后巴格达捡柴火的女人和孩子。（唐师曾　摄于1991年4月）

伊拉克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多次受难都坚持下来。我采访了几十

位遭受不幸的脆弱母亲，在她们脆弱的躯体内有一颗勇敢的心，正以母亲对世界的智慧理解，顽强地哺育着亚述、巴比伦的子孙。郭沫若在话剧《棠棣之花》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要有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儿女。有了好的儿女，才有好的国家。"伊拉克妇女对苦难生活的巨大忍受力就像伟大的底格里斯河，默默承载着众多的苦难，川流不息滋养着大地……

2000年1月29日在阿曼举行的阿拉伯五人制女足邀请赛中，人们终于看到伊拉克妇女的身影。这也是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女足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伊女足队长卡利姆说："作为一名伊拉克妇女，我想告诉全世界，伊拉克妇女并不生活在禁锢之中。"



一位老奶奶把自家节省的奶粉拿到集市上卖。（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破车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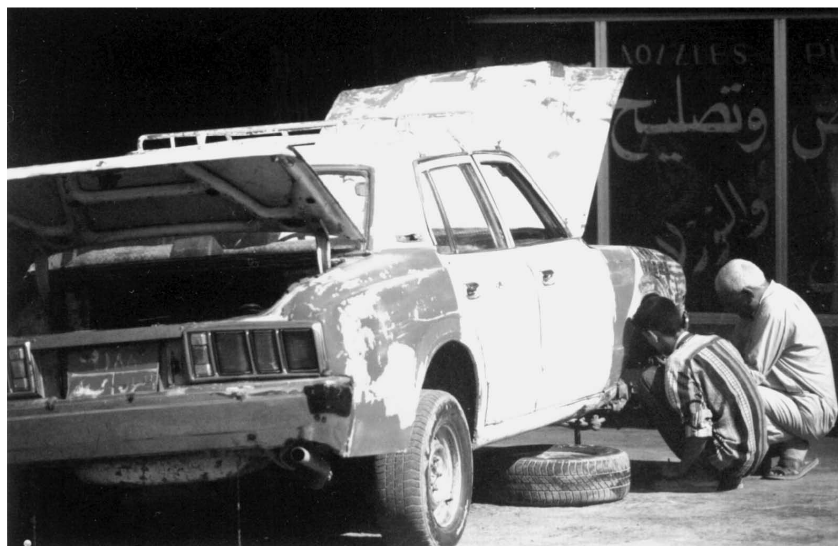
飞行员都改行开卡车了

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空中封锁开始于1991年1月，随着多国部队在伊拉克南北设立禁飞区，伊拉克航空公司开始从天上飞改为地下爬。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从九霄云外一落千丈，伊航一流的飞行员因为无法达到国际民航飞行员的飞行小时而技艺荒废，纷纷改行当卡车司机，或是成了驾驶“巴格达-安曼”长途车的大巴师傅。从此伊拉克逐渐沦为现代文明社会之外的孤岛，任何企图从空中进入巴格达的飞机都将被多国部队击落。

因为我对飞机、舰船、汽车特别偏爱，所以习惯由一个地方的交通状况判断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一直坚持：由于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两维空间里，所以只有贴近地面才能真正体会不同地区的生活状态。十几年来我努力减少乘飞机、轮船的次数，总是尽量亲自驾车周游世界各地，从方向盘的震颤中体会道路的细微变化。1996年我驾车环绕美国，才首次体会超级大国的强大，良好的路况、鲜明的交通号志、遵守法规的驾车者都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美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被命名为“自由路”（FREEWAY），我从美国最西南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开到美国东北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就没遇到过什么收费站，这点经验和我在德国、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埃及、阿联酋、阿曼、利比亚等国的经验基本类似。与西方各国相比，伊拉克同样没有公路收费站，其居民对交通法规的认识始自英国殖民时代。伊拉克司机大多文明礼貌，喜欢端着英国殖民者遗留的派头，其遵纪守法程度

至少高于我国10倍。例如在伊拉克高速公路上开车，所有车辆都按规矩先亮超车灯再从左侧迅速超越，决不会出现北京机场路上霸占超车道的滑稽现象，更不会闯红灯、抢行猛拐、先违章再托警察走后门。

这是我第五次前往巴格达，“死亡之路”这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伊拉克的交通状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1993年我第四次前往巴格达，就已经体会到炎炎盛夏往返“安曼-巴格达”的长途车里没有空调的难受滋味。7年过去，当年路上没有空调的大巴士早已油漆剥落面目全非，磕磕绊绊仿佛一具活动棺材。就我个人肤浅的旅行经验，各国大城市之间的远途交通工具多是舒适清洁的豪华大巴，连北京开往河南固始的长途车都设有卧铺、彩电，世界各地的国际长途客运更是如此。可在“死亡之路”上跑的汽车普遍车况不佳，五官不全，灰头土脸。偶尔有辆光彩照人的，肯定挂着约旦牌照。



由于国际禁运，伊拉克许多早该报废的老爷车仍然浪费着宝贵的能源，汽车修理厂也因此生意不断。（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外交部礼宾车也像“文物”

1990年我首次去伊拉克时海湾战争还没爆发，巴格达的所有公共汽车全都是奔驰、沃尔沃，每辆车都阳光灿烂色彩分明，和我生活的北京城那些千篇一律的公共汽车大相径庭。穿梭于巴格达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几乎都是排气量超过2.8的皇冠、公爵王，而当时北京只有正部级以上的高干才有资格坐排气2.8的“公爵王”。记得10年前新华社社长慑于中央反腐倡廉威力，每次去中央开会都不敢坐奔驰，换乘一辆符合标准的国产奥迪。可以想象当年我从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北京城突然进入富得冒油的巴格达，置身于世界上众多美好的名车之间，简直就像土老帽儿钻进了卢浮宫。

海湾战争前的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有一辆白奔驰、一辆红皇冠和一辆棕色科罗纳。战争爆发后红皇冠不翼而飞，1991年听说“又丢了一辆红奔驰”，1993年我回国后又“丢”了一辆魔鬼漆的超豪华科罗纳。这次重游故地，只见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车库里又锁了一辆白奔驰和一辆灰绿色的尼桑风度，仿佛黑暗地狱里的白天使，不知道这些拴在笼子里的宝马是否能平安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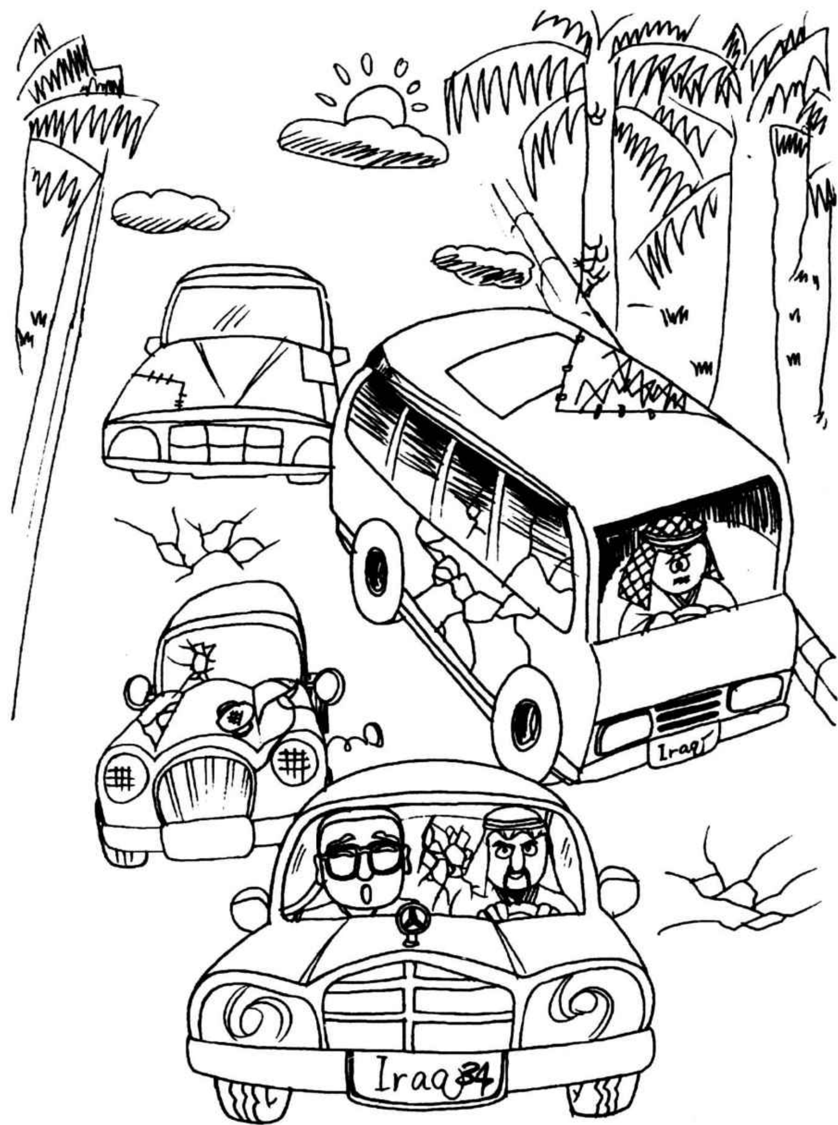
随着深入伊拉克，走进尘封地狱的感觉愈发强烈。首都巴格达的所有出租车就没有一辆外观完整的，更不用说巴格达以外的边远城市了。就我所见，巴格达95%以上的汽车前风挡玻璃残缺不全。由于多年战乱，加上国际封锁，既没有换风挡的美元，更没有合法的进货渠道。满街跑的汽车普遍雨刷器不动，反光镜没有，刹车失灵，发动机严重磨损，轮胎老化，还有的连保险杠都没有了……这在习惯讲派头儿的伊拉克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

伊拉克有的是石油，但缺乏分解优质汽油的化学配剂。甚至连石油提炼的低级产品——沥青，也达不到目前世界铺高速公路使用的“改性沥青”的工业水平。破车滥路，所有汽车跑起来都摇头晃脑，

前仰后合。巴格达街头的各种汽车，都好像是刚挨了枪似的，其中许多破车的确真有枪眼。就连接待我们的外交部礼宾车，也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文物。而且由于机械故障前后换过两辆，前一辆是大雪佛兰，后一辆是欧兹牟拜（Oldsmobil），两辆车都是专门接待国宾的。可我这个“国宾”面前的两块前风挡都支离破碎，像蜘蛛网似的。我一直担心稍有震动就会震落下来，扎了我的手脚。



海湾战争前巴格达的街道美丽清洁，公共汽车都是德国的奔驰。（唐师曾　摄于1990年12月）



巴格达街头的各种汽车，都好像是刚挨了枪似的，跑起来摇头晃脑，就连接待我们的外交部礼宾车，也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文物。



巴格达95%的汽车前风挡不全。（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从“奔驰”到“解放”

伊拉克夏季白天气温高达60～70摄氏度，燃烧的空气仿佛可以融化一切，可我们的国宾车连冷气都没有。据陪同讲，冷气机需要更换氟里昂，伊拉克的氟里昂长期以来就依赖进口，可现在美国几乎把所有的化学品都列为禁运。

美国加利福尼亚帝王谷县地处热带沙漠，由于高温干燥汽车雨刷器上的胶条一到夏天就被晒裂，每年入冬都得更换新的。我曾经在帝王谷县唐氏农场种过地，深刻体会南加利福尼亚的酷暑与伊拉克沙漠的炎热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重庆人把盛夏形容成“蒸笼”，那巴格达干脆就是烟熏火燎的生烤。

长达10年的国际封锁使所有汽车断了配件，连起码的维护也无法进行，哪里还顾得上冷气空调。各种老爷车即使在巴格达城内稍微运

动一下，也会发出糊橡胶味，并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响动。发动机由于没有进口冷却剂，只能以普通凉水代替，根本达不到要求的冷却作用。不合格的机油、汽油使发动机迅速过热，造成引擎熄火。司机不得不到处找人要水，不停地把凉水浇到烧红的发动机上，烟雾腾腾仿佛回到150年前的蒸汽机时代。

普通老百姓就更惨了。由于伊拉克经济建立在发达的石油工业基础之上，现在经济封锁断了石油美元，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普通人家使用的汽车都是进口的，现在断了配件供应，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各国大使馆的奔驰车做一次最基本的养护，最近也得到约旦首都安曼，往返2000多公里。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文化专员李景方是我的大师兄，不久前好不容易到约旦给自己的绿奔驰换了一副新轮胎，刚回到巴格达就和一对伊拉克夫妇迎头相撞。大师兄那辆原本傲视群雄的大奔驰五官移位，整个前脸都撞飞了，伊拉克人的小丰田就更没法看了。这家人可怜巴巴地围着大师兄，说自己不但没钱赔偿，还希望大师兄给点儿钱，“没有这辆车，我们就没法活了”。凄凄惨惨，让我根本没有勇气端起照相机。难怪大街上有那么多人都开始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下班了。



外交部礼宾车由于没有冷却剂，靠凉水降温。（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现在巴格达街头票价最高的公共汽车，是这些刚从中国进口的60辆“解放”。（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一天在去中国大使馆的路上，我突然在破车堆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崭新标志，就连声大喊“停车”！不等司机停稳，我早已抄起相机冲了出去，一直追上一辆崭新的大公共汽车。司机不屑地问我一辆新车有什么了不起。我得意洋洋地向他臭吹，现在巴格达没有新汽车，有新车就是新闻。其次，你注意新车的牌子了吗？过去伊拉克的大公共只有奔驰、沃尔沃，顶次也得是印度的“塔塔”（TATA），可这是辆“FAW”，就是中国一汽制造的大“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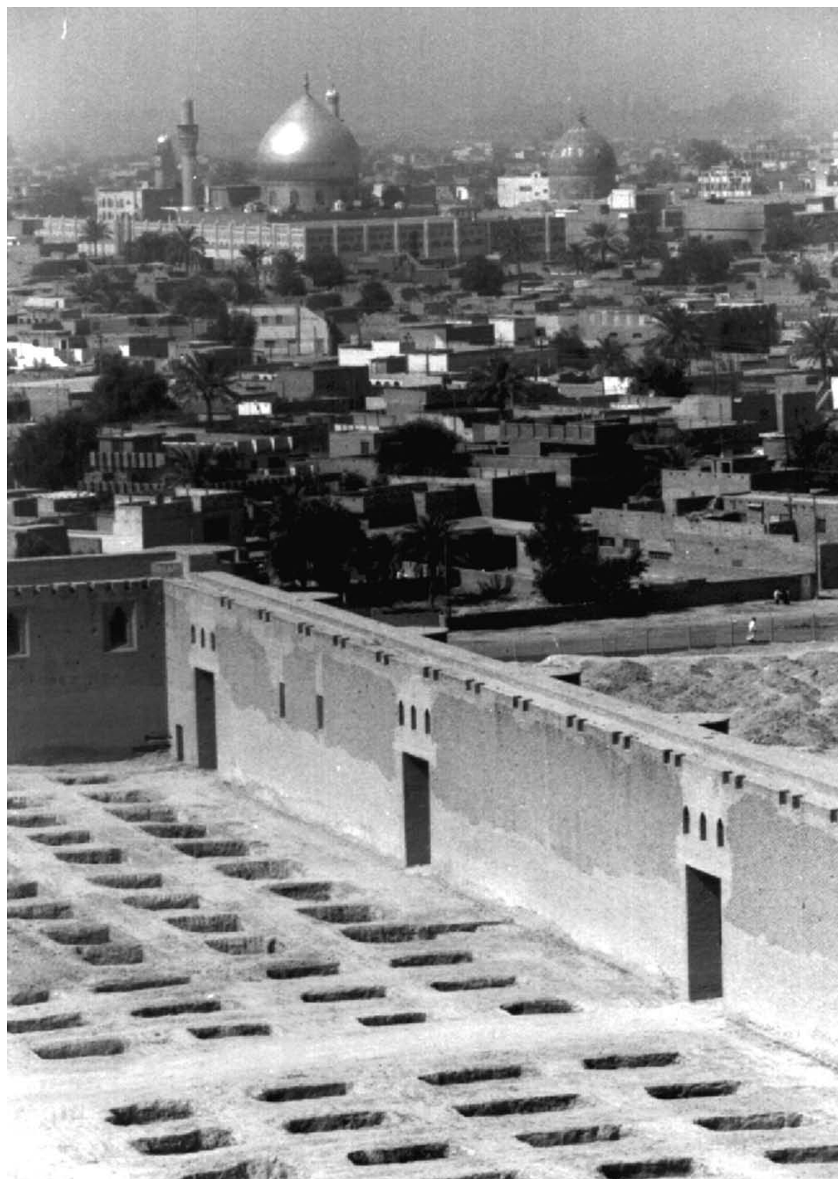
经过采访，果然这是一辆刚从中国进口不久的新车，与其同批到达巴格达的共有60辆，全部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新产品。巴格达市政当局准备用这60辆“解放”缓解日益艰难的公共交通，并已初见成效。目前，“解放”的票价是巴格达所有公共汽车中最贵的。

撒马拉转塔

宿命的故事

毛姆有篇小说名叫《撒马拉相会》，说巴格达的一位商人派仆人去集市买粮食。工夫不大，仆人面色苍白狼狈不堪地跑回来，浑身发抖地向主人报告；“主人，我刚在市场被人挤了一下，抬头一看竟是死神。他见是我，立即做了一个吓人的手势。我想死神一定是冲我来的，现在求您赶快借我一匹快马，我要逃离巴格达，躲到撒马拉去。”商人闻言立即借给仆人一匹快马，让他逃往撒马拉。当天商人自己去市场买粮食，不料也碰到死神。商人感到很奇怪，就问死神早晨碰到仆人为什么做一个吓人的手势。死神说：“那不是吓人的手势，而是我被你的仆人吓了一跳。我为在巴格达撞上你的仆人惊诧不已，因为按神的安排，今天晚上我和他在撒马拉有个约会。”撒马拉是伊拉克著名的通天之塔——撒马利亚螺旋塔的所在地，毛姆在这里讲了一个命中注定的“宿命”故事。

人的命运就像撒马拉转塔，有着宿命的味道。我对生命的理解也是这样，每个人的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按医生的解释，我活着已经是奇迹了，可我还要不知疲倦地工作。尽管医生不停地给我吃药，强迫我睡觉，可我决不会为安宁而牺牲工作。我是为新闻而生的，为此永远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努力，中国话叫“狐死首丘”。为此我冲破国际封锁，乘着一辆伊拉克破车沿底格里斯河溯流而上，拜访毛姆小说中的转塔。你可以想象我穿过沙漠第一眼看到转塔时的兴奋心情。



撒马拉转塔（大宣礼塔）旁边的大星期五清真寺废墟。撒马拉位于伊拉克中部，濒临底格里斯河，公元3-7世纪建城。836年穆阿台绥姆哈里发撤离巴格达时，选撒马拉为都城，建宫廷园林。（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撒马拉转塔坐落在巴格达西北约160公里的撒马拉城边，是阿拔斯王朝第八代哈里发穆阿台绥姆的杰作，建于公元849年，整个修建过程历时三年，于852年竣工，迄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帝国疆域已经西抵比斯开湾、东到印度河和中国边境，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超级大帝国，疆界远远超过罗马帝国。当欧洲沉沦于封闭落后的中世纪的黑暗蒙昧时代时，阿拉伯由于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的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天堂，宗教、科学、艺术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撒马拉转塔原本是伊斯兰教宣礼塔，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必须信奉五功：作证除安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每天五次祷告；持奉斋月；缴纳天课；条件具备时往麦加“天房”朝觐。

宣礼塔也叫拜楼，是伊玛姆或阿訇登高率领穆斯林每天五次向安拉祷告的高塔，登高的目的是让宣礼安拉的声音传得更远。据海湾战争期间担任多国部队司令的施瓦茨科普夫回忆，他小时候曾经随其父在海湾地区生活，当年伊玛姆每天五次爬上宣礼塔顶，带领穆斯林集体祷告。几十年过去，现在所有宣礼塔顶都装上了扩音喇叭，阿訇再也不用每天五次爬上爬下。在我拜谒过的众多清真寺中，撒马拉转塔是绝无仅有的没有装扩音喇叭的宣礼塔。和其他所有阿拉拍宣礼塔不同，撒马拉转塔通往塔顶的楼梯不是修在塔身内部，而是环绕在高耸的塔身外侧盘旋而上。据说当年穆阿台绥姆建成这座独特的宣礼塔后，每逢星期五“主麻日”都要骑着高大的阿拉伯纯种马，沿着蜿蜒小道策马飞驰直到塔顶，向整齐坐在清真寺围墙里的上万穆斯林宣读《古兰经》：“安拉！阿卡巴拉（安拉最伟大）！”

历史盘旋前进

我师萧乾反复告诫我：“千万不要因为上过两天大学、写过几篇文章就自称文明人，切忌对似懂非懂的东西指手画脚。”这些教诲使

我获益匪浅。多年独自在世界各地闯荡浪迹天涯，全靠自己良好的工作习惯。皮肉上磨练的经验告诉我：要想迅速融入当地社会、获得第一手新闻，首先必须尊重当地习惯、崇拜当地人民所崇拜的。尽管我对世界各门宗教所知寥寥，但我诚心参拜我遇到的每一件圣物，从社会人文景观到植物动物名山大川，崇拜当地人崇拜的一切。

当年我在中东任常驻记者时，许多同事都习惯到清真寺里方便，在人家小净之处尿完就走。而我每次都先到寺内诚心跪拜，恳请安拉宽恕因我的无礼打扰了清真寺的安宁，再在寺内自行方便。我这些由衷的做法首先赢得清真寺阿訇的尊敬，把我看成他们的兄弟，称赞文明古国的记者就是比一般人文明。

撒马拉转塔独自突兀在伊拉克北部广袤的荒漠上，已经和沙漠浑然一体。其螺旋体塔身以逆时针方向扶摇而上，一圈又一圈地向上盘旋，不动声色直插云天。我趴在撒马拉转塔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尽管我的叩拜程序似佛似道不伦不类，但周围的穆斯林兄弟认可我的虔诚，把我当作他们的同类。

整座撒马拉宣礼塔高53米，坐落在一个正方形基座上，是一座高耸入云的本色砖石建筑。塔的四周筑有台阶，宽两三米。为游人安全，伊拉克旅游局在靠近塔身内侧修了简单的金属栏杆，可外侧依然空空如也。我一个人大踏步朝上爬去，随着越爬越高，肾上腺素迅速分泌，恐高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扑面而来的沙漠热风强劲有力，穿过身体时好像要把我从转塔上迅速剥离，体现着历史的巨大力量。我用左手紧抠塔身的砖缝，尽量把身体贴向塔身，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眼睛紧盯着眼前的台阶，只有这样才有了一点安全感。

塔顶一位自带冰水的伊拉克人免费请远道而来的客人解渴，这在水比油贵的沙漠里属于最高的德行。1992年我开大吉普陪新华社一帮领导去西奈沙漠，路遇一辆抛锚的破车，我主动停车过去问阿拉伯弟兄是否需要帮助，并送给他们几瓶矿泉水。车上的中东分社社长马上

批评我浪费国家财产，可同车的干部局长康国志事后却说我做得对。原来他年轻时曾经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常年往返于沙漠，据说他们吃完西瓜都把西瓜皮扣在地上，这样可以保持水分，给一旦遇险的人救急。

导游介绍说撒马拉转塔高53米，可我总觉得比我在北京住的20层塔楼还高。坐在没有遮拦的撒马拉塔顶，脚下的汽车只有甲壳虫大小，使我突然感到从来没有的揪心。整座转塔在茫茫沙漠中悲凉耸立，庄严、肃穆、傲视苍穹，睥睨脚下自以为是的人类。极目四望，几位身披黑纱的伊拉克妇女虔诚地从塔前走过。和转塔同时建造的大清真寺已成一片废墟，只剩下240米长、160米宽、约10米高的四面围墙，屋顶和其他建筑早已毁于战火。外墙门楣和墙头饰物的残存花纹，显示着当年建筑的精美和豪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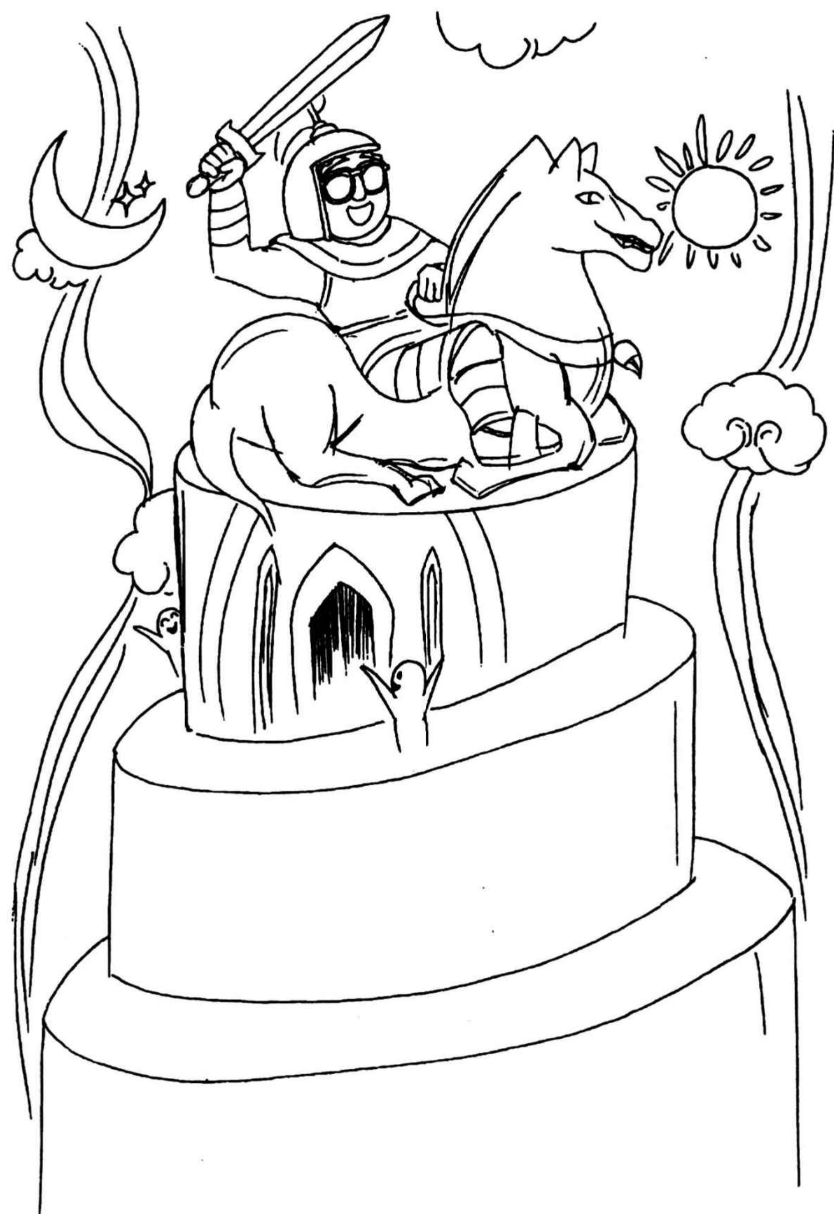
撒马拉转塔下的妇女。（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我和一帮素不相识的阿拉伯弟兄挤在一起，穿塔而过的热风把彼

此的汗臭席卷而去。搭讪之后得知这几位全部来自巴格达，伊拉克人素有旅游的传统："海湾战争前我们的货币很值钱，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我们是开放快乐的沙漠民族。可现在由于战争，我们无法到远方去，但我们仍然要过快乐的周末。"

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开始拍着手高唱反美歌曲："我们只要面包、盐和萨达姆，打倒美帝！打倒美帝！"我不相信持续战乱的地方会有愉快，在我们国家像这么大的孩子还在缠着父母买耐克鞋，发疯般地追奶油歌星……伊拉克孩子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奢求，可他们的心理年龄比我们的孩子成熟，成熟到让我悲伤的程度。

我想也许再过10年，他们长大成人后，会像撒马拉转塔下面无表情的父辈那样，继续屹立在沙漠里，守护着他们的撒马拉转塔。再过50年、100年、1000年，他们本身就成了人类历史的撒马拉转塔，他们用自己的繁衍记录着人类旋转前进的历史。古道、残墙、飞沙、落日，而我则是撒马拉的匆匆过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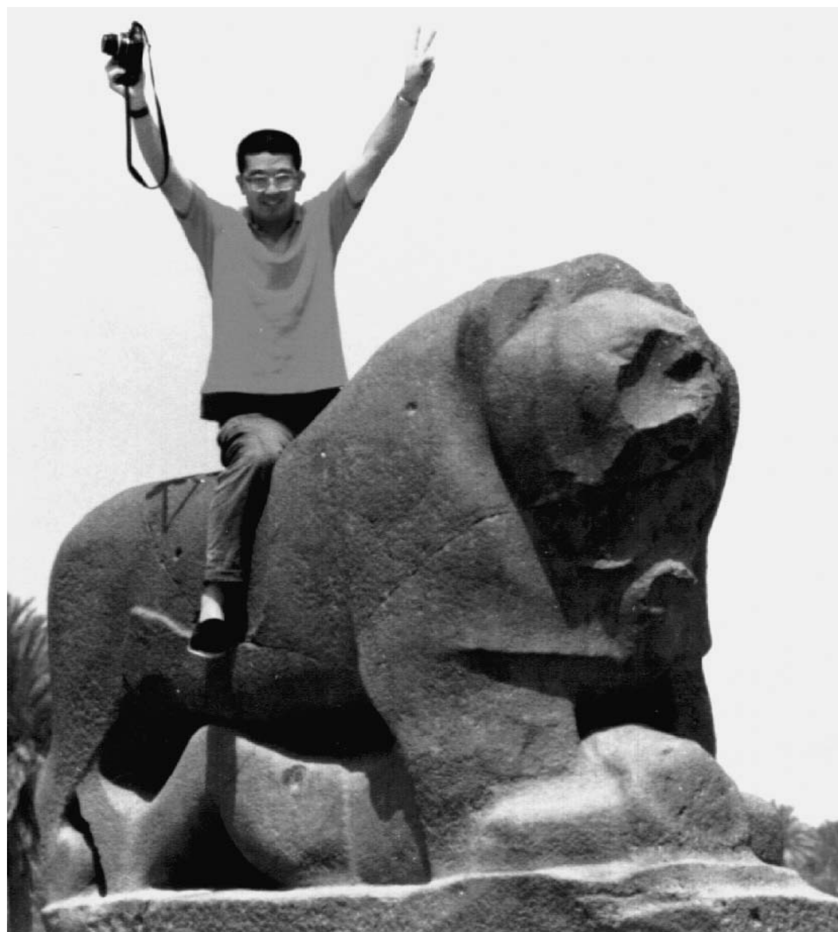
消失的巴比伦

众神相会之地

希腊语称两河之间的土地为“美索不达米亚”，其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明起源之时。“楔形文字”证明早在6500年前两河流域就有令人瞩目的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后巴比伦王国代表了两河文明的显赫时期。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最早的灌溉农业、手工业、商业、楔形文字、法律和司法体系，组建了城市国家联盟，为自己的神灵建造庙宇和雄伟的寺塔，这些寺庙不仅是祭祀地而且是人类最早的科学文化中心。

“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CIVIL”本身就有“城市”、“市民”的意思，而文明产生的标志是城市国家。由于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出现城市国家的地方，所以它是四大文明中最古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巴比伦北部叫阿卡德，南部叫苏美尔。公元前3000年阿卡德国王统一阿卡德地区，公元前2350年，阿卡德领袖萨尔贡把这些城市结合成一个帝国。阿卡德衰落后，形成两个新的权力中心：巴比伦、亚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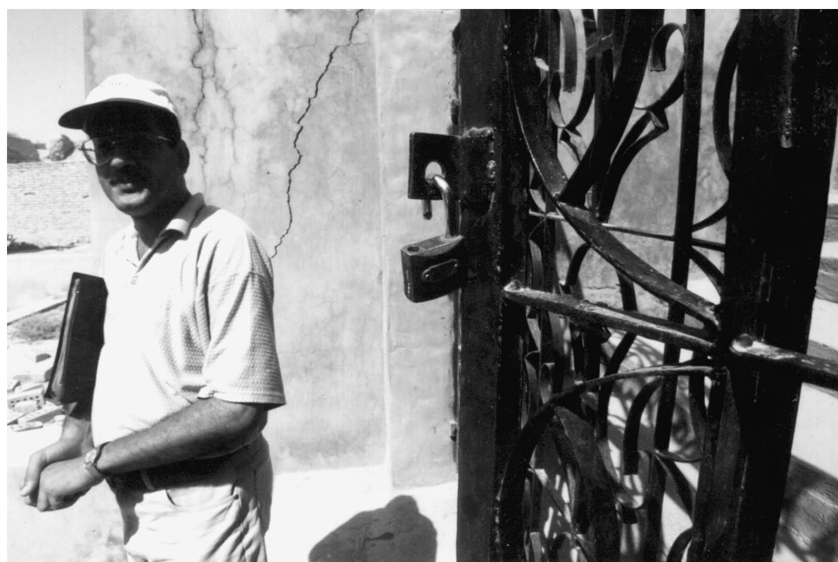
古代亚述帝国就在今天的曼苏尔一带，是萨达姆的家乡，被英国人、德国人称作“狮城尼尼微”作为这次重返巴格达的副产品，我儿子在这里孕育，出生后就取名亚述（Ashur）。



30岁的我骑在无人看管的巴比伦雄狮脊背上。雄狮正在强暴一个女人，表现古代崇尚征服和繁殖的英雄情结。（唐师曾　自拍于1991年5月）

巴比伦原意为众神相会之地。1824年大英帝国的乔治·卡佩尔（George　Keppel）手持巴格达帕夏的手谕从巴格达前往巴比伦，由于土匪出没带了武装保镖。想不到将近200年过去，我在公元2000年拜谒巴比伦的情形几乎和乔治·卡佩尔当年没什么区别，我手里拿着伊拉克政府的介绍信，身后跟着哈迪德、塔米姆两位陪同。

1991年我和新华社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朱少华开车去巴比伦，当时海湾战争刚结束不久，巴比伦一片废墟无人管理，我竟然轻而易举地骑到巴比伦雄狮的脖子上。如果当时我有一辆卡车，完全有可能把这个国宝盗运出国。历史上众多文物都是被列强趁战乱之机暗渡陈仓的，连我在中学课本中熟识的伊什塔尔（Ishtar）女神门也被德国贝加蒙博物馆整个收藏，给巴比伦剩下一个崭新粗糙的复制品。《汉谟拉比法典》原件现藏巴黎卢浮宫，更多的文物早在殖民时代就被大英博物馆弄走……伊拉克曾经揭露美国兵在伊拉克南部盗窃文物，我猜这种说法决非空口无凭。



海湾战争以来，为了保护巴比伦古迹免遭破坏，所有的重要古迹都被保护起来，锁铁门的大锁是“中国制造”。（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令我惊异的是现在锁巴比伦大门的大锁竟是中国制造，我在伊拉克陪同陪伴下可以随意触摸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的巴比伦的文物。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破砖碎瓦，巴比伦空中花园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只剩下莽莽废墟，在烈日下泛着白光。果然像古代犹太人在

《圣经》中诅咒的那样："巴比伦必将成为旷野、荒漠；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成为野兽的巢穴。"难怪一直到现在伊拉克和以色列两个民族国家彼此对立，冰炭难容。

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是位勇猛过人精通谋略的国王，他用8年时间统一两河流域，征服包括亚述在内的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使巴比伦疆土超过苏美尔历届王朝，形成以巴比伦为中心、楔形文字为特征、辐射整个西亚地区的"楔形文字文化圈"。巴比伦作为两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持续了2000多年。汉谟拉比在给自己的铭文中写道："神任命的牧者、常胜的国王、天下四方的庇护者、众王之王、众王之神强大的国王、巴比伦的太阳、光明照耀苏美尔阿卡德全境、四方威服之王。"

为汉谟拉比赢得不朽名声的还有《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顶端是太阳神沙马什将王杖授予汉谟拉比的浅浮雕，柱身四周刻有法典。法典共有282条，将人分成三种，其中巴比伦人是自由人。法典由序言、正文、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序言首先列举自己功德：修建城池、宫殿、运河、神庙、土地、牧场……阐明本法典的立法原则深受历代先贤的法律影响。正文分：道德、国家、私人社会三部分。道德领域地位最高，是神的领域，涉及某些不可饶恕的罪行；国家领域代表王室利益，集中反映维护王室土地、履行兵役、杂役等义务；私人社会领域的关系规则最为复杂，规定了诉讼手续、盗窃处理、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债务奴隶、继承权、伤害和赔偿、奴隶地位等。

《汉谟拉比法典》关于犯罪与处罚的条款最多：侵犯人身罪、侵犯家庭罪、反叛罪等多种。刑罚种类繁多，光死刑就有溺死、烧死、刺死、绞死。法典还保留了许多原始公社的习惯法：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以命抵命的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法则。

20世纪50～60年代考古发现还有比汉谟拉比还老的立法，其中乌尔第三王朝创立者乌尔纳姆（公元前2113～公元前2096年）就把法典写在泥板上，正文29条：婚姻7条、女奴隶4条、伤害罪5条、农业3条、司法诉讼3条。《乌尔纳姆法典》明显偏袒男人歧视妇女：离婚女人没有财产；通奸男人无罪，女人则处死；强奸未成年女奴隶只付5西克勒白银罚款。“女奴向女主人顶嘴，用1卡咸盐塞嘴。”《乌尔纳姆法典》惩罚手段都是判刑或罚金，没有同态复仇、血亲复仇的痕迹。由于立法十分技巧，可以肯定两河流域还存在其他成熟的法律体系。

《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第一部完备的法典，被列为世界级文物。刻有法典的石柱曾经被埃兰人劫往苏萨，并磨去部分条款。殖民时代被法国考古队发现三块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全部掠往法国，现存巴黎卢浮宫。



巴比伦门前水车。由于海湾战争带来的气候异常等原因，原本水草肥美的两河流域持续干旱缺水。这是工人从远处运水给巴

比伦伊什塔尔女神门前的椰枣树浇水。（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出于尊敬，我一再要求参观“汉谟拉比博物馆”，可我们的陪同和保镖就是装聋作哑，死活不作正面回答。最后被我逼急了才坦言相告，说由于持续战乱许多文物流失或防空隐蔽，所以不大方便。想不到这片最早进入法制文明的土地，在人类文明发展了5000年之后，竟然遭到文明社会的军事打击。

重建废墟

巴比伦位于两河流域古文明的中心地带，地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最接近处，是东西商旅必经的战略要地。阿卡德语中的“巴比伦”意为“神之门”或“众神相聚之地”。当古巴比伦王国建成举世无双的富裕城邦时，世界上多数民族还住在土坑树洞里呢。可惜巴比伦老城公元前7世纪在亚述内战中毁灭，城墙铲平、神像被掠、房屋烧毁、居民被强制迁移……



据希罗多德叙述："巴比伦有上百座门。"这是伊拉克政府1982年根据希罗多德描述重建的巴比伦城。（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几百年后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重建巴比伦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200年后还称赞巴比伦的宏伟：“就其壮丽而言，我们所知的任何城市都难以和巴比伦相比。”“巴比伦到处是宫殿庙宇、高耸入云的高塔，光城门就有100座，每座城门都用青铜制成。”“居民依家族、行业划分自成天地。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社区，各社区由各自的管理机构负责日常事务，建有世界最古老的行会。”巴比伦还向人类贡献了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等方面的早期知识，它的文明和富饶招来马其顿人、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英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和现在的多国部队……连我这个笨蛋都想在巴比伦废墟上开创自己的历史。

尼布甲尼撒二世建造空中花园的同时也发动战争，迫使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缔结城下之盟。时隔不久，当犹太人勾结埃及法老企图背叛巴比伦时，勃然大怒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再次攻打耶路撒冷，杀死犹太国王的所有儿子，然后押解被剜去双眼的犹太国王、王室、祭司、贵族、工匠数万人回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一直到现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仍是犹太人恨之入骨的头号人物，可伊拉克却把他当作镇压不义之徒的明君加倍尊敬。他的右手被按照实物放大，和萨达姆的右手共同紧握卡迪西亚广场的利剑。新修复的巴比伦废墟到处都是新修的墙，楔形文字并排刻着尼布甲尼撒二世和萨达姆的名字，“感谢伟大领袖萨达姆于1982年复原巴比伦”。崭新而整齐的城墙很像我们推倒北京城墙后“复原”的西便门。这种做法可能出于爱国主义目的，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我脚下的残垣败砖原是尼布甲尼撒充当工事的内墙，用煅烧过的大砖和石漆（沥青）砌成，已有2600多年历史，顶部足以供一辆四马战车原地掉头。内城三面筑有壕沟和土城，西墙兼作工事和幼发拉底河防洪大堤，一座世界最古老的石桥把幼发拉底河两岸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这里的堤岸上尽是柳树，被抓来的犹太人在柳树下吟诵《巴比伦之囚的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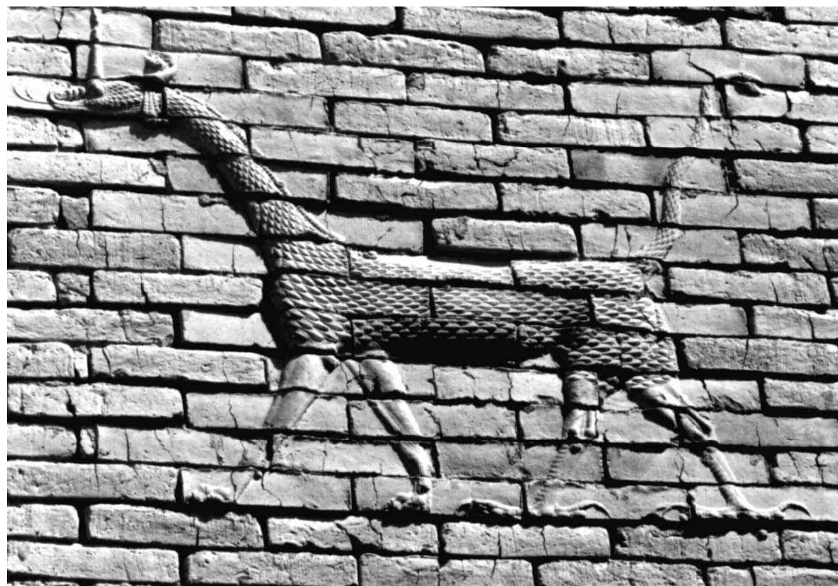
巴比伦最宏伟的是供奉伊什塔尔女神的伊什塔尔门，城门用煅烧的砖和沥青砌成，原件已经被掠往德国。从小广场右拐，即可看见世界上最早的沥青路，早在6000多年前巴比伦人就懂得使用石油、沥青。当年这里是巴比伦迎来送往的仪仗大道，现在被1米高的铁栏保护着，已经剥蚀成一堆破碎的黑块。以后历代统治者对这段路作了多次修补，但都已支离破碎，唯有巴比伦最早的沥青路留存至今。沥青路两旁城墙上刻有各种浅浮雕，其中一种被称作“Mardukh God”的瑞兽，它有马的身子、长颈鹿的脖子、龙的角、鳄鱼的鳞、鹰和狮子的爪、蛇的舌头……它是巴比伦的保护神。一条笔直的大街穿过伊什塔尔门进入巴比伦城，直通王宫、巴比伦塔和马都克神庙。尼布甲尼撒王宫的墙壁厚达3米，既可以抵御外敌也能隔开当地夏季高达50℃的炎热。



巴格达卡迪西亚广场。（唐师曾　摄于1991年1月）

据《圣经·但以理书》讲，居鲁士大帝进攻巴比伦时，巴比伦王伯沙撒正在宫中饮酒，王宫墙壁上突然出现一只神手写下一行冒火的铭文：“Mene Mene Teke1。”但伯沙撒没有在意这条神谕，结果当晚巴

比伦祭司偷开城门，放进波斯军队，使伯沙撒兵败身亡。



巴比伦的保护神——“瑞兽”。（唐师曾　摄于1991年5月）

亚历山大

和巴比伦连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位伟人，那就是古希腊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我对这位生于马其顿、在希腊求学、死于巴比伦、葬在埃及的国王崇拜已久。我把他看成世界上第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92年11月我在埃及当记者时，曾单独驱车前往地中海沿岸参加亚历山大建城2325年纪念仪式。我希望自己能像亚历山大那样四海为家。

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子，13岁拜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为家庭教师苦读三年，尤爱读《荷马史诗》，梦想当阿溪里式的英雄。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3万希腊联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人类最著名的军事远征。出发之前他将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手下将

士，有人问他给自己留下了什么，他回答："希望！"一直到现在，西方国家还把"希望"看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亚历山大凭借"希望"身先士卒以少胜多，先后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打败60万波斯大军，俘虏大流士三世的母亲、王妃、两个女儿和大批波斯贵族，占领巴比伦时年仅23岁。看着豪华的宫殿和珠宝，亚历山大大喊："这才叫个国王哪！""告诉大流士，我不要黄金，也不要部分领土。他所有的黄金和土地都是我的。如果我想要他的女儿，我自己会安排的。我是全亚洲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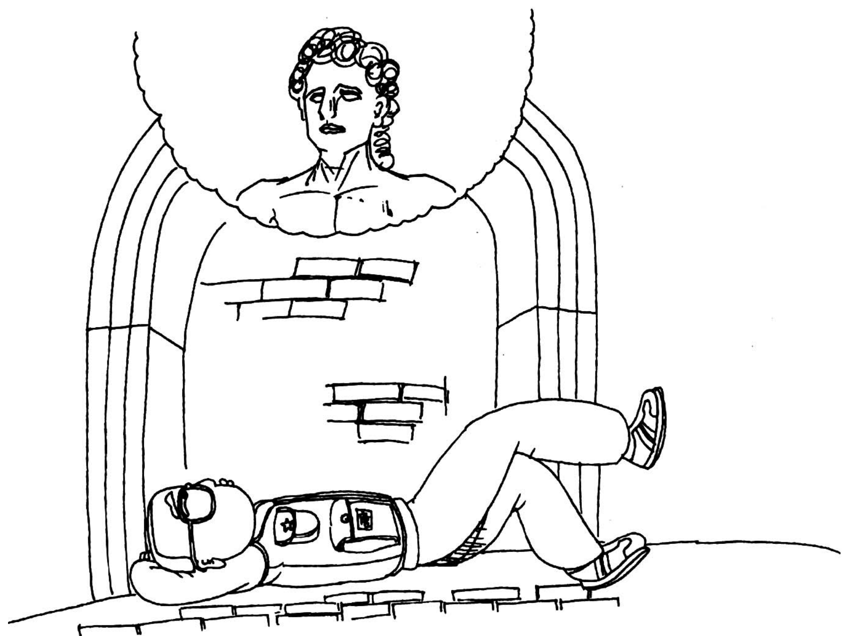
公元前332年11月，亚历山大占领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亚历山大城。以后征服波斯，娶中亚部落首领之女罗克塞妮，一直打到印度。经过10年艰苦征战建立一个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南至埃及的亚历山大帝国。

祭司曾经反复规劝亚历山大不要进入巴比伦，否则会发生不幸。果然，当亚历山大的战舰接近巴比伦时，怪风突然把他的王冠卷走，正好飘落在亚述帝国皇帝的坟墓上，这被亚历山大视为不祥之兆。随后派去取回帽子的水手在游回大船时，竟然把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亚历山大郁闷中连饮6夸脱烈酒后病倒，此后10天继续指挥大军前进，第11天生命垂危。手下将军问他死后把国家交给谁时，亚历山大说："给最强大的人！"言罢死去，时为公元前323年6月13日，年仅33岁。这个时期中国刚刚进入混战的春秋战国时代。



老人和狮子。百无聊赖的老人懒洋洋地清扫巴比伦雄狮广场。从汉谟拉比到尼布甲尼撒，巴比伦一直是迦勒底王朝的都城，其废墟展示古代人类最杰出的建筑成就。（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巴比伦废墟现有一座巨大的土台，传说亚历山大曾在此休息并死在这里。我心怀敬意地爬上空空荡荡的高台，小心翼翼平躺在亚历山大安眠的地方，心潮澎湃。2000多年过去，有关亚历山大死因的争论至今没有定论：苏联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美国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都说“亚历山大死于恶性疟疾”。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日本的大牟田章认为他“死于感冒发烧”。而古希腊史学家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却说“他是被毒药毒死的”。他的部将托勒密把亚历山大遗体运到埃及，葬于亚历山大城，成为托勒密王朝创始人，也是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曾祖。



巴比伦废墟现有一座巨大的土台，传说亚历山大曾在此休息并死在这里。我心怀敬意地爬上空空荡荡的高台，小心翼翼平躺在亚历山大安眠的地方，心潮澎湃。

与中国历代王朝不破不立的传统做法不同，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首先穿越沙漠拜谒埃及阿蒙神庙，把自己比作“阿蒙之子”。罗马人占领亚历山大时，恺撒大帝亲自拜谒亚历山大陵墓，决心建立像亚历山大一样伟大的功勋。恺撒的继承者奥古斯都叩拜亚历山大陵墓时给亚历山大塑像加了一顶金冠，并送鲜花。只有这样才能有几千年文明的累积沉淀，避免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1992年我在埃及当记者时曾花半年时间寻找亚历山大陵墓，可惜毫无结果。开罗大学的易卜拉欣教授告诉我，各个历史时期的世界各国考古学家已经寻找了几百年，都无果而终。

当今世界上至少有500个城市叫亚历山大，许多男人都喜欢用亚历山大取名，“亚历山大”成为勇敢和力量的象征。尽管人人都知道亚

历山大，可知道他死在巴比伦的还真不多。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时间在巴比伦失去意义。由于没有统一的时空，由此产生的驰骋的想象力是无法限制的。能像我这样在亚历山大安息的土台上平躺片刻的人又有几个呢？

浮在油海上的国家

伊拉克成为“人类血管”

从1999年1月到现在，中国普通汽油零售价每升上涨了1元多，由此引发所有石油制品全方位的连锁反应，连飞机票也“上浮”了10%。随着国际油价持续攀升，缺乏应变能力的经营部门把涨价造成的危害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部分地区汽、柴油市场零售价已经突破政府指导价的最上限，国家计委为此特地颁发《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适当提高汽、柴油出厂和零售价，中国股市中的石油板块也随之爆发急升行情。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9年进口石油4000万吨。如果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美元，中国将多支付2.8亿美元；如果每桶石油上涨10美元，中国将多支付28亿美元。我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的复合材料全部提炼于石油，一日三餐饮食做饭连喝水都离不开液化气，交通没有火车、轮船、飞机、汽车更是寸步难行，再不用说其他了。

伊拉克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raq）的国名“伊拉克”，源自阿拉伯文“血管”。古巴比伦人早在6000年前就知道使用石油烧火、沥青铺路。随着进入内燃机时代，石油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能源命脉，人们逐渐发现伊拉克不仅水源丰富，而且原油储量、产量始终居世界前列。石油年产量高达1.57亿吨的伊拉克继续担负人类血管的重任。

1996年我驾车环绕美国时偶然发现，石油巨霸美孚、德士古、BP已经把自己老家得克萨斯的所有油井全部封死，理由是“美国的石油还能开采20年，在找到可靠的替代能源之前，美国严禁开采自己本

土的石油资源”。以后路过东京，听留学日本的朋友讲：狡猾的日本鬼子从中国大量购进优质原煤，运到东京湾集中后埋到濑户内海。还有比神头鬼脸的小鬼子更精明百倍的以色列……他们都把伊拉克及海湾地区看作自己的血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珍珠港事件、五次中东战争，都直接和地球的有限资源密不可分。

不久前我驾车穿过山西、河南，发现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奔小康的小煤窑和炼焦厂，源源不断向空气中释放硫化物形成酸雨，向大地倾倒废渣，污染原本有限的河流、农田。尽管中央政府屡屡告诫人民节约能源，可自诩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仍躺在自家炕头上做地大物博的黄粱梦，明显缺乏进入21世纪的物质和心理准备。

通过激烈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往往比其他政体滋润的政客更觊觎世界，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挑选中东召开“德黑兰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决不是三流政客脑瓜一热的即兴之举。解放整个欧洲并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更不是一个普通丘八，他在西点当学生时就刻苦钻研欧洲地缘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就直言不讳地提出：“哪怕仅仅从地理学角度讲，在整个世界战略上也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

海湾战争结束后，习惯重物轻人的国内媒体大肆渲染美国的先进武器，可对比武器更重要的人的作用却讳莫如深。据我所知，海湾战争盟军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不是一位简单的西点毕业生，他从12岁起就跟随担任伊朗宪兵顾问的父亲生活在海湾地区，不仅熟练掌握当地语言而且对中东历史地理的熟悉程度决不逊于萨达姆。早在施瓦茨科普夫担任美国中央军区司令时，就以海湾为假想战场多次进行电子对抗和沙盘模拟。就像我1990年在可可西里预见“海湾战争将在半年内爆发”并提前潜入巴格达一样，施瓦茨科普夫甚至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一周，预见性地秘密访问了利雅得、开罗。

当年我在埃及当记者时经常出入阿拉伯联盟总部，阿盟秘书长马

吉德亲口对我说："要想在中东有所作为，政治上离不开埃及，经济上离不开沙特。"显然施瓦茨科普夫早在海湾危机发生前就已经在埃及、沙特做好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准备。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依赖持之以恒的能量积累，任何伟大目标都需要几代人的卧薪尝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在我们的祖辈、父辈忙于应付内战之时，美国实用的教育体制因地制宜培养了许多热点问题专家，为美国谋得最大利益。如两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的总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都是精通欧洲事务的德国后裔。而在远东捍卫美国利益的麦克阿瑟父子，几十年一直生活在亚洲太平洋，家里雇着菲律宾女佣和中国厨师……由此看来，耗资600亿美元进行的42天海湾战争仅仅是漂浮冰山的小小一角，以石油为核心的巨大利益才是国际政治中追逐的现实目标。作为一名从学生时代就关注中东并有幸亲历海湾战争的摄影记者，应该感觉到海面下的冰山。

水比油贵

2000年8月2日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0周年纪念日，打开当天的电脑互联网，中石化信息网上所有的石油信息都与伊拉克有关：

伊拉克提出8月10日至8月31日要对基尔库克（Kirkuk）和巴士拉（Basrah）轻质原油提价80美分/桶。（2000-8-2）

伊朗怂恿伊拉克原油走私（2000-8-3）

伊拉克石油部长语出惊人（2000-8-1）

伊拉克要求制止美英阻挠审批石油合同（2000-7-26）

伊拉克将大力开发新油田（2000-7-25）

伊拉克可能要损失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2000-7-24）

伊拉克将向印尼出售2000万桶原油（2000-7-21）

伊拉克石油日产量下降导致油价上涨（2000-7-17）

……

在著名的新加坡原油市场，干脆就有一款优质石油直接叫“基尔库克”，基尔库克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优质石油的代名词。伊拉克偏远的沙漠城市基尔库克之所以令西方国家万分关注，其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石油。按《大英百科全书》讲：“基尔库克位于巴格达以北233公里处，有铁路、公路联结首都……是伊拉克石油工业的中心……”

中东历来“水比油贵”，在伊拉克花1美元可以加满奔驰轿车的大油箱，但买不来一瓶矿泉水。海湾战争爆发前1伊拉克第纳尔＝1000菲，当时的97号汽油只卖50菲一升。即使是现在，伊拉克的路边加油站也把汽油当凉水用；加油站满地流油，俯首可见。照看加油机的工人并不像世界各地的加油工那样斤斤计较，而是哩哩啦啦地把加油枪随便塞给顾客，加多加少任顾客自便。

随便走进伊拉克任意一处破烂不堪的农家，厨房里无人照料的炉灶大火都在长明灯般地熊熊燃烧。烤阿拉伯大饼的铁炉子本身就是一个大号汽油桶，炉灶里烧的不是柴火而是呼呼咆哮的天然气。即使躺在曼苏尔饭店的大床上也能隔着玻璃看到都拉第一精炼厂的熊熊大火，巴格达简直就是一座浮在油海上燃烧的城市。



在伊拉克，这种加油站满地流油的场面到处都是。（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早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就通过伊拉克驻华大使库巴先生，向伊拉克

政府递交了采访石油设施特别是基尔库克的申请，可到达伊拉克以后却迟迟没有基尔库克的安排。我几次向负责接待的文化新闻部礼宾司询问前往基尔库克的日程，可伊方都没有回答。最后见我被逼急了，就安排我们参观了巴格达南郊的都拉第一精炼厂。

位于巴格达的都拉第一精炼厂是伊拉克建造的第一座炼油厂，也是海湾战争开始后最先遭受打击的工业目标。1991年1月17日和2月9日，多国部队重点袭击了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和储油设施，彻底摧毁伊拉克94公里长的输油管，80%的炼油厂和石油输送网络遭到破坏……尽管物质破坏达到空前程度，但并没有使伊拉克人民丧失信心。海湾战争结束时，我曾经拍摄过都拉炼油厂的重建工作，当时许多经验丰富的退休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重返工作岗位，以非凡的勇气帮助濒临崩溃的萨达姆政府渡过难关。尽管当时伊拉克石油工人月工资只有3～4美元，但他们心态平和，“紧密团结在以萨达姆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仅用9个星期完成第一阶段的修复工作，打破外国专家关于伊拉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才能生产石油的预言”。伊拉克石油日产量迅速达到6.6万桶，给政府带来700万美元的收入。对解决伊拉克迫在眉睫的能源、燃料匮乏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迅速恢复的石油工业促使糖类加工、服务等其他工业部门逐渐恢复正常工作。10年来，封锁中的伊拉克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对住房、医疗、食品等给予特别补贴，使伊拉克人民获得可靠的基本生活保障，使“萨达姆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政权像金字塔一样稳固”。接待我们的都拉精炼厂厂长自豪地介绍：“1991年我们厂首先遭到轰炸，很多单位被毁坏了，工厂里到处都是燃烧的大火。可我们坚持下来了，这个炼油厂完全由伊拉克人民自己重建，所有的工程、技术工作都由伊拉克人自己完成。”从厂长的办公室看出去，到处都是醒目的防空洞指示牌，专供厂内职工躲避美英空袭。



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石油工人仅用几周时间就使都拉精炼厂恢复生产，这是一位老工人在工地上吃午饭。（唐师曾　摄于1991年3月）



都拉炼油厂内到处都是躲避轰炸的民用防空洞。（唐师曾摄于2000年5月）



都拉精炼厂的炼油工人（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这次重访都拉第一精炼厂的突出印象是似乎所有的管道、阀门都已经开始漏油。由于我不懂工业生产，只能从电线的老化、开关的失灵判断工厂设备的运行情况。都拉精炼厂的采访结果强烈刺激我北上基尔库克的欲望，可陪同的伊拉克官员采取拖延战术，说自海湾战争以来还从未允许任何外国记者拍摄基尔库克。

一定要去基尔库克

早在来伊拉克之前，新华社特稿部的图片编辑就慕名而来，要我为法国西格玛图片社拍摄伊拉克石油设施的详细资料，西方人对伊拉克石油工业如此关心显然不仅仅是军事目的。我认识的一位日本商人吹牛说，他可以从模糊不清的炼油厂照片上凭肉眼看出伊拉克需要哪种管道、阀门……由此推算出萨达姆的国家实力。可10年来他还没有看到这种真正贴近拍摄的、有价值的照片。

伊拉克是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执政的集权国家，全民皆兵，似乎全国就是一座大兵营，所有部长都穿一身戎装，很像“文革”期间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每人一身“国防绿”。由于10年来轰炸不断，伊拉克对所有重要目标全部实行军事管制，更不用说列为伊拉克经济命脉的基尔库克油田。据伊拉克新闻部介绍，基尔库克油田已经连续10年严禁外国记者接近，拍摄基尔库克更是绝对不可能的。

“阎王好惹，小鬼难缠”，绝望之余我向伊方要求直接面见胡马姆，由我自己当面向这位老朋友解释为什么非要去基尔库克。我历来相信大人物高屋建瓴的气魄，他们喜欢欣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冒险，而他们手下的局长、处长往往因“年富力强前程远大”觊觎高位而畏惧开拓。全世界的官僚机构充斥着这种但求无过的小官迷，被他们挡在身后的大人物绝对比这些小鬼更容易交流。伊拉克文化新闻部礼宾司司长哈利德，对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文化专员李景方抱怨说：“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有一种执着的职业病，但是唐是我所见最执着的，

特别是唐发脾气的时候更是如此。”直到我们拜会胡马姆博士，当面提出想看一下基尔库克，事情才有了转机。



早在来伊拉克之前，法国西格玛图片社就托人转告我，要我为他们拍摄伊拉克石油设施的详细资料，被我拒绝。

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胡马姆是当前伊拉克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不仅管辖文化部，还有新闻部、伊拉克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影剧院、博物馆……权力包揽邮电通讯、新闻情报、文化交流……相当于中国的中宣部长 + 邮电部长 + 文化部长 + 新华社社长 + 中央电视台台长……胡马姆毕业于著名的工学院，有英国核物理硕士、法国科技管理博士学位，常年担任伊拉克核研究中心主席，1984年获党徽勋章后调任文化新闻部长。萨达姆每次发表电视演说，都由胡马姆担任主持。

佛说：“若为善事，不惜身命，罢散自事，营成他事。”果然不出我所料，胡马姆听说我在文化新闻部吵闹后，立即派人把我请到部长办公室，说他很高兴又见到我，称赞我冲破封锁来伊拉克开辟了伊、

中文化合作的新途径。他首先耐心听我解释为什么非要去基尔库克，任我旁征博引摇头晃脑唾沫星子四溅。谈话进行到一半时，胡马姆让办公厅主任把我的请求全部记录下来，马上打电话给石油部长拉希德，让他尽快安排我的基尔库克之旅。还建议我顺路去摩苏尔休息一天，然后再去基尔库克看石油。“我得和石油部长拉希德安排一下。因为你知道，他们通常不让新闻记者去油田，你是特许的。在你之前还没有任何记者获得过拍摄基尔库克油田的特许。”



当面向胡马姆部长解释一定要去基尔库克的理由。（王淳华　摄于200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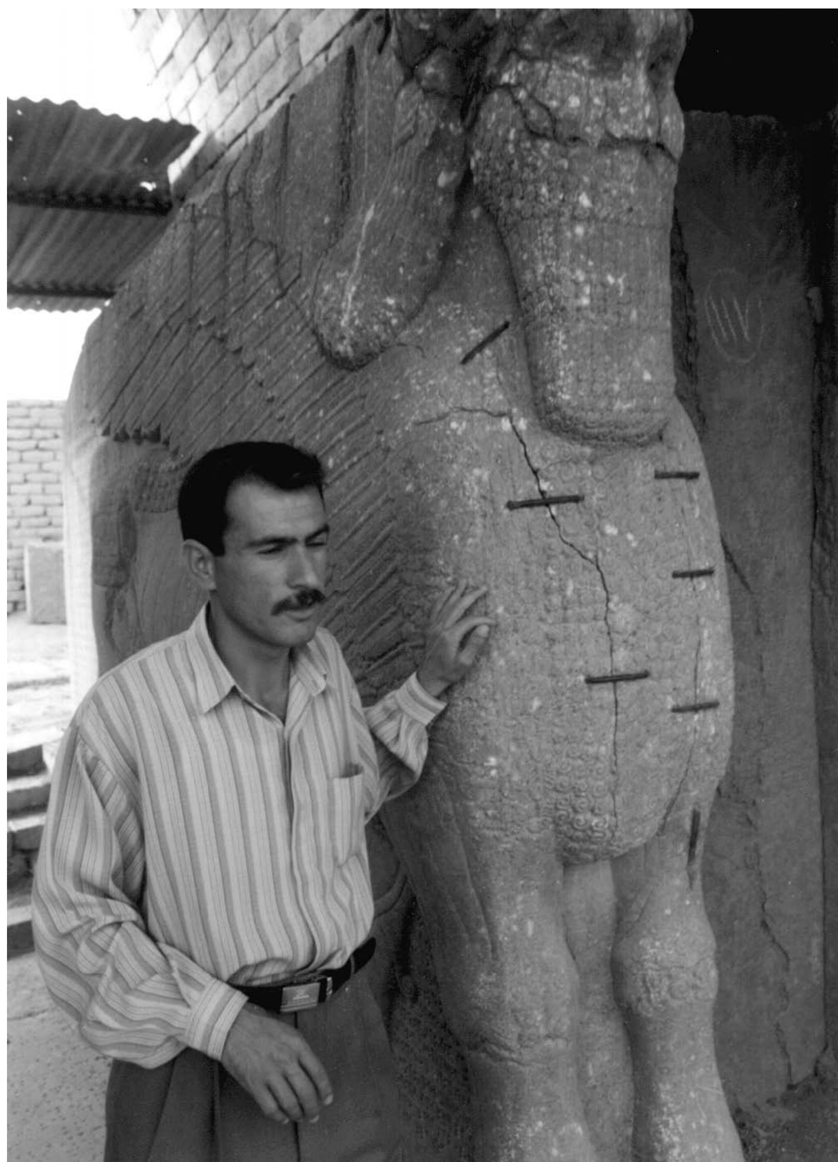
亚述，亚述

次日清晨，陪同天不亮就到了楼下，这是我们访问伊拉克期间陪同没有迟到的唯一一次。汽车悄然离开黄沙滚滚的巴格达城，穿过底格里斯河浓稠的晨雾进入满目碧绿的河谷地带。沿着古老的底格里斯河溯流而上，车窗外开始出现茁壮的庄稼、清洁的河水，还有活泼的

羊群和嬉戏的孩子。克劳塞维茨在他的经典之作《战争论》中讲过：“战争是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即使在远离都市的乡村，战争造成的破坏也比比皆是。海湾战争作为历史上钢铁含量最高的现代化战争，不仅直接破坏人的生命财产，还污染环境影响子孙后代。一直到现在，伊拉克南北仍处在多国部队划定的禁飞区内，头顶不时突然爆发F-15突破音障的轰鸣。

大概是看到部长对我们很关照，陪同比往日客气了许多，沿途带我们参观了一些残破不堪的古迹。在前往基尔库克途中，我们顺路拜访了北部腹地的古城摩苏尔，想不到和巴比伦齐名的亚述古迹竟然比巴比伦还残破不堪。亚述人崇尚武力喜欢捕捉狮子，历史学家习惯把古城尼尼微称作“狮穴”，当罗马帝国还处于幼年时，亚述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国。在尼尼微出土的2000多块泥板表明亚述王国实行男人家长制，妇女毫无地位。法律规定丈夫只许有一个妻子，但可以嫖妓。妓女在最古老的城市文明出现时，就已经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尼姆鲁德（Nimrud）的鹰翼人面公牛（Human-Headed Bull with Wings of A Hawk）是亚述地区最著名的文物之一，只可惜精美的石雕已经开裂，被伊拉克人用简陋的大铁锔子随手钉合在一起。海湾战争使原本破败的亚述文明雪上加霜，交战双方谁会在意“一千零一夜”的文物保护呢？我开始为这里的世界文化遗产担心，恍惚间想起北海太守孔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那句感慨。



尼姆鲁德的鹰翼人面公牛是亚述地区最著名的文物之一，只可惜精美的石雕已经开裂，被伊拉克人用简陋的大铁锔子钉合在一起。（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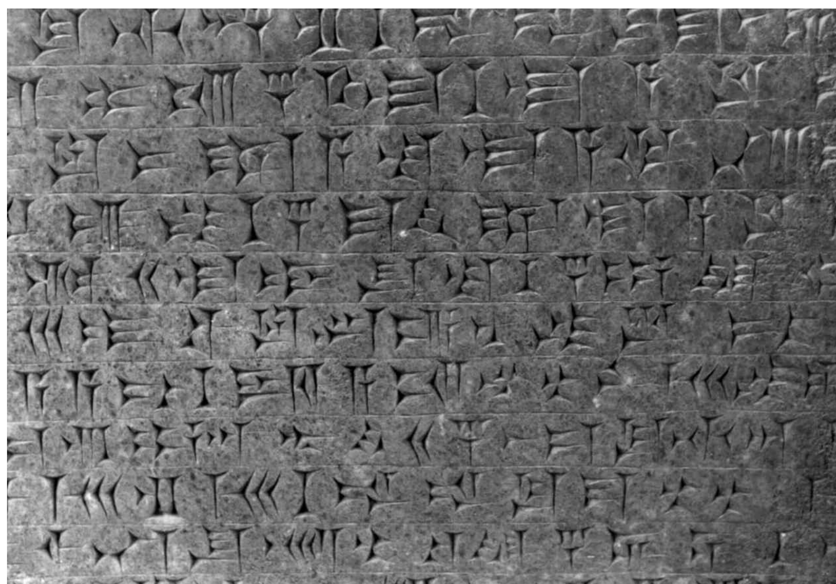
两年前我去波斯湾，看到即使只有100年历史的阿曼城堡也受到

英国、德国文物学家的精心保护。可伊拉克几千年历史的文物就像没妈的孩子，被抛弃在露天简陋的院子里，任其在烈日和沙暴下风雨飘摇。在尼姆鲁德，我们碰巧遇到联合国发展计划的项目官员杜波伊斯先生，显然，联合国也开始对伊拉克古迹的保护表示关心。

离此不远有座上百年历史的圣马利亚教堂，1999年8月11日地球发生日全食，这里是北半球的最佳观测点，许多科学家都会聚到此观看百年不遇的天文现象。不料观测时发生了千年罕见的恐怖事件，云端里突然钻出美国飞机，投下比日全食还惨烈百倍的高爆炸弹，一下子就摧毁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处……给我带路的两个小男孩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天轰炸的惨烈情景，似乎在讲述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格林童话》。我用手摩挲孩子的光头，联想到自己苦难的儿童时代。我5岁时遭遇“文革”抄家，一直到大学毕业才落实政策搬回什刹海的老房子。我从不愿回忆自己童年受了多少苦，只是一见到这么大的男孩就兔死狐悲心生怜悯。我想如果将来我生两个儿子就叫巴比伦、亚述；如果生两个女儿就叫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我决不让我的孩子重复我受过的苦。

接近死亡的玩世不恭

黄昏时分，我们驶抵巴格达以北400多公里处的避暑胜地——古城摩苏尔，下榻在著名的尼诺瓦饭店。尼诺瓦饭店濒临底格里斯河，整座建筑下宽上窄仿佛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在夕阳映衬下金光四射，神圣高贵。美中不足的是所有玻璃窗都贴着防空胶条，仿佛全身长疮贴满膏药的麻风病人。据说这样做是防备经常光顾的美英飞机，避免轰炸造成的气浪震碎玻璃伤人。



刻在石板上的楔形文字。（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尼姆鲁德的石门。（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由于国际封锁，往日舒适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宾客寥寥、生意萧条，晚餐时只有我们一行傻呆呆坐在餐厅里。入夜，寒风习习吹得落

地窗帘随风飘舞，仿佛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鬼魂，让我油然产生自己正在变成木乃伊的错觉。

次日天明，做了一夜噩梦的我被穆罕默德喊醒，继续朝茫茫沙漠深处的基尔库克挺进。我兴奋而得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油田一游的福分，特别是海湾危机10周年之际。穿过一片低地，路边开始出现各种蜿蜒的大口径输油管、输水管，远处天际腾起的冲天烈焰，伴之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那是正在燃烧的天然气，划破空气的啸叫仿佛正把天空撕开一个大洞。陪同官穆罕默德和司机塔米姆开始警觉起来，坚决要求我把相机装进包里："在得到基尔库克政府、北方石油管理局双方认可之前，绝对严禁拍照。"

伊拉克是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如果在高速公路、桥梁、机场、政府机关或其他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停车，马上会有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冒出来，纷纷从各自内衣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声称他有权把你抓走。即使在伊拉克情报人员陪同下，即使在萨达姆高塔、底格里斯河畔、巴比伦废墟等纯游览区域，也严格限制拍摄的方向和角度。我在文化新闻部会见胡马姆部长后得意忘形，忍不住顺手拍了张门口的岗哨，差点被翻脸不认人的宪兵砸了莱卡。作为经历过战乱的摄影记者，我喜欢享受街头情急生智、随机应变的幽默，尤其喜欢体验接近死亡的玩世不恭。

伊拉克石油质量是世界公认最好的，原油年产量高达1.57亿吨，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由于一半以上的好油出在这里，基尔库克历来被列为国家头号财富备加保护。海湾战争以来长达10年的轰炸封锁使伊拉克草木皆兵，萨达姆集中全国最优秀的装甲单位誓死保卫伊拉克的最后一笔财富。

行进中一无所有的荒漠开始出现T-71坦克履带轧过的宽边痕迹，SAM-2防空导弹和双37高炮、单57高炮长颈鹿般的身躯也开始在沙丘后跳跃。紧接着是半埋在沙堆下的坦克掩体，我可以模糊辨认出115

毫米火炮的T-62坦克、125毫米火炮的T-72坦克，还有土黄色的BMP-2步兵战斗车，一律雄赳赳翘首长空，至于是否打得响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根据我在南加利福尼亚热带沙漠的切身经验，一个夏天的酷热就能把汽车雨刷器的橡胶条晒化。由此我怀疑这些在沙漠上曝晒了10年又缺乏起码配件的武器是否还有战斗力。当我看到某一景物非常想拍却不能拍的时候，这个景物就会深深印刻在脑海里，持续折磨我一辈子。以往坐出租车、火车、飞机旅行时我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职业本能使我忍不住摸出莱卡，举到眼前对着沙堆轻轻按了一下，想不到这一下立即被司机塔米姆在反光镜里发现了。这家伙迅速和穆罕默德交换了一下眼神，斩钉截铁地把车停在沙漠上，任我怎样解释都不起作用。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和我们一起吃吃喝喝的两个人，四只眼睛永远防贼般盯着我。特别是司机塔米姆从汽车后视镜里发出的可怕目光，这种眼光只有在大型犬科动物扑咬食物时才能看到。

石油重地被捉记

莱卡惹事了

莱卡引来的麻烦逐步升级，我首次面临本来可以避免的危险。我和司机塔米姆的冲突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迅速转化为敌我矛盾，原本站在一边旁观的穆罕默德见状不甘落后，也加入到塔米姆一边。连我老婆都站出来攻击我，说我买个破莱卡到处吹牛快门没声，结果刚掏出来就让人抓个正着，天生一个败家子。情况对我越来越不利，我自己都弄不懂怎么一下子就发展到这个地步。塔米姆和穆罕默德协商后把汽车停在路边，威胁我如果不交出莱卡就停在这里不走。我搜肠刮肚想出所有的阿拉伯好词讨他们的欢心，可急红了眼的塔米姆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英国人为信仰可以牺牲一切，我可不会为我的荣誉牺牲他人生命。

就在我们讨价还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风驰电掣地冲过来一辆皮卡。车没停稳就连蹿带蹦跳下来四五个端AK-47步枪的彪形大汉，每个人头上都缠着库尔德人的包头，仿佛《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领头的黑大个儿身穿油脂麻花的钻井套裤，就像“工业学大庆”时的铁人王进喜。我提心吊胆绝望之极正准备交出命根子莱卡，不料“王进喜”伸出握刹把的大手一把就把塔米姆从驾驶座上拎了出去。坐在一边的穆罕默德吓得赶紧掏出怀里的介绍信追出去解释，“王进喜”二话不说顺手把塔米姆和穆罕默德的工作证全都收走。吓傻眼的穆罕默德扭过头结结巴巴朝我大喊：“呆在车上别动！”我这才意识到这位“王进喜”比塔米姆和穆罕默德更有来头。

“王进喜”指挥几位便衣连推带搡把塔米姆和穆罕默德架走，扔下我和我老婆孤零零地坐在破车里。头顶的骄阳格外刺目，我老婆用比烈日还刺目的白眼仁恶狠狠地瞪着我。我佯作不知眺望远处的沙堆，惴惴不安准备和我的宝贝莱卡永别。

大约过了一刻钟，司机塔米姆先被放回来。这老兄衣冠不整面色铁青，钻进汽车就叮嘱我千万不要承认拍过什么。我怎么也弄不懂刚才还要没收莱卡的塔米姆这么快就改变了态度。5分钟后，穆罕默德大汗淋漓地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趴在我耳朵上：“一会儿有人问话，千万咬定什么也没拍。”接着命令我把莱卡中的胶卷卸下来曝光，“赶快把你的操蛋相机扔了算了！”

我们奉命跟在皮卡后面开进基尔库克，一直开到北方石油公司总部，被马超、马岱们簇拥着走进外事部门的办公室。经过查询，北方石油公司声称到现在还没收到中央通知，尽管我们持有伊拉克文化新闻部的介绍信和省里的批准信，但由于缺少石油部的电话通知，已经严重违反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关于基尔库克的战时规定。穆罕默德要求现在就给首都打电话，无奈基尔库克联结巴格达的电话根本不通，急得穆罕默德和塔米姆对着安拉赌咒发誓说这一切都是胡马姆部长安排的。

习惯承担罪责的我见状掏出我和伊拉克高官们的合影，说我是伊拉克人民的老朋友，这次来基尔库克的确是胡马姆部长邀请的，所以错误都由我个人承担，他们两位不过是奉命而行的陪同。领头的“王进喜”大手一挥说这和你无关，你是中国作家，是我们的朋友，可这两个家伙不会不知道革命指挥委员会的规定。我这才知道这帮雷厉风行的便衣不是冲我来的，他们属于比塔米姆、穆罕默德更厉害的其他部门。

我们被押出基尔库克城，跟着皮卡驶向大漠深处。现在轮到塔米姆埋怨穆罕默德为什么没把事情弄好，穆罕默德又反过来指责塔米姆

——两个人像拔了毛的斗鸡，已经没有精力顾及刚才发生的“莱卡事件”。8年前我在开罗看过一场大学生演的舞台剧，编剧天才地杜撰了一帮住在一间寝室的阿拉伯地区的留学生：埃及学生每天发表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巴勒斯坦学生不停地找人借钱，海湾学生花天酒地，伊拉克学生钻研革命理论，利比亚学生研究炸弹，黎巴嫩学生策划绑架人质……剩下趁机牟利的以色列人在一旁偷着乐。其实阿拉伯人这种窝里斗的习惯在我们中国也有，已经让近水楼台的日本人占走不少便宜。

便衣“请吃饭”

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被押进一处濒临油气田的金属活动房，几名带枪的便衣把我们几个逐一分开，关进不同的小屋里。一位穿漂亮短袖衬衫的中年男子把我带进一间有空调的单间，用英文问了我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又强迫我老婆交出摄像机，可对我脖子上惹是生非的莱卡则看也不看。我随手朝被吓傻的老婆偷拍一张，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刚被没收的摄像机上。

短袖衬衫手捧摄像机在我身旁坐下，用修长的漂亮手指熟练地操作Panasonic EZ-1，以职业的热忱和我一同欣赏我们刚拍的录像带，我赶紧在一旁没话找话地献媚。短袖衬衫按下快速搜索键，把拍过的录像带从头到尾捋了一遍，直到没有发现任何危害国家利益的内容之后，才把摄像机还给我老婆，并对刚才的误会表示歉意：“您是作家，一定见多识广。这是禁飞区又是石油重地，美国常来轰炸，战争状态要求每个人提高革命警惕。现在请你和夫人与我们一起吃饭，也算压惊。”我赶忙说我个人倒没什么，我只是不想连累我的陪同。他们两位都是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好同志，只是路上走得急了点儿，可能有些环节没衔接好。至于吃饭，这得由我的“MUH”（脑子）决定，我的陪同才是我的MUH，我一路上吃喝拉撒采访拍照都由我的MUH安排，可现在不知道你们把我的MUH弄到哪里去了。短袖衬衫闻言哈哈

大笑说，你的确是个够朋友的好人，安拉保佑你。

这时候塔米姆、穆罕默德都笑吟吟地推门进来，跟在他们后边的还有一位精瘦的小伙子。小伙子不停地用英语由衷地重复“萨达姆是好领导、非常好的领导”。边说边拉住我的胳膊非要一起吃饭。我老婆两眼盯着桌子上刚被收走的摄像机，弄不明白这里“MUH、MUH”到底演的是哪一出戏，担心这台几万块钱的摄像机是否会被没收。



2000年5月27日，在基尔库克油田拍照后被抓进当地一所拘留所。（王淳华　摄于2000年5月）

《汉谟拉比法典》的故乡——伊拉克的法律是没有通融的，任陪同怎么求情也没有用。我们找遍基尔库克的所有电话，希望能够向巴格达求援，但基尔库克通往巴格达的电话始终就没法接通。像大多数

文明古国一样，大量不易解决的复杂事务都是在饭桌上完成的。我在饭桌上获知，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多年前的规定，所有进入基尔库克的外国记者都必须得到文化新闻部、石油部、基尔库克政府和军方联合审批，“由于某些文件上的欠缺”，我们必须返回巴格达补办其他手续。在革命纪律森严的伊拉克，几位刚认识的朋友不是不肯帮忙而是不能帮忙，“我会让手下将你们安全送出基尔库克的”。

落日余辉中蒙黑纱的妇女赶着毛驴在河堤上收粮食，天真烂漫的牧童赤脚赶着成群的牛羊。沮丧之余我们只好打道回府，掉头开上通往巴格达的沙漠公路。夕阳从破车背后照过来投下长长的、飞速跃进的黑影，一股断肠人在天涯的忧伤油然而生。我从小就害怕黄昏，以后常年在外面奔跑深知黄昏是黑暗、寒冷的前兆。每到黄昏，夕阳都把万物涂上一层恶狠狠的血色，预兆一些不可知的祸事。

生命不能浪费于无意义的纷争

多年浪迹天涯培养出来的预感总是很准，这种预感不属于知识、教育而属于野兽的本能。我在伊拉克北部禁飞区冒险的同时，新华社主管国际采访的一位老兄已经把明码电报直发到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要求“立即把唐师曾弄回国内”。前一天还为我设宴款待的张维秋大使对从天而降的明码电报莫名其妙，为解除大使的疑虑，我只好把不愿示人的个人恩怨和盘托出。

盯住我不放的这位老兄原来也是记者出身，曾经还是我上司。说来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是热衷乌纱、缺乏判断力而嫉贤妒能。海湾战争爆发前，他下令麾下的新华社巴格达分社集体撤到尼科西亚、开罗，甚至撤回国……以“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使新华社巴格达分社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彻底关门。我曾经在巴格达通过国际长途向他汇报美联、路透、法新社和CNN都在巴格达坚持工作，希望新华社“不要主动躲过百年不遇的天赐良机”。他当即恶狠狠让我“把电话给首席记

者，现在还轮不到你讲话”。我万般绝望越级向新华社社长穆青报告关闭巴格达分社愚蠢之极，还找到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向曹彭龄武官、郑达庸大使寻求支持。最后冒着“违制”的风险负隅顽抗，坚信海湾战争能把我锻炼成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的一根硬羽毛。由于我单枪匹马坚持滞留在“伊拉克边境-以色列”一线，侥幸经历战争的全过程而一举成名，终于成为这场世纪末之战唯一跨越战线双方的新华社记者。

想不到这位封疆大吏对我蔑视权威的做法恼火之极，海湾战争结束后竟然拒绝我到开罗担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理由是“唐师曾名声太大，不好领导”。总社摄影部偏要针锋相对，坚持：“唐师曾是新华社优秀摄影记者，在没有其他理由的情况下，摄影部坚持把最好的摄影记者安排在中东地区。”两位领导就这样僵持了半年多，我才臊眉耷眼地到中东赴任。

想不到10年过去，这位前封疆大吏的官越做越大，到底像秦桧处理岳飞那样在决战前夜把12道金牌发到朱仙镇……说到这里我情绪激动、血脉贲张，尚未痊愈的血液病当即发作，害得张大使和文化专员李景方慌忙四处找纸巾帮我堵鼻血。

我老了，可我希望有更多的风光日子，我可没精力把生命浪费在无聊的琐事上。我随手抓来一张包装纸，写下“唐师曾已经得到张维秋大使转来的电报通知”。我把包装纸交给大使让他去向新华社交差，我不想为我这只病鸭子殃及池鱼，耽误了好朋友的前程。

石油之争

次日天明，我督促穆罕默德迅速补齐所有手续，由我亲自驾车二进基尔库克。“压力之下毫无惧色”，由于压力我更感到肩膀上的千钧重任，一种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徒步天竺的神圣使命感油然而生。

伊拉克北方石油公司（North Oil Company）总经理兼董事局主

席贾西姆（Rafid Abdul-Halim Jassim）事先得到石油部长拉希德的电话通知，早已在阳光明媚的大办公室里等着我。“北方石油”是伊拉克最大的国营企业，实行准军事管理，不仅经济地位重要，政治文化中的旗手地位丝毫不逊于我们的大庆。

石油资源从一开始就是伊拉克经济的最主要财富，其大规模开采起始于1955年。从19世纪初基尔库克发现石油时起，外国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就像垄断资本插在伊拉克肌体上的吸血管，越过沙漠经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等国把伊拉克的能源掠夺到西方世界。由于伊拉克石油蕴量大、埋层浅、品质优、杂质少，加之纯熟的技术和多年丰富经验，伊拉克原油年产量从一开始就有100万吨。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伊拉克的原油开采能力不断增长，很快就达到年产450万吨的水平。一直到1961年6月英国批准科威特完全独立以前，伊拉克都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的产油国家。



向石油工人兜售葵花籽的儿童。（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1972年6月，伊拉克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宣布石油国有化，把英美控制的石油命脉全部收归国有，伊拉克南北丰富的石油资源才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基尔库克省改名“塔米姆省”，即国有化省。

1980年7月1日，萨达姆总统在纪念石油收归国有8周年庆祝大会上说：“伊拉克石油国有化之前，外国石油公司始终欺骗伊拉克人民，说国际市场不需要伊拉克石油，以此压低伊拉克石油的出口价格。由于外国公司垄断了石油开采，造成伊拉克国库空虚、人民生活贫苦，当年只有英国人和经过挑选的伊拉克人才能进入油田。夜晚，普通老百姓一旦靠近灯火辉煌的石油工地，就被英国人像撵狗那样赶走。英国人利用石油控制伊拉克政局，派代理人随意更迭他们不喜欢的政府。那时伊拉克工人和普通农民连5个第纳尔都没有，而现在的农民可以赚上千第纳尔，工人最低周工资40第纳尔。石油国有化使我们脚下的土地更加坚实。”

海湾战争期间，在以美英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下，伊拉克北方库尔德三省发生叛乱，一度占领了苏莱马尼亚、埃尔比勒和达胡克三省的省会，并集中兵力攻打石油城基尔库克。当时伊拉克主力正集中南方，与美国等多国部队进行海湾战争，共和国卫队精锐被多国部队隔断在科威特、巴士拉一线无力北上驰援。人单势孤的基尔库克守军与库尔德武装对峙3天后被迫退出城外，基尔库克失守。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与南方穆斯林什叶派遥相呼应，萨达姆政权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但像所有的反政府武装一样，由于缺乏组织和正规的训练，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长达数百年的利益冲突、民族矛盾、宗教信仰使他们在综合力量整合上大大落后于政府军。与反政府叛乱分子对峙的小股政府军为争取时间，采用类似“空城计”的古老的计谋迷惑叛乱分子，派出直升机在库尔德村庄上空盘旋扬撒石灰粉。反政府军看到白雾缭绕误以为是化学武器，军心浮动疑惧顿生。他们

大肆抢掠、烧杀，烧毁许多学校和医院后望风而逃，并挟持大量库尔德人，使原本复杂的库尔德问题更加复杂。



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贸易部长亲自到北部埃尔比勒、苏莱马尼亚等库尔德自治区给缺衣少食的少数民族送粮食。（唐师曾　摄于1991年4月）

我曾经在1991年三四月间跟随伊拉克政府军几次北上，亲临一线镇压叛乱。我还和伊拉克经贸部长一起给库族百姓送面粉。库尔德男子穿着有点像黎巴嫩舒夫山区的德鲁兹人，上衣紧身煞腰，腰间围有布巾，裤子大宽裤裆却紧煞裤脚。衣服多为蓝、灰、青、古铜色，头戴棉线手编小帽，面孔黑红目光炯炯，一看就是能受苦的山里人。

井无压力不喷油

据贾西姆介绍：“美国入侵给伊拉克石油生产造成极大破坏，油田的所有装备都被炸毁。美国人还用小降落伞在这个地区布置了25万

枚地雷，用以阻止伊拉克重建油田恢复生产。由于缺乏必要的装备，排雷已经让我们失去许多宝贵同志。我们需要进口设备，我们需要友好国家的人道援助……”

基尔库克作为伊拉克最宝贵的油田，海湾战争爆发后成为仅次于巴格达的战略目标，经常遭到美英飞机的狂轰滥炸，基尔库克油田的所有泵站和通往土耳其的输油管都被多次炸毁。



基尔库克炼油厂的旧机器。（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1998年美国炸毁基尔库克通讯塔，还炸死一些工人，基尔库克石油工人只用一周时间就修复设备，马上又被炸毁。联合国“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办公室执行主任塞万立即表示关心：“据悉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通往土耳其输油管的一个主控中心，1日在美英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2日同一条输油管的另一处设施又被美英飞机炸毁。该输油管出口的石油约占‘石油换食品’计划允许伊出口的石油数量的一半以上……”

贾西姆总经理说，重新修复基尔库克油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必要的设备，持续封锁迫切需要中国、俄国朋友的大力支持。安理会制裁伊拉克委员会对伊进口石油零部件和设备合同的审批，进展十分缓慢，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对人为搁置合同的做法表示不满。据他介绍，到1998年，联合国已收到1991份合同申请，但却只有1391份在审批之中。

由于多国部队轰炸，基尔库克炼油厂和一些输油管道受到破坏，尽管大批设施已经恢复生产，但一些损坏严重的目前仍无法修复。设备老化、机械陈旧严重影响基尔库克昔日在世界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



警卫基尔库克油田的苏制40管自行火箭炮。（唐师曾　摄于1992年2月）

10年的国际封锁非但没有使伊拉克石油工业崩溃，反而刺激伊拉克人的工作热情，“人没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仿佛回到我们反帝反修的“工业学大庆”时代。基尔库克工人的精神面貌很好，丝毫看不出封锁下的消沉。负责设备维修的艾迪巴工程师每月工资奖金

共4万伊第（相当20美元），远远高于伊拉克人的平均收入。一帮刚从基尔库克石油学院毕业的女技术员就业机会与男技术员平等，而且同工同酬，是海湾地区最开放的地区之一。

从巴比伦时代燃烧至今的大火

伊拉克的原油日产量到2000年8月已达307万桶，比7月份增加了63万桶，创1991年以来日产量最高纪录。伊拉克《巴比伦报》11月12日援引伊拉克石油部提供的材料说，尽管伊拉克遭受长达10年的国际制裁，但仍有能力将原油日产量恢复到海湾战争爆发前日产314万桶的欧佩克配额。2000年12月5日晚，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再次延长执行6个月，即从12月6日开始执行第9期“石油换食品”计划。由于伊拉克目前的生产能力已接近极限，急需大约300亿美元的追加投资，这笔大买卖让俄罗斯、法国、日本商人垂涎三尺。

伊拉克是世界产油大国，1988年1月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1000亿桶以上，半探明的石油储量为500亿桶，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2位。我在伊拉克的好多朋友都公开、私下地找到我做石油生意，答应用绝对低于国际油价的优惠政策款待我这个老朋友。

北方石油公司贾西姆总经理亲自带我们到离他办公室不远的一处油田，递给我一根棍子让我敲打地面，随后掏出火柴在我敲打的地方轻轻一划，一团橘黄色的火焰立即升腾而起。贾西姆掏出一支铅笔，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幅草图，解释地壳内的原油自下而上分别以沥青、重油、轻油、天然气的层次重叠而上。有些地方埋藏太浅直接暴露到地面，用小木棍轻轻敲击就会震松地壳，使天然气冒出地面。由于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所以极易燃烧。又由于天然气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所以早在巴比伦时代，古伊拉克人就用燃烧改变天然气的有害成分，这也是遍地大

火的原因。伊拉克石油不仅含杂质少，有效成分高，而且埋藏浅，面积大，整个伊拉克北方分布的都是这样的油田。



我站在基尔库克油田上，身后的大火至少燃烧了一万年。（王淳华　摄于2000年5月）



基尔库克的土地只要用木棍戳两下，就有天然气冒出。由于天然气本身有毒，古巴比伦人就通过燃烧天然气去改变其成分，避免污染。（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景色，一望无垠的大沙漠上大火熊熊，咆哮着变换身形在广袤大地上翩跹起舞，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魔鬼吞噬一切。从没见过如此壮烈场面的我，心怀敬畏地向贾西姆请教，这些滔天大火是否是海湾战争引发的油田大火。贾西姆回答，这些大火从巴比伦时代燃烧到现在，已经至少燃烧了一万年。我们的汽车仿佛在但丁《神曲》描述的炼狱中穿行，置身一个虚幻的神鬼境界。空气弥漫着岩石烧焦的怪味和空气撕裂的爆炸声，仿佛要把我烤化。整个基尔库克就是一座燃烧的城市。

透过大火形成的前景，满目尽是林立的井架，遍地铺满四通八达的油管，一直通向遥远的边界。把地球深处的无穷能源，源源不断地输向世界各地，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



基尔库克油田埋藏太浅，我用一根棍子敲打地面，就会震松

地壳，使天然气冒出。随后掏出火柴在我敲打的地方轻轻一划，一团橘黄色的火焰立即升腾而起。

哭泣的河流

真主用水创造奇迹

《古兰经》第24章说：“真主用水创造一切事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真主创造他所意欲者，真主对万物是万能的。”真主用水在沙漠中创造所有奇迹。

伊拉克位于波斯湾西北角，面积44.18万平方公里，人口2200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自北向南流淌，冲积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伊拉克自古以来就是中东地区水源最充足的国家，我真弄不懂真主为什么对伊拉克如此偏爱，一下就赐给它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土耳其境内的山间湖泊，流经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绵延1900公里，最后同幼发拉底河汇合为阿拉伯河。沿河地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不仅孕育第一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还诞生了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

90年代初，我到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持续的高寒缺氧才使我认识到氧气、淡水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沙漠民族具有超乎寻常的危机意识，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一位英国人从开罗骑骆驼走到亚喀巴，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阿拉伯人为一桶淡水就可以杀死入侵者。《圣经》中的摩西出埃及前也曾帮牧羊女争夺水源，我在西奈就喝过摩西泉的井水。阿拉伯语把泉水称作“艾因”，意为眼睛。阿拉伯人习惯指着眼睛赌咒发誓，因为沙漠中的泉水不仅可以孕育绿洲，还可以孕育生命。

源于对万物之母——水的崇拜，阿拉伯人对女人的重视也和其他水草肥美的民族大相径庭。男人即便拈花惹草也只是瞎忙活一场，无果而终。女人却可以不动声色、偷偷怀上自己选中的种子。就是国王也可能被女人欺骗，把铁打江山拱手让给女人生育的儿子，而这个儿子极可能是自己的敌人的种子，这也是国王把女人囚禁深宫内院与太监为伍的基本原因。由于沙漠民族对女人贞洁特别重视，所以对不忠的女人惩罚起来也格外坚决。沙特王室处死自己公主被英国人拍成电影，还有许多令人咋舌的类似故事。我在埃及当记者时，一位少女途经开罗解放广场遭到一帮男人的强暴，处女膜破损。事后报纸竟然怀疑“这名少女早先偷情已经弄破处女膜”，现在因为嫁不出去才故意嫁祸街头恶少。在中东某些农村，至今流行切除少女阴蒂的传统，这样做的“好处”是少女成人后不知性交快感，免得独守空房时追求性爱，《圣经》《古兰经》里都有惩戒通奸教义。



底格里斯河下游干旱缺水，一位巴士拉妇女从距家很远的地方取水。（唐师曾　摄于1993年7月）

《一千零一夜》就源于国王沙赫里亚尔发现妻子不忠，由此开始向所有女人报复，每晚要一个少女，次日天明就把她杀死。一位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阻止杀戮，自愿把自己献给国王，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每到精彩之处就戛然而止，留待次日再讲。好奇的国王就这样听了一千零一夜，最后爱上山鲁佐德，两人白头偕老。一直到现在，蒙头垢面的沙赫里亚尔和山鲁佐德的雕塑仍在阿布·奴瓦斯大街靠河边一侧，津津有味地继续《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他们身后就是奔流上万年的底格里斯河。

登高远望，巴格达的建筑高屋建瓴错落有致，处处显示着国际大都市的恢弘遗风。从一座座独立的洋房、宽阔的马路可以看出伊拉克曾经富裕繁荣，人多地少的中国人再过20年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宽大的房子。绝无仅有的淡水、石油资源，使伊拉克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有“油水”的一个。

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海湾战争后长达10年的国际封锁，使巴格达灰头土脸、满面蒙尘。原本植树种花的“真主花园”，堆满各式各样的钢筋水泥拒马、铁丝网和防空掩体。满街徘徊的虎背熊腰的高大士兵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不像我们常见的子弟兵大都是农村来的小童蛋子，一脸稚气地斜挎空枪套，二尺的小腰扎在猪皮腰带里。

被玷污的古老文明

回到我们住宿的曼苏尔饭店，即使坐在阳台上也可以看到底格里斯河的涓涓细流。由于海湾战争造成的环境污染改变了局部气候，导致两河流域连年缺雨、飞沙走石、尘土飞扬。加之土耳其、叙利亚在上游修筑大坝截断水源，要挟伊拉克“用一桶水换一桶油”，因此每到夏季巴格达都水荒严重，连伊拉克降温用的传统水风机都无法开动。医院无法保障洗澡用水，甚至清洁的饮用水也无法提供。

巴格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多姆·沙马博士说："以前伊拉克拥有24座发电站和先进的水处理工厂。如今除了巴格达之外，伊拉克大多数地区的电力供应极不稳定，每天大约供电6小时。获取安全用水的能力也显著下降。"所以连位于巴格达曼苏尔富人区的新华社巴格达分社院内，也堆满了发电机和汽油桶，准备应付随时发生的停水、停电。

从我所站的位置看，目力所及的四座跨江大桥间不到2公里的河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50个直径半米的污水管，正把乌黑恶臭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河内。海湾战争破坏了原有的污水处理系统，滚滚污水顺流而下，污染两河流域原本纯净的古老文明。

濒河而居的渔民拉西姆世代在底格里斯河上捕鱼，可海湾战争带来的贫铀弹和油田大火造成底格里斯河严重污染，河水怪臭、鱼类死亡，还传染许多奇怪的疾病。由于国际制裁无法进口造船用的马来西亚柚木，可用普通木料造船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刷船的防水漆不许进口，用伊拉克国产的普通油漆刷船最多只能维持4个月，大大缩短了渔船的使用寿命。各种伪劣的化工品随河漂流，继续污染下游的生态环境。



夏季的巴格达底格里斯河。（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战乱使巴格达的城市残缺不齐，设施陈旧，没有生机。海湾战争期间多国部队用激光制导炸弹摧毁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共和国”大桥、“7·14”吊桥和烈士桥，战争使伊拉克的发展至少停滞在10年前，就像一本尘封的日记。巴格达满街歪歪扭扭奔跑的各种破车、失灵的扩音喇叭、烧焦食物的糊味、破旧发动机喷出的废气、争先恐后的叫卖声和不规则的阿拉伯音乐，构成嘈杂、无序的交响乐。

1000多年前，底格里斯河巴格达水路码头长达好几公里，据阿拉伯第一部编年史《先知与帝王史》记载：“由于有了底格里斯河，我们和中国之间就不再有障碍，任何东西都可以经过水路运到这里……”我国的《唐史》也描述了“四方辐辏，万货斗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的“大食国”商队来广州、泉州贩运珠宝、香料、挂毯……

当时底格里斯河上除往来的商船外还有阿拔斯王朝达官显贵名门

望族的豪华游艇，游艇外型模仿狮子、猎隼等凶猛动物，每条船都价值连城。穷奢极欲、肆意挥霍、贪污腐败，终于使这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毁于一旦。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蒙古骑兵破城而入，将豪华宫殿洗劫一空，把马蒙的“智慧宫”和许多书院付之一炬，底格里斯河漂满了死尸和书籍……



由于没有进口的防水漆和马来西亚造船用的柚木，底格里斯河上渔民的渔船破旧不堪。（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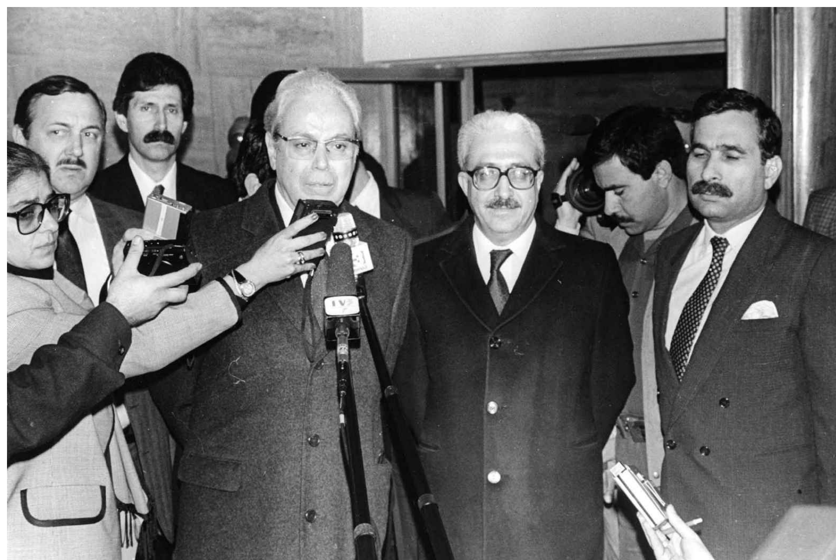
母亲河的枯竭，是全人类的过错

穿过刺鼻的恶臭，我踩着满地垃圾走向底格里斯河畔。夕阳给朦胧的底格里斯河投下一层玫瑰色的红雾，几名天真的儿童正在浑浊的河水里嬉笑游泳……我的好朋友库巴大使就出生在巴格达市中心紧邻底格里斯河的黄金地段，库巴家族的所有男孩都是底格里斯河里的游泳高手。

古老的库巴家族盛产医生、商人和著名政治家，其中好几位担任部长以上的要职。由于现代社会此起彼伏的整人运动纷纷打着“政治”旗号，伤了百姓的心，所以现在一谈政治就有人谈虎色变、咬牙皱眉嘬牙花子。其实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说到美国、法国我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他们的民选总统。北大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教导说：“政治学是所有科学门类中最敏感的学科，国际政治是政治学中最敏感的门类。”库巴大使就是一个来自敏感国家、从事敏感职业的天性敏感的好人。他毕业于外交学院，年轻时留学法国、美国，担任过驻法参赞、苏丹大使和联合国大使。

1991年1月13日我在巴格达拍过一张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和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谈判破裂的照片，其中露了半个脑勺的就是库巴。库巴10年前就是阿齐兹五人高级代表团成员之一，西装革履领带挺括，威严得让人不敢接近。“同生共死的人互称兄弟”，海湾战争结束后库巴先生出任驻北京大使，由于共沐风雨把我看成无话不谈的手足。库巴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天性和德行”。按库巴的说法：“一个人的天性应该憨厚；起码的德行是不伤害人。”他甚至把我当作私人朋友，引荐给仅次于萨达姆的二号人物阿齐兹。

由于我和库巴都酷爱游泳，又都厌恶人工游泳池，所以每到周末他都开着大奔驰拉我到密云水库游泳。平时西装革履的外交家和我比赛着扒光衣服跃入冰凉的河水，穿越时光隧道追寻无忧的童年。我们彼此大喊着打水仗，爆发出孩子才有的开心大笑。通过清澈的河水，仿佛从长江、黄河游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游向人类共同的文明……



1991年1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到巴格达进行最后斡旋，露了半个脑勺的库巴是阿齐兹的高级顾问。（唐师曾　摄于1991年1月）

库巴大使是最优秀的阿拉伯语言学家，可以详细解释许多晦涩难懂的阿拉伯方言的细微差别，教给我许多阿拉伯世界鲜为人知的有趣知识。库巴夫人说库巴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写一部伊拉克近现代史，所以对我写的每本涉及伊拉克的书都充满兴趣。库巴提醒我：“人生有意义的生活经历是有限的，不能浪费。好书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写一个人的感觉和情感，讲自己的经历和对经历的看法，否则就没有意思。首先是‘唐’这个人有意思，其次才是文笔不错。”他要帮助把我的书翻译成阿拉伯文，好的翻译可以给书第二次生命。

我做梦也想不到海湾战争10年来，库巴经常游泳的底格里斯河已经沦落为一条散发着刺鼻恶臭的污水沟。看到库巴家乡的河流受到污染，就像我从小游泳的北京什刹海受到破坏一样难受。孕育巴比伦、亚述、空中花园、伊甸园、诺亚方舟等文明的母亲之河逐渐枯竭，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过错。



我和库巴夫妇在密云水库泛舟游泳。

像小蚂蚁般安详地生活

中国商船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停泊在底格里斯河口，现在的河口有一座中国建造的灌溉发电系统。由于水利设施被严重破坏，没有河水，雨水又少，农业成为很大问题。我随意闯进巴比伦附近的Muelha村，将车靠近一处冒着炊烟的农舍。主人哈米斯·哈桑（Khamees Hasan）哼着小曲正在橄榄树下挤牛奶，地上扔着一个巨大的塑料盆里面装满刚摘的小酸杏。这里的农家一律没有院墙，生活朝着田野开放，就像伊拉克人的生活传统没有遮拦。哈桑一家从1970年就住在这里，他得意地向我一一介绍自己的三个儿子：哈桑、载顿、奥玛尔；两个女儿贝娜特和罕特。哈桑全家养了一群牛，种了10公顷小麦，还有一个果园。由于国际封锁使伊拉克普通农民缺少农药、化肥和机械配件，一些上游国家趁火打劫，断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源，要求伊拉克人“用一桶油换一桶水”。各种困难交织在一起，哈桑一家收入锐减，几乎无法维持七口人的日常开销。

哈桑夫人害羞地缩在厨房里，正在准备传统的阿拉伯午饭，主食大饼有点儿像我们新疆的馕。二儿子载顿正熟练地帮妈妈烤大饼，两手插腰好像一个大男人。农舍很简陋，厨房像个牛棚，烤饼的大炉子改装自一个大号汽油桶，烧的不是柴火而是罐装天然气。在如此简陋的地方，居然使用现代的天然气，简直不可思议。哈米斯夫妇身穿传统的阿拉伯服装，屋内彩电、冰箱、洗衣机都是日本的日立，看得出伊拉克农民生活水平早在10年前就已经现代化。哈米斯一家有两个卧室、一个大客厅、一个带抽水马桶的洗手间，还有一个贮藏粮食的大贮藏室。哈桑夫人作为一个农妇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上学总是一件好事”。孩子们手中的课本残破不全，哈桑在一旁脸红红地解释这些破损不是他家孩子撕坏的，由于国际禁运，纸张奇缺，没有办法印刷教材，他们现在使用的教材还是上一个年级学生剩下的。而且现在由于是几拨学生共用，课本基本不能带出教室，10年来这些课本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由于美英怀疑伊拉克正从石墨中提炼核物质，所以连铅笔也列入禁运名单，我们带来的几把铅笔成了孩子眼中的奢侈品。望着孩子猫爪般的小黑手里捧着的破课本，我不由一阵心酸，想起“文革”中自己无助的童年。我把全身上下的小物件和几万伊拉克第纳尔塞给哈桑的孩子，可他们只收铅笔，就是不肯收钱。

主人哈桑最大的梦想是庄稼能有好收成。大儿子哈桑想当医生，二儿子载顿想当军官，小儿子奥玛尔想当工程师；不在场的大女儿贝娜特想当老师，小女儿罕特也想当医生。孩子们都喜欢英语，这和伊拉克的传统有关。尽管伊拉克和英美等英语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但基于前英国殖民地的教育传统，伊拉克人的英语普及水平仍然很高。老一代伊拉克知识分子大多在英、法、德国受过教育；新一代海湾战争成长起来的孩子缺乏稳定的学习环境，但对英美国家有盲目崇拜倾向。

当一个人被当作流氓、土匪之后就获得极大自由，被摈弃于国际社会之外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就在美国F-15战斗机霸道翱翔的蓝天底

下，上百万伊拉克人在底格里斯河畔像小蚂蚁般安详地生活。盛夏的亚述遗迹上一片丰收景象，一名身穿中国“常州”运动衣的男孩正弯腰伏在麦地里收割小麦。麦田附近河渠内清澈的河水滚滚流淌，牧羊人拉马丹放任自己的羊群漫山遍野地乱跑，他对自己的悠闲生活很满意。持续10年国际封锁造成的食品紧缺使他的养羊生意迅速发展，连他的羊也适应了美国飞机突然加速时的咆哮。



巴比伦附近农家正在用天然气烧火，烤汽油桶里的阿拉伯面饼。（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巴比伦、亚述巍然屹立，太阳照耀下的两河依然流淌，农民仍然在田间劳动，到处都是饱经沧桑的面无表情的面孔。天还是那么高、那么蓝，小鸟在F-15战斗机的阴影下自由飞翔。这里的路是铺好的，人民是理智的，货币虽有贬值，但尚未崩溃；他们还有汽油、食品；可以买到蔬菜，甚至还有罐装可乐。

联合国已经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专门负责评估和解决科索沃战争给多瑙河带来的毁灭性的污染，但是没有人对底格里斯河污染问题加

以关注……专家指出：战争对环境的污染不仅危害一代人，而是几代人。



巴格达街头，战争不能阻止恋爱的进行。（唐师曾　摄于

2000年5月）



巴格达老人悠闲地在茶馆里下棋。（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不灭的火焰

战争给老实人带来不幸，给投机者带来利润

医生说我活着已经是奇迹了，所以命令我老婆不停地给我吃药，要我睡觉。我常常在睡眠中憋醒，咳得青筋毕露，几乎窒息。洋人有种说法："许多人的墓志铭都这样写：30岁死；60岁埋（Many people's tombstones should read: died at 30, buried at 60）。"我不想行尸走肉地混一辈子。

伊拉克已经被联合国制裁封锁了10年，机器设备陈旧不堪，优质石油无法兑换外汇和急需物品，以石油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一蹶不振。农业设施落后，种子退化，化肥和农药严重不足，百姓的日子非常艰难。为救济老百姓，政府每个月凭卡供应生活必需品，很像我们20年前的购粮本、购货本。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仅2～5美元，与我们"文化大革命"时一模一样。工资最高的教授、总编一个月也只有10美元。看到这些，我真庆幸我们有一个务实、开明的政府，把误入"文革"歧途的中华民族挽救回WTO的国际大家庭，由此对那些仍然身处水深火热的阶级弟兄分外同情。

战争总是给老实人带来不幸，给投机者带来利润。战争中有人沦落、有人潦倒，也有人在逆境中顽强挺立。海湾国家没有计划生育，一般家庭的孩子都在三四个以上。由于阿拉伯妇女婚后只照料家庭，生活重担落在男人身上，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养活一大家子。巴格达大学历史系纳赛尔教授告诉我，现在读书的人少了，因为没有出路，做生意的多了，人得活命呀。



巴格达老城区典型的多子女家庭。（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10年前我首次撤离巴格达时，街上商店都封闭了，什么都没有。而现在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伊拉克被锻炼得什么都能制造了。一个富士胶卷2美元，相当于17块人民币，可是这已占去他们半个月的工资。除政府定量供应的商品以外，还有自由市场的高价商品，但这只起点缀作用，对老百姓没有实际意义。

伊本·纳赫·什本底药店位于Babi-Sheih区，由侯赛因·谢哈巴·迪恩经营，已有上百年历史。由于制裁造成药品短缺，政府号召百姓多用草药摆脱困境。什本底药店经营的都是传统草药，很像我们的中药

店，其中有些就来自中国，只可惜我不通医理，弄不懂其中奥妙。这里门庭寂寥、冷冷清清，店老板看上去最多只有30岁，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按西医看，我经营的什么都不是。漫长的封锁使我们万念俱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满足人民需求。老人、儿童对药品的依赖程度最大，许多儿童没有药吃。但作为药店的经营者，我千方百计地寻找药品来源，阿拉伯邻国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货源，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办法。由于白血病等重病治疗费用很贵，药品奇缺，而战争造成这种罕见疾病的发病率突然升高。”



由于持续10年的国际封锁，巴格达药品奇缺，许多传统医疗手段重新复兴。巴格达Babi-Sheih区的伊本·纳赫·什本底药店的侯赛因·谢哈巴·迪恩在药店出售各种阿拉伯传统药品。（唐师曾摄于2000年5月）

哈米德是退伍老兵，由于生活所迫做旧书生意：“伊拉克人喜欢读书，最受欢迎的是纳赛尔和萨达姆的革命作品。我的经营手法灵活：可租，可换，可买，可卖，这是一项挣不了大钱又饿不死的买卖。”

与巴格达商人相比，前往巴格达寻求商机的外国商人却生机勃勃。就在我们来巴格达的路上，几位在飞机上邂逅的“崇拜者”争先恐后地让我托关系找门路。海外商团掀起的狂风巨浪给封锁10年的巴格达市场带来活力，巴格达的小商小贩突然像一潭死水里的小鱼欢蹦乱跳。由于战争破坏百业待兴，连日常饮水设备都有亚美尼亚人在打主意。俄罗斯商人恨不能整军团地来做石油生意，中国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已经谈妥覆盖整个伊拉克的移动电话……

远离伊拉克

面对制裁许多有条件的伊拉克人选择外逃，这是所有生活窘迫者的自然选择，很像我们历史上的“下南洋”“闯关东”。人不但要生存，而且总希望追求美好的生活，但出国对普通老百姓谈何容易。首先得缴2000美元的保障金办理护照，这对每月4美元收入的普通人比登天还难。再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和30多个国家大打出手，有谁会欢迎伊拉克难民呢？



战前不善制造冷饮的巴格达人已经可以制造物美价廉的冰激凌。（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约旦一直是伊拉克亲密的邻国，约旦国王和伊拉克国王本来就是亲兄弟。约旦现有450万人口，真正的约旦人只有200万，其他如巴

勒斯坦人120万、东欧新娘5万、斯里兰卡女佣1万，还有数不清的伊拉克人。



Shorjia市场其他阿拉伯国家进口的清真奶糖，每250克售价500伊拉克第纳尔（0.25美元），但很少有人买得起。（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穆罕默德一家就是从伊拉克来到约旦谋生的，我们路过约旦时曾到他家拜访。穆罕默德是机械工程师，妻子曾在法国读书，能说非常漂亮的英语和法语，从她缓慢而标准的英语中，可以看出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他们夫妻俩均出身于伊拉克上层，双方父母都是伊拉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战前，他们在巴格达生活富裕工作稳定，战后两人一同失业，为了三个孩子举家迁到约旦。从他们身后没开箱的包裹可以看出，他们到这儿时间不长。后来女主人告诉我，她刚来两个星期；她丈夫已经来了半年，还没找到工作。

女主人做了顿可口的阿拉伯饭菜招待我们，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堆，把几天欠下的饭菜都补上了。可我老婆看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没碰碟子里的鸡腿，到门口SAFEWAY超市买了一堆零食，还买

了唐老鸭侄子造型的长毛绒玩具送给孩子们。穆罕默德没工作，家里没钱，孩子没法受教育，生活变得没有希望。他们说在约旦再找不到工作，就回巴格达去。穆罕默德是独生子，仍挂念在伊拉克的父母。穆罕默德举家外逃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质量下降，家族担心下一代在巴格达没法接受西方教育。

阿巴斯36岁，是记者、翻译；妻子是中学老师，生有三个孩子。他在巴格达兼职许多工作：翻译、写稿、做杂志、打工、做小买卖，可还是养活不了老婆和三个孩子。经朋友介绍，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际部阿文专家，帮助翻译、校订文稿，每月挣4000多元人民币。由此感觉颇好，想继续在友谊宾馆住下去。只是今年任期已满，他试探地问新华社领导："我能不能继续留在中国？"他的妻子说出她仍不愿离开的理由："这里很舒服，东西很便宜……"4000元月薪中，用上2000元就够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了，其余攒起来，有时还托人换成美元带回伊拉克。

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穆罕默德还没找到工作，阿巴斯的延期要求也还没有得到新华社的批准。

挑战禁飞令

阿盟秘书长马吉德最近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讲话，谴责美英轰炸伊拉克民用目标，使伊拉克遭受人员和财产损失。马吉德指出，自1998年12月16日以来，美英两国一再对伊拉克实施轰炸，不仅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数千人受伤。马吉德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迫使美英两国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停止入侵伊拉克。他强调阿盟（22国）完全站在伊拉克人民一边，要求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使伊拉克人民早日摆脱制裁所带来的痛苦。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以保护伊拉克南部穆斯林什叶派和北部库

尔德人为名，在伊拉克南、北分别设立禁飞区，扬言要把进入禁飞区的飞机一律击落。10年来没有任何飞机敢于冒犯以联合国名义颁布的禁飞令。从那个时候起，巴士拉和摩苏尔就成了美英飞机的试飞场，F-15、F-16想怎么飞就怎么飞，还隔三差五地向伊拉克居民区发射几枚导弹，“空袭可疑的军事目标”。禁飞区的伊拉克百姓对美英霸行敢怒敢言，甚至开枪开炮发射SAM导弹，只可惜射程有限，够不着以2马赫飞速掠过的美国飞机。转眼10年弹指过去，美英对伊拉克的禁飞、禁运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而且越来越不得人心。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主持正义的国家一再呼吁，要求解除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美英等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在制裁伊拉克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

自2000年6月以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率先不顾美国威胁，对伊拉克进行正式访问，萨达姆亲自为来访的查韦斯驾车，在多极世界里炸响一声春雷。随后意大利、俄罗斯、印度、法国以及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纷纷挑战联合国的禁飞令，恢复中断近10年的巴格达空中航线。卡扎菲的女儿艾沙最近乘一架挑战联合国禁令的利比亚飞机抵达巴格达拜会萨达姆，透露卡扎菲不久将访问伊拉克。卡扎菲这位大漠英雄，正争取成为伊拉克遭受制裁以来第一位访问巴格达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由英国议员加洛韦率领的一批和平人士也迫不及待地乘匈牙利包机从英国直飞伊拉克，这是10年来第一架从英国直飞巴格达的民航客机。英国一直是西方政治、法律的制定人和解释者，加洛韦的飞行没有向联合国监督制裁委员会或英国外交部申请批准，他在巴格达积极参加了伊拉克政府主持的“早日结束制裁三日论坛”。



海湾战争结束后挈妇将雏逃离家园的大丈夫。（唐师曾　摄于1991年3月）



伊拉克用于防空的四联20毫米高炮的射程对美英飞机无法构成威胁。（唐师曾　摄于1993年7月）

在美英看来，伊拉克今天遭受到的各种不幸都与制裁无关，而是伊拉克1990年入侵科威特的必然结果。美国为维护在海湾的战略利益，一直对伊拉克实施遏制政策。除设立禁飞区外还扶植伊拉克反对派，试图通过没完没了的核查和长期制裁拖垮伊拉克现政府，达到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美英强权势力竭力阻止“不服软”的伊拉克回到国际社会，防止不合作的伊拉克在海湾东山再起。在美英看来，在伊拉克现有政体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前，伊拉克平民生活有多悲惨并不重要。

打破空中封锁

2000年10月5日下午，在美英两国战斗机的眼皮底下，伊拉克航空公司的两架国内航班从巴格达萨达姆机场起飞，首次跨越美英在伊拉克划定的禁飞区，分别前往400公里外的南部城市巴士拉和距巴格达450公里的北部城市摩苏尔。

13时50分左右，从巴格达飞往巴士拉的伊拉克航班飞临巴士拉机场上空，所有人都看清了飞机上的绿色飞燕标志，这是伊拉克航班10年来第一次飞临巴士拉。到机场欢迎的观众至少超过1万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双手高举萨达姆总统的画像。“这些年我们看到的都是敌人飞机，今天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飞机！”人们喜极而泣，相互拥抱。

这架俄罗斯生产的客机在跑道上缓缓停稳，舱门打开依次走下114名乘客，其中包括一名法新社记者，他们立即被当作英雄包围起来。整个飞行随时有被美英战斗机击落的可能，最高飞行高度8400米，整个行程历时50分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架载着42名乘客的“安东诺夫”客机在北部

城市摩苏尔安全降落。伊拉克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今后两条国内航线每天都有航班”。正在开罗访问的伊拉克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哈夫在与穆巴拉克会晤时声称：“尽管受到威胁，这些客机将继续在这些航线上飞行，我们的目标是彻底粉碎美英的犯罪行为强加给伊拉克的非法的禁飞区。”

我驾车环绕美国也环绕利比亚、伊拉克，阿拉伯人的通行想法是，如果国际法院判定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过激行为是恐怖主义，那美国对利比亚、伊拉克的轰炸同样也是恐怖行为。如果10年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那现在伊拉克已经变成被美英入侵了。

我眼中的伊拉克就像一个当众抢劫被警察抓住的小偷，由于情节恶劣引起公愤，旁观者群起而上将其暴打一顿，所有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这个小偷已经被痛打10年，参加群殴的旁观者已经失去当初的热情，逐渐对失去还手力量瘫倒在地的“前小偷”失去愤怒，转生怜悯。这时候只要人群中有谁轻喊一声“停”，大家就会住手，甚至会马上把遍体鳞伤的小偷送进医院。聪明的伊拉克人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间，在美国人忙于大选的特殊时刻，不费吹灰之力就打破了空中封锁。



鸡蛋是封锁中的奢侈品。（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傲慢的偏见

1998年骨穿手术后，我的身体始终没有复原，人突然老了很多，开始以一种老气横秋的眼光看待生活。写的文章也反复出现类似的主题，反映一种不积极的世界观。根本原因是我的心老了。

受我师萧乾影响，我理解的人生就是一个缓慢的死亡过程，从健康到疾病，从纯洁到污浊，从十全十美到一无是处。人生就是一个恐怖的“死亡之旅”。西洋人认为：“如果你20岁不美丽，30岁不强壮，40岁不富有，50岁不睿智……那你这辈子就达不到上述目标了。”受前辈们启发，我在《我钻进了金字塔》中把“人过七十古来稀”换算成365天×70年=25550天。在这短暂的70年里，前20年得上学，后20年得退休，剩下中间30年找工作、上户口、追女孩、评职称、买房子、赡养老人、繁殖后代……“生命短得来不及干小事（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大概出于对生命短暂的恐惧，死亡意识总在我

眼前时隐时现，就像99之后必然是100一样，只不过如三国祢衡所说“卧者为尸，坐者为冢”而已。为此我尊重世间一切神秘的事物，相信梦幻和自己的预感，拼命与死神赛跑，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每一天，甘愿冒倾家荡产的风险重返伊拉克。

西方始终怀有一种傲慢的偏见，基于机械的数字统计，认为西方文明可以改变历史。他们习惯把世界纳入他们熟悉并乐于看到的轨道，为推行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惜使用武力。他们不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不仅需要足够的物质文明，更需要物质以外的文化心理素质。恩格斯说：“历史是按人类社会所有成员合力方向前进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200年内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被国际社会孤立出去的伊拉克的楔形文字已经至少存在了7000年。仅从海湾战争10年来的短暂时间无法看出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即使在这短暂的10年里，萨达姆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显然比各位美国总统略胜一筹。



巴格达的小贩正在叫卖刚出炉的面包。（唐师曾　摄于2000

年5月）

海湾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而是保持自己的社会结构不受破坏。从这一角度讲，科威特、伊拉克、美国都是海湾战争的胜利者。海湾战争终于给布什机会以“解放军”形象进驻中东，和平进程从此在美国“一手遮天”的情况下紧锣密鼓。由于美国按自己设定的和平框架构筑中东和平，所以一味偏袒以色列。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仅仅几个月就惨遭轰炸、制裁10年；以色列占领广大阿拉伯领土已经将近半个世纪，精通法理的美国却置若罔闻。

2000年11月30日，62辆巨型卡车满载面粉、食糖、大米、食油、药品和医疗器械，从饥寒交迫的伊拉克出发穿过约旦前往巴勒斯坦。萨达姆作为22个阿拉伯国家中仗义疏财的老大哥，率先向惨遭以色列屠杀的巴勒斯坦人民送去第一批人道主义物资。伊拉克贸易部长萨利赫解释说：“另外还有一批物资将很快从安曼直接送往巴勒斯坦。”海湾战争我曾随萨利赫部长向伊拉克难民发放救援食品，10年过去，就在萨利赫向巴勒斯坦发放救援物资的同时，沙特、科威特也分别向巴勒斯坦捐款2.5亿和1.5亿美元，22个阿拉伯兄弟国家在反对以色列问题上空前一致。

英国不喜欢伊拉克了？

中东是历史上战事频繁、英雄辈出的敏感地带，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战事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都发生在中东。公元前1469年，埃及法老图特摩斯在巴勒斯坦大败叙利亚人。公元前218年，迦太基的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雪山战胜罗马人。1789年，埃及马穆留克骑兵大败拿破仑......据我在世界各地肤浅的旅行经验，只有那些饱尝战火的勇敢民族，才具有鉴别真假英雄的慧眼。在整个中东地区赢得普遍尊敬的部队，只有英国军人。近代史上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曾经依靠一支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极强的军队统治全球。为以少制多，增强部

队战斗力，大不列颠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军队的素质，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以及刻板军纪、坚强意志和幽默风度闻名于世。叙利亚、以色列、约旦、伊拉克、科威特、也门、巴勒斯坦、埃及、苏丹……几乎所有的中东军队，都是按英国操典创建的。当然，这与大英帝国征服过这一带有关，但更多源于英国军官百折不挠的绅士风度。在当今许多中东国家，如阿曼、卡塔尔、沙特、约旦……许多国家的元首，都从英国圣桑切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就连坚决反对英美的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也是英国装甲通讯学院的毕业生。

早在海湾战争以前，伊拉克一直是美英等西方国家争夺的朋友。由于英帝国对中东石油的特别关心，仅英国圣桑切斯特军校每年就从伊拉克遴选两名以上的优秀青年到英国免费接受军事教育。纳比尔·卡利夫（Nabil Khalif）准将是伊拉克驻华大使库巴的亲家，自幼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里。他1954年进圣桑切斯特军校，是阿曼苏丹卡布斯、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罕的同学。一直到两伊战争期间，他亲手操纵过来自英、美、法、苏、中、德、捷克、比利时、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100毫米火炮。卡利夫曾经为阿拉伯利益和伊朗作战，平定库尔德叛乱，还在基尔库克驻防一年，指挥世界上最大石油城的卫戍部队。至今他服装整洁，因为“圣桑切斯特的学生不能没有领带夹”，“军人只有一张脸，但圣桑切斯特有千张脸”。

说起蒙哥马利，卡利夫充满崇敬：“蒙哥马利的贝雷帽上有两个帽徽：一个步兵徽、一个坦克徽。根据传统，军官进入餐厅前必须把军帽摘掉挂在外面的衣帽钩上，每天都有人和蒙哥马利的帽子合影，吃饭结束前再偷偷还回来。能戴蒙哥马利的军帽照相真是一种荣幸。”连对英国有感情的卡利夫也弄不懂从什么时候起美英突然不喜欢伊拉克了。即便如此，在伊拉克相当的人群中，仍然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心怀眷恋。

卡利夫将军把我带到著名的艾勒维亚俱乐部，该俱乐部建于1924

年的殖民时代，建筑风格近似中世纪古堡，昏暗、巨大、神秘而恐怖，属于内部会员制，不对外开放。里面坐着几十位吃穿不愁的人，中间是土耳其风格的乐队和歌手，唱着凄楚而亢奋的阿拉伯歌曲。

多年战乱使老将军的3个儿子死于疾病："他们都是发烧死的，其他一切正常。一个只活了16个月，一个活到2岁，另一个……"老将军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帕帮我擦去脸上的鼻血，"像你一样，总出血。总流鼻血决不是好事，孩子，你应该去约旦检查一下，我打赌你的血有问题。"

每月10美元就可以过天堂般的日子

新华社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顾正龙每次来电话的头一句都是："今天鼻子流了几次血？"连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部长胡马姆、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张维秋都帮我堵过鼻子。我这个不争气的破鼻子总在人多的时候丢人现眼，弄得我"花容"失色狼狈不堪。

张大使1941年生于河北保定，毕业于外交学院、外语学院，是一生待在阿拉伯地区的职业外交官。海湾战争我在伊拉克挨饿时，张大使正在巴林当大使，整天躲在地下室里看CNN、BBC，尽管房子震得地动山摇，可大家衣食不愁该干什么干什么。从这一角度讲，我和张大使是海湾战争不同战线的战友。

使馆文化专员李景方毕业于北大东语系，和10年前住过这栋房子的曹彭龄将军是前后系友。我平躺在两位师兄住过的地板上让塞了药棉的鼻血凝固，李景方坐在身旁和我老婆轮流用浸了凉水的湿毛巾为我冷敷，我仰望天花板体会着什么是时光倒转。一时间灵魂出壳，仿佛自己的灵魂正摆脱躯体挣扎着飞向天花板，升到天际偷窥自己扔在地板上的肉身。

海湾战争期间曹武官和我在这里度过无数个艰难的不眠之夜，恍

惚间曹师兄就变成了李师兄。两位学长充满爱心地照顾共同的小师弟，就像兄长照料在调皮捣蛋打架中受伤的小兄弟。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在地毯上和我闲聊的一会儿是老李，一会儿又变回曹武官、郑大使……我要终生感谢这些帮助过我的好人，可惜我大脑中全是感情而不是句子。

李景方、詹参赞在当年曹武官请我吃饭的AL SAAH（时光）餐厅为我接风，“时光”使我的巴格达之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令我惊奇的是在这家巴格达最好的高级饭店，一顿丰盛无比的阿拉伯大餐，从“库斯”（羊肉）到“祖拜迪”（烤鱼）应有尽有，结账时竟然不到300元人民币，而同样的饭菜在北京至少人民币5000多块。李景方说现在在巴格达每月只需10美元就可以过天堂般的日子，他每月用在周济伊拉克穷朋友上的花费都得几十美元。



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畔阿卜·努瓦兹大街的传统烤鱼。（唐师曾　摄于2000年5月）

离时光饭店一箭之地的街口几年前发生过恐怖事件，一帮来历不

明的冲锋枪手袭击了萨达姆的长子乌代，尽管乌代死里逃生，但被打断双腿再也无法站立行走。

时光饭店对门新开了家中国礼品店，靠卖廉价的中国货发了大财。可与此相反的北方公司上个月运到一船芸豆，伊拉克借口质量不好拒绝接受，一下就损失美元1000多万。

善良的李景方在使馆顶层养了一群鸽子，想不到鸽子数量越来越多，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原因是由于制裁食品短缺，连鸽子都知道择木而栖加入李景方的大家庭。在大师兄的鸽子振翅高飞的蓝天之下，伊拉克空中英雄阿卜杜拉·埃比·图哈巴的巨大雕像在伊拉克空军部门口巍然屹立。图哈巴在1984年对伊朗的空战中，弹药用尽，最后像日本神风敢死队那样冲向敌机，撞机而死。

“被开除”的历史

2000年9月初，回国述职的伊拉克驻华大使库巴从巴格达打来电话，要求我10月份不要离开北京，他要“尽快”和我见面。由于通讯线路太差，没等库巴讲完，电话就突然中断。我知道库巴讲的尽快见面是什么意思，我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好朋友、中国前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当时新华社的个别人正撺掇社长严惩我，说我“私自前往巴格达”罪重如山，还向北京各媒体通报“不许刊登署名新华社记者唐师曾的稿件”。幸亏社长圣明，没让这帮小人得手。

		[illegible]	¥1,642.32	88888
20000801取	1,630.00		¥12.32	01810
20000824登		808.07	¥820.39	88888
20000911取	815.00		¥5.39	1570
20000926登		808.07	¥813.46	88888
20001025登		1,023.00	¥1,836.46	88888
20001128登		1,023.00	¥2,859.46	88888
20001223登		0.00	¥2,859.46	88888
20010121登		0.00	¥2,859.46	88888
20010227登		0.00	¥2,859.46	88888
20010327登		0.00	¥2,859.46	88888
20010430登		0.00	¥2,859.46	88888
20010525登		6,476.00	¥9,335.46	88888
25				
26				

2000年底，我因“私自前往巴格达”，在新华社摄影部党员大会和处级以上大会，先后两次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邵华泽、何鲁丽、唐家璇等前辈仗义执言，以行动声援老鸭，为老鸭题字，印在第一版《重返巴格达》彩页上。倪萍、李景方、崔永元也展开多方营救，分别动用各自的“关系”去新华社为老鸭说情。第一版《重返巴格达》卖到15万册时，新华社声称从未开除过唐师曾，也的确没有任何档案记录。只有这份一度停发五个月工资并于第六个月补齐的存折，能够证明曾经发生过的事。那时我前妻肚子已经大了，肚子里孕育着亚述。

历访中东风云人物的记者战士
唐师曾同志

唐家璇
1999年9月15日

重返巴格达

杨福昌
二〇〇〇.八

唐小弟：

多写好文，

并注意健康

[illegible]

九九年九月十六

当时只有少数熟悉内幕的中东问题专家掌握唐老鸭“重返巴格达”的综合价值。其中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礼宾司司长鲁培新、亚非司司长吴思科、条法司司长王厚立、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都是我最坚决的支持者。外交部长唐家璇把我称为“历访中东风云人物的新闻战士”。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多边关系发生重大改善前夕，个别中国人在伊拉克的纯民间交流行为只会有益于中国国家利益。在世界各国打破封锁、呼吁停止制裁的先行者当中，我和我

老婆是绝无仅有靠私人力量前往巴格达的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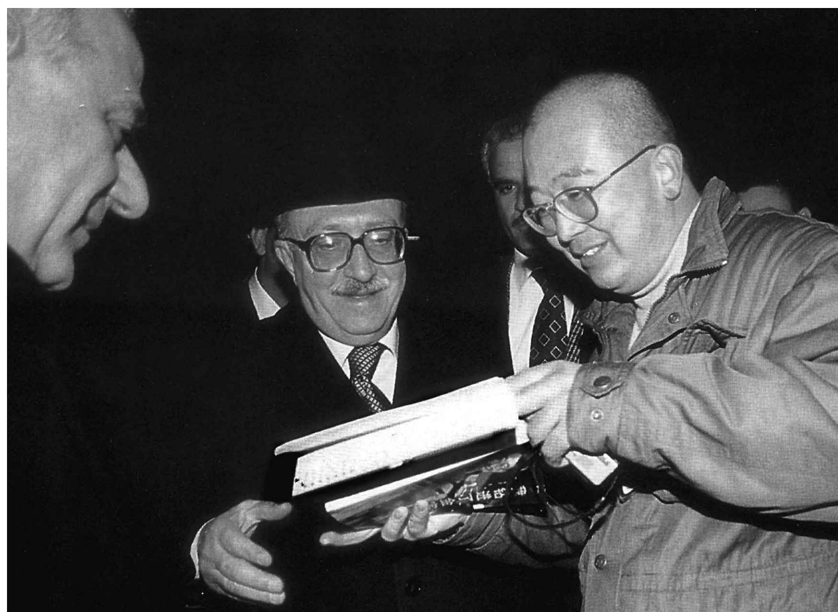
11月中旬，我去亚布力滑雪时再次接到库巴从大马士革打来的国际长途，说他从巴格达给我带来一件特殊的礼物，希望我在11月26日以后的3天里待在北京别动。

11月26日晚，我从国家南极训练基地飞回北京。与此同时，以副总理阿齐兹为首的伊拉克高级代表团的专机正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俄罗斯为伊拉克提供的政府专机平缓地在专机楼前停稳，现任伊拉克总理特别顾问的库巴大使正怀抱带给我的阿拉伯大烟枪笑眯眯地看着我。这是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国家领导人首次乘飞机出国访问，伊拉克高级代表团乘伊拉克航空公司班机飞到大马士革，再换俄罗斯专机飞抵北京。

11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阿齐兹认为，只有顶住美国的压力，才能改变美国对伊拉克的敌对政策。阿齐兹感谢中国对伊拉克的支持，希望进一步加强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钱其琛指出，国际上控制别人的做法不得人心，中国支持伊拉克为打破制裁所做的努力。中国对伊拉克改善与邻国关系、发展国际合作表示高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伊拉克的朋友，愿为伊拉克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继续努力。钱其琛强调中国重视发展与伊拉克的双边友好合作，一直鼓励中国公司积极参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方愿与伊方一道探讨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的途径。

阿齐兹与外交部长唐家璇会谈时说，美国长期以来奉行敌视伊拉克的政策，践踏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不是要解决海湾问题，而是要推翻伊拉克现政府。唐家璇在会谈中强调，中方十分关注伊拉克问题的发展，对伊拉克人民因遭受长期制裁所蒙受的苦难表示同情。唐家璇指出，某些西方国家设立“禁飞区”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无视和践踏。空袭不仅造

成伊拉克大量平民伤亡和物质损失，而且加剧了紧张局势，我们对此予以坚决谴责。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谋私利，在伊拉克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伸张正义，10年来为早日解除对伊拉克制裁在安理会内外作出了自己的积极努力，今后中方将继续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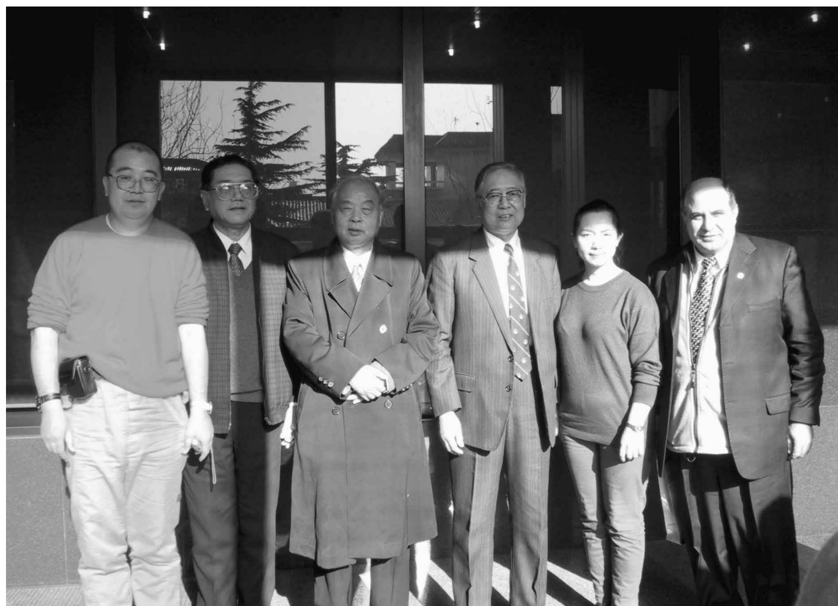


库巴大使把我写的两本书当面送给阿齐兹。

11月28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对伊拉克人民因制裁蒙受的苦难深表同情。江泽民说，早日公正合理地解决伊拉克问题不仅有利于实现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有助于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希望伊拉克在实现解禁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会见结束后，阿齐兹接受我的独家采访。海湾战争前我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采访过他和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库巴大使把我写的《我钻进了金字塔》《我从战场归来》两本书当面送给阿

齐兹。阿齐兹看到书中当年我拍摄他任外长时的新闻照片，对我始终关注中东和平进程、促进中伊民间相互了解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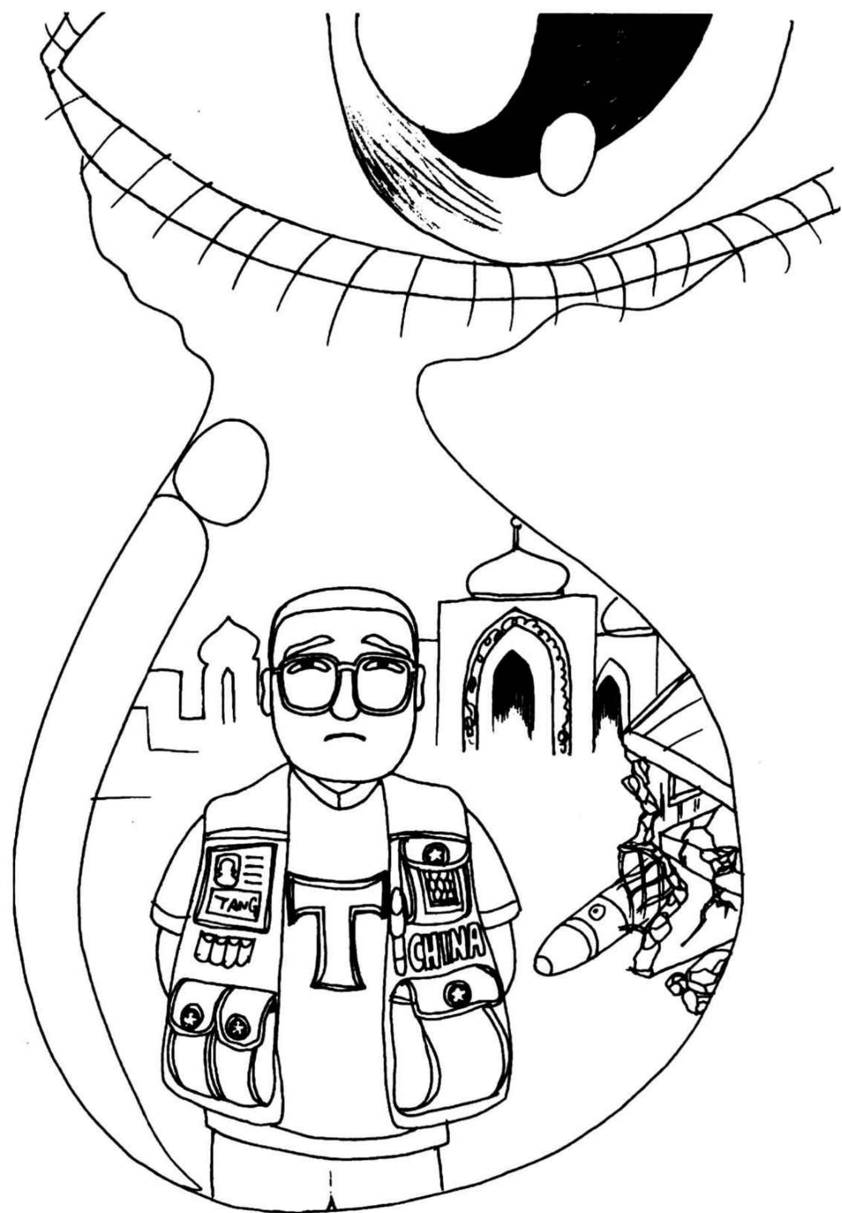


2000年底，我前妻王淳华的纪录片《重返巴格达》在京首发，郑达庸、邵华泽、杨福昌、萨法日尼等纷纷前来捧场。纪录片原名《不灭的火焰》，审批未通过，改名后方得以问世。

就在新华社摄影部在党员大会和处级以上大会两次宣布开除我的公职和党籍之际，《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黑明把我写的书送给了丁关根。丁关根不但否决了我的“被开除”，还让我参加作协“青创会”。“青创会”在北京连续召开7天，开到第4天我突然成了代表。这以后就没人再提过开除我的事儿，相关的文件也自此泥牛入海，销声匿迹，那时我才知道权威机关是可以修改任何历史记录的。只有老人们依稀记得我被开除过，21世纪新来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继续把我当成英雄膜拜。黑暗的日子结束了，太阳照常升起，但留在心中的阴影，就像海湾战争综合征和再生障碍性贫血一样，会一直跟我到死。

我还会再来

2000年5月我冒着被开除公职的危险去巴格达时，纯属被逼无奈。如果我遭受不测，所有责任由我个人承担，因为我用的是私人护照。但我更希望成功，成功对我的国家和人民大有好处。当我告别巴格达时，我看到我老婆眼里含着泪水，在她的泪光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悲壮之美。



这是我第五次来伊拉克，与以往不同的是，带着照顾我生活的老婆；以后我还会来第六次、第七次，带着梦想中的孩子。那时我一定坐飞机从天上来，不用再担惊受怕走“死亡之路”。我相信21世纪会有

更多的同胞自由自在地走向世界。成千上万发明甲骨文的华夏子孙走出国门去拜访发明阿拉伯数字的印度、发明楔形文字的伊拉克、发明象形文字的埃及……足迹踏遍文明古国以及我们所有的邻居的国土，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

我喜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我一直崇拜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出色男子汉，他们靠自己的聪明勇敢使许多罗曼蒂克的想法美梦成真。思想会有反复，信念坚定不移，事实一去不复返。人若不能主宰自己，还能为别人干什么。佛说："若为善事，不惜身命，罢散自事，营成他事。"事前的思考是简单的，事后的回忆是多样的。我们今天的所有行为不仅创造现在的美好生活，也创造将来的历史。

跋
多媒体时代到来之前

唐师曾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问题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商业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每个人都埋怨自己长相不够漂亮、金钱不够多、房子不够大、地位不够高……无穷的商机使人的欲望永无止境。

10年前我在金字塔下萌生“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梦想时，曾幻想得到新华社的全力支持，得到卡内基、杜邦、梅隆、洛克菲勒那样有品位的大财团的鼎力赞助，历史上从哥伦布到利文斯通、斯坦利的历次探险都是如此。这种属于上个世纪才有的天真想法几乎葬送我的一切。

“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按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前20年上学后20年退休，剩下中间30年找工作、追女孩、买房子、赡养父母、繁殖后代……

作为一名四海漂泊不知所终的摄影记者，我的生命就像我手中相机的快门一样，是以若干个1/1000秒组成的，我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读书走路可以体验生命的深度和厚度。面对有限人生的诸多诱惑，我必须谨慎选择每一个曝光瞬间，尽量避免不负责任的空泛议论，远离那些戏剧化的哗众取宠。

我希望能把“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继续下去，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我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走完全程。我需要善良人的各种支持，因为我已被自称“商业运作”的欺骗吓破了鼠胆。漏洞百出、仓促上阵的商业表演不仅对各民族间的融合没有积极意义，还会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人类需要圣保罗、玄奘法师那样圣徒般的远征，只有目标坚定、生活简单才能做出余纯顺式的英雄壮举。

我在寥无人迹的巴比伦花2美元买过一个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雕塑，萨尔贡是高级祭司的私生子，出生后被扔进涂了沥青的芦苇筐顺底格里斯河漂流而下。萨尔贡被王宫里的挑水人无意中捞起来，精心抚养长大成人。萨尔贡曾经开创崭新的军事理论，以轻装方阵取代装备精良的重装步兵，先后征服叙利亚、小亚细亚、印度、埃及……萨尔贡一生打过34仗、擒获50名国王。由于他“强迫全国只有一张嘴”，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独裁者”。

正在走向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听到多种声音，在CNN、美联、路透、法新社垄断的媒体世界，必将出现更多的中文、俄文、波斯文、印地文、阿拉伯文……就像大森林里百鸟齐唱的晨曲。

21世纪需要从更多角度去看和记录的历史。那时网络和多媒体尚未普及，作为记者，我只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基本加工，简单处理后立即以新闻的速度传播。不计时间成本地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所记录的这段历史，就算多媒体时代到来之前最早的“多种声音”吧。当各位看到此书时，我已经从中东火海进入南极冰山。我只希望通过《重返巴格达》一书，为推进整个世界的和平、环保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000年12月

南极中国长城科考站